



20

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岸

[俄罗斯] 尤·邦达列夫 著
索 熙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岸

[俄罗斯] 尤·邦达列夫 著
索 熙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7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98-0559

Ю. БОНДАРЕВ

БЕРЕГ

МОСКВА,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岸/(俄)邦达列夫著;索熙译. - 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
1998.10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ISBN 7-5016-0146-1

I. 岸… II. ①邦…②索… III. 长篇小说-俄国-现代
IV. I51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0351 号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51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5.125 插页 1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定价 20.50 元

前 言

本世纪七十年代,正当欧美文坛流传长篇小说危机论之际,以俄罗斯当代著名作家尤·邦达列夫为代表的一些前苏联作家却在积极探索长篇小说的新路子,追求作品描绘生活的广度和进行哲理思考的深度。

一九七四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岸》就是这样一部描写战争、政治、意识形态、两种文明、道德准则等问题的、结构和情节都颇为复杂的多层次、多线索、多问题的作品。

《岸》共分三部:《到彼岸》、《疯狂》和《怀旧》。首尾两部写主人公作家尼基金及其随同翻译、作家萨姆索诺夫应汉堡书商赫伯特夫人之邀访问西德,插写在首尾两部之间的《疯狂》则描写一九四五年苏军炮兵排长尼基金中尉在离柏林五十公里的德国小镇柯尼斯多夫的遭遇,属于“回溯”性质。这种“回溯”有别于按从古到今的历史连续性叙述故事的传统的结构手法,而是与“时空凝聚”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即把一切事件集中在时空有限的现实(访问汉堡的五天),然后“回溯”也是时空有限的过去(驻军柯尼斯多夫的五天)。构成小说中的小说《疯狂》的相对独立但又必不可少的篇章是双层交错“回溯”的第一层次,即小说各篇章之间的今昔“大”交错的叙述层次。而在描写现实生活的各篇章中,借助主人公的内心独白、回忆、联想以及梦境、幻觉等意识流活动再现了其青年时代的美好时光、令人陶醉的创作活动以及访问中的种种会见、谈话、争论、见闻、感受等等,形成双层

交错“回溯”的第二层次,即散见于各篇章中的今昔“小”交错的叙述层次。作者正是通过这种不同时空穿插的双层交错、“回溯”的联想结构,以突破篇幅集约的限制,扩展作品的容量,既反映现实生活中的众多重大问题,融合各种创作题材因素,又再现永志不忘的战争往事,把历史与现实,过去与现在,把主人公的个人生活进程,即其精神世界的形成和对真理的探求,与历史进程覆叠交错地融为一体,以现在联系过去,用过去检验现在,即以战争的法则和教训来看待现实生活的矛盾与问题,同时又从现今的角度去观察战争中发生的种种事件。正如作者说的那样:“当今不能与过去的实质因素分离,否则它就不会存在,不但如此,道德的维系也要中断。现在总包括着过去。”^①

从时空高度集中的特点中可以看到邦达列夫以往作品(五十年代的《营请求火力支援》和《最后的炮轰》、六十年代的《热的雪》)中常见的“新三一律”原则的延续;从交错综合的方法中则可以看出邦达列夫从事电影创作活动(影片《解放》脚本的编写以及《最后的炮轰》、《热的雪》等改编成电影脚本)中的经验的运用。至于把战争作为永志不忘的往事加以再现,既是苏联文学中一个重要的普遍现象,也是邦达列夫作为“前线一代”作家从纯粹战争题材作品的创作过渡到当代生活题材作品的创作的一个特色。综观这位在文坛上辛勤耕耘近半个世纪的作家迄今写出的七部长篇小说、四部中篇小说以及不少短篇小说、微型小说、电影脚本,《岸》应是他的一部划阶段的作品。

《岸》又是一部多线索的作品,贯穿全书有三条主要线索:战争、爱情、探求。

小说开篇就响起战争的回声,但直接描写战争主要是在以

^① 引自尤·邦达列夫《寻求真理》,莫斯科现代人出版社1979年版,第237页。

《疯狂》为题的第二部。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的一九四五年五月，战争即将胜利的日子，尼基金所在连队奉命驻守疗养城镇柯尼斯多夫。爱玛姐弟的出现、德寇自行火炮的突然袭击、与据守林务所的“狼人”的战斗……对尼基金和他的战友来说都是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不仅是敌我双方之间的火与血的考验，而且是法西斯侵略军土崩瓦解、苏军胜利进攻的条件下苏军队伍内部在道义上的考验。在考验中，苏军指战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表现，即炮排排长克尼亚日科和尼基金与炮连连长格拉纳图罗夫和炮长麦热宁的不同表现。格拉纳图罗夫向克尼亚日科提出“我们到底是敌人还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的问题，只能在上述这种背景下得到解答。

林务所前，被法西斯匪徒操纵和驱使的“狼人”受到炮击发出疯狂的“畜生般的嚎叫时”，克尼亚日科独自一人挥舞着手帕前去劝降，企图“用自己清醒头脑的疯狂一着来制止这种疯狂”。克尼亚日科的“疯狂一着”以他的死亡而告终。作者把克尼亚日科的死亡作为人性的最高表现，着力塑造一个纯洁、美好、崇高的形象。尼基金赞颂说：“克尼亚日科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勇敢。他所以牺牲就是因为他比我们大家都好。”少尉军医加丽雅·阿克肖诺娃也说：“他是最好的……是你们当中最好的。”战士们也给克尼亚日科以正确的评价：“他严峻，但是公正”，并无情地揭穿了麦热宁的怯懦和卑鄙。

麦热宁这样的人物性格不仅在邦达列夫的创作中，甚至在整个苏联文学中都堪称创新。麦热宁虽是炮连最佳瞄准手，但他的灵魂却是肮脏的。他经不起胜利的考验：他为了保命不愿迎战发起突然袭击的德寇自行火炮；他企图奸污德国少女爱玛，当后者为尼基金所救，他又血口喷人，反诬尼基金，并把爱玛当做“女间谍”而抓住不放。格拉纳图罗夫，这个自负、粗鲁的连

长,与麦热宁气味相投,他津津乐道自己在卫生营里的“艳遇”,以此伤害同志;他残酷地对待俘虏,进行报复;他由于自尊,不惜给尼基金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当然,他与麦热宁略有不同。他的“吹牛”背后隐藏着他对女军医的真挚恋情;他的暴虐行为与他全家人在斯摩棱斯克惨死于法西斯匪徒铁蹄下有关;克尼亚日科牺牲后他能捐弃前嫌,尼基金违反纪律,他能不挟私仇,妥善处理。尽管如此,格拉纳图罗夫作为胜利进军的苏军指挥员,他未经得起胜利的考验。

尼基金与爱玛的爱情是贯穿全书的情节主线。二十六年前的一段复杂的恋情,构成奇异的浪漫史。这一浪漫史发生在战争尚未结束的日子里,特别是在被尼基金视为终身楷模的克尼亚日科牺牲的悲痛欲绝的情况下,无疑也是尼基金的一种“疯狂”。至于爱玛,她对“救命恩人”则是一片痴情,终身难忘。事隔二十六年,当年的爱玛,现今的生意兴隆的商业家赫伯特夫人在西方出版的书里发现尼基金——她的“瓦吉姆”的照片后,以汉堡文学俱乐部的名义邀请他前去访问。访问汉堡的尼基金已是一位年近半百、饱经沧桑的作家。他谈到自己时说道:“我早上刮脸的时候照镜子,有时就会产生一种天真的、自我解嘲的想法:两鬓斑白了,虽然还差一点才到五十岁。其实,主要的岁月是在那镜子后面……”与爱玛的重逢使尼基金心绪郁结,耽于内省,日夜不得安宁。往事历历在目,其意义何在呢?如果一九四五年的年轻中尉尼基金对他们之间的爱情以及存在于他们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鸿沟不甚了了,那么一九七一年汉堡重逢时的作家尼基金则看到使他们分离的一种不可克服的社会力量。这种力量在一九四五年是战争,在一九七一年则是国与国之间的对抗、“冷战”。虽然在汉堡他们之间可能重新燃起爱情的火焰,但是他们都有所克制。不论是尼基金还是赫伯特夫人都意识到他

们各自站在不可逾越的两岸上。

汉堡访问的重要内容是尼基金与韦伯出版社总编迪茨曼之间展开的一场争论。但小说中,对这场争论的描写与对战争以及尼基金与爱玛重逢的描写相比显得逊色。在论战的舞台上,尼基金的形象与虽对生活 and 未来失去信念但却能言善辩的西方文人迪茨曼的形象相比,显得苍白无力。

尼基金死亡前的思索和梦幻是全书各条线索的汇总。上述这些交流访问、爱情纠葛、战争往事、对话或争论等情节线索都只是小说外在的情节线索。在情节的敷演上,邦达列夫有自己的美学追求。他在《致我的读者》一文中谈到古典文学作品的情节铺叙时说道:“大师们笔下的情节决不浮于表面。它是作品潜在的发展,如同一股潜流。”《岸》中也有“潜在的发展”,有一条内在的情节主线,那就是主人公的反思和探求。

登机返程的途中,身心交瘁的尼基金脑海里如同走马灯似地浮现出他一生中悲欢离合、酸甜苦辣的一幕幕幻影:喧嚣的人间地狱罗马和僻静的西伯利亚故乡、通古斯卡河两岸原始森林中平静的夜晚和被杀死的两只漂亮的小松鼠、六岁儿子的夭折和妻子丽达的关心、“眼睛碧绿、举止敏捷、身材像柳树般挺拔的克尼亚日科中尉”和自以为是、纠缠不休的萨姆索诺夫、柯尼斯多夫小镇上初会的爱玛和汉堡机场分手的赫伯特夫人……生活中充满悲欢、善恶、美丑、生死……尼基金不断探索生活的实质,并寻求消除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敌对的途径:“生活的实质就在生活本身之中,它毫不迟疑、毫不停顿,以闪电般的速度奔向不可知的、幸福的‘后来’”;“人的一生都寄希望于未来”;人生的职责应是关心他人,“丽达——她想承担我的痛苦。而我……却想承担另一个人的痛苦——爱玛的痛苦……承担别人的痛苦,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疯狂,这是理智所难以理解的。但也许正

是在这里含有我们心里所有的最富有人性的、最主要的东西？”

与爱玛的重逢、与迪茨曼的辩论、与萨姆索诺夫的争吵造成的几天的紧张生活以及过量的白兰地和咖啡、睡眠不足、疲劳过度，导致尼基金死亡。尼基金的死亡可能引起一些读者的不解。主人公的死亡实是艺术家手中一个强有力的艺术手段。何况仅有的两个贯穿全书的男女主人公经历了战时和战后的长期别离，再次相逢后，一个抱着对未来的期望——哪怕是渺茫的；另一个却突然死去，怎么不让读者产生强烈的反响呢？那么主人公死亡的含义何在呢？虽然死神夺去尼基金的生命，但他的一生证明克尼亚日科和尼基金的世界比起麦热宁、格拉纳图罗夫、萨姆索诺夫等人的世界来要光明、纯洁得多。虽然他无法达到“那个绿色的、天国般的、蜂蜜一般的夏日幸福的彼岸”，但他终于悟出人的真正幸福：一个人“尝尽一切苦难、疑虑、探求、斗争”，“掌握了不可思议的奥秘——不再害怕死，这时他才是真正幸福的。”大公无私，关心他人，无所畏惧，追求真理，这就是幸福。

邦达列夫早期作品《营请求火力支援》的主人公叶尔马科夫对死亡是这样看的：“死亡——这是空虚和孤独。”把前后两个主人公对死亡的两种不同理解对照起来，就可以看出邦达列夫在《岸》中是站在什么样的哲理高度来探索人生奥秘的。

作者本人提到《岸》时指出，书名《岸》本身蕴含了一切。的确，作为小说篇名的“岸”这个词不止一次出现在小说之中，具有多种内蕴：它时而表达出某种感受或预感，时而又闪现在回忆之中，时而又体现出某种情绪，时而又作为看得见的实体，时而又变成蕴含着深奥哲理的象征。如果说河流两侧总是河岸，那么这种多含义的“岸”就会演化出许多互为对照或互为对立的“岸”，如祖国和异邦、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敌方和我方、战争与

和平、善与恶、现实与理想、今与昔等等。如小说这样写到尼基金和爱玛：“她，是个德国女人，属于敌对世界……她是在那一边，在彼岸，在崩裂的万丈深渊的那一边，而他自己则在洒遍鲜血的此岸。”又如麦热宁就明确地向尼基金宣称：“我俩中间，中尉同志，隔着一条河。您在这边岸上，我在对岸。”除了社会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对应的“岸”外，人（譬如尼基金）也在自身中寻求“岸”——幸福。正和作者说的，“每个人都想找到自己立足的岸，这个岸应当证实或者说明他以往生活的含义……人找到自己的岸或者没有找到——幸福或不幸福的区别界限即在于此。”^①最后，不应忘掉的是作为象征形象的“岸”所包含的哲理：“岸的形象——这是走向某个事物、走向理想的目标、走向真理、走向精神的高地……的永恒运动。”^②

陈 敬 冰

① 引自 E. 戈尔布诺娃《尤·邦达列夫》，莫斯科作家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229 页。

② 引自《莫斯科大学通报》，1976 年第 4 期，第 84 页。

内容说明

一九四五年苏军中尉尼基金随大部队攻进德国，在与德军残余势力继续进行残酷战斗的特殊环境下遇到德国少女爱玛，双双坠入爱河。七十年代尼基金作为作家访问德国，与爱玛重逢。他们心潮激荡，感慨万千，但又都意识到各自站在不可逾越的两岸上。《岸》是一部反映二战和“冷战”时期的作品，也是一部深刻的哲理性小说。作者尤·邦达列夫(1924-)是当代俄罗斯著名作家，曾三次获得前苏联国家奖。根据小说拍摄的电影《岸》曾在国际电影节上多次获得大奖。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定，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目 次

第一部	到彼岸	1
第二部	疯狂	97
第三部	怀旧	351

第一部 到彼岸

第一章

巨型客机的喷气推进器在九千公尺高空轰然呼啸，在舷窗厚玻璃的外空，那阳光普照的北极严寒里，巍峨得眩目的宛如白糖般的冰山闪耀着，沿着地平线飘浮。冰山下，密密层层의暗云遮覆着的白茫茫深处，留下了好像被遗弃的大地。

人们在苍穹中微微震颤着连续飞行，尽管知道云层之下是可怕的深渊，但是，由于阳光的辐射，由于在机场久待后终于顺利启航，于是在温暖的座舱里便活跃起来，大家感到舒适惬意。直射的阳光映现出座舱里到处弥漫着的层层烟雾，此时此刻，烟味儿也特别好闻。乘客们解开安全带，放低软椅靠背，坐得更舒服些；到处是翻阅报纸的沙沙声，这些报纸是由两个身段苗条、笑容妩媚的迷人的空中小姐（似乎是神话般地从国际航线时刻表的广告上走下来的）分发的；大家嚼着起飞时分发的夹心糖，这也是空中小姐几分钟前带着迷人的微笑放在托盘上送来的；接着，座舱的各个角落里响起了俄语和德语的交谈声——充溢着旅途舒适、安逸的情绪，希望以后的一切都像刚才那样顺利安乐。

最初在机场上产生的那种摆脱了一切家常琐事的自由自在的感觉，现在，在机舱里，在舷窗外漫无际涯的充满阳光的高空中，在功率强大的推进器震耳欲聋的吼声中，在耳畔听到的外国

话声中，在令人愉快的天堂般的座舱里，加上顾长的空中小姐——这些在空中维护精神安宁的纯洁天使——的亲切微笑，使人们的感受带有宗教的神圣色彩，如同释去枷锁，悠然自得。尼基金常有这种不以飞行为苦的心情，他疑问地斜睨了一下同伴萨姆索诺夫，这两人还从来没有一同乘过飞机。

萨姆索诺夫的圆鼓鼓的腹部还束着安全带，他转过头，以好奇的眼光漫不经心地投向过道那边的邻座。那里，三个上了年纪的，看上去像是旅游者的德国女人，一边翻阅膝盖上的杂志，一边大声交谈，并用烟雾袅袅的香烟指指座舱前面空中小姐走进去的门帘。透过推进器的音响，尼基金听出“吃”、“早饭”^①这两个词。他想随便聊聊，就愉快地说：

“普拉托沙，别去听别人谈话。她们在谈什么？我想，一定是在谈此刻必不可少的早饭，对吗？要是能吃点冻鸡，喝点矿泉水倒也不坏！”

“德国女人是饿鬼，”萨姆索诺夫叹了口气，回答说，“她们说，还是拂晓在‘大都会’饭店吃的早饭，还想再吃点东西提提神。她们是科隆人，可爱的女人……只要一听到这种语言，我就有过敏反应，简直像中毒。战争期间我跟他们这种人谈够了——一辈子够受……”

“不，普拉托沙，喝点白兰地再吃冻鸡，这在飞机上是必不可少的东西。”

萨姆索诺夫松开安全带，摸索着按钮使椅背向后倾，笨拙地向后一靠，鼻子里呼哧了好一会，颧骨宽大的面孔转向尼基金，那疲惫的、宛如圣像上的眼眸望着对方，眼神里没有常见的那种讥讽，而只是流露出一种忧郁神情，迟疑着是否要研究研究尼基

^① 此处原为德语。

金为什么逗乐的原因。尼基金此刻好像是一语道出了一个无所用心的旅行者的哲学：无忧无虑地偎靠在椅子上，一心只想冻鸡和矿泉水。

“我看得出，瓦吉姆，你对这次游历的开头很满意。是啊，总有什么在等着我们。”

“你知道吗，我高兴的正是能同你一起到德国人那里去，普拉托沙。”尼基金说。

“彼此一样，”萨姆索诺夫含糊地低声说，“这种情绪适逢其时。”

他们相识有十五、六年了。这些年来，他们走过的道路不少是交错在一起，甚至常常是相连在一起的。两人写的书几乎也是同时出版。尽管他们的作品风格迥异：尼基金的作品粗犷激越、热情奔放，萨姆索诺夫的散文则平稳细腻；这和他们两人的言谈举止却又不可思议地截然相反，——一些评论文章谈到战后代作家时，总是将他们相提并论。尽管他们俩都知道彼此在许多方面都不相同，但他们总是互相吸引着，这是因为他们这代人都经历过战争，共同的体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还有在他们相识多年的交往中形成的某种不可捉摸的东西，它有时隐藏在半开玩笑的讥讽中，甚至晚上打电话闲聊时也是这样，比如：“你神气起来啦，瓦吉姆？为什么也不打电话来？躺躺沙发，抽抽香烟，坐享清福啦？什么时候你才能把中篇小说凑合出来，大作家？雇用黑奴了吗？读完了，读完了。你的那位教授写得还可以，渡口上那位细眼睛的姑娘也还可以，至于将军嘛，完全不可信，你把一个将军写成个小知识分子啰，这样的人是没有的。好吧，等着瞧吧，等我的巨著一旦问世，你们这种人就成了晚辈了。”“我不怀疑，普拉托沙，我在等着你那惊人的大作出版。”“等着瞧吧，尼基金，等着吧，你还会在我的书上落下伤心之泪呢。”

萨姆索诺夫在电话里笑了，然后又背出一句简短有力、妙趣横生的俏皮话。“怎么样，嫉妒了吧？在扯头发了吧？就该这样写作，我的孩子。我三年才想出一个结尾。唉，你们这种人还是一群毛孩子呐！”

萨姆索诺夫写作起来慢得要命，一天只能写几行，写一段。他煞费苦心、疑疑惑惑地挤出几个字眼，然而又将信将疑。他讨厌修饰语，可是文句里又用了许多，甚至于到了极为冗繁的地步，即使这样，他的文笔也还是细腻的，特别是作品结尾的章节尤为出色。然而，当有人向他提到其文句有些累赘时，他往往一字一抠，使劲儿进行反驳，争得面红耳赤，脸色发紫，同出版社的编辑们吵得不可开交，弄得一些批评家怕他大发雷霆，怕他会火冒三丈。有人认为他这个人爱大喊大嚷，令人难以理解，他会毫不客气地对文学界的同行进行粗暴的“骑兵式的袭击”，因为有时他偶然在俱乐部的走廊里遇见某个不够谨慎的批评家，他竟然会暴躁地冲着人家喊起来：

“你们这帮苏格拉底，不见世面的真理爱好者，你们在喝酒的时候只会翻来覆去地唠叨一些叫人腻烦的定理吗？你们喜欢含含糊糊的电报文体吗？我可不是报务员。我写得太详细了吗？我以后还是这样！你们在这里嘟哝的那一套，我统统瞧不起，统统置之脑后！你们的时髦话和你们那种妇女例假时的唠叨焦躁劲儿，害得我消化不良。我温存地热爱和拥抱你们，我这就去药房买点蓖麻油来清清肠！”

萨姆索诺夫的这种顽固执拗激怒了许多人，为自己树敌不少，同时也赢得许多崇拜者（尊重他的坚定），这种拗劲儿特别使尼基金亲近他——从中可以看到过去部队中的典型代表人物的性格和当年必须具备的充分自信。……在出了第一本书之后，尼基金已习惯了萨姆索诺夫对他的态度。萨姆索诺夫带着妒意

和特有的偏见读他的作品，言不由衷地夸奖几句，责骂一番，好像不肯说出最后的评价。同时，那张胖乎乎的脸上激动得泛起红斑，镜片后的眼睛变得湿润而忧郁，像患热病似的。在这种时刻，不知为什么尼基金便会想到：他的工作室是不舒适的，昏暗的，因为书橱占了很多地方，老式写字台上的墨水缸笨重得出奇，桌上乱七八糟地堆放着手稿啦、书啦、写满了又圆又小的字迹的纸张啦，纸上还留有咖啡杯底的圆印，因为他工作时不停地喝咖啡。他还想到工作室角落里那张宽沙发床以及萨姆索诺夫坐在桌边和这张床上苦思冥想的情景。萨姆索诺夫精疲力竭地躺着，额头埋在枕头里，口中念念有词地搜辞寻句——一天早晨，尼基金在萨姆索诺夫工作时间去他那儿，见到他就是这副模样。

一想到萨姆索诺夫面对着一张白纸，搜索枯肠也找不到合用的单词之痛苦，尼基金就有一种近乎羞惭的感觉——他也使自己在桌边坐上几小时，尽管要作无止境的修改，但他写起来比较轻松，比较迅捷。因此，如果萨姆索诺夫的写作过程可以称为折磨人的苦役的话（他一天工作四小时），那他的工作就其持续性而言可算得上是加倍的苦役，但这对他来说仍然是一种乐趣。因此，每逢谈到萨姆索诺夫的著作时，他总是特别委婉和半开玩笑地说，他承认结构复杂句子有其必要性，因为应该受到责备的大概只是鹦鹉学舌的作家，那些把别人的成就算为自己发现的真理的恬不知耻的模仿者。他不想得罪萨姆索诺夫，因此，始终没有超越对后者开诚布公的界限。

“……别管他们，别管那些德国女人和早饭，”尼基金说着，把窗帘拉开些。“普拉东，你看看太阳，感触一下永恒世界，你就会忘却尘世的一切烦恼的……我写的几句诗还不错吧？说不定还能抢掉诗人的饭碗呢！”

“我担心，你马上会对着座舱唱起歌剧中的咏叹调，”萨姆索诺夫低声说。“什么事使你这样高兴？”

“地面上是雾茫茫的一片秋色，而这里——纯洁明净，蔚蓝色的天空，没有一丝秋意，多美好啊，普拉托沙！”

窗外，在寒冷的空间，高高的太阳发射出金属般灿然的光芒。凝滞不动的云层下面的无涯的白色平原上，糖块似的晶莹的巨大冰峰高低起伏，它们的顶沿默然地闪着反光。空中到处泛着雪色，这雪色和阳光一起，透过仰椅上方的烟霭，照进飞机的座舱。

萨姆索诺夫故意随便瞥了一眼舷窗上耀眼的玻璃说：

“你最好谈谈这个……汉堡的文学团体是个什么玩意儿？在搞什么名堂？他们的方针又是什么？把窗帘拉起来，太刺眼了……”

尼基金把窗帘拉上一半，窗框咯吱响了一声。他问：

“究竟担心什么，普拉托沙？”

“我想知道，到了西德我们将碰到些什么样的人？这不使你感到不安吗？”

“据我从那位赫伯特太太的来信所知，他们约请世界各国的进步作家举行会见，其中也有东欧作家。波兰人已经去过，我们是第二批。但这些你都知道了。”

“就算这样。总的来说是这样。那么这个赫伯特太太是何许人呢？”

“不清楚，”尼基金回答说，并用手指不留痕印地在窗玻璃上划着“赫伯特”这个姓。“根据她的签名来判断，这是个穿着白花边领衣服的老太婆，有着良好的贵族式教养，爱好俄罗斯文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托尔斯泰——喏，你来读读她最近的来信……”

他拿出笔记本，取出夹在里面折成四叠的信。萨姆索诺夫展开光滑的白信笺，上面密密地打满了字。他微微动着眉毛，开始朗读、翻译、评论它：

“尊敬的尼基金先生！（哈，你原来是位先生。那么，一切也就明白了……以前人家怎么没有看透你这一点，没有在教皇面前把你揭穿？）汉堡市文学俱乐部的任务为邀请欧洲各国作家参加圆桌会议……（这些圆桌会议变得多时髦，这个桌不是一桌宴席，这个圆桌是要把你身上磨得圆圆的。按愚见，就是说，磨去你的棱角），就当代文化交换意见，以‘作家与现代文明’为题，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讨论，不管作家生活在哪个国家里——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还是东方共产主义制度下。您的三部小说，尼基金先生……（小说，尼基金先生，我得向您指出，照欧洲的理解就是长篇小说，请记住，尊敬的。）”

“往下念。”

“我念下去……已在西德由韦伯出版社翻译出版，《星》、《明镜》杂志上论及您时，把您比作东方升起的明星。您的近作《后退之路》在我们的知识分子和青年中享有盛誉……（你看，有什么办法，成为西方读者的宠儿了。你征服了西方，用自己的《路》打倒了所有的人，可还带着一副谦虚的样子坐着，就像个普普通通的人似的！）”

“胡说，胡说，可是你得注意！”

“……我还要愉快地告知您，您的书在我的书店里两星期内就销售一空……（喔，你准备好箱子去装稿费吧，哪怕只拔它一撮毛也好……叫资本主义彻底破产，让他们伸手去乞讨。）”

“念吧，念吧。”

“……著名的文学教授和罗特伏尔出版社的评论家孔茨博士断言，您是写悲剧的天才，他说，您有两个血缘父辈——陀思

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可是我想，您更接近契诃夫，虽然您最近这部小说的结局很悲惨，看了令人心情十分忧郁！您如此无情地使自己的主人公在战争开始时就死去，使人读后热泪盈眶，久久不能摆脱哀伤。这是多么悲惨。（你看，没想到这位太太还是个活跃的评论家，把你批评得很厉害。原来你还是个悲观主义者，是个悲剧的歌手啊！）”

“如你所见。”

“……尼基金先生，请原谅我冒昧地谈了我的看法，但这不过是在私人信件里说说，如果这种看法多少有些使您见怪的话，请别介意。作家应该除了自己谁的话也不听……（喔，这位太太看来有点滑头，向你灌输作家要独立思考的说教了！辩论已经开始了——如此而已。）”

“念下去。”

“……文学俱乐部切望您来访问。已于八月二十日发出邀请，但至今未蒙答复。恳请您回复我们，您是否很快能来汉堡。如果您能在十一月十日至二十日之间来访问我们的城市，我们将尽力使您在逗留期间过得十分愉快。如果您不会讲德语，欢迎您随带翻译来。请接受您的译者出版者韦伯先生怀着尊敬和感激的心情的致意。顺致最好的祝愿并恭候光临。文学俱乐部成员，赫伯特太太。又及：请将行期告知，我将在汉堡机场迎接。希望我能根据您书上的作者像认出您，当然，如果您没有很大变化的话。”

“真一有趣，有一意思，”萨姆索诺夫说着把信还给尼基金，鼻子吸了一口气，忧愁的、圣徒般的眼睛仰望着舱顶。“他们也欢迎带翻译去，作为外委会的匿名成员前往，真美！我当翻译，更是加倍地美！扔下自己写了一百二十页的小说，飞往汉堡，像个傻瓜蛋那样为你受罪。为了得到什么好处？要偿付我，白兰

地是不够的，就是这么回事！但是，为什么要我当你的翻译呢？你自己也能看懂，也能讲德语嘛！^① 是要我做你的随员吗？”

“拿我的德语程度跟你的相比，实在叫人伤心。”尼基金回答说，“普拉东，我就是要你和我一起去。并不是去当翻译，这只是给外委会装装门面。我们俩在一块，各方面都好办些。”

萨姆索诺夫摘下眼镜，用拳头揉着眼睛，大声打了个呵欠，声调不自然地说：

“我可怜你，尼基金先生，因为西方不知为什么开始非常令人可疑地向你表示亲善。可得小心点，别弄得晕头转向，别骄傲自大，忘乎所以，我是根据来信和其它……我担心，电影会腐蚀你，还有轻易得到的金钱和像赫伯特太太这一类型的形形色色的西方崇拜者。不要飞行的时候像个天使，落到地上就变成了魔鬼。”

他又打着呵欠，像鲶鱼似地张大了嘴巴，发出拖长的“啊哈——哈——哈——啊”的声音，于是尼基金笑起来说：

“我将努力遵循你的教导，普拉托沙。打起呵欠来你也是最高级的天才。想睡觉了吗？”

“那么，东方的明星，各方面仔细地想一想，盘算盘算，考虑考虑，斟酌斟酌今后怎样生活吧，而我要睡觉，睡^②五分钟。”

萨姆索诺夫两手交叉在胸前，合上眼睑，鼻子深深呼吸着，脸上现出不问世事的、痛苦而生气的神态，一个终日操劳过度的人在休息的时候常有这样的表情。忙碌不安、机场的等候和长时间的谈话使他疲倦，现在他就打起盹来或者说他想打个盹儿。他那交叉在胸前的胖乎乎的手和他的姿态都表现出一个知道自

①② 原均为德语。

己身分的人所特有的那种安详和尊严。

“现在可以把他当作什么人呢？”尼基金想。他心情愉快，设想用另一种眼光去衡量萨姆索诺夫。“一个富裕家庭的父亲，万事如意，胖得可爱，事业上一帆风顺。虽然一切都已心满意足，但还是要操心。还有什么呢？他为人明智，一丝不苟，爱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像是一个毫不怀疑真理的人。这是文学的联想。但为什么我要想这一点呢？是因为和他在一起我感到轻松——太好了……”

第二章

他们和一群旅客到达汉堡机场，经过气门走进大玻璃窗隔开的大厅时，还感到飞机降落时底舱的微颤，耳边还充塞着推进器的轰鸣声，所以只能隐约地听到一个妇女的嗓音在召唤：

“是尼基金先生吗？……”

一个身材修长，约摸四十来岁的妇女，穿着一身深色衣服，一头栗色头发中醒目地露出几绺整齐的白发，她一面笑盈盈地从远处招呼他们，一面立即离开在第一大厅门口接客的人群，快步朝他们两人走来。尼基金也面带笑容把装了四瓶白兰地的沉重的皮包放下，不太有把握地讲着德语：

“赫伯特太太！您好！我想，我没有认错吧？是的，我是尼基金。这位是我的朋友，作家萨姆索诺夫（萨姆索诺夫非常得体而矜持地向赫伯特太太点了点头）。您终于认出我来啦？是根据照片吗？是不是？”

“是的，尼基金先生，是的。您来了我非常高兴！我们等候

您很久了！甚至都感到失望了……”

她突然紧紧握了握他的手，凝视着他。她那双充满激动和喜悦、年轻得和她那白发不相称的蓝眼睛里，依稀显露出好像是惊愕和惶惑的神情，但是这种神情被微笑掩饰了。她重复说：

“是的，尼基金先生，是的……请上车吧。车子就在附近。对了，我们先去取行李。您乘飞机之后感觉还好吗？”

“还可以。”尼基金回答说，“谢谢。看来，两人都挺好。”

他们到行李处取了行李，走出机场。赫伯特太太唇边依然挂着微笑，立即带他们到停车场。尼基金看她一边走着，一边心急慌忙地扯着手提包上的拉锁儿。打开后，大约是取出汽车的点火钥匙。

“先生们，请等等……我们马上去旅馆。皮箱请放在行李箱里。尼基金先生，要是您方便的话，请坐在我旁边，这样谈话方便些。”

赫伯特太太的轿车是一辆崭新的紫红色的、眩目的“本茨”。车身舒适、宽敞，宽大的行李柜吞下了两只装得满满的皮箱。尼基金在赫伯特太太旁边坐下。他清晰地闻到一股浓郁的香水味和幽微的人造革座套气息。那是异国生活、异国物品的气味。每逢他远离家乡时，对这种气味总是特别敏感。于是他疲惫地想到：“看，我又到国外了。”

“尼基金先生，萨姆索诺夫先生，抽烟吗？”赫伯特太太问。

“谢谢，我在飞机上抽得够多了，等一会儿再抽吧。”

“我也抽够了，”萨姆索诺夫说，“不抽啦。”

她又忙着扯动拉锁儿，在膝头上打开手提包，随手取出一盒香烟和打火机，点上烟，贪婪地吸起来。她吐了一口烟，喷在挡风玻璃上。然后开始戴她那双紧窄的鹿皮手套。

“请等一等……”她说，“尼基金先生，您是第一次来汉

堡吗？”

“您问我是不是第一次？是的，赫伯特太太。请您讲慢一点，不然，我不习惯，就听不懂。”

她表示遗憾地蹙了一下眉头，左手那只细窄得蛇一般的手套紧得怎么也拉不上去。于是她拉下手套，揉成一团，扔在座位上的手提包旁。她一面把车拐向湿漉漉的石板马路，一面缓声问道：

“尼基金先生，那您以前曾经到过德国吗？哪怕是一次……”

“那是在战争时期，一九四五年，赫伯特太太。”

“到过柏林吗？”

“是的，到过三个城镇：柏林、波茨坦、柯尼斯多夫。不过，柯尼斯多夫是郊区的小市镇，您可能根本不熟悉这个地方。”尼基金说。

“哎呀，我的上帝，您到过德国！”她翕动着双唇说，深深吸了口烟，一字一顿地问：“尼基金先生，您说，难道我们还时刻不忘那一场战争吗？”

“很遗憾，赫伯特太太。”

他也慢慢地回答，一面捉摸着德语的音调和她那像布置家庭作业时拖长的语句，一面兴致勃勃地观望着车窗外两侧的市容。时当十一月，天色阴霾，下着蒙蒙细雨，湿淋淋的城市显得膨胀起来，铅灰色的天空沉甸甸地低压在屋顶上空。他望着过早就灯火通明的商店橱窗，欣赏着两旁人行道上不断移动着的点点黑伞和十字路口红绿灯下密集的人群。

他欣赏着虽然已是秋天、但经雨水冲洗后依然一片翠绿、精心修剪的草坪和草坪上懒洋洋地踱步的点点白鸥。他情不自禁地想尽情呼吸这海滨的湿润空气，饱览秋日的朦胧街景，欣赏雨

烟中映在玻璃橱窗上掠过的湿绸伞影和十字路口红绿灯机械的闪光。红绿灯时而使一长串汽车停下,时而放它们从马路空隙中穿过。本能地记住看到的東西,下意識地在腦际独自进行思索,这是尼基金的第二本能。虽然他知道,遗憾的是很多事情以后都会忘掉,随着时光的冲刷留下的将只是一些细节,或者只是最初闻到的一些气味:就像汽车里的香水味和人造革座套的气味啦;或是赫伯特太太想戴上窄小的手套,而又没有耐性把它戴上,最后把它摘下的那个急促的动作啦;或是她手颤抖,拿着精致的镀金打火机急急忙忙地点烟的情景啦,如此等等。

他带着疑问的神情瞥了她一眼。她神经质地往拉出来的烟灰缸里抖掉烟灰,漫不经心地注视着蒙蒙雨雾,雨雾在车盖上汪成一摊摊积水。尼基金听到打在伞上的雨点声,闻到暖和的商店里(那里的霓虹灯光已经暗淡)塑料雨衣的气味,顿时感到汉堡街道潮气闷人。于是他用俄语说道:

“好像涅瓦大街的秋天,对吗?萨姆索诺夫先生?”

“一片泥泞,”萨姆索诺夫在背后动了动,应声说:“汉堡的美景嘛!这儿的雨水我们还没有受够吗?你听我说,当年我早就对多雨的鬼天气感到不自在了,我怕我的脊椎神经末梢炎又要发病啦。”

“请原谅我们用俄语讲了一句。”尼基金对赫伯特太太说。他把手指弹了一下,斟酌地说道:“我们在讲,老兵不喜欢秋天,因为到了秋天伤口就要作痛。令人忧伤的季节啊……”他半开玩笑地加了一句:“您理解吗?”

看来,她不仅理解他的话,还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她盯着他瞅了一眼,扬了扬细眉,乌黑的眉毛在几绺白发相衬之下显得黑白分明。她吸着烟,断断续续地说:

“大概是吧,尼基金先生。夏天已经消逝,我们现在已到了

忧伤的暮秋之年。可是秋去冬来，那更糟哪！冬天人人都感到萧瑟寒冷……就连你们俄国也一样。要知道人的年龄是不分国界的。”

“可能是吧。”尼基金淡淡一笑说，“在这儿，什么样的俄国毡靴也不顶用。”

雨刷发出单调的沙沙声在车窗上划着半圆形，均匀地刷去讨厌的雨水和微细的、几乎看不见的尘埃。马达声中，马路上一辆辆汽车汇成金属的洪流，发出带水的嗖嗖声在蒙着水气的车窗两旁擦过，追逐着，奔驰而去，在粘满落叶的黑油油的柏油马路上急促地喷出团团烟雾。十字路口湿淋淋的雨伞也渐渐聚拢来，伞面发出溜滑的闪光，捱在一起，接着迅疾穿过马路。笼罩在十一月暮霭阴雨中的汉堡街道，提前点灯的商店和酒吧间，使尼基金突然感到窒息和昏沉。汽车里也是一股寒冷彻骨的潮气。他真想尽快到达旅馆，走进一间温暖舒适、整洁安静、铺着干净床单的房间；像通常到了一个新地方那样，换换衣服，刮刮脸，然后下楼到餐厅，坐一会儿，喝一小杯芳香的热咖啡，这时再向赫伯特太太打听有关他们访问的详细日程。但当她说到“俄国”那个词时，就像他在国外常有的感觉那样，使他想起在遥远的莫斯科，在夜晚微弱的街灯照明下的阿尔巴特胡同；想起被他留在后面的无比辽阔的空间，那使他可以偷闲几天，摆脱操劳忙碌和每天的案头工作。一旦他感到内疚，感到急切地恋家，怀念工作室，怀念那准备好的、期待着他去写上没有过错的含蕴词句、既引人而又可怕的稿纸时，他就要回去写作了。一瞬间，他想象着回家时甜蜜愉快的心情，便又兴致勃勃地交谈起来。他仔细地按照语法结构说：

“至于说到我们这一辈，赫伯特太太，那么四五年春天我们是多么年轻、多么无忧无虑、多么幸福啊。战争结束了。一切重

又开始了。那时我们刚二十出头。这一切是多么美好啊！不知怎么我竟想起这些来了，赫伯特太太。”

“真是个毛孩子，”萨姆索诺夫的男低音说，“那时候我已经二十四岁了，可你还是个小孩。嗨，我倒想知道，你们在炮车上没有把尿布捎带着吗？”

“何止如此，老长辈，每次战斗后我们还把尿布挂在炮筒上晾干呢……赫伯特太太，请原谅，我和我的朋友又用俄语逗趣了。这是当兵的逗趣。”

她默不作声，只是朝挡风玻璃喷了一缕青烟，说：

“不过……可以相信，现在您也并不忧伤，尼基金先生。”赫伯特太太怯然地说，“我想，您很幸福、很健康。您的情绪很好、很平静。”

尼基金没有完全听懂她最后一个词的含义，他又弹了一下手指，请萨姆索诺夫帮忙，说：

“劳驾，普拉东，把最后一句给译成家乡话。我的情绪很好，还有很什么的？”

“情绪很平静，幸福的尼基金先生。”萨姆索诺夫准确翻译后拖长了鼻音说：“唔一唔……我再加一句，你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轻率的人，今后你要注意。倘若我放肆，庸俗地胡扯一通，——这在我是可以的，可你却不行。你该摆出副庄重、幸福的样儿来，大作家，就得这样！”

“谢谢，我明白了。现在你把我的回答翻译一下。句子结构太复杂，我会讲错的，真该死。”尼基金半真半假地说，“请原谅我无礼，赫伯特太太，我觉得，在我这个年纪，除非那些自我陶醉的糊涂虫才会时时刻刻感到幸福。平静的情绪可以使你摆脱很多很多烦恼，包括摆脱自身。但说实在话，这并非总能办到。”

“尼基金先生，我不愿……”

她那双由于惊奇睁大的蓝眼睛看了看他的脸，话没有讲完，就急忙转了话题：

“先生们，我们快到了。你们就在古老而舒适的‘林克’旅馆下榻。你们一定会喜欢这所旅馆，拐了弯就是，先生们。”

她在旅馆玻璃大门入口处停了车。旅馆坐落在一条道旁绿树成荫的狭长街道上，这里和喧嚣声以及满城整日川流不息的汽车的噪声隔得较远。他们从车后行李柜里取出手提箱，走进宽敞的、空寂的、铺着地毯的前厅。这儿特别宁静，甚至听不到落在柏油马路上的雨点声。有一种显然的古老陈设的家庭风味和安谧恬静的感觉。一个胖汉脸上堆着谦恭笑意匆匆从柜台后面迎向他们，“您好！”^① 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像在家里那样平和从容。他对赫伯特太太低声说了一句话，彬彬有礼地点了点头招呼尼基金和萨姆索诺夫到柜台跟前，看了他们的护照，用一分钟时间办好手续，填写了登记表，又恭敬地从圆抽斗里取出系着木制小梨的钥匙。他拎起手提箱，墙上的落地镜照出他朝着前厅深处的电梯间走去。

“非常感谢，赫伯特太太，您把我们送到这儿太好了！”尼基金说，“下一步做什么呢？”

“尼基金先生，我讲慢一点，好吗？”

“暂时是要请您讲慢一点，我得习惯习惯。不然老要萨姆索诺夫先生给我们当翻译，就太麻烦他了。”

她嫣然一笑。

“我想，你们乘坐飞机之后，一定很累，需要休息一会。晚上如果能到我家来作客，我将非常高兴。七点钟我来接你们。现

^① 此处原为德语。

在……请你们看看房间。如果需要的话,换换衣服,十分钟后请下来,我在餐厅等候你们。请允许我和你们先稍为喝一点。是怎么说的?祝你们健一康?”她曼声用俄语加了一句,有些不好意思地、也像尼基金那样弹了下手指,用德语说:“俄语是这么说的吗?还是我说得太蹩脚了?”

“赫伯特太太,您的发音很漂亮。过十分钟,我们下楼来。”

他们乘电梯到了五楼。走出电梯,跨上了充满暖意的长长走廊。走廊上铺着绿色的、毛茸茸的化纤长条地毯。他们很快找到了两个并排的房间。房门早已半掩着,锁眼里插着钥匙,手提箱已经放在房间里。

尼基金的房间里笼罩着秋天的朦胧暮色。雨点轻打着玻璃窗,讨好似地挂在玻璃上。尼基金脱下雨衣,找到开关,开了电灯。只见宽大的双人床上,两叠雪白的卧具发出迷人的皎洁的光泽。尤其显眼的是一对消毒过的洁白的枕头,在床头那只像小裙子般妩媚可爱的灯罩映衬下,更显得幽雅柔和,宁静诱人。抛光的大衣橱和带收音机的细脚斜面两用写字台擦得雪亮,在蒙着浅红色圆形灯罩的落地式台灯下,放着茶几,周围放着三张软靠椅。

“全部德国派头,收拾得一尘不染。”尼基金想着,一面解下领带,走进盥洗室。盥洗室里有股淡淡的药水味,天花板上几盏长方形荧光灯照得很亮。镜子、瓷砖、镀铬挂钩光亮可鉴。洁净无瑕的浅蓝色洗脸盆上贴着纸条“消毒”,盆架上挂着平整的、毛绒绒的专用毛巾,洁白可爱。他又回到房间里,舒舒服服地倒在软靠椅里,伸直两腿,享受着宁静和舒适,心里想道:

“就这样,我的旅居生活算开始了。这段生活将穿插着争论、应酬、开胃的美酒、交谈。敬爱的瓦吉姆·尼古拉耶维奇,尽管你住的是国外的高级旅馆,还有似乎身份不明的赫伯特太太

的令人愉快的款待，尽管只十天也会使你感到永无尽头。会弄得你精疲力尽，就像地狱里的小鬼那样！有什么办法呢，既来之，则安之，让生活按自己的路子走下去吧……”

此刻，他不愿去想那被抛在身后的、相隔数千公里的、多雨的空间及其有关的一切，也不想家。因为他知道，不消一个星期，他就会发疯似地、不可抑制地想念自己的工作室，思念妻子，思念十一月初冬莫斯科的寒冷。

“暂时一切都顺利嘛。”尼基金想，他很快从箱子里取出一条在巴黎买的领带和一件也是巴黎买的新衬衫，高高兴兴地换着衣服，感到新的悠闲的生活开始了。这时，他听到敲门声和萨姆索诺夫的男低音：

“准备好了吗？大作家，别忘了那个女人在等我们呢。”

“进来。让我们男子汉来干一杯，好吗？祝贺我们的安临！”尼基金说着，一面扣上袖口钮扣，用目光示意一旁敞开的皮包。“我先修饰一下外表，你来把瓶子打开，每杯倒五十克。”

“嘿，瞧你房间里有收音机，可我那儿只是个半导体，小玩意儿。房间靠在一起，等级规格可明显啦！”萨姆索诺夫用男低音说，一面以怀疑的目光扫视房间。他用牙齿加之门上的钥匙打开了尼基金皮包里的酒瓶，把桌上的玻璃杯弄得叮当响，斟上了白兰地。“来，让我们为了在汉堡土地上安全着陆干杯。你看，你把这个赫伯特太太迷住了。你发现她是怎么瞧你来着？”他闻了闻白兰地说：“嘿，好香！”

尼基金穿上紧裹身子的凉爽的亚麻布衬衫，套上外衣，怀着先前那种清洁爽快的感受和无忧无虑的心情拿起酒杯。褐色的白兰地透过玻璃杯闪闪发亮。他站着和萨姆索诺夫碰了杯，将一杯醇香烈酒一饮而尽。他顿时感到一股令人快活的暖流注入胸口，咯了一声说：

“好极了！太美了！普拉托沙，至于说你的观察力，简直赛过福尔摩斯。”

“来，压压酒。”萨姆索诺夫从口袋里取出两块夹心糖，像赠送礼物似的递给尼基金一块，说：“吃一块，飞机上吃剩的。我们得下楼去看看赫伯特太太了。”

他们嚼着夹心糖，乘电梯到了楼下前厅。前厅里地毯上听不到脚步声，四壁明镜和半圆形毛玻璃灯罩的灯光朦胧，他们看见柜台后面那个熟悉的侍者正彬彬有礼地向他们点头招呼。他们愉悦地对他说了声“谢谢”^①，就走进了餐厅。餐厅里空空荡荡，光线暗淡，四周墙上的壁灯发出微光。高大的窗户外面暮色苍茫。玻璃窗上挂着雨珠。

赫伯特太太已经修饰过，头发光洁，涂了口红，身穿一套深色衣服，全身显得很是整洁。她坐在靠窗的桌旁，一条腿搁在另一条腿上。她放下菜单，含笑望着他们，说：

“先生们，我们要商定一下，喝点什么？吃点什么？”

“吃点清淡的吧。来一点瘦火腿、干酪和咖啡。就像吃顿早餐一样。”尼基金回答。他把香烟盒放在桌布上，对赫伯特太太说：“请尝尝苏联香烟，稍微凶一点，但还可以。”

她用指甲修剪整齐的手指从烟盒里抽出一支香烟。她想念出香烟的牌名，但念不出来，她笑了，说：

“哦，俄国的！……我不爱抽淡的。您请试试这个吧。”她把德国烟递给他。“不过，先得说定，我们喝什么？白兰地？威士忌？喝德国烧酒还是俄国伏特加？”

“俄国伏特加应该在莫斯科喝，”萨姆索诺夫佯作沉思曼声回答。“在德国就应该喝德国酒。我没有讲错吧，尼基金先生？”

^① 此处原为德语。

“即使你错了，也错得高明啊！”尼基金用俄语说，接着又大胆改用德语：“赫伯特太太，稍许喝一点你们的酒。从战后到现在，德国烧酒是什么味儿，我已经全忘了。”

“不，现在是另外一种烧酒了。战后到现在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一切都变了。”赫伯特太太略带歉意地凝视着尼基金，不同意地说。她随即转身朝光线幽暗的大厅唤道：“领班先生！”

正在不远处无声地摆弄着餐具的领班，轻步走来，脸上带着跟刚才那个老侍者脸上一样的恰如其分的谦恭，向赫伯特太太低下有着一圈白发的秃脑袋，问她要什么。他那浆得挺硬的白胸衣和黑色领结显出高级餐厅侍者的训练有素的贵族气派。赫伯特太太每说一句，他那只精心保养的白皙手就随着话音用自动铅笔在小本子上麻利地记下她点的菜。尔后他颇有风度地微微欠身，迈着无声的步子，悄悄走进因为不到开饭时间而空寂幽暗的餐厅深处。

“尼基金先生，我在信上提起过的您的汉堡出版人，他希望今天在我家里和您见面。”赫伯特太太说，把手提包放在膝上。“他要我事先向您转达谢意，并……把您最近一部新书的稿费交给您，三千五百马克。毫无疑问，他可以付更高的稿酬。不过，很遗憾，我们两国之间没有出版协定。韦伯先生是个有钱的人，但不是那种随意挥霍的人。”她腼腆地笑了笑，把一个厚厚的信封交给尼基金，信封上印有哥特字体：韦伯出版社。接着她又从手提包里取出两只薄一些的信封，说：“这是我们文学俱乐部送的零用钱，每位八百五十马克。这份给您，尼基金先生，这份给您，萨姆索诺夫先生。”

“谢谢您，也谢谢我的出版人。”尼基金说，“原来是一文不名，一下发了一笔小财。这就让人心里踏实了。”

“百万富翁洛克菲勒，您可以从汉堡运一辆玻璃纸包装的

‘本茨’小轿车回去了。”萨姆索诺夫把钱装进一只大皮夹里。他想了一下，双眼透过镜片盯视着赫伯特太太，说：“我想了解一下，我这位尊敬的同事的近作是怎么销出去的？就是说，是怎么售完的？”

“登了广告。介绍这是一部描写非斯大林化时期苏联知识分子的小说，于是这本书就销售一空了。韦伯先生很懂得怎样引起人们对东方作家的兴趣，他生财有道呢。”赫伯特太太回答说，同时观察着尼基金正在不经意地把两只信封塞进衣服里面的口袋。她感到惊讶，突然讷讷地问：“你们的钱从来不点数吗？是不是在俄国不兴数钱？”

“兴数的。”尼基金说，“不过，德国人的仔细似乎是举世闻名的嘛。”

“喔，这种情况正在逐渐消失，尼基金先生。”

“连在德国也这样？”

“俄国人恐怕不太了解现代的德国。”

从飞机场坐上汽车一路上感到的倦意，此刻消失了。他在旅馆房间里干了一杯白兰地，开始觉得一股暖流涌遍全身。他不用控制自己，不必紧张，因为一切都很顺利，也许比预料的还好。又是平安到达，又是高级旅馆，又是出版商付的臭钱，又是文学俱乐部送的零用，这笔钱使他和萨姆索诺夫摆脱了生活上的酸窘。此外，现在他对赫伯特太太讲话的风格和动听的慢条斯理的语调更为了解，可以更有把握、更有信心地应付德语。他于是产生了一种到国外休假、工作之余心安理得地休息休息的愉快感。不再像在家时，因找不到确切的语句而在纸上乱涂乱改，因为虚度光阴而受良心的谴责了。

这时，一个侍者灵活麻利地在桌上摆上小巧的高脚酒杯，杯子里已经倒了三分之一的白酒；一个带东方式弯嘴的铁咖啡壶，

散溢出咖啡的巧克力的香味；一个小巧的盛着牛奶的瓷奶壶；一只铺着餐巾的小篮子里装着新鲜的小白面包；几片薄薄的黑面包和放在梅花形碟子里的几小块冰过的黄油，上面有着点点的水珠。

所有这一切：没有香味的冰镇烧酒（“祝您健康，赫伯特太太”），涂了黄油的松脆的小白面包，火腿和香甜的黑面包，芬芳的土耳其咖啡和几片香喷喷的干酪，——尼基金都觉得是无上的美味，产生一种无忧无虑的飘逸之感，这顿早晚餐，空空荡荡的餐厅里的宁静，以及窗外汉堡街头上下个不停的、十一月的蒙蒙细雨，这些都使他感到几乎是一种享受。

第三章

“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汉堡是英国人打下来的吧？但是奇怪呀，到处都看不到一点废墟的残迹。”

“不是打下来的，普拉东，是在四五年开进来的。先炸掉几条街道，然后兴冲冲地不费吹灰之力开进来的。飞机炸了一阵，随后就把城市占了，没有遇到多少抵抗。毁坏的街道，德国人当然把它重新建设好了。”

雨还是下个不停，汉堡上空烟雨弥漫，天际蒙蒙。滑溜溜的人行道像抹上了一层油，闪闪发亮。成群的汽车嗖嗖地从身旁疾驶而过；马路上倒映出被雨水冲得发亮的车身。人行横道线旁，行人影影绰绰，在红绿灯的灯光下忽儿呈现绿色，忽儿又变成红色，一大片湿漉漉的雨衣雨伞显得异怪地秩序井然。地下铁道入口处的上方，“U”形霓虹灯光昏暗无力。街心公园的草

坪泛出暗绿色，褐色的树叶浸在水洼里，羽毛蓬乱的、冻僵的白鸥沿着一堆堆枯黄的树叶在草地上蹒跚——到处是一片暮秋景色。天气多雨，一片泥泞，散发着附近海面吹来的窒人的湿气。

“是有些令人吃惊啊，”尼基金低声说道，一面瞥视着行人的平常而安详的脸。“你我漫步在德国的土地上，而过去的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真叫人不相信，比方说，正是这位规规矩矩的大叔……”他朝一位身穿格子雨衣、在一家酒吧间门旁漠然地抽着廉价小雪茄的人瞥了一眼，这人已上了年纪，显得疲惫不堪。“很难置信，正是这位大叔曾直着嗓子高呼‘希特勒万岁’^①，并在斯大林格勒城下朝你我开过枪……再看这一个，”他又把目光移到一个矮个子、外貌善良的德国人身上，这人大腹便便，大衣明显地鼓起，他从商店里走出来，一手撑着伞，一手拿钥匙打开停在路边溅满泥点的“大众”牌小汽车的车门。“不像吧？一家之主，爱喝啤酒，爱开玩笑，每天晚上让孩子坐在膝上……真是慈善的化身。他会向人开枪吗？会向人开枪扫射吗？会把人吊死吗？还有这等事情？！普拉东，真令人费解啊！……”

“那到底是谁高喊‘万岁’^②，向人开的枪啊？”萨姆索诺夫唠叨起来，“看来个个都是和蔼可亲的大好人……那究竟是谁开过枪呢？”

“看来也许不是‘谁’开过枪，而是由于‘什么原因’、‘为什么’开的枪，问题的实质在这儿。”

“人的长相未必能说明什么问题，瓦吉姆，恰恰相反，它往往能把人弄糊涂。”

“我们走着瞧吧。”

在一座坚固的石墙已被烟熏得漆黑的车站上方，“S”形的

①② 原均为德语。

霓虹灯发出蓝光，车站大厅里灯火辉煌，像是一片片商店。尼基金在车站附近的玻璃售报亭前停下来，在琳琅满目摆满挂满各种画报的橱窗里久久寻找，看那些装璜鲜艳的书籍，一本一本地读着书名：

“《肯琪》，一个年轻姑娘的故事；《马德里的凶杀案》。明白啦，他们这里畅销的是些什么书啦。我译得不对的话，普拉东，你给纠正纠正。弗朗茨·卡夫卡^①的书削价了，看到没有？从二十六马克减为十七马克。这是怎么回事？不久前他还是西方的红人呐。下面，角落里有一本新书《贝当^②在狱中给妻子的书信》，这倒很有意思，此人给她写了些什么？亨利·米勒^③的《北回归线》，色情小说，这明白。这儿是一本什么书？《第二次世界大战》，太有意思啦。这本书，普拉东，走以前可要弄它一本……旁边是《希特勒死了没有？》，有意思，看有人买吗？”

“这可要去问问赫伯特太太了。《希特勒死了没有？》也要买它一本。”

“有把握吗？海关怎么过？碰上检查怎么办？‘有带外国文学作品的没有？’这一下大家就该忙做一团了。”

“有办法，这些书是买来自己看的，又不是给公家图书馆买的。什么都该了解了解嘛，不管什么都该了解。”

“了解个啥？有什么不清楚的？是谁开的枪，我来给你解释。统统都可能，瓦吉姆，凡是现在四十二岁以上的人，统统都可能。以往我们把希特勒描写成‘疯子’啊、‘发狂的上等兵’啊、

① 弗朗茨·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现代主义作家，生于捷克。

② 亨利·贝当(1856—1951)，法国将军，上将，希特勒占领法国时，任法维希傀儡政府总理(1940—1944)。

③ 亨利·米勒(1891—)，美国当代作家，著有色情小说《南回归线》、《北回归线》。

‘瘫痪病患者’啊，这些说法都不确切。这是一个有号召力的恶魔般的人物，他一发表演说，那些德国人，特别是娘儿们，就会激动得嚎啕大哭。这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知道，但不完全，一些细节，极为重要的细节还是模模糊糊。普拉东，这些西德人是些什么人，对我来说，基本上毫无所知，没有探究过，^① 是个空白点。他们是谁？他们怎么样？他们还是那样的人吗？至今我总忘不了他们关于士兵三大美德的‘命令’^②：‘忠于元首，服从元首，为元首而战……’算了，看看再说吧。我们当然任何博物馆都不去，那里会把你搞得稀里糊涂。我们只作一次例外，去看看阵亡将士纪念碑和港口，主要是看看人脸，看看街上人的脸和眼睛……你同意吗？”

“同意。”

“那一等一下，我们来弄清楚，纪念碑在哪儿。”

尼基金解开窸窣作响的雨衣，从侧袋里取出一张他从旅馆拿来的城市交通图。他看了一下街道线路网，密密的雨点很快洒满了光滑的纸面，尼基金把图收起来，说：

“离这儿远着哩。不过我们还是走去吧，好吗？我想观光一下市容。你吃得消吗？”

犹如对一个初次见面的陌生人有无好感，多多少少取决于他的外貌一样，尼基金在陌生城市（不只是外国的）的最初印象很容易使他产生一种遏制不住的好奇。人行道上这熙熙攘攘潮涌般的人群，拥挤不堪的地铁和电车，这挤满了人的啤酒馆和小酒吧间，喧闹的、供人消遣的低级酒馆，市面繁荣的街道，这时隐时现、一会儿仿佛骤然出现、一会儿又消逝得无影无踪的异邦人

① 此处原为英语。

② 此处原为德语。

的脸庞，这关注、忧虑、淡漠的神态，有的微露笑意、有的双眉紧锁的表情，这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这眼神、笑语、不知谁的手势……都吸引着他。

这一切总是在他心中溅起激动的浪花，似乎打破了他个人的某些看法，把他和所有初次见面的人联系在一起。但同时，他所不深知的、曾想深入了解而未能进入其生活禁区，又令人不满地将他和对方分开。也许正因如此，他常常喜欢向人家窗内窥视，由于对窗内没有显示的情况作种种得不到满足的猜测而苦恼。忘了拉上的窗帘，房间深处对镜梳妆的女人的身影（只她一个人吗？她和谁在一起？她是谁？），夜阑人静的漆黑的院落，破旧的大门，神秘的、脚步声渐去的楼梯口，楼上的叩门声，墙上写满人名和电话号码的城市自动电话间，遗留在汽车空位上的一包香烟或忘在公园长凳上的一本翻开的杂志，都会使他感情激动，要去触及那谜样的人的生活。童年时代，有一次他也曾有过这种感情。那次他偶然在街上拾到一只不知是谁丢失的小钱包，一只簇新的朱红皮的钱包，上面金色的小锁闪闪发亮。他把钱包藏在后院桦树劈柴堆后面的鸽子棚里，心里由于一种莫名的过错感到难受。有时，他坐在鸽子棚里，阳光透过一条条板缝射进来，他闻着鸟毛鸟粪的窒人气味，一连几个小时看着这些不知是谁的东西：一把小小的铅笔刀，叠得整整齐齐的三个卢布，一管有点甜丝丝的、半边已被谁的嘴唇擦掉的红唇膏。他想象着这些东西曾经在过什么人手里，想象着这个陌生女人的脸庞、体态和嗓音，暗自激动。他想象，她一定年轻，多愁善感，跟她的珠母刀柄一样雅致，独坐在自己的房间里。窗外是一垛砖砌的防火墙，每天早晨砖墙被朝阳晒得暖烘烘的。这个想象中的女人不像他们家这座房子里的任何一个女人，也不像莫斯科河南岸小街上的任何一个女人，她的脸、体形、步态没有特征，她只是

美丽而忧郁沉默，坐在舒适凉爽的小房间里，被若明若暗的阴影笼罩着；房间里该有一口古色古香的五斗橱和一面镜子。那时他还设想，在夏日的一天早晨，他像小偷似地爬到那个陌生女子敞开的窗前，把这个藏着小刀、口红和三个卢布的小红钱包扔到她粉红色的窗台上，自个儿感到骑士般的狂喜而浑身发麻，只听对方吃惊地问：“谁呀？”

童年时代那次未能满足的好奇心的详细情况，尼基金早就忘却，只留下一点淡淡的、模模糊糊的印象，但是成年以后，那种渴求知道别人的隐秘生活的欲望常会使他感到一种近乎病态的满足。

“看，到了，”萨姆索诺夫说道：“你看，‘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阵亡和失踪的将士。一九三九——一九四五年’。下面还有：‘纵然我们全部战死，德意志仍将存在’。”

“哟，说得真带劲呀。”尼基金说道，“我们来看看，普拉东。”

这座纪念碑很粗重，阴森森的，石头被雨淋得有点发黑。浮雕的轮廓分明，仿佛被夜色吞没的士兵侧像，排成密密的队形行进——不知是到地狱还是到虚幻之境去；他们的武器，钢盔，依稀可辨的、目光无神的、死人般的脸，都无声地凹凹凸凸，有棱有角。石碑下面的石板上，暗色的金属花圈阴惨惨地闪着反光，旁边放着鲜花做的花圈，飘着黑白流苏的挽带被蒙蒙细雨粘在地上，不祥地露出上面的马尔太十字架纪念章，金属花圈之间摆着秀丽的翠菊和嫩红的石竹，石竹的花瓣像滴滴鲜血洒落在肮脏的石板上，散落在花圈花体字的题词上。题词上面写着：

“在二二五步兵师战斗过的士兵敬献”，“联邦后备军敬挽”，“前飞行员敬献”，“前坦克兵敬献”。

忽然，一股泥土的铁腥味向尼基金袭来，仿佛可以清晰地听

到被机枪扫射打断的人声，不知谁在炎热的阳光下嚎叫一声：“坦克一克！”一辆装甲坦克的侧面出现在瞄准线上，从灼热的坦克那儿吹来一股令人窒息的热浪。尼基金完全被坦克发动机的吼叫声震昏了，一阵像尸臭那样甜丝丝的浓重的合成汽油味和炸弹的气浪，使他突然感到喉咙里一阵恶心……

尼基金回想起这些，已经无法摆脱耳痛和炮击震动的感觉，无法忘却二排长希卡诺夫那熟悉的嘶哑的嗓音，他那露出两排年轻人的牙齿的开朗的笑容和像牛眼毛那样忽闪忽闪的白色睫毛。希卡诺夫的大力士般的裸露的身体被砍成两半挂在白杨树上，犹如粉红色的猪胴。他看到有一股非常可怕的殷红的东西喷出来，顺着变了形的大炮的护板流下来，渗入静静的普肖尔河近岸滚烫的白色沙土里。右边，河水被炎热的阳光烤得热气蒸腾。坦克沿左岸开始进攻。希卡诺夫的排比尼基金的排早发两颗炮弹，抢先占领了林边一块阵地，未及挖战壕就接上了火。

傍晚，战斗结束后，在攻克的加佳奇城里，大家喝着缴获的甜酒，尼基金怒冲冲地对惊愕的炮兵连长大声叫嚷，说他尼基金的排该当首先占领林边阵地射击，这样希卡诺夫就不会死了。他仿佛在为偶然事故和自己那种不祥的走运辩白。那时他还不理解，在战争中，谁也不能逾越、回避、延缓或是蒙骗命运。命运由于希卡诺夫仓卒间没有击中目标而向他报复，赶上他，用死亡的利斧在刹那间残酷地、无可挽回地砍中了他。这个报复对尼基金是一种警告性的惩戒，这种惩戒，由于命运的安排他已经见过多次，不过形式不尽相同，但是直到战争结束仍未使他变得缜密一些——青年人是不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可是岁月流逝，他曾不止一次地一觉醒来浑身冷汗——他梦见命运在他面前举起复仇的利斧，但却在一米左右的地方落到别人的脖子上。每当想起坦克进攻时牺牲者的音容笑貌时，他就觉得痛心——这

一把在人们头顶上挥舞、可怕而又假惺惺地挑选目标的利斧，是和战争紧密相联，不可分割的。

“你怎么愁闷上了？”响起了萨姆索诺夫的声音，“你在想什么呢？我们走吧，看够了。”

“等一下，再看一会儿……”

尼基金一直望着发黑的石板上粘得到处都是的湿漉漉的花瓣，望着带刺的、潮湿的铁花圈和花圈上像公墓里那样下垂的挽带。石板上这些潮湿的花，挽带上黑色的马尔太十字架，这湿淋淋的黑纱，似乎都散发着一股跟他漠不相干的人死后的集聚不散的气味和密林中传出来的浓重的尸臭。就跟从前的一个秋天一样，在一座林子里，斜雨覆盖了毫无生机的大路，雨点打在沟壑里的蕨类植物上，从沟边可以看到陷在被冲刷的泥土里的德国人的防毒面具，被压扁的钢精锅，翻转的、里面积满污水的钢盔。林间大道上那股腻人的尸臭扑鼻而来，令人窒息。

“这是怎么一回事？”尼基金想着，他对自己感到厌恶不满，“我没有办法克制？没法忘却了吗？难道我不能战胜这个念头吗？为什么我不能设想一下另一种死亡——想想德国士兵的死，想想他母亲、老婆、未婚妻的眼泪呢？为什么这不能打动我的心呢？”

旁边有一个轻悄悄的脚步声走近了，一个形容憔悴的男子走到纪念碑跟前，此人高高的个子，穿一件紧腰身的灰大衣，没戴帽子，花白的头发梳着分头，刮得光光的瘦脸上死气沉沉，毫无表情。他用一个手指把一根绞起来的挽带理好，黑纱上的花体字题词泛着白色：“在二二五步兵师战斗过的士兵敬献”。他低垂着头，若有所思地站了几秒钟。

“这个德国人在想些什么？在想昔日的胜利和失败吗？在想阵亡的同团战友吗？看样子他将近五十岁啦，这么说，是打过

仗的啰。在哪儿打的？在西线还是在东线？”

尼基金为好奇心所驱使，打算过去问问此人曾否作为二二五师的一员在东方战线同俄国人打过仗？但德国人仿佛感到有人在注意自己似的，用拒人于千里以外的、冷淡的目光把尼基金打量了一番，就离开了纪念碑；合时的秋季大衣的背部显得很合体。

“看年龄是个上尉或少校，”尼基金想。他知道，也可能没猜准，但是他继续猜下去，想象着这个德国人的曾紧裹着军官制服的背影，便向正在用手帕擦眼镜的萨姆索诺夫问道：

“你看这是个什么人？”

“是一个朝你开过枪的德国人。”萨姆索诺夫懊恼地答腔道，“‘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① 你注意他的军人姿势没有？喏，又来了一个，我敢肯定，这是未来联邦军的一条好汉。有人在家里偷偷向他灌输当年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的思想。”

尼基金朝正在走过来的男孩瞟了一眼。男孩大约十一岁，穿着短裤和一双沾了污泥的白色长筒袜。小孩懒洋洋地嚼着橡皮糖，一面放肆地沿着石板走起来，像在运动场上那样保持着身体的平衡，黄皮鞋践踏着花圈上散落下来的花瓣。然后他绷紧圆圆的屁股和小腿，纵身一跳，一只手抓住浮雕上突出的机枪，随即把嘴里嚼的橡皮糖吹起一个大泡，跳下石板，摇摇晃晃地向篱笆后面落满了一簇簇树叶的池塘走去。一群水鸥正在那儿刺耳地尖叫着。池面上烟水茫茫，暮霭沉沉，鸥雀嘈杂的尖叫声传到老远的地方。水鸥像蛇那样凶猛，利喙相对，慌慌张张地拍击着翅膀，沿着池边互相追逐。一群动作迟钝的鸭子晃着长颈，摇摇摆摆地穿过水面枯叶，背离水鸥游开去。那个穿着沾了污泥

^① 此处原为德语，是纳粹德国国歌的第一句歌词。

的白球袜的男孩顺岸边走着，不时朝水鸥虚晃一脚，鼓鼓的嘴唇一个劲儿地吹着泡泡，直到泡泡炸破为止。尼基金就说：

“汤姆·索亚^①……像吧？”

“不过是德国产的。”萨姆索诺夫纠正他。“好啦，往前走吧，这里的情况已经知道了。雷佩尔班大街很有名，我们上那儿去，好吗？要不要还是走去？你还没被雨泡胀吧，瓦吉姆什卡？”

“去你的。我们乘地铁去。”

雨点变稀疏了，他们下到地铁站，迎面吹来一股湿润的穿堂风和雨衣雨伞的潮气。

当他们出了地铁站来到雷佩尔班大街时，雨停了，一团团的乌云，低低地从港口地区和看不见的海洋上空升起，天空显得肿胀起来，大团大团的乌云在屋顶上空浮动。

这里的一切，甚至地铁周围，跟旅馆附近幽雅的中心大街都完全不一样。这儿的一切反映出另一种生活，一种游手好闲、令人心荡、非同寻常的生活，仿佛是谁为了供那些操着世界各国语言的、来到殷勤好客的汉堡观光的游客和做买卖的水手们消磨（一个黄昏、一个夜晚、一个钟头）而臆造出来的生活。每一个想要享受文明大城市的形形色色娱乐的人，汉堡都准备满足他的愿望。

“这就是有名的圣保罗区，”尼基金说，“有性感，有啤酒，还有各种娱乐。”

“是啊，”萨姆索诺夫哼哼哈哈地说道，“我看得出来。”

在街边转折处，字迹粗劣的酒吧间招牌五光十色，特别显眼。幽会所、饭馆、美式俱乐部的广告比比皆是。舞厅、夜间酒

^① 马克·吐温的小说《汤姆·索亚历险记》中的主人公。

馆、脱衣舞厅的名称——什么“禁区”、“蜂鸟”、“红色磨坊”、“萨福”^①，先后映入眼帘。隔着玻璃橱窗可以看见身躯高大的裸体女郎的彩照……

这时雷佩尔班大街还不到热闹的时候，还没上灯，广告的灯光还没有亮起来，宵夜酒馆还没上夜市，舞厅还没有开始营业，夜市的闹景还没开始。但是，根据俱乐部、电影院、脱衣舞厅光怪陆离招徕顾客的招牌，这种热闹场面尼基金已经可以想见。现在街道深处已经开始活动，夜生活已经疲乏而机械地开始，或者说在继续下去。小旅馆墙内，酒吧间的玻璃橱窗里，住家的院内，都蠢蠢欲动起来。外表干练、大力士般的看门人穿着制服大衣，睡眼惺忪地打着呵欠，在紧闭的门旁徘徊，偶尔跑到马路当中，拦住过路人，死皮赖脸地挡住去路，怪声怪气地给人看手心里的照片、门票之类的东西，嘴里嚷嚷着，嗓子有点喑哑，像说绕口令似地：

“新式性感电影！三个马克一张门票！……三个马克看一看！便宜真便宜……”

“五个马克一刻钟！年轻的瑞典姑娘……两个漂亮的、互相配合的混血儿，瑞典性欲！法国方式！……”

这当儿，影子似地在马路上出现了几个年轻人，面貌平常，脸色苍白，像做买卖的那样目光淡漠，穿着尖头皮鞋，身子一闪从大门里溜出来，从街巷深处冒出来，压低嗓门劝人到什么地方去。这时，几个仪表优雅、头发斑白、身穿黑衣的男人，用龟奴的那种无情的狩猎目光，远远盯着那几个年轻人怎样招徕生意，一面不时机警地扫视着街道。酒吧间窗前，台阶旁，大门口，到处站着一些已不很年轻、精神萎靡、浓抹艳装的妓女，无聊地摆弄

^① 古希腊女诗人的名字。

着撑开的雨伞；旁边还站着一些妙龄姑娘，身穿超短裙，手拎小皮包，洒脱地抽着烟，不时抖着脚上的高筒皮鞋。

他们没有在这条街上逗留，径直往前走，也不答理别人。他们像通过铁丝网一样，从一些脸无血色、衣袖里装着美术明信片、秘密絮语的年轻人身旁挤过，在衣冠楚楚的老龟奴的威胁勾引的目光下和白天营业的妓女的不可捉摸的注视下穿过。这些妓女中有体态笨重、老练内行的中年妇女，也有年纪轻轻、淡黄头发、有着天使般纯洁的外貌、迎面向你睁开仿佛初次涂上青色眼睑的中学生。尼基金感到这种有失尊严的赤裸裸的欲念的包围，这种欲念已被合法化，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了。他想，显然这里的人知道一切阴暗的人类淫欲深渊里所能知道的东西。人们老早就熟练地学会了一套台词、手势、话语、姿态，以便把大腿、嘴唇、胸脯、肚皮、嗓音及善于随机应变的虚假爱情用来做买卖，可以零售，可以批发，价格随对方的爱好而定。他这样想着想着，突然感到有一股不太厉害但很沉重的压力 and 无声的窒息，像一只毛茸茸的爪子掐住了他的心脏。

他俩默默地走过白昼的卖淫窟。忽地，在胡同口的拐角处，一个旅馆看门人模样的拱腰曲背、老态龙钟的看门人，身穿带银色边饰的长襟制服，满脸睡意，胡子拉碴，谄媚地对他们晃着布满皱纹的疲倦的面孔，卑微地低声央求道：

“先生，只要三个马克，可以给你们看一部法国短片，是从毕加尔操练场弄来的。看得出，你们不是德国人，你们一看就会感兴趣的。最新的片子，这是门票。先生，三个马克，很值得的……我担保……”

“去看看怎么样？”尼基金有些拿不定主意，突然转向萨姆索诺夫问道，“去开开眼界，什么都该了解一下嘛。假如这……你看怎么样？”

“去就去吧，不管它啦，挺有吸引力。”萨姆索诺夫说着，不知为什么脸涨得通红。他付了六个马克的零钱给看门人，咕哝了一声：“只是去了解一下。”

守门人从侧旁跑上前去殷勤地给他们打开一扇窄门，他们走进门去，下了昏暗不明的石阶，来到从里面扑来一阵辛香的潮湿味和柔和香水味的地下室，再掀开楼梯尽头入口处沉重的、被摸脏的天鹅绒门帘。在一间很小的厅里，光线很暗，渐次分明，前面的小银幕亮光闪烁，银幕上一个裸体女人在一张很宽的床边懒洋洋地抱着一个男人肌肉丰满的肩背，后脑埋在枕头里，——这是无声影片，没有声音，只有动作，描述旅馆房间里两个人的事情。

尼基金一进门就在若明若暗的小厅里寻找座位，但到处找不到一张椅子，只有几张桌子。四周墙上的红灯灯光暗淡，角落暗处酒吧间的镜子里一亮一亮地闪着红光。小厅也好，这个酒吧间也好，乍一看好像完全是无人之境，徐缓地显现出镜子右边三个女人的身影，她们坐在侧门门帘附近靠边的小桌旁，从那儿传来一个拖长的声音：

“哈罗！”

银幕上荧光闪烁，反照着黑洞洞没有椅子的空房间，借着这点光线可以看到，两位姑娘站起身，从容不迫地扭着屁股走过来，然后像电影院的检票员那样（说一声“马上来”）把他们领到一个半圆形的包厢里，让他们在桌旁坐下，然后带着沁人的香味，满有把握地径自在他们中间一坐。这副神气说明，在这个酒吧间电影室里，这是常规了。

尼基金还来不及对自己的邻座瞟上一眼，第三个姑娘很快又来到了跟前，看样子是个女招待，打着手电。他打量着她的淡色头发、冷若冰霜的鹅蛋脸、一副大学生的聪慧面孔；她冷冷地

问这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喝点什么？”尼基金用德语重复了一遍，略显窘迫地用目光暗示萨姆索诺夫，“你下命令吧。”

“可口可乐，”萨姆索诺夫无可奈何地要了最便宜的饮料。“来两杯。”

“这些姑娘究竟是些什么人？为什么要和我们坐在一起？”尼基金想着，立刻想起了殷勤的日本艺妓。“也许她们就在这里卖笑，必须殷勤接待观众。真有意思，不好，好像是选错了对象。”

很快端来了两瓶冰镇可口可乐和两小杯罗姆酒。两个姑娘挪了挪身子，开始面露笑意，倒了两杯可口可乐，一个姑娘递了一杯给萨姆索诺夫，另外一个姑娘递给尼基金。这时，尼基金终于看了她一眼：她皮肤黝黑，颧骨突起，乌黑的大眼睛木然无神，一件细毛衣裹着丰满的胸脯，一条腿很巧妙地搁在另一条腿上，瘦小的短裙紧束腰肢，下面露出白皙的膝盖。

她呷了一口酒，一只脚晃动着，打着手势向尼基金要香烟。他乐意地向她递上烟，并给她点了火。借着火光，可以看出她鼻子略显肥大，睫毛涂得太浓，丰满的嘴唇撮成圆形，叼着烟嘴，圆指甲涂着发亮的深红色指甲油。她慢条斯理地深深吸了一口烟，又晃晃腿，用膝盖碰碰尼基金，笑了笑，一只手用猫儿般轻巧的动作抚摩了一下他的头发。

“我叫盖达。”她低声说，手指停在他脸颊上，亲昵地拧了几把，又搔了一下他的耳垂，补充说：“你是什么人？英国人吗？瞧你这副正经样子！”

“你叫盖达？”尼基金重复了一句，把她那凉得使人难受、有一股花露水味的手从脸上拿开，让她知道，他对这种放肆的抚摩、对这种试探自己的好奇心不感兴趣，于是他就看起电影来……

尼基金刚看的时候还有一点莫名其妙的兴趣,到了后来就感到厌倦、气忿,一阵发涩的、令人作呕的感觉渐渐涌到喉咙口,好像有人用包了棉花的拳头当着他的面在残酷地拷打和折磨美好的人体,逼得它在病态的淫欲中痉挛、扭曲,这种欲念以令人鄙夷的仇恨毁灭了男女之间正当的接近。

“英国人,请喝酒……”

他被包厢里的讲话声、私语声所吸引,皱着眉把目光离开银幕。突然手电一亮,他看到,不知为什么给他们桌上又端上了酒,两个浓黑的酒瓶和四只高脚酒杯。女招待默不作声把四只酒杯斟满。盖达斜睨着尼基金,呷了一口。女招待掀开银幕右边不知通往哪里的大门帘走了进去。这个门帘不时牵动,波浪似地轻轻摆动着,在这空荡荡的小厅里可以听到男人的有些嘶哑的细语声从那里传来。

这时,一种好像疟疾病患者发寒时的迷离混沌的感觉,使尼基金内心隐隐不安。这一切是多么荒唐无聊——银幕上的电影,汗涔涔的赤条条的身子,在雷佩尔班大街冷落得令人莫名其妙的地下室内非公开的幽暗的酒吧间,桌上不索自来的酒,门帘后面的一阵阵窃窃私语,这辈子从没见过的、高颧骨的盖达把膝盖贴着尼基金的腿。这是怎么一回事?不,得马上起身,无论如何得控制自己,离开这个可疑的、潮湿的地下室的幻境。这里似乎完全与世隔绝了,外界大自然的阳光、十一月白昼灰色的天空、各种生气勃勃的声响,都传不到这儿,就像不能透过钢筋水泥厚板一样。四周静悄悄的,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在看到门帘掀动、听到门帘后面男子的窃窃私语之后,尼基金再看这座无人知晓的地下室,它那潮湿的、低低的拱顶,沾满泥巴的滑腻的墙壁,以及人迹不至的、排泄城市污水的、臭烘烘的下水坑和排水沟,就像是一座怪异的、阴森可怕的迷宫。

“走，我们得离开这儿！”尼基金想道。这时，他听到盖达轻轻的说话声，他急切地想听懂她的德国话：

“我昨天看过医生，我一切正常，我很注意自己的身子，英国人……”

她睡意慵懶地微笑着，慢慢吞吞地抚摩着自己的胸脯和大腿。

“我是脱衣舞演员，挺够味儿的。我晚上在这儿表演。你瞧我的胸部多美！你摸摸试试……看我这大腿，像男孩一样。你是什么人，英国人吗？”

“不。”

“波兰人？南斯拉夫人？”

“不。”

“那么是俄国人？”

“难道有俄国人上这儿来过吗？”

“来过一个。很讨人喜欢，不过是个间谍。”

“为什么是间谍呢？”

“俄国人都是间谍。”

“这是胡编瞎说，亲爱的盖达。”

“我看得出来，你有点儿动心了，”她嗓音嘶哑地笑了起来，“也许你想来……这个？也许你想来点儿别的？你别担心，我什么都会……”

“不，亲爱的，我什么都不要。”

“离开，赶快离开这儿。对萨姆索诺夫说一声！”尼基金一边想，一边感到浑身不自在和窒息。银幕上演的东西有什么意思他全然不理解，也看不出来——镜头闪过的还是那些赤身露体的男男女女——他终于怀着对自己处境不满以及恐惧、厌恶和不解的复杂感情转向萨姆索诺夫。猛一看，尼基金简直认不出

他了，萨姆索诺夫被另一个身材高大的女郎挤在角落里，他晃着在黑暗中发青的脸，咕哝了一句，声音极不自然而且很生气，仿佛在为自己辩解，一面用佯装的笑容自卫。于是尼基金一口气说出：

“好了，我们走吧！”

萨姆索诺夫喘着气，眼镜片向尼基金一闪，站起身在空荡荡的酒吧间小厅里声音沙哑地说道：

“算账！”

银幕右边的门帘一动，掀开了，淡黄头发的女招待不慌不忙地走过来，嘴巴和眼睛里流露出聪慧的大学生具有的那种纯洁严厉的神情。她把两张账单往桌上一放，打着手电，泰然自若地等待着。尼基金没有能仔细看一下自己的账单，因为他发现萨姆索诺夫把目光投向招待员的手电光时，他那胖乎乎的脸霎时变了颜色，吃惊地叫嚷起来：

“这笔账是怎么算的？您搞错啦！要一百五十马克？我们只要了可口可乐！不行，我们没喝酒！”

“你没有钱吗，英国人？你不知道价格吗？”招待员冷淡地说着，一面向他俯下身去，“你能付多少马克？你一共有多少钱？”

“一百马克。”萨姆索诺夫撒了个谎，结结巴巴地说，“我只能付一百马克。”

“那就付一百！”

萨姆索诺夫鼻子里出着粗气，一面在担心地想着什么，一面从里面口袋里掏出钱包，手指不听使唤地在里面掏着，当他抽出两张五十马克的钞票时，女招待紧紧抓住钱包的边把它打开，突然尖叫起来：

“里面还有钱！拿来！还有你……付钱！也没有钱吗？”

她用手捏紧的电筒严厉粗暴地点了一下尼基金的前额，

漂亮的面孔显出凶相，还摆出准备动手的架势逼近，挡住了银幕。尼基金绝没想到她会这么粗暴，会准备动武。但他明白，眼前这个情景就跟恫吓勒索一个样。他敏锐地看到地下室角落里的门帘动了一下，两个体格像拳击师的汉子——一个没穿毛衣，只穿一件白衬衫，领结松开着；另一个穿一件深色毛衣——一前一后从门帘里出来，示威似地往酒吧间的高脚椅上一坐，背对着大厅，默不作声，悠然自在地抽起烟来。

“手电该用在适合它用的地方，我尊敬的人儿，”尼基金开了腔，“这样更聪明些。”

他曾不止一次尝过束手就擒的苦头，这种情况后来经常在梦中再现，——这时，一股使人窒息、有损尊严的力量扳住你的肩头，它像铁箍一样卡住你的脖颈，等你俯首听命、束手无策时，它就笑了。此时此刻，在这人迹罕至的、凶险的地下室，在这与地面世界隔绝的简陋的陷阱里，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打架、毒打、抢劫、甚至可能谋杀，而周围只有潮湿的臭水沟、城市下水道的废井——没有一个人可作见证，永远没有人会发现，会知道……

尼基金立即意识到自己的孤立无援，马上想到，像惊呆的萨姆索诺夫那样跟女招待顶牛，不是也不可能是理智的行动。于是他竭力做得镇定自若，满不在乎地把自己一百四十三马克的账单拿过来，又把萨姆索诺夫的账单——也是一百四十三马克——拿过来。这是一笔很可观的数目，但是他认为这点钱不足挂齿，关系也不大。对，对，要赶快毫不犹豫地付掉三百马克来买到自由，可以去透透十一月的空气，淋淋那爽人的雨水，逛逛那湿漉漉的柏油马路……这笔数目是多么微不足道啊！花了这笔钱就能起身，撩起楼梯口沉重的门帘，走上阶梯，离开这铅灰色的半明半暗的地下室，摆脱这个冷漠地不时呷着酒的盖达身上发出的湿滋滋的香水味，离开这满脸凶相的淡黄头发的女招

待，后者现正弓着腰居高临下地站在面前，摆出准备应付一切的架势——揍你，用指甲抠你的眼睛。

尼基金期待着能够脱身，一心只想赶快跨上楼梯，他数了三百马克，叠成一叠，冷冷地递给女招待，说了一声：“一起付了。”她几乎像抢一样把钱从他手上夺过去。尼基金轻声短促地对萨姆索诺夫说道：

“离开这儿，快！……”

女招待嘴巴撅得老高，把找的零钱放在桌上。两个壮汉仍然背朝着他们，莫测高深地、态度冷漠地坐在酒吧间柜台旁，默默地抽着烟。

“快，快，”尼基金催促着自己。忽然，他感到盖达抓住了他的臂肘，拽住雨衣袖口，不让他站起来。他愤怒欲狂，但他用巨大的意志力抑制着自己不把她推倒（她会马上厉声尖叫，大吵大嚷，说是挨了揍，这下可就要闹开啦……）。于是，他轻轻地把抓住他袖口的指头掰开，站起身来，装得像一个遇到喜事的人那样，脸上堆着假笑（不，没有发生什么情况），说话的声调客气得不自然，这使他自己都感到厌恶。

“多谢……再见……”^①

萨姆索诺夫用肚子把桌子顶开，紧接着笨拙地跳起来，喘着粗气，像牛一样低下头，迈步向门口走去。几乎在这同时，尼基金也动身跟他走去，直到在门槛上甩开了被人摸得肮脏不堪、发着刺鼻的浓重霉味的门帘，看到了陡梯上方令人喜悦的白昼的亮光时，他还在担心里面的人会改变主意，尾随着紧追出来。

他们俩喘着粗气，沿着石梯向出口走去。秋天晦暗的光线透过玻璃门从出口处微弱地照射进来。他们打开通往大街的大

^① 此处原为德语。

门，获得了自由，来到宽宽的人行道，踩上坚实潮湿的柏油马路，两人都激动地深深吸了一口雷佩尔班大街苦涩湿润的空气，朝两旁看了一下。

“滚他妈的蛋！”尼基金开腔骂道，“统统滚他妈的蛋！”

看门人站在门旁，装出正在专心刮掉绿大衣衣襟上的斑渍的样子。他那满是皱纹的疲倦的脸上不再显露出奉承的神情，而是装出一副聚精会神的样子。尼基金发现自己暗怀恶念——记住这酒吧间的名字，记住这个地方和这张伪善的脸，这张脸可能是他命中偶然遇到的一个记号，也可能是他命中注定要遇到的一个记号。

“‘隐秘酒吧’，”尼基金念着大门上方的霓虹灯招牌。“这对末等的酒吧间老板是一个绝妙的名称！好一个贞洁的隐秘场所，原来如此啊！普拉东！”

“嗨，笨蛋！笨蛋！”萨姆索诺夫叫喊起来，他憋着一肚皮的气，用拳头捶自己汗涔涔的额头。“三百马克！给抢光啦！硬抢去啦！在光天化日之下！把我们当黄鼠，当笨蛋一样抢光啦！”

“感谢上帝，这一切好歹总算结束啦，普拉东。”尼基金已经开心起来。“哎，你说有什么办法呢？去向警察局声明，说你对罪窟里的卑鄙下流的勾当不满，你要到总理那儿去控告？这样可能更糟。你知道，他们是把我们当英国人抢劫的，可他们还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呐。你没听到那位迷人的盖达嘀咕的关于俄国人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进来的那几个打手？那是边境水域里的主力舰！”

“我们真是笨蛋，笨蛋，我们就是这种笨蛋！三百马克！”

“去它的吧，这些马克！就算我们从来没有过这笔钱得啦。应该说，资本主义国家里的任何稿酬都是不义之财。”

“不行，这可不行，对不起！我欠你一百五十马克，我以后还你，我们平均分担这个愚蠢的代价。”

“还什么钱，瞧你，普拉东，我不要你还，三百马克我已经忘掉了，没有这回事。”

“你也不要忘记，我不欠人债，……啊，我们头脑简单，笨蛋，活该我们倒霉，傻瓜，蠢驴，糊涂蛋！碰上了这么一群坏蛋！”

“冷静些吧，一切都过去了。这种事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呢，还怪有意思的哩，真的。”

尼基金说着自己也笑了。他一面安慰忿恨恼怒得脸色发紫的萨姆索诺夫，一面感到压抑他的心灵的那种令人屈辱的软弱无力之感还没有消失，他还没有感到完全轻松。那个用手电筒粗暴地打他额头的淡黄头发女招待的大学生型的面貌，她那像市场上做买卖的口吻：“你也要付钱！”那无人光顾的黑咕隆咚的地下室，那两个坐在酒吧间柜台旁叼着香烟、懒洋洋但又带示威性地有所等待的汉子，还有盖达和不索自来的酒——这一切是一场演得很蹩脚的暴力戏，没有反对暴力的人证物证，因为所发生的这一切显得太平常了，十分自然：酒呀，坐在桌旁的女郎呀，酒吧间柜台里两条汉子呀，他们随时准备挺身而出保护因为别人不肯付钱而受凌辱、又无法自卫的年轻女招待……这里没有犯罪者，确切地说，有罪的是两个随便光顾酒吧间、结果遭人抢劫、受人侮辱并且挨了打的外国人……

第四章

这三千卢布是第一笔稿费，是长时期身无分文，在一家大出

出版社的出纳处领到的第一笔钱，厚厚的三叠，每一叠都用上面盖着印记和做了什么记号的纸带扎好。这一叠一叠的钞票把他旧上衣的口袋塞得鼓鼓的，令人高兴。当他走出出版社的大门来到六月的阳光灿烂的室外时，他感到一股幸福的暖流，这是由于他初次不习惯地看见了厚厚的杂志里一篇短篇小说上的如此熟悉的姓名，也由于甜滋滋地感到了压着他胸口的这些钞票，这是他盼望已久的财富。

他在碰到的第一个香烟亭买了几包贵得出奇的“海尔茨戈维纳·芙洛尔”烟。他沉浸在喜悦之中，忘掉了债务，忘掉了他在帕维列茨车站旁租的那间贴着肮脏的糊墙纸的怪不舒适的房间，在炎夏的、花草争妍的大街上，在酷暑当午的杨树树荫下走着。他欣喜若狂地看着一张张行人的脸，高兴地想：不，他们不会知道，他的名字现在好像和他本人分开了，不会知道，各处报亭里都在出售新出版的一期杂志，里面刊登着他的短篇小说，是他写的，是他在那间糊着已经脱落和发黄的糊墙纸的不舒服的房间里，在摇摇晃晃的餐桌旁创作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他终于能使得街上的这些行人，这些陌生人赞赏、忧愁、惊讶。谁也不知道，他现在发财了，可以还清债务（女房东的房租和膳费），还可以买一套衣服、衬衣，买双皮鞋，还能剩下一些钱以保证能安心工作，以便再次一鸣惊人，使人们倾倒在他那出色的才华前。

他在拐角报亭周围久久地徘徊着，一边透过被太阳晒热的玻璃仔细观看书籍和杂志的封面，一边斜睨着购买新出的报纸和最近一期《星火》杂志的行人。他的视线时刻盯着刊登他那篇小说的厚厚的杂志的名称。他一直记得从光滑的优质纸上散发出来的油墨味，这上面有他的名字，第一页上奇异地排满了黑色印刷符号和字句。他还背得出小说的开头。他预先就设想着别人看了《秋天的一日》这个题目之后会有什么感受。他觉得这题

目本身就有一种悲秋的气息：“花园中雨声淅沥，雨点敲打着房顶和台阶上空的遮檐，斜风吹动水洼里黑色小船似的片片落叶……”小说写完后他对小说的开头总感到不满意，反复修改，长时间地精雕细凿这一句，一会儿增写，一会儿压缩，一会儿又重新改写，删掉修饰语。他做梦都梦到，这句话对他仿佛是一种令人心荡神怡的惩罚，一种痛苦，——然而在这痛苦之中又有一种享受，一种无穷享受。

他好像陷入于恍惚的沉思中似地抽着烟，一边在报亭旁等待有人来买刊登他那篇小说的杂志，使他的虚荣心可以得到满足的时刻，并且暗诵着第一页开头肯定会引人注目的第一句话：“花园中雨声淅沥，雨点敲打着房顶……”这毕竟是多么精练、多么美妙的句子！它无疑地会使读者爱不释手地读下去，如同置身河畔小城里树木秃的花园里，如睹十月仲秋黄昏的景色，感到伤感而又激动。

报亭的玻璃窗后面，卖报老头的脸色呆板得令人沮丧。他一边卖报，一边用两个都缠着旧绷带的手指数着零钱，然后从架子下面取出一个小纸包，不慌不忙地嚼着，下巴上留下了柠檬威夫饼干的碎屑。

“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没人来买杂志？”尼基金望着懒懒地嚼着东西的售货员，心里想。按说，售货员应当深知这本厚厚的杂志的重要性的和它的声誉，把刚出版的这一期推荐给每一个人。“要不要给他讲讲杂志的内容？”

他在报亭旁呆站了近二十分钟，人们嫌他碍事，推他走开。这时卖报老头从报纸捆后面欠了欠身子，突然疑心地盯着他，叽哩咕噜地问：

“您要买什么，年轻人？”

于是，他涨红脸拿起一本刊登着自己小说的杂志，浏览了一

下目录，翻了几下，翻到非常新颖地用黑体字印着他的名字的地方，匆匆看了开头几行，故作惊奇地说：

“啊，出来了……”

“谁出来了？新东西吗？作者是谁？”售货员像老鼠一样把威夫饼干咬得咯吱咯吱响，看了一眼作者的名字和小说的标题，犹如看着荒凉的沙漠。

“这是我写的小说，”尼基金像是一个厌倦于荣誉的人，用硬装出来的冷淡口吻说。售货员那无神的目光中的某种疑问的神色使他既感到难受，又得到满足。

“您是作者？……是您？您写小说？是这一样！……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年轻的作者……那么，您是作家喽？看见您我很高兴……”

“是的，这是我写的小说，”尼基金皱着眉头重复了一遍，并伸手掏钱。“请给我两本杂志，劳驾您给我拿三本吧。我手边一份都没有。”

他显然是说谎，因为他有作者应得的两本。可是他恨不得把报亭里谁都没有碰过的、令人喜爱的一整捆紫色封面杂志都买下来，以不可名状的贪婪买下来，似乎一秒钟之后它们就会从报亭里消失，因此在他一生中神奇地起着某种决定性作用的、能证明他是作者的、印刷出来的依据也将不复存在似的。

“散文作家尼基金？是你？你要收购自己的作品？这可太妙了！”

一个“O”音很重的声音从尼基金的脑后传来，响起了粗鲁的、像演员般熟不拘礼的声音。尼基金顿时踌躇了一下，伸手接过售货员找给他的零钱，一转身看见了年轻诗人瓦西里·维赫洛夫。此人已经出过书，在文学界颇有点名气。他红头发，宽肩膀，说话大嗓门。不仅他那白里透红的健壮的土里土气的外表

像年轻的叶赛宁，连他那用很响的男中音朗诵诗的风格也像他。尼基金在大学的一次晚会上曾听过他的朗诵。

“散文作家……小天才！……”

维赫洛夫穿着一件揉皱了的破上衣，穿旧的衬衫领子敞着，胡乱梳过的头发耷拉在结实的额头上，他高兴地、就像一个热情奔放的、快乐的农村小伙子那样，亲热地从后面抱住尼基金，吊嗓子般地大声说：

“我读过你的小说，读过了，在杂志上我们是邻居，上面登着我的叙事诗，你没读过吗？你读读吧！我可是读了你的作品，很好，太棒啦！你怎么样？‘火花在黑暗中抖动，’好像是这样吧……老兄，这简直是一行诗！你真是个小天才，尼基金，你将冲破帷幕，和契诃夫并驾齐驱！真一行一啊，散文作家，真一行！”

“你上哪儿去？”尼基金红着脸问，并向一边嚼威夫饼干一边倾听维赫洛夫打鼓般的男中音的售货员瞟了一眼。“你去市中心吗？”

“去就去吧。走吧。稿费拿到了吗？去喝它几杯，怎么样？为庆贺你的小说，第一声春雷，还有我的叙事诗！让我们随便到什么地方去坐坐，谈谈人生。去文化公园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你的孩子不会哭吗？老婆不会等吗？丈母娘不会拿着擀面杖等你吧？”

“不，我就是一个人。”

“一步一步地向电车站走去，契诃夫！头一篇小说发表，不可不庆祝一下！你知道，只要扫清道路，就可以青云直上！散文作家，天哪！你是有才能的，知道吗？”

尼基金清楚地记得，起初心中有一种轻松的节日般的喜悦在回荡（“在他的生活中终于发生了令人惊奇的重大事件！”）。由于旁边桌上放着刊登他的小说的杂志提醒他发生的事情；由

于中心公园的浓荫和夏令咖啡馆彩色玻璃上神幻般地闪烁着的六月的烈日——他们正好在正午时分到这些地方去；由于喝了第一杯酒后引起的令人愉快的微醺，使他忘却了熬夜工作时的说不尽辛苦；还由于在他生活中展现了一种新的美好前景，——他难以抑制地感到心情愉快、善良、多感、慷慨乃至喜爱一切人和物，喜爱地上的荫凉，喜爱初夏的烈日，喜爱凉台上散发出木头和树叶的淡淡的气味以及咖啡馆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林荫道上的热空气。

他津津有味地听维赫洛夫谈散文诗，谈小说的细节，谈上帝赋予他神奇的创作灵感，谈命运之神使少数前线战士幸存下来，让他们可以来说出别人没有说出的话。他一边听维赫洛夫讲，一边爱慕备至地瞅着他那健康的脸，他那双因领悟对方的意思而入迷的热情而又神采奕奕的蓝眼睛和他那耷拉在额头上的红头发。他心想，这个维赫洛夫真是有趣的小伙子，他是多么忘我地信仰艺术和工作，信仰自己天天绞尽脑汁精雕细凿出的优雅文字。他一边听，一边责备自己，为什么在这次见面之前没能早些这样熟悉他，而是只知道他打过仗，大学毕业，发表过东西，并且像傻小子那样非常明显地把“O”音念得太重。

维赫洛夫建议为粗犷的散文、为温柔的诗歌、为整个文学、为变态的人——即所谓借助想象的神力虚构出第二生命的作家——干杯；随后维赫洛夫开始朗诵他尚未发表的最新的抒情诗。而尼基金喝得越多，就越欣赏维赫洛夫，欣赏他的才智和他心灵的敏锐，每当他朗诵完一首诗就说：“高，妙，好！”并且由于过分赞叹而冲动地拥抱他，像是彻底被征服似地张开臂膀，真心诚意地吻了他两次，亲热得差点儿哭出来。

因为赞叹和亲热而感动的尼基金，怀着内心的喜悦一直铭记着：命运在他艰难的道路上竖起了一根有重大意义的珍贵的

标杆。是的，他生活中盼望已久的幸福的新时期开始了。人们应当注意到刊登在厚厚的杂志上的这第一篇小说，在报上一定会出现一些评论文章，一致确认他的初露锋芒，甚至标题也会是相似的，什么《富有才华的小说》或《富有才华的抒情散文》。接着，就会有令人高兴的好评，开始出名，他的名字将光芒四射，他将成为受喜爱的人。他梦寐以求的夙愿将成为现实：他在地铁的电车里偶然向一位正在看书的姑娘瞥视了一下，便看到封面上自己的名字，还看见里面自己写的东西，多么熟悉的句子，这是他写的句子啊……“他砰地一声关上门，冒雨从台阶跑到杨树林里去……”“‘我不去接，’他粗鲁地说，‘再见！’‘不，’她抚摩着他的肩膀说，‘即使你不去接，我也要来……’”

他也举杯祝酒，喝了酒，并建议干杯，听着维赫洛夫的朗诵，为后者的声调和他最近写的那首爱情抒情诗深深感动。这首诗描写情侣在一个秋天的傍晚，晚霞映照着电车线路的上空，两人在小站分手时的抑郁凄婉的感受，忧伤动人。他钟情地想，无疑，他今天结识了一位和自己有同样的思想、同样的感受、同样的认识的始终不渝的朋友，同时心里充满了难以言传的喜悦：“是的，我们现在坐在这儿，可是我的小说发表了，往后还会有更多的小说！……”

他们在这家顾客不多的夏令咖啡馆里一直坐到黄昏，不断地朗诵着诗，热情奔放地谈论着古典作家作品的永恒的魅力（“听啊，听啊，这是多么简朴而天才的创作：‘忧伤的星，暮色的星啊！你的光辉使枯萎的草原变得一片银白……’^①或者：‘我

^① 见普希金的《乡村》。

记得那美妙的一瞬，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① 这简直令人发疯：‘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你，犹如昙花一现的幻影，犹如纯洁之美的精灵……’^②而你只要琢磨琢磨：‘俄罗斯，贫穷的俄罗斯啊，你那灰房子，你那狂想曲，对我来讲，就像是初恋的眼泪！’能写出这样的东西就是死了也甘心！伟大的文学，世界的巨人！”。他们时而争论，时而互相赞同，时而打断对方谈话，时而又哭泣，现在又重新背诵他们喜爱的散文中令人心醉的字句（“塔曼——这是俄罗斯所有沿海城市中最糟糕的城市……”^③ 这就是小说的奇怪的开头，这种心情是多么美妙迷人！莱蒙托夫是无与伦比的！而契诃夫又是多么善于处理自己小说的结尾！你还记得这一句吗：“米修士，你在哪儿？”^④），又重新举杯，就着甜食喝了一种带香料的甜酒，喝了咖啡。他们相互倾吐爱慕，发誓要忠于文学、文字和修饰语，忠于还活着的前方战士的友谊（“瓦吉姆，我们的人没有几个活下来！”）。最后，他们像钻出迷雾似地醒悟过来，——黄昏时公园林荫道上空的蓝天渐渐暗下来了。两人慷慨地付了账，在服务员讥笑的耳语声中站起身来，——看来，尽管尼基金阔绰地付了账（维赫洛夫掏钱时，他真的生气了），服务员仍旧当他们有些不太正常：因为关于文学的谈话、叫喊、争论、眼泪和磨破了的上衣之间有一种令人不解和纳闷的矛盾。

他们走在公园的林荫道上，傍晚的凉风吹拂着他们发烫的脸。维赫洛夫浑身是汗，情绪激昂，挺凸的胸前衬衫大敞着，红头发贴在额上，一只手抓住尼基金，醉醺醺地站也站不住，莫名

①② 见普希金的《致凯恩》。

③ 见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

④ 见契诃夫的《带阁楼的房子》。

其妙地笑着，用热情洋溢的、近乎沙哑的声音念起蒲宁的诗来。

“绝妙的诗。”尼基金一边听着维赫洛夫的深沉的男中音，一边激动地想。与此同时，他还谛听着自己心弦的幸福欢唱。“一切都很好，我并不因为自己微醉而感到害臊。可是为什么我们要离座而起，这么早就离开那适宜于畅谈的、舒适的咖啡馆呢？”

尼基金似乎不可能想到，也不可能同意立即便走出公园，到暮色渐浓、灯光发白的街上的人群中去，然后各自东西，——也就是维赫洛夫念完诗，不再谈论蒲宁那金刚石般的光辉词句，坐上电车到莫斯科的郊区去；而他尼基金，则乘地铁到帕维列茨车站去，在巷子拐角就能看到墙壁剥落的老房子二楼上自己那间凄凉小屋的窗户，那儿散发出一股霉味和破旧不堪的老古董家具的气味。不，不，他们的谈话和喜悦，他们互相之间以及对文学和对一切人的好感不可能就这样简单地中止、结束，因为今天的一切都是不平凡的！

“说真的，瓦西里，我不想回家，还早呐，”尼基金说，“要不，咱们步行去市中心？”

于是，维赫洛夫建议到莫斯科河去乘小汽艇纳凉，干一杯饯别酒，那儿每到晚上就很空，乘客不多，可以到孔采夫打个来回，在文化公园码头下船，然后到市内的随便什么地方去。尼基金对这个建议欣然接受。

他们走进小艇的餐室，打算喝最后一杯白兰地。在这里，维赫洛夫好色地向一位个子矮小、胸部丰满、黑眼睛、穿着浆硬罩衫的女服务员挤了挤眼，拖长声调给她朗诵勃洛克的一句抒情诗：“每晚在约定的时刻……”女服务员一边在湿塑料布上摆好酒杯，一边卖俏地动了动眉毛，吃吃地笑起来：“看样子你们是大学生喽？你们拿到了奖学金？要庆贺一番吗？”——可是维赫洛夫友好地拥抱了尼基金并对她说，站在漂亮女子的美目之前的，

是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作家。他建议尼基金立即把一本刊登他的小说的杂志赠给她,并且题上赠言,他说:“瓦吉姆,让人们去读吧……”

尼基金一边不好意思地问着她的名字,一边很快地在杂志上小说的标题下题了字,付了酒钱,摆出一副有钱人毫不在乎的派头,不去理会女服务员放在潮湿小碟子里拿来的找头。

后来,只剩下他们俩坐在下面灯火通明的船舱里,莫名其妙地要了香槟酒,又谈笑起来,朗诵诗。凉爽的水气拂面,带着汽油味的微风吹进船窗,窗外莫斯科河水的波浪哗哗地流过船舷,轰鸣的螺旋桨的震动使地板也颤抖起来。城市向后退去,换了个航向,灯火在花岗石的堤岸上游动着,不久,船舱里开始喧闹起来,变得舒适而又快活。

尼基金怡然而又自得,对一切都充满了爱(他甚至会把自己的衬衫脱下送给别人)。他大手大脚,请黑眼睛的女服务员和她的助手——一个睡眼惺忪的胖女人——喝香槟酒,吃巧克力,请两个面孔蛮横、黝黑的年轻水手喝白兰地,这两个人不时跑来张望这两个根本不像作家的人怎样在船舱里碰杯,寻欢作乐。女服务员此时则假献殷勤,用托盘把酒瓶一直送到船舱里;尼基金把随便揉皱了的钱塞给她,也不要她找钱,因为他们不断地在为文学、为生活、为未来、为漂亮的女人干杯。然后,维赫洛夫有些疲倦地闭上眼睛,用拳头撑着颧骨,想用浑厚低沉的嗓门带头唱《从孤岛驶向航道》这支歌,开始女人们还很和谐地跟着唱,可是当她们醒悟过来,就互相发出嘘嘘声(“老实点,不然他们会要流氓的!”),并吃吃地笑着用手指指上面,那儿有三个乘客裹着雨衣坐在露天的甲板上,他们好像是要到孔采夫下船。

他们高谈阔论,狂态毕露,精神亢奋,尼基金偶尔模糊地听到从烟雾缭绕、灯火通明的宽敞船舱里传来的说话声。他看到

一些陌生男女的面孔，一个个对他的挥霍都表示怀疑和惊奇，这些面孔对他来说是不相干的、没有吸引力的（“这个女服务员为什么老是吃吃地笑，翘着嘴巴，并且对他暗送秋波呢？为什么她的眼睛这么漂亮而她的嘴又扁得如此难看？”）。于是一种隐约的羞愧像一根钝头的针（“我这是怎么啦？我为什么要这样做？”）使他清醒过来。

直到十二点他们才在“突击队员”影剧院附近下了船。尼基金还没有平静下来，这一天不平凡的白昼和夜晚搞得他精疲力尽，他又开始说服维赫洛夫，要让他坐出租汽车，非把他送上出租汽车才回家……于是他们便在沿河大街上跌跌撞撞地向巴尔丘格方向的停车场走去，不时地在石砌的堤墙旁停下来抽烟（他们一直在抽烟），相互倾诉着好感和内心的一致，并且再次互相提醒一定要再见面。

真走运，出租汽车开近桥旁的停车场时，绿灯孤零零地在彼亚特尼茨卡亚广场凹进去的转弯处闪了一下，他们喊着“哈罗！”摆着手，车子停了下来。他们像兄弟般地拥抱、接吻。于是，尼基金突然孑然一人了，他忧心忡忡，惶恐不安，几个小时的谈话、喝酒、抽烟、志同道合、热烈的倾吐衷肠，刹那间都好像一闪而过，现在他惘然若失。

在奥夫齐宁科夫沿河大街上，对面“曙光”电影院的招牌已经不再闪光，街上一片夜色。彼亚特尼茨卡亚广场已经灯火熄灭，只有楼上少数几个窗户上还有昏黄的灯光。在广场拐角处的路灯下，堤墙上坐着一群小青年，也许是刚看完电影。他们在交谈，不时发出笑声，懒洋洋地向黑油油的卡纳瓦河里吐唾沫；一个有点驼背的、敦实的、穿着短上衣的小伙子摆动着喇叭裤，好像由于无聊，纯粹为了自己消遣似地在人行道上踏着乔特卡舞步。

“喂，伙计，有烟吗？”

这个小伙子发现堤岸上只有尼基金一个人，就吹个口哨。当尼基金摇摇晃晃地走到跟前，乐意地递上一包烟（“请吧！”）时，小伙子毫不客气，很快用指甲捏出一支香烟，欣赏了一下，然后向其他人点点头：

“都给吗？我们全抽完了，光了，只一根……”

“行，行，当然可以，你们抽吧，朋友们。”

他们互相推推搡搡地围住他，伸过手去，手指飞快地、贪婪地抽出香烟。借着路灯的灯光，他看清了围着他的这些年轻的陌生面孔渐渐露出有所戒备的神气，对他的大方好像不相信。但是由于今天在文化公园和小汽艇上灯火通明的船舱里的经历，由于今天在他生活中发生的大事，他把香烟一一塞到小伙子们手里，向他们笑着，像一个幸运儿那样天真开朗地说：

“这算不了什么，朋友们！我猜你们是没钱买烟了。这些我都经历过。我身上经常是一分钱也没有。”

“什么？”那个敦实的小伙子用斜得很厉害的眼睛怀疑地打量着尼基金问。“你说什么？”

“我很想买烟请请你们大伙，朋友们。我知道身无分文的滋味。”尼基金向他们点着头说。他对他们满怀同情和善意，在彼亚特尼茨卡亚广场和广告灯熄灭的“曙光”小电影院前临晨时分的寂静中，在夏天蓝盈盈的清澈的夜色里，这次要他帮忙的相遇毫不使他感到扫兴。“对，对，”他想，“我不想回家。我宁肯通宵在莫斯科游荡，看看夜晚的行人，抽抽烟，同他们认识认识，像跟这些小伙子谈话一样跟他们谈谈。和人们结识——这该有多好啊！”

“我说，”尼基金和善而朴实地说，“要是‘巴尔丘格’饭店没休息，咱们就到那儿去。买烟，随便喝点什么酒，聊聊……愿意

吗，朋友们？”

“谁请客？哪个付钱？”穿短上衣的敦实的小伙子问。他想了想，随即把一个人朝桥那边的“巴尔丘格”饭店推去，“快跑！”

两个小伙子立即跑过空无一人的桥，向透过窗帘亮着灯光的饭店跑去；只听他们把玻璃门敲得震天响。随后，隔着玻璃门出现了看门人的身影，只听得一个劲儿的要求声：“开门，大伯！”可是门没开，看门人黑色的身影消失了。然后这两个人回来了，其中一个向敦实的小伙子兴奋地嘀咕着什么，那小子哼了一声，眼色阴沉地盯着尼基金的鼻梁，拖长着语调问道：

“你这个花花公子！你不知道‘巴尔丘格’已经休息了吗？”

“很遗憾。那有什么办法呢，非常遗憾。”尼基金失望地说，并且叹了一口气。“朋友们，我倒是想……”

“撒谎，骗子手！”那小子用凶狠而又狎昵的口吻说，用手掌把蓬松的头发理了理，像是要动武似的，又向其他不声不响站着的人使了个眼色。“又想请客，又没有钱！你呀，其实一个钱也没有！”

尼基金看着他的高颧骨的大脸，就像极度幸福的人不觉得疼痛和讥笑一样，并不觉得危险。只是因为被人怀疑他在骗人而感到不解和受了侮辱。

“不，”他诚恳地说，“你不该……我有钱。”

“撒谎，你一分钱也没有！要不，你拿出来看看！”那小子威胁地、命令式地喊道。在这刺耳的“要不”声里，口气很强硬，斜眼睛里和宽颧骨上露出一副阴森森的狠劲。

这时，他那不怀善意的眼光和令人不快的声音已经使尼基金清醒过来。他看到这群小伙子蹙眉看着他，在路灯下紧张地屏息着，似乎蠢蠢欲动。“眼看就要出事。”尼基金心里想，顿时感到胸口有一股彻骨的寒意。他意识到情况不妙，却不明白为

什么似乎应当在这个小伙子面前进行辩解，便生气地向他冷笑了一声。

“我看，你真是个怪人。”尼基金说，摸了摸放在屁股后面口袋里揉成一团的钞票，随手掏出一张崭新的五十卢布给他们看。“不，朋友们，我想同你们一起……”

霎时间，那小子的一只手像钩子似的在前面一闪，尼基金本能地做了一个自卫的动作，把手缩了回来，那小子的手指已经抓住五十卢布的一角，猛然一拉，猛听得钞票撕破了的的声音，那小子急忙退后一步，喘着粗气沙哑地呵斥道：

“听着，把整张钞票交出来，骗子手！拿过来！”

事后尼基金想起那个夜晚的时候，心里想，当时那小子要是客客气气地向他讨五十或者一百卢布的话，他是不会拒绝的，也许，他还会因醉后的行善乐施而高兴哩。然而，事情并非如此。

“干什么？”尼基金小声说。起初他还没弄清那小子为什么不是向他讨钱，而是蛮横地企图抢劫，于是，一种稍纵即逝的、模糊而恐怖不安的狂热，一股对那个小子、对他的短上衣、对他发红的斜眼、对他每个可憎的手势的明显仇恨使得尼基金火冒三丈，他甚至结结巴巴地说道：“你们是六个人……可我想和你较量较量，小一子！好吧，来一吧！……”

于是，他摆好打架的架势，把一团钞票往口袋里一塞，攥紧拳头，不顾一切地向前跨了一步。

“别挨近，死猪！我有梅毒！别挨近！”那小子尖声喊着，嘴巴不知是因害怕而抽搐，还是因看到尼基金那不顾一切的样子而吓得扭歪了。他咳嗽一声，吐了一口痰；可是痰没有吐到尼基金脸上，反而在自己胸前沾了一摊白点子。只是在这时，当尼基金模模糊糊地看到那小子的细眼睛后，才向他扑去，满怀仇恨而且得意地朝他那牙床咬得格格响的尖下巴和不再沙哑地大喊大

叫的、满口吐沫的嘴巴打去。但是，他脑后吃了重重的一记，脑袋被打昏了，路灯晃向一边，坚硬的路面擦破了脸，嘶哑叫喊着的人影在上面时隐时现，在周围跳动着跑来跑去。“揍他的肝！揍肝！”不知是谁的声音就像野兽的声音一样刺耳。他感到有许多只脚猛踢他的肋骨和胸部，心里只有一个疯狂的复仇念头：“爬起来，只要爬起来！”他双手撑地，挣扎着爬起来，一使劲挣脱出那些围在一起践踏他的脚，在这些半疯狂的、几乎没有人形的人脸中间左右招架，这些人脸都像恶狼般龇牙咧嘴，似乎一看见血就红了眼。这时，他被一股从未有过的不顾死活的怒火支配着，也不觉得疼痛，疯狂可怕在喊着：“胆小鬼！下流坯！”他准备孤注一掷，在包围圈中左冲右突，弯下身子，左右开弓地揍这些可恨的脸。由于攥得发木的拳头用力过猛而险些跌倒。同时，也许由于怒火得到发泄，他的脸变得很难看，但他尚未失去视觉和记忆力，他疯狂地寻找那宽颧骨小子的脸，拼命向他冲过去，但是那小子却在什么人的背后时隐时现，并在那儿尖声地唆使着：“把他撂倒，撂倒！”

在幸运的一刹那(真是幸运的一刹那!)，他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听到身上的衣服被一双双钩子般的手撕得稀烂的声音，他挡过拳打脚踢，向那小子冲过去，那小子喉咙里发出吓人的尖叫，沿着堤墙一直退到桥边。这时，周围好像出现了真空，一种绝妙的、公道的真空。不知怎的，现在谁也不干涉他们了，那小子侧身沿着桥往后退，猛地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一样东西。突然，亮出了一把像长针似的打开的折刀，刀刃锋利，寒光闪闪。说也奇怪，这闪闪的钢刀没有使尼基金害怕，相反，他心中的仇恨像一根弹开来的弹簧，无论用什么东西都抑制不住。他疯狂地、怒不可遏地向那小子冲过去。他狂喜地、像在梦呓中念念有词地低声咕噜着：

“这可好了,现在咱们是一对一,……我马上就能知道,你以前有没有打过坦克……(“我为什么要说这个?为什么说这个?”)对了,现在该见个分晓了,你这个胆小的下流坯!……这种人在战争中也有过!对了,像你这样的人在古罗马就有了……(“什么罗马?说这干吗?”)那好吧,看是你行还是我行?……咱们等着瞧吧!是你行还是我行?……”

“别走近!我会把你的心脏插个窟窿!”那小子憋着嗓子吼叫起来,脸发狂似地抽搐着,头发甩打着太阳穴,他侧身靠紧桥栏杆,倏地伸出拿着刀的拳头,刀锋毕露。

也许,当一个原始人黑夜在自己的洞穴附近遇到一个强大的公兽时,会像野兽一样恐怖地、声嘶力竭地大叫,拿起可以致命的、有棱角的石头瞄准敌人,以便一个纵身打碎那异类公兽的头颅。可是,这儿不是洞穴,也没有原始人,这里是沉睡的彼亚特尼茨卡亚广场,已经关门的“巴尔丘格”饭店,卡纳瓦河上的桥,还有宽颧骨、鼻子被打破的、令人厌恶的小子和他尼基金。他浑身是血,难以辨认,疼痛难忍,穿着撕得稀烂的上衣和衬衫,吞咽着满嘴的鲜血,准备疯狂而理直气壮地揍他、打伤他、干掉他,借以自卫,维护自己的天真和一种非物质的、受侮辱、受压制的东西。在那一刹那,尼基金毕竟不是尼基金了,当时的一切使他的所作所为变得如同穴居时代的野人那样疯狂……

“我要你记住这一切,下流坯!……不,我本不想这样!……你们是六对一……不,不,问题不在于钱!”当尼基金逼近那小子,逼近他那紧张得发抖的手里握的那把针尖般犀利的刀子时,他那僵硬的嘴唇呓语似地小声说:“刀子收不收起来?不收?到底收不收?……”

“别走近!当心我阉了你,你这猪猡!”那小子像野人一样可怕地、威胁地吼叫着。

紧接着，尼基金感到有一样火辣辣的硬东西在左手面滑过去。那小子凶光毕露的红眼睛和那大张着的、喘着粗气的嘴巴在眼前一晃。这时，尼基金看到左手上的血，顿时明白，那小子用刀戳伤了他的手。于是，他往后一闪，弯下腰，用右手从下面对着那小子的下巴就是一拳，只听得一声野兽般的尖叫和叫骂，那小子的颧骨污脏的通红的面孔和圆瞪的眼睛，又闪现在他面前。他便又朝那逼近的、湿漉漉的、可恶的面孔打去，一种复仇的欲望，使他把烧不尽扑不灭的满腔怒火都发泄到这一拳上。

后来，一个沉甸甸、黑乎乎的东西从背后向他扑来，将他猛然推倒在地。在头旁边慌张的脚步声、拳打脚踢声和口哨声中，透过充塞耳际的声响，传来两声不清晰的叫喊，不知为什么就像在空中飞过的两片棉絮：

“坏蛋！坏蛋！”这时他感到，周围是异样地空旷，一片寂静，只听见一阵阵耳鸣声。

他吐了口血，脑袋里嗡嗡直响，他踉踉跄跄地跳起来，可是一个陌生人从后面有力地把他紧紧抱住，对他说：“放老实些，放老实些！”这时，就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一样，他看见那小子在桥的堤墙旁被两个警察抓住肩膀，一条条血迹斑斑的肮脏的伤痕使他的宽鼻子和颧骨变得很难看。利刀不见了。那小子无力地挣扎着、抽搐着，不像是在说，而是呛咳地喘息：

“我往家走，可他老缠着我，坏蛋！……该死的醉汉！我往家走，他却来向我讨钱，坏蛋！”

尼基金勉强站着，两条无力的腿摇晃着，连说一句话的气力都没有了，只是可怕地微笑着。

他们被带到警察局。那小子嚎叫着，反复地硬说，他从电影院回家，可那该死的醉汉钉了上来，搜他的腰包，抢走了钱，有五十卢布——他歇斯底里地打着手势，比划着全部经过。他把口

袋翻了个底朝天,在值勤人员面前抖出一张撕破了的五十卢布纸币。一个衣饰整洁、清瘦、宽额的上尉,用专注的、怀疑的眼光从柜台后面看着他,拿起五十卢布纸币的一个碎片(“拿来……”)又放到桌上。这时民警让尼基金坐在一条结实的、踩脏了的长凳上。尼基金看着那小子,想起他在吐痰的一刹那龇牙咧嘴的脸(“我有梅毒!”),他在桥上打架时那因仇恨和害怕而发出嘶哑声音的血迹斑斑的嘴(“我会把你的心脏捅个窟窿!”)——差点由于无力和憎恨而哭起来,他恨的是没能让他们在桥上一对一地干下去,那群人当中有人从后面不怀好意地、胆小鬼似地给了他一拳,再用脚一绊,将他撂倒在地。现在到了警察局,要是缺乏同情心,就不可能理解双方中的任何一方,甚至连诉说和解释在沿河大街上发生的这一切的细节和原因都不可能。那小子的喊叫,他的解释——“酒疯子,骗子手!”钉了上来,讨钱,遭到拒绝,于是就搜腰包,那张撕破的纸币就是证据,表面看来,这在某种程度上还是能够接近事实真相的,而尼基金能够并打算加以解释的却显得不寻常,极其特别,很反常,就是说,掩盖了真相或变成扯谎。

“今天,正是今天,在我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如果这算是幸运的话,大概我就是个幸运儿。我想做个善良的人,对世界上所有的人以及我偶然遇到的这些陌生的小伙子做点好事……”

“做什么好事?讲具体一点。”

“比方,我身上有钱,可他们没烟抽了,我就想请他们抽。对,买包烟,跟他们坐着聊聊。”

“夜里,跟不认识的人?什么目的?”

“您知道,我想做一个善良的人,对所有的人都做点好事。难道您没有过这种情形吗?”

“公民,我们大家都应当做善良的人。可是您想请他们的客

又是什么原因？他们跟您有什么相干？您认识他们中间的什么人吗？”

“不认识。但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公民，简单地说，您喝醉了，——那就该回家去睡觉，这才是正常人的举动。”

“正常人，——对。”

“您在精神病防治所登记过吗？也许，您战后落了脑震荡？”

“暂时还没有，虽然震伤过……”

“您在哪儿工作？”

“目前不在哪儿工作，呆在家里。确切地说，我租别人的房子住。”

“怎么会不在哪儿工作？您拿战后抚恤金吗？”

“不，不拿。大学毕业后，我在报社工作，后来离开了。靠什么生活，很难说。我卖掉了大衣、皮靴、军用指南针……还有什么呢？对了，还有拿‘近卫军’胸章换了皮鞋。确切地说，我把它送给我同团的一个战友。两年前他在火车上被偷走了全部证件、证章，连同别在衣服上的勋章。但他买了双皮靴送给我。”

“这就是说，您没有固定的职业，也没有劳动得来的生活资料？应当这样来理解吗？”

“不完全是这样。我几乎没有任何财产。但我整天在工作……从早到晚，夜里还干，夜里经常干，差不多每天夜里都干。我不想睡。您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巴尔扎克是怎样工作的吗？托尔斯泰、福楼拜、列那尔^①呢？您读过列那尔的《日记》吗？”

^① 列那尔(1864—1910)，法国作家，著有《胡萝卜须》、《日记》等。

“您真好意思！别给我东扯西拉，支支吾吾的。我们知道托尔斯泰是什么人，我们搞得清楚。您以为，民警在这儿都是吃闲饭的，什么事都不闻不问？把托尔斯泰也抬出来了。问题是很清楚、很具体的：您干什么工作？职业是什么？”

“我干什么工作？职业？好吧，我尽量回答。我从早到晚，连夜里都在寻找所需要的句子，可是往往却找不到……我一生最大的愿望是使人们欢笑、使人们忧愁、使人们看了我的东西落泪。且慢，瞧我给您说了什么蠢话！我应当给您另作解释。瞧，您瞧瞧这个小子，他多会撒谎！为了什么？您看，他像不像犹大·伊斯卡里奥特^①？像不像我的炮长麦热宁？我在四五年曾开枪打他，可是没有把他打死。”

在尼基金发热的头脑里闪过的这番对话，只是使他觉得像做梦一样。当他用手帕捂住被刀子划破的手时，一阵令人窒息的疼痛立刻使他清醒。他看见那小子在柜台旁边低声下气而又激愤地说着什么，看见他的充满恶意的眼睛以及他眼眶和打破了的鼻子周围的肮脏黑点。接着，在值勤人员目光炯炯、嫌恶的视线下又看见了自己身上被撕得稀烂的、简直认不出来的上衣——这件上衣是刚才被那群胆小鬼仗着人多势众、得意洋洋地给撕破的（他们似乎知道，这是他惟一的一件上衣）。他想到自己被打得遍体鳞伤、浑身肮脏，处在荒唐的现实之中，想到他想象出来的关于职业和对托尔斯泰、列那尔的癖好、关于寻找词句、爱情和善良的全部解释——他听见了这种既非笑声又非噎在喉咙里的哭声的奇怪的呜咽声。当他意识到他碰到了一件发疯似的、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时，他感到惊讶和羞愧。——

^① 犹大·伊斯卡里奥特，耶稣的门徒之一，后来出卖耶稣，故他的名字成为“叛徒”的同义语。

阵不由自主的幸灾乐祸的假笑和遏制不住的痛哭,使他窒息和胸闷。他屏气硬咽下这种假笑和痛哭。在似乎浮动着的灰暗的空房间里,他看见值勤人员昂起的威严的冷冰冰的面孔,看见自己那打开的公民证放在像学校里那样可笑地满是墨迹的桌子上,附近的墨水瓶旁边是什么人的证件,看来是那小子的,证件上放着一张揉皱了的五十卢布纸币的碎片。他咬紧嘴唇害怕地想:“我这是怎么啦?真是歇斯底里——又想哭又想笑……真是从来也没有过!神经错乱了,我控制不住自己了吗?要是没有这件丢人的事就好了,……当着他们的面,当着大家的面……”

“是这样吗,尼基金公民?”值勤人员的声音像灰沙磨擦的沙声传到他耳朵里。“您很不清醒,几乎丧失了自制力,就是现在也看得出,您企图抢米利亚耶夫公民的钱。是这样吗?”

“是,是的……”尼基金勉强地说,喉咙里再次发出痛哭般的笑声,泪流满面。

“把撕破的钞票还给原主。”

“是,是……还给原主……拿去吧……”

值勤人员的像农民那样结实的手指(关节上沾满了斑斑点点的城里人用的紫墨水),以公正无私的果断的动作不慌不忙地把尼基金交出来的半张五十卢布放在证件上面的另外半张上,啪地合上证件,把它递给急忙向桌子弯过腰来的小伙子。

“米利亚耶夫公民,把自己的钱拿去吧。银行给兑换。尼基金公民,现在我要把几个问题记录在案。”

“可要沉住气……要是不憋气多好……我伤了自己的尊严。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怎么……我这是怎么啦?像神经衰弱似的。在前线,要是我的士兵出了这种事,我是不会再相信他的。”尼基金自言自语道,喉咙口因为苦笑和抽噎而哽咽。为了不让人看出他吞咽时痛苦的痉挛,他转过脸去,仿佛因为一阵恶

心而发抖。

“该把这种人关起来，可恶的醉汉！……他还要把你们这里给呕吐得一塌糊涂呢……”那小子怀着有恃无恐的优越感，奴颜婢膝地说。他像是认出自己东西的物主一样，对两半的五十卢布看了一眼，把它和证件一起塞进短上衣的口袋，又一次讨好地在柜台旁边忙了一阵。“上尉同志，我可以走了吗？我是个工人，明天还要上早班。不像其他人……”

这时尼基金撑持不住了。那小子站在靠近木栅栏的地方，离他有两步远，颧骨油光闪闪，肿得发青的嘴带着凶狠和得意洋洋的神气咧着，露出细小的牙齿。并不是他所说的话，不是他那奴颜婢膝的腔调，也不是他对值勤人员的谄媚，而是从那得意的一笑中露出的庆幸自己得胜的卑鄙态度，霎时间在尼基金的想象中勾画出另一幅胜利的情景，甚至他在堤岸上看到那小子手里的刀子时都没有想到这幅情景：对，对，要是来得及，他是会用这把刀子将打倒在地的尼基金的心脏“捅个窟窿”的，并且会毫不犹豫地带着这种胜利者的满意的怯笑把他的眼睛也挖出来。

“你的刀子呢？”尼基金勉强地小声说，哭和笑使他哽噎。他发疯似地向机灵地闪开的那小子猛扑过去，可是拳头只能够到他那骨骼粗大的、有劲的肩膀。然而，那小子躲闪的时候没有站稳，失去了平衡，他的脊背和后脑勺重重地撞在墙上。他马上嘶哑地尖叫着向尼基金扑去。这时，两个民警已经用力抓住尼基金的手，把他又按在长凳上。那小子没有打他，而是像大山猫一般灵活地用硬得要命的指甲在尼基金的脸上乱抓，显然是想抓尼基金的眼睛，他的叫喊听上去像剃刀一样刺耳：

“你们看见吗？你们看见吗？……他对我动刀子！……他把刀子扔到卡纳瓦河里去了！混蛋，扔到卡纳瓦河里去了！”

值勤人员纵身跳过栅栏，以熟练的动作抓住那小子，把他的

双手反背着,就这样把他带到门口,愤怒地命令民警们:

“把他们俩都关起来!可是不要关在一起。明白吗?两个都关起来!”

在一个昏暗的、充满脏内衣气味的房间里,尼基金愁眉苦脸,躺在一张被划得乱七八糟的长凳上直哆嗦。一个半小时以后,进来一个民警,厉声要尼基金洗好脸跟他走。尼基金在警察局厕所的水龙头下面洗了脸,用手帕擦干,再次被带到值班室。

尼基金回想到在民警面前他那身不由己的、使他窒息的又哭又笑的情形,仍旧感到一种屈辱的心情。突然他惊恐地看到值班台旁边有一个戴着老式的帽子、穿着旧布鞋的干瘪苍白的受惊的老妇人。她用孤立无援的孩子般的眼光看着他,几乎是耳语似地重复着:

“瓦吉姆·尼古拉耶维奇,瓦吉姆·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啦?”

这是他的女房东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斯杰什诺娃,尼基金就是租了她的一个房间。她是个寡妇,丈夫是在战争中死去的历史学教授。她是一个善良、害羞的人,听到粗话就会面孔绯红。尼基金在琢磨,她是为什么、又是怎么会到这儿来的。忽然,霎时间,他设身处地地以她的眼睛来看看自己被打破的、匆忙洗过的脸和撕得稀烂的上衣,然后闷声闷气地问值勤人员,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到警察局来干什么。

“是我叫来的,根据您提供的用户电话号码。”值勤人员阴沉地回答。“这是您的房客,玛丽娅·巴甫洛夫娜。他是好人吗?啊?”

“我?提供给您?给了电话号码?乱弹琴!”尼基金不解地说。“决不会!我没有给您什么电话号码!”

“怎么，您怎么啦，瓦吉姆·尼古拉耶维奇，您怎么啦？”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手足无措地说着，就在长凳边上坐下来。“您是从来不喝酒的！我的天哪，是谁把您打成这样？”

“他挨了揍！”值勤人员说。在他那抬向尼基金的、像真理一样毫不动摇的眼睛里，仿佛有一块化不掉的小冰块。“这么着，玛丽娅·巴甫洛夫娜，这是头一次，我们将这样处理。就这么处理，头一次……您把他从我们这儿领回去。由您个人负责。就这样。走吧。这是身份证。尼基金公民，我决不相信您会在报上发表文章。您去灌黄汤子去吧，寻衅打架去吧。这叫什么来着？”

“看上帝的份上，瓦吉姆·尼古拉耶维奇，看上帝的份上，咱们快离开这儿吧。”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嘟哝着，急忙胆怯地说。“咱们回家吧，亲爱的。您应该做冷敷。像您现在这样怎么能上街呢？”

她抱歉地向值勤人员摇了摇戴着老式帽子的头，用发抖的手搀着尼基金的手，把他小心地拉向门口，似乎根本不相信会立即把她和尼基金一起放走，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恢复原状似的。

“您总该道歉一下吧，尼基金公民。”值勤人员阴沉地说。“不要去管别人的闲事了，您也真闹得够呛……”

“亲爱的，瓦吉姆·尼古拉耶维奇，您就道歉一下吧，看在上帝的份上！”

“对不起，玛丽娅·巴甫洛夫娜，等一等……”尼基金停住了，心里冒出一句恶毒刻薄的话，讥笑地朝值勤人员看了一眼。“您做得很对。我是经常喝醉，到了夜里就去抢劫、抢人家的钱，您把真相调查得一清二楚。因此，我的钱就交给了那个了不起的诚实的小伙子。祝您一帆风顺。让钱见鬼去吧。但十分遗憾，

我不能道歉。”

“去吧，去吧！”值勤人员激愤地催促着。“少说废话，尼基金公民！您扯得太——太多了，可以写不少文章了！……”

后来，走到拂晓前泛白的、静悄悄的街上——可以清楚地看到发灰的柏油马路和被一条条电车轨道截开的大马路，尼基金因为玛丽娅·巴甫洛夫娜被唤到警察局感到很难为情，情绪低落。他终于问她，他们是否真的半夜打电话到家里去，把她叫醒，打听他的情况了，并且请原谅他极端愚蠢地、意外地打扰了她，由于他的愚蠢的争吵造成的过错，害她受了一场虚惊。

而她尴尬地听着，和善地抖动着朴素而奇怪的帽子，什么也没问，轻轻地叹着气，好像是不要求别人来表白的温柔的保护天使。

“我怎么以前……不了解她？”尼基金想。

他在那儿住了一年多，在这期间，除了必不可少的话以外，他们似乎没有说过一句知心的话。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尼基金怀着对她又是愧疚又是感激的温情，一边骂着自己，一边沙哑地说。“玛丽娅·巴甫洛夫娜，对不起……我太不守信用了……那时我没有钱。我欠您四个月的房租。可您没有问过……现在我有钱了。请收下，我现在一齐付给您……对不起……”

于是，他急忙去掏口袋，拿出揉皱的钞票，但当他慌慌张张地一遍又一遍地数着钞票时，发现钱几乎没剩多少了：三千卢布只剩下了七百五十挂零。他想起文化公园的夏令咖啡馆，小汽艇上的船舱，在那儿，全部由他而不是维赫洛夫付的钱。他怎么也弄不明白，怎么会花了这么多的钱——况且在打架时，那一群小伙子当中似乎谁也没有能来得及掏他的腰包。

“对不起，玛丽娅·巴甫洛夫娜，我觉得我丢了钱。”尼基金一

边说，一边因为自己说了空话而着急得不得了。他不知怎么匆匆忙忙地、不好意思地把一团钞票塞到她手里。“这是两个月的……剩下的我以后给，以后给。很快就给，请相信我。”

她惊恐地站住了，脸上泛起点点红斑，——当她看到鲁莽的行为或稍许有一点鲁莽迹象时就会这样，——不好意思地摇着帽子。

“上帝保佑您，瓦吉姆·尼古拉耶维奇，现在还谈什么钱。您听着……不必了，不必了，看在上帝的份上。什么时候有，什么时候再给好了。我过得去，过得去，现在我不要。”

“玛丽娅·巴甫洛夫娜！”他恳求说，“我求求您！”

“我不要，不要，”她拒绝道，还抗议似地把手倒背过去。“咱们走吧，瓦吉姆·尼古拉耶维奇。您的脸现在应该做冷敷，要不您怎么……？还有，请您忘记自己的窘境吧。我有过儿子。许多事我都能理解……”

他轻扶着她的胳膊，同她并排走着。他只有对死去的妈妈才这样。一路上，他唠叨着不必要的道歉话，担心绊交而妨碍对方那纤弱干瘪的身子的动作。

过了许多年，他已经成熟了，回想起那一天一夜，他感到一种异样的使他害怕的心情：既为善良、慷慨和爱而高兴，同时也充满了仇恨。

第五章

“被遗忘的四十年代曾经使我们分离，而……现在，政治制度又使我们分离。我赞成俄国和德国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和平相

处，尼基金先生。俄语是怎么说的？祝您——健康！……”

“这句俄语已经成为国际性的了。祝您健康，迪茨曼先生！”

他们坐在赫伯特太太家大客厅里的壁炉旁边。长毛地毯宛如修整过的草地，在落地式台灯的灯光下呈现一片绿色，走在上面富有弹性。燃着的劈柴烧得哔剥作响，无力地迸出火星。同时，由于谈话间喝了一点白兰地，这酒的味道及酒后引起的有益健康的暖意，使尼基金感到精神上有某种略带戏谑意味的欢悦。他准备不管他们想要向他提出什么问题，他都将预先正确无误地估计到自己和别人之间的疏远程度。这种疏远充满着恶毒的政治怀疑主义以及永远可能存在的界限，甚至在这个德国人的客厅里也是如此，尽管这儿充满了令人愉快的、安谧舒适的气氛，铺着地毯，环境安静，靠近炉火熊熊的壁炉，似乎特别适宜于进行晚间的谈话。

他和萨姆索诺夫一走进客厅，用汽车把他们从旅馆迎接来的女主人赫伯特太太，就把他们介绍给在这里聚会的人，用她的话来说，这是一些经过选择的、亲近的朋友。像通常那样，先是一个一个的介绍，关于旅途劳累的客套寒暄，然后是对汉堡潮湿的秋天的无关痛痒的议论，对今年雨水特别多，容易感冒表示遗憾，最后，在客气地搞清楚谁喝什么酒之后，将尼基金的几本近作翻译出版的、西德最大的韦伯出版社总编辑迪茨曼先生使了使眼色，一下子拿了两瓶酒（摩塞尔酒和白兰地——作储备！），并且相当执拗地将尼基金引到客厅的一个角落，笑着告诉其余的人，说他要暂时独占一下苏联作家，为了弄清某些真理。

可是赫伯特太太快活地说，她不允许德国批评家折磨俄国作家，要他当场表态，因为她非常了解迪茨曼先生的自我中心说，所以，她邀请客人们坐到壁炉旁，靠炉火近一点，便于大家聊天。于是，秃顶发亮、红脸膛的出版商韦伯先生摇晃着矮胖结实

的身体，晃晃悠悠地走向桌子，舒适地倒在柔软的安乐椅里。他那身材修长、细长腿的妻子洛塔·蒂特尔，一个风靡一时的剧院女演员，像游蛇一样灵活地坐在他身旁，用有些沙哑的、像是正在变嗓音的少年的女低音说：

“喔，我想看看东方和西方，它们将以什么告终？是宣战吗？”

迪茨曼先生渴望着进行一场智力锻炼，他一分钟也不停顿，紧盯着尼基金，似乎在为这种难得的机会高兴。他讲话很快，在苍白的脸上，那双灵活的眼睛射出使人迷乱的光芒，干瘦的手指不停地动弹：一会儿握紧玻璃酒杯沾沾嘴唇，一会儿把一包拆开的香烟迅速地凑近尖鼻子，一个劲儿地吸着烟叶味（他因为不久前心脏病发作而戒了烟），——他的举止谈吐起初使尼基金感到有一种不太严肃的调子，好像是文学沙龙所特有的一场智力练习游戏。他想：“迪茨曼先生过去大概是一个头脑灵活的新闻记者。”但是这场“游戏”持续的时间越长，尼基金就越陷越深，越来越严肃地对待它。当迪茨曼满足于柏拉图式的欲望那样闻着拆开的香烟时，他已经饶有兴味地看着他那双神经质的手。萨姆索诺夫按尼基金的请求，仅仅逐字逐句地翻译那些复杂的句子。他态度泰然自若，上衣所有的扣子都扣上，人显得胖墩墩的，腹部绷得紧紧的。坐在壁炉旁他嫌热，额上沁出点点汗珠。

赫伯特太太坐在尼基金对面，绒线衫型的黑色上衣的领子裹住她的雪白的颈项，好像一个有些粗鲁的男子温情地搂住她一样。椭圆的金胸饰在细链上晃动着，俄罗斯式样的发髻耸在小巧的耳朵上方，里面整齐地现出几缕银丝。这引人注目的银丝，在仓卒一瞥之下，显得惊人地不相称和令人费解，以致破坏了她那处女般体态的一丝不苟的整洁。因此，尼基金刹那间想到，没有生育过的妇女往往会有这种不相称的情况，这也许是由

于不喜欢孩子的缘故，也许是由于禁欲主义的节制，使她们一生都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得很好。

看来，这并不完全如此——赫伯特太太并没像修女那样克制自己，她喝白兰地，烟抽得很多。她那双眼睛在烟雾后面凝视着，似乎隐隐流露出激动的神情，闪烁着晶莹湿润的蓝色光芒。

她的目光越来越多地与尼基金的目光相遇，有时她那倏然一现的、惊惶的微笑似乎有点刺激性，使尼基金感到局促不安。当他喝白兰地或点燃香烟时，好像她在背着别人仔细地、偷偷地研究他的服装、领带、领扣。在她的这种目光下，他不由自主地想动弹一下，变换一下姿势，就像被人长时间地、令人厌烦地拍照时那样。

有一次，赫伯特太太低下含笑的眼睛，抖掉裙子上的烟灰，然后用指尖触动一下胸前的胸饰。尼基金不无烦恼和怀疑地暗自好笑，猜测女主人实际上是用这个玩意儿给他照相，也许还用秘密的微型录音机录下他的谈话。“为什么呢？这有什么用处呢？荒诞无稽！”他一面简短地回答迪茨曼先生提出的问题，一面在心里又否定了自己那种带有侮辱性的猜测，便竭力不去看赫伯特太太，但突然他又感到她那专注探究的目光，他就像被人触到皮肤，又好像被彻骨的寒气所逼，皱了皱眉，朝她望了一眼，突然非常清楚地看见了她的脸——一张来不及改变表情、来不及欺瞒他、来不及掩藏到烟雾之中去的脸，——使我不禁觉得全身发冷，打了个寒颤。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她那挂在微微颤动的嘴角上的半带微笑半做媚眼的抱歉的神情，以及向他投过来的交织着疑问、温情和惊恐的目光。这些似曾相识的表情，使他想到某种痛苦的、模糊的、不可捉摸的东西。“这好像是什么？是什么呢？也许，是曾经在梦中见过的、在神奇的屋顶上空的一小块不可思议的蓝天？也许，是童年时代快乐的、阳光明媚的田野

上那遥远的充满春天气息的晓风？……是什么呢？这不可能，我从来没见过赫伯特太太，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她，只是在这里的机场上才是第一次……是下意识的愚弄？是神秘主义？完全是好好的……我不记得，是的，是不记得在什么地方见过这种疑问的、含有歉意的、温柔的目光，她为什么这样望着我呢？”他又思索起来，一面气忿地责备自己是神经过敏，竭力使自己不再胡思乱想。但是头脑里仍旧留下有件事情没有了结的感觉，像苦苦思索被忘却了的姓名而又想不起来时所引起的一丝不安。“不，我从来没有遇见过她。在一九四五年呢？在战争年代？在柏林？我们驻在德国民房的时候？头脑里哪来的古怪念头！还记得那种眼神吗？我在哪里见过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时她才几岁？不，她的脸我从未见到过……一连串下意识的念头，荒谬的臆想。但是，也可能，在什么地方偶然地——在莫斯科街头，在火车上，最后在国外，曾经留下的很相像的记忆？在世界各地，经常会遇到外貌、声音、体态一模一样的人，就像双胞胎一样……所有这一切像是幻觉！我感到又有点不舒服了……”

他知道，自己身体不太健康。近几年来，在六岁的儿子伊戈尔死后，偶尔会发生一种奇异的、有时连理智也无法理解的现象，只能用极度疲劳、神经失调来解释。夜里，由于忧郁、良心受到谴责和不可克服的孤独感引起的失眠，使他十分难受，痛苦的窒息扼住喉咙，阻塞呼吸，就像在墓地上，在那可怕的不可忘怀的时刻，吻别儿子冰凉的三角形的小嘴时的感觉。透过半睁的、落满雪花的睫毛，他看见了儿子那双没有生气的、浅蓝色的眼睛。这双眼睛曾经总是闪耀着坦率、稚气的喜悦，随时会大笑，会淘气。他刚发出喊叫声，就晃着草黄色头发的脑袋，早上跑进他的工作室，好像要躲着谁似的，然后张开胳膊，紧紧地伏在他膝上，全身散发出一股小鸟般纯真快乐的气息。

在墓地上的那个冬日里，尼基金觉得自己疯了：他感到，或是他的想象，儿子的那张落了雪花的冰凉的小嘴似乎无力而微弱地动了一动，以回答他最后的吻别。那小嘴唇上发出的隆冬寒气，使他五内如焚，抱恨终生。

他不能留在莫斯科，留在那变得冷冷清清的、一下子显得太大的住宅里。因为那里还留着伊戈尔的气息，响着他那活生生的脚步声、尖叫声和叫喊声，那里的小床上，还放着他收集的玩具。他离开城市，一个人在别墅里，在没有电话的空空落落的房子里，完全是一个人，一直工作到发呆、失眠并产生幻觉的地步；入夜，他生起炉子，整整几个小时望着炉火，听着旧橱里老鼠小心翼翼的啮啃声，听到花园里在严寒中冻僵了的树木的簌簌声就会震颤。有一天深夜，万籁俱寂，他坐在笼罩着一片白色灯光的桌旁。突然，他听到工作室玻璃窗上轻轻的、乞怜似的敲叩声，不禁吓得浑身发冷，无力挺身站起来去拉开窗帘。他怀着惊恐的预感（谁能敲二楼的窗子呢？）想到这是某种厄运的警告，想到也许他妻子此刻发生了什么不幸。他发僵了，打着冷颤，支着两条不听使唤的腿从桌旁站起来，一面设想着，一面又怕看到窗外可怕的无法摆脱的命运的先兆，勉强把窗帘拉开。但是外面阒无一人。寒夜，村镇屋顶上的暗空中现出一片黑压压的枞树顶。满天星斗在广漠无垠的空中闪烁着，一颗很大的、如初恋那样美好的淡蓝的星星在一个地方——被雪堆阻塞的林间通道上空，柔和地闪烁着、跳动着、飘游着。

他把额头贴着结了冰的玻璃窗，寻思着，伊戈尔离开了这个世界，就此不能看见，不能知道，不能感到这样的夜空了，而在这个世界上却有着一切：生命、少年、青年，对爱情的期待，对消逝的岁月的惋惜。可也正是在这世界里，他的儿子不可思议地死去了，天地无情，儿子既不能看见这天空，也不能看见这颗浮动

着的、遥远的、迷人的、明亮的星星了。

黎明时，在静谧的严寒中，他踏着村里吱吱作响的积雪，跑到车站，叫醒了摸不着头脑的值班员，奔向电话，拨了莫斯科住宅的电话号码。当话筒里响起妻子充满惊恐和睡意的声音，问他出了什么事，他气喘吁吁地低声答道：“我想听见你的声音。”然后，在站台上整整站了一个小时，抽着烟，平息着剧烈的心跳。

这种轻微的精神失常，一直延续到秋天。

“您说，迪茨曼先生，您主张知识分子之间的和平相处。您这个口号包含什么意义？”

“不是口号，而是信仰，尼基金先生。我对于口号早就失望了。您想涉及政治吗？”

“现在——不。我们尽可能不谈。”

“如果他们联合起来，”始终保持沉默的韦伯先生用麦秆拌动着鸡尾酒里的一片柠檬，轻声笑道，“那么就会形成一个很大很大的清谈馆，而且谈的尽是胡说八道。每天会想出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来，会想出什么装在衣兜里的革命。而我不是智力者，我是个出版商，我将干什么呢？我仍将是现实主义者。不吗，不吗？我仍将像过去那样出书，播放电视节目，您说不是吗？晚上，所有的德国人都在家里看到我的东西，而不会听您那莫名其妙的胡诌。不吗，不吗？侦探片啦，短节目啦，好广告啦，——对于德国人来说，要比智力者摸棱两可的空话有用得多。”

“现在可以看出，您是资本家，”萨姆索诺夫说，并且开着玩笑：“甚至从外表看，您也像是大资本家的代表。”

韦伯先生舒适地躺在壁炉旁的安乐椅里。他肥胖，脸红红的，头秃得厉害。他很少喝酒，像是迷迷糊糊地用麦秆吸一点柠檬鸡尾酒。听了萨姆索诺夫的评价，他咂巴了几下嘴，一双不大

的聪明的小眼睛变得敏锐专注起来。

“从外表上来看,我的样子像您,萨姆索诺夫先生,”他接过玩笑,用麦秆从容地在空中画出萨姆索诺夫的轮廓。“像虽像,但是按照你们的法律,您没有权利办出版社和拥有电视股票。不吗,不吗?”他拖长了语调,话说得含糊不清,但是这些疑问的“不吗,不吗?”说得很快,像说行话,因而冲淡了他这些话的严肃性,而且具有一种平和的调子。“根据你们的……报纸上的概念,根据报上的漫画来判断,”韦伯先生那双浮肿的、可笑的眼睛快活地转动着,继续说,“资本家是怎样的人?一个大腹便便的先生,穿着坎肩,坐在装着美元的袋子上,两手还掐着一个贫苦饥饿的工人的脖子,龇牙咧嘴的。不是吗,不是吗?”

“有这样的画,韦伯先生,”萨姆索诺夫表示同意,把话头引向自己。“不这样描绘,请问又怎样来描绘资本家呢?难道这不符合实际吗?”

“在这件事上您大可不必和我争论,”韦伯十分温和地反驳说。“我早就开始搜集世界各国报纸上刊登的资本家的漫画:我应该知道在别人心目中我的形象。你们共产党报纸上的漫画——应该看作这是对我所属的这个阶级的政治态度……而我很有兴趣了解这一点。洛塔!”他用麦秆向桌上的酒瓶挥了一下,温柔地眯着眼望着自己年轻的妻子。“什么,什么,我会算,你在每杯威士忌里放两块冰。不会影响你的嗓子吗?不是吗,不是吗?”

“你何必要知道,鄙视金钱的人对你的钱财有什么看法呢,”洛塔·蒂特尔用女低音说。“你的癖好能否给你带来愉快,实在令人怀疑。”

“不论是我们的还是他们的政治漫画,都是旨在对群众进行可怜而粗暴的宣传!”迪茨曼先生插进来说,同时把一包香烟凑

近鼻子，用劲吸着烟草的味儿。“我不想现在去仔细探讨政治这个破玩意儿，它只会叫你头痛。不是这样吗，尼基金先生？”

“是这样，又不完全是这样。现代人怎么能不问政治呢？”

“可是，尼基金先生！……”

“告诉你们，先生们，关于政治是没有什么‘可是’的。”洛塔·蒂特尔坚决地、像男人似地来参加谈话。她那长着扇子般的睫毛和细眉、经过美容后很漂亮的略微嫌长的脸涨得绯红。“告诉你们，我可亲身感受过这政治！而且是一次不愉快的感受。不久前，我应邀去波兰演出，我唱了德国歌，还唱了几首古典名歌和世界流行歌曲，大厅里听众呼唤着点我演唱……我从来没有像在华沙那样受欢迎！我简直爱上了波兰人！后来我犯了一个极其愚蠢的错误。我喜欢唱铁木耳那支歌，这在我们西方是非常流行的歌。这个可怕的东方征服者，他又残酷又强悍，他占领了许多城市之后，还想占有女俘虏。他像野兽那样向她们扑去——啃——啃——啃！”她把装了薄荷烟的琥珀烟嘴放到烟灰缸上，弯着细长的手指，描绘铁木耳怎样兽性大发地向一个女俘虏扑去，并继续说，“唱完这支流行歌曲的尾声后我用凝注的目光望着大厅问：‘你们中间有没有铁木耳？’开始大厅里一片静寂，谁也没有向我鼓掌。一分钟后，才有人出于礼貌拍了几下。就这样，我得罪了那些可爱的波兰人……”

“您要到东方去的时候，迷人的洛塔，应该仔细挑选节目。”迪茨曼没有把那包香烟从胀鼓鼓的鼻孔旁拿开，讽刺地指出，“东方并非总能领会西方幽默的含义，我们之间是有差别的。”

“当然，迪茨曼先生，”萨姆索诺夫挖苦地说，“东方至今还忙于应付妨碍电车交通的白熊问题和买双毡靴上剧院看戏的问题呢。”

“喔，喔！”迪茨曼活跃起来，把香烟丢到桌上，举起双手，喊

道：“我投降，东方进攻了！那么请回答我，俄国先生，为什么你们的士兵进入德国时要强奸德国妇女呢？”

“强奸德国妇女？您能肯定吗？”尼基金感到惊讶。“是经常发生的啰？”

“我知道的，尼基金先生，而且还不止一起。”

“但是，也可能，在某种场合下，是德国妇女自己想要体验一下这个东方的铁木耳。可以这样认为吗？”尼基金回答着，同时又不失社交场合礼貌的分寸。“绝对的肯定总是冒险的，迪茨曼先生。”

顿时，所有的人都兴致勃勃警觉地转向他，好像他的回答打破了什么禁忌似的：赫伯特太太低垂双目，祈祷似地摸了摸胸前的胸饰，抚摩了一下，扯着它把细链条拉紧；韦伯先生噗哧一笑；迪茨曼嘲笑的目光变得尖锐了，准备进行反驳，不料，洛塔·蒂特尔竟像农民那样两手叉腰，把金赤色的头发往肩上一甩，大声肯定地说：

“尼基金先生说得对！如果女人不愿意的话，是不可能强奸她的！而我想讲的是另一回事——是关于波兰人，先生们！我爱上了聪明、敏感和富有音乐感的波兰人。他们好客，有教养，从来不在我面前谈战争，他们闭口不谈，不愿意让我想起战争。有一次，我说想去看看奥斯威辛^①，他们回答说，最好别去；对我，一个德国女人来说，这是不愉快的。当时我坚持要去并且真的去了，亲眼看见了真正的地狱。在那里可以使人发疯，只要想象一下就够了！一群极其愚蠢的暴虐狂者——那些德国军人，就是这样一批人！我真想去抓我们党卫队的脸！我要对你说的

① 波兰城市。一九三九年希特勒法西斯占领波兰时，在此处建立杀人集中营，屠杀了四百多万人。

就是：现在谈论什么无辜可怜的德国女人被强奸是可笑的，我们完全应该闭嘴！”

“战争是战争，亲爱的洛塔，”迪茨曼冷笑说，“许多德国人作为一种类型来说，他的本性并不是暴虐狂，而是表现为绝对顺从的受虐主义者。战争——奉命行事。您对那段时期不太了解，迷人的洛塔！”

“战争——是臭狗屎，毫不掺杂任何知识分子哲学的臭狗屎。”洛塔·蒂特尔吵架似地打断了他的话，用在烟嘴上冒烟的香烟指着埋在安乐椅里的韦伯先生，他的有点浮肿的小眼睛正含着温柔宽容的神情望着她，对她任何孩子般的淘气都喜欢。“我的这位资本家不愿意把我在奥斯威辛拍的录像拿来放电视。他说，没有人会看它。自己却把臭狗屎一样的美国侦探片大量塞进电视节目，这种东西是只配丢到下水道去的影视垃圾！看起来看去都是男人的尖屁股穿着磨破的斜纹裤不停地摇摆着，忽地，噼！啪！好啊，好啊！^①”洛塔·蒂特尔撇着嘴，用压低了的嗓音说着“好啊，好啊”，又弹着舌头发出很快的射击声，用烟嘴瞄准桌上的高脚酒杯。“这只有牛一样的笨脑袋才需要，近年来这种人变得太多了！谁也不愿意认真地思考问题！所有的人，白天黑夜想的就冰箱和汽车——都想像在美国那样搞钱！”

“洛塔，”韦伯先生柔和地说。看来，他已习惯于妻子那种不受约束的粗鲁。他把自己饱经世故的眼睛转向鸡尾酒的酒杯，用麦秆搅动着柠檬片。“你首先是一个迷人的演员，而不是联邦议院中社会民主党的议员，……不是吗，不是吗？现在谁也不想回到过去，使自己烦躁，加重罪责。不是吗，不是吗？”

洛塔·蒂特尔作了一个坚决反对的手势，又甩了一下红

^① 此处原为英语。

头发。

“因为政治也是臭狗屎，卡尔！所有的人都像发疯一样地搞钱，德意志很快就要变成美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州了。我们很快就会像一群闹圈的肥猪，看不见天堂了！你在集中营里受过纳粹分子的折磨，卡尔，而你却什么也不愿意回忆！只是钱！钱！钱！……”

韦伯先生依然温情地看了看妻子，搔了下秃顶，用麦秆吸了点鸡尾酒，他的口吻是要委婉地使人相信，真理是不可靠和不可理解的：

“四五年解放集中营时，我们中间谁也没有想到钱，洛塔，那时我就是这样的人……”韦伯翘起小指头，“不是吗，不是吗？先生们，你们不可能设想我是那样的人。我那时是瘦弱无力的，瘦弱得几乎不能走路……但是已经自由了，我含着热泪望着太阳，望着青草——性命保住了，可诅咒的战争结束了，纳粹分子已经没有了，当时我很幸福，先生们！……”

“解放您的是俄国人还是美国人？”萨姆索诺夫带着怀疑的神情，颇感兴趣地问。

“解放我们的是美国士兵。他们乘着坦克来，冲毁了大门。我们三个人走出集中营来到大路上，去美国人的医院。和我一起的有一个英国人，是个被击落的飞行员，一个贵族出身的年轻人，牛津大学毕业生。还有一个十二岁的男孩，他父亲死在集中营里。在自由的那一天，我们都没有力气。我们在路上勉强拖着步子，对着春天微笑，像发了狂的幸运儿。水沟里到处堆着被炸毁的汽车。我还记得，在一辆‘奥别尔－布里茨’载重汽车里，有一个被炸毁的存着钱的保险箱，几百万，整整几百万马克，一束一束地散在柏油马路上。什么？不是吗，不是吗？马克飞了满地，堆在水沟里，粘在鞋底上，简直就像招贴画一样，谁也不去

注意它。性命，先生们，由于生还后的陶醉的感觉——别的就没什么了！只有我们可爱的男孩，像搜集明信片那样搜集了几张钞票。不是吗，不是吗？后来我们到了美国人的医院，就倒在地上，像被打死的人一般沉睡了。当我醒来的时候，看见那男孩在旁边躺着，正兴致勃勃地看着钞票……”

“怎么？旁边躺着个男孩！”迪茨曼连忙喊了起来，把一条腿架到另一条腿上，晃动着脚上的尖头皮鞋，从小裤腿下可以看见活动的踝骨，穿着一双红色丝光袜子。“有意思，韦伯先生！是温柔的十二岁的男孩吗？……”

“你们这些知识分子，”韦伯先生宽容地打断了他的话，“到处寻求艳遇。”

“我只是抓住了您的话，韦伯先生，”迪茨曼笑起来，同时像阴谋家似地用醉人的明亮的眼睛扫了尼基金和萨姆索诺夫一眼。“那男孩叫什么名字？”

“我想说的是，”韦伯先生继续说，“三天之后出了布告：旧德国马克照常流通。但就在那时，我们也不太惋惜没有把钱塞满口袋……如果现在我走运能在路边发现一只打坏了的装着钱的保险箱，我会怎么办呢？我会打电话给警察局，也许，会由于自己下不了决心而发疯，躺在精神病院里。不是吗，不是吗？”

他那血色很好的红腮帮有点狡黠地鼓了起来。他吃吃地笑着。这时，尼基金失望地说：

“多么好的情节被您糟蹋了，韦伯先生！”

“我把它作为原始材料卖给您，”韦伯先生得意地回答说，“把我的情节写进小说，我给您出版，印数很多，卖得的钱百分之五归我……顺便说一下，您可以用莫斯科的黑鱼子来支付。不是吗，不是吗？”

“合同！我开支票！但有个条件，小说里要把和男孩的艳遇

写进去！”迪茨曼耍无赖似地喊着，并从上衣里面的口袋里掏出支票簿，晃了晃。“我认为，凭您的才能，尼基金先生，您一定能把这段言情故事写得引人入胜！”

“他们的玩笑中有明显的主张，”萨姆索诺夫在桌底下碰了下尼基金的腿，“明白吗？”

“谢谢您，”尼基金说，“收起支票簿吧，要不然您就是在用亨利·米勒的桂冠来诱惑我。”

“这个情节用一个马克买妥，先生们！允许我当尼基金先生的代理人吗？”

赫伯特太太咔嚓一声打开她那漆一般发亮的小手提包，拿出一个新的金属马克，当着大家的面晃了一晃，然后将它放进韦伯先生的口袋里。后者发出啧啧声，眨着眼，用手拍了拍口袋，说：

“这个情节卖得太便宜了。不是吗，不是吗？”

“谢谢您，赫伯特太太，我准备聘请您当秘书，因为我深信，这样我就不会破产了。”尼基金说。

她用微笑回答了这一番好听的空话，而他则竭力想要获得一个确切的感觉，再次像在苦恼地回忆那老在头脑里打转而又忘却了的姓名那样思索着，她那种使他吃惊的经久专注的、询问的目光，那经常被他看到的对他的注意，和这种近乎是卖弄风情的微笑，以前似乎曾经有过类似的情况：也是这样在某个时刻，壁炉烧得暖烘烘的，在落地式台灯的伞形灯罩下，一缕香烟雾霭缭绕。他也是这样坐在一个女人对面，也是对她讲一些和现在一样的客套话，而她对他答以暧昧的微笑，这微笑似乎曾在过去另一种淡忘了的生活圈子里看见过。他拼命回忆，仍旧不能确切地回忆起来，因为这不是思想，而是思想的影子，不是现实，而是现实的一点淡淡的影子。

“我看,她是在为什么事不安,她在为我担心着什么事。”尼基金想,“而且她用眼神、微笑和她用来很快地结束这场谈话的这个马克把她的情绪传达给我。”

“多么奇怪,先生们,你们竟嘲笑与战争相联系的时代,”萨姆索诺夫不满地说,胖胖的双手交叉放在胸前。“什么钱啦,男孩啦,言情故事啦,归根到底,有一些和德国过去的悲剧有关的严肃的概念。我指的是你们人民和祖国的命运以及对未来的应有责任。几百万德国人是为什么死的?”

迪茨曼先生在安乐椅里迅速直起身子,向上一跳,十指张开在桌子上方拍了一下。

“什么?‘祖国’、‘人民’的概念?‘责任’?它们早就用得滥了!希特勒利用这些概念为纳粹的目的服务,贬低了它们的意义!‘祖国’和‘义务’等旧的概念现在又被一小撮复仇主义者所利用!如果您还在谈战前的种种美德,那您就太不了解现代的西方人了。西方人现在没有像你们所理解的祖国!他们有护照,有形式上的国籍,只有这个将他们和国家联结在一起!在德国护照上写着:各国通用!各国通用啊,萨姆索诺夫先生!”

“这么说,我弄明白了:这是最彻底的世界主义吧?当然,这样,自由的知识界会在抽象的世界里生活得舒坦些,可以这样说!”

“怎么说?世界主义?抽象地?哈——哈!您说得真妙!”迪茨曼喊起来,“世界主义——很美,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与别人无关。但是……西方的自由既包含着冷淡,又包含相互疏远——这是现代世界的奇谈怪论!我不想美化什么,萨姆索诺夫先生!西方的知识分子是孤独的,非常孤独。”

“就是说,在纳粹主义的独裁统治下倒没有……这种可诅咒的孤独和人与人之间的疏远,迪茨曼先生,是吗?”

“像现在这种程度过去是没有的。有的是另一种东西——恐惧。现在不会把人关集中营，不会杀人，不会迫害人了……但同时，人与人之间疏远的这种社会病，比起可诅咒的人类恐惧感来，却是半斤八两！是的，就是这样！”

“那么请问，这是怎么一回事？”萨姆索诺夫固执地说，他顶住迪茨曼急剧的冲击，胸前的手交叉得更紧。“这么说来，第三帝国及其关于祖国和‘德意志，德意志高于一切’^①的概念并不坏喽？”

“您想怀疑我是希特勒独裁制度的忠实信徒吗？”

“我并不想。但我知道，纳粹机构中有百分之十的知识分子，迪茨曼先生，在过去不久的历史上，往往正是德意志的知识界起着精神警察的作用。我不了解您，我说的是双手沾满鲜血的那种知识分子，请原谅我的直率！”

“喔，萨姆索诺夫先生！……”赫伯特太太带着温和的责备口吻说，望了一眼迪茨曼消瘦的脸，低下头去。

“他压住了对方的第一批火力点，现在要不停地开始填平堑壕了。我可了解这个普拉东。”尼基金想着，对萨姆索诺夫急躁地越出争论的禁界，说话过分尖锐而感到烦恼。“但为什么我老是觉得，她不想使争论尖锐化，并且总像是有什么事使她激动不安似的。”

“您是因为我们父辈犯下的罪责而指责我们吗？”迪茨曼先生问，很显然，他没有料到萨姆索诺夫会这样忿懑和执拗。他摆出一副拒绝理解的样子，痛苦地把眼睛转向天花板。“您确信，我们父辈手上的鲜血也玷污了我们的双手吗？”

“说呀，说呀，萨姆索诺夫先生！”洛塔·蒂特尔急不可耐地扬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起扇形睫毛，她因为喝了威士忌，因为这个笨拙的俄国人粗鲁地施加压力而感到兴奋，她身子灵活地半倚半躺在安乐椅里。这样，她那纤细的、裹在绷紧的银色衣料的身体就更显示出她极其强烈的好奇心。这使尼基金想到，她还没有被生活和歌手的荣誉弄得过分疲劳，她大概喜欢看拳击和运动比赛，如果酒馆里偶然发生打架，她甚至会带着狂热的满足用拳头敲着桌子，发出尖叫声和笑声，为双方助威。但这种事，赫伯特太太大概是从来不会做的。她这人是如许地温文尔雅，谦恭沉着。

“你的声明和提的问题太多了，普拉东，”尼基金说，“我担心，他们弄不清楚事情的本质。”

一片寂静。壁炉里不时发出均匀的哔剥声，使时间显得特别长，韦伯先生发出了既不像嗯也不像哼的含糊不清的声音。然后，在他那浮肿的眼睑的缝隙中，那双睡意惺忪的眼眸狡黠地闪映出某种思想。他相当精神地说：

“萨姆索诺夫先生，我不把自己算作知识界的人，我是个出版商，从您的观点来看，我是资本家。但是，喂……允许我提个问题吗？在阵亡将士公墓或者某一个人的墓前，我们的心灵该有何种感受？在这里，任何言语和怜悯都是不够的。不是吗，不是吗？”

“我说的是责任感，”萨姆索诺夫阴沉地反驳说，“没有对过去发生事情的责任感，那么现在的社会便是虚伪的天堂。”

“喂……话的本身是有局限的——我们的心还没有开窍嘛。为了使言辞达意，必须有讽刺。您，萨姆索诺夫先生，太相信直率的话和感情了。在阵亡将士公墓里，既葬有英雄，也葬有非常软弱的人，——后者经不住党卫队的拷刑，成为叛徒，并出卖了真正的英雄，——这难道不可能吗？而您却把他当做英雄来同情。不是吗，不是吗？”

“我同情叛徒？为他们流泪？绝不会！我们对人和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应该是这样区分的：看他和谁在一起——和刽子手站在一边，还是反对刽子手。”

“喂……您没有理解我的意思，萨姆索诺夫先生，没有理解。我说的是现代人。”

“我理解。我说的也是现代人。比如拿您来说，”萨姆索诺夫的眼睛透过眼镜片，以令人难受的执拗盯着迪茨曼先生。“您曾在希特勒的武装部队里服过役、打过仗吗？”

迪茨曼先生架起来的那条腿不安地动弹起来，尖瘦的皮鞋也随着他克制的嗓音有节奏地晃动着。

“是的，我当然服过役。我不能例外。”

“在什么地方？我倒想知道。”

“在柏林。我在人民冲锋队打过仗。战斗结束时，我还是个孩子，萨姆索诺夫先生，当时正是你们部队兵临城下的时候。这是在三、四月间。那时你们已经向德国腹地进军，我们则进行了防卫。”

“那么您打死多少俄国人？”萨姆索诺夫问着，鼻子里发出喘息声，他那颧骨突出的脸拉长了，变得铁青。“一个？两个？多少个？”

在寂静中，劈柴在炉膛里哗剥地燃烧着，爆出火星。在这沉默中，大家一下子都用同样担心的和不自然的同情的目光望着迪茨曼先生。一股紧张的冷风，像寒流袭过韦伯先生合上的眼皮，袭过洛塔·蒂特尔扬起的睫毛和赫伯特太太苍白的脸——因此，尼基金觉得，他是很难以把有着暖烘烘的壁炉、地毯和落地式台灯的汉堡客厅里那种值得赞扬的舒适宁静和四分之一世纪前他们之间发生的可怕的流血的过去相对照的。

“我不知道我打死了什么人，我没有看见，”迪茨曼先生抑制

着激动,声音忽高忽低地说。“我用火箭炮弹击中过一辆你们称做‘T-34’的坦克。当你们的部队向国会大厦挺进时,我从施普累河岸的地下室里射击,坦克着了火,我就看不到什么了。你们的第二辆坦克……它叫……‘伊-爱斯’……是约瑟夫·斯大林,是吗?第二辆坦克发现了我们,就对着地下室的窗子射击,我们很快撤退了。”

迪茨曼先生按一下那包香烟,闻了一下,丢在桌上,用嘲笑的口吻在萨姆索诺夫发问之前抢先说:

“那么您打死了多少德国人呢,萨姆索诺夫先生?”

萨姆索诺夫没好气地回答:

“我在集团军参谋部当翻译,因此没有开过枪……您用火箭炮弹击毁了一辆坦克,如果您的话可信的话,那就是打死了四个苏联坦克兵。为了什么呢?您是自觉地或是不自觉地捍卫了纳粹主义,是这样吗?”

“萨姆索诺夫先生!”迪茨曼喊了起来,身子向安乐椅上一仰,举起痉挛的手摇着,装出请求宽恕的样子。“我那时是个孩子,没经验的傻小子,上当受骗。我只是一只鼓,任人敲出各种各样的爱国主义的进行曲。再说……要是我们开始互相责备的话,我们就永远也找不到全人类的真理!我们也丧失了百分之十以上的居民啊!但我不想问,萨姆索诺夫先生,您打死了多少德国人,尼基金先生又打死了多少。据我所知,他不在参谋部,他是炮兵军官,也就是说,不是天使的化身,也不是甘地主义者!是这样吗,尼基金先生?”

“您从哪儿知道我这么多的情况?至于我的性格那更不必提了,”尼基金平静地带着玩笑的口吻,饶有兴趣地问。“我想,我们是初次见面吧。”

“难道我不会在战争中见过您吗?”迪茨曼笑起来,他那女性

般高高的前额因为出汗而发亮。“比如，在柏林？可能吗？会有这样的事吗？”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尼基金半严肃地回答。“我不喜欢消遣读物，更不喜欢幻想小说，我是现实主义者，迪茨曼先生。”

“即使在现实中，有许多事情也都是可能发生的，而且多得连现实主义者本身也不怀疑了。两支几百万兵士的大军在柏林对峙，在那里我可能见过您……”迪茨曼鼓着细小的鼻孔，拿起酒杯，好像要喝几口酒来压下那令人扫兴的下文。“但是，我，”他用餐巾擦了下嘴唇，醉醺醺地拖长声音说，“但是，如果我知道，在我面前的是一个俄国知识分子，比如说，是作家尼基金，那我是不不会向他开枪的……”

“会开枪的，”尼基金有把握地说，“而且，要是那时我碰上了您的话，我也是会开枪的。这又是现实主义。这是毫无办法的。”

“不，您不会开枪打死我的，正是您……”迪茨曼舌头发硬，声音很低地说，“您那时还是个孩子，看我也是个孩子，就不会打死我……也不会打死某个德国姑娘，这我能感觉到，我能知道……不，您是不会开枪的……萨姆索诺夫先生要比您坚决些：叭的一枪——就又少了一个德国人，一个可恨的德国人……”

“这是卡夫卡风格的芦苇沙沙作响或者马德里院子里的秘密。”萨姆索诺夫用俄语说，又在桌底下轻轻碰了尼基金一下，意思是说，这些醉话是什么意思，你听懂了没有？

这时，尼基金听到赫伯特太太吞吞吐吐的、陌生的恳求的语音：

“弗利德里赫，请别喝了，我恳求您。既然您戒了烟，那么为了爱护自己的心脏把酒也戒了吧。我请求您……”

赫伯特太太坐着，没有抬起眼睛，鼻翼上由于苦恼蹙起的一

条细线似的皱纹，将她那两条匀称的、与几绺白发相比显得很黑的眉毛分开。这番迫不得已说出来的关于戒酒的意见，她对迪茨曼先生直呼其名并能责备他的权利，不知怎么都使尼基金认为，这是至亲好友或夫妻之间在人们面前常会发生的短暂的嗔怪，不一会，便会由于有教养的女主人表面的礼貌而平息下来，因为她已经倦于保护客人免受她所亲近的人酒后的纠缠。“他是她的什么人？情人还是亲戚？”尼基金暗想，“我不记得，她是否介绍过这是她的丈夫。”他感到，应该设法缓和，缓和一下在自己、迪茨曼、赫伯特太太和萨姆索诺夫之间讨厌的尴尬局面。他想开个玩笑，讲讲下意识怎样荒谬地捉弄人，但是迪茨曼抢了先。

迪茨曼很有力地拍了一下椅子扶手，突然异常迅速地站了起来，扣好上衣，笑了一下，马上又收敛笑意，姜黄色的削瘦的脸上目光炯炯。他十分愉快地说：

“是的，爱玛，您是聪明人。谢谢您。我可不想再犯心脏病了，这玩意儿还有用哩。”他用手指在左胸敲了一下，“再见，先生们，我们还将不止一次见面！我病后确实很虚弱，我要睡觉去了！”

他向大家鞠了个躬，又高又挺的个子，微微摇晃着长腿，在厚地毯上向门口走去。

“弗利德里赫！”赫伯特太太一面站起来一面说，“在这种情况下您开车有困难！对不起，先生们，请稍等片刻……”

她赶上了他。在门前，迪茨曼像原先那样异常坚决地转过身，耸耸肩，把手指弹得很响，手一转，好像打开汽车的点火开关似的，笑着回答她：

“我喝醉的时候，开起车来就像参加汽车大奖赛，请您相信！比平时开得还好！”

他们走了出去，门紧紧地关上了。客厅里一片寂静，可以听见炉膛里劈柴的爆裂声和哔剥声。客人们非常客气地对望了一下，似乎对女主人的突然离开和中断了的谈话感到有点扫兴。韦伯先生整个儿埋在安乐椅里，马甲紧裹着的圆圆的大肚皮一起一落，他带着深思的神情在背心上磨着指甲，眼皮浮肿的半睁的眼睛，在落地式台灯的灯光下望着上面的亮光。然后，他带着啾啾的声音，咕嘟咕嘟地用麦秆吸着酒杯里剩下的鸡尾酒，从容地说：

“迪茨曼先生是个出色的总编，天才的评论家，是个很有才智的人……”

“你就雇佣他，让他在你的出版社里，像黑人似的白天黑夜地干。他一个月前发过心脏病呐！”洛塔·蒂特尔摆出一副进攻的姿态昂起了下巴，补充说，“不是这样吗？”

“洛塔，洛塔，洛塔……”韦伯先生和颜悦色地反驳说，“你又像社会民主党人那样发表声明了，一点不像一个演员。不是吗，不是吗？迪茨曼先生并不是因为我付给他大量的钱而心脏病发作的，而是由于生活方面没有节制，这是现在知识界所特有的情形。不是吗，不是吗？”

“我不在，你们没有感到寂寞吧，先生们？”

赫伯特太太走了进来，好客的女主人那种令人愉快的微笑，甚至急促的步态都像是对自己的离席表示歉意。但韦伯先生以他臃肿的躯体说来是相当灵活地站了起来，仍然像在家里那样安逸地闪露出一口好牙，秃顶发亮。跟着他，洛塔·蒂特尔像一根柔韧的细枝挺直身子，轻巧地跳了起来，从地板上抓起手提包，像银鳞般的连衣裙窸窣作声。两人先后向赫伯特太太告别，为度过一个美好的晚上而致谢。

她微笑着点头，但是并没像俄国家庭通常那样挽留他们，他

们放开她的手，又来同紧跟着洛塔·蒂特尔站起来的尼基金和萨姆索诺夫告别。

“我们也该告辞了，赫伯特太太，”尼基金说，“谢谢您……”

“喔，不，不，不！等一会儿，尼基金先生！”她突然打断他的话，带有窘态地望着他的眼睛。“我想留您再坐几分钟。萨姆索诺夫先生要是不反对的话，韦伯先生可以送他回旅馆，过半小时我送您回去。我想和您谈一下将面临的辩论会，这决不会多占您的时间。”

“为什么她要当着大家的面把我同萨姆索诺夫分开？这后面有什么名堂？”尼基金想。由于极度的怀疑和某种内心的憋闷，他感到情绪恶劣，很不舒畅，因此打算拒绝，半真半假地、委婉地坚持说自己疲倦了，头痛，脑袋里装满了各种印象。但是，他说出来的却是连自己也感到厌恶的表示同意的口吻：

“好吧，”他又对着萨姆索诺夫异常平静地添了一句，“我一回去就到你那儿，别睡觉，等着我。”

“见鬼……没请你在这里过夜吧？”萨姆索诺夫生气地斜睨了赫伯特太太一眼，用俄语回答着，好像说的是讨厌的天气。他涨红着脸，背着手，在韦伯先生面前晃动了几下身子。“就是说，我得麻烦您啰？您送我去吗？”

“当然，当然！”洛塔·蒂特尔甩着波浪形的红头发，散发出薰衣草的清香味，再一次像男子那样紧握了尼基金的手，低语说：“尼基金先生，只要回忆起战争，我们德国人就总有什么令人讨厌的地方。啊，这是一个特别的民族！”

他们坐在藏书室里的皮沙发上。

“我请您讲得慢一点，不然，我就不能完全听懂。”

“尼基金先生，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每当我看见这本照相

簿，回忆起我们曾经是多么愚蠢和不知道害怕的孩子的时候，我就感到可怕。我想给您看一样东西。”

“我不明白，您指的是什么。”

“我指的是战争。”

她把一本不知是丝绒还是深色麂皮封面的照相册放在膝盖上，迟疑地打开了金属小锁，犹豫地翻动着厚厚的照相册页。这些翻过去的册页，向尼基金袭来一股略带苦味的甜香，以及年久而发黄发霉的纸味，——所有的家庭照相册一定都有这股气味。她在照片中寻找着什么，似乎一下子又找不着，他从她的手后面看见了一些闪耀着陈旧光泽的、上了年纪的陌生男人的脸，这些男人都非常严峻，留着凯撒式的胡子，梳着分头，穿着紧身制服，下巴硬僵僵地支在竖起的衣领上。这些人按照一般家庭的样子，和穿着白色连衣裙、面容白皙的妻子并肩坐着，周围是他们的淡黄鬈发的孩子们。后来又看到，在炎热的沙漠的闪光下，坦克旁站着一个高傲的年轻军官，船形帽上披着伪装的网，一枚崭新的铁十字勋章在黑色的坦克兵上衣口袋边上闪闪发光。于是，尼基金问：

“这个军官是谁，赫伯特太太？”

“是我父亲，尼基金先生。他在托卜鲁克城下牺牲了。在非洲军团。”

“就是说，他是在隆美尔手下服役？”尼基金说，“托卜鲁克战役——这是在四二年。那么您母亲……？但愿她还活着，赫伯特太太。”他出于礼貌问，同时又不理解，为什么她要在他面前翻阅这本家庭照相册，——这本和她的亲属有关，或是尼基金不知为什么觉得还和令人不快的、有点神经质的、正在发酒疯的迪茨曼先生有关的照相册。在迪茨曼的有关战争的模糊解释后，在他抛出暗示他们曾经见过或者可能见过的饱含毒汁的种子以

后，这在尼基金心里唤起了反感和怀疑。

这时，尼基金由于意识到自己这种意料不到的愚蠢的处境不禁皱起眉头：大家都散了，萨姆索诺夫也回旅馆去了，对于他贸然同意留下来深为不满，而他，没有任何充分的理由反对挽留他的邀请，留在这里，现在不得不对赫伯特太太的亲人，对别人照相册里的陌生人的照片出于礼节而表示感兴趣。他想到自己这种危险的软弱无能，这种容易妥协的、不坚定的性格，感到特别恼怒。

“我母亲在三六年去世，尼基金先生，”赫伯特太太说，“但我并不是想给您看照相册里我父母的照片……您没疲倦吧，尼基金先生？我不该把您留下吧？”

“不，不，”他回答着，一面诅咒着自己这种不必要的客气，他生自己的气，皱了皱眉头，擦了下额头，不自然地对她说，“请原谅，头痛……一会儿就好。”

“给您拿片头痛药片吗？”

“谢谢。一会儿就会好的。”

她用含情脉脉的发亮的眼睛负疚地望了望他，两手放在照相册上，可以感到，她有点踌躇和忸怩不安。她沉默着，胸饰随着呼吸在胸口起伏。尼基金突然预感到她在准备要说什么，暗忖她是打算对他讲一件他可能不知道，意想不到，甚至无法猜测的新奇的、严肃的、重要的事情。但看来她也正在踌躇中。于是，他用不自然的平静的声调说：

“我在听您说，赫伯特太太，好像您有什么话想告诉我，那就请说吧……”

“是的，我要对您说的，尼基金先生。”

她从小桌上拿了一支香烟；他殷勤地给她点了火，她以羞怯含笑的目光向他表示谢意，然后，仍然那样羞怯地把膝盖上的照

相册挪过一点，低声问：

“尼基金先生，您还认得柯尼斯多夫的这座房子吗？您还有点记得吧？”

她眼睛里的笑意立刻消失了，双眸噙着晶莹的泪花，显露出专注的神情——她凝望着插在发黄的硬纸里的一张跟其他照片不一样大小的小照片，下面用工整的学生字迹的花体字写着：

柯尼斯多夫，威廉街七号，我们的家。

这张照片还是在战前拍的，时光在上面留下黯淡的灰色，但画面还是清晰的，可以清楚地看见一幢两层楼房，和德国城市中所有富裕的德国人的房屋相似。顶楼上的瓦片在烈日的照射下呈现红色。近处是松树，树干的一面受到晨光的照耀。屋前是一片修整过的翠绿的草地。草地中央有一辆倒在地上的自行车，旁边蹲着一个晒得黑黑的小姑娘，她穿着运动服，帽子底下露出短短的黄头发。小姑娘蹲在自行车的镀铬的把手上面，把手则从像夏天般茂盛的、令人喜欢的草里翘起两只金属的角……

“您认得这座房子吗，尼基金先生？”

赫伯特太太的指甲涂着淡紫色的指甲油，夹住香烟的两个手指指着房子给尼基金看，似乎无意地遮住了小姑娘的脸。尼基金为一种模糊而又强烈的不安所控制，仿佛正在拼命拨开层层忆念，突然闻到了暖洋洋的、充满酸涩的树脂芬芳的空气，看到沐浴着春天晌午的阳光的房屋的墙壁，窗户敞开着，里面是使人感到凉爽的幽暗，从屋子深处传出来留声机播放的音乐，也是在这样翠绿的草地上，中间横放着一辆闪着亮光的自行车，车上的车条被枪托弄坏了。

是的，在柏林附近的郊区小镇柯尼斯多夫，曾经有过和这座房屋相像的坚固而舒适的德国式房子。草地周围种着松树，只是苹果园后面一百五十公尺的地方埋伏着炮兵连的炮，射击方向对着湖岸上的公路。一辆“斯蒂倍克”汽车没有伪装，就停在松树斑驳的荫影下。是的，尼基金的一排人就在这样的房子里驻扎过，他们占据了四、五个房间。排里还有一架英国产的留声机和一套唱片，这还是在波兰，在华沙郊区树林里一所被炸毁的别墅里拿来的，它们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并且一直带到德国。

但那时也曾经有过某种可怕的、负疚的和高兴的事情，与之联在一起的还有那敞开的窗户里传来的留声机播放的乐曲，那青草味和马合烟的味儿，那阳光明媚的五月清晨，他意外地看到的一边浴着阳光的松树；也曾有过一个与他命运相联的幸福而又凄惨的故事。这事儿差一点毁了他，使他的一生转变为黑暗，使他由于疯狂的忿恨、爱情和怜惜而与一切隔断。

尼基金还记得战争结束和生活开始时的那种感受，记得自己对生活那种狂热的向往，青春的欢乐，还有那堵可怕的灰墙，在那些充满阳光、一片翠绿的宁静日子里在松树下这座坚固的房子里他被关的禁闭……

“这个小姑娘是谁？”尼基金喑哑地问，由于感到窒息和心跳，他微微挺身，让肺部能够吸进足够的空气。现在他是如此急不可待地想要看到这个小姑娘的脸，仿佛她的脸会向他说明许多事，提醒他，使他回忆起那永不复返的、美好而又可怕的、像在梦中浮现的往事。

“小姑娘吗？”她把遮住部分相片的手指移开，在相册的硬纸上战战兢兢地滑过去，低声说：“这是我，尼基金先生。”

“您？这是您？”

“照片上的我是十一岁。那年在捷克斯洛伐克打了胜仗，父

亲就给我买了自行车。母亲死后，他非常溺爱我。”

“您父亲那时已经是军人了吗？”

“是的……您看，尼基金先生，草地上坐着一个多么丑陋的小袋鼠——长长的手臂，尖瘦的肩膀，全身都是角，呸，可以戳伤人！……半大的孩子——是女孩子最糟糕的时候，举止像男孩……”

不，那是另一回事。不管是长长的手臂，尖削的肩膀，还是这个他从未见过的难看的小姑娘的像男孩那样挑衅的面孔，他都记不得。和被太阳照得暖烘烘的草地、松树以及草地上的自行车不可思议地联系起来的那件事是那样刺心，是那样瞬息即逝，就像很久以前的短促的震惊，就像由于那时完成了的一件极其重要的、然而被时间掩藏在记忆之中的大事而产生的痛苦的喜悦。尼基金细看着相册上的房子、草地和松树，他为自己迫切要慢慢辨认出来的痛苦心情感到惊异，同时，不知为什么他还企图使自己相信，这不完全是变幻无常的幻觉所唤醒的记忆中的那座房子，不完全是那个草地，不完全是那些松树。他虽然要使自己怀疑，但他已经知道，他是不可能弄错的，不能欺骗自己的记忆，不能否定它。

“您不记得这座房子吗，尼基金先生？”

“在德国我们不止一次住过这样的房子，”尼基金说，“很遗憾，不记得，不。”

他那样平静地回答了她，那样坚决地撒谎，再加上心跳，加上她那长久惊愕的沉默，以致他又一次感到喉咙口堵住和憋气。她的沉默使他在肉体上，在肩膀、在胸部、面部的皮肤都受到重压，就像在他作了背叛行为的瞬间那样，而这种背叛大概被她看作是一种答复，表现他对没有记住或不想回忆——他有权把一切都忘记——的迟钝和冷漠。因此她没显露出特别的表情，只

在…句话的末尾她把声音压得很低：

“是啊，是啊，尼基金先生，岁月如逝。但我的青春是在这座房子里度过的……”

她痉挛地深深吸了一口烟，吹掉照相本上的烟灰并开始弄灭香烟，使劲儿将它按在烟灰缸底，低垂着双目。而他装出很有礼貌地注意看着照相本册照片的样子，同时既惊讶又不相信记忆所暗示的事情，一边似乎是从五月早晨的明雾中出现的那个不太漂亮的、像男孩那样充满敌意而美好的女孩的脸，一张在微翘的鼻子周围布满青春纯洁的雀斑的脸；一边是赫伯特太太这张画着眉毛的清秀的成年人的脸，和从有着几绺整齐的银丝的高耸发髻后面露出的小巧的耳朵，她胸前的金胸饰，微微显露出青筋的苍白的太阳穴……在匆促的对比中，他在凭想象虚构出来的或是忘却了的爱玛和这位赫伯特太太之间，找不到丝毫相同之处，似乎是将儿时的梦境和真正的现实作毫无意义的比较。

“我们那时在柯尼斯多夫停留了多久？”尼基金一边想，一边从过去的深渊中激动地搜寻着那个春天的、遥远的、几乎不是现实的、一掠而过而又是确凿无疑的东西。“我们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几天，将近一个星期，那么，难道说赫伯特太太就是那个爱玛？难道是吗？她那时十八岁。而在我、麦热宁中士和炮兵连长格拉纳图罗夫之间发生的一切纠纷都是为了她吗？不可能！既然我们两人都有很大变化，她怎么会认出我呢？要是此刻有面镜子，有面镜子照照自己——我已经两鬓斑白，下眼睑满是皱纹了！……她怎么能认出我来呢？她是怎样认出来的呢？”

“尼基金先生……您忘记我了，过了这么多年……可是我还记得，那天夜间和早晨您怎样在纸上写着：‘再见，爱玛’。再——见……”

赫伯特太太这句压低了的、把最后一个词的音节拖长了的

话音，像一股热浪烧灼着他，使他感到灼闷，就像在那异常久远的炎热的战斗早晨，在太阳晒得发烫的顶楼屋顶下一样，——那时候在敞开的窗前，他和她坐在桌旁，他在一张暖烘烘的白纸上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写着几个俄文字，而在楼下屋旁的汽车已经开走，只剩下第四门炮的“斯蒂倍克”在草地上等着他，发动着马达在等着，从那里传来了士兵的喊声，他们快乐地、七嘴八舌地向他们喊着：“爱玛，再见！① 中尉同志，该走了！”

后来他怀着一种强烈的惜别的温情吻了她，拉着她，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几乎要哭，因为他知道他们从此不会见面了。而她，抬起泪痕纵横、由于忍住号啕大哭而变得很丑的、长着雀斑的脸，不肯放开他，一直结结巴巴地重复着她学会的一句俄语：“瓦吉姆，亲爱的，别忘了我。”

他挣脱了她，飞快地冲下了楼梯。等他坐进汽车，她还站在窗口，但是他没有向她挥手，没有转过脸对着窗口，没有望一眼，而是用压低的嗓音喊着：“走！出发！”

“赫伯特太太……”尼基金说，他没看她的眼睛，低下头吻了她那冰凉的、颤抖的手。“我很难相信，爱玛。”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第二部 疯狂

第一章

那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战争列车历经四年漫长岁月，疯狂地开足马力冲进德国，烧红的车轮碾压进被打垮的巨大的柏林城，插进城内的石砌的死胡同。被炸弹啃坏的房屋像黑魑魃的峭石兀立在滚烫的土地上，窗洞发黑、大门紧闭。屋里的电梯死气沉沉地停止不动。沉寂的住宅楼梯口不再飘出德国菜汤的香味。听不到脚步声、敲门声和邻居之间日常在门口相遇时点头招呼的寒暄声和殷勤的“谢谢”，“别客气”^①。到处是一片寂静，空空荡荡、昏昏惨惨。整个城里听不到一声枪响。柏林最后一道防线——帝国总理府和国会大厦被打下来了。一切都完了。市里疯狂地烧了几天的大火渐渐平息下来。遍地徐缓地飘散着焦烟味。仿佛是从血污泥泞的黑石头中逐渐出现的广场和街道上，堆满了烧成焦炭的坦克躯壳、散布的街垒、翻倒在弹痕累累的石路上的电车。到处是弯曲了的路灯座杆的影子和烧焦的还在冒热气的瓦砾堆。在空寂无人的马路上，在街垒前后，在中心大街的十字路口和拐角上，被打穿的玻璃橱窗张着大嘴，商店和理发店的招牌被机枪打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掉半截，旁边成堆的碎镜片闪闪发亮。近旁是烧毁的汽车、装甲输送车和变了形的大炮。遍地是被履带压扁的德国防毒面具的滤毒罐、带有黑鹰符号的凹瘪的钢盔、碾成奇形怪状的自行车、拆毁的儿童手推车、还有迷彩防雨帐篷的碎片、俄国人的灰色棉袄、一段段像扁平的小蛇那样伸开的脏绷带和被爆炸的气浪炸飞的汽车轮轴。在一处倒塌于人行道上的被削平的断墙中间，在被打毁的家具堆中有一架蒙着砖屑的钢琴，像被剖开了肚皮的死人一样，可怜地露出内部的琴弦。乱七八糟的废墟上，有一层楼还残存着部分住房和部分墙壁，糊墙纸上留下不久前挂照片的发黑的方块痕迹。奇迹般保存下来的枝形吊灯像只玻璃蜘蛛，在天花板窟窿中间蛛网般的电线上微微摇晃着。

这座巨大的、不祥的全部用石块砌建的城市，在几天之中被烈火烧得皮开肉绽，在作临终的抽搐，仿佛在烟雾中扭曲着。坦克疯狂地伸出粗大深红的射击触须，机枪射出一条条细鞭，鞭挞着街道的上空，火箭炮弹从地窖阴森森的方眼里射出闪电。被大火席卷的柏林在悲鸣，在翻腾；在痉挛抽搐，在轰鸣。它像莫洛赫巨神那样，还把最后的祭品狼吞虎咽地吞进肚里。柏林在毁灭，但它还以自身尸骨堆上的铁证宣扬它的信条，表明它对人类嗜血成性——在墙上、马路上、围墙上留着这样的口号：“Berlin bleibt deutsch”，“Schlag neun Russen tot”，意思是：“柏林永属于德国”，“消灭九个俄国佬”。

大火一直烧到五月二日才平息下去。空气中依然充满滚烫的水气，饱含着令人窒息的灰烬味、混凝土的粉尘味、被烧过的砖瓦浓重的枯焦味和埋在瓦砾堆里的死尸的腻人的腐臭味。经过大火肆虐之后，在露出来的石头走廊上方和熏黑的街道上空，阳台上耷拉着床单的碎片和破白布。风有气无力地拂动着破布片，吹动着黑魑魑的瓦砾坑中渐渐冷却的灰烬，吹赶着满是碎玻

璃片的马路上的垃圾纸屑，摇晃着从屋顶拖曳上人行道、又在打碎的路灯上绕了几圈的断电线。

但这依然是春光明媚、风和日丽的五月的一天。蔚蓝色的高空中飘浮着朵朵耀眼的白云，全城沉浸在离奇的无声无息中，静得令人难以置信，使人觉得耳朵里嗡嗡作响，胀得发痛。似乎这座被打垮的城市里，没有一名武装的士兵，也没有一个居民。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柏林满城都是士兵、坦克、大炮、汽车、马车、指挥所、后勤部队、工兵和通讯兵。在街垒森严的勃兰登堡门旁最后一次炮轰后三小时，柏林城像来了个急刹车似的，沉入水中，进入了任何力量都克制不了的冬眠状态。

柏林最后的顽抗结束了，最后一个堡垒——国会大厦打下来了。这近乎是遍及众人心头的梦幻般的魔法，再不受理智的约束了，人们欣喜若狂，对此深信不疑，纵情欢呼。攻克柏林的士兵，像赛跑跑到终点，刹住了，松弛下来。他们因为终于出现的幸福而兴奋得如痴如醉，因为突然的沉静而惊愕。他们一边东倒西歪地走着，一边解开汗水浸透的军衣领子，用累得发抖的手指卷着烟卷。有些人在太阳烤晒下还没有抽完一支烟，就合上眼睛，睡倒在国会大厦柱子下晒烫了的台阶上，偃卧在砂路上，倒在沉默的教堂的石板上，躺在富豪私邸的地毯上，倒在被抛弃的住宅的床上，也不掀开居民的绗过的厚被子，便和衣倒下了。有的睡在坦克里和弹药箱上，有的坐在炮架上，有的站在炊事用具的大锅旁，有的趴在桌上、窗台上，很不舒服地睡着了。被四年的战争压紧的弹簧，终于自由地松开了。在它彻底松开的终点，不是吃点东西，也不是想喝口水，而是睡眠。

许多地方还在冒烟的柏林城，士兵们这一觉竟睡了好几小时。虽然只有指挥所的通讯畅行无阻，不断向友邻集团军、向莫斯科发出有关“老巢”中心停火、有关攻克帝国总理府和国会大

厦、有关希特勒自杀的消息，可是那些硬挺着不睡的指挥人员和参谋人员中没有一个人忍心去唤醒累垮了的士兵，忍心用原来发号施令的嗓门来下达命令，此刻谁也没有这个权力。

晴空万里。寂静的柏林沐浴着五月和煦的阳光，沉睡了。好像在漫长的夜间，到处大门紧闭，酒吧间和幸而保全的橱窗的铁百叶窗放下了。但在昏暗的隐蔽的住宅里，异邦人惊恐的眼睛却贪婪地急忙紧贴着窗缝，大概他们对于在自己这座德国古老城市街道上所看到的一切，是将信将疑。没有一点痕迹足以使人想起原先早晨冲刷后乌油发亮的马路路面和清新的空气。哪里也看不到开足马力滑过光亮马路的总参谋部的长列汽车；看不到认真地刮过脸的、披着短披肩的巡逻队和军官；哪里也看不到平时每天来往的行人（他们见面便举帽致意，有的在书亭购买当天报纸）。年轻快乐、发式美观、身系雪白围裙的侍役不再用托盘端着琥珀色的冰镇啤酒，不再一本正经地从附近的酒吧间穿越马路到理发店去，那儿有正在刮脸的顾客，他喜欢在脸上敷上一条热毛巾，把面颊舒舒服服地泡软之后，涂上芳香的肥皂泡沫，轻轻地剃掉胡子，喷上香喷喷的花露水，然后躺到安乐椅里美滋滋地闭目养神。

先前的那个秩序井然、有条不紊、从容不迫的柏林，已经不复存在了。

尼基金排长所在的那个炮兵连，同步兵一起在蒂尔公园以东向帝国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方向进攻。他们在宽广的林荫道上，沿着一道荒凉的围墙一公尺一公尺地向前推进。透过远处坦克的隆隆声，从围墙那边传来激烈而密集的自动步枪声和狂暴的机枪扫射声。从那儿两次传来令人吃惊的、像是野兽发自腹腔的吼声（人不可能发出这样的喊叫声），样样事都有份的炮

弹搬运手乌沙季科夫，一个淡眉毛、长颈的小伙子，由于天真幼稚，对任何事情都不停地感到惊奇，他吓得睁大了蓝眼睛，跑到尼基金跟前报告说，从围墙缺口处仿佛看到树丛下有些装野兽的笼子，土墩上好像有只大象翘着长鼻子在行走；还有，看样子是我们的人，在小道上前进，并没有开枪，但是他们前面的火箭筒手和自动枪手却在小路上快步疾跑；小桥前面有一辆“T-34”坦克在燃烧。

尼基金从谈话中得知，卡图柯夫将军的坦克部队在他们师的左翼投入了战斗。当乌沙季科夫报告“T-34”坦克出现在动物园的那一分钟，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大炮逼近了地下避弹室，脑子里只想了一下：

“就在近旁了。”

在到达动物园地区前，炮兵连拖着大炮，穿过房屋的断墙，越过原来是住房的瓦砾堆，翻过楼板倒塌的屋梁，整整走了两天两夜。从西北方向通往动物园的道路，受到街垒森严的马路拐角上强大的防御点日以继夜的扫射，乘坐汽车是不可能进入那个地区的。当第一批炮弹终于滚落在这个大公园里潮润的隔年落叶上（公园里还很潮湿，树木稀稀拉拉，散发着秋天的霉烂味，但正在抽出嫩绿的幼芽），当朝着附近树丛后面排成半弧形的自行火炮开火时，整个炮兵连都被无法遏制的、疯狂的情绪控制着。

自行火炮缓慢地、沿着他们熟悉的途径向树丛中后撤，重又爬到林荫道的岔路口；前面的步兵一会儿卧倒，一会儿站起，在树林中迂回包抄；自动步枪的扫射和接连发射的炮弹震撼着树枝，打落了枝头的嫩芽。自行火炮和大炮发射时弥漫的硝烟以及在烟雾中像彗星那样闪烁的爆炸的火光，像一层深紫色的幕布遮住了公园上空，令人无法估计时间——现在究竟是早晨、是

白昼、还是黄昏。这使人们产生一个绝望的想法，仿佛这个沉没在浓重黑暗中的公园，不是在柏林中心，而是与整个世界隔绝，仿佛前面没有我们的步兵，没有向前推进，什么也没有，只有火光、轰隆声、铿锵声和硝烟……偶尔可以听到水泥围墙外坦克在轰鸣，从那儿传来野兽的吼叫声。漆黑的林荫道上火舌飞窜，小道岔路上自行火炮浓烟滚滚，大地富有弹性地抖动着，天空一片漆黑，重型炮弹在不同的大气空间呼啸着、叹息着，附近城里不断发出锤击般的爆炸声，近处连续的自动步枪声，所有这一切全都持续地、毫无变化地混合在一个地方，这儿本来应该是炮火打不到的德国人的防线，而如今这道防线已不复存在。

傍晚时，大炮旁意外地出现了步兵部队的两个通讯兵小鬼。他们吱吱嘎嘎转着线筒，兴高采烈地喊叫着，好像周围已经没有德国人了。他们摸黑把电线拉向不知何方。他们从炮兵排旁边跑过时，大声说着调皮的粗话，故意惹逗炮手们。他们看到炮手们的脸已经不像脸样，而是涂了一层黑硝烟的假面具，不禁哈哈大笑，像开机关枪似地告诉炮手们，说：“我们部队占领了地下避弹室，院子里尽是德国鬼子的尸体！给他们个彻底完蛋！我们正从那儿向指挥所拉线呢！那个小胡子魔鬼希特勒却没有找到！”

他们沿着树枝架设电线，又闪电似地在黑暗中消失了。尼基金由于连日来无止境的战斗，昨天一整天又拖着大炮穿过一幢幢房屋的断墙缺口，已经筋疲力尽，累得直想呕；看到通讯兵以后，他原先那急切地想看一看已被步兵占领的这个可恨的德国人负隅顽抗的地方的愿望，一下子都消失了。

他勉强转动舌头，嗓音喑哑地说：“睡觉吧。谁愿意，可以弄点水洗洗脸再睡。原地待命。”

这样一来，他就没有看到帝国总理府的这些地下避弹室。

黎明时分，寒冷刺骨。他被马达声和人声吵醒。他慌忙从铺在大炮下的树枝上一骨碌爬了起来，甩开蒙住头的军大衣。旁边站着一个哨兵——三号炮瞄准手塔特金，在公园吹来的潮湿的冷风中冷得直打寒战，咧开麦黄色胡髭下的两片兔唇哆嗦地笑着。他留这两撇胡髭，大概就是为了掩盖这个缺陷。

“什么事？”尼基金喊了一声。

“炮兵连长来了，”塔特金回答说，微微咳了几声，一面样子滑稽地跺着双脚取暖。“就是我们那位格拉纳图罗夫……还用汽车拖来了炊事车。”

天亮了，四周寂静得不同寻常，没有一声枪响，全排都盖着军大衣，在蒙了油布的炮架中间睡觉。林荫道当中离大炮不远处，出现了一辆缴获的崭新发亮的“奥贝尔”汽车，还拖着炊事车。一缕令人舒服的炊烟从树丛下袅袅升起。炮兵连的司务长，壮得活像一头牛，动作迟钝。他涨红了脖子，在炊事员的协助下旋开锅盖。看样子，锅子很烫手，两人不时把手缩回，甩甩手指。炮兵连长格拉纳图罗夫上尉阔步从“奥贝尔”车旁走过来，踩得草地上的潮叶窸窣作响。他用有力的肩膀整了整披着长下摆的军大衣，从衣襟里露出缠着纱布绷带的手腕。在他的没有光泽的脸上，引人注目的是漂亮的连鬓胡子，挺直尖削的鹰钩鼻子，他那仿佛随时准备大发雷霆的面孔，此刻显得很有精神。他有点粗鲁而快活地喊着：

“尼基金，你还活着？柏林城防指挥部打下来了，你们还在鸭毛褥子上睡懒觉，蠢驴！嗨，炮兵连还在我手里！起来！让大伙饱餐一顿！司务长，把缴获的烧酒发给大家提提精神，把大伙儿喂个饱，胀破肚皮！明白啦？尼基金，您大概以为我的手给划了个口子，我就躺在医院里啦，是不是？没什么了不起的！纱布一裹，屁股上打了一针防破伤风的药水以防万一。后来，我还搞

突然袭击，到一户人家过了一宿。瞧，我不是坐了‘奥贝尔’，挂着炊事车到来了吗，哈哈！顺路我还到动物园和团指挥所弯了一下呢！我一眼就看出，你还没有和他们联系上！死驴子，看来，没有我，你只好唉声叹气！克尼亚日科在哪儿？”

两天前，格拉纳图罗夫在直接瞄准轰击德军占领的施普累河畔的地铁车站时负伤，由那儿被送往卫生营。一排长克尼亚日科中尉就代理他的职务。尼基金被连长洪钟般的嗓门吵得完全醒过来了，他本想向连长报告关于他的排穿过房屋的断墙缺口向蒂尔公园推进的情况，关于昨天同自行火炮作战的情况，以及关于克尼亚日科中尉在右边邻近的一条林荫道上指挥自己的两门大炮的情况。但格拉纳图罗夫不想听他的。他把那只好手一挥，打断他的报告。他望着睡在炮架中间欠身坐起的士兵，把尼基金推到一旁，低声对他说，不用望远镜也看得出柏林完蛋了，还说他在司令部听说，大概全师要调离城市，因此得做好出发的准备，说罢，就大步向士兵走去。士兵们被昨天的战斗累垮了，还没有休息过来，他们半睡半醒地吐口唾沫，咳嗽几声，清清喉咙，抽起司务长慷慨分发的德国卷烟；瞅着缴获的“奥贝尔”汽车和它牵引的炊事车。这时有人已振作精神爬了起来，敲着饭盒。

“哎，怎么啦，小伙子们，怎么磨磨蹭蹭，像屎壳郎似的？”格拉纳图罗夫叫嚷起来，“大不了向自行火炮开炮嘛，又不是让你们在狮群中进攻！明白吗？”他高兴过头，骂开了。“我和司务长顺道到动物园转了转！狮子这该死的畜生，到现在还在路上逛来逛去，狼群围着大象跑来跑去，河马躺在水池里，肚子上还挂着颗水雷。斯拉夫人这下真够呛的！自行火炮倒算不了什么，小意思！是这样吧？”

格拉纳图罗夫所说有关师部调动的事，得到了证实。五月

二日中午接到命令——炮兵团开走，沿公路从柏林向柯尼斯多夫出发。炮兵连谁也不知道这次匆忙重新部署的原委。他们乘车驰过柏林的街道，议论着休整的事。异样的寂静笼罩着大地。在蓝天和被吞噬的房屋、烟雾、瓦砾场中间，寂静得刺耳和不可思议，好像一切都变得悄无声息了。

“‘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我这样忧伤……’^① 见鬼，下面是什么？忘了。这是谁写的，歌德还是海涅？罗雷莱，^② 关于罗雷莱的神话故事多美呀！……好像说，她披着长发坐在莱茵河畔的岩石上，四周一片惊人的寂静，浪花轻轻拍打着。她呀，不知为什么在歌唱，我看，唱的是忧伤的歌曲，是呀，是呀，非常忧伤的歌。究竟是谁写的，是歌德还是海涅？我全忘了，真是好样的！这是几年级时教的？八年级还是九年级？哎哟，好一个聪明人，真是好样的，好一个德国通啊！‘举起手来’，‘不许开枪’，‘快’，‘窝囊废’，^③ 唔，这些我知道，所有骂娘的德语我都会！妙极了，中尉先生！对了，譬如要问：您读过关于罗雷莱的神话故事吗？或者问：多少钱一杯啤酒？该怎么说啊。”

尼基金非常舒服地躺在柔软的鸭绒被里，一面翻阅着会话手册，傻里傻气地自己跟自己进行会话，享受着清晨的宁静和凉爽，欣赏着舒适的德国式顶楼天花板上淡红色的光点。他一个人睡在这儿，一觉醒来，一连几个小时享着清福。一昼夜来他都无需操什么心，不用发号施令，不用夜里亲自去查哨（这在先遣部队里是必须要做的），也不必等候电话指示，等候突然下达的

①③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② 德国传说中的女妖。

命令和在进攻或出发前炮兵连长的召集。一昼夜来他们驻扎在离柏林五十公里的柯尼斯多夫小镇上休息,待在一边,离开了世界上还在进行的重大事件。这是郊外一座清静的小镇,瓦屋顶和石砌教堂的尖顶明朗快活地闪烁着,整个城镇沉浸在阳光之中,一派外省风光,全城拥覆着洁白的盛开的苹果花和从院墙后面垂挂到人行道上的浓密雪白的早丁香,它丝毫未受战争波及,没有挨过一枚炮弹,也没有吃过一粒子弹。战争只是从它旁边掠过。这儿只是隐约听到远处的隆隆炮声,玻璃窗微微的震动和苏联强击机的低吼声。尼基金后来知道,在柏林的多次战斗中,苏联飞机只有两次越过这儿的屋顶。当炮兵团晚上进驻这座小镇时,“斯蒂倍克”汽车的一片轰鸣声终于带有威胁性地打破了它的沉睡。但是小巷里依旧杳无人影,垂挂的窗帘里没有一点灯光,只有晒台上像报丧似地耷拉的白床单显现出发亮的斑点。

格拉纳图罗夫上尉下令占据小镇西南方做火力点。尼基金把自己的排安置在一幢阒无一人的空房子里。大炮配置在离苹果园围墙外一百五十公尺的露天阵地的掩体内。苹果园外是一大片伸展出去的密林。小镇边缘环绕着一个大湖,可以看到湖对面黑压压的树林,从树林里通出一条公路,横穿过春天的草地(那儿是射击方向)。因为据格拉纳图罗夫得到的情报,在那片树林里,深夜有一些狂热的“狼人”“悄悄地”出来游荡。这是红军逼近柏林时击溃的法西斯部队的残部。

先遣部队的惯有的身处险境之感,使炮兵们在睡觉时总是把枪支放在伸手可以够到的地方,在死一般的寂静中只要稍有一丝风吹草动就会一跃而起。可是这如同金属般锐利的危险感在进镇后的第一个早晨就消失了。五月稀疏的细雨,苹果园里一片田园的宁静,雨露滋润后青翠欲滴的草地上欢乐和煦的阳

光,以及随阳光而升起的平和地飘散于小镇上的晒热的石头味和淡淡的带点甜味的丁香的芬芳,把炮兵的危险感冲洗得一干二净。

士兵们住在考究的德国房子里,生活在难以想象的、家庭风味的舒适安逸的氛围中,整日洗呀、刷呀、烫呀、吃呀,这在整个战争时期是从未有过的。厨房清洁整齐得使人吃惊,碗架上放着各种大小的锅子、罐子。更使他们叹为观止的是,那些有着彩色瓷砖镶成的浴缸的盥洗室,挂着豪华的镜子,铺着毛茸茸的地毯;卧室里放着从未见过的宽阔的大床,铺着厚厚的鸭绒被褥和柔软的枕头。这一切好像是一幅幻境,以昨天的节日开始的幻境。人们简直无法相信,离这儿几十公里以外的柏林会是一片阴森森的瓦砾堆,充溢着烧毁的石头发出的令人头昏的气味。

团部和营部都没有下达任何命令。炮兵连除了早晚点名、指派岗哨值勤外,没有任何军事活动,日子过得自由自在:安宁的早餐、检查武器、午餐、长时间的大喝瓶装啤酒的晚餐、熄灯就寝,谈论受惊的德国太太,不停地抽着烟味平和的德国香烟,嘻嘻哈哈说什么德国女人在窗口向某人微笑来挑逗他之类的下流话,热闹地打牌打到深更半夜,用战利品打火机、短剑、手枪做赌注,然后像小孩那样安然地一觉睡到天亮。战争、柏林、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里党卫军部队的顽抗,我们部队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整个炮火世界仿佛不知不觉地离开了,退到数千公里以外,沉没在那茫茫的、遥远的虚幻之中。留下来的现实,就是使人麻醉的宁静,清新芬芳的春天气息,灿烂的阳光,清澈的蓝天,愉快的无忧无虑的休息。

镇上的商店、理发店、啤酒酒吧间都还关着门,但街头上开始偶尔出现一些上年纪的、穿着黑衣服和毛线背心的德国人。他们小心翼翼地看看大炮、汽车、马车,看见迎面走来的士兵、军

官，便有礼貌地抬抬头上的细毡礼帽，老远就谄媚地堆起笑容，恭恭敬敬咕哝说：

“您好，士兵先生！”“您好，长官先生！”^①

尼基金和大家一样，处在如释重负、懒洋洋的无忧无虑的状态。他和大家一样，几乎想都没有想到，这场快要到达终点的战争可能破坏命运赐予连队的安宁。因为无事可干，他决定根据在德国边境上发给军官们的军事会话手册，学习德语。

这天清晨，他怡然自得地躺在床上，翻阅会话手册，大声朗读着。酣睡了一觉以后，无所忧虑，也无人召见他，他沉浸在这种幸福的安宁气氛中，感到休息以后精力特别充沛，干净的衣衫特别令人舒坦。

尼基金念了一句德语，说：“让我来翻译吧：‘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我这样忧伤。’这个我记得，”尼基金大声说着，在柔软的鸭绒被里伸了个懒腰，望着令人愉快的、洒满粉红色阳光的小房间，墙上糊着花草图案的褪色的糊墙纸；望着照片上戴大礼帽、蓄小胡子的老头和戴古色古香花边帽的端庄的老太太；望着有裂缝的旧式五斗橱、衣橱和房门左边一面有框的小圆镜；望着摆着文具和带罩烛台的桌子；望着这整套不知是什么人由于什么原因留下来的舒适的摆设。“其实，”尼基金说，“我忧伤是因为我不知道以前是谁住在这儿。这句话德语应怎么说？谁——ber，生活——leben，好吧，中尉先生，现在让我们来试试造句！……”

可是，句子他没有造成，因为在寂静中楼下的门碰响了一下，有人从外面进来。接着，楼下一个铁嗓子大声嚷起来：“起来！别睡懒觉啦，斯拉夫人！”随即响起了一片睡意朦胧的声音，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呼呼哧哧的声音和长长的呵欠声中夹着嬉笑声。不知是谁忽然想起了什么，用男高音喊道：

“嘿，弟兄们，我梦见了一个多美的小娘儿们呀……她站在篱笆旁，眯细着眼，向我这样点头招呼……”

“那你怎么啦？呆头呆脑的光搔头皮吗？还是采取行动啦？后来怎么啦？”

“吹啦！……梦里总不会有好结果，谁都知道，梦就是幻影嘛！”爱讥讽的男高音解释道，“嘿，伙计们，要是在这鸭绒褥子上，有那么一个光溜溜的搂在身旁，一个礼拜都甭吃啦，光是……中士，你从哪儿跑来的？干吗这么大的响动？像是玩了个通宵，天蒙蒙亮就把人吵起来！”

麦热宁中士用抑扬有致的发号施令的口吻说：

“喂，大伙儿洗洗脸，刮刮胡子，上个厕所，拿着饭盒，吃早饭去！你们像熊一样睡得太多！都睡肿啦！起来！叫醒中尉了吗？”

“让他睡去，喊他干吗……”

接着，尼基金听见楼梯上吱嘎吱嘎沉重的脚步声。他扔下会话手册，从软椅上拉起军服，很快穿上马裤，答应说：

“麦热宁，我起床了！进来吧！有什么急事？但愿不是坦克进攻吧？现在请进来！^①”他讲了句德语，“请！”^②

“中尉同志，可以进来吗？”

三号炮炮长麦热宁中士走了进来。他身材魁梧，稍有点胖，穿着洗得很干净的军服，脚上铬鞣革的军官皮靴和肩章都是湿的，好像刚走过露水地，肩膀擦过湿树丛似的。他的脸色白里透红，睫毛浓密，眼睛明亮、刚毅，要不是他那厚颜无耻、似笑非笑

①② 原为德语俄译音。

地露出几颗有些损坏的门牙使其外观减色的话，长相可算不错。大家公认麦热宁是个走运的好色之徒，是个不可救药的吊膀子老手。只要炮兵连在人家耽上一两天，他到处总能得心应手地搭上关系。他从不隐讳这一点，胸前口袋里总放着一大堆照片，上面写着动人的词句。有时喝醉了便吹嘘说，如果死神捉弄到他头上，全乌克兰和全波兰的娘儿们将要为他哭泣，比他老婆还要伤心；还说什么，她们会怀念麦热宁中士。但是，他又是个走运的炮长，在强渡德聂伯河的日子里来到这个排，一次也没有负过伤。因此，全然不用费时耗神地到医院去找，就能把奖章发给他。

麦热宁故弄玄虚地眯着眼，不经意地把手举到鬓角，冷冷一笑说：

“中尉同志，早上好！^① 有件事要请教您，不打扰吧？”

尼基金看了一眼炮长的湿皮靴和被露水沾湿了的发黑的肩章，惊讶地问：

“您怎么啦……没在排里过夜？中士，您到哪儿去了？”

“没到女法西斯分子那儿去。尽管这些女尸自己凑上来，”麦热宁生硬粗鲁地说，丝毫不为自己分辩，反而进一步说明：“你在街上走，她们就从窗口用手指打着各种各样的手势……”

“那又怎么样？您在哪儿过的夜？”

尼基金从软椅上拿起光滑可爱、擦得亮亮的武装带，闻到一股暖暖的皮革气味，睡足之后原来的那种精力充沛，充满青春活力的感觉使他高兴。他把武装带系在腰里，然后把暖暖的手枪套朝一边挪移了一下，装出一副严厉的面孔，走到镜子前梳起头来。他不想立即训斥麦热宁未经同意擅自离排的行为，不想破

^① 原为德语俄译音。

坏春天早晨生气勃勃的美好情绪。他故意装得很严肃，以此提醒，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宣布可以不遵守纪律，尽管连队是在休息，没有接到上级指示的情况。

麦热宁比尼基金大九岁，比他有经验，体力也比他强得多。麦热宁善于突然开一通粗鲁的玩笑，使自己下属的士兵佩服。有时，尼基金和炮长单独相处时，总感到不舒服，对他那股露骨的恬不知耻的劲头感到气忿。

“那又怎么样？”尼基金梳好头，又问了一遍。他从镜子里看见中士那炯炯有神的、放肆的目光正盯着自己的后脑勺。“麦热宁，您想说什么？”

“我想问问……中尉同志，您对德国钞票和手表在行不在行？”

“不明白您的意思。”尼基金朝梳子吹了一下，“您指什么？”

“中尉同志，请等一等。”^①

麦热宁走出房门，不一会，从楼梯口拎来一只帆布袋，放在地上。袋子的金属拉链没有拉到底，破了的紫色火漆印挂在那半边拉链的粗线上，看来，那封口的小锁刚扯掉不久。麦热宁在口袋旁边蹲下，毫不惭愧地从下望着皱着双眉的尼基金，用关节粗大的、带有很久前的蓝色刺字“舒拉”的手拉开拉链，从口袋里取出几叠厚厚的用黄纸条封着的钞票，放在圈椅上，随即又掏出一只精致小巧的、像珠宝商出售耳环或戒指的盒子，从里面取出一只装着细皮表带的银光闪闪的小手表。

“中尉同志，您瞧瞧，是不是冲压出来的？”麦热宁装出天真的样子稍稍垂下睫毛，说：“您懂点德文吧，这表面上写的什么鸟玩意儿？要是看盒子……不像是冲压件。”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您在哪儿搞到的？从哪儿弄来的？”

麦热宁泰然自若地晃晃皮带上的小手表，朝夜光表面呵了口气，用手指擦了擦玻璃表面。

“中尉同志，犯者不杀嘛。”

“不是犯者，而是认罪者不杀，”尼基金纠正说，“犯罪者正是该杀头。哎，您到底从哪儿搞来的？”

“都是合法的，没有搞一点不正当的手段。”麦热宁傲慢地说，挺直了身子，“是这么回事：夜里我到野战医院去找一个认识的护士，正好有个护士过生日。看来，这是合情合理的吧。她们住在费恩还是……斯坦因……多夫，鬼知道，说不清楚，总之，是个小村子，离我们这儿大约六公里。我回来时穿过树林子，天刚蒙蒙亮。一看，左边树丛后有样黑糊糊的东西，像辆汽车。看样子，是指挥车，给打得粉碎，是给地雷炸翻的，坏得不成样，像雷打乌龟。心想，碰上这么有趣的事，该去看一看吧。走近一看，汽车上全是破破烂烂的东西。可是，有一只小木箱和一只口袋，干干净净的。我很好奇，就打开了。小木箱里装的是手表，袋子里是一叠叠钞票……为了方便起见，我在袋子里装了二十块手表，其余的连同木箱藏到树丛里伪装起来，免得再招惹别人。事情就是这样，中尉同志，我感兴趣的是：这些表是值钱货，还是狗屎堆？”

“文件呢？那儿有没有文件？”尼基金问，“拿到没有？”

“您要那干什么？送博物馆，还是怎么的？战争今天明天就要结束了，您还问文件。文件值几个钱？狗屁不值！”

楼下传来士兵响亮的讲话声，声响愈来愈大，愈来愈清楚，饭盒叮当作响。这是早餐前，全排集合准备就餐时的一片兴致勃勃的忙乱声。大家都没有正经的操心事，七嘴八舌地等着司务长把缴获的柏林库存的烧酒、啤酒统统分发下来。

“中士，我看，您什么都知道。战争是快结束了，这很清楚。不过，谁告诉您，就在明天结束？是上帝亲自告诉您的吗？”

“我用鼻子嗅出来的，中尉同志。对我们来说，已经到头了。我们打炮到此结束。”

“但愿如此。不过，中士，您的嗅觉还不能作为依据。”

他和麦热宁的谈话照例是公事公办。这是他和炮长打交道时给自己规定的一条维护自己尊严的准则。麦热宁抿紧嘴唇厚颜无耻、过分自信的冷笑和他的冷冷的毫无表情眼神，经常隐隐流露出对尼基金的蔑视，他瞧不起这位生长在莫斯科的中尉，这个刚离开爹妈、刚放下甜果酱、刚丢下学校功课的不会干活的白面书生，而他麦热宁在三十年的岁月中已经饱尝各种甘苦了。

“我们来看看，您发现了有多大价值的宝贝，中士。”

尼基金取了厚厚的一叠新钞票，看见印着黑色鹰徽下“德意志帝国银行 5000”的字样。他把它塞回敞开的口袋，就像这是令人毫不感兴趣的石头。接着，又看了看麦热宁递给他的小手表，拿着表带的一头把表放到中士伸过来的手掌里，带着厌恶冷淡的神气说：

“胡闹，麦热宁。帝国马克没什么用，可以烧炉子。手表嘛，也不是瑞士货。那是送给德国士兵的复活节礼物。懂吗？”

“明白了，”麦热宁嘲弄地合上女人似的睫毛。“也许帝国马克还有用呢，中尉同志？会吗？上百万钞票呢……您说呢？”

“把口袋拿走，回排里去。”尼基金打断对方谈话，不高兴地摸摸下巴上微白的硬须。“我以为您有什么事，原来是这么无聊的事。告诉乌沙季科夫，叫他拿点热水来，我要刮刮胡子再去吃早饭。”

“明白了。”麦热宁把船形帽拉到眉毛上，把口袋搭在结实的斜倾的肩膀上，走了出去，皮靴把楼梯蹬得咚咚直响。到了楼下

他用那粗野的嗓音命令说：“乌沙季科夫！送热水给中尉刮脸！还有……”他突然中断命令的口吻，又讲了些什么，但尼基金在楼上听不清楚。

楼下像地雷爆炸似地迸发出一阵震撼墙壁的大笑声。不知谁说了一句什么，大伙儿兴高采烈地拉开粗嗓门报以哈哈大笑。但从士兵的嬉笑声中听不出有对尼基金不友好或者恶谑的意思。这一点尼基金是清楚的。全排在温暖美好的家庭环境里睡足了，休息够了，乐意开开玩笑，讲讲俏皮话，引起一阵阵健康快乐的哄堂大笑，有时还会特别淘气。

“就是麦热宁对我不怀好意。”尼基金一面想，一面把镀镍的保险剃刀、毛茸茸的刷子、折叠式杯形肥皂盒和一盒锋利的“索林根”刀片放在窗台上，这套刮脸用具，连同丹麦食品罐头、葡萄干、法国巧克力和玩具硬纸板的小枞树包装在一起，看来，是送给某个德国军官的一九四三年的圣诞礼品。这是在日托米尔附近一列货车上缴获的战利品。

“你们在楼下笑什么？”尼基金问，这时排里最年轻的士兵乌沙季科夫满面春风端来一锅开水放在桌上，马上就忍不住地尖声笑开了。

“谁弄得清他们，中尉同志，”他说着，用手捂住嘴又扑哧笑了。“他们一说什么，就哈哈大笑。”乌沙季科夫像乡下妇女似地两只长手拍了拍大腿，露出又惊又喜的神情，说：“一帮爱笑的疯子，大伙都笑个没完！”

“总是那些俏皮话。您去吃早饭吧。”尼基金说着，又听见楼下爆发出一阵大笑声。他被士兵们的笑声所感染，自己突然也微笑了起来。

太阳挂在屋顶上，不像清晨的阳光，热烘烘地晒烫着窗台和尼基金肩头。尼基金怀着无忧无虑的轻松愉快的心情对着镜子

慢悠悠地刮着脸，只闻到窗外暖洋洋的空气中送来的一阵阵松脂香和战利品香皂的香味。他用刷子搔痒似地在脸上涂上香皂，泛起轻飘飘的皂沫。他慢条斯理地用剃刀刮着，刮完之后，本来就很白净的皮肤显得更干净、光滑，人也更年轻了。他一面刮，一面细看自己的脸，细看自己睡足后炯炯有神的眼睛。他懒洋洋地、快活地想，要不要留撇小胡子。那些步兵侦察兵在奥得河畔就讲究装扮漂亮，蓄起这种式样的胡子来啦。为了试验一下，他在没有刮完脸之前，先在上唇留下一抹稀稀的、浅色的小胡髭。然而，这抹小胡子既没有使他的外貌显得庄重些，也没有给他增添潇洒风度。他摸着自己的胡子琢磨了一会儿，大声说道：“见鬼去吧。”便决定不再搞这种赘饰了。毫无疑问，这样做肯定会引起麦热宁撇嘴冷笑，引起他那令人讨厌的喊叫：“啊，我们的中尉留起小胡子来啦！这是干什么呀？”

他刮好脸，用热水浸湿毛巾，一边仔细瞧着镜子里自己容光焕发的外貌，一边擦着脸、脖子和胸口。在这美妙的春天的早晨，擦着这条热气腾腾的毛巾，活动着清脆作响的筋骨肌肉，不必急着去哪儿，也没有什么事需要研究决定，甚至不需要认真动脑筋（这在一天以前，在那大火熊熊的柏林是无法设想的），这一切使他感到精神抖擞。

“喂，中尉，中尉，吃早饭啦！”透过蜜蜂似的嗡嗡声，楼下有人喊着：“啤酒凉啦！”

尼基金梳好头，扣上衣服，用湿毛巾擦擦勋章，把被硝烟熏出黑斑的珐琅擦得晶亮。他感到浑身富有弹性、清爽，再一次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脸，又一次出声地说：

“一切都不错，好极了。”

他沿着螺旋式的楼梯，肘部顺着溜滑的木栏杆滑下去，向闹哄哄的饭堂走去，这时一阵芬芳的微风扑来，使他突然产生一个

念头：整个这新鲜、轻松、无忧无虑、远离战争的生活，眼看就会猝然中止、结束并消失；他和他的排驻扎在德国小镇上，生活在难以置信的幸福的迷雾中，这幸福不可能是持久的。他回想起自己浑身的泥泞汗渍、满脸污垢、双颊凹陷的模样，这副面孔前天夜里还在这面镜子里出现过。那天他把士兵们安置在这座空着的德国住房之后（战争意外地把他们送进了这个天堂），第一次踏进了这间由他占用的顶楼的门槛。

第二章

饭堂很大，里面烟雾腾腾，一束束阳光从窗口斜射进来。全排士兵聚集一堂，闹哄哄的，桌子周围一片欢腾的笑声和戏谑声。尼基金的姗姗来迟，立刻引起欢乐的喊叫：“哎，中尉，您请入座吧，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在楼梯上那种针扎似的惶惑不安，一瞬间便消失了，那种不合时宜的、不必要的面临危厄的担心消失了。他再次心满意足地想：“当然没有必要硬让脑袋胡思乱想。目前一切都很好。主要的是我全排的人都活着，我也活着！此外，还需要什么呢？”

大多数士兵都围在桌旁，在麦热宁中士背后吵吵嚷嚷。麦热宁站着，一个膝头顶着椅子上的口袋，一面转动着从小盒里取出的小手表，眯着眼环视周围的士兵，大声说：

“弟兄们，咱们合计合计，有了这玩意儿可以搞到什么？烤猪肉、啤酒，还可以大吃一顿各式各样德国美味。试问，怎么个搞法？我琢磨嘛，这毫不费劲。塔特金，来，听着！吃过早饭你去找对面那家关着门的店老板。如此这般地跟他说说，问他愿

不愿意拿东西和我们交换手表，友好协商，两厢情愿，尽管我们本该掐死你们这些猪猡，不过，我们还是克制着！这样处理战利品，大伙儿没意见吧？”

“那还有什么意见！塔特金能行，他脑袋瓜算盘打得精啦！集体农庄当过会计，打算盘快得像弹钢琴！应该叫他当司务长！他是一把神算盘！”围在麦热宁背后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一大堆人亲昵地挤挤塔特金，拍拍他的肩膀和脖子。三号炮瞄准手塔特金是个火红头发的小个儿，一个善于精打细算的好当家。士兵们善意地逗他，逼他弯腰，逼他咳嗽，他都照干。“塔特金要是当上军需，我们可以再次攻克柏林！我们的塔特金就是个没佩军衔的将军。他的脑袋是万能的！”

“口袋里装的全是手表吗？”塔特金感兴趣地问。他因为自己的管家本领得到大家的公认心中得意。他很麻利地拉开袋子的拉链，问：“这儿是什么？好像沙沙响的纸头……是什么玩意儿？”

“有好几百万呢，塔特金。你凑近瞧瞧，真他妈的不得了！”麦热宁喊着，“货真价实的帝国马克，猜中了没有？可以买头牛，买幢房子，外加一个德国女人。她在窗口向你招手，问你要香烟抽，懂吗？塔特金，来，瞧瞧这儿……”麦热宁早就估计到他的这一着会造成什么影响，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厚叠的钞票往桌角上啪地一甩，“这里一叠是五千！公羊为什么翘尾巴，懂了吗？塔特金，拿这一叠去摸摸情况，随便到哪家铺子去试探试探，看他们收不收？弟兄们，有了这钞票，我们就好过日子啦！”

“真的有好几百万吗？”乌沙季科夫惊叹地喊道，他像鸟儿似地把细长的脖子从麦热宁的肩头后面伸过去，拼命想挨近看看桌上的钞票。“这样，我们不就成了资本家了吗？一口袋吗？难道全是真钞票？”他像平素那样好大惊小怪地奋然大叫起来。

“这么一来，你就成了百万富翁啦，年轻人，打开你的衣服口袋！”

“要这么多干什么？派什么用？简直不得了！……”

“你要是把钱当小菜就稀饭吃，包你吃了还要添！别发慌！……”

上兵们起哄了，欢乐亲昵的情绪互相感染着，他们推推搡搡地闹着，使劲拍乌沙季科夫的肩膀，拍他的瘦脊梁，用这种友好的挤压来安抚他。他噗哧一笑，好像谁呵了他痒似的，笑得像只小马驹。这时候，四号炮炮长兹金上士，一个上年纪的已有家室的汉子，他深明事理，不爱长时间逗闹，吐掉吸到嘴边的烟蒂，威严地唤道：

“乌沙季科夫！”

“什么事？”

“这叫什么？”兹金问道，伸出一只被烟熏黄的手指，“知道不知道？”

“上士同志，当然知道，您的手指呗，这我还没看到吗？”乌沙季科夫眨着眼，露出一副令人无可奈何的天真相。

“瞎说，乌沙季科夫，这不是手指，是车辕，也许，还会说，这不是车辕，是母鸡呢。”兹金发火地说，“年轻人，好好地瞧瞧，还是没戴眼镜看不见？”

“这怎么是母鸡呢？您真是开玩笑吧，上士同志？”

“我有看法呐，乌沙季科夫，你光知道笑，光知道提问题。”兹金说，“你们卡卢加尽出些什么样的哲学家？尽是一些牛脾气的孩子吧？‘真是德国人吗？’‘真是坦克吗？’你提的问题，我事先都能料到。这一回，你又像个木头脑袋，大惊小怪，晕头转向了，‘是真的钞票吗？’就算是真的，你要几百万干什么？弟兄们，我们现在日子过得像在疗养院一样，简直成了苍蝇，变糊涂啦！脑

袋瓜就像坐在旋转木马上一样。”

“得了，得了，兹金！”麦热宁吆喝了一声，眨巴着眼睛，发号施令说，“你别碰我的鹰！既然有好处，干吗撒手丢开？是因为我们不配，还是什么？伙伴们，对不对啊？你兹金，是我们这儿的圣人，为我们祈祷吧！战利品嘛，不管从哪一点讲，是缴获来的，这是硬碰硬的。塔特金，怎么样，钞票是真的吧？大会计，你给大家报一报，让大伙儿都听到，这些钞票值多少钱，还是像兹金说的，是我变糊涂了！我不会把百万元钞票往自己腰包里装的，我妈可不准我这样干哪！”

麦热宁用挖苦的玩笑把兹金的反对意见压了下去。士兵们取笑着，赞同地起着哄，全都好奇地簇拥在火红头发的塔特金背后。只见塔特金能干而仔细地用指甲扯开一叠崭新钞票上的银行封条，咳了一声，郑重其事地用两只手指头蘸点唾沫，抽出一张纸币，对着阳光，怀疑似地把它翻来倒去看了又看。他那小胡子的脸上调皮的表情显出他正在干一桩了不起的重要大事。

“不像是假的，”塔特金说，“这是千元票面的帝国马克。我还没有和这么大的票子打过交道。这么大的票子我可不认识。”

他小心地把那张钞票放进那一叠里而，像掸灰一样弹了弹手指。

“既然你记过账，当过会计，肯定精通财务，那么，这事你准能对付。”麦热宁提高嗓门说，“大会计，根据所有的财务条例你合计合计，明白了吗？咱们以后给德国女人付钱就是了，这样便合法啦！”

“是呀，塔特金，是呀！”大伙一致发出赞同的声音，“这只不过是长疥的羊身上揪一把毛！他们这些坏蛋到我们那儿不给钱什么都抢走了。我们不管怎么还是凭良心的……手表算得了

什么？就是说，我们现在都成了百万富翁啦，哈哈！哎，中士，我们里面数你最麻利……吃早饭，弟兄们，把稀饭和啤酒^①都忘啦！中尉在等我们呢！”

“愚蠢，莫名其妙。他们要钱干什么？”尼基金思忖着。他一言不发看着塔特金，看着麦热宁在指手划脚，看着被这些钞票和手表弄得手舞足蹈的全排士兵。“可是，就在一天前，在柏林动物园的林荫道上，除去惟一的生命，其它东西都还一文不值呢。”

“麦热宁，把桌上这些玩意儿都拿走！该吃早饭了。”尼基金趁片刻的安静说，并坐到“中尉”席上。接着又说：“把战利品袋子藏到桌子下，不然，大家吵得太厉害了。今天司务长给我们发什么吃的？啤酒吗？中士，别谈你的战利品了，给每人发三瓶啤酒。这样更合适些。”

早饭时大家喝着啤酒。啤酒从深色酒瓶的颈口咝咝地冒着泡沫。大家把酒倒在从厨房拿来的车光玻璃的大杯子里，频频举起厚玻璃杯戏谑地碰杯祝酒，津津有味地吃着粥，把沉重的“索林根”汤匙和也是从厨房餐具柜里“租”来的搪瓷盘碰得叮当作响。大家又是说，又是叫，互相打断对方谈话，回忆在柏林十六天的巷战、街垒战，穿越一幢幢房屋，越过断墙残垣向蒂尔公园进攻的情景。人们换洗一新，满面红光，每当回忆起某个细节时都快乐得哈哈大笑。强烈的阳光照进窗口，在桌面上投下一块块发热的白方块，透过军便服烤着士兵们的脊背。屋子里热起来了。在这顿吃不完的早餐和无休止的闲聊中，在外国啤酒的酒味中，在香烟和马合烟的烟雾中，在这喧哗拥挤的饭堂里以及这暖和的春日里，显露出人们急不可待、贪得无厌地希望大大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享受一番的心情。他们是些刚刚侥幸穿过针眼^①的人。他们记得一切又忘却一切,都是为了目前的生还。

尼基金喝着啤酒,望着这一群他所熟悉的,然而其现在的手势、笑容、声调又使他感到陌生的士兵们。一昼夜间,命运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结局竟是这么幸福,他被一阵阵温暖的怡然自得的感觉控制住了。浑身结实有劲的麦热宁中士,敞开军便服的领子,汗流满面,一个劲儿地喊着:“为战争完蛋干杯!为娘儿们,为该死绝的德国女人干杯!”天真的乌沙季科夫睁大了圆眼睛,惊奇地拍着巴掌,动不动就发出一阵银铃般清脆的笑声,听到任何粗话都起劲地笑上一番;调皮的塔特金不让头头看见,偷偷把喝完的酒瓶放到桌子底下;老成持重的四号炮炮长兹金沉思着,抽着自己卷的粗大的马合烟,——所有这些不同类型的、对尼基金来说十分亲近的人们,不知为什么此刻使他感到慰藉,内心感到自己和他们过去和现在的一切是令人感动地亲密无间。这些打仗勇猛、被硝烟熏得污黑、疲惫不堪的人受他的指挥,而他每天要对他们每个人的生命负责,现在,他绝不能把他们看成是另一种人。但刚才看到他们为了手表和钱胡闹,他竟会发火。尼基金后悔了,他寻思:“干吗我要去干涉他们呢?让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接着,他又认为这是军官的军衔赋予他发怒的权利。也许,尽管他没有权利在日常生活问题上要他们接受他的决定,但他在发射阵地、火炮瞄准计算和射击这一方面要比他们强,这一点是主要的,是和全排每个士兵的生命攸关的。正是这一点维护并巩固了人们对他的尊重。尽管他年岁不大,但对战争中最重

① 见《圣经·新约》,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困难。这里是比喻他们侥幸活下来的困难。

要的东西的理解好像比谁都深切。

他指挥着一批人,但他不像很多士兵那样会在刮风的严寒中生着篝火,不会按常用的办法在篝火上煮汤,不会在农舍里麻利地生旺炉子,不会和女人过夜,不会连头蒙上雨披到空寂无人的村里的养蜂场去“检查”蜂箱,然后不知用什么办法搞了一整桶的蜂蜜回来,也不会像上了年纪的兹金在冬季防御时经常在发射前把背贴在火炮的护板上蹭来蹭去取暖。但是他学会了必要的粗鲁、发号施令的嗓音、军官的自尊自重,也学会了在打仗时讲一些骂人的,但可以解决困难的话。这一套把他和大家拉近了。当别人谈论女人时,他装出不屑一听的、内行的样子,因为要是麦热宁知道(尤其是在日托米尔那一回之后)尼基金在战争期间确有一次搂过和吻过女人,那么,麦热宁大概就会公开鄙视他这个知识分子所干的荒唐事。

餐桌旁的谈话没有停息,屋子里的烟越来越浓,波浪似地往人们通红的脸上拂动。激昂的声音交织在一起。昨天的节日好像一清早便又开始并继续着。尼基金没有打断这顿拖延下去的早餐,也没有离开饭堂。他欣赏着窗外火红的太阳和在它那连接不断的光柱中闪耀着的微尘,愉快地沉浸在这片欢乐的喧哗声中。

“我的朋友们,听着,那是在我们翻越断墙进击蒂尔公^{尼基}的事情。”兹金上士庄重地说,一面吸着粗大的自卷烟,“我记得,我爬进了第四幢房屋的一个窟窿,这个窟窿有凿穿的锅灶那么大小。为了摸清情况,就是说,怎么把我们的大炮这个笨家伙比较顺当地拖过去……事情发生在将近傍晚。我爬进一幢德国住房,家具都打坏了,黑咕隆咚的,到处积满指头那么厚的灰尘。透过天花板上的一条缝有一点微光。到这儿之前,我们先在隔

壁地窖里饱餐了一顿缴获的肥肉罐头，撑得连腰带都束不住了，胀得肚子里翻滚起来，再也忍不住，受不了啦。在肚子里的东西止不住地要朝外冒的情况下，怎么把大炮拖过缺口呢？真是哭笑不得。我一爬进洞口，就把皮裤带往脖子上一挂，自动步枪往旁边一放，做好了准备；蹲了下来，像只雄鹰蹲在角落里，如同通常那样，想着心事。我蹲着，听见黑暗中有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有什么东西在沙沙作响，后来，居然哼起来啦。我打了个寒颤，一把抓起自动步枪。一看，那边角落里蹲着一个德国鬼子，也是脖子上挂着皮带，也是想得出了神，像通常那样，蹲在那儿。我还看见他脚边也放着一支自动步枪……”

“哎哟，我的上帝！真的是德国鬼子吗？怎么会呢？是活的吗？”乌沙季科夫惊叫起来，往自己大腿上拍了一巴掌。“当真是活的吗？”

“小鬼，你在哪儿见过死的德国鬼子还脖子上挂着皮带蹲着大便的？”兹金责怪地瞅了他一眼，周围的人都笑了。“就这样，他看见了我，一把抓住自动步枪，浑身紧张，像是在哼哼。我在黑暗中分辨得出他年纪不轻了。怎么办？我们蹲了几秒钟，都屏住了气，从角落里恶狠狠地你盯着我，我盯着你，要把对方俘虏过来。我这当口正在拉肚子，真是什么仗也不想打了，难受得要命。我脑子里一动，我想，如果他先动手，那么我还来得及……他忽然把他的自动步枪轻轻放下，一直朝我看呀看的，像只病绵羊。我也把自己的枪放在地上，也像只傻绵羊一样瞧着他。后来，我们都办完了‘公事’，他首先发疯似地跳起来，皮带咬在嘴里，把枪挎在脖子上，钻过缺口，屁股还忽闪了一下！嗨，这时我也站了起来……就是这么一回事。”

“这么说，你受了一场虚惊，兹金，是吗？”麦热宁生硬地笑了一声，拳头猛击了一下桌子，压倒了士兵的笑声，说：“哎哟，上帝

的信徒！你可以上教堂去啦！要是我，不用一梭子弹，一颗子弹就宰了他这臭狗屎！对德国鬼子还心软吗？”

兹金吹了吹烟卷，一边考虑着一边有力地说：

“中士，你尽管很聪明，却也是个傻瓜。在这件‘永世不变’的事情上，大伙都一样。都是人嘛……”

“兹金，你是鸡蛋里孵出来的哲学家！”麦热宁抓住不放说，两颊侧鼓起了许多小疱块，遮盖了脸上的粉刺。“这种情况让笨驴去考虑吧，它们的脑袋大……在柏林，我也有过一次，像傻瓜一样虚惊了一场，吓得毛发直竖。在那个地铁旁边……那条街叫什么来的？菩提树大街，^①小伙子们，你们还记得吗？德国鬼子机枪手从阳台上朝十字路口猛扫，不让人喘一口气。我一看，是在二楼，就冲上楼梯。嗨，原来是幢住房，电铃，门牌都有。我用肩膀一撞，他妈的，门就开了。第一间屋里铺着地毯，摆着家具，一个人也没有……摆了一桌子吃的喝的，有酒瓶、罐头，是一套很大的公寓。机枪声停了，屋里死一般的寂静。我手指扣着扳机，蹑着脚在各个房间里走了一圈，最后一间房门关着，我推了推。突然听到背后一个人的声音：‘咕—咕，咕—咕！……’我心想，麦热宁，你这下可完蛋了，彻底完蛋了！我像猛兽一样转过身去，打了一梭子弹。我发现，原来是只布谷鸟从钟里跳出来，咕咕、咕咕地叫着，我就朝布谷鸟，朝自鸣钟，朝墙壁，朝镜子打了几梭子。它还在跳，我就朝它这狗东西穷打，直把它打个稀巴烂！哎，那时，真吓得我够呛。兹金，在对付拉稀的德国鬼子这件事上你竟拿鸡笼架上的哲学来糊弄我！老家伙！你妄想进天堂，兹金，依你呀，你还得给打死的德国鬼子供蜡烛呢！反正我们要在地狱里见面的，你的大炮打死了多少德国人？啊？”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你白白把钟和镜子打坏了。”兹金颇明事理地发表意见说，又卷了一支烟，“麦热宁，鬼附到你身上了，在耍花招啦！”

“至于说到耍花招嘛，这说对啦！”麦热宁眯着眼，挺直强壮结实的身躯像公猫似地伸了个懒腰，弄得骨头格格作响。“我对耍花招这个工作挺喜欢！唉，弟兄们，在战前我可不是这样的，我是公认的劳动突击手。常常一回到家，一头倒在枕头上，就睡得像死人一样！老婆当然有意见啰，说：‘彼金卡，看来，你的神经还算没毛病吧。’‘神经？’我说，‘我早就把我的神经换成拖拉机备件了。’这样一来，还有什么爱情可言呢？用起重机也甭想再提起来啰！可是在战争时期，这又怎么说呢，这儿倒可以大显身手。弟兄们，战争结束了，咱们还会想起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呢！……”

“我就是这么说呀，有鬼钻进你肚子里，吃你呢。”兹金又说了一遍。

“整个吃不下，还有剩下的！”

麦热宁像平时那样压倒了兹金，完全控制了全排一致的意念。他乐滋滋地伸伸懒腰，眯着眼睛望望五月的阳光，抚摸着挂满勋章的挺起的胸脯，他是一个诸事顺遂的美男子。由于他的无所顾虑的骁勇，由于他能说会道，由于他在战斗中不寻常的走运——他和他的炮班简直像有护身符一样，从白俄罗斯边界到这儿没有遭受到一点儿伤亡，——因此他的许多事情都得到原谅了。在战斗中和他在一起挺自在，也挺可靠，他在先遣部队里不管处在什么情况下都平安无事。令人奇怪的是他生活在战争中毫无顾虑，他坚信自己总是福星高照，而且不止一次得到命运的爱抚，因此他很清楚自己在炮兵连里的价值。

“喂，小伙子们，你们瞧啊，塔特金会计是我们老粗中的一把利斧，是不是啊？”麦热宁接着又说，向一旁的塔特金挤挤眼，逗

得士兵们都乐开了。“瞧他一言不发，双料乖巧，一声不响，心里有数。看来是个内行，可千万别……他下工回来，看见路上有一个粗腿美人儿，就盘算着到树丛里去，马上像只公鸡似地围着团团转。红头发的人，全是机灵鬼，对小娘儿们的危险分子，就像恶魔似的！是这样吧，塔特金？我说得对吗？”

“斯拉夫人，留点儿神啊！”不知谁哈哈大笑起来，喊着说：“塔特金可以撑得下三盘稀饭，再加半个大面包，呼噜呼噜喝个精光，好大的胃口！”

瘦弱矮小的塔特金，食量惊人。不管有多少，也不管什么时候都吃得下。甚至有时夜里站岗，还啃着储存的面包干，像只饥饿的老鼠在黑暗中咬得吱吱咯咯直响。此刻，在众目睽睽下，他还在不停地咀嚼，尖瘦的狐狸似的脸变得深沉、严肃起来。

“中士同志，我想，”他的红眉毛朝麦热宁动了动，“这些钱嘛，是不是吃过早饭后，到哪家店里去试探试探？”

“聪明人，你懂德国话吗？你打算怎么交谈，打手势还是眨眼睛？”兹金问道。

“这种事，不用开口都明白。钱嘛，……它自己就会说话。”

“塔特金，我喜欢你那精明的脑袋。你还是坦白交代，你恐怕胡搞过吧？”麦热宁还是揪住不放，“看来，你做过巡回演员，是个美男子！高个儿、宽肩膀，一个劲儿地拉着手风琴，奏华尔兹！我从各方面看，你是个地地道道的能手！”

“从来没这么想过，”外貌一般的塔特金拘谨地垂下好像晒褪了色的眉毛，他的天使般温和的性格，使他既想参与又不想参与眼前这场舌战，这样的舌战老是针对着他，在排里经常发生，为了给大伙逗乐。

“撒谎，塔特金，你在大放烟幕！你说说吧，我们洗耳恭听。等会儿我再讲一段有关日托米尔的有趣的故事，尽管中尉差点

儿把我送交军事法庭！是啊，过去的事，不过是场笑话。中尉同志，当笑话给大家讲讲，行吗？您不会怀恨我吧？”

麦热宁非常不合时宜地提起日托米尔的故事，那是很久以前在那边发生的一件不愉快的事件，尼基金不愿意提起它，因为它似乎是针对他尼基金的，是针对他当时被麦热宁所识破的丢人的缺乏经验。

“提日托米尔干什么，中士？完全是蠢事！”尼基金生硬地说。说过之后，感到自己在麦热宁的目光下脸上热辣辣的。麦热宁那像女人一样浓密的睫毛天真而好奇地微微颤动了一下。

“那就不讲这个，中尉，是吗？坏事我是不记得的，只记得那是有关娘儿们的事，”他说，“战争时期的娘儿们，也是一种礼品，或是战利品，我是这样认为的，说句老实话……”

“我正好要讲讲战利品的事，”尼基金打断对方的话，他对自己说话的嗓音生气，也对自己看重麦热宁提到日托米尔的事而生气，“我正要讲讲缴获的这些钱。”他说的完全不是他该说的。“兹金说得对，要这些钱干什么？我们到德国来，是为了当商人吗？手表，这是另一回事。麦热宁，把手表分给没有表的人，让大伙儿站岗值勤时知道准确时间。至于钱嘛……我们又不开什么店，又不做什么买卖。哎，塔特金，把这些帝国马克数一数（干吗我要讲数数帝国马克）。最好这样：麦热宁，要不，统统烧掉，要不，就上交给团部，免得使人受骗上当。我不愿我们排陷入做商人的愚蠢境地！”

尼基金明白，他这项命令会激起麦热宁的怀恨，有伤他的自尊心，同时也会引起士兵们不满，会说他排长夺走他们过几天快活日子的希望。但他不由自主地下了命令。大家都静下来了，小心翼翼地瞅瞅他，又看看麦热宁。麦热宁咬紧牙关，用虎视眈眈的目光直刺尼基金的脸上，傲慢地冷笑了一声，终于开腔了。

“明白了，中尉。按命令办事，我们遵命。”

麦热宁立即哗的一声推开椅子，站起身来，挺直了匀称漂亮、肌肉发达的身躯，走到桌下的袋子跟前，拖出袋子，扯开拉链，以故意引人注意的、不经意的神气往塔特金面前的桌子上一倒，倒出一堆扁平的小盒子和一叠叠已经散开的新钞票，命令说：

“谁没有表的，来挑吧，别害怕！塔特金，把钱数一数！中尉有权先挑最好的！”

“不用。我的表还能用。”尼基金嘴上答着，心里马上想到自己这块旧表，还是在戈麦尔附近那场几乎兵不血刃的战斗以后，在军官避弹所拣来的，已经被塹壕里的尘土和硝烟弄得表面发黑。不换一块，也太死心眼了。

士兵们听了麦热宁一声令下，都活跃起来，在桌旁你推我挤，都想在挑选这些外形像玩具的小盒子上碰碰运气。正在这当儿，一排长克尼亚日科中尉走进了饭堂，他在门口就喊道：

“二排同志们，你们好！尼基金，你好！吃过早饭啦？怎么不喂猫啊？”

这位克尼亚日科中尉非常年轻，腰肢细得像妇女，军便服改得很合体、笔挺、紧贴身躯，武装带交叉着紧束在胸前。一双绿眼睛像少女一样温柔。每当他在排里出现，就给人以一种柔弱、明亮的感觉，像一道光芒投射在绿莹莹的水面上。然而这种感觉是一种假象。克尼亚日科稚气的脸上时常显出高不可攀的、生气似的执拗的神情。他的到来，他的声音、眼神和潇洒的身影的出现，就像夏天的一阵凉爽的穿堂风，使尼基金精神为之一爽。克尼亚日科出身于莫斯科一个教授的家庭，原在大学语文系学习，家住湖岸街。他熟悉尼基金居住的彼亚特尼茨卡亚一带的胡同，但他们彼此从未在莫斯科河南岸的马路上见过面，直

到一九四三年年底他们才在前线交上了朋友。克尼亚日科中尉是从后方医院被派到他们炮兵连，继任牺牲了的一排长的职务的，当时他还瘸着腿。他原在步兵部队，在德聂伯河一带指挥过一个连，由于负伤，腿瘸了，不适合在步兵部队，根据他个人的要求，调到师的炮兵连。

“一排同志来看我们，那应该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尼基金答道，因为克尼亚日科的到来而高兴，体验到一种异样的、隐秘的感觉，宛如在一个遥远的七月的清晨，置身在莫斯科河南岸的小胡同里，阳光照着篱笆和马路上的杨絮。“安德烈，你好！怎么回事，你从哪儿弄来的猫？”

“你还问从哪儿弄来的呢？二排同志，这未免太不像话啦！猫在你们跟前都快饿死了，你们是怎么搞的？”

克尼亚日科中尉像平时一样，穿着整齐，军服上没有一个褶皱，浅色头发梳成分头，光滑发亮，微微突出的胸前挂着一长串闪闪发亮的勋章，皮靴亮得像镜子，一点土也没有。不平常的是在他弯着的手臂上，像在庆典队列中捧军帽那样捧着一只蓬松的满身尘土的猫，他还抚摸着它那眯缝着眼、伸在他肩头的肮脏不堪的脸。

“你知道吗，它怪可怜地蹲在屋子旁边，苦凄凄的，在啃咬青草。”克尼亚日科说，“尼基金，你还迟疑什么？乌沙季科夫，快给它点稀饭，像给士兵那样，要不，我就带回自己排里去！”

他放下手上的猫。那猫立即仰天躺下，露出细毛下垂的干瘪的肚皮，接着又撒娇似地在被皮靴踩脏了的地毯上擦擦背部，猫爪懒洋洋地动着，像是邀请克尼亚日科跟它继续玩下去。

“我的上帝，你瞧，多好的一只猫！”乌沙季科夫哎哟一声笑起来。他刚才还为手腕上增添了新手表高兴，一转眼就把手表的事忘掉了。“是德国猫吗？小咪咪，小咪咪……瞧，瞧，它的两

只爪子在干什么？它听得懂俄国话吗？怎么对付它呢？”

“只有讲纯粹的法语。”克尼亚日科一点不笑，掸掉衣袖上的小细毛说，“德国猫照例都受过法国贵族式家庭的训练，但现在它对俄国稀饭也不会嫌弃的。明白了吗？”

“是，我一定认真喂养，中尉同志……嘿，多好的猫！”

乌沙季科夫瞪着温柔的蓝眼睛，胳膊猫的肚皮，它还在玩，动弹了一下，轻轻用爪子碰碰他。他蹲着，眨眨眼，细声细气地唤着猫：

“咪咪，说啊，说啊，来，来，^① 我给你吃稀饭……站起来，好，好，^②……多神气的猫啊！”

“您把它搞昏了。”尼基金忍不住笑了，“大概，德国猫就懂得一句通用语，咪咪，咪咪。您试试看。如果它听不懂，您把德语会话手册拿来。”

“中尉同志，它大概会听懂的，咪咪，咪咪，咪咪！”乌沙季科夫温柔地说，蹲着往后退，逗着猫。“过来，过来，我给你找个碗。过来，过来，到墙角这儿来，不然，一不留意皮靴会把你踩死的……”

“安德烈，有什么新闻吗？”尼基金问，“司令部有什么消息吗？至今毫无动静吗？”

克尼亚日科中尉掸尽了粘在军便服上的细毛，斜睨了一眼上面堆满帝国马克钞票的餐桌，看了看塔特金正在全神贯注地把一叠叠钞票一排排整整齐齐地摆起来，又看了看围着麦热宁还在挑选手表的士兵们的兴奋的脸，说：

“一切如常。没有任何命令。真有意思，尼基金，你们在哪儿没收了一家银行？”他的问话中带有讥讽的味道。不过他的绿

①② 原均为德语俄译音。

眼睛仍然是严肃的。“在柏林？还是在柯尼斯多夫？”

“我们日子过得真是不坏，中尉同志！”麦热宁在推推挤挤的人堆中高声答着。“但愿别人不要忌妒。院子里设备齐全，药房里还有电话呢！请您收下一件小礼物吧，保管可以用一年！”

“这类值钱的东西你们有很多吗？”

“大伙儿足够了，有一车皮外加一小板车呢。中尉同志，请收下这块扁表吧，戴在手上可以看看，还有秒针呢。”

“德国东西我一概不要，”克尼亚日科冷冷地回答。“据我所知，麦热宁，这应该归埋葬队去处理。”

“这都是新手表，像刚从店里买来的，中尉同志。不是从手上抹下来的！”

“反正一样。”

“是一是。”麦热宁迟疑地拖长了声调，“这是两厢情愿的事。人各有所好嘛。我们中尉也是一个讲究原则的人。记住了！”

他眯着眼睛上了发条，听听手表，扫兴地把手表当啷一声扔到桌上的一堆小盒中间。

“这就好极了。”克尼亚日科转向尼基金，“我看，你吃过早饭了吧？我们到大炮那边去走走吧。今天天气真好，完全像夏天了。”

“这天气真是美极了。”尼基金表示同意说。他戴上昨天洗干净的船形帽，吩咐麦热宁说：“如果司令部来电话，立即向我报告。”

“别去搞贵族的那套派头，当然这办法想得不坏，”克尼亚日科在门口朝蹲在饭堂角落的乌沙季科夫点点头说，后者正专心致志地把士兵们盘子里吃剩的小米粥刮在一只德国饭盒盖上喂猫。

早上,德国外省小镇的街上静悄悄的。街道一侧被太阳晒得很热,背阴的一面仍然凉意袭人,还带一点春天的湿润。在这凉爽的空气中,特别浓郁地飘送着早丁香甜蜜的芬芳,洁白盛开的花朵沉甸甸地垂挂在铁栅栏上面。这一阵阵飘扬在郊外小镇人行道上空的醉人的芬芳,和意外地出现在这些静谧街头的部队的炊烟以及汽车夹着尘土的汽油味混杂在一起。这些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停在微湿的马路两旁。

这座宁静的小镇早已醒来,瓦顶鲜红,松树干被染上金色,从院墙里传出为团里事务忙碌的司务长们官气十足的声音,还有早饭后洗碗时勺子锅子碰撞的叮当声。从郊外果园深处隐隐传来后勤车队马达的响声。教堂附近的广场上和小巷周围出现了三五成群的士兵,全是春季服装,没穿军大衣,也没穿棉袄,在马路当中来来往往,饶有兴趣地张望着荷兰式门灯下小旅馆的不认识的招牌、理发店镜子橱窗里的妇女发髻和门户紧闭的酒吧间垂下的百叶窗。他们坐在石板上和教堂光滑的台阶上,舒舒服服地休息,抽抽卷烟,晒晒太阳,聊聊天,偶尔抬头看看沐浴在温暖的蓝天中的哥特式教堂高高的尖顶。

“快乐的小镇。”克尼亚日科说,他比尼基金更频繁地向迎面走来的士兵还礼。“人们曾经过着舒服的日子。总之,五月真是个美妙的季节啊!”

尼基金问:

“你能不能告诉我,老百姓都到哪儿去了?都躲在地窖里吗?全都藏起来了?还是像我的房东那样,都逃跑了?”

看来,这是一座典型的疗养城镇,清洁、舒适,像洗涤过的一样。镇上有许多小商店、餐室、酒吧间和小旅馆。柏林人大概都到这儿来消夏休憩。可是现在听不到一句德国话。尽管士兵占用了民房,和房东住在一起,到处窗户上依然都遮着窗帘。只有

当附近响起汽车的马达声或是炊事车的叮当声，马路上传出士兵的大笑声或是讲话声时，窗帘的一角才偶尔小心地微微掀动一下。

“我看，德国人不再指望温克^① 的神兵去拯救柏林了。不过，他们仍在恐怖中等待着什么。”克尼亚日科答道。“至少，我的房东吓得要死，只剩一口气了，走路踮着脚尖，低声低气地说：‘希特勒完蛋了。’他们对士兵们拼命巴结讨好，把我当将军一样阿谀奉承，甚至把什么难吃得要命的蹩脚饮料当做‘咖啡’送到我的床头。他们一定认为，他们正在经历一场成吉思汗的浩劫。但德国人毕竟是德国人。实力！实力！他们拜倒在力量面前。”

“我感兴趣的是我的房东溜到哪儿去了。”尼基金说，“什么都留下了，就是没有人。”

“喏，给你看个亚利安人种的代表，真是说到就到。”克尼亚日科皱着眉头，说：“好像有点喝醉了。”

铁栅栏后面的洁白的丁香花盛开着。在映有栅栏条纹阴影的石板路上，一个上了年纪、满脸通红的德国人，穿一身黑衣服，趑趄着迎面走来。他忽然止步，老远就抬抬帽子，露出宽宽的深红色的秃头，没有把皱巴巴的帽子戴上，就恭恭敬敬、奴颜婢膝地鞠了一躬，结结巴巴地说：

“早上好，军官先生，早上好……俄国人好，希特勒完蛋了……全部……斯大林好，希特勒坏，完蛋了。”^② 尼基金和克尼亚日科还没有走到他跟前，他就带着醉醺醺的丑态重复着这套背得滚瓜烂熟的话。接着，他的红脸上的深皱纹带着谄媚的神

① 德国法西斯集团军司令。希特勒濒临灭亡时，妄想他能挽救自己。

② 此处原为德语。

情抖动着：“请原谅，军官先生，请您给我一支烟。俄国香烟好……伏特加好……”①

“你带烟了吗？”不抽烟的克尼亚日科严肃地问尼基金。“给他一支吧。这个亚利安人，他从哪儿学会的这一套？我看是斯拉夫人显示了宽宏大量的缘故。肯定是这样。”

“请，”②尼基金打开一包缴获的香烟。德国人仍然没有戴上帽子，小心翼翼地用指尖抽出一支香烟，哼哈起来，馋涎欲滴地闻闻香烟。于是尼基金说：“拿几支吧……哎，见鬼，德语这怎么说的？请吧，您可以再拿几支，请吧，请吧！”③

“噢，只要两支，非常感谢，非常感谢。”④德国人感激地说，仍旧那样小心地取了第二支烟，仔细看了烟盒，故意装出莫名其妙的神气喊道：“噢，是‘约诺’，德国香烟，谢谢，请原谅。军官先生，希特勒完蛋了！再见……”⑤

德国人把帽子戴到汗涔涔的秃头上，在栅栏旁站了好一会，然后转过身去，露出假牙，陪着笑脸，目送尼基金和克尼亚日科走去。

“俄国人好，伏特加好。”⑥原来如此，”克尼亚日科说，他边走边抬起体操运动员那样灵活的身体，从栅栏外面摘了一枝丁香，吸了一口饱含清凉露水的花香，这香味一直飘到尼基金身旁。他马上又严峻地动了动柔滑的眉毛说：“我想谈谈，瓦吉姆。我不清楚，为什么把我们调到柯罗斯多夫来。我想，不会那么简单。柏林战役后，连里有一种反常现象，似乎战争已经结束，人人都变傻了。司令部没有任何指示，整天闲着无事。昨天夜里我去查哨，那位可爱的哨兵不在岗位上，原来他正躺在沙发上做

①②③④⑤ 原均为德语。

⑥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他小子的太平梦，还直喷着唾沫呢，这真是太出格了！既然这样，明天起我就开始抓紧全连的队列训练。哪怕以此使大家振作一下，以此把斯拉夫人拉回到这块罪恶的土地上来也好。不然的话，我们会在这儿变成可怜的小牛犊。”

“对。”尼基金说，“我排里也有这不好的迹象。不过你知道吗，我自己也老是觉得一切都结束了……”

他们都默不作声。马路正中走过一队工兵，传来一阵笑声和口琴的吹奏声。

“依我看，你那个麦热宁，一头栽到战利品里去了。”克尼亚日科把丁香从右手换到左手，向迎面走过的士兵们回礼。其中一个快乐的、有一双调皮的眼睛的士兵用口琴使劲吹着《卡秋莎》。“他对所有的人都压。你发觉了没有？”

“是的。不过他是个出色的炮长。”

“他是个自由派，十九世纪的律师。”克尼亚日科说，“我看不出你这样有什么高明之处。你是排长，在一切尚未结束之前，你应该影响你的士兵……”

“你真的认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

在拐角上有一家店门关闭的酒吧间，陈旧的招牌上画着一头狗熊，熊掌里捧着一杯泡沫四溢的啤酒。他们两人从这儿拐到侧旁的小街上。那儿挤满了炮兵的后勤汽车、卫生营的大车和马车。人行道两旁植着老松树。他们两人穿过松树黄色的阴影，走到街道的另一头。前面豁然开朗，宛如掀掉屋顶一样。田野上空，蓝天如同海波，晴空清澈明朗，耀眼夺目，高空中飘浮着春天淡淡的烟云。嫩绿的草地一望无际，在阳光下泛着光亮。草地中央镶着一个湖，如同一面椭圆的银镜，边沿伸展到郊外，湖岸沙滩像疗养地的海滨浴场。从眼前直到天边，处处是一派温暖的五月晌午的景象。

“我认为，”克尼亚日科若有所思地说，“如果我们变得软弱无力，我们将不能原谅自己。”

第三章

这个远离前线、十分平静的小城还在实行灯火管制。夜晚，楼下既像工作室又像图书室的大房间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大伙坐在里面兴高采烈地喝着司务长从柏林仓库里搞来的巴伐利亚啤酒，狂吸着缴获来的淡而无味的烟卷，没完没了地聊着天。

这里人声嘈杂。桌子上面点着一盏绿玻璃灯罩的煤油灯，颇有家庭风味，使人感到有些异常。油灯在袅袅不绝、浑水似的烟雾里摇曳着，像一只磷光闪烁的水母，在古色古香的、闪闪发亮的书脊中间晃动。书籍周围悬挂着鹿角和灰暗的图画。画面上一座座朦胧不清的中世纪城堡，犹如昏暗的峭壁，耸立在乌云下端。

晚饭后，曾在施普累河西岸手臂负伤的炮兵连长格拉纳图罗夫，这个二十五岁、声如闷雷的彪形大汉，由阿克肖诺娃少尉军医陪着，出人意料地来了。大汉扯开嗓门说，他在卫生营里想念他的鬼炮兵弟兄啦，碎麦粥真吃腻啦，于是就和加洛奇卡溜上街来啦，请大家接待他们这两位客人吧，当然啰，如果这儿的人还当他是连长的话。大家聊起白天发生的事情，格拉纳图罗夫立刻就从谈话中知道了缴获帝国马克的事。因为尼基金禁止使用，这些钱现在全都成了废纸。格拉纳图罗夫大为开心。他想了片刻，建议拿这些钱来打牌，为了好玩，每人发十张千元票面

的帝国马克，来打二十一点，看看在爱情上究竟谁走运，谁不走运^①。他向加丽雅和矜持的克尼亚日科中尉使了个眼色，提议：

“加洛奇卡，请您也试试您的运气，来和我们一起玩吧。看看在这种场合女人怎么个走运是挺有意思的。”

“干吗？您想让我丧失女性的特点吗，格拉纳图罗夫？”加丽雅坐在书架旁的皮沙发上凛然地说，“这对您并没有什么好处。”

“我的运气就像一个被淹死的人。”麦热宁叹了一口气，一面把一扎一扎钞票从袋子里取出来摆到桌上，“真想再到卫生营去一次，少尉军医同志。”

“那不用说，肯定会发生想象不到的事情，会有人端着碎麦粥跟在您脚后颠来跑去，可怜的卫生营呀。”她的嗓音是低沉的胸音，夹着隐隐的嘲讽语气，因此，要不是她那娇嫩的鹅蛋脸和被乌黑的头发、眉毛衬得娇嫩白皙的前额，她就会显得过分严厉，不像是女性了，卫生营的医生护士和士兵们在一起时，态度总是这样生硬，毫不客气。

“好啦，我们玩牌吧！”格拉纳图罗夫命令说，“别扯了，斯拉夫人！注意！^②”

麦热宁第一个做庄，他洗牌的时候把干净滑溜的纸牌弄得噼啪作响，然后开始发牌，纸牌上通常的杰克改成了两个希特勒的头像。

“书籍、鹿角、古老的版画，甚至还有壁炉，”加丽雅一边说，乌黑的眼睛一边环视着房间，盯着克尼亚日科和尼基金看了好久。“不知谁家的舒服生活被俄国人破坏了……我可以想象得

① 西方谚语：“赌场得意，情场失意。”格拉纳图罗夫在这里就是用的这句谚语的意思。

②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出，他们会多么害怕我们，仇视我们。尼基金中尉，是您自己把您的排安排在这儿的吗？”

“正是。”尼基金说，“房子空着，没有主人。”

“克尼亚日科中尉在隔壁的房子里吗？你们彼此紧挨着？”

“大概是吧，”克尼亚日科冷冷地答道，“我的排大概就住在隔壁的房子里。”

“炮兵排总是挨在一块儿住的，您该知道这一点，加洛奇卡！”格拉纳图罗夫抓起麦热宁摔到桌上的一张牌，开心地笑了，声音像洪钟。“又来一张，好啊……又是一张好牌。是啊，命运是只小锅，生活就像三弦琴。唷，胀死了！中士，瞧你样样事都走运！可我一下子就输了五百！你这鬼东西真走运！你来试试，看克尼亚日科中尉的运气怎么样。”

“这我不否认，听人说，我妈是把我生在树皮鞋里的。”麦热宁因为一上来手气就好，十分得意，理好庄家的增高的钱堆，又噼啪地洗起牌来。“据说，从前剥削者拿女人赌输赢。您下多少，中尉同志？您一定会毫不费事打满分的。三点，七点，爱司……您要打暗牌吗？”他问克尼亚日科，忽然又扬起眉毛，有些生硬而又温情脉脉地看了加丽雅一眼。加丽雅靠在沙发上，草绿色的呢裙紧裹着并紧的膝盖，皮靴闪闪发亮。“哎，加丽雅，如果您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人家把您给赌输了，您该怎么办呢？我倒挺感兴趣的。”

“暗牌？不要。”克尼亚日科还没有翻开桌布上的牌。他听了加丽雅短促的笑声和她嗓子里的胸音，他的脸似乎拉长了。

“您真会开玩笑，麦热宁！可是我毫不开玩笑地告诉您，您是一九四五年的中世纪封建主。如果您把我赢了去，那可不得了，我就会在枕头底下放一把锋利的匕首。”

“这么说，您会把我杀死。下得了手吗？”

“一秒钟也不会犹豫。”

“中士，别作声了，快赔上个笑脸，懂吗？”格拉纳图罗夫兴高采烈地喊起来，健康的右手从挂在皮带上的剑鞘里拔出一把缴获来的银光闪闪的短佩剑，在空中画了一个圈。“要不要送给您，加丽雅，以防万一？……”

“十七点。”克尼亚日科无动于衷地说着，摊开了自己的牌。“您多少，麦热宁？”

“十九点，中尉同志。”麦热宁朝牌吹了一口气回答说，洋洋得意地笑了。“您输了！我可没做手脚，正大光明。唉，就是在情场不走运……”

“克尼亚日科，你念念，刀刃上刻的什么字？”格拉纳图罗夫把佩剑扔在克尼亚日科面前的一叠帝国马克上。“这儿就你一个人能弄几句德语。语言这玩意儿算是和我无缘！给大伙儿念念吧！”

“Blut und Ehre.”克尼亚日科皱着眉头读了冲压在刀刃上的字，接着翻译说：“布卢特，意思是鲜血，挨雷，意思是荣誉。”

麦热宁像精于此道的老手灵活地重新洗起牌来，把精光溜滑的纸牌弯成弓形，理齐，拿在手里准备发牌，一面得意洋洋地笑着，若有所悟地说：

“一般说来，佩剑总意味着成功。就像我们常说的，‘不胸佩勋章，就血染沙场’。中尉同志，您怎么样？想赢吗？来暗牌吗？”

“发牌吧。”尼基金说，“我无所谓。全部下注，怎么样？”

“麦热宁，你是个爽快人，没说的！”格拉纳图罗夫以一个漂亮的动作把佩剑插回剑鞘。“我的朋友们，这玩意儿是在柏林施普累河畔的‘希特勒青年夏令营’的营部得来的。说得对，鲜血和荣誉，说得多带劲。正因为这样，我才建议送给加丽雅。来点

啤酒吗，克尼亚日科？”

“不，不喝。”

“请原谅，我忘了，我们在我们这儿是烟酒不沾的。道地的清教徒。坦克钢板，钢筋水泥！”

他在桌上找到一瓶开了塞的酒，炽热的黑眼睛含着好奇的疑问神情，从头到脚打量着加丽雅。加丽雅脚上穿着窄窄的皮靴，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格拉纳图罗夫笑着问她：

“您和我们在一起不感到无聊吗，加洛奇卡？”

她早就没有注意任何人了，仿佛心不在焉地坐在书房的古老的沙发角上，一只拳头支着腮帮，另一只手翻着膝盖上的书，细棉布的封面使这本书显得沉甸甸的。她那雪白的额头低垂着，双眉严肃地联成一条黑线，脸上现出一种新的、若有所思的、沉着而紧张的神情。

“加洛奇卡，”格拉纳图罗夫的声音低沉而温柔，巨人般的身躯转向加丽雅，“您干吗盯着书愁眉不展啊？来和我们聊聊，喝杯啤酒，一切都会正常啦。要是这儿有人使您感到拘束，别理他好了，一切悉听尊便，您终究是个军官啊，加洛奇卡！”

他说着，不时向克尼亚日科投过嘲弄的眼光。他刚讲完，克尼亚日科便带着厌恶的神情皱起眉头。克尼亚日科稍许有点瘦削，武装带系在微微鼓起的胸部，淡色头发仔细地梳成小分头。他口气冷淡，表示不满地说：

“您就不能不跟人纠缠吗，上尉同志？”

“你干吗发火，中尉？难道我得罪了你？还是得罪了加丽雅？”格拉纳图罗夫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真没想到，我竟成了无辜的罪人。”

“据我所知，”克尼亚日科不动声色说，“少尉军医不受炮兵连任何人管辖。她可以自行其是。您的建议至少使我觉得

可笑。”

“哎呀，中尉！哎呀，克尼亚日科，我还是那么喜欢你，我自己也弄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格拉纳图罗夫装模作样地哈哈大笑起来。“真的，我喜欢你，哪怕你是个糟透了的浑身带刺的犟小子！你给我说说，我们什么时候能用‘你’相称？或者你就是愿意用‘您’来称呼？”

克尼亚日科的脸上依然毫无表情。

“我不能完全像您对我那样地对待您，上尉同志。我觉得，按军阶称呼上级更方便些。”

“还没有忘记啊，克尼亚日科没有忘记他们两人之间过去发生的事，也没有原谅连长。”尼基金心里想，一面碰运气地摸起第四张暗牌。“不，他不知怎的比连长更不讲情面，更坚决。格拉纳图罗夫也清楚这一点，所以才不想当着加丽雅的面和他吵架。”

“不用说，我输了。真见鬼！”尼基金说着便把钱放到桌上一大堆钞票里，“你真走运，麦热宁。”

“我是在树皮鞋里生的，中尉同志，不是在城市里的地毯上长大的。”

“树皮鞋，这倒不错。怎么样，我们再来一次，试试不生在树皮鞋里会不会走运。”克尼亚日科忽然执拗地说，“不过，请注意，别搞鬼。发牌吧，中士。”

“你们注意到这间书房没有？”加丽雅问得似乎不合时宜，一双不含笑意的眼睛从书上抬起来。“真叫人想知道，以前是什么人住在这儿？他们逃到哪儿去了？大概每天晚上他们就是坐在桌旁这盏灯下，男的戴着睡帽，女的穿着睡衣，看这些古书的吧？我很难想象，他们对战争，对希特勒，对俄国人……是怎么想的。竟把东西全扔下，逃走了。”

“房子里空无一人。”尼基金证实说。

“空无一人……”她的目光扫了一下亮着灯光、落满灰尘的煤油灯罩，四壁装在粗大镜框里的图画，磨旧的皮沙发椅，窗上挂的红丝绒窗帷，摆饰着许多小巧玲珑的裸体女铜像的壁炉，接着又说：

“连灶神，供奉灶神的古罗马的贞尼都留下来了。您还记得吗，尼基金？我在学校读罗马史的时候就记住了。尼基金，在别人的、丢下无人管的房子里，您是不是常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忧郁感？抑郁而愁闷。”

“有什么好忧郁的？正常得很！”麦热宁用安慰人的口吻说道。他向一张纸牌吹了一口气，像变魔术似地把牌在自己鼻子上弹了一下。“这下子亏了，三点！……唉呀，看来，大大不妙啊！他妈的！……”

“灶神供奉者的故事我记不太清了。”尼基金答道。加丽雅那慢悠悠的、深沉的嗓音使他觉得，加丽雅这些话不是讲给他、也不是讲给格拉纳图罗夫和麦热宁听的，而是讲给克尼亚日科中尉听的。她似乎准备就这样和克尼亚日科坐在一间屋里，即使克尼亚日科通宵不理她也行。也许，这不过是尼基金的想象而已？……

“战争结束后，您嫁了人，也会安排这种阔绰而又舒适的生活，美极了！”格拉纳图罗夫眨眨眼，“到那时，我想上您那儿看看您。”

“是吗？”

“您不会赶我走吧？只消看一眼……”

“那可有得等啦。要等很久呢，上尉同志。”

“为什么要等很久？加洛奇卡，这儿就有许多您的崇拜者呢。您只消动一动小指头，他们就会拜倒在您的脚下。”

她冷笑了一声，心不在焉地翻着膝上的书。

“我选对象时十分挑剔，格拉纳图罗夫。您怎么也不会相信，居然会有这样不正常的女人。”

“哎哟，加洛奇卡，男人家也不会跪下来苦苦乞求的！”

“我非常讨厌男人。战争期间，他们真叫我烦死了。”

“您究竟爱什么人？爱女人吗？没有女人嫁给女人的，这是违法的！”

“我爱什么人，我要不要嫁人，谁管得着？天哪，多有意思！您非得知道这些不行啊？”

“讲这些废话太无聊！”克尼亚日科说道。他好像是由于习惯慢腾腾地翻开麦热宁发的牌，但他的双唇威严地紧抿着，这是他通常在尽量压抑内心愤懑时的样子。他接着说：“连长同志，您讲讲团部有什么新闻不更好吗？依我看，卫生营里听到的总比我们炮兵听到的多些。”

“新闻？”格拉纳图罗夫右手打开啤酒瓶，把酒杯凑到瓶口倒酒。酒杯碰着瓶口发出叮当的响声。“加洛奇卡，为您干杯！有什么新闻？眼下一切平静，我的朋友们。仗在西边打。而且是些零星战斗。柏林城下被击溃的几股残匪，在树林里一些地方流窜着。这帮匪徒显然是害怕被俘，可是这些鬼子又无处藏身。”

“算得多精！赢我两点！您算碰上了。这么说，您也是生在树皮鞋里的吗？啊？”

“生在皮袄里的，麦热宁，生在皮袄里。”克尼亚日科生硬地说，“我还记得穿着毡靴在地毯上走来走去呐。”

“克尼亚日科中尉事事如意，是团里头号的幸运儿。”格拉纳图罗夫发出低沉的隆隆声附和着。他整了整裹着绷带、吊在纱布挟带里的左手，纱布带压在肩章上。“对吗，加洛奇卡？要是

在一百年以前，他一定会当上骠骑兵。‘洁白的桌布，酒渍斑斑……’歌里是这样唱的吧？他也许会指挥一个骠骑兵团，而不是暂代我的职务。”

“我们该走啦，上尉同志。”加丽雅啪的一声把书合上，放回书架上。“我作为医生，有责任提醒，您目前还在治疗期间。”

“加洛奇卡，好宝贝！”格拉纳图罗夫表示反对。“回卫生营？放着好酒不喝，去听病房的人打鼾？我受不了，都厌烦死了，说不定我会把他们全都给毙了，我受不了！”

“您受不了，那就留下吧，呆到明天早上也行。今天我同意您。可我还有值班任务。还有，请……我想把话说在头里。我早已不是小姑娘了，因此我请任何人都不必送我。”

“您确实该走了。”克尼亚日科看也不朝她看一眼，冷冷地说。

“您说什么？一个人走？深更半夜的？在德国的城市里？”格拉纳图罗夫轰的一声推开座椅，高大的身躯挺现在桌子上方。“我改变我的决定，加洛奇卡，我这就……”

“不。”克尼亚日科的语气冰冷冷的，“城里有巡逻队，完全用不着担心，上尉同志。”

“可不是嘛。”加丽雅点点头，紧张地、令人难受地轻声笑起来……

一排长克尼亚日科中尉和军医阿克肖诺娃相互之间的秘密关系，炮兵连里谁也搞不清楚；谁也没有看到，他们俩在炮兵连以外的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相会过。大家先只是猜想，后来才证实，半年前在普鲁士边界他俩就认识了。当时，克尼亚日科腿部中弹负伤，在炮兵团后方医院住了十天。他显然是提前归队的，人变瘦了，性格变得孤僻了，走起路来还瘸得厉害。有时，在准备进攻的行军途中，可以看到一辆画着红十字

标记的救护车挨着大炮,一位细眉毛、黑眼睛、脸色白皙、娇小瘦弱的女军医,小小的船形帽下面露出乌青的头发,毫无笑意地走近一排的大炮,和拄着拐杖的克尼亚日科并排走上一段路。这时,克尼亚日科便露出一副严峻冷漠的表情,好像硬憋住一肚子不满,使人看起来觉得奇怪。女军医严肃地向他提一些问题,显然都是与他的腿伤有关的,可是他难得答上几句,态度冷淡,有礼有节,公事公办,似乎急不可耐地巴望她快些走开。医生在炮兵连没待多久。此后克尼亚日科只字未提她来过的事,在士兵们好奇的目光下皱起眉头。士兵们怕惹他生闷气,什么话也不敢说出声来。有一次克尼亚日科不在场,亲眼目睹路上这种相遇的格拉纳图罗夫便怀着醋意、兴高采烈地说,我们的中尉一定是个不可救药的童男子,要不就是怕女人,死神的可爱的助手^①真是找错了对象,“白跑腿”。

“要是这样的话,您自己就该去插上一脚。对年轻女人就该老钉着她,上尉同志。”麦热宁眨眨眼睛,根据自己丰富的经验给他出了个主意。“身边放着这样的尤物,错过机会真是罪过!老天不容许的。好东西放着不用就是糟蹋浪费。”

后来,格拉纳图罗夫在施邦道堡附近受伤——炮击时,泥土压到观察所上,他受到轻度震伤,——住进了炮兵团卫生营。一周后,他回到连里,声若洪钟,后方医院的伙食使他格外身宽体胖。他带回许多罐头和三瓶伏特加,这是他好不容易从认识的侦察兵那儿搞来的。他一回来,马上就把连里的军官和士兵叫到自己的掩蔽部,说是“为浪子回家洗尘”。他兴高采烈,一对乌溜溜的眼珠含着神秘的表情,意味深长地扫视着军官们的脸,看着滴酒不沾的克尼亚日科的脸。当麦热宁另有含义地怂恿他讲

^① 战争中开玩笑指医务人员为“死神的助手”。

讲“后方卫生营有什么别的新闻”时，格拉纳图罗夫便有些得意忘形地看看军官们，又故意忸怩作态，压低声音说：

“不好说，弟兄们，说了你们也不会信的，你们会说我放毒的……”

“上尉同志，别吊胃口啦！”麦热宁催促着，“我们都在后方待过的。关系断了，是吗？”

“那好吧，弟兄们，事情是这样的，”格拉纳图罗夫装出一副不得已的样子，终于开口道：“卫生营驻在后方一个德国小镇上，收拾得干干净净。病房里有电灯、有暖气、干净的床铺，伙食按规定，甚至还发给缴获来的果酱和咖啡，生活就像童话里讲的一个样，前线与你毫不相干！我受的是震伤，小意思，能走动，简直像在疗养地休养。弟兄们，后来我认识了一个女人，她那体形、胸脯，那一双小脚、一对沉思的眼睛，一句话，真是像天上的天使，貌比塔玛拉女王^①。每天早上她来量体温，照例总要问：‘您感觉如何？’‘要不要给您拿本书来看看？’叽叽喳喳，讲这讲那，一五一十，东扯西拉。总之，我看有苗头。后来，有一天晚上，她值完班，我送她回家。她住在德国人的住宅里。到那里一看，是个小单间，有地毯、窗帷，摆着一张大床，很幽静。房东是德国人，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都不声不响的，听不到他们一点声响。一切都是那么洁净、明亮和舒适。‘请坐。’她说。我就坐下来，盯着她，心里在打主意。她很快走到碗橱跟前，原来还有酒喝哪！是药用酒精。我喝了，她没有喝，坐在那儿若有所思地瞅着我。好，我想，情况很清楚，就是说，无须准备就按常规转入进攻。当然，她小声地说：‘不，不，不要这样。放开我，把手拿开。’她脸色苍白，牙齿格格发抖，可是却把我往床边拉，并解开了自

^① 莱蒙托夫的《恶魔》的女主人公。

己的扣子……我们躺下来，我熄了灯，弟兄们，这样就开始了——一千零一夜。《十日谈》！中士，您看过这本书吗？”

“上尉同志，这么说就上手啦？”麦热宁打断话头，表示怀疑。“跟小说里描写的像极啦。不过，书里往往两个人顶呀磨的要很长时间，最后才被力量征服。可您，一下子就……”

“胡说八道！完全是胡扯，连长。”尼基金不相信，他突然感到一种病态的敌意。“快承认，这是您在卫生营里闲得无聊编造出来的。”

“我骗人？”格拉纳图罗夫龇牙露齿，恶狠狠地问：“说我骗人？请看，这是她送我留念的照片！”

他那炽热兴奋的目光直盯着置身谈话之外的克尼亚日科，一边从军装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丢到桌子当中。

“现在可怎么说？”

就在这一瞬间，克尼亚日科中尉面色惨白，霍地一下跳起来，在一片寂静中胸前束紧的武装带咯吱一响，右手以极快的速度伸向胯部，从狭窄的皮枪套里抽出一支重型手枪。格拉纳图罗夫像大象一样吼起来：“你干什么？你要干什么？把枪收起来！听到没有？放下！……”就在这一刹那，似乎有一种面临危险的下意识力量，一种要出事的预兆，把尼基金抛向克尼亚日科的身旁。格拉纳图罗夫的两手猛的一推，桌子摇晃了一下，只听见一片玻璃被打碎的声音，桌面上的罐头间突然有什么东西流了出来。尼基金清楚看到克尼亚日科的与众不同的、稚气未脱的脸上一片苍白，他那没有血色的嘴唇断断续续地迸出一句话：

“上尉，如果您不为您的这些下流话道歉，我马上把您当作下流坯毙掉！”

“把枪放下，安德烈，听见没有？把枪收起来，听见没有？”尼基金声音嘶哑，不停地喊着，接着又愤怒地转向格拉纳图罗夫：

“立即道歉，连长！听见了吗？”

“告诉你，我是说着玩的！你不懂吗？”格拉纳图罗夫气也透不过来地喊道，“开玩笑你都不懂吗？”

“愚蠢的玩笑！”克尼亚日科口齿清楚，毫无妥协之意。他避开尼基金，轻轻地把枪塞回咯吱咯吱作响的枪套，不知为什么用手指摸了一下头发，快步向堑壕走去。

掩蔽部里一片寂静。兹金上士阴郁地蹙着眉头，在膝盖上卷烟卷，可怎么也卷不起来。麦热宁一动不动，在军官们冲突时他一言不发，既不惊讶，也不害怕，仿佛非常懊丧地专心致志地在研究从翻倒的酒瓶中流到桌面上的一汪粗制白酒。他闻着酒香，打量着打开的罐头。格拉纳图罗夫坐在铺板上，出着粗气，用手帕擦着溅到脸上的酒。尼基金骤然对格拉纳图罗夫的歪斜的小连腮胡、对那像圆木一样的粗脖子和咝咝响的呼吸声产生了憎恶，他恶狠狠地问格拉纳图罗夫：

“连长，您为什么要在这儿无耻撒谎？什么鬼迷了您的心窍，让您胡说八道？”

“疯了！……真是神经病……”格拉纳图罗夫呼了一口气，使劲咽下喉咙里不知是笑还是哭的咕噜声，“你看，一条小疯狗！……”

“这样你们两个勇士会死于非命的，上尉同志。”麦热宁满不在意地说，一边在罐头堆里乱翻。“真可惜，酒都白白流光了。”

“您想从克尼亚日科身上打什么主意，连长？您为什么要瞎说？”尼基金从桌上抓起浸湿了的照片。“上面没有签名。这么说来，这张照片不是人家送给您的！”

“不关您的事，您别多管闲事！”格拉纳图罗夫冒起火来，从尼基金手里夺过照片。“克尼亚日科中尉跟这些事有关，——是谁，还不明白？他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他把娘儿们搞得神魂颠

倒，自己还装得若无其事。得了！我不愿意为了娘儿们生闲气。我有没有耍弄她，这可是秘密，绝对的秘密！”格拉纳图罗夫用鼻孔抽了一口气，手指有力地把照片撕成碎片甩到桌上。“哎，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呀，也太娇贵了，太神圣啦！”

……一排长和连长之间这场很可能是不可挽回的冲突，使尼基金了解到许多事。但是，克尼亚日科当着格拉纳图罗夫的面，对加丽雅这种彬彬有礼的冷淡，而加丽雅对克尼亚日科这种公事公办、生硬冷淡的态度却能逆来顺受，这种反常的难解的现象，以及尼基金目前还未能全部了解到的详情，使尼基金更为惊奇。

“不，上尉同志，”克尼亚日科以惯有的固执的声调重复说，“您不必去送阿克肖诺娃少尉军医啦。如果您和我们再坐一会儿，我倒很高兴。”

“我的天哪，您说什么来着？”加丽雅笑着嚷道，“这有什么含义吗？”

“我连里有三剑客，三剑客！阿托斯、波多斯和……还有一个是谁？别对我下命令啦，您真使我奇怪！”格拉纳图罗夫出人意料地和气地大笑起来。“告诉您，加丽雅，克尼亚日科中尉赌起来赌注可大哪，只要一落到他的手心，管叫您想起亲娘来！”

“说对了，上尉，我们来大赌一场，我全部下注。”克尼亚日科慢悠悠地说，“您下多少，麦热宁？”

麦热宁一边洗牌，一边眯眼望着那堆帝国马克。

“八万五千，中尉同志。一下子？全部下？想连根刨吗？”

“我说过了，全部下。”

“想赢吗？”

“希望如此。”

“其实他根本无所谓，输赢都不在乎。”尼基金心想，他怀着焦虑不安的、猜测的神情凝视着格拉纳图罗夫和加丽雅。他觉察到，克尼亚日科和连长之间的针锋相对的对话中有一种明显的做作，但他清楚知道，克尼亚日科和格拉纳图罗夫不同，他不善于装做一个和气的、爱说笑的人，一个容易息怒的，在必要时让别人和自己皆大欢喜的小伙子。这是他过人的地方，也是他的弱点。

“莫非他又在这儿考验自己的意志力吗？”他想。

他看到过几次，在坦克开始发起进攻时，克尼亚日科脸上带着顽强坚定的神情，直挺挺地站在大炮旁足有五分钟之久，身旁不断发生爆炸，弹片呼啸着掠过头顶，他连腰也不弯一下，只是面色苍白地看着坦克射击的火光，仿佛用这种难以解释和并无意义的冒险行为，在全排人面前考验自己的命运。尤其难以解释的是，在他跃入指挥壕后，却几乎怒不可遏地冲着电话喊叫，让各班不要把自己当射击靶子暴露在坦克面前，然后对尼基金说，现在他可不害怕啦。直到战斗结束他表面上始终很镇定。

“我要走了，炮兵们，我向你们告别了。”加丽雅迟疑不决地说着，并打开像信封一样叠得好好的雨披披在身上。“我把格拉纳图罗夫留下，一切都会顺顺当当。卫生营不远。”

“加洛奇卡！”格拉纳图罗夫像小丑一样伤心地喊起来，“您究竟要我们怎么样？一个漂亮的俄国女人……深更半夜的一个人走？在异国的城市里？”

“我什么都不怕，格拉纳图罗夫。德国人是不敢强奸俄国医生的。晚安，炮兵们。”

这声“晚安”是对大家说的，这时尼基金多么希望克尼亚日科哪怕能看她一眼，放下这毫无意思的牌戏，说点什么，至少向她点点头也好。可是他只看到，克尼亚日科的毫无表情的眼睛

神秘莫测地盯在着迷的麦热宁慢悠悠摔到他面前的牌上。仿佛他根本没有听到格拉纳图罗夫低沉的油腔滑调，没有听到加丽雅冷嘲热讽的回答，他安坐在桌旁，像一个整整齐齐、身穿改制合身的军官制服的聪明孩子。灯罩里射出的绿光，透过袅袅的烟雾照亮了他整齐的小分头，照亮了他绷紧的武装带，照亮了柏林战役后戴在他簇新肩章上的闪闪银星。

“常来玩，加丽雅。”尼基金说，他突然对克尼亚日科很恼火，一面把加丽雅送到门口。

她停下脚步，系上雨披的带子。乌黑的头发呈三角形从船形帽下面垂下来，衬得她的脸颊分外白皙。她双唇含着歉意伤心地动了一动，她的语调抑制得过分平静低沉，她小声地说了一句：

“这儿惟有您一个人爱我，中尉。”

他懂得，她说的不是这个词的直意，而是另有含义——包含着伤心、友谊和感激之情。他懂得这一点，皱了皱眉，笨手笨脚地打开通走廊的门。

“加丽雅，欢迎您常到我们这儿来玩。”

“哟，多好的小猫哇！这是打哪儿来的？”她在门口发出一声惊叹，拉开雨披下摆，弯下腰，一把抓住那只蜷缩在漆黑走廊的门坎边的、睡眼惺忪的癞皮猫。在这儿可以听到从各个房间传出来的士兵们的鼾声。“这是谁的猫？德国人的？真逗人！我有一百年没见过这样的丑东西啦。”

她像抱孩子似地悬空托着猫，猫儿伸直了瘦长柔软的身子，肚皮上的奶头发灰，脚爪很长，眼睛在亮光下眯成一条缝。加丽雅深棕色的眼睛高兴地瞅着猫儿邈邈的嘴脸。后来她笑着把猫脸偎着自己的脸颊，偎着自己美丽的乌发，深受感动地对尼基金说：

“还在打呼呢！天一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啦……也许不久前生过小猫，它有小猫吗？也许是一只孤零零的猫，无家可归？”

“不了解，”尼基金答道，“是克尼亚日科中尉今天早上把它带来的。我想，是在院子里捡来的吧？”

“克尼亚日科中尉？”加丽雅极为兴奋地脱口而出，她一遍又一遍亲昵地抚摸紧偎着她下巴的猫。“我可以把它带到卫生营去吗？”

“您要这只邋里邋遢的德国猫干吗？”尼基金说，但是他的声音被格拉纳图罗夫的假装不满的、闷雷般的声音盖住了：

“要这只又瘦又脏的可怜东西？还带到卫生营去？您看得上这个干瘪的东西？”

他从桌旁站起来，皮靴咯吱咯吱地响着，走到加丽雅身旁，高耸在加丽雅面前，他那笨重的身躯，那从上朝下俯视的、黝黑没有光泽的、生着一圈络腮胡子的脸和那响亮的嗓门，立刻使人感到又窘困又不舒服。他说：

“让它见鬼去吧，加洛奇卡，您想弄一身跳蚤啊？真的，您找的是一只快要见上帝的癞皮猫，根本不值一看！”

“您到底答应不答应，中尉？”加丽雅问，她的眼神黯淡无光，手指越来越慢地抚摸着灰猫。尼基金对克尼亚日科死不吭声感到生气和恼火，就急忙说：

“要是您喜欢的话，就拿去吧，别问了。”

“我说，快扔掉这只癞皮猫吧，它会给您传染上毛病。”格拉纳图罗夫的声音柔和低沉，露出一口洁白发亮的牙齿。“您想养猫的话，明天我的侦察兵可以到城里各个地方去找它五只、十只、二十只头等纯种猫，装在口袋里给您送去。”

“真的吗？二十只？能搞到一百只吗，上尉同志？”

“只要您下命令，保证完成任务。一百只各种各样德国种的

猫就会在您的脚边转来转去，加洛奇卡！您把它们养在卫生营，老鼠就会光剩下一条尾巴啦！”

她皱着眉头抬头看了看向她俯身的格拉纳图罗夫，看了看他洁白耀眼的结实的牙齿，急忙把猫放在地板上，脸上露出厌恶的敌意，说：“得了，别再装出一副丑态了！”接着，一阵风似地掩上雨披，走进黑暗的走廊。走廊里空气窒息，令人昏昏欲睡，熟睡的士兵们发出喃喃的梦呓。尼基金跟在她后边，默默送她到门口，并穿过院子里的小草坪来到木栅门口。门旁的哨兵一动不动，用呵欠被打断的声音问道：“是中尉吗？”月亮还未升起，只有公园附近教堂后面的东方有一小片余辉，透过松枝之间洒落到地面上。夜晚的街道万籁俱寂，静悄悄的铺路条石在充满暖意的霞光的映照下闪烁着橙黄的光辉。篱内散发出湿润清新的丁香的芳香。尼基金站在矮篱笆的阴影里，又一次提议：

“我送您到卫生营吧？”

“不用了。我一个人走。我想一个人走走。再说，您说有什么人、什么东西好让我害怕的？”

她转过身，走到他跟前。在这悄无声息的夜晚的宁静中，她的脸靠得特别近，白皙的脸颊，乌黑的发梢，格外黑白分明。此情此景使尼基金再次痛苦地想起了一件事。这事没发生过，但又很可能发生过。“这件事”像小铃铛在他头脑中叮叮地响着；他仿佛站在一些遥远的小巷中间，月色灿然，地上纵横着各家木栅栏的阴影，栅栏里散发出白天积下的热气、被阳光晒热的木板气息和大门口四月泥土的潮气。他默默无言，百感交集，喉咙里一阵抽搐，竟连一句“再会，常来玩，别跟格拉纳图罗夫计较”的告别的话也说不出。他从加丽雅闪烁的眼神中发现，她的目光越过他的肩头，注视着一弯微泛红光、略带暖意的新月从教堂后面的树林上空冉冉升起。

“多美的夜色啊……您记得吗？‘星星和星星在低语……’还有一句更妙：‘万籁俱寂，大漠荒原聆听着上帝的音韵。’”加丽雅喃喃地说，“我们离家多么遥远……一切又使人多么忧伤。说来说去，我是多么蠢哪！……您帮不上我一点忙，对吗？可我始终不明白，我为这事生气，我嘲笑这件事。多蠢哪，老天！”她拽了拽雨披的带子说：“但是没关系，中尉，这种事固然令人厌烦，但我对付得了，我对付得了的。我要像修女一样清心寡欲，忍饥挨饿，还要每天早上用冷水浇身……我要吃黑面包使自己消瘦。我要跪着祷告。对了，从小没有人教过我祷告，这真糟糕！我怎么办呢？我究竟怎么办呢？故意怄气去爱上格拉纳图罗夫吗？”

她异样地笑了起来，声音痛苦而顽强。尼基金从她的笑声和颤抖的眉毛中仿佛看到了眼泪，但是她那在近处黑暗中闪烁的眼睛并没有泪水，充满热情，不知为什么倒像在笑一件本来并不可笑的事，这是一种不会造成死亡的意外情况，是她没有碰到过、但别人却碰到过的荒唐事，她以前甚至无法想象这件事会和自己有关。

“为什么她跟我说话如此直率？”尼基金心想。加丽雅的有失尊严的坦率和她的强颜欢笑使他局促不安。

“这种事我搞不清楚。”他说。

“要搞清楚什么？为什么要搞清楚？难道这还需要去搞清楚吗？唉，我尽向您胡说些什么哟，中尉！”她说，头向后退。 “怪我自己不好……您去玩牌吧，男子汉的这种游戏要比女人的废话重要得多。祝您晚安，尼基金。”

“再见，加丽雅，明天来玩。”

“现在还说不准，中尉，也许会来。”

尼基金听见，雨披擦着围墙窸窣窸窣，沿着垂在人行道上的丁香花丛渐渐模糊、远去。皮靴后跟在石板路上发出清晰响亮

的响声。他关上栅门，这时才担心人们对他的不在会有什么想法。他踏着草地小径向哨兵走去。哨兵在屋子旁边不停地倒换着双脚，睡意朦胧，呵欠连天，不时传来牛叫似的咳嗽声。尼基金用命令的语气说：

“哨兵！马上到马路上去站五分钟，直到阿克肖诺娃医生走到去卫生营的岔路口为止，以防万一。”

“是！中尉同志。”哨兵应声穿过草地，一边咳嗽，一边满含睡意地喃喃自语：“唉，这夜晚，星星也出来了，就跟我们俄罗斯一样，连月亮也升起来了。这种夜晚对士兵不合适，脑袋里会胡思乱想……”

“你说什么？”尼基金问。

“遇上这样的夜晚，在乡下就要出来遛达啦。姑娘们唱歌，田野里静悄悄的，只有长脚秧鸡发出断断续续的叫声……该回家了吧，中尉同志？”哨兵停了半晌，充满幻想地低声说道，“我站在这里想，大概快了吧，该结束了。我这是讲笑话吗？我们现在在德国的中心，什么时候回家呀？嘿，天上的月亮多美啊！”他又说起来，赞叹地凝视着树梢上一片血红色的明亮的月光。“春天啦……该回家啦，回家啦……”

“是啊，是啊，我们驻扎在德国，现在又是春天啦。”尼基金感到一股兴奋的暖流涌遍全身，充满了青春的活力，又仿佛孩子们流下幸福的眼泪一样，感到如释重负，心头轻松。这些日子，他似乎头一次这样十分明确而清醒地想到：“是啊，是啊，确实是春天啦，战争快要结束啦！”

月亮在影影绰绰的教堂左侧冉冉升起，爬上了松树枝梢，从烧红的天空中露出脸来，猛然反射在钟楼高处的玻璃窗上。一堵石墙冲着月色发出亮光，突现在木栅的浓影中。街上月光如水，显得越发神秘，衬得公园里的黑暗更浓。几道天蓝色的清光

横在隔壁瓦顶的屋脊上，尼基金站在沉睡的院中，屋前的草坪，长长的黑影画出的直通栅门的沙铺小径——这一切在月影下，在充满青草气息的静止的凉意中，凝固了。

“可不，我没有负伤，没有被打死，我这一排人，不管怎么说，在柏林一战中就是运气好，其他都是小意思。样样都不错，样样都很好。德国也是春天啦，战争快结束了，德国小城的这个月夜多美啊！我二十岁啦，过去没有的一切今后都会有的……”尼基金想道，方才的那个小铃铛又在他心里叮叮地响起来了，令人感到甜蜜而又痛苦，就像刚才他在栅门边送别加丽雅，觉得她眼睛里冷淡的闪光落在他脸上时的感受一样。

这种青春焕发、充溢着宽恕一切的善意的感觉，就像从内心涌出的一股柔情，一种对某种新的、在童年黄金时代曾发生过、现在预料很快就会实现的东西的幸福等待；这种对生活中尚未经历过的事情的期待的感觉，为迎接战争为他安排的、没有体验过但又令人兴奋的命运的令人焦虑的准备，每逢部队开往陌生的城市（城里仍在燃烧，但尚未完全摧毁，屋顶浴着火光，马路上大炮轮子底下的鹅卵石泛着红光）；或是在潮润的树林边上，在烟雨朦胧中出现一座雨水冲刷过的孤零零的小别墅，似乎有人曾经在这儿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坚信过去那种生活是不可摧毁的，这儿还有年轻貌美的女子，很可能会在这温暖、愉快、亲切、舒适的环境里遇到他，并且爱上他——每逢这种时候，上面的种种感受就会显得特别强烈。

在急雨吹打风帽的簌簌声中，在脚踩烂泥的吱吱声中，在炮轮啞吸似的响声中，他眼前每每浮现出遥远的童年的梦景：一列离奇的火车，穿过茂密的草丛，行驶在被晚霞染成金色的温暖的草原上。他独自一人在充满美妙的淡紫色光线的车厢中，怀着一种纯洁、明快的心情，站在打开的车窗前，迎着芳香的微风，看

着这真正童话般的、非人间的荒漠草原，看着原生草丛中火星人的巨大模糊的黄色花球，看着它那笼罩着朦胧的灰黄色晚霞的地平线。地平线上，长满棕榈树的粉红色河岸上，神秘的小城影影绰绰，仿佛在用天国即将来临的诺言引诱着人们，使他当时只想长久地痛痛快快地哭一场。这样的草原在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过，他也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做过这个梦。但是他感到了这个梦，仿佛这是对他生活中一件无法实现的、幸福的往事的模糊的回忆，在他心中鸣响。

第四章

牌打完了。麦热宁输急了，满头大汗，随手把一堆帝国马克搂向克尼亚日科一边。克尼亚日科的手指插在武装带下面，连人带椅子一起轻轻地晃动着，心不在焉地望着上面，望着煤油灯灯罩。格拉纳图罗夫上尉敞开军便服，含混不清地哼着小调，一只脚打着拍子，眼睛盯着床头柜上的留声机（这还是炮兵连在波兰缴获的战利品）。值班通讯员在书架下的小矮桌旁睡得死死的，野兽般的鼾声时高时低，半边脸颊压着放在军用电话机上的船形帽。

“你真的送她去了吗？怎么样，尼基金？”格拉纳图罗夫怀疑地问，“真行，真有办法，骑士！你偷偷摸摸地干了吗？”

“我不明白您的意思，”尼基金说，“我就送她到门口，呼吸了一会儿新鲜空气。城里静悄悄的，夜色真美。炮兵连长，您干吗还开留声机？大家都睡着了，您会把战士们吵醒的……”

“‘卡秋莎’的炮轰也不会把他们吵醒，更不要说音乐了！这

些魔鬼的鼾声可以盖过五个留声机的声音——一点也不碍事！没关系，在歌曲伴奏下他们会睡得更香。”格拉纳图罗夫劝慰说，一边继续用脚打着拍子，一边开始选唱片。“这是用波兰语唱的……入暮时分，就是说，是黄昏时刻啰？这张唱片怎么样，尼基金，还不错吧？要不，来个探戈舞曲或是什么动人心弦的曲子，好吗？”

“就放这张吧，”尼基金建议说，他走近壁炉，碰了下小铜像。“别弄错了。”

格拉纳图罗夫放上唱片。唱针在唱片上开始发出啞啞声。他重重地倒在皮手椅里，压得弹簧咯吱咯吱直响。接着他又在椅子里挪坐得舒服些，放松吊着手臂的绷带，伸直双腿，露出一口洁白闪亮的牙齿调皮地笑起来，一边望着克尼亚日科和尼基金，一边说：

“我们的日子过得不错，斯拉夫人。豪华的住宅、啤酒、音乐，而且战争也不钉在屁股后面。啊，弟兄们，有多好呀！听着，我对你们说，俄国军官先生们，我们赢得休息完全是理所当然的，命运爱怜我们，让我们完整无缺地活了下来，总算还有条命可以带回俄国去。主要的是，脑袋瓜还在肩膀上。再这样休息和转它个把月，然后向后转，回斯摩棱斯克，回到亲爱的白桦树那里去！啊，弟兄们，这有多好呀！麦热宁！”他喊着，“让我们像贵族那样把这个壁炉烧起来！这里什么地方有柴吗？有音乐伴奏火会烧得更旺。我们赢得了生命，弟兄们！”格拉纳图罗夫又说。他把头向后仰，随着音乐的节奏用指甲敲着椅子扶手。

“有音乐，可舞却跳不起来。”麦热宁将整堆马克堆到靠克尼亚日科这一头的桌上，他因为输得精光而神情沮丧，拖长声音说，“别装蒜，您的钱。您赢得合法，可真捞了一大笔。您打算拿它们怎么办？”

克尼亚日科脸上依然是那副心不在焉的表情。他坐在椅子上前后晃动着，漫不经心地听着音乐，眼睛盯着前面的一个地方，沉默了一会，说：

- “扔到壁炉里去，拿去生火。”

“我不明白，中尉同志。”

“这样您可以安心些，麦热宁。用马克生壁炉，试试吧。”克尼亚日科若有所思地又说了一遍。“我要把这虚构的财富烧掉，这是从您那儿赢来的。”

“啊，您竟做出这样的决定。这么说，是为了免得魔鬼来迷惑您吗？那我们——干什么呢？我们来——烧吧！反正是有命令的！”

麦热宁狂热地表示赞同，量了一下离壁炉的远近，立刻把一捆捆帝国马克扔到炉膛里，接着把打火机凑近鼓鼓的一堆纸币，点燃了纸边。纸币碰到火苗慢慢地颤动着，发出簌簌声，纸角卷曲起来了，变黑了——于是轰地一下燃起了熊熊火焰，火光从下面映照着麦热宁的幸灾乐祸的脸。

“还有，”尼基金一脚把装着余下的马克的袋子踢向炉边，“全都扔到火里去。”

“要不要留着以备万一？怎么样？”麦热宁眯起眼睛望望书架，怀着希望问道。“看，燃料要多少有多少，够烧一年，还有剩的。”

“叫您怎么干您就怎么干呗，中士，把所有的钱都扔到壁炉里去！”

“哎，我真爱你们哪，俄国军官先生们，”格拉纳图罗夫声音轻柔地说，“我热爱和尊敬你们，魔鬼们……弟兄们，让我们来安安静静地听听唱片吧。静一会儿。”

房间里烟雾迷漫，带有一股暖烘烘的有点苦涩的灰烬味，脚

下开始感到热气。火苗在炉膛里旋舞。桌子上方绿灯罩下射出的亮光,令人觉得一种家居的气氛。壁炉火光和灯光将书架上的书脊染上金色。整座房子里寂静无声,只有那张旧唱片发出吱吱声响——一个女声用外国话唱着,唱的是,在迟暮时分别离后的痛苦而又幸福的恋情,以及对难期的相逢的狂热渴望。克尼亚日科连人带椅微微摇晃;他那窄窄的男孩似面孔引人注目,格拉纳图罗夫上尉脸色黝黑,长着弯弯的连鬓胡子,他半躺在安乐椅里,沉湎于深受感动的遐想之中,——一瞬间,尼基金觉得,这一切仿佛在哪里见过、在哪里发生过,好像很久以前就见过这些脸;很久以前,一千年前就曾坐在这样一个有着沙发、书籍、玻璃灯罩的异国人的房间里,也看见过格拉纳图罗夫紧偎在留声机近旁,听女声爱情歌曲的侧影,看见过他那悬吊在绷带上的手臂,还看见过克尼亚日科那双沉思的眼睛,看见过麦热宁蹲着从袋子里把一叠一叠的帝国马克拿出来扔到火里去。

以前,尼基金也曾有一两次发现自己有过这种模糊的感觉。刹那间依稀相识之感使他吃惊:这样的或者类似这样的情景曾经发生……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但是,在他的生活中从未见过类似的德国人的房屋,里面有藏书室和壁炉,壁炉里崭新的德国钞票代替木柴烧得旺旺的;世界上也从未有过这样令人难受的无尽的安宁,就像一分钟前结束了巷战,一种无声无息的沉寂突然在窗外降临,笼罩着夜空……

那个女声用波兰语唱完了歌,歌词是黄昏时刻她等着他,而他没有来,接着手风琴声发出颤音,自然地降下来,低下去。只有唱片旋转着,发出吱吱声。大家都默不作声,望着壁炉,望着在出奇的静谧中轻飘飘向上窜的红火苗。夜里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沉寂,因此反而使人有点担心这别是命运的骗局,别是离战火几十公里的一种虚假的希冀,似乎战争正用这无忧无虑、怡然自

得的两天功夫一步一步地狡猾地考验他们。唱针吱的·响,唱片停住不转了。于是,可以听到火苗飞舞的声音和烧着的纸在炉膛里发出的老鼠啮嚼的窸窣声。麦热宁一声不吭,只顾把帝国马克往炉膛里扔去。格拉纳图罗夫第一个醒悟过来,用挎带把手勒紧一些,在沉思中两道眉毛斜着联在一起;克尼亚日科现在不再晃椅子,带着疑问的神情斜睨了一眼拉上的窗帘。窗外夜幕沉沉,一片异乎寻常的死寂,院子里没有一点动静,像是施了魔法的凝滞的沉静,往往在月夜的前沿塹壕里才会有这种迷人的万籁俱寂。尼基金没有听到窗下哨兵走动的脚步声,心想:“他睡着了,还是怎么的?”

“怎么回事?谁在屋子里走动?好像是有人在找厕所?”突然,有着动物般灵敏的嗅觉和听觉的麦热宁压低了嗓子说,接着又警觉地离开壁炉转向军官们说:“嘿,又静下来了。简直就像死人在墓地行走一样……”

“查一下岗哨,麦热宁,”尼基金说,“不然的话,好像屋子里的人都死了,包括哨兵在内。”

“立即就查吗?”

“立即。出去看一下。”

麦热宁一出去,克尼亚日科立刻就站起身。他像平时那样整了整腰间的手枪,矫健而又利索地把身子挺得笔直,严肃地对尼基金说:

“我得回排了。岗哨最好每夜都查。”

格拉纳图罗夫上尉本来还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疲软无力的状态之中享福,这时他那大力士般的身躯在椅子上动弹起来,他伸了个懒腰,温和地说:

“别着急,克尼亚日科。岗哨不会出事的。你一走,我就冷清了。天哪!再坐一会做个伴吧。我真爱你,中尉,尽管我看得

出，你对我并不怎么样。君子不念旧恶嘛！弟兄们，还是再来一曲动人心弦的……”

但是他一句话没讲完，从头顶的二楼上就传来奔跑声和哑哑的叫喊声。楼上的门砰的一响，接着好像有什么厚厚的棉东西闷住了上面的声音。克尼亚日科扫了天花板一眼，一双平静的绿眼睛望着尼基金说：

“据我看，你的那些斯拉夫人碰到什么事了……你没听见吗？”

“你那里没有人把烧酒当白捡来的缴获品拼命地拿吧？”格拉纳图罗夫宽容地问，“会不会是打破酒瓶，这些鬼毛驴？”

“胡扯！哪里会有什么呢？”尼基金耸耸肩膀说。他很清楚，办公室的楼上就是他的房间，排里没有人住在他旁边。他不在的时候，没有事谁也不会到他房间里去。“等一等，我去看看就来送你。”他对克尼亚日科说，一边向门口走去。他对楼上发出的莫名其妙的响声和人声也感到几分不安。

走廊里静悄悄的，漆黑一片。可以闻到窒闷的木头味和战士的靴子发出的臭味。楼下房间里传出全排战士睡熟后发出的忽高忽低的鼾声、响亮的咂嘴声和含糊不清的喃喃声。木楼梯从厨房小储藏室后面走廊的暗角通向二楼。在那里的顶楼上听不到一点脚步声，也没有一点动静。

“麦热宁！”尼基金试着朝楼下空气污浊的黑房间里喊了一声，“您在哪里？……”

没有回答。

他等了一会，心里感到纳闷，沿着摇晃的螺旋梯摸索着向二楼走去。他在漆黑的楼梯口站住，凝听着顶楼上的动静。

一会儿，他就清楚地听到一声像是动物的拖长的哼叫声和从自己房间里传来的一声突然发出来的微弱的呻吟声。这声音

被一阵低沉的忙乱声和气喘吁吁的、沙哑的低语声压住了：“傻瓜，傻瓜，别作声，坏蛋！”尼基金全然不明白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是怎么一回事；不明白，谁会深更半夜到他房间里去。顿时一股热血涌上太阳穴，他用力推开顶楼的房门。

“谁在这里？……”他喊着。

月光射进宽大的窗子，照亮了半个房间。在打开的衣橱门的镜子里反射出一条蓝莹莹的光带。地板上一张翻倒的弯曲木椅旁乱扔着一堆揉皱的衣服，在房间深处的床上，黑糊糊缩成一团的身体乱动着，哼哼着，挣扎着，弹簧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在月光下，尼基金首先辨认清楚的，是一个高翘起来的圆圆的白色的东西，像是女人的膝盖，在被子上，在滑向地板的绒褥边向上翘着，来回动着。就从那里，从一堆黑糊糊的人体那边传来像是从厚厚的枕头下挤出来的被捂住的喊声：

“不，不，不！……”^①

“谁在这里，见鬼了！……”

尼基金害怕的是，他马上会看见自己排里的士兵偷偷地把德国女人拖到这里，拖到这个空房间里。这种揣测使他愤怒欲狂，他冲到床边，在黑暗中粗暴地抓住一个人的厚实的肩膀。霎时间，他听出了麦热宁的沙哑的、断断续续的骂声。麦热宁的方形的庞然的身体从床铺上跳开了。在斜射的月光下，他威势逼人地出现在尼基金面前。那幽灵般惨白的脸上，一双发狂的眼睛像玻璃球一样转动着，双唇发青，嘴大张着，发出一阵阵痉挛的呼吸。

“麦热宁！”尼基金绝望地喊着，“你干什么？发疯啦？”

“你别管，中尉……别碍事，中尉……”麦热宁冲着他的脸嘶

^① 此处原为德语。

哑地说，向他喷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马合烟味。“你别管！……走开！关你什么事，中尉？从这儿走开，走开，走开，我客气地跟你说！……”

在麦热宁射向尼基金的圆睁睁的目光中，在这癫狂的喃喃声中，赤裸裸地露出一一种狂兽般龇牙咧嘴的令人厌恶的疯狂的神情。心头涌起的一股反感和狂怒使尼基金火冒三丈，他用足力气将麦热宁从床边推开，喊着：

“你疯啦？这个德国女人是谁？她从哪儿来的？她怎么会在这里的？”

“女间谍，坏蛋，偷偷钻到屋子里来……”麦热宁嘎哑地说。像是想好了现在该做什么，他边吐着气边骂着娘，扑向床铺。那里一动不动仰面躺着一个女人，用枕头遮住胸部。麦热宁一把拉过枕头，紧紧抓住她的手，用猛劲把她从床上拖起来。“起来！……说！为什么钻到中尉房间里来？……啊？想偷军用图囊吗？说，恶魔，说，说，^①叫你说！”

他紧紧地抓住她，捏痛了她的手，痛得她一边弯着身子向后退，一边悲切地轻声喊着：“不，不！”^②月光下，尼基金看见她那弯着的脖子，苍白年轻的脸，痛得连眼睛也眯了起来，她那似乎有点发蓝的头发，难看地披散在一边。

“放开她的手！您干吗紧抓住这个小姑娘？您！中士！……”尼基金用激愤的声调命令说，“真见鬼，还说什么图囊？胡说八道，图囊一直挎在我身边！您怎么会在这儿碰到她的？她在这里干什么？”

“鬼知道她这个坏蛋是怎么到这里的……开了衣橱……挑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② 此处原为德语。

选东西……我一进来,她就企图开窗……”麦热宁放开德国女人的手,一脚踢散了地板上的女人的衣服,断断续续地说着。而德国女人像一只筋疲力竭的小兽似地突然背靠着墙,摇着头,上牙直打下牙,啜泣着,呻吟似的低声重复着:“不,不,不!”^①

“住口! 母狗!”麦热宁带着肆无忌惮的狂怒吼叫着。“像只手摇风琴似的,尽说‘不!’”^② 好好地说,为什么到这里来? 从哪里来? 怎么来的? ……”

“别嚷,麦热宁! 她不懂俄语,怎么回答您呢!”尼基金还不知道需要做什么,怎样做。他徒然费力地搜索着他记忆中所知道的德国话,终于说了出来:“您是谁,小姐?”^③ 就是说,您是谁……从哪里来? 您是谁?^④ ……”

德国女人的双齿发出很响的声音,颤抖的身子在屋角蜷缩着。她用微弱的吞咽声回答了一句尼基金听不懂的话。他只听懂了其中一个词“房子”^⑤,于是又严厉地问:

“房子? 您是谁? 为什么要房子?”^⑥

“中尉! 你听到了吗?”麦热宁突然喊起来,奔向窗口,用拳头猛击叮叮作响的窗框,窗子被打开了一半。“好像是警报!”

这一刻,窗下面人声鼎沸,传来了纷乱的脚步声。接着响起了刺耳的喊声:“站住,站住,我要开枪了!”——枪栓咔嚓响了一下。屋旁又是脚步声、奔跑声。突然,红色的火光闪了一下,一声枪响震耳欲聋。接着,寂静中听到低沉的打人声,骂人声,一个人压抑的尖叫声。后来,格拉纳图罗夫的男低音在楼下开始大叫起来:

① 此处原为德语。

②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③④⑤⑥ 原均为德语。

“哨兵！把他带来，带来！是什么人？要是还活着，就把他拖来！……”

“啊，库尔特！库尔特！”德国女人嚎叫着，像一个挺直身子的影子冲向窗口，向下探出身子，像孩子似的瑟缩着，上气不接下气地嚎啕大哭：

“别开枪！库尔特，库尔特！^①……”

“麦热宁，把德国女人带下去！快！”

尼基金下了命令后，就沿着螺旋梯向漆黑的楼下跑。下面房间里传出了被惊醒的战士们乱哄哄的惊惶的说话声。黑暗中他碰在什么人身上，好像是跳到走廊里的睡眼惺忪的乌沙季科夫（“警报？德国鬼子？”）。尼基金看见客厅的门大敞着，门外人影乱动。他只觉得胸口憋得难受。每当碰到情况不明，形势发生无法扭转的闪电式的变化时，他常会有这种感觉。

当他进去的时候，克尼亚日科和格拉纳图罗夫已经站在房间当中。他俩脸色阴沉，神色紧张，一会儿望着激昂的哨兵（他还端着卡宾枪防备着），一会儿望着一个干瘦得不像样的十六岁左右的德国男孩。他戴着眼镜，穿着一件肥大的不合身的德国制服。制服脏得要命，搭拉在瘦削的肩膀上，腰里还烧了个洞。细瘦的腿上穿着沾满尘土的大皮靴，靴筒像喇叭口似地张开着，显得很怪。可以看出，他的膝盖一阵阵抖得很厉害。他那士兵的裤子的膝部鼓了起来。

男孩吃力地呼吸着，舔着满是裂纹的嘴唇。额头被湿糊糊的头发遮住一半，汗涔涔地，额角晶亮。好久没有洗过的脸上翘着一个尖尖的、死人般蜡黄的小鼻子。

^① 此处原为德语。

“喂？”格拉纳图罗夫声音低沉地问，他走近德国人，用那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从上到下打量了他一下。“你这个骠骑兵，武夫，是从哪里冒出来的？是狼人吗？说呀！武器在哪里？把他仔细地搜一搜！”他命令哨兵，“全身都搜一搜，明白吗？把他里里外外翻一翻！”

哨兵把眼睛一瞪，做出严厉可怕的样子，把卡宾枪甩到背后，开始搜德国人的口袋，还将口袋翻过来检查，同时，又像开机关枪似地解释着：

“我在站岗，月亮正好升起……我听见屋外有沙沙的响声。我想，大概不是猫就是狗，或者是自己人出来解手，这是很平常的事……一看，屋后的苹果树下有一个人影站着，好像是望着上面的窗口。眼镜在月光下一闪一闪的！……不对，我想，我们排里从来没有戴眼镜的。我就从屋角跳出来，喊着：‘站住，不然我要开枪了！’他就逃，我朝天放了一枪就去追他，赶上他，把他打翻在地，压在他身上。而他，这个恶棍，还尖叫着，咬我的手！当然，我就敲了一下他的脖子……”

哨兵一样一样地把东西放到桌上：肮脏不堪的赤褐色手帕，士兵用的打火机，一包揉皱了的“约诺”烟，一堆油腻腻的粘满饼干屑的手枪子弹，一张用玻璃纸包起来的小照片以及口袋里所有其他的東西。哨兵认真地在大衣下摆上把手擦干净，带着一副证据确凿的样子给格拉纳图罗夫看了看手腕，忿忿地说：

“用牙咬住我的肉不放，德国壁虱！看来，他是从树林里来的狼人，密探，必定是来刺探情况的，蛇崽子，装得倒像个小娃娃！”

“全在这儿吗？”格拉纳图罗夫问。他居高临下地看了下德国人垂下的头。“这么说，没有武器。喂，哨兵，好好检查检查抓住他的那个地方。也许，那里还会留下什么东西。”

“是！马上去。”

哨兵从德国人身旁走开，然后，使劲蹬着厚油布高筒靴向门口走去。当他走到门口碰到麦热宁时，慌忙退在一旁，让麦热宁过去。麦热宁咬牙切齿地将一个几乎是小姑娘的、非常年轻的德国少女推进房间。她没有戴帽子，穿着撕到大腿的脏得吓人的连衣裙，神色惊慌。女人好像是通过架在深渊上摇摇晃晃的横木，用尽最后的力气要在致命的高度保持平衡，因此，从没有扣上的连衣裙领口里露出来的凸现的锁骨很刺眼。她那咬肿了的嘴唇像伤口似的发黑。她一看见德国男孩，便气喘吁吁地低声喊起来：

“库尔特，库尔特！……”

她用手掌捂住嘴，绝望地倾身向前，好像在压抑着自己的恸哭。库尔特弓着背，把肮脏的鸟脸似的小脸转向她，蜡黄的尖鼻子上的眼镜光摇曳不定地闪动着。他没有说什么，只是吃力地吞咽了一下——喉结动了一下。

尼基金还记得在被褥上扭动的白膝盖、闷声闷气的“不”^①的喊声。他望着这个披头散发、因为惊恐万状而显得难看的年轻德国少女，望着这个拱肩曲背、瘦得不成样子、一身怪诞的武夫装束的德国男孩，望着不知为什么深夜跑到这里——他的排占据的屋子——来的这两个人。他越来越清楚地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关系。于是，他急忙赶在麦热宁解释之前说：

“连长，在我的房间里发现一个德国女人……”他讷讷起来，没有讲出麦热宁的名字，免得现在不适时地涉及使情况复杂化的枝节。“首先应该弄清楚……不明白，为什么她要在衣橱里取衣服……”

^① 此处原为德语。

“她？在你的房间里？”格拉纳图罗夫说。他那双探究的眼睛火辣辣地盯着德国姑娘。“要是连这只脏猫居然也是女间谍的话，那她又是怎么会偏偏到我们这里来的呢？这样吧，审问他们，马上审问！弄清楚：他们是什么人？谁派他们来的？有什么目的？克尼亚日科中尉！……”他威严地望了一眼在这场谈话中一声不吭、皱着眉头的克尼亚日科中尉，像要发火似地补充说：“我们这里就你懂德语，来吧，你审问他们，来吧，克尼亚日科，开始吧！”他还是用那种命令的口吻催促着，语气中好像已经尝到这场严酷娱乐的乐趣，也显出他是一个履行自己职责的老练人物。“干吧，我来提问题。马上一切都会搞个水落石出。会开口的，坏蛋，会滔滔不绝地讲个没完！”

克尼亚日科皱了下眉头。

“我完全知道该提些什么样的问题，这是第一；第二，咱们什么时候改用‘你’来称呼的呢？是今天吗？”

“算啦，算啦，别生闲气啦！以后我称‘您’，行了吧！”

“谢谢。”

克尼亚日科中尉显得冷淡而固执。武装带和腰带束得紧紧的。他走向俘虏，立即说起德语。他相当平静地一会儿对瘦得出奇的少年，一会儿对年轻的德国姑娘说着德语。尼基金听懂了他熟悉的一个词“Name”，知道这是问姓名。他看见，德国姑娘的目光中充满了惊恐，浮肿的双唇微微张着。她用微弱的低语回答说：

“爱玛……长官先生……”^①

少年默不吭声，艰难地咽着唾沫，好像空气不能从他胸中挤出来似的，喉结穿梭似的在喉头上下动着。格拉纳图罗夫从克

^① 此处原为德语。

尼亚日科背后俯视着他，用手指朝他肩上重重地戳了戳。

“怎么，变哑巴了，小崽子！你叫库尔特！是吗？您问他，他是不是从狼人那儿来的？是不是从树林里来的？那里有多少人？”

但克尼亚日科冷冰冰地打断了他的话：

“我说，上尉同志，如果您再打断我的话，用手指戳俘虏，我就停止审讯！”

“得啦，得啦！”格拉纳图罗夫不满地咕噜说，“装成彬彬有礼的人多得很，我见过。如果我们落入他们的魔爪，他们会怎么对付我们呢！会放火烧死！”

“水龙带通到鼻子里，还不准你哭！”麦热宁断然地插话说，“德国女人就是那么个家伙。瞧，装得像只母山羊。女间谍，母狗！”

他在德国姑娘后面踏着脚，一双迷茫的眼睛在她那蓬乱的头发、窄窄的胯骨和腿肚丰满、踝骨纤细的两腿上转动。看来，他既不想怪咎自己，也不想轻饶这个不漂亮的女人在顶楼房间里的反抗和她那透过厚枕头的喊声。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因此，现在要用恶狠狠的语言和目光向她报复，这一点尼基金是明白的。

“在楼上他向我胡说了些什么呢？”尼基金想。他害怕回忆起自己在顶楼上内心的那种一片漆黑的感觉。“我能指责他什么呢？指责他企图强奸这个女人吗？但是，他并不怕我，因为谁都没有看见，而且谁都不会同情德国人。难道我同情她吗？”

房间外面一楼的走廊里，传来了嘈杂的人声和走来走去的声音。门开了一点儿，门缝里伸进四炮长兹金上土的苍老严肃的脸。他闷闷不乐地报告说：

“巡逻队到我们这里来了！问是谁开枪。现在一起来了！”

“尼基金，去跟他们说说，”格拉纳图罗夫命令说，“用不着多罗嗦，别声张，我们自己会弄清楚的！”

尼基金走到走廊里。放在衣架下托架上的德国式油灯冒着黄色的火苗。两个房间里也点着油灯，惊动起来的士兵身影在墙上晃动。门旁站着三个穿雨披的陌生人的黑影，他们的武器闪耀着暗淡的光泽。其中一个人立即向尼基金走来，从帽子来看，是个军官。他干瘦，身板笔直，正言厉色地问：

“你们这儿为什么要开枪，中尉同志？是谁开的枪？”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尼基金回答说。他考虑到，要是解释详情，就会使一切复杂化，就会过早把喜欢追根问底、好吹毛求疵的警备司令部引来干预炮连的事。“是哨兵太卖力了。我们自己会查清原因的。”

“深夜在德国城市里开枪，这可不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而是非常事件，”军官毫不让步地表示反对，“比如，昨天在树林里就有人朝参谋部的一辆车子打枪，你们是知道的。我们的一个战士被打死了，两名军官受了重伤。‘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事’，你们炮连的人都没喝醉吧？”

他那张严峻的、不那么年轻的脸上带着不信任的神情凑近尼基金，毫不客气地嗅着后者的呼气，然后又回头看了看士兵：他们已经一群群地聚在房门口，一致不友好地望着他。兹金上士带着忧郁孤僻的神气死盯着油盏的火苗。在别的上级面前，全排不约而同地用一致的沉默支持尼基金。尽管目前尼基金自己也没有完全意识到，为什么要对警备司令部来的军官撒谎，又为什么不完全相信巡逻队军官那种一本正经的态度，虽然就其职责来说军官是可以那样要求的。

“关于开枪，我们会弄清楚的，”尼基金说，“还有问题吗？我该走了。”

军官等了片刻。

“警惕，中尉，要十分警惕！您知道，在德国玩忽职守会导致

什么后果吗？”

“我们会十分警惕的。我们知道。”

巡逻队走出去的时候，哨兵侧着身子从他们身旁窜进来，忙乱地像楔子一样插在他们中间，差点没缠住军官的雨披，弄得那军官惊讶地踉跄了一下，他穿着靴子在走廊上跑得咚咚响，边跑边对尼基金说：

“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中尉同志！”

“您命也不要了！”尼基金拦住他，“屋子周围好好看过了吗？”

“我爬遍了所有的角落，中尉同志，什么东西都没有。”

“好，去站岗吧。别打瞌睡，明白吗？”尼基金想了一下，又对等着命令的兹金说，“没有发警报前，检查一下炮位那里的岗哨。”

饭堂里审问继续进行着。

德国少年低垂着小鸟般的头，结结巴巴地回答着克尼亚日科的问题。他的眼镜滑到汗涔涔的尖鼻尖上。谈话间歇的时刻，他畏怯地咽着唾液。他的样子依然是那么怪异、可怜、沮丧。克尼亚日科没有打断他的话，自己每说完一句，就专心致志地听他说。

格拉纳图罗夫用自己那只好手托住受伤的手臂，在房间里踱来踱去，跨步量着房间的大小。他那魁梧的躯体不时高耸在克尼亚日科背后，怀疑地发出“嗯”“哼”的声音，喉咙里发出的浑厚的哼哈声，他只是用这些声音来表示他怀疑、不相信德国男孩畏怯的嘟哝声。他觉得这些话不足为凭，正像男孩那一副俘虏的沮丧相一样可以欺骗他。麦热宁站在德国姑娘的背后，用蔑视的眼光从头到脚打量着她，看着少女大腿处被扯破的连衣裙。他这种明显是报复性的赤裸裸的轻蔑神情使尼基金非常反感。麦热宁在顶楼上发出的那种疯狂的、带着令人窒息的烟草味的

嘶哑声：“走开，中尉，走开，我对你说，别碍事，”还没有在尼基金的脑海里消失。

“大声点，小崽子！别磨磨蹭蹭的！”格拉纳图罗夫威严可怕地命令着，同时转向在他的命令下沮丧地低下头去的德国少年。“干吗讲话像老鼠钻在米里一样吱吱叫？克尼亚日科，问得具体点！他是不是狼人？是还是不是？”

一片肃静。德国少女啜泣着。她那睁大的眼睛里泪水满眶，现在睁得更大了。她凝视着格拉纳图罗夫烦躁而又严峻的脸。他的嗓音雷鸣般地又一次在房间里响着：

“问具体点，到底是不是？他是法西斯分子还是毛孩子？两人是怎么钻到这屋子里来的？”

克尼亚日科的脸好像痛得抽搐了一下，他声音平淡地说：

“别像在集市上那样叫喊……”克尼亚日科说得很平静，但语气中充满了隐隐的愤慨。“库尔特姓赫伯特，十六岁，一个月前被征入狼人，没有参加过战斗。顺便插一句，他的话是可以相信的。还有，库尔特·赫伯特是这个姑娘爱玛·赫伯特的胞弟。两人说的就这些。”

“弟弟和姐姐？哈哈！我们知道这种事！看来，还睡在一个被窝里呐。”麦热宁恶狠狠地说。但是格拉纳图罗夫执意追问的声音盖过了他：

“两人夜里怎么钻到这所房子里来的？有什么目的？两人有什么目的？”

“您怎么啦，是审问我吗？”克尼亚日科冷冷地反问。在他的眼睛里越来越流露出隐隐的愤懑。“是这样的，注意听着！爱玛·赫伯特和库尔特·赫伯特声称他们是这所房屋的主人。你看，找到主人了。”克尼亚日科朝尼基金微微笑了笑，接着又说，“他们和爷爷三人住在这里。照我听懂的意思，他爷爷是个退伍

上校。爷爷是上校吗？^①”为了再一次弄准确，他用德语很快地又问了他们两人一次。年轻的德国姑娘好像非常匆忙地向他点了下头，表示回答。同时，她怀着希望用讨好的语调低声说：“是的，是的，上校……国防军。”^②——“是的，退伍上校，七十五岁，一个月前离开了。明确地说，当然是躲到汉堡去了，离英美人近些。我想，大概是怕我们来。爱玛·赫伯特留下看守房子。四月三十日，当苏联飞机飞来的时候，她一个人在家里感到害怕（我是逐字翻译的），她从家里拿了些吃的东西就住到这镇上的女友家的一个小棚子里去了。”

“上校爷爷在汉堡美国人那里。这只……母山羊住在一个小棚子里，而这个库尔特……这个鬼东西拿着冲锋枪在树林里晃荡？”格拉纳图罗夫厉声说道，“这两位主人真不错！是带着侦察的目的和姐姐一起到自己家里来的吗？他们俩到这里来干什么？这是主要的！谁派他们来的？”

蕴藏着的激愤眼看就要爆发（像尼基金预料的那样），但是，这种情绪在克尼亚日科的眼中消失了。他好像故意不理睬格拉纳图罗夫的最后一个问题，只对尼基金一人泰然自若地说：

“你知道，我可没有愿望进行这样不公平的审讯，何况又是和这些乳臭未干的娃娃作战，特别是跟这两个人，这是第一；第二，这些天真的孩子知道，柏林已被攻克，没什么可指望了，因此决定弃家离去，到汉堡去找那个被俄国人进攻吓破了胆的年迈的祖父。拿点东西，换换衣服就上路……这个库尔特从树林里回来，对姐姐说了这些。他们是这样解释的。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事。还有，爱玛是从花园那边的后门进屋子的，库尔特在下面等着。顺便说一下，这个库尔特说，湖后树林里有二十来个狼

^{①②} 原均为德语。

人,其中有和他同年龄的人,一些十五、六岁的男孩,为首的是一个被击溃的部队的上等兵。他们有自动步枪和火箭炮弹。”

“是这——样!”格拉纳图罗夫拖长声调说着,迈大步向库尔特走去。“是这——样!有自动步枪和火箭炮弹吗?是二十个人吗?那么你说,我亲爱的库尔特,他们在哪里?狼人驻扎在哪里?连个鬼影子都看不见!”他挑着字眼骂着。“狼人……在哪里?……”^①他搜寻着德国话叫喊着,猛地把自己的大手放到手枪套上。“狼人在哪里?离这里多少公里?说,^②狗崽子!喂,说呀!”

库尔特的小鸟般的脑袋缩在窄小平直的肩膀里。下摆烧了个洞的肥大的制服,像挂在衣架上似地挂在他的肩膀上。他舔了舔起了许多像大滴汗珠般水泡的嘴唇。他惊慌地、含糊不清地嘀咕了什么,孤立无援地看着他姐姐。尼基金觉得,连他那孩子般的招风耳也发白了。而他的姐姐则处于麻木的恐惧之中,用睁得大大的眼睛向格拉纳图罗夫和克尼亚日科央求着。她屏住呼吸,未发育全的胸脯突然耸起,像小石块似的变得挺硬。最后,她用尽力气发出了绝望的呼声:

“不,长官先生,不!不!”^③

接着,她两手遮住脸,晃动着蓬乱的头发,对自己孤立无援的处境感到十分伤心。

一缕缕汗水从库尔特肮脏的面颊上流下来。他的头越来越往肩膀里拱缩,细脖子一动一动,越来越低垂。制服下面的肩胛骨支起。后来,从他的尖鼻子里冒出了一声脆弱的咳嗽声。他喉咙里卡住了,呛了一声,一边咽唾液,一边断断续续地勉强挤

①② 原均为德语俄译音。

③ 此处原为德语。

出一句话。

“昨天树林里有人朝参谋部的一辆车子打了枪，”尼基金望了克尼亚日科一眼，低声说，“巡逻队告诉的。他知道这件事吗？”

“昨天？打枪？”格拉纳图罗夫接腔说，“喂，克尼亚日科，问狗崽子！是他们开的枪吗？”

“难道就是这样一批乳臭小儿埋伏在树林里吗？”尼基金想。他力图要确定开枪打车和这个呼嗤呼嗤拖鼻涕的、弯腰曲背的德国男孩的可怜相之间的关系。“简直难以相信！他们还只会吃麦粥，而不会用自动步枪射击。像他这样的孩子，不可能开枪！……”

“这个拖鼻涕的阴死鬼在那里哼什么？”格拉纳图罗夫威胁地问，他的手没有从枪套上移开。“要是不回答，就重复问，一直问，克尼亚日科！昨天开了枪，今天就来侦察吗？让他回答这个！”

克尼亚日科提了问题，特别冷淡地翻译着：

“他说，昨天他不在树林里，而在城里姐姐那里。此外，那个上等兵每夜都要选择新的宿营地。泄密者就得枪毙。有个弗里茨·戈夫曼，腿碰在树枝上受了伤，不能走路，就被枪毙了……上等兵用手捂住他的嘴，朝他心窝开了枪。”

“真是恶棍！”麦热宁轻蔑地说，不知是指那个上等兵还是指库尔特。“吊死还不够！把他们统统吊死！一个也不留！我记住他们的‘希特勒万岁！’^①他们到了我手里就该团团转了！”

格拉纳图罗夫两腿叉开，身体重心由脚尖移到脚跟，慢悠悠地晃动着。颧骨上的黝黑色明显地消失了，带上些灰色。

“这么说……他是拒不开口喽？我这样理解对吗，克尼亚日科？”格拉纳图罗夫的声音低沉得像从地下发出的隆隆声。他的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瞳仁突然射出似乎失去理智的、令人害怕的目光。他野蛮地把头朝门那边一摆。“喂，所有的人都出去，只留下德国女人的兄弟！我要跟这个手淫的家伙谈谈，照德国鬼子当年在斯摩棱斯克和我父母谈话那样。他在我手里会变得服服帖帖，这个狼人坏蛋！……他们居然还拿着自动步枪在我们周围转！”

“蛇崽子！还跟他们耗时间！他们这里的人都是法西斯坏种，非把他们折腾折腾不可！……”麦热宁无情地咒骂着，“他们折磨我们的人，到了这里他却一声不吭，希特勒的杂种！你昨天开枪了吗？”

尼基金曾不太详细地听到过四一年格拉纳图罗夫一家（父亲好像是中学校长，母亲是教师）在斯摩棱斯克的可怕的遭遇。他自己很少谈起这件事。尼基金想到这儿，即刻就看见了连长那张发灰的面部咬牙切齿的样子，看见了他使出大象般的力气绷紧了肩膀，他那有一普特重的拳头像铁锤似地晃了一下又顺着身子放下。尼基金在他身上还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惊人的、疯狂的、野兽般的表现，因而不知为什么闪过一个念头：格拉纳图罗夫这一拳会不费吹灰之力把人打死。但是，麦热宁在顶楼房间里对那个德国姑娘强行非礼的时候，身上也曾流露出这种兽性的、愚昧的、不可思议的神情。好像暴力的感染如熊熊烈焰一下子从麦热宁传染给了格拉纳图罗夫，犹如一群复仇心切的人在遇到虚弱慌张的、意念中的敌人时，会产生疯狂的情绪一样，因为作困兽之斗的敌人往往会激起人们比对强大的敌人更强烈的仇恨。

尼基金没有理解这一点，但是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就在这刹那间，德国少女一声刺耳的尖叫划破了屋内的寂静——她从手势、声音、目光里猜出，一定发生了什么事，于是她嚎啕大哭着奔向库尔特。她紧紧抱住兄弟的脖子，把他的小头贴在自己

的脸上，用哆哆嗦嗦的手指捧住他那面无人色的脸，只是一遍又一遍地苦苦哀求着：

“库尔特，库尔特，库尔特！回答呀！”^①

“麦热宁！”格拉纳图罗夫吼叫起来，走近库尔特。“叫这个骚女人滚他妈的蛋！所有的人都出去！我来跟他谈谈！是这个流口水的蝎子向我们开枪的吗？麦热宁，是吗？……”

麦热宁朝掌心吐了口唾沫，擦了擦，像是准备劈柴似地双手抓住德国女人的肩膀，猛地一拉，把她和库尔特扯开。就在这时，克尼亚日科的令人难以辨认的异常激动的声音，像一声清脆的枪声冲过来：

“回来！……”

接着，他跨了两步，臂肘像弹射的钢丝弹簧一般，把麦热宁推开。他脸色发白，站在格拉纳图罗夫和库尔特中间，用不可抗拒的判决的口吻对格拉纳图罗夫和自己说：

“除非我死了，您才能这样做！您明白吗，连长？”

“麦热宁！离开这儿！”尼基金发出命令。他热情地支持克尼亚日科的决心。“您立刻离开这儿！”

“真有你的，中尉！……”

麦热宁把狂怒得发花的眼睛转向尼基金。然后，像平时那样合上睫毛，不知为什么生硬地搓着手掌，哑声对格拉纳图罗夫说：

“原来，对他们来说，德国女人更可贵，啊？”他摇摇摆摆地向门口走去，一拳把门打开，跨着大步走了出去，又重重地把门关上，连油灯的火苗都摇曳起来。

“噢，是这——样！”格拉纳图罗夫恍然大悟，从牙缝里挤出几个字，然后退到桌旁坐下，往椅上一靠，缠了绷带的手臂吊在胸

^① 此处原为德语。

前。“这么说，童话中的骑士们，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我们要为了德国人而火拼吗？这就是说，你们比我仁慈啰？你们是纯洁的小天使，而我呢？……”

接着，可以明显地看到他是竭力使自己冷静下来，控制住自己的怒火。他几乎是冷静地接着说：

“为了这两个小崽子吗？也许，咱们还得拼个你死我活？为了他们吗？哎呀，克尼亚日科，克尼亚日科，我们以后可怎么生活呢？就该开动机器反对我！我们到底是敌人还是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但是克尼亚日科却默不作声。他脸上的苍白色没有褪尽，表情依然是那样坚定固执。他肩章上那崭新的、神气的星章，擦得雪亮的铬鞣革皮靴，浅色的头发和梳得纹丝不乱、无可挑剔的分头，现在看起来令人感到异样。因此，尼基金不由地想：“不错，他确实就是一部机器。”

“就这样，”克尼亚日科似乎只字未听见格拉纳图罗夫说的话，非常清楚地说，“十分清楚，上尉同志，这两个德国人是房屋的主人，就是说，这屋子是他们的，是他们的，而不是我们的，这是绝对正确的。因此，应该让他们收拾属于他们的东西！让他们去他们想去的地方，无论是去柏林还是去汉堡都行。让他们走吧。”

格拉纳图罗夫用指甲弹着空茶杯。

“也让这棵只受了点惊的老实的蒲公英再飘飘荡荡地回自己的上等兵那里去吗？应该这样理解吗，克尼亚日科？”

“噢，上尉同志，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有多危险呀！二十个乳臭未干的孩子坐在树林里，被某个上等兵吓破了胆。这个库尔特就足以使我们相信，那里留下的是些什么人。”

“哎哟，多么仁慈呀！”

“‘哎哟’什么呀？”

“自动步枪和火箭炮弹是乳臭未干的吗？克尼亚日科？”

“我认为，应该和旗鼓相当的敌人战斗，而不是……”克尼亚日科不再用原先那种好奇的眼光看了一下吓得不敢吱声的瘦瘪的库尔特和微张着咬得肿胀出血的双唇的年轻德国姑娘，冷峻地把话说完，“而不是和小雏鸡战斗。”

“哎哟，多么仁慈呀，中尉！”

“我想提醒一下，”克尼亚日科不容争辩地继续说，“您现在任务是在卫生营治疗，连长同志。我代理您的炮兵连连长的职务。所以我作出了决定。没有发生过任何战斗，我们并没有俘虏他们。他们是作为房屋主人自己来的。因此，我再说一遍，如果他们愿意，就让他们离去。尼基金，我想你不会反对吧？”

“是的，克尼亚日科就像一部机器，顽固地朝一个方向转动，你就不能使它向相反方向转动。但是，为什么他能如此有信心地作出决定呢？这就不明白了。”面对着克尼亚日科这种毫不动摇的信念，尼基金心里一面责备他，一面暗暗高兴，他知道克尼亚日科现在是不会同意格拉纳图罗夫的任何反对意见的，就像在选择反坦克阵地时常常不同意连长的意见一样，他总是自己来确定排里的火力点，这种过于自信的执拗往往激怒连长。尼基金虽然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克尼亚日科的决定是绝对正确的，但还是服从于他所熟知的克尼亚日科那种毫不犹豫的坚定性。他说：

“我同意你的意见，没有发生过战斗。我们也没有俘虏他们。”

“好极了！”克尼亚日科说。

格拉纳图罗夫两腿伸直，蹬在地毯上，健康的手臂垂向地板，摆出一副架势，像是一个精疲力竭的人，在耐着性子嘲弄地等待着这一切如何收场。当面色阴郁的克尼亚日科走近德国人，很快地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格拉纳图罗夫挺起胸部用劲吐了一股气说：

“管得不太多了吗，克尼亚日科？管得不太多了吗？嘿，说得太过分了！以后可别为这样的命令哭鼻子！……”

克尼亚日科没睬他，继续和德国人谈话。尼基金看到，蓬头散发、不漂亮的爱玛耷拉着的下巴颤动着，库尔特的长圆形小鸟般的脑袋神经质地从肩膀一边撞向另一边。不知为什么使尼基金产生了一个强烈的想法：这个瘦削的、不像样的男孩不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居然在审问中一次也没摘下那副大眼镜，这副眼镜使他具有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带有病态的神童的那副怪样，这使尼基金心里感到不安。于是，他不悦地说：

“我想知道，他会不会开枪？”

“就是傻瓜也会，”克尼亚日科冲口说。他向德国人解释完了，就一连两次像下口令似地说：

“就这样吧！这样吧！”^①

令人不解的是，在这“这样吧”^② 的口令后，爱玛小步走近克尼亚日科，没有抬起她那哭肿的眼睛，急促地行了个屈膝礼，然后，又突然地、有点羞涩地向尼基金行了屈膝礼，以感恩戴德的态度，翕动着浮肿的嘴唇说：“十分感谢，长官先生！”^③ 接着，她碰了碰还在犹豫不决的弟弟的胳膊。他大概还不相信在最后一刻得救了。她脸上带着谄媚的神情，显然是以做姐姐的权利搀着他的手向门口走去。他跟着她，笨拙地挪动皮靴，踉跄迈步，他那孩童般的有一个小洼儿的脑勺害怕地缩在制服领里，大概在等着大声呵斥或背后的枪响。

“就这样吧，”^④克尼亚日科用德语又说了一遍。门在他们

① 此处原为德语。

②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③④ 此处原为德语。

背后关上后，他看了看表，一本正经地说：“好像该是临睡前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的时候了，顺便去查查岗。”

接着是一阵静默。

“嗨，军官先生，军官先生，啊哈—哈……”格拉纳图罗夫咬紧上下颚，吐了口气说，“管得那么多，谁来负责？要是我们中有谁该负责的话……那就不是掉肩章，而是掉脑袋啰。”

“是吗？”克尼亚日科淡漠地表示惊奇，“好吧，肩章有一对，脑袋有一个，我来负责，上尉同志。”

尼基金说：

“我和你一起负责。我自己去查岗，以防万一。”

“查岗不应只是以防万一，”克尼亚日科回答道。他爱洁成癖地吹掉船形帽上看不见的灰尘后，戴上了它。“走吧，尼基金。”

“啊？去哪里？”格拉纳图罗夫思考似地问道。他的黝黑的脸转向克尼亚日科，脸上的肌肉烦恼地抽搐了一下，露出沉思的神情。“去卫生营吗？没用，我想，加洛奇卡这时已经睡了，中尉。”他弄得椅子发出吱嘎声，装出困倦的样子伸直他那两公尺长的身子。“代替我的职务，一切都承担起来吗？真厉害！要是这只可恶的丑小鸭是带着兄弟来搞侦察的，那你们怎么回答斯灭尔施^①呢，军官先生们？想好怎么回答了吗？那就替咱们仨出个主意吧，让大伙一块。我还是喜欢你们的，魔鬼，喜欢这种冒险精神！……”

克尼亚日科把雨披甩到肩上，并不理会格拉纳图罗夫那种半开玩笑的口吻，冷冷地说：

“不必出主意。到时候准是我上法庭，上尉同志。”他把手举到船形帽边敬了个礼，又缓和地补充了一句：“您最好还是在沙

^① 斯灭尔施：音译。为惩治、处决间谍的专设机构。

发上躺到早晨,晚安!”

他们走了出去。

第五章

深夜尼基金几次醒来,怀着不安的心情辗转反侧,时时昂起头来倾听着。屋内一片死寂。沐浴在月光中的小镇万籁无声。丁香的潮润清新的芬芳、盛开的苹果花香随着凉风一阵又一阵地飘进敞开的窗户。湿润的微风吹拂着尼基金发烫的脸。在广漠无垠的空中,在尖尖的瓦屋顶上面,在西边松树林后,月亮好像一块未熟的西瓜悬挂着。屋顶、花园、街道都抹上一层磨刀石般的银辉。一切都笼罩着一片蓝靛。夜间,万物凝滞不动,只是由于哨兵的走动,屋旁的草丛偶尔发出沙沙声。于是,尼基金放心了,又睡着了。

拂晓,尼基金在朦胧中听到附近什么地方发出的不像自己人发出的声音而打了个寒颤。他睁开眼,侧过身,机械地扑向放在床头椅子上的制服和放在制服上面的枪套,但他马上就明白,他是突然被惊醒的:楼梯口响起了脚步声,然后是轻轻的叩门声——接着又静下来了。

天亮了,寒气袭人。朝霞点燃着松树顶。是一个粉红色的、一尘不染的清晨。

“是谁?”尼基金喊了一声,“乌沙季科夫,是您吗?”

又是几声轻轻的敲门声。透过敲门声,一个少女的声音谨慎地、断断续续地低声讲着德语:

“可以进来吗，长官先生？……”^①

“怎么回事？”尼基金感到不安起来，他一边想，一边回忆起昨夜发生的一切，于是脑海里模糊地闪过：“这是那个爱玛小姐吗？当我查哨回来时，她和她弟弟一起在顶楼另一个房间里收拾东西。是啊，他们原应该在早晨离开的。她为什么找我呢？她有什么话想说吗？想报告吗？发生了什么事吗？”

尼基金还没有想明白，就找俄德会话手册，以备不时之需，但没有找到。他把鸭绒被拉到胸口，迟疑地应声说：

“进来吧。请进。”^② 我的门没有锁。”

门被轻轻地推了一下，慢慢地打开了一点，吱嘎一响。门缝里先是伸进一个摆着小茶杯的小托盘和两只从花睡衣宽大的袖子里伸出来的纤细的手，接着，爱玛端着托盘，侧身走了进来，用膝盖关上了门。她带着睡态，两片像是僵硬的嘴唇羞涩地笑着：

“早安，长官先生，早安！……”^③

“早安，”^④尼基金答道。她的到来使他感到意外和羞赧。用托盘端来一杯咖啡这种不寻常的情形也使他惊奇，这杯咖啡大概是送给他的。由于不善于掩饰最初的窘态，他脸红了。他竭力回忆学校里学过的德语，结结巴巴地开始问她：

“这是什么？为什么？”^⑤

“咖啡，长官先生，请吧。”^⑥

她摆动着睡衣的下摆，怯生生地走近来，殷勤而温柔地点着头，把托盘放在床边。他窘得不知所措，甚至把被子下而的双腿挪了挪，离托盘远一点，一面用没有睡醒的、无神的眼睛带着疑

①③④⑤⑥ 原均为德语。

②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问的神气望着她：

“这是什么？为什么？”^① 他说的还是学校里学到的那句话。

“请吧，长官先生，请吧，早安！”^②

“早安，”^③他嘟囔着说，苦于找不到话回答她的微笑，不知怎样谢绝送到床边的咖啡。

“请吧，”^④

她也觉得忸怩不安，在床边像昨天那样行了个半屈膝礼。她那因为激动而大瞪着的蓝灰色眼睛里含着仔细聆听的笑意望着尼基金的嘴。他闻到，房间里像通常早晨那样，散发出香皂或者是淡淡的香水味（这种味儿尼基金在德国军官的掩蔽部闻到过。当他们占领这所空房子时，这里的東西还散发出德国人所有的那种薰衣草的甜味）。这时，他不知为什么想到，她是按照整洁的习惯刚用冷水和香皂梳洗过。她那似乎全部被晒褪色的黄头发整齐地梳了新发式，闪着金光。他仓促地看到她脸上和微翘的鼻子旁有着男孩似的浓密而带稚气的雀斑，很逗人喜欢。只有双唇仍像原来那样，难看地肿着，被咬破了。

他把目光转向别处，回想起她被枕头闷住，伸开两臂被压倒在他现在躺着的这张床上的情景，想起她那被捂住的喊声“不，不”，^⑤想起射进窗户的月光照出的她那挣扎着的膝盖，他想到她也会记得这一切并感到羞愧，觉得额上冒汗了。

“谢谢，”^⑥他摆出一副严肃的样子一本正经地说，同时又想：“这多别扭——她把咖啡送到床前。她等什么呢？等我喝完咖啡吗？这是什么风俗？怎么办呢？”

他下了决心，在床上坐起来，把鸭绒被拉到胸口，拿起了小

①②③④⑤⑥ 原均为德语。

瓷杯，喝了一口热乎乎的、有点苦味的咖啡。因为迟疑不决，过了一会儿又喝了一口，然后将咖啡一饮而尽，把瓷杯放到托盘上。

“谢谢，”^①尼基金说，为了表达在这种场合下大概是必要的、特别的谢意，感谢对他的关切，他不好意思地撒起谎来：“非常好的咖啡。也就是……非常好，非常出色的咖啡。”^②谢谢。”

“请吧，长官先生。”^③谢一谢？……”

她懂了，仍然笑眯眯地又行了个奇怪的恭顺的半屈膝礼，她这一蹲，她那睡衣开岔处露出了白白的圆膝盖，使尼基金感到惊奇和窘困，使他重又回想起昨夜奔进顶楼时分辨出床上黑乎乎的蠕动着肉体 and 这个难看的翘起的膝盖的那一刻，他满脸绯红，马上转过脸去对着墙壁。

“谢谢，”^④尼基金望了望平整清洁的天花板，低声说道。玫瑰红般的阳光，如同水中的反光一样，在天花板上模糊地散成扇形。

“现在该对她怎么说，让她离开呢？”他着急地想，感到有必要摆脱这种不寻常的受拘束的处境。“她在这里，而我没有穿衣服。怎么对她说：‘走’，‘离开’，‘退出去’？”^⑤还是朝门那边挥一下手呢？或者，笑着对她说：“谢谢，退出去？”^⑥对她该怎么样——要有礼貌、严肃、正经吗？她昨天是在那种很可怕的情况下看到我的。我叱责麦热宁，因此，她可能怕我。她在说什么？她说的是什么呢？”

“中尉先生……汉堡，库尔特，在那里，”^⑦他尴尬地碰见了她那睁大了的恳求着的眼睛，从她的话里听出了个别的、不太听

①②③④⑤⑥⑦ 原均为德语。

得懂的词。

“见鬼……我不懂德语，”他说，“我知道一点点。你说什么？说的^①是什么？”

她惊惶而又讨好地很快说着什么。她那细嗓音听起来有点异样。她讲着德语，声音中听得出有某种不安和卑躬屈节的请求。尼基金已经不再指望能听懂她的话。当他看见她用手指在托盘上做着走路的样子，突然把他知道的几个词从意思上联了起来：“库尔特”，“汉堡”^②。为了肯定已有的猜测，他重又问：

“怎么回事？库尔特走了吗？……库尔特去汉堡了吗？^③也就是……”他也用手指在被子上做出腿的动作，最后画了个问号，又问：“汉堡？库尔特？一个人？库尔特一个人？^④那您呢？”

“库尔特，库尔特……”她的蓝眼睛盯视着他，急促地点着头，以致她那黄铜色的头发都披散到脸颊上。但马上她又以期待的神情恐惧地把捏成一撮的指头紧贴胸口，又一次畏怯地、匆忙地、激动地解释着，向他有所请求。

他没有听懂，困惑不解地一会儿笑笑，一会儿皱皱眉头。他脸上这种最微小的变化以警惕的表情从她脸上反映出来，这种表情有时是恳求，有时是难以置信的兴奋，有时又是希望的破灭。于是，最后他作出了惟一可行的决定：

“听着……这里什么地方有本会话手册，请把它递给我。请把书递给我。小书。^⑤”他指着床头柜，“好像在那里。德俄书。^⑥请您拿一下。请^⑦……”

她非常用心地听他讲话，注意他的目光，马上张圆了嘴说：

①②③④⑤⑥ 原均为德语。

“噢！”灵活地把托盘放到床头柜上，双手像是拿着易碎的东西似地非常小心地从床头柜上拿起还相当新的、没有翻过的会话手册，向床边跨了一小步，又行了个半屈膝礼：

“请吧，中尉先生。”^①

他翻开会话手册，翻过《审问俘虏》、《农村地区的会话》这几章（“哎，全用不上！全用不上！”）然后停在《与和平居民的会话》这一章，只注意寻找需要的句子说：

“再说一次……请说慢一点。”^②

“我留在……这里……我的房子……我的房间……”^③不知怎的，爱玛自己把语法弄错了。她曼声说着，同时，把那一撮指头越来越紧地按向胸口，否定地摇着头。“我，我……留在这里……房子……”^④

尼基金皱眉蹙额，竭力在手册中寻找适合的话以回答她（“房子”和“房间”^⑤这两个词在学校里学过），但找不到合适的。有的只是那些现在毫无用处的气势汹汹的问题，通常是在自动步枪射击的间隙中拚命用力喊出来的：“有没有德国兵躲在您家里？”“楼上房间里没人吗？”“谁是这座住宅的主人？”

“我不懂……我不懂，^⑥”他一边低声说，一边对自己生气。“就像个哑木偶！您说什么？房子？房间？^⑦”

“一会儿，中尉先生！对不起……”^⑧

她坐到床边，微微佝着身子，查起会话手册来。她的头发飘出一股甜丝丝的味儿，睡衣上散发出一种隐约的、暖洋洋的身体香味。他在旁边从侧面看见她明亮专注的眼睛的眼角、脸上的点点雀斑、光滑柔软的眉梢。她的靠近使尼基金浑身冒汗，不由得把被子下的腿挪开了一点。这条被子现在盖在身上变得出奇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 原均为德语。

地沉重和闷热。他怀着惯有的那种转瞬即逝的担忧想道：

“为什么我允许她看手册？这毕竟是军事秘密……为什么她要坐到床上呢？应该对她说明这一点。”

“喔！”她叫起来，用小指头指着字行，高兴地同时又负疚地低声问：“请您读俄文，中尉先生。”^①

“怎么对她说呢？怎么说呢？”

他不完全清楚地理解她用指甲被咬过的小指头指着儿的行字是什么意思，也没有马上朗读那句德语问话，问句的内容只要根据译成的俄语就明白了：“您是难民吗？从哪个城市来的？”“不，这是我们的房子，我们将留在这里。”

“我留下。我留下……库尔特去汉堡，我留下，”^②爱玛轻声说，语气恳切而热情。于是他凭感觉猜到了，她恳求得到他的同意，她想留在这里，但又怕不许她留在俄国士兵占领的房子里。

“但是为什么库尔特走了，而她留下呢？他真的去汉堡了吗？”尼基金起了怀疑。“她又为什么来找我，而不去找克尼亚日科呢？昨天是他审问他们的。我是否有权不准她住在自己的房子里呢？真愚蠢！……要是她留下，那么毫无疑问，库尔特是不会到树林里去的。”

“好……”^③他啪的一声合上手册，把它丢到椅子上压着枪套的制服上面。“好。请。好。这是，”他开始挑选单词，“这是……对的。”^④

“啊，中尉先生！十分感谢，谢谢！啊，中尉先生！”^⑤

她转向他，容光焕发，含笑的眼睛幸福地向他投去喜气洋洋的蓝色光焰，如释重负似地轻轻喟叹了一下，脸上带着某种坚决

①②④⑤ 原均为德语。

③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的、屏息凝神的神情，把头倒向他的枕头。她那洗过的湿头发向他散发出夹心糖似的芬芳甜味。他感到，她那双也散发着香皂气味的凉爽的手臂搂抱住他的脖子。他想到，这是不需要的、危险的、反常的，她此刻所想要的正是昨夜，正就在这张床上她和麦热宁之间使用暴力可能发生而没有发生的那件事。“为什么？”这个问题像炽热的火花在尼基金脑海里一闪而过。他扳住她的肩，她顺从地由他的手摆布。他稍微把她推开一点，在模糊的记忆中苦苦寻找已经忘掉的词汇，嘶哑地、断断续续地说：

“爱玛……不^①……”

“士兵不……士兵不！”^②她怨诉地喊出声来，发狂地拥抱他。“十分感谢。谢谢……”^③

在他的“不”字中，有某种无法解释的、陌生的、非成年人所有的东西，这与他昨夜在顶楼上表现出的坚定毫不相符。他甚至由于冒出这个不像男子汉说的字而咬紧牙关。他迎着她那凝视不动的、幽蓝的大眼睛射出的深邃的目光，不知为什么想起，那天夜里，月亮在沉睡的小镇上空升起，他送加丽雅时，在自己心里无缘无故响起的欢快而尖细的铃声的感觉。于是他想：“我将为此而惋惜吗？我正在做一件背叛的行为吗？”

“十分感谢，我的中尉，十分感谢。”^④

“十分感谢？……”^⑤他机械地说着，刚听懂就表示不相信。“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十分感谢？’”^⑥

“我，我……别作声……嘘！……”^⑦

她从床上跳起，咔嚓一响把门锁上，闪动着双腿回到床边，温顺地跪下，额头靠在他肩上，蓬乱的头发披挂在脸上。

他听见她的因为呼吸而中断的絮语。她的嘴角在挂在脸上

①②③④⑤⑥⑦ 原均为德语。

的头发后面奇怪地微笑着……

“我从来还没有过这样的事。只是在被包围的那时候……”他骇怕地想着，竭力想控制但无法止住的由于对方牙齿打颤而引起的瑟缩。“但她是德国女人，而我是俄国军官……”

“爱玛……爱玛……”

他回头望了一下门，发干的嗓门不由自主地重复着她的听起来不习惯的名字。他全身热流如灌，由于自己犹豫不决而感到羞愧和惶恐。他一边克服着踌躇的心情产生的羞辱感，一边劝慰自己，这种事今后决不会在他的生活中再现。

……他们躺在阁楼上没有踩坏的陈年干草堆里。他一直觉得，她从暗处望着他。在射进屋顶缝隙的月光下，她的眼睛闪闪发光。她颤抖着说：

“听着，你为什么要避开？你嫌我吗？确实，我们身上好久没洗了，又有汗又脏……听着，我们突围不了。他们早晨就要进村。你听见吗？多静呀！”

“是的。”

“今天我不知为什么怕死。你记得反坦克连的克拉娃吗？”

“记得。”

“早晨她被打死了，当时我们想第二次突围。你看见她是怎样被打死的吗？”

“没有。”

“幸好你没有看到。在弹坑里留下了一只卫生包，不，是一些碎片——棉花、绷带……还有些什么可怕的东西。你还记得吗，她是个美人。她来找我的时候，你们都盯着她看，不过她是个小心眼儿。你们中没有人……此刻我还记得，她有一双多么好看的眼睛呀！还有那身材，就像一尊雕塑。现在却什么也没

了。就这样，完蛋了……”

他没有作声。他没有力气动弹一下，没有精神去回答她，去回想克拉娃的眼睛和身材。克拉娃是反坦克连的卫生指导员（在被围的第二天，反坦克连里已经沒有一门完整的大炮）。于是，她推开干草，向他挪近了一点，侧身偎依着他，屏住呼吸，一只手抚摸着他的颈子，另一只手开始解他那件在三天的战斗中汗透了的军服的钮扣。

那天夜里，他们俩在这被包围的农村里一个阁楼上拥抱而睡。在寒气袭人的黎明降临之时，他们正疲倦地躺着，他被非常响的震动声惊醒了——大地震动着，滚来一阵阵震撼声——他心跳剧烈，睁开了双眼。她拥抱着他，睡在他的手臂上，像是安心于找到了保护，昏沉沉、暖洋洋地躺着。她的脸是稚气的，露出信任和略带哀怨的神色。他闻到她头发上一股又酸又涩的杏仁味。

在阁楼紫色的小窗外，摩托的隆隆声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近。不一会，黄色的光线爬上了震得发响的玻璃窗。在坦克的轰响声中从街上蹿出一支讲德语的、乱哄哄的队伍……他倾听着，虽然还没看到屋旁街上的情景，但是已经明白，德国人占领了村子。炮兵营被击溃以后，在这里只剩下了几个士兵和他们俩。他胸口感到一阵冷冰冰的空虚。他从她头下抽出胳膊，站到窗口。一长列坦克已堵住街道，在前灯的灯光照耀下密集地行进着。路边两列步兵像链条似的伸展开去。

“起来！快！”他摇了下她的肩膀，急促地系上武装带。

她没有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懵里懵懂地甚至歪着脸问：“什么？什么坦克？”但是，当她领会了一切时，他没让她说一个字，只是低声指挥着，要她一步不能落后。接着，他端起冲锋枪做好准备，推开阁楼的小门，先走下楼梯，到了房主人遗弃的有点潮湿的前室。

整幢屋子都充满了坦克的吼声和履带的铿锵声。玻璃窗震得直响。由于坦克的前灯从侧面掠过,不时闪烁着橙黄色的光。在荒废已久而发出霉味的前室里,一只空桶的弧柄,也发出轻微的响声。

“我们从这里走不出去……我本来就这样想,”她低语着,跟着他下了楼梯。她似乎对脱险不抱希望,把自己的太阳穴靠着他的背。“我们往哪儿跑呢?他们会打死我们的,中尉……”

“跟着我,一步不要落后!穿过菜园……到树林里去!”他说,被她的低语、她那无泪的哭泣表现出来束手待毙的无能弄得发火。“喏!拿着我的手枪!会开枪吗?”

“不,不会……我只会给伤员包扎。”

“啊,见鬼,看着吧!应该按这里,扳机钩,瞄准了就按!”

然后,他们就沿着毁坏了的松散的菜畦跑过一个个菜园,在黑暗中他们看不清楚周围的房屋,一会儿陷进弹坑,一会儿跌到迎风发出金属般响声的玉米地里。他们俩都气喘吁吁,现在除了耳朵里血管的激烈跳动声,其它什么也听不见。汇合的摩托轰鸣声,打开的舱口闪现出德国坦克兵的队伍,低低地辉耀在房屋之间的坦克灯光已经向左边渐渐远去。于是他们猛然奔过一个个菜园,一直跑到在晨曦中显得灰蒙蒙的田野边上,辨认出它后面紫色天空下一排黑糊糊的树林。

当照明弹带着干燥的哗啪响声划破田野边的黑暗,光芒四射,照亮了长空,照亮了一脉流水上的小桥的时候,他错过了决定性的一刻,他看见前面土丘上的两个黑影为时已经太迟,听见“站住”^①的吠叫似的喊声也太迟了。他拉着她的手刚扑向地面,把头伏在潮湿的扎脚的留茬地时,一梭子弹就在他们头顶上

^① 此处原为德语。

呼啸而过。

“站住，站住！”^①——喝令声和剧烈的心跳声在耳畔同时响起。

他把枪杆放到前臂上支撑着。他对惟一的出路满怀信心，对她嘀咕着：

“他们是两个……马上就近了，我给他们一梭子！……然后你跑过桥！到桥上就开枪，哪怕朝天放也好！懂吗？”

“我尽力而为，我会开枪的，我懂了，我会……”

德国鬼子并没有走近。可以模糊地看到他们在土丘上的身影，相隔约有二十来步，在星光下低声交谈着。接着又是照明弹发出愈来愈响的爆裂声和啞啞声。就在这一刹那，他打出一长梭火光闪闪的子弹，枪声盖过了一切声响，他从下面射击，因为在下面他清楚地看见土丘上的人。这个土丘呈半圆形突出在河的上方，比黎明的天色要暗一些。接着他就清楚地看见他们直挺挺地倒下去，和地面融为一体。

在沉寂中，前面传来了剧烈疼痛的呼叫声，铁器碰撞的声响，似乎是冲锋枪在地上碰到了钢盔。尼基金因为打死敌人和由此而猛然获得的解放而镇静下来了，他用变了调的嗓音对她喊起来：

“快！过桥！别落后！千万别落后！”

他跳了起来，还是带着把德国人打死就可以获救的强烈愿望，朝土丘又打了几梭子弹。他没有径直向桥头奔去，因为一直没有找到一条无阻无挡直通河边的道路，所以疯狂地在田野里蜿蜒曲折地前进。射击停止后，他奔向河岸，在他面前五公尺的地方有一座圆木架的桥，桥上阒无人迹。河水在阳光下反射出锰一般的闪光。

^① 此处原为德语。

“中尉，等一等！我不行啦……等一等！……”

她赶上了他。只见她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脸色惨白得吓人。她疲惫不堪地用拿着手枪的手抓住卫生包，低声挤出一个个字：

“我要倒下去了……等一等，我不行了……”

“对你说，把包丢掉，丢掉！跟我上桥！穿过桥就去树林里！把东西都扔了！跑上桥！”

“不，我不行了，亲爱的，请等一等……”

最后，她因为喘不上气来，闭上了眼睛，向地上倒去。于是，他为一种下意识的粗暴的决心所支配，拉着她的肩膀，拖着她，把她向前推，怒冲冲地命令着：

“跑！我在你后面！喂！我求求你！……”

他们踏上了桥板。她两腿发软，晃了一下，她抓住桥栏杆，双手慢慢移动着，这样又萎靡地走了几步。她哽咽说：

“我不行，我不行了……”

“唉！你怎么啦？你怎么啦？……”由于他没法使她跑，自己也就没有权利跑，因此他野蛮而疯狂地向她喊叫着，同时又狂乱、粗暴地拉了一下她的肩，弄得她在离开栏杆时差点儿跌倒。

“快点！快点！”

但他们刚在桥上跑起来，后面就突然发出一阵猛烈的机枪声。曳光弹像一股热风在他们头顶上呼啸而过，吹动了他们的头发。他一边跑一边将她放倒在桥板上，紧紧地躺在她身旁。他把脸转向她，他的脸由于可怕的喊声而变了样。

“爬吧，爬到对岸去！我就赶来！……从这儿爬，快……”

一分钟前他还相信，他的第一梭子弹打死了土丘上那两个守桥的德国人，但是很显然，还有第三个带着机枪留在岸边的堑壕里，而且很快发现了他们上了桥，于是朝他们开火。

面临着被子弹击中的死亡威胁，他嘶哑地喊着：“爬开，到那

里去，到桥那边。”他没有望一下，她是怎样爬的，只听见她的呻吟声和在桥板上移动的声音。他钻到木栏杆下掩护着，把枪身支在一根圆木上，浑身非常难受地打着寒颤。土丘上的火光、曳光弹的闪光、水边着火的碎树片使他头晕目眩。

他的手指在扳机上失去了感觉，因为使劲抓住冰凉的铁而僵硬了。当一梭子弹击中他的锁骨时，他还是不断地转着附近就是河、可以救命的念头：如果他受了重伤，那么他还能站起来，翻过栏杆，往下冲，到那永恒的虚无乡去或是获得幸福的自由。

“爬开！爬开！”他喊着，“从桥上爬开！离开桥！……”

他没有把麻木的手指从扳机钩上松开，射出了几梭子弹。令人痛苦的寂静使他清醒了一些：冲锋枪没再射出子弹，只发出咔嚓的空声就不响了。在激战中他没有计算子弹，耳内嗡嗡作响，令人发晕。土丘上的机枪也不响了——那里没有冒火光。他跳了起来，弯着身子，在桥上向对岸奔去。在可怕的寂静中他只听到自己的呼吸声和在圆木上自己的沉重的皮靴声。他怀着由于生命有救和获得自由而陶醉的感觉。跑到了桥的尽头，跳到地上，像麻袋一样滚到堤下溜滑的湿草里。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看到了在顺利地停止射击和冲过桥之后不愿看到的情景。

“怎么啦？你怎么啦？……”

“你什么时候受的伤？在什么地方？怎么会这样？……”他重复地问，被她胸口流血的情景吓坏了。他现在还记得她胸脯的柔软、富有弹性的娇嫩和气味。这意外的灾祸使他大惊失色。他想帮助她，从卫生包里猛然扯出绷带，一边断断续续出着粗气，一边说：“我给你包扎一下，我包扎起来方便些，我帮你……”

“是的，帮我一下。”她翕动着像死人一样发育的双唇低声说，并没因为他在跟前而感到害羞。而他看到，她张开毫无生气的嘴唇是多么吃力，他想到，现在她的双唇会有多凉，现在除了

他的帮助什么也不需要。面对眼前的处境,他感到无能为力,不知道用什么来减轻她的痛苦和疼痛。对她的钻心的怜悯、意识到自己的罪责和憎恨自己,这使他浑身发抖:为什么他要赶她跑,为什么要逼她往前跑,为什么对她发号施令,为什么粗暴地拉她的肩膀——难道在桥上她已受伤了吗?……

“你原谅我……我一点也没发觉,没看见你什么时候受伤的!你是在桥上受伤的吗?……”他不知为什么要说这些,怀着模糊的痛恨自己的感觉,向她表示歉意并为自己辩解,一边整理和拉着她胸口和肩上老要滑下来的绷带。使他感到惊骇的是,暗红的鲜血一下子就浸湿了绷带,他还担心她不能长时间地和他一起行动。“我们应该走……趁天还不亮。”他说服她,“你能走吗?离树林还有三百公尺光景,到那里就太平无事了!……你抓住我……我们慢慢走!你站起来,站起来,忍一忍,站起来走吧!……”

“我不想当俘虏,中尉,”她呻吟着说,“但是我不行了,马上,等一等,请帮我一下……”

他帮她站了起来,抱了她一会。他感到她那软弱无力的身体在颤抖,贴着他下巴的额头在冒虚汗,因而茫然不知所措。她就抓着他的武装带。

后来,他们像是一对永不分离的情人沿着田野走着。他们互不松开,走着一样的步伐。她吊在他身上,抱着他的腰。而他已经感觉不到擦着他大腿的她那女人的大腿特有的弹性,感觉不到她那亲人般的温暖。他听到右边和背后传来了远处坦克的轰鸣。他每次回头望见河那边德国部队正在行进的路上划破黑暗的照明弹亮光时,总为她那越来越沉重的步伐感到担心,怕她要倒下来。他用嘶哑的低语不断地重复说,主要的是走到树林里去,主要的是要穿过这块田野,到了那边就可以休息一下,突

围到自己人那里去……

到了树林里，他们已经累垮了，倒在秋天的落叶堆上，马上就昏昏沉沉，一无所知了。但是，好像不多一会他就被使人惊恐不安的声音所惊醒——在簌簌作响的树林上空，凝胶似的十一月的太阳，透过缠绕的树杈和被风吹落的暴风雪般的黄叶，照射着。她佝偻着身子，坐在旁边，把手枪放在膝盖上，用泪水晶莹的目光长久地望着自己的手指，虚弱无力地动着扳机。她泪水满面，并且不知为什么带着犹豫不决的人所常有的哭腔叫唤他：

“中尉，中尉……”

“你——干什么？”他喊了一声，坐起来，从她手里夺过手枪，急忙将它藏到枪套里，带着不高兴和不理解的心情对她说，“为什么？你拿枪干什么？为什么？”

她抬起头，面对着穿过光秃的树杈的不很强烈的阳光，吞咽着泪水。由于遏制着哭声，喉咙口一阵阵痉挛。

“你可怜我吗，中尉？”她问，鼻子里鼻涕呼嗤响着。“我做了个恶梦，好像我躺在草丛里，蚂蚁爬满了我的脸，非常可怕，吓人——我就醒了。中尉……亲爱的，你会怜悯我吗？……”

“别说这种话！”他打断了她。她说的关于蚂蚁的话使他害怕，他不止一次看到过被打死的人脸上的蚂蚁，大概正像她梦见的那样。他不能想象她死了躺在草地里，也不愿想象她额上眉上和不再呼吸的冰凉死板的嘴唇上满是蚂蚁的情景。“走吧，秋天哪有什么蚂蚁！走吧！”他抑郁地说，并且，为了结束这种谈话，严格地要求她：“再也别说这个！怎么也得走到那里，离那儿已经不远了。”

他把肩膀靠近她，帮她站起来。她呻吟着，靠着他。突然，她用那冰凉的凝着血的嘴巴不灵活地但热忱地吻起他那没有刮过的下巴，吻他那肩章旁汗湿了的呢子军便服。她那少气无力

的声音又一次火燎般地灼痛他的心，引起他的怜悯。

“你是我最亲近的人，惟一最……我再也没有别的人了。你是爱我的，中尉，是吗？你跟我不是逢场作戏吧？”

“走吧，我帮助你，走吧！我爱你！”他低沉地说，但并不看她那探寻着他的目光的眼睛。他在骗她：从德国鬼子占领的村子里逃跑，街上的一列坦克，田野里和木桥上的射击，无法突出包围圈的念头，她的受伤，穿过林子突围到自己人那儿去的惟一愿望，这一切把昨夜在阁楼上他们之间产生的感情在他心里都烧光了，化为乌有。

“走吧，我们应该走！靠着我！我们应该走，我们能冲出去。剩下的路不远了，树林后面就是我们的人！”

她顺从地跟他一起走着，搂着他的腰，摇摇晃晃地向前走，脖颈软弱无力，头常常向后仰。有时她低声说着：

“谢谢你，谢谢。”

第二天她喉咙里开始出血。这是在早晨发生的，经过一夜的行程，在树林里不断迷路，最后他们完全筋疲力竭了，摊开四肢躺在小河旁峡谷的树叶堆上，只有喘气的份儿。

然后，他听见呻吟声、咳嗽声、哼哈声。当他看见她那因为痛苦变得难看的脸（在这张脸上，惊讶、痛苦还在同死的恐惧搏斗），当他看见她那歪扭的眉毛，认不出人的眼睛，嘴角上流淌的一缕缕殷红的鲜血时，他像是受命运迫害虐待的人，在她周围焦急地走来走去，觉得旁边一片死亡的凉气。一阵令人麻木的不幸之感使他整个僵化，他只是不断地问她，应该做什么，她需要什么，必须做什么，怎么帮助她，她要不要喝水，她想要什么……但是她无力地抓着土地，窒息使她缩成一团，她不懂，也听不见活人的声音，依然只是在挣扎，在反抗那压抑着她、使她胸口窒息的、无形的、铁石心肠的东西。于是他一边对自己喊着毫无意

义的、奇怪的话，一边不知为什么奔向小河，用船形帽盛满水，又带着这个装满了铁灰色水的“杯子”奔到她身边，把水全部浇在她脸上，这张脸已经平静了，脸颊痛苦地贴着一堆树叶，不能转动。不久前她所看到的恐惧向他涌来，他浸沉在这种惊骇之中，那一刻他几乎发狂地想象着，明天或是春天，蚂蚁将要在她这对眉毛上，在她的这对没有合拢的乌黑的睫毛上爬动。

他跪着，迟钝地绞着发出汗臭的、潮湿的船形帽。他的牙齿一阵阵打战，由于不可挽回的罪责和绝望而引起的痉挛堵住了他的喉咙。

他把她葬在峡谷里，用土块和树叶掩埋了她。

如果这可以称作爱情的话，那就是尼基金在战争中的第一次爱情。

“马上就会有人来敲门，那就一切都完了……”

“名字，名字……我的名字是爱玛，”^①她轻轻笑着说，用灵活的食指按着自己的胸口，接着又按他的胸口，并带着温柔的试探口吻狡黠地问：“请说名字……伊凡？约翰？俄国人叫彼得？名字……”^②

“瓦吉姆，”他懂得她要问什么，就回答说。

“瓦吉一姆，”^③她拖长声音说，高兴地笑起来，又把指头撮起来先后放到他和自己的胸口（她受审时也这样做），一个一个音节地发音：“瓦一吉一姆，爱一玛，瓦一吉一姆，爱一玛……你懂吗？瓦一吉一姆，”^④她重复说着。她那半启的浮肿的嘴唇温柔地擦着他的双唇。她那洗过的头发发出甜丝丝的清新味，掠过他的脸，使他感到轻痒。“爱一玛，瓦一吉一姆……”^⑤

①②③④⑤ 原均为德语。

“爱玛，”他低声喊道，同时，在这种清脆的使人陶醉的声音中又感到，她那颀长的身体越来越紧地、越来越柔顺地贴紧了他。

接着，他闭上眼睛，感到一丝模糊的惶惑：

“我这是干什么呀？为什么我会干这样的事？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的呢？”

他知道，他所做的是一种不现实的、不顾死活的事情，好像梦中发生的背叛和犯罪，好像绝不容许的违规行为。他似乎是轻率地逾越着和偷偷地逾越了禁界线，由于许多情况，他是没有权利逾越这条界线的。

“要是连队里知道了今天早晨的事，怎么对他们解释呢？怎么回答他们呢？现在怎么办？这事发展得多么离奇，不可思议，又是多么美妙呀！现在……现在怎么办呢？”他处在一种生理上的空虚之中，在迷迷糊糊的瞌睡中想着。他找不到清楚的逻辑可以准确有理地解释明白，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从什么时候开始和为什么发生的。“不，我是个军官，我就应该对我所做的事情负责……我没有背叛任何人，因此，以后我会怎样，这无关紧要。爱玛，爱玛……她应该离开了。马上就会有人来敲门——那就一切都完了……”

第六章

“请进，乌沙季科夫！怎么，快吃早饭了吗？”

“给您道喜呀，中尉同志！”

“是您呵，麦热宁！道什么喜，是战争结束了吗？”

“瞧，多美的早晨呵，中尉同志！正像童话里讲的，阳光灿烂，鸟儿歌唱，一片静谧，简直是人间天堂呀！至于战争结束，那还没有消息。睡得好吗？”

“尽管昨晚打牌输了给您，还是睡得挺好。克尼亚日科在哪儿？”

“在院子里。一早就来了，正在自个儿准备带领全连操练呢，大概是队列操练课吧。呐，热水给您拿来了，刮胡子吧！”

“谢谢您送水来。我弄不大懂：干吗要您来替代乌沙季科夫呢？他怎么啦？”

洗得干净清爽、两颊刮得溜滑的麦热宁中士故意装出十分殷勤的样子把水壶放在窗台上。他的浅色的眼睛天真地望了望尼基金，似乎他们之间昨晚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接着，他又望了一眼那凌乱的床铺，目光立刻就变得暗淡了。尼基金一本正经地问：

“您有什么要报告吗？”

“我想跟您谈一谈个人的事，中尉同志，”麦热宁懒洋洋地、并不特别有兴致地说，“就是关于昨儿的事。需要说明一下。您昨天狠狠地训了我一通。您像魔鬼一样向我扑过来，差一点连手枪都拔出来。但这件事并不是您所想象的那样。”

尼基金拖出他那双铬鞣皮靴，把鞋后跟在地板上敲敲，对麦热宁的解释并不表现出应有的兴趣。

“就是这事吗？什么是我的想象？”

“当我听到声音，走过去在衣橱旁一把抓着那女人的时候，”麦热宁单调地接着说，同时透过他的长睫毛不时望望那张床铺，“这个德国小娘儿们，这个火红色的小东西吓得直流泪。瞧，她抓住我的双手就往床上拖。这个德国骚货，是她把我拉倒在她身上的，而您……您大概梦见了神话，梦见了可怕的巨面怪物了

吧！瞧，事情就是这样……”

麦热宁面不改色地撒着谎，但是在这个谎言中没有暗示他对是错，有罪没罪。

“您是打算给我讲童话故事吗，中士？”尼基金问，并且跟着转了话题。“排里怎么样——没事吧？”

“就像药房里那样有条有理。”麦热宁平静地回答说，仿佛毫未受到良心的谴责。“而那个德国小娘儿们，啊？那是个有蹄子的、会顶人的小山羊。她自己嘴里喊着‘不！不！’一边把我往自己身上拉。看来，德国娘儿们就会用这一招来报答一切。这您是不会懂的。对于这种微妙的事儿，您呀，我坦率地说，是缺少经验的。”

昨天，就在自己这间房间里发生了那令人厌恶的一幕以后，尼基金就差不多恨起麦热宁来，并且下决心怎么也不饶过他。可是此刻，尼基金却脸红了，他扭过脸去，内心强烈的羞愧烧炙着他。他不愿意重提他们之间那件不愉快的事，也不想回到那条不完全公平合理的不愉快的界线上，这条界线好像把他和麦热宁分开了，而在某种方面又使他们暗暗地、不道德地接近起来。他克制着这种使他压抑的疑虑，尽可能心平气和地回答说：

“话说完了，麦热宁，这是最后一次。我不想记住它。就此为止。您可以走了。五分钟后我就下去。”

但是麦热宁没有离开。尼基金于是走到五斗橱的镜子跟前，摸摸双颊，装做就要刮脸的样子；但是他在镜子里立刻便发现了麦热宁的傲慢无礼的微笑，这在他那张略胖的漂亮的面孔上显得是多余的、陌生的。尼基金觉得似乎有人在他后脑勺上不太沉重地敲了一下。他问：

“还有什么事，麦热宁？”

“是这样，中尉同志……”

“究竟是什么事？”

“看样子您昨夜没有睡好吧？”麦热宁说，睫毛不住地颤动着，好像揭开帷幕，让人看到他的两眼闪烁着残忍的目光，直刺镜子里尼基金的瞳仁。“您的眼睑发青，一脸疲倦的样子。怎么搞的，是失眠吗？……早晨您没有去查过炮位吗，中尉同志？您大概还没有离开过房间吧？”

“今天早晨？没有。这又怎么啦？”

“真像是童话一样。妙极了吧，噢？”

“又是什么童话？妙什么？”

麦热宁的面容是坚定的、明晰的。他不再微笑了。他那从后面传来的声音听上去又像日常报告那样，但里面透出一丝温和的嘲弄。

“中尉同志，今天太阳一出来我就起来了，去查岗哨，顺便看看两个德国佬——以防万一嘛。我上楼，到了您隔壁他们的那个房间，一听，没有一点儿动静。朝门上一看，没有上锁，而房间里没有人。我再一听，中尉同志，从您的房间，”麦热宁的声音里含着十分讨好的惊奇，“从您的房间里似乎有一种窃窃私语声、笑声和用德语的谈话声传出来……我心里想，这是怎么回事呢？……”

尼基金勃然大怒。他一个转身，将沾满皂沫的蓬松的须刷朝杯子里一扔，想用这种突然不可遏止的怒火来抖落麦热宁在身后说话时他后脑上一直感到的那隐隐的重压。他愤怒地问道：

“那又怎么样？您偷听了什么？……您站在房门外偷听我大声地读德语单词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① 是这样吗？（我

^① 此处原为德语。

怎么,在他面前辩解吗?我撒谎——并且还要辩解吗?)您还听到什么?”

麦热宁突然烦躁起来,目光变得混浊不清。他眯缝着昏昏欲睡的双眼望着尼基金的鼻梁,找不出一个字来反驳。这时尼基金心里一动:在这个看不透的外表后面,可以感到中士已经胸有成竹,事先把昨晚他们之间的一切都衡量过,他是决不肯善罢甘休的。

“您究竟想说什么呢,麦热宁?”

“现在的结果是,中尉同志,您从我手里把这个德国小娘儿们抢去了。”麦热宁说道,根本不把尼基金的发脾气放在眼里,“我和您是两下抵消了。抵消了,虽然还不是完全的。”

“能说得清楚些吗?我们抵消了什么?”

麦热宁又眯着眼研究起尼基金的鼻梁和额头来。他稍微想了想,说道:

“是的,意思是清楚的,中尉同志,可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军官和一个德国女人搞关系,人家是不会放过您的。会给他戴上腐化的罪名。送进惩戒营。但是,男人的事我是在行的。只要搞得毫无破绽,天衣无缝就成。但是,有一点,看上帝份上,我先声明,您别来压制我。我受不了。您知道,我是不喜欢受约束的。这是我的性格。咱们这也是照男子汉的样子说的。战争已经被一顶大帽子遮盖起来了。快结束了。让我们安静地、和平地活下去吧,凑合着把仗打完吧!”

他说得很单调,不容人争辩,就像那些坚信自己的力量、毫不怀疑别人都能正确理解他们的、独立不羁的人们说话那样。在他的自信中存在一个老于世故的人的经验,他不打算在相互关系中故意搞僵化。尼基金这时已不能自制,但他仍然怀着恶意的的好奇问:

“这就是说，我在各方面都妨碍您，是不是，中士？”

“我以男子汉的身份说，”麦热宁闷闷不乐地说道，“那样日子会好过些，中尉同志！我可以郑重地保证，就我俩知道，——我可以乖乖地服从您，但在某些事情上您不要再干涉我。”

“哪些事？”

“这种事多的是。”麦热宁回答道，口气又突然变得生硬起来。“我们俩中间，中尉同志，隔着一条河。您在这边岸上，我在对岸。我早就游过了河，上帝保佑，确实喝足了水。而您还没有游过来，水还没有喝够。尽管您很会打仗，但也还是像做孩子时候那样在草地上奔跑。甜酸苦辣您都没有尝过。瞧，问题就在这里。您要跟我作对，资格还太浅。我是开诚布公地说。就这么回事——别妨碍我！”

“您听着，中士！”尼基金终于忍不住了，“怎么着，您在门外面搞特务勾当，像个老娘儿们那样偷听，还嫌不够，还想来威吓我吗？您得放明白些，您再想要像您在日托米尔那样的‘太平’事，休想！回排去！明白吗？去！”

麦热宁痛苦地合上睫毛，咬紧牙关，颧骨上肌肉突起，使他的女人似的好看的小耳朵似乎有点像野兽那样紧贴向后面。他用昏沉沉的、惋惜的声调警告说：

“等着瞧，中尉同志，您可别惹我。我在火头上的时候，连我自己也怕的。本想和您像男子汉大丈夫那样谈谈，可您老是让我想到过去。过去的事我早就忘了……”

“您是想让我回忆起昨晚的事吗？”

“不要和我争论，中尉同志。您会需要我的。至于说到昨儿的事，——是有些不光彩。……到了夜里，哪个猫儿看起来都是灰色的。您产生了幻觉。脑子里什么念头都是会有的，没有人看见嘛！而我是长着眼睛的，上帝可以作证……”

麦热宁谦恭地叹着气，做出画十字的样子，意味深长地望了望那凌乱的床铺，然后，仿佛很不乐意地转过身子，摇摇晃晃地走了出去。

尼基金气得火冒三丈，他受不了麦热宁这种沉着自信、厚颜无耻的态度以及他所提出的半是妥协半是攻守同盟的玩意儿。这件事本身表明了尼基金的幼稚和软弱。麦热宁肆无忌惮地向他报复，为昨晚，同时也为过去在日托米尔的事，尽管他们在说话中除了一句“而您老是使我想起过去……”只字未提到老账。

这“过去”指的是一九四三年。尼基金十分清楚地记得那个多雾的十一月早晨。那天，德国人发动反攻，用坦克占领了沉睡着的城市。他记得，他接到了炮兵连长向西郊地区挺进并在坦克危险地带占据新阵地的紧急命令。他带着这个命令回排，发现麦热宁不在炮位上。他在夜里布置的火力点附近的一所房子里找到了他。麦热宁喝得烂醉，脸肿得不成样子，没穿制服坐在桌前搂抱着两个年轻女人，桌上杯盘狼藉，满是脏碟子、空酒瓶和罐头盒，堆满了一块块法国巧克力、一圈圈战利品香肠。

收复基辅后，紧接着拿下了日托米尔。德国人没有来得及运走储备食品。炮连为了支援步兵团，沿着车站向前推进，最先碰上了遗弃的仓库。

这天早上，尼基金没有在排里，而是在火力阵地旁边的一所房子里找到麦热宁时，并不十分惊奇。他只是命令他立刻收拾起来，洗洗脸，穿好衣裳，跟他到炮位上去。但是麦热宁根本没有听见他说的，嚷嚷着，摇摇晃晃地从桌旁站起来，把一个尖声嬉笑着的、披着一头蓬乱黑发的、半裸体的女人朝他推过去，喊道：

“你是个知识分子，中尉！跟我们一道来干一杯吧！照知识分子的方式来受用一下这个皮肤浅黑的女人吧！她在德军医院

里工作，什么都知道！你大概一辈子没有碰过一次女人吧！别那么不好意思，把她带到隔壁那个房间里去吧，中尉！”

他哈哈大笑起来，喉咙里发出剧烈的咯咯响声。尼基金感到浑身发麻。

“我等着，”他说，“我在台阶上等您五分钟。快收拾一下，麦热宁！”

他在门外台阶上等着。他相信，经验丰富的麦热宁马上就会跟着他走出来；麦热宁知道，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任何人都无权撤销或改变已接到的把炮排推进到坦克危险地带的命令。

但是，十分钟过去了，麦热宁仍然没有出来。尼基金尽力克制着无法忍受的厌恶感，又走进房间。伏特加酒味、汗酸味和肉罐头的油腻味令人窒息。他又十分厌恶地看到麦热宁那张怡然自得的醉醺醺的脸。麦热宁仍然没有穿制服，身上穿着一件脏衬衫。他还是搂着两个女人坐着，其中一个就是那个黑皮肤的、头发披散着的小姐儿，她令人讨厌地嬉笑着，尖叫着，狂吻着麦热宁的衬衫领口露出的毛茸茸的胸膛，另一个女人是个大块头，宽颧骨，正凑着麦热宁的耳朵，沙哑地叽咕着什么，一边用粗短的手指偷偷地把桌上的巧克力按压成小块。

“麦热宁！”尼基金喊道。他感到自己亲眼目睹到明目张胆的卑鄙下流的丑事，他鄙视和憎恨麦热宁的那张青灰色的得意面孔和这两个浑身散发着汗酸臭的半裸体的龌龊女人。“立刻离开这里！麦热宁！命令下来了——立即行动！您听见我的话了吗？”

“排到哪里去？往哪儿开？”麦热宁像被呵痒似的翻着白眼说，“基辅收复了，日托米尔拿下了，中尉！痛痛快快地乐它一次，这难道不应该吗？凭我们流的血就理应如此。该打句号了。我说，把这个黑姑娘拿去吧，中尉！我并不贪得无厌！要不你就

走你的吧，别妨碍别人，我说的是男子汉的话！”

“如果再过十分钟您还不到排里，我就把您送交军事法庭！”尼基金说。

“哪怕枪毙也行！”麦热宁拼命嚷着。他纵身一跳，撕开胸前那很久没有换洗的衬衣，耍着无赖。“枪毙我吧！老子要先到人间天堂去乐它一乐！”

这以后，每当尼基金想到自己当时那种尴尬的处境，想到关于军事法庭的话，想到那间昏暗龌龊、散发着食物和脏衣服臭气的房间，想到那两个恬不知耻的女人，想到不愿意或是无法理解现实环境的麦热宁的那愚蠢的、醉后的嘶喊和狂笑，都不能不感到颤栗。

麦热宁直到天黑才回到排里。战斗结束后，他满脸浮肿，脸色像死人一样发青，对尼基金说：“我错了，中尉！这件事就算完了！”然后，他微笑着对战士们讲，说他是吃了法西斯的罐头中毒，肚子痛，到卫生营去了。尼基金几乎沉默着，不加解释。后来有很长一个时期他使自己相信，他之所以原谅麦热宁在战争中犯下的可怕的罪行，只是因为排里当时没有遭受损失，而且麦热宁并不是胆小鬼，他是连里公认的最出色的炮长。

但是，现在麦热宁以恬不知耻的挖苦话把已被尼基金缓和了的关系弄得更尖锐化了。看来，这显然是由于安度了美好得难以置信的、有腐蚀作用的两昼夜的结果，因为远离战争，不再时刻面临着危险。大家都在期待着，地球上马上就会来一个巨大的变化，被重新夺回来的世界的欢快的晴空要永远闪烁着，永恒的节日的幸福的开端即将到来，永无尽头的新生活也将成为现实和希望，而每一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贪婪地等待着这种新生活的到来。

“我该怎么办？”尼基金匆促地走着，想道，“我也不是洁白无

瑕了，我也被卷了进去……我这是多么疯狂呀！”

整个炮连驻扎在一块林中空地上，周围是一片翠绿的草地。到处照射着强烈的阳光，清晨的空气里弥漫着春天被晒暖了的青草的气息，沿着栅栏盛开的丁香和白色苹果花的芳香扑来，时凉时暖。尼基金向队伍走去，这香气好像是给他洗了脸。

克尼亚日科中尉做完了他那套被称为特殊的“步兵操”，即有时他在休息时进行的操练——肉搏战和刺刀战。他的这套拳式，虽然连里任何一个战士，包括克尼亚日科在内，谁也没有在前线战场上采用过，但克尼亚日科坚信，这是在步兵学校就已学会的、锻炼身体必不可少的一种训练。

克尼亚日科光着上身，站在插在草地边缘一端的一幅广告牌前。广告牌是根据他的命令从城里运来的。那上面画着一个巨大的啤酒瓶，正往一个杯子里倒酒，杯上冒起的泡沫像一顶帽子。克尼亚日科手里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威严地对着火红头发的小个子塔特金说：

“您这是什么动作？您怎么跑步的？枪怎么拿法？两肩下垂，肌肉松弛，看着您都难受。肚子缩进去！胸部要展开！背挺直！您看着，该怎么做！”

克尼亚日科把已经很平的腹部缩进去，稍微舒展开双肩，于是，他那肌肉发达、细长笔直的身躯就充满了优美的、富有弹性的力量，露出一块块灵活的钢铸般的肌肉。他就像一个孩子在操练前在体育馆里检查发达肌肉的灵活性一样。

矮个子塔特金站在阳光下，皮肤洁白的脊背和无毛的胸脯发着光。他使劲拉皮带，想束紧松垂的肚皮，还呼哧呼哧地吸着气，显得有点难为情。那张总是显得有些狡猾而且似乎时刻都在核算什么的、留着小胡子的脸上显露出要认真试试的样子。

大家都知道，瞄准手塔特金从前是会计。他总是在计算、心算、核算一切可以计算的东西。排里的面包、烟和糖一向由他分配。他的脑子里牢牢记住一连串数字：司务长少发给多少面包干，发射了多少炮弹，击毁了多少敌军坦克，连里获得了多少勋章和奖章。正是由于大家知道他这种算术才能，早操后精神抖擞的战士们在队列里快活地盯望他，并无恶意地嘲弄他，给他出主意，鼓励他：

“喂，塔特金，你在算盘上打一下，你这个五斗橱还能拉长多少公分呀！你前面的那玩意儿是吃小灶长肥的吧！”

“不要用肚子呼吸呀，红头发的魔鬼！瞧你像壮牛一样喘粗气！你把大家都拖住了，可还用鼻子，鼻子，用鼻孔呼吸，就像山羊一样！”

克尼亚日科听到这些话，用那双绿眼睛冷冷地朝连队扫了一眼，于是，战士们非常欢快的声音一下子没有了。他命令道：

“我请那些最在行的人出列，来给塔特金示范最后一个动作——冲刺！”

没有一个“在行的人”敢出列，谁也不自告奋勇作冲刺示范。一阵清凉的微风吹走了大家脸上不及时的微笑。这时克尼亚日科命令塔特金（后者听到克尼亚日科的声音不禁打了个寒战）：

“再来一次！要把仇恨、信心和力量放到冲刺里去！还有脸，脸，您的脸要使被您冲杀的人感到可怕！明白了吗？再来一次！拿住！”

接着，他用闪电般冲刺的动作把步枪递给塔特金。塔特金不自然地接过枪紧握在胸前，咳嗽一声，然后弓着身子把刺刀对准前方，胆怯起来，开始在长着嫩草的草地上沿着队列小跑。

“站住！”克尼亚日科很不满意地喊道，跑到塔特金跟前，一把夺过枪。“得了吧！算您走运，是个炮兵而不是步兵！您只要

打过一次冲锋就知道了！那就完了，塔特金！往这边看着！大家都往这边看，并且记住！”他向全连命令着。于是，一瞬间，这绿色草地上的一切愉快明朗的东西都变得阴沉了，改变了，更确切地说，是克尼亚日科脸上原来的相貌改变了，消失了。他的脸变得可怕了，由于仇恨、由于极度的凶狠而扭歪了。他的身体有弹性地猛向前倾，手中紧握着的步枪的刺刀尖直指敌人，一动不动，仿佛凝固于死亡的状态中。接着，他以急速的跳跃在草地上向广告牌冲去，喉咙里可怕地嘶喊着什么分不清的话语。这声音使得尼基金感到脊背上一阵冰凉。

闪光的刀尖离广告牌只有两次跳跃的距离，克尼亚日科弓着身子向右，再向左就到了广告牌前。他那肌肉发达的细长的身躯在加速滑动中绷得紧紧的。他灵活地斜冲一下，刺刀尖就戳进广告画的中心，然后，缩住刺刀，再躬身，像避开谁似的，最后，用枪托猛击一下广告画边沿，咔嚓咔嚓地把它击倒在地。克尼亚日科的这些动作使尼基金感到有些可笑。他觉得在这场假想的战斗中，仍然有某种不明白的东西，某种不明确的界限。因此，他认为这是一种不必要的、徒劳的训练游戏，但同时尼基金也觉得，在克尼亚日科的动作中，有着一股演员似的仇恨的力量，一种可怕的搏斗的疯狂，使人觉得在这个冲刺中有一种属于他特有的钢铁般的弹力。

“明白了吗？”克尼亚日科对塔特金和全连喊着，他那稚气的脸上又恢复了刚才那冷漠、平静而有些固执的神态，不允许对他采取倨傲和不拘礼节的态度。“今天就做到这儿！明天再练！解散！”

他将步枪刺刀倒插在地里。

“我知道他干吗这样做。”尼基金想，“但是，为什么我看着克尼亚日科就会感到，一切不会像我们希望的那样很快结束呢？”

全连又活跃起来，又说又笑，在草坪上散开。尚未晒黑的脊梁在松树林斑驳的光影里，在一片绿茵中闪着白点。有人跑到栅栏旁丁香树丛下的自来水龙头前洗脸；还有一些人躺在草地上，惬意地沉浸在温馨的青草气息中，从容地抽着缴获来的香烟，等着开早饭。在宅旁盛开着满树白花的苹果树丛后面，厨房里已经静谧地升起缕缕炊烟，一个被好闻的热气熏得面孔血红的厨师正用勺子在锅里搅拌着。

“我这是怎么搞的？”尼基金望着在自来水龙头前洗脸、身旁围了一群战士的克尼亚日科，想道，“今天发生的这一切，好像是在梦中，然而确是事实。我简直不敢想象我们所下的事情。是我们俩都愿意如此吗？她愿意，我也愿意？麦热宁真的知道这事了吗？”

这时，麦热宁中士懒洋洋地走到插在地上的步枪前，他的双肩像被太阳涂上一层漆似的闪着光，流着汗。他那毛茸茸的胸口刺着一只正在展翅飞翔的蓝色雄鹰。他拔起步枪，在草上擦着刺刀。

“以后会怎样呢？”尼基金又思忖着。在麦热宁擦好刺刀的当儿，尼基金突然发现他眯缝着双眼向楼上窗口飞快地瞥了一眼。尼基金也朝窗口望了一望。只见顶楼上半圆形的窗玻璃后面，窗帷旁，亮着爱玛的身影，她站在那里往下看。他看得不十分清楚，好像隔着一层薄雾。顿时，他敏锐地意识到，他和她之间隔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意识到自己今天铸成了大错，这感觉像一根冰冷的针刺痛他，似乎他已经偷偷地在大伙儿面前出卖了自己。……

她，是个德国女人，属于敌对世界。他不承认这个世界，鄙视它，过去憎恨它，现在还应憎恨它。三年来，他对它射击，仅仅看到被击毁的坦克冒着滚滚浓烟就高兴得发狂。她属于那个黑

暗的、异族的、他要推翻的世界，这个世界迫使他在每次战斗后都要在被炮弹直接命中而倒塌的战壕里掩埋自己的士兵，而他这个由于死神利斧的没准儿的选择幸存下来的排长，还得写那些最难以措辞的信，作一番解释，写一些表白的理由。她是在那一边，在彼岸，在崩裂的万丈深渊的那一边，而他自己则在洒遍鲜血的此岸。任何情况都没有给他权利，也不容许他哪怕只有一分钟忘记这一切而用竹竿撑到那危险的对岸。在对岸，有那不久前的早晨，有她刚洗过的头发上的薰衣草的香味，还有她那长着茸毛的嘴唇。“这事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出在我身上？我不能原谅自己……”

是的，她在那儿……而且不知为什么她站在顶楼窗内窗帘的后面，用手挡着扎眼的阳光，望着下面闪亮的草地。草地上战士们走的走，躺的躺，抽烟的抽烟，有的在水龙头前嘻嘻哈哈地洗着脸。这儿还有他，在自己人中间，共同的命运、战争和整个生活使他和他们之间有着亲如骨肉的联系；而和她之间却隔着这扇阳光照耀的玻璃窗，隔着这翠绿的草地，隔着战士们清晨的谈话，也许还隔着这座静谧的德国小城，——他们是穿过了一个巨大的、敌对的、杀人的世界才从柏林来到这座小城的。

“那个德国娘儿们在张望，是吗？”麦热宁从尼基金身边走过时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接着又同样若无其事地向她挤眉弄眼地挥挥手。“瞧，这小姐儿在瞅俄国人。中尉同志，她睁大了眼睛在盯着您哩。也许这个德国娘儿们是在做间谍工作吧？”

她在楼上发现了他的手势。只见一个受惊的身影向后一缩，纱窗帘轻轻摆动了一下，她从窗口消失了。这时尼基金脑海里立刻掠过那狂热的声音：“瓦吉一姆，瓦吉一姆。”他竭力控制自己，用命令的口吻说：

“这样，麦热宁！今天早饭别让大家喝啤酒和烧酒。一小时

后全排上炮位。我们要进行操练，以后每天要操练。”

“是。”麦热宁答道。在他睫毛驯服的颤抖中隐匿着嘲笑：“我一切都明白。”

“不，不是一切！这件事已告结束！”尼基金断然决定，这才觉得好像突然摆脱了一件使他隐痛的事。这件事是不允许的，而他却身不由己地做了。他快步向克尼亚日科走去。克尼亚日科已经冲洗过上身，还在士兵们围着的哗哗淌水的水龙头旁转来转去，用毛巾仔细地擦着皮肤已经发红的、肌肉发达的身体。

“安德烈，我一直在欣赏你。”尼基金说，“真棒！你是块当步兵的料。”

“儿童把戏。”克尼亚日科漫不经心地回答说，然后又不满地说，“什么马克、战利品、纸牌、‘二十一点’，我们这是在消磨时间，把自己养得肥肥的，我们在开始堕落了。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大家都在盼望结束，可是总不得结束。把我们赶到这个远离柏林的地方来。是什么意思？不清楚。何况西边还在打。我们的那两个乳臭未干的主人情况怎么样？就是说，库尔特走了？这个爱玛留下来了么？”克尼亚日科问道，“你知道吗？”

“是的，他走了，到汉堡去了。”尼基金随即转过话题，“你听广播了吗？有什么新闻？那边怎么样？”

“柏林方面没有什么变化。”克尼亚日科答道。

早饭前他们检查了火力点。

炮兵连的阵地从离房子一百五十米的地方开始，大炮埋伏在苹果园围墙后而一块平地的边上。他们沿着一片寂静的湖边草地向火力点走去。草上还有露水，散发着湿润的清香。青草拍打着靴子。他们走着，就像很久以前在莫斯科郊外散步一样。早晨的宁静，前方是蓝湛湛的朗阔天空，阳光，大地温暖的气息，湖面上阵阵的水雾——这一切使尼基金感到陶醉。他首先打破

沉默：

“总是不大相信还没有结束。安德烈，到底什么时候结束？过两个星期？过一个月？”

“结束的时候结束，”克尼亚日科生硬地回答道。他停住脚，沉思地凝视着不远的火力阵地上的土丘。“我没有看见炮兵连的哨兵——这就是对你的问题的回答。大家的情绪完完全全是在过疗养生活。”

“到这儿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尼基金说，“有什么办法呢？安德烈？大家都感到快了……”

“连你的哨兵也这么想？他在哪儿？”

然而克尼亚日科错了。哨兵是在火力阵地上，正迷迷糊糊地躺在炮弹箱堆积成的侧坑里，用船形帽遮住刺目和直晒前额的阳光，冲锋枪斜靠在脚边，皮带耷拉在肚子上。当他听到旁边的脚步声后，立即缩起腿坐了起来，扭过头去，大声地咳嗽，好让人知道他在这里。为了以防万一，他吓人地大叫一声：

“什么人？站住！”接着忍不住大笑起来，懒洋洋的面孔上满是汗水，“啊，两位中尉同志！我听见有人到这里来，没有想到……”

“乌沙季科夫，没有做梦吗？”克尼亚日科声音冷淡地问道，“就拿我来说，只要平躺着睡，准会做梦。什么乱七八糟的梦呢？譬如说，德国人把哨兵连同大炮和炮弹一起偷走了。乌沙季科夫，可能吗？”

“没——有，我没有睡，中尉同志。身上落了露水，我稍微晒晒太阳，太阳非常暖和！”乌沙季科夫显得更加温厚。“从哪儿来？什么德国人？现在一切都静悄悄的，不管怎么说，柏林是我们的了。他们是些傻瓜蛋，还是怎么的？瞧，中尉同志，这是麦热宁中士送给我的，我将能确切地知道时间了。战利品！”

他非常幸福地伸出戴在手腕上的表，表玻璃和镍面迷人地闪耀着。他听听表，然后惊奇地低声说道：

“滴答滴答，德国鬼子，滴答滴答。干吗它滴答滴答地响呢？”

“有点像孩子，”克尼亚日科耸耸肩说道，虽然他比乌沙季科夫可能还年轻两岁。说完，他在炮架上坐了下来。他那双不爱笑的严肃的眼睛望了望湖后边细线一样的公路。有几辆汽车正沿着公路在淡白色的尘烟中从城里向树林开去。他问道：“怎么，战争以来才第一次有表吗，乌沙季科夫？”

“过去我没有，我想有……”长脖子的乌沙季科夫回答说，一面小心地用衣袖拂去表面玻璃上看都看不到的灰尘，爱惜地擦擦镀镍的字盘外壳。“表呀，这真是不可理解的东西。我是一窍不通。小小的轮儿在里面转动，像有生命似的，像有呼吸。走啊走啊，走个不停，仿佛里面有那么一些小人儿用小锤在敲打。中尉同志，它为什么要向人们报告时间呢？真有意思……没有表能不能生活？白天就是白天，夜里就是夜里。干吗人们要想出这么个玩意儿来，真怪！”

天真的乌沙季科夫接二连三地提出一些很普通的问题，并且像往常一样，对一些不值得惊奇的问题大惊小怪。克尼亚日科像是要发火了，双眉紧蹙，他那转向树林的脸绷得更紧，似乎这些朴实的问题中含有某种敌意似的。

“他不知道我早晨做的事，”尼基金想着，感到脑袋里恼人地嗡嗡作响。“我不想再回忆它，但是我记得她的嘴唇、湿润的头发……怎么能忘记这一切呢？”

“尼基金，”克尼亚日科非常激动地说，“注意树林。要么是我的感觉，要么是有一个斯拉夫人在用德国信号弹发信号。这些斯拉夫人已经疯了。”

“哪儿有信号弹？”尼基金说，“我怎么没有看到任何信号弹。”

“看湖的左边。这又回到我们的话题上来了。”克尼亚日科以肯定的口吻补充说，他已经毫不怀疑他看到的東西是真真實實的。

“湖的左边？”

一切都很平靜——遠處的草地在陽光下呈現一片淡綠，延伸着的明鏡般的湖面閃爍着粼粼白光，湖岸后面的松樹林邊氣流清澄。一片晴朗早晨的景色，嫩草勻淨的光澤，四周闕然無人，——只有公路上遠遠的有一列車隊像一條虛線從城里開向樹林。接着尼基金覺得，在湖左邊的樹林上空似乎突然噴出一種難以辨認的東西。一簇紅色的光點閃爍一下，變成變幻着的五彩繽紛的顏色消失在波狀的煙霧之中，仿佛是漸漸熄滅的焰火。不一會兒，又有四顆在陽光下變白的星點穿過煙雲射向蔚藍的天空中，在瞬息變化的閃爍中隱約可見，接着又無聲無息地消失在樹林上空的雲霧中。

“現在看見了嗎？”克尼亞日科問。

“只是弄不懂，為什麼？”尼基金說，“為什麼我們的步兵到那兒去？到那兒去幹什麼？”

“看來斯拉夫人吃飽了喝足了，用信號槍來打烏鴉，朝樹林里開槍。”烏沙季科夫說，眼睛瞪得圓圓的，稍微抬起身子，驚訝地伸長他那長脖子。接着，他半抬起身子，雙手拍了一下大腿：“這是怎麼的？是斯拉夫人閑得無聊，放几顆信號彈來消遣？他媽的，這些步兵！”

“完全可能，烏沙季科夫！”克尼亞日科說，想用語調壓下自己的疑惑，又對尼基金說，“可是，又為什麼……我們的哪個笨蛋會毫無目標地發射德國人的信號彈？為什麼？”

“我们的人就会这样胡来，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依我说，他们是用信号枪打乌鸦玩呗！瞧，车队朝树林开过来了，是我们的‘斯蒂倍克’！哪儿来的什么德国人？”乌沙季科夫半弯着身子站在胸墙上，因为自己的正确判断又惊又喜地叫道：“我们的车队来了，看见了吗？”

“是的，是我们的车队。”尼基金说。

在晴朗的天空下，可以看见车队——五辆盖着防雨布的“斯蒂倍克”——正沿着像一条白线似的公路一辆接一辆地开进粼粼发光的湖水岸畔的树林，从远处传来马达低微的嗡嗡声。车门侧面玻璃的反光的光点在树林边上跳跃消失。路边扬起的旋风似的灰尘，沿着公路下沉，像一道灰色围墙飘浮在驶入树林的最后一辆车的后面。但是，就在这最后一辆“斯蒂倍克”从视野中消失的一刹那，从那里突然传来三声不太响的爆炸声和好长一阵机枪声。回声在远处回荡。随后又升起几颗信号弹，没有一点烟，在天空画出几道亮晶晶的弧线。接着，在树林深处响起了激烈的、一阵紧一阵的冲锋枪声。尼基金立刻清楚地看到树林边的两辆“斯蒂倍克”：它们沿着公路向后倒退，打算拐弯。

第一辆汽车拐了弯，奇怪地摇晃着，开上了公路，车身笼罩在浓烟中，防雨布被撕成碎块，泛着深红色，在浓烟中飘动。接着，整个车身燃起了熊熊烈火，冒着火的车身歪歪斜斜地滑去，前轮扎到排水沟里，车子侧着挡住了公路。第二辆车子只来得及转了弯，没有刹住车，向右猛冲，车帮差一点闯到在前面熊熊燃烧的大火堆上，车子在排水沟和坑坑洼洼的草地上颠簸，绕过着火的“斯蒂倍克”，又开上了公路，开到最大的油门，在畅通无阻的公路上驶去。

但是，车子刚从草地转到公路上自由地飞驰，把燃烧着的“斯蒂倍克”甩得老远时，从树林边上横射出一团橙黄色的火球，

车子左边爆炸了，升起一股浓浓的烟柱。树林里飞来的第二发炮弹在“斯蒂倍克”车身的后面升起一团黑页岩般的烟雾，车身向上抛去，驾驶室上面鲜血飞溅。这团浓烟缭绕的烈火从公路上移开，越过排水沟，在草地上漫无目的地弯弯曲曲地滚过去，在离湖的砂岸二百米的地方停滞不动了。

“啊，这是什么？……这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乌沙季科夫半弯着身子站着，直到发出这声惊慌失措的、毫无意义的尖叫时，仍然这样站着。他叫了一声以后，就像只袋子一样，笨重地坐到炮弹箱上，充满焦灼疑惑的眼光从克尼亚日科身上移向尼基金。可是他们俩没有说一句话，只是望着公路。他们之间的沉默持续着，使乌沙季科夫感到惊惶难受，仿佛不可避免的死亡时刻就要到来。

“这是坦克在打我们的汽车。”乌沙季科夫惊讶地低声说，“天啊！它们从哪里来的？这么说，那里有德国人？”

“这是自行火炮打的，”克尼亚日科机械地答道，好像自己也很难作出决断，而当尼基金猛冲向炮位时，克尼亚日科突然对他大声叫道：“站住！没有用！算啦！离这里太远！你这是浪费炮弹，我不准许！”

“两辆汽车糊里糊涂地烧掉了，两辆汽车……就是说，我们的车队遭到突然伏击，”尼基金低声说道。他望着湖那边。在早晨的一片绿色和阳光中，两辆被自行火炮直接命中的“斯蒂倍克”在熊熊燃烧，几乎不冒烟。这时又看见第三辆汽车，不知怎么从树林里冲到公路上。这辆汽车沿着笔直平坦的柏油路在尘幕中朝城市方向疾驶，渐渐远去。隐藏在林边的那座看不见的自行火炮现在没有向它射击，可能是“斯蒂倍克”已经越出“蔡司”瞄准器的瞄准范围。

“去打电话，尼基金！快，去吧！乌沙季科夫留下！注意观

察！”克尼亚日科命令说，迅速地打量着两辆燃烧着的汽车，望了望树林那边。那里一颗孤零零的信号弹又飞向天空，然后一簇像云母般的火星在无声的蓝空中散开。接着，一片沉寂重又笼罩着大地，使人喘不过气来。

但是，当尼基金和克尼亚日科跑回连部时，炮兵连里也不平静。战士们一听到了射击声，就纷纷从房子里出来，走到草地上，有的嚼着饼干，端着饭盒里没有喝完的茶，带着怀疑和探究的神气望着果园那边，周围响起一片推测的声音：“是不是我们的地雷在树林里爆炸了，还是怎么的？”这时麦热宁中士微微一笑，像是要以洪亮的叱喊来消除这种紧张心理，说：“得啦，得啦！毫无意思地瞎忙什么？命令下来了吗？继续吃早饭吧，不用咱们也会弄清楚的！干吗嘎嘎叫！”然而，就在这时，他的长长的睫毛一闪，好像要贪婪地把走近来的两位军官的严肃的脸吸进自己清澈深邃的眼睛，颧骨上的肌肉也鼓了起来。

“又打起来了吗，嗯？”

“停止早餐。炮兵连，有警报！”克尼亚日科以命令打断了士兵们的喧闹。他微跛着和尼基金一起走进房子，而尼基金边走边向麦热宁重复着命令：

“全排，战斗警报！”

就在这间兼做办公室的房间里，或者叫客厅里，——昨夜因无事可做，大伙在无忧无虑地打牌、喝啤酒、听留声机，——尼基金突然在壁炉熏黑的炉口旁看见一个弯曲着的身影，披散在背后的熟悉的黄铜色头发，不禁感到刺心。他一时不能理解，爱玛为什么在这里。她蹲着，用火钳翻动着炉子上烧剩的一叠叠帝国马克，并把它们扒到簸箕里。当她回头看见了走进来的尼基金和克尼亚日科，惊慌地叫了一声：“啊！”把火钳和簸箕掉在炉篦上，就飞快地跑出房间。

“这德国女人。”通讯兵忧愁地把舌头弄得啪啪响。他是个善良的厚嘴唇的小伙子，正在电话机旁值班。“她非常舍不得。她走进这里，看见他们的钱烧掉了，差一点哭出来。中尉同志，外面干吗吵吵嚷嚷的？”

“接营部！”克尼亚日科命令道，“给您一分钟联系。”

“我只要一秒钟，中尉同志！”厚嘴唇的通讯兵坐在椅子上开始忙碌起来，身子抖动一下，摇着军用电话机的摇把。“难道是德国人？他们打哪儿来的？真是德国人？……”

第七章

这很可能是钻进树林的一支被击溃的德国部队。看来，它的下一个目标，要么是通过此地前往柏林，要么就是向西逃窜。只有一点还不清楚，就是德国人为什么不是夜里，而在早晨向我们公路上的“斯蒂倍克”车队开火，以这个笨拙的决心暴露了他们自己。或许，这是他们灭亡前的最后的残暴行为，也许是坦克部队某个绝望的指挥员想用公然袭击我们的汽车这个迫不及待的冒险来侦察一下：是什么人，什么部队驻扎在被围和沦陷的柏林城外围的这座小镇上。

尼基金“挂炮”的命令刚下达，便看到一群士兵跑到大炮跟前。因为面临令人窒息的危险而产生的一种揪心的感觉使他摒除了一切杂念。由于这儿不是前线，而这一场偶然的战斗又完全是不可避免的，他感到周身就像有许多冷冰冰的针在扎似的。过去每当炮兵连深夜胡乱闯进设雷地带时，他往往会有这种感觉。

这种感觉一直控制着他，——从他们在火力点望着炮轰地

段后面公路上的四门重型自行火炮和草地上的两辆装甲运输车缓慢地在兄弟炮连的火力网之外开过，心里焦急万分地等待汽车开来的时候，直到后来大炮挂上汽车，穿过花园和草地，突然出现在可以听到各种惊慌的命令和马达的吼叫声、挤满士兵的街道上，在挤得水泄不通的十字路口又被迫停下来，最后终于沿着这条公路由树林开往东郊的时候，——这种感觉始终控制着他。

它们在这里又停住了。前方，烟雾弥漫，埋伏在住宅最近旁的苹果园内的反坦克炮，有力地频频发射；左边，矮小轻便的“道奇”拖车，拖着大炮突然从院子里钻到大街上，沿着旁边的土路，像是不着地面似地奔驰着，绕过公路上的自行火炮、马车和野外行军炊车疾驶，向后朝市中心开去，挡住了迎面车流的去路。步兵们从车子里跳下来，像一根细链朝湖那边炮弹爆炸的地方跑去。一位上了年纪、样子严峻的中校，看来，是从指挥部来的，跑到因交通堵塞而停下来的炮兵连队跟前，脸色苍白，用手枪柄敲打着克尼亚日科坐的第一门大炮的车盖，喊着什么，用手枪指指树林；克尼亚日科稍稍打开车门，听他指示，点点头并向尼基金打了个手势：前进！

东郊地区转移中的这种一团混乱、杂乱无章、反坦克炮连续的枪炮声、大喊大叫的口令声、在这种情况下很有办法的炮长的命令声、疾驶而过的炊事车的滚滚轮声、战士们惊喜而又迷惑不解的面孔，所有这些近年来熟悉的神经过敏、不解和普遍的情绪激昂，都没有能向尼基金隐瞒过某种逻辑：在柏林之战和安逸地休息几天之后，谁也没有料到，甚至不可能料到，德国人会在后方发起进攻，同时，谁也没有想到要防御，谁也没有在郊区的房子旁边掘壕避弹。克尼亚日科“前进”的手势、步兵向湖边冲去、“道奇”拖车拖着反坦克炮在土路上好像要从侧面包围自行火

炮,快速疾驶,这一切都告诉尼基金:战斗不是在城里,而是就在这儿,在郊外被公路截开的旷野里进行,挂在“道奇”拖车上的反坦克炮及其炮兵连,正在直接瞄准着向那儿开去。

但是,几分钟以后,尼基金才明白,他错了。土路上尘土飞扬,反坦克炮连越来越向右开去,和公路成了一个锐角。步兵从左边迎着湖岸跑去。现在好像只剩下尼基金他们跟在克尼亚日科排的后面,直接沿着公路朝向自行火炮推进。他习惯地想,再走三公里就该在田野里下车并摆开炮阵。这时,他透过层层烟雾看到拖车上的第一门炮,看到阳光沿着长长的炮筒掠过。这些天来,这炮筒被太阳晒得发亮,像要接受检阅似的。他还隐约看见前边不远处自行火炮那巨大、模糊、笨重的炮身,还可以看到褐色木栅栏后面炮弹爆炸时刺眼的火光。“马上,马上咱们就要短兵相接了,大炮也要‘投入战斗’,而汽车则要向后退,隐蔽起来,在这儿,一切马上就要在这儿,在这田野里进行了!”在进入射程前的最后一公里,尼基金头脑里老是萦绕着同一个念头,同一个机械的命令。同时,像往常一样,暗自计算着现在急速在黑秒针和红秒针的尖端,在“非此即彼”的边缘上摆动的这个距离,一边设想着被汽车抛在旷野中的我方火炮一定会暴露在敌人准确的瞄准圈内。他像往常那样,心里感到一阵揪心,因为炮兵连的战士们大概不会全部从这次战斗中生还了。

“中尉,我们就像要淹死的人那样走运,”尼基金听到驾驶座旁边麦热宁的被马达和车身的轰响打断的声音,这声音以及他那严厉的、好像是盯牢在公路上并准备跳跃的目光,都使尼基金感到陌生。“一直向正前方……他们退却啦,啊?”他又喊着,眼睛眯缝着,像是有烟和一阵热风穿透玻璃扑打他的眼睛,“注意自行火炮,中尉!……”

“什么,自行火炮?哪儿看得见他们在退却?”

太阳照射着有毒的黄色烟雾，由于整个田野上不断的爆炸，烟变得更浓了，而且经久不散，积聚着，被射击的反光扯开。公路上透亮的缝隙中，显现出模糊的自行火炮的轮廓，摇曳着并渐渐消失。目前不能确定，他们到底是在前进，是原地不动，还是在退却。

与此同时，尼基金根据速度和时间估计，汽车已经朝自行火炮逼近了三、四公里，已经到了直线瞄准射击所必需的距离了，这会儿该开始战斗和开炮了，然而前面克尼亚日科的车子并未减速，还在继续疾驶。这一情况，尼基金起初以为是一排的一时糊涂和发疯。（还不开炮，开去送死！）然而，他认识克尼亚日科已有两年之久，就是现在他也很快地相信了他的冒险和慎重。因此，一种奇怪的希望，像一股强有力的热流涌上尼基金的心头：战斗将很快结束，比他想象的要快。莫非自行火炮是在退却？

自行火炮确实是一边匆匆忙忙地打着炮作掩护，一边沿着公路向树林、向它开出来的那片树林边缘退去。接着，前面一门炮断断续续地从排气管放出一道道刺眼的火花，灰糊糊的装甲板在阳光下隐约地一掠而过，笨拙地拐了个弯，向后退去。紧接着，又有三门自行火炮跟着它打转似地、笨重地动起来，在沿公路蔓延开去的昏暗中，一门接一门地向林边退却。这一切尼基金看得清清楚楚，他还同样清楚地看到两辆装甲运输车在湖岸边，迟迟不进攻，那儿，可以看到有我们步兵的身影倒下去又站了起来。只见装甲运输车一边开始向树林退去，一边向这些身影连续射击，大口径炮弹像一条条粗粗的虚线一闪一闪地飞出炮膛。

一开始对市镇采取瞄准进击的德国人，撤到树林里去了。而尼基金心中曾产生的、以为战斗会很快结束的一闪而过的希

望,是他的错觉,这个错觉并不给人以轻快的解决办法。

自行火炮缓慢顽强地向树林深处退去,马达发出深沉的轰响,许多小松树被它折断。它离开大路向看不见的林间小路爬去,一边不停地向公路射击。公路被两边高墙似的松树密密地夹着,成了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走廊,被一阵阵爆炸推向地狱般的黑暗,黑暗不断被沸腾的轰鸣划破,到处充满炮弹爆炸时掀起的烟雾。就像是在一个突然降临的漆黑的夜晚,低低的闪电不断划破夜幕一样,这时无法准确地断定,自行火炮退到哪里,它们是从哪里射击,又是如何在树林中改变阵地的。这种情况不明和两眼漆黑的状态,使尼基金产生了绝望的心情,他抓住从浓烟滚滚的黑暗中急速喷射出来道道火光的一刹那下了命令,几乎是盲目地进行射击。他心急如焚,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快,快! 快点走出这弯弯曲曲的鬼地方,走出这倒霉的走廊! 快,只要快! ……”

他看到大炮旁有一些灰暗的光点在闪动,心里推测着班里战士的面部表情。每次打炮后,透过轰响他都听到麦热宁在野兽般的疯狂地破口大骂。他没看见左边公路后面一排的大炮及大炮旁的克尼亚日科,甚至没朝那儿看一眼,因为战士们刚一听到克尼亚日科的命令,就把大炮拉到树林边上,推到公路两边密密的隔年的针叶上,立即投入战斗,开了火。这样,他们的联系中断了。

几分钟内,一切都消失了,不复存在了。尼基金发红的脸上热汗淋漓,火药的炽热气浪的冲击和没用泥土保护的大炮挡板上方弹片喷出的热气,使他的双目流泪。他感到,死神正在灼热的空气中执拗地游荡,用天使般的歌喉欢唱着,响得震耳,报复似地尖叫着,贪婪地寻找着僵硬的躯体,湿漉漉地打算闯进松树

林去，用小斧头砍掉树枝，切开土层，把柏油马路路面高高掀起，把毁坏的路面洒落在幸存战士的汗涔涔的脊背上，这些战士不知怎地也充满仇恨把死神胡乱地打发开去，似乎一个人活在世上的全部意义就在于此。德国的自行火炮和我方的大炮都失去了空间和距离，不见目标，似乎完全盲目地相互射击。等待着盲目的碎片，和好像在黑暗中进行一场什么也阻挡不住的肉搏战时的疯狂的感觉，使尼基金感到浑身无力，恐惧和狂怒使他神经质地颤抖起来。有一次，炮弹爆炸，打中了大炮前面的一棵松树，随着猛然折断的松枝带来的一股热风，他感到脸上挨了一下。他本能地捧住火辣辣的面颊，看看手指，并没有流血。一块红得发紫的锯齿状的小弹片打在他身上，然后落了下来，掉在脚跟前。这是大发善心的死神给他的记号和警告。于是，他喉咙里下意识地冲出一阵断断续续的笑声：“真走运，我真走运！……”谁也没听见他的笑声。他被炮声震聋了，忍着隐痛和耳鸣，用流泪的眼睛匆促地在硝烟中寻找着自行火炮的发射火光。看不见这些自行火炮，它们就在近处，可是不会受到伤害，都在无法测定的、好像有千里之遥的黑暗之中。

“快！快！……”

搬来了几次炮弹，卸着汽车。一堆堆发热的炮弹壳乱扔着，堆在炮架中间，不知是什么人用脚把这些炮弹壳都踢到了不断排出硝烟蒸气的炮尾下面。弹壳的铿锵声，麦热宁恶狠狠的破口大骂声以及战士们的叫喊声，在尼基金的意识中都和这急匆匆、半疯狂的“快，快！”声交织在一起了。

“快！……”

前面密林深处突然大火腾起，直冲天空，滚滚浓烟使火光显得昏暗，这时尼基金不知道，也永远不可能知道，这是谁打的炮弹误打误撞地击中了一门自行火炮。刹那间，前方无声无息了。

突然，他像发疯似的被一阵无声的狂喜憋得喘不过气来。他皱起眉头，还没明白过来，为什么要催促自己，就向第三门炮下了命令：

“麦热宁，前进！……”

他终于喊得声嘶力竭。他费力地扯开嘶哑的嗓门，转向第三门炮，迎面看到麦热宁汗淋淋、黑乎乎的、颧骨上肌肉鼓起的面孔，看到战士们的被硝烟抹得乌黑的凶狠的脸，看到乌沙季科夫的惊奇的、像害结膜炎似的红眼睛，他又一次声嘶力竭地喊道：

“前进！上车！穿过灌木丛！离公路远一些！”

“向哪里‘前进’？”麦热宁恶狠狠地说，“他们在哪里？连个鬼影子也不见。活像在黑人的胳肢窝里似的！去送命吗？”他又眯缝起眼睛，问：“脸怎么啦？抓破啦？没啥，中尉，能活一百岁！”

“趁他们不打的时候，前进！上车前进！”尼基金重复着，一挥手，做了个下砍的动作，坚定地命令着：“喂，前进，麦热宁！前进！”

现在他也讲不清楚，是什么力量不可抗拒地命令他、促使他离开阵地，尽管只要挪动十米。但是这时，从公路的另一侧传来了克尼亚日科威风凛凛的声音：

“三炮和四炮，前——进！……尼基金，前进！”

根据前面滚滚硝烟中越来越响的马达轰鸣，根据履带的咯咯声，已经可以明白：自行火炮在沿着公路，沿着南北向的林间小路退却了，于是尼基金和班里的人一起，用麻木僵直的肩膀使劲顶住大炮的挡板，他听见在密林里炮弹爆炸的间歇中，树林后面德国人的冲锋枪像踏缝纫机似地不停地响着，和我们机枪粗声粗气的哒哒声交织在一起。反坦克炮啪啪地发射着。他想起

草地上步兵的身影，想起城郊那些矮小轻便的“道奇”拖车，想起它们沿着林间小路斜着向树林开去，又非常嫉妒地想起：在不远的某处，别人正在进行另一场没有危险的战斗，那儿没有这些看不见的自行火炮，没有这种到处会碰上瞎眼死神的林间走廊。于是，他嘶哑地喊出跳入脑际的一句话：

“前进！前进！快！……”

“是！去玩命！祝您和克尼亚日科活一百岁，中尉，活一百岁！”麦热宁在旁边透了口气。他那热烘烘的、有力的肩膀挨着尼基金的肩膀，紧紧地顶住挡板。可是不知怎的，尼基金却觉得中士只是装出用力的样子，实际上他是在抵制命令，不让大炮向前推进。“您能活一百岁……”

“别说丧气话啦，你这个毒眼的家伙！”从下面某处，从炮轮那儿响起了乌沙季科夫刺耳的尖叫声。他从下面抬起头来，那张一向是善良稚气的脸，此刻涨成了紫红色，一道道的汗水冲洗着硝烟灰渣，在额头上留下了一条条花纹；使劲圆睁的蓝眼睛里闪着迷信预兆的恐惧，“别对中尉们说不吉利的话了！你要他们死吗？”

“他们会比咱们活得长，会埋葬咱们，就埋在这个树林里！懂吗？在柏林战役之后咱们要把小木牌留在这儿，他们会说咱们是英勇牺牲！是吗，乌沙季科夫？”麦热宁用令人窒息的怨恨的哈哈一笑作为回答。他那假装用劲的湿漉漉的多肉的肩膀，在尼基金的肩膀旁乱动起来。“命令我们死，我们就死！还怎么样？不费吹灰之力！我们反正是服从命令……我们玩命也要让某些人胸前挂上最后一批勋章！……”

麦热宁湿滋滋的肩膀轻轻的触碰，他那虚伪的俯首听命、假装使劲的样子，哈哈的笑声以及那在目前毫无意义的带刺的废话，起先并没有刺痛尼基金。他把这些看作不过是不久前他俩

争吵所激起的后发制人的水花，这件事尼基金根本不放在心上，就像多年前那些不必要地偶然发生的鸡毛蒜皮的小事一样；同现在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东西相比，这些小事简直不值一提。然而，麦热宁投过来又转开去的那浑浊模糊、探索的目光却刺痛了他。不，这不是记仇，不是他们争吵带来的后果，而是以前从没注意到的另外一个原因，一秒钟前他还不可能想到这个原因。“莫非是这个缘故？难道是这样吗？”战斗开始后，尼基金没有听到大炮旁麦热宁通常那像野兽一样奋激的命令声；没有听到他通常的夹杂着下流话和老一套的恶毒的手势、逗得士兵们轻松发笑的玩笑；没有在挡板左边或射手旁边看到他（记得，往常麦热宁总是不停地用难听的粗话催促运弹手）；也没看见他大声下了命令后拍着自己的裤裆，边跳边笑地说：“德国鬼子，给你们！……”假如没有他那勇敢鲁莽的毅力——这毅力好像能减少死亡的可能性，没有他那善于指挥的、不顾死活的进取精神，打炮时就会像缺少了什么似的，显得黯然失色，苍白无力。战斗开始时，尼基金并没有重视这些变化。这时尼基金一边推着炮，一边用肩膀擦着脸上的汗，看了麦热宁一眼，甚至恨得咬牙切齿，因为他突然猜透了麦热宁的心思，而这种心思正是他所厌恶的。

麦热宁低着头，用手顶住挡板，在大炮后面走着，被硝烟灰渣弄脏的嘴唇因为痉挛而歪扭，颧骨上蒙着一层油汗，皮肤紧绷得使骨头都凸了出来。他那被睫毛半掩着的眼睛凹了进去，闪着浅灰色的、发热病似的目光。尼基金看到了他的这种面部表情，这是一张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人的陌生的脸，这张没有见过的、不可置信的脸，损坏了麦热宁惯常的面容。尼基金从别人的事例深知类似的情况，他只是勉强地用断断续续的低语问道：

“麦热宁……怎么啦？怎么啦，麦热宁？……”

麦热宁面部抽搐着，齙着牙露出死人般的冷笑，然后，他张

大那双充满凶狠苦恼神情的眼睛,盯着大炮挡板下面的方向,嘶哑地说:

“干吗要往地狱里钻,中尉?四年还少吗?柏林一战还不够吗?您想跟克尼亚日科多捞一枚勋章吗?啊呀,你们这些乳臭未干的知识分子呀,就会瞎起劲!……往哪儿‘前进’呀?你们想在战争结束时把大家都埋葬掉吗?”

麦热宁对于自己的已被尼基金觉察的恐惧,对于自己也跟在自行火炮后面开始向前推进,感到怒不可遏,竟说出了尼基金不敢想到的事:在离前线和被摧毁的柏林几十公里地方、在安逸的小镇附近发生的这一场预料不到的战斗,对于大家来说是一场可怕的、毫无意义的战斗,完全是垂死挣扎的德国人不必要地和偶然地强加于人的。而在那个充满宁静、无忧无虑的休憩、阳光、春天的气息和丁香的芬芳的小镇上,还吹拂着战争结束、胜利在望的、令人眩晕的愉快的微风。在第一阵射击和第一门自行火炮着火后,尼基金不再去想这些,因为到了命运所选择的不可更改的时限,退路没有了。他在狂热地寻找出路,他的思想活动汇集到一点:唯一可能的解救办法是:“快前进,只要穿过去,结束在林中窄路中凶险的摸索!只要不被掩蔽起来的自行火炮射中!……”

这时,尼基金根据自己的体会敏锐地领悟到,是一种什么缠人的念头把麦热宁压倒了、折服了,顿时感到这种念头像倾出的毒汁一样带有使人瘫痪的毒性(“为什么?现在?去冒险吗?在战争结束时吗?”)。他回头朝麇集在大炮旁的士兵们看了看,他们骂着,根据他和克尼亚日科的命令,在沉重的炮架下面疲惫不堪地、艰难地使劲推着那不肯挪动的轮子。他用目光询问着,他们有没有听到麦热宁的这个完全正确的、不容置疑的抗议,同时还想,在跨出摆脱这尚未结束的战斗的最后一步之前,这种想保

全自己而产生的无法克服的恐惧，将把大家毁灭在麻木的无所作为的状态之中，因为自行火炮从树林里可以准确无误地把他们统统打死。麦热宁应该知道这一点，他不是头一天打仗，他这个三十岁的人，应付战争远比他尼基金要机灵得多，狡猾得多。

“麦热宁，麦热宁……”尼基金嘶哑地说，并换了一口气。他有点喘。“住口，明白吗？别作声，别作声，麦热宁！”

麦热宁愤怒地龇着牙，他那双被灰尘弄迷糊的、视而不见的眼睛离开大炮挡板，粗壮的脖子上暴出一条条绳索般的青筋。他挺着胸激昂地小声说：

“您想把大家都报销，统统报销吗？……”

黑烟滚滚的树林里，火光四起，天崩地塌般的爆炸猛烈地震撼着脚下的大地，以致使人感到，大炮的前面裂开了一个无底洞，从洞里掀起一个黑黝黝的巨物，它使喉咙里冒火，使大炮向后摇晃，使发烫的松针、被旋风刮下来的树叶乌云似地在头顶飞过。立刻响起战士们的七嘴八舌的、惊慌失措的声音，响起乌沙季科夫的假嗓子般的惊呼声：“怎么啦？他们这是怎么啦？……”但尼基金一边被梯恩梯炸药苦味的毒气呛得咳嗽着，一边用袖子抹着满是汗水的脸，把粘在脸上的、令人疼痛的松针抹得满脸都是，他无法回答，也看不清树后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突然的爆炸声很像是多吨位级的炸弹或远程炮弹的爆炸声。然而，既没听到它那钻入云霄的悲惨呼啸，也没听到树林上空那熟悉的飞机的嗡嗡声。

“怎么啦？那边怎么啦？他们自己炸自己啦？……”

“中尉同志！……”

“站——住！”尼基金喊道，“站住！”

在那情况不明的爆炸地点，好像有一幅昏暗的帷幕把公路、大地、树木、天空都遮掩得严严实实。一切都淹没在火光四起的

浓烟烈雾之中。只有装甲运输车打出的弹迹和一团团猛烈爆炸的火光不断划破这个黑色雾障。烟雾中自行火炮频繁地胡乱开着火。

“现在……”尼基金悄没声儿地说着，坐到一棵倒下来的松树上，一边摸索着从满是松针的脸上弄掉针叶，一边朝破得很厉害、熏得漆黑的赛璐珞图囊和地图看了一眼，顿时明白了：往后还会发生什么事。树林里的公路像线一样笔直，穿过狭窄的湖泊在林间小路的左边伸延着，湖西岸的拦水坝上可以看见有一座木桥。这时他更清楚了：德国人进了密林深处，过桥之后，然后从湖对岸开火，炸毁了桥，大炮对他们自行火炮的正面射击已经失去威慑力，德国人切断了可能接近他们的通路。

“桥，”尼基金说，“难道被炸毁了吗？”

在这同一瞬间，他不用看地图也确信这一点。被一阵凉风稍稍吹散的团团烟雾中，五月的阳光以锐不可挡之势，像一把扇面透过烟雾放射出一束束光，掠过裂开了的松树树干，掠过遍体鳞伤的柏油马路，掠过地上铺的黄针叶。在那不断发生爆炸的公路尽头，树丛中的林中湖泊波光粼粼，在阳光下像刀刃一样闪烁着铅灰色的亮光。在湖对岸的灌木丛中，炮火经常从那儿冒出来。在大家明白那边发生了什么事情之前，像雨声似的闷声闷气的响声、越来越大的哗哗流水声，从前面传到了大家的耳朵里。

“弟兄们，德国人把桥和拦水坝炸毁了！”不知是谁带着猜测、惊讶和恐惧的神情喊着，“那边是湖呀！水朝我们这儿流过来了！看，都流到公路上了！”

乌沙季科夫在大炮旁慌里慌张地跳起来，从挡板后面伸出下巴，尖叫着：

“这是怎么回事？”

接着又是谁的喊声从背后传过来：

“水流到公路上了！朝我们冲过来了！瞧！”

“别吵，把你们的喉咙都给堵起来！”麦热宁吼叫起来，一屁股重重地坐在横在尼基金身旁的松树上说，“我料到了，中尉，心里料到今天咱们不会走运，该撤退。叫车——退到树林边上……说真的，咱们暂时等一等……”

“车开到哪儿去？开到公路上去吗？到自行火炮的瞄准器底下去吗？”尼基金反驳着麦热宁的建议，“撤退，撤到哪里去？再到树林边上去？然后再回来吗？怎么，下撤退的命令啦？”

“什么命令？谁下？上帝下的？这儿，您和克尼亚日科是主人！”麦热宁龇着牙说，“你们要朝湖水开炮吗？想在德国鬼子面前显显泅水的本领吗？”

“我对您说过了，麦热宁，住口，别作声！明白吗？别作声！”

麦热宁不高兴地骂开了：

“好吧，那我们就在这儿掘一个阵亡将士公墓吧，小雏鸡般的英雄！可别忘了，我在阴间会搅得你们心神不宁的！”

“到大炮跟前去，麦热宁！”

从这里看得见，在前面穿过烟雾的一束束阳光下，汹涌澎湃的湖水涨高了，拍打着水泥堤坝的撞坏的缺口。湖水像水银似地闪耀着，淹没了整条公路，淹没了湖前面的洼地，顺着沟渠、沿着路边的灌木丛奔泻着，在松树树根周围漫流着，甚至使人感到，好像有一些肥大的鲤鱼顺着畅通无阻的小溪被扔到堤坝的缺口，迸溅出暗淡的金光，在涌到铺着厚厚的松针的路面的浅水里活蹦乱跳……它们在浅水里痉挛地跳动着，好像是子弹爆炸拍溅水面一样。

“你们看，好像有鱼？（“这是谁在叫喊？是乌沙季科夫吗？他干吗大惊小怪？”）弟兄们，活蹦乱跳的鱼！这是怎么回事

呀？……”

“住口！”麦热宁大喊着跨到大炮跟前，“几条鱼就把你逗乐了，狗崽子！把裤子脱下来——晃水去，傻瓜蛋！”

尼基金始终抱着希望：水不要淹着大炮，它将流到洼地里去，渗进土层，在离湖一百公尺的地方淹掉公路。可是水涨了，流进了排水沟，在洼地里流开了。他拒绝了麦热宁调上运输车的建议后才知道，炮班已无力徒手再把大炮向后推二、三百公尺了。他看见不声不响的士兵们脸上惊恐等待的神情，看见麦热宁那模糊、痛苦的眼睛。他没下任何命令，心里在想着他现在该怎么办：不，把大炮向后推，简直就是继续发疯，跟逃跑、跟自行火炮退到彼岸的退却没有两样，而且紧接着要重新投入战斗，重新前进，因为谁也没有，也不会取消克尼亚日科中尉下达的命令。尼基金脑子里所想到的一点，并不是简捷的出路，也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而只是出于无可奈何的急躁，是孤注一掷的行动，这念头像锤子一样敲打着：“快点结束，这一切都快点结束吧！拉着大炮穿过树林，绕过湖，从侧面绕过自行火炮，它们就会退去！但怎么个绕法呢？怎么拉呢？谁也没有力气了。”

“尼基金！尼基金！你怎么啦？”

他听到克尼亚日科的有点刺耳的声音。克尼亚日科猛然一跳，穿过公路，跑到大炮跟前，尖削苍白的脸上现出凶狠愤怒的神色，额头和脸上尽是硝烟灰烬，一对绿眼睛用审视的目光迅速从士兵们身上掠过，锋利的目光直刺尼基金的瞳仁。

“怎么，尼基金，打算游泳啦？”克尼亚日科怀着愉快而勇敢的战斗激情喊着。“你听见没有，友邻部队往右边去了，鬼知道仗在哪儿打！步兵也不知陷在什么地方了！面我们在这儿追上他们了！好极了！快让大炮穿过树林，绕过湖！别磨蹭，快！跟在我的大炮后面！暂时不要开炮！需要时再打，前进！”

“明白了。”尼基金点头回答。他感到,由于克尼亚日科的不可动摇的决心,由于他那清脆响亮的声音突然打消了他心里的疑团,他那颗紧缩的心在剧烈地跳动。

“快! 尼基金! 快, 弟兄们! 没有别的出路!”克尼亚日科大声喊着, 他那纤细的身影在烟雾中穿过公路, 消失在树林后面。涌出的湖水泡沫飞溅, 沿着草地凶猛地、毫无羁绊地向那边流散开去。

在克尼亚日科说话的时候, 麦热宁用闷闷不乐、表示反对的目光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像是既想反驳他, 又想反驳尼基金, 但他没有作声。当克尼亚日科消失在松树林里以后, 他便恶狠狠地齧着牙, 像是把满腔仇恨发泄到什么人身上似的, 用嘶哑的声音命令说:

“搬轮子! 推, 推! 用劲! 小心我掐住你们的喉咙, 打断你们的腿!”

人们抓着轮子、挡板和炮架, 扭过头来看着他, 好像不认识他似的, 火红头发的小个子塔特金嘟哝着, 撅着小胡子下面的豁嘴唇, 对这声野蛮的叫喊报以胆怯的吃吃一笑。

人们踩着在松树树干之间因为湖水泛滥形成的宽阔的泥潭, 推着火炮, 轮子一会儿陷进泥水里, 一会儿掉进林间积满了水的堑沟里。在湖那边炮火连天的情况下, 大伙不知怎么竟用全班人马的重量把炮架的制动锄压进了松土里; 弹片像一股股赤热的风暴在挡板上方呼啸着飞过, 泥浆随着燃烧过的令人窒息的硝烟毒气飞到脸上, 又一股股地流下来, 在肩头留下一摊污渍。在爆炸的那一刻, 搬运炮弹箱的人起初弯下身来, 在炮身周围围成一堆, 但很快就被笨重的钢炮弄得筋疲力尽了, 他们被自行火炮盲目的炮火震得耳聋, 被近处炮弹的爆炸气浪撂倒在地, 俯伏在满是松叶的泥泞中, 身子紧贴地面。爆炸扬起一团团的

烂泥，像喷水一样冲洗着脊背，接着又被克尼亚日科不知从哪儿厉声发出的命令催促着：“大炮，前进！”——这时，在疲惫不堪中抬起来并转向尼基金的不是人脸，而是一个个黑乎乎粘糊糊的变成畸形的面具，上面带着一个毫无希望的疑问：“啥时才是终了，中尉？”

“加油，加油，朋友们！”尼基金用机械单调的嗓音说，像是在可怕的昏迷状态中使自己和他们相信：他们所干的一切都是必要的。他摇晃着身子用肩膀顶住推不动的炮身，一边侧耳听着麦热宁嘶哑的叫骂。麦热宁在发了一通丧气话之后，整个样子都变得可怕起来，喉咙也因盛怒而变哑了：

“用劲，用劲，他妈的！在这音乐伴奏下死掉算了！屁股动一动！用一劲，把你们都装进棺材里去！……”

当人们沿着树林中的湖岸把大炮移动了几百公尺，穿过滚滚的浓烟，从被水和成稀泥的洼地里出来，走到宽阔干燥的林间小路上时，尼基金感到已经站不住了。他觉得两腿在发抖，嘴里有一股铁一般的苦味，就侧身倒在松树干上。他用发木的手指扯开军便服的领子，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想透一口气，干渴的喉咙渴望着喝水，他感到一阵阵的恶心，汗水蒙住了眼睛，太阳穴内像锤子似地扑通扑通地跳得震耳。他模模糊糊地看见右边克尼亚日科的大炮班已作好战斗准备，他无力去弄清楚，他是怎么、又是为什么会到这儿来的……

大家呻吟着、哼哼着倒在大炮旁边的地上，额头扎进隔年的针叶层。麦热宁一个人抓住挡板，张着大嘴痛苦地喘着粗气，红肿的眼睛凝视着快步从大炮旁走来的克尼亚日科。克尼亚日科不声不响地走着，边走边用手帕擦着被硝烟抹得乌黑的湿漉漉的手，他走着，长筒靴矫健地踩在草上，但走路时可以看得出有些跛，身子微微摇晃，显然他已极度疲劳，可是他把这种疲劳也

许看作是人的弱点而掩盖起来。他那苦恼阴郁的目光不耐烦地寻找着什么，探究着湖对岸的树林。

“你明白吗，尼基金？”他走到跟前大声说。“他们都走了，见鬼去了！他们炸毁了桥，眼下我们在这儿……”他被激怒了，脸色苍白，胸前军服湿透了，在溅满污点的船形帽下可以看见浅色的湿头发贴在额头上。此刻，他的外表失却了一向使尼基金感到惊讶的那种一丝不苟、恰到好处的整洁。“他们终于甩掉我们！沿公路溜走了。你知道吗？”克尼亚日科继续说，一边看着对岸，紧捏着拳头里的脏手帕。“你知道，结果是什么？结果是：不是他们躲开了我们，而是我们躲开了他们。愚蠢啊，愚蠢！放跑了三门罪大恶极的自行火炮！让它们到我们的后方游逛！我永远也不能原谅自己！……”

“算啦，安德烈，”尼基金无力地喘了一口气，吃力地接着说，“算啦……听着，安德烈，也许是应该如此吧。似乎这是最后一次战斗了，也许是我们走运了。”

“什么，最后一次战斗？最后一次战斗就该像个战斗，而不是……”克尼亚日科从牙缝里挤出一句粗话，以前他是决不容许自己骂出这种话来的。

“是啊，我不想打这一仗，”尼基金想，“可是他的感受却不一样……他感到什么？愤恨还是不满？”

前边的一切是异乎寻常的宁静。左边，他们的大炮穿过的洼地里，没有炮响，断桥周围也没有爆炸声。湖对岸，在阳光照耀下，在慢慢燃烧的火焰中淡红色的烟雾徐徐飘散着；松树底下一团团烟雾涌向水面：那里有一门自行火炮已经烧得不成样子，火苗就要熄灭，却仍在燃烧不息；在冒烟的树林后面，马达的吼叫和坦克履带的铿锵声都听不见了……远处反坦克炮的双响炮声也听不到了，只有好像一窝蜂的嗡嗡声从密林深处传来。湖

右边某处，冲锋枪不停地扫射着，枪声时而交织在一起，时而分开，在刚刚震撼树林的炮轰以后，这枪声好像游戏一般，并不使人感到危险。

“是步兵。”尼基金疲倦地说，“你听见了吗，安德烈？”

“我也听出来了，是步兵，”——一直把手帕捏在拳头里的克尼亚日科不客气地说。“树林里四门大炮对付三门笨拙不灵的自行火炮，还把它们给放走了！不，这些自行火炮逃跑，应该由咱们负责，尼基金！眼下它们会到后方去游逛一阵，还会打死我们的弟兄，决不止一个！对这些人来说才是最后一次战斗呢！……”他带着冷冷的固执的表情转向尼基金，每当他对自己不满时，脸上就会流露出这种表情。他突然问道：“你脸上怎么啦？啥时候碰破的？”

“啊，没事。无妄之灾。弹片擦碰的，没关系。”尼基金回答，焦干的嘴唇上露出一丝莫名的微笑，他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把他放进图囊袋留作纪念的一块小弹片给克尼亚日科看一下。这块弹片没有把他打死，只是使他想起了克尼亚日科本人从来没有说过的话，克尼亚日科认为，关于偶然性的种种说法，都是神经脆弱者的精神衰弱的表现。

“到湖里洗洗去，”克尼亚日科厉声说，只字不提尼基金脸上的擦伤。“你这副样子简直是……”

尼基金感到，要迫使自己用他这两条不听话的腿走上二十来步到湖边去，——湖上的浓烟已消失了一半，蓝天的倒影使湖水好像深了一倍，——走到阳光照耀的非常平静的湖水跟前，弯下腰，用双手捧起水，这不知要花多大的力气。他想说：“会好的”，然而他立刻看见克尼亚日科全神贯注的目光正看着林间小路的尽头，那儿，远处爆豆般的机枪声不断划破温暖的晴空，于是他也不由自主地向那边转过脸去。

“是这样，”克尼亚日科说，“友邻部队来了。”

在林中长廊柔和的绿荫中，两旁的松树干反射着金光。在这长长的林间小道的尽头，出现了一群人，他们突然从树林里涌出来，传来了口令声。这群人急急忙忙从林间小路的左边小步向湖那边跑去。一个方脸、头戴军官帽的人，大步跑在最前面，身上的雨披飘拂着，胸前挎着冲锋枪。他头也不回，非常紧张地喊着：“别掉队，弟兄们，别掉队！”他穿着牛犊皮的皮靴，在草地上跨着大步，浑身显出一股敏捷的麻利劲，他那矮小敦实的个子坚定地向着正前方。快跑到湖跟前，他第一个发现林间小路上的大炮，便威风凛凛地、警告似地把手一扬，大声命令道：“停止前进！原地待命！稍息！”说着，就像一只被踢出去的球，向大炮滚去，雨披像翅膀一样飘动着，他边跑边喊：

“炮兵们，你们这些龟孙子！你们在晒太阳啦，打炮的在太阳底下晒起脊背来了！享起福来啦？”

他气喘吁吁地跑到指挥员们面前，既高兴又气愤，那张湿透了年轻的脸上，还流露出方才那场战斗中没有松弛下来的、拼死拼活的那股劲头，那顶帽檐破烂不堪的饱经风霜的军帽滑到脑后，乌黑的眼睛眼神灵活，眼皮上有一圈烫伤的红斑，那双眼睛惊慌不安地一会儿瞅瞅大炮，一会儿瞅瞅尼基金，一会儿又瞅瞅克尼亚日科，像是没有找到应该在这儿找到的东西。

“你们这些东晃西晃的浪荡鬼，后方的炮手，战争之神！你们到底是朝什么人打炮！你们躲在太阳底下睡大觉！你们要保全你们的屁股啊？”他用步兵的习惯于催促、因为愤懑的鄙视而激昂的嗓门，冲着他们嚷道。“你们的日子过得可真美啊，这些梁赞来的后勤兵！打了几发炮就晒起太阳来了？你们的战斗结束啦？你们坐着，像给钉子钉住啦！”

“去你的吧！……”尼基金突然发起火来。“像马一样嚷嚷

什么？见您的鬼！从哪儿冒出来的？”

克尼亚日科只是动了动眉毛，依然是那副冷冰冰的执拗的神气，他矫健地挺直身子，把手掌放到太阳穴上，冷冷地打着官腔（在这官腔后面隐藏着压抑的愤怒），用平静的语调问道：

“请问，您是什么人？我是炮兵连执勤连长克尼亚日科中尉。我想让您知道，您是在跟谁打交道。请您别嚷嚷，安静一点。要沉得住气！”克尼亚日科皱了一下眉头。“请您说说看，您嚷嚷什么，是怎么回事？”

“什么嚷嚷不嚷嚷的！眼下在打仗，我的人死掉了。而你们这些战争之神，却在晒太阳！”

步兵放低了嗓门，他的气势有点被克尼亚日科的这番话压下去了，他不安地时而瞅着在松树树荫影里等着他的自己人，时而瞅着大炮，炮下面的炮兵班的士兵们被这种高声喊叫所惊动，晃动着脑袋。这儿看不清他们的脸，只看到许多难看的黑点。这个步兵突然以紧急的动作抽搐了一下，他那又扁又翘的鼻子张开了两个大鼻孔；他从帐篷般的雨披下伸出手来，非常激动地把手举到破帽檐上。

“我是上尉连长别尔林。这是为了让您也知道，是谁在粗野地骂您。得啦，两下对消了！”他牙齿一闪，把拳头从太阳穴处甩下来，就像是把帽子甩在地上似的。“得啦！一拳来，一脚去，也就完了！咱们彼此又不是外人，朋友们！帮帮我的忙吧，中尉，啊？炮火支援我一下，好吗？我怎么也没能把这些小爬虫……德国鬼子从林务所赶走！”他已经用恳求的语气热情地说着，“他们待在房子里，那边是墙。瞧，他们正在打冲锋枪呐！叫你无法迎头痛击！装甲运输车还在那儿帮他们的忙哩！哪怕用齿轮开个道儿也行啊！我自己带一个排从后面包抄过去，——可是这样做需要时间，中尉，而且是毫无把握的呀！最好能给他们两发

炮弹，这样，我就能把他们像蟑螂一样统统给挖出来！啊？怎么样？炮兵弟兄们，两发炮弹就能把装甲运输车给压下去，那他们就完蛋了！怎么样？我求求你们，弟兄们，衷心地恳求你们！不要让一连人都报销啊，步兵也是人啊！弟兄们，眼看战争就要结束了，干吗还要叫人去死，谁都想活下去！支援一点炮火吧！怎么样？用炮火把他们这班娼妇给熏出来！”

尼基金看见，这个一分钟之前还很粗鲁、威风凛凛的矮个子上尉连长的面孔，现在却是一副讨好、恳求、低三下四、甚至有点局促不安、不好意思的样子；他还看见炮兵班一张张惊慌失措地抬起的脸，并在别人的目光中认出了麦热宁的阴沉、仇视的目光，这目光是射向步兵、射向这位也许是穿过炮火涉水过来苦苦哀求支援的步兵连长的。但转瞬间，尼基金被一股怨恨气得满脸通红，心想，我们炮兵是怎么和为什么到这儿来的，湖堤是为什么和在什么情况下被炸毁的，湖对岸的一门自行火炮是为什么和在什么情况下烧掉的，现在在这个步兵看来，都是无关紧要的，对他来讲，重要的是要在这最后一次战斗，最后一次进攻中，使自己的在林务所附近的一连人保存下来。于是，他毫不隐瞒对这个步兵的挖苦，不友好地问：

“您干吗要披上雨披？这会影响发起进攻吧？或者您是想求雨？”

“影响？双料糊涂蛋！是为了不让子弹击中！”上尉喊着，他的口音变得流利了，并且涎着脸皮逗起趣来了。他抖了抖满是被打穿的洞孔的雨披下摆，说：“看见了吗，有多少？每一次冲锋以后就留下一个标记！是从德聂伯河穿起的！这可是个护身符！我求求你们，不是为了自己，弟兄们！请你们设身处地想一想！我无权在柏林战役以后把自己的小伙子们都给埋葬掉！我已经埋葬了他们几百个人了，还要再埋吗？总有人该活着，除非

我们都不是人了！……”

“住口！把地图上的林务所指给我看。”克尼亚日科嫌恶地打断他的话，从图囊中取出一张柏林战役前发的崭新的地图。“在哪儿？”

“哎呀，中尉！根本不用地图，就在旁边！在林间小路的尽头，沿土路再走三百公尺左右便是。湖的东北角上，就在旁边！”上尉用变得粗糙的手指在地图上点戳了一下，指甲里净是泥巴。“中尉，你根本不需要看地图。你不相信我的话？你不是参谋人员吧？看地图干吗？”

“我是想知道，我能否从林务所出来，回到公路上。”克尼亚日科不容争议地打断他的话，一面把别尔林的手指从地图上推开。“您要知道，我应该完成自己的任务，而不是向我们尊敬的步兵们蜷缩在那儿的林务所开炮。这么说，”他放下地图说道，“土路穿过树林与公路相连，大约两公里。好极了……你说呢，尼基金？不反对吗？”

“难道他就决定啦？”尼基金想。克尼亚日科的斩钉截铁和过分认真的执拗使他打了个寒噤。“他还指望在公路上与自行火炮相遇吗？不，我们这是在做一件失去理智的事！”

“你是炮兵连长。”尼基金闷声回答，这回答是对他的间接的赞同。

“拿别人的身份证进天堂吗？”麦热宁在大炮旁哑着嗓子说，“步兵，这是寄生虫，在俄语里你们知道是怎么称呼的吗？这个词你们知道吗？……”

“那太好了，”克尼亚日科用眼角瞟了一下麦热宁，令人莫测地说。然后，他扣上书包，想着自己的心事，皱着眉头对别尔林说：“太好了。让我们来看看你们的林务所吧。把你们的人都叫来，可是要快！你们帮炮兵班推大炮！下命令吧！”

“好样的！鬼东西，我忘不了你们！我就喜欢这样的人！我尊敬你们！”上尉喊着，一高兴猛然从脖子上扯下冲锋枪，朝空中啪啪打了一梭子。“到这儿来，步兵们，你奶奶的！火力支援来了！我们使劲来推大炮吧！快——快！”

尼基金对上尉，对他那高兴的大叫大嚷，对那些无力奋起进攻而要冒险攻占林务所的步兵们一直怀着敌意。他们一星期以前就该去占领林务所，现在却高兴地沿林间小路慢跑着，来寻求意想不到的炮火支援。尼基金痛心感到他在抗拒克尼亚日科的决定，抗拒自己的赞同，尽管同时他也知道，他们大概不可能作出别的决定。

第八章

在离林务所还有二百多米的地方，步兵们看到炮兵来支援，欢欣鼓舞，他们叫喊着，忙乱地拥挤着。大炮沿着长着些杂草的林间小路推进。根据树林后边越来越密集的枪炮声，——根据大口径机关枪低沉的隆隆声，根据德国人冲锋枪刺耳的尖叫声，根据我方回击的连发声，根据密林中子弹飞落时的唿哨声以及打在断树干上又弹回来的啪啪响声，——根据所有这些声音，尼基金揣想并感觉到，在他们向前推进的地方，一场近在咫尺的战斗已成为不可避免的了，因而心里对这个扁鼻子、罗圈腿、迷信地不愿脱下那件破烂不堪、满是弹孔的雨披的步兵上尉就越来越仇恨了。上尉，这个莫名其妙地姓什么别尔林的诡计多端而且蛮横无礼的饶舌家，显然以为炮兵连是因为取巧而及时退出战斗，袖手旁观，安然地休息起来，在太阳晒热的地方舒舒服服

地躺下享福，而他的步兵却在出生入死，在没有火力支援和炮兵的援助下，还在履行自己殊死的职责。

“讨厌的小子，”尼基金怒气冲冲地想，“他那个好像被打断了的宽鼻子多么丑恶！”

别尔林、克尼亚日科和尼基金，他们快步走在大炮前面，上尉雨披的下摆摇摆着，胀鼓鼓的。雨披旧得褪成肮脏的灰色。他那激怒的、因发惯命令而练就的步兵的好嗓子，不时被狂热的笑声所打断：

“咱们马上给他们捅个窟窿，把他们的肝刺破！要是有四门大炮来猛干，我们就能把臭虫从缝里给熏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转入冲锋！我一边迂回跑着，一边想：唉，我们只好永远呆坐在这儿啦！于是我就忙得到处抓瞎，一转头，看见了你们。我就想，假如说没有神的话，那么，战争之神还是有的！哈——哈！（“他干吗要扯这许多？在表白吗？”尼基金想。）我说，我来试试向这个神祷告祷告……现在我的两个排把房子给包围了！注意，^①弟兄们！差不多了。从这儿打那幢房子就更近了。……”

“停住！”一次也没有同别尔林谈过话的克尼亚日科向炮班下达了命令。“原地待命。走吧！让我们去看看你们那儿的情况。”他向别尔林命令道，“连的主阵地在哪儿？您在前面走。”

在这儿，他们沿着开阔的大路伸直身子走了不过几米，跟在别尔林后面刚向左拐进不通风的松树丛里，射到这里的机枪的嗖嗖声，打在树干上一阵阵的子弹声，从上面掉下来的打断的针叶枝杈，就使他们本能地稍微弯下身子，看着别尔林领他们去的方向。别尔林正穿着自己那件“有魔力的”雨披穿过小枞树丛向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树丛后枪声交织的方向走去。

在那里，他们才走了百十步，就撞在一个被打死的德国人的尸体上，那人像一个绿色的隆起的东西靠在一棵大松树有结节的树根旁。他身穿一件草绿色的新制服，很别扭地躺在那儿，侧着身子，佝偻的姿势像是在逃跑的垂死挣扎中永远僵硬着。一条腿蜷在肚子上，另一条腿穿着尚未穿坏的、落满尘土的皮靴，直伸着。他的年轻的、孩子般的脸上蒙上一层死尸的蜡黄色，右鬓紧贴在抽搐得像小勺子的、血迹斑斑的手指上，呆板的恐惧的怪相使他的脸变得难看，嘴巴在临死前呼救时大张着凝固了。然而，那少女般的柔软的亚麻色的长发还像活人的头发，在透过树枝投射下来的阳光下闪闪发亮，仿佛以这永不消失的亮光来掩饰他在这儿遇到的灭亡。尸体的脸上密密麻麻地爬满了褐色的蚂蚁。蚂蚁在睫毛上乱爬乱钻，沿着不动的嘴唇爬到张开的嘴巴里，吸干最后一点水分。尼基金想，他也许被打死才个把小时。

“这孩子是打哪儿来的？”克尼亚日科皱着眉头问，又向别尔林点点头说，“看看他的证件，他是什么人？是希特勒青年团员还是狼人？大概，他才十六岁光景……”

“喂，中尉，十六岁不十六岁又有什么区别，关你什么事？”别尔林回答着，放肆地朝脚下的德国人吐了一口唾沫。“他们是从林边退到这里的林务所来的。他们在这树林里倒下的又不止一个。关你什么事？自找麻烦，浪费时间……”

然而，他蹲了下来，装出厌恶的神气挨个儿翻了死者的衣袋，但是什么证件也没找到。有的却是老兵根本不会带在身上的一些不需要的和几乎是无用的小玩意儿：毫无用处的、精致的小铅笔刀，带匕首和卐字图案的失去光泽的什么纪念章，通条上的小链子，坏了的、没有扳机的勃朗宁小手枪，咬坏了笔帽的红

铅笔，一包刚打开的、碎了的饼干。小钱包和照片都没有，看来，这个被打死的男孩还没有什么使他牢牢留恋这个世界的东西：没有爱情、往事和恶习。他像是很喜欢发亮的金属东西，大概他喜欢手持冲锋枪，时刻准备听命开枪，就像玩机械玩具似的。于是尼基金想到了自己和其他人对金属武器的强烈的爱好以及对他在军事学院毕业那天第一次领到的自佩手枪的迷恋，心里想：“不久前他还在上学哩。”

“小孩子，”克尼亚日科沉思似地、含糊地说。“很想知道，他是打哪儿来的？是城里来的吗？尼基金，你看呢？”

“也许是吧。”

“死了一个小希特勒分子，口袋里乱七八糟地尽装些臭狗屎。”别尔林说着，拿起那些毫无用处的小玩意儿朝这个德国人的尸体上扔去。“这小子连手表都没有。”

“哎呀，您太不文明啦，步兵军官。”克尼亚日科眼睛冒火地催促着别尔林，“往前走吧！领我们到你们连队阵地去，上尉！”

尼基金没有吭声。他不喜欢多看被打死的人，看那些有时是可怕的、不舒服的、难看的姿势。这些姿势标志着永远凝止不动的痛苦或是最后的求生的抗争。他们临死前，面对终了的痛苦而惊骇得变了形的脸、那眼球凸出的无神的眼睛，那似乎是对活人的冷酷的讥笑，或者，那有时绝望地意识到注定了要到那虽则可怕可是却再也无人开枪的地府里去因而得到些安慰的表情——他不忍细看。尼基金讨厌那种硬说什么上述情景是不难习惯的呀之类的话。他觉得别人死时的样子，就是对自己的一种预告，提醒你，在战争中个人的生存是很没有保障的。它无情地使死亡的可能性逼近，范围缩小。在战争中死亡的可能性只有一次会被视为无限的，那便是第一次参加战斗的时候。

“那个德国人是头一回打仗，”尼基金一边和克尼亚日科在

别尔林后面并排走着，一边想。“当他在我们的炮火下逃离林边时，他就明白了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战争。他当时大概没有冲锋枪，只顾逃命而把枪丢掉了，就像是丢掉一个毫无用处的玩具。哎呀，我干吗要想这些？”

越是接近前面啪啪的枪炮声，接近机枪嗖嗖的尖叫声，机枪扫射的唿哨声越是刺耳，尼基金心里就越是发凉，越是恶心。尼基金抱着他保证会走运的信念，曾千百次硬着头皮从那厄运的利斧下，从充满仇恨、万能地主宰“非生即死”的境地通过。但经过同自行火炮那场中断的战斗后，这种面临危厄的感觉令人特别不舒服。为了抑制住胸口一阵新的冷冰冰的感觉，尼基金看了看克尼亚日科，竭力揣测着他现在是否也有一种类似的有损尊严的卑微想法，就像一阵丝毫没有减轻的恶心那样。

克尼亚日科轻轻地走着，举步跨过松树根，忧心忡忡地皱着眉，令人无法理解他此刻在想些什么。

“就在这儿！停下，炮兵们！”别尔林在灌木丛中停下，突然命令道。“朝前看！从这儿的树丛中什么都看得见！大炮就该放在这儿。看，他们就隐蔽在那里！装甲运输车在车棚后面，在房子左边。”

“只不过，”克尼亚日科冷冷地说，“请不要规定大炮该放在什么地方，又怎么个放法。这我们自己有数。你们的指挥所远吗？”

“就在旁边。到这儿来，中尉，到柴垛这边来。我的副手留在那儿了！啊，这儿的地方随你选，从这儿到处都能打中他们的狗头！”别尔林回答。

他一边喊着什么人，一边弯着身子在灌木丛右边向堆得整整齐齐的矮柴垛又走了十来步，一眨眼，就像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从那儿迎面走来一个很年轻的、长着两只招风耳朵的少尉，

年轻的脸在那儿东张西望，只听到他那急匆匆的声音：

“上尉同志，您回来啦？这些人是谁？”

“小声点，拉甫连季耶夫！”别尔林粗鲁地制止道，“祷告上帝吧，我把炮手们领来了。你们这些鬼疗养者，都像在海滨浴场上一样地躺着，而进攻就要让你们的大爷来干啦？”

“您瞧，他们都在干什么！”拉甫连季耶夫尖声喊道，这嗓门一点儿也不像个步兵，尼基金根据少尉那崭新的武装带，根据他那解开来的没有破损的手枪皮套不难断定，他不久之前才开始打仗。

在离林务所大约二百米的最靠边上的松树旁边，哪怕只待一分钟也是冒险的，林边被炮火封锁了，子弹噼哨着，像一群群啄木鸟在啄着树干。他们三人只得全都站到柴垛后边隐蔽起来，从这儿观察敌情，因为这样毕竟在某种程度上要安全一些。

拉甫连季耶夫也许是因为当着炮兵们的面受到别尔林粗暴指责而感到委屈，仍旧站在一堆柴垛旁，自顾在那儿抖掉粘在军便服上的针叶树的小针刺。

“弟兄们，问题是这样。那座房子你们看清楚了吗？”别尔林边说边用发红的黑眼睛看着林间空地，突然朝拉甫连季耶夫大声呵叱着：“喂，别玩了，钻过来，招风耳的英雄！”

是的，前面的情况已经清楚了，尼基金是怀着对别尔林及其连队不快的心情期望弄清这种势态的。被德国人阻拦在这儿的步兵连的这种明显处境，不在于步兵的惊慌失措和无能为力，而在于树林后边现在清晰可见的那座坚固的小楼（那幢楼房坐落在宽敞的林中空地当中，四周是附属的小木屋），那里有一种就像刚才和自行火炮遭遇时那样的乱哄哄的疯狂劲儿，仿佛是在德国鬼子没有间断的盲目的炮火下注定要死亡的垂死挣扎一样。步兵们躺在最边上的松树下隐蔽着，没有爬起来，没有东跑

西窜,也没有在开阔地暴露自己,可是德国人却一直不停地向树林、向林中空地的每一米地方射击:整幢房子,从楼下被打毁的窗子到阁楼,到处都张牙露嘴地搏动着冲锋枪子弹的一束束光痕,被左边附属建筑物的一角隐蔽了一半的装甲运输车,用大口径机枪守护着房子,断断续续地、隆隆地喷出一道道白色虚线般的子弹,打在林中空地周围的松树下面,看得见那儿匍匐着的步兵们的身影。

“这简直像个游乐场,弟兄们……只要你们朝那批汉斯、弗朗斯^①猛开炮,我就放信号弹让我们的小伙子们都站起来,”别尔林用雨披揩着被风吹得粗糙的宽脸上的汗水。“进攻的信号是红色信号弹,以免你们误伤我的士兵。”

“他们根本不会进行肉搏战,”拉甫连季耶夫说,庄重地咳了一声,猝然中断了他那不那么刚毅的尖细的声音,严峻威武地从手枪皮套里掏出一支崭新的“TT”^②手枪,炫耀似地用手指一扳,弹出子弹匣,以此证明里面确有肉搏战时所必需的子弹。

“你瞧,我的拉甫连季耶夫多么麻利!想拼刺刀了!”别尔林用扁鼻子哼了一声说。“可你知道,我亲爱的患难之交,在整个战争中,我只有一次像英雄似地在德军的堑壕里挥舞枪托,即便如此,立刻就送去大修了三个月!既然有冲锋枪子弹,刺刀只能用来开罐头,你那肉搏战也就该见上帝去了。得啦,你像小孩说梦话一样地瞎插嘴,插得也不是个地方,真见鬼!”

“可我有自己的看法,上尉同志,”拉甫连季耶夫蹙着眉头嘟哝着,同时莫名其妙地吹吹手枪。“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多好的小伙子,”尼基金想。

① 汉斯、弗朗斯都是德国男子的名字。

② 苏联重型手枪。

“知道了。”克尼亚日科说，微微向拉甫连季耶夫笑笑，看来，他也喜欢这个小伙子。接着他便命令尼基金：“这儿有一门大炮和两箱炮弹就够了。其余的在火力网外待命。”

“一门大炮就够了，有把握吗？”尼基金怀疑起来。“不管怎样，放上一个排直接支援不更好吗？”

但克尼亚日科打断了他：

“绝对有把握。又不打坦克。让麦热宁的炮到这儿来。这儿的位置不错，在柴垛的左边。把大炮从来的那条路上拉过来。”

“那我走了。”

“支援步兵一门大炮和两箱炮弹就行了吗？他为什么这样沉着、这样有把握呢？”尼基金想，“他不会低估什么吧？他以为一切都会很简单吗？”

过了十五分钟左右，尼基金在步兵连的协助下，还从原来那条路，穿过树林，把大炮拉来了。克尼亚日科踏着赤褐色的针叶，在柴垛旁边前后来回地踱着，一边用一根小树枝打着膝盖，偶尔看看上面，那儿密集的子弹唿哨着，弹跳着，把松树皮打得裂开。尼基金刚一露面，他就用树枝不慌不忙地在地上画了一个圆圈，命令道：

“大炮放在这儿。没有更好的位置了。装甲运输车和房子都在扇形射击圈内。大炮投入战斗！”

“投入战斗！”尼基金喊了一声。当他看到炮班在挡板的掩蔽下干起来，把炮架拉开，用身体的重量把制动锄压到沙土里以后，便马上又下了一道命令：“把制动锄埋起来！埋到支架为止！麦热宁，注意别让大炮跳动！牢一些！牢一些！”

麦热宁那张活像是对命令不理解的呆板的脸，从大炮挡板下面露出来。他那睫毛抖动着的眼睛溜着林中空地，溜着从这

儿看得很清楚的林务所的建筑物。突然，他吼叫起来，声音盖过了整个炮班。

“把制动锄埋起来！把炮架给卡住！”

他弯下腰，胸部挨到跪着在瞄准器旁爬来爬去的瞄准手塔特金身上，一只手使劲按在他那瘦弱的肩上，疼得塔特金那长着红头发的脑袋猛地向后一仰。

“怎么啦？”他喊道。盖住他那豁嘴缺陷的褐色小胡子下面，露出一口小牙齿。

“你瞎忙吧，会计，滚你妈的蛋！”麦热宁嘶哑地说，把他一把拉起来，推到后面去，自己笨重地往瞄准器旁一坐，眼睛眉毛一起扎刺进了瞄准器的眼罩。

“是您，麦热宁？……”尼基金说。他知道，当过瞄准手的麦热宁，在射击时的那种又狠又准、又快又从容不迫的本领，都是很高强的，只是他决定亲自来瞄准，似乎有点不可理解。

没有得到回答，尼基金也没有再问他什么，他已经听到了克尼亚日科那响亮清晰、微微拖长音节的熟悉的命令：

“向装甲运输一车……”

他觉得，打了第一炮后，装甲运输车的灰色车身上好像冒出了许多火星和刺一样的火光，机关枪扫射声突然不响了。腾腾烟雾像旋转的螺旋那样在建筑物上空盘旋着；接着，一个黑乎乎的、好像人体的东西沿着车帮晃晃悠悠地倒了下来，两个人影弯弯曲曲地冲到房屋跟前。尼基金断定了这是直接命中，便又急忙下达了第二道命令：

“向右 0-04，用开花炮弹向房角射击！……”

扔进炮尾里的炮弹短促地当的一响，只听见乌沙季科夫惊讶地喊叫：“有人朝房子跑去啦？”麦热宁的一只肩膀笨拙地抬了起来，慢慢地滑动着，一下滑到手压的扳机上，顿时，中士的后脑

勺和胖乎乎背部，由于射击后大炮的后坐力而猛地向后倾去。接着，麦热宁满是汗水的额头重又紧贴在瞄准器的眼罩上。但是，当他往后倾的时候，他的侧影在尼基金的眼前闪了一下，只见他歪扭的嘴上有一道很深的皱纹，压抑着满腔仇恨，像是喝醉酒的脸上带着疯狂的表情。

第二发炮弹在歪歪斜斜地倒在屋角旁的黑压压的人群旁边爆炸，在他们后边两米远的地方，升腾起了黑红色的浓烟，弹片和浓烟扑着墙壁。麦热宁急急舔着焦干的嘴唇，再次全神贯注地瞄准，嘶哑的喉咙里说出来的不是有意义的词语，而是像用斧头砍东西时发出的用力气的、闷声闷气的音响。由于他和大炮合为一体，由于准确的射击，一种希望战斗能有个幸运结局的奇怪的力量使尼基金感到有了希望，因而过去他们中间发生的一切充满敌意的使他们疏远的事情，刹那间消失了，溶化了，被他遗忘了，谅解了，大概也被麦热宁遗忘了，他因为这儿开始的战斗中给敌人带来的巨大杀伤而欣喜欲狂了。

“下命令吧，中尉，下命令吧！……”

当炮弹的第二次爆炸打中了屋角的两个德国兵的一刹那，在装甲运输车后面飘落的硝烟尘土中间，林中空地上突然显得一片寂静。大口径机关枪不响了，冲锋枪也沉默了。附属建筑物内部的碎玻璃纷纷落地，叮当直响。从林务所被打坏的窗子里，立刻传出一种虚弱的、歇斯底里的嚎哭似的喊声，这声音也停息下去了。

“停住！停止射击。好样的，麦热宁！”

“不，这不是我下的命令，这是克尼亚日科，是他下的。”尼基金想。

克尼亚日科像平时一样沉着地挺身站在大炮左边十步左右的松树下，一边用树枝打着膝盖，惊奇地、甚至带着厌恶的怜悯

注视着那幢房子，——人们往往就是这样注视着那些倒在路上、挣扎着企图站起来的无力的畜生。

“他干吗阻止射击？为什么？现在应该朝窗子打，哪怕打一发炮弹！”尼基金想，他看清了柴垛旁边的别尔林和年轻的拉甫连季耶夫都朝着大炮伸过脸去。

“好样的！弟兄们！再来，伙计们！压倒他们，炮手们！把他们这帮坏蛋烧死在里面！”别尔林喊着，同时，他披着敞开的雨披跑到克尼亚日科跟前，并朝房子那边挥了挥信号枪。“还要把他们抠出来！然后我们开始冲锋！弟兄们，再来两发炮弹吧，亲爱的！……”

“尼基金！向窗口打两发炮弹！”克尼亚日科命令说，因为愤怒，额头上露出一条皱纹。同时，他又顺便向别尔林喊了一句：“打炮的事请你们不要干预，也别瞎嚷嚷！否则我就不打炮啦。”

“下命令吧，中尉，下命令吧！”麦热宁也没有离开瞄准器，沙哑地说。他的右肩重又抬起来，那只放在扳机上的手正不易觉察地慢慢往下按，等待着命令。“下命令吧，中尉！……”

他一次也没有离开瞄准器，好像是凭直觉，以极其敏锐的、闪电似的速度推测着是否该连续射击，一面心里催促着自己、尼基金以及整个炮班，他们单是看到他肩膀一抬，就注意到了他的准备动作。

“向窗子射击！打两发开花炮弹！……”

没有看到爆炸。两发炮弹在屋内炸开了，剧烈地摇撼房屋，带着破裂的声音将砖头瓦片掀上天。一团团淡黄色的烟雾从一楼窗户里涌出来，一阵可怕的嚎叫声突然汇成一片从那里冲出来。这种垂死前绝望的、注定要死亡的嚎叫从楼下冒烟的窗户里冲出来。接着，在这嚎叫声中，突然听到用德国话下的命令和房子内部零零落落的枪声。尼基金背上一阵发冷，设想着神炮

手麦热宁打的那两发开花炮弹造成的后果。

“下命令吧，中尉，下命令吧！”麦热宁发疯似地不可抑制地重复说。每打一炮，他就像用斧头砍东西似的发出短促的喉音。“再来两炮！再来！下命令吧！……”

屋里的嚎叫没有停息。

“他们那里怎么啦？”这像一阵微风拂过全班。“他们在哭还是在喊，啊？”

这时，尼基金看见手里老是揪着小树枝的克尼亚日科那苍白的、因为痛苦和惊讶而抽搐的脸。远一点，还看见眯缝着细眼睛、两手捂住耳朵的拉甫连季耶夫少尉的脸，还看见别尔林。别尔林在高声喊着，甚至带着得意的幸灾乐祸的神气哈哈大笑，挥着信号枪，雨披大敞着，他那发号施令的嗓音在破口大骂，声音刺耳：“叫他们投降，这帮坏蛋，叫他们投降，没跑的！……”尼基金瞥了那幢房子一眼，即刻看到有一块像白布片似的东西在窗口飘了一下，但似乎马上就有人从屋子里声音不太响地放了一枪，把它打掉了。这白色的东西闪了一下，不见了，然而那被恐怖激起的许多嗓子的叫喊声却像一股浊浪从窗口冲出来，时高时低，就像失火时在被火焰笼罩的、锁着的房子里的人声那样。

“叫你们这帮坏蛋投降，坏蛋，投降！……”麦热宁一直没有离开瞄准器，断断续续嘶哑地说。“把那个白东西收起来了，挥了挥手帕！下命令吧，中尉，下命令吧！再向那儿打两发开花炮弹！叫他们都变成烤羊肉……叫他们变成一堆臭狗屎……我说，上炮弹！”

“住手！一发也不许打！”克尼亚日科喊着，把小树枝用力一甩，走到尼基金面前，脸色像死人般苍白，激奋地、很快地说：“听着……大概这都是些小家伙，像被打死的那个一样，都是些孩

子！……他们不会打仗。看来，我们是要把他们统统打死！他们挂出白旗又收回去了。他们是狼人还是希特勒青年团员……他们怀疑我们是否会饶了他们。他们怕当俘虏……住手，别打了！”

自从克尼亚日科在德聂伯河进炮兵连以来的两年战争中，尼基金没有发现他有过一丝的迟疑和犹豫。如果优柔寡断跟他那略带高傲的、使人服从于他的直接行使的权力一样，也是他固有的特点的话，那么尼基金就会多少明白或完全明白他刚才说的那番话了。

“你说什么？”尼基金问。“我不懂……你说什么？”

“住手！谁也不许打！步兵！别尔林！一发也不许打！”克尼亚日科转向别尔林喊道。满脸斑斑点点的拉甫连季耶夫少尉像根细柱子一样在别尔林旁边微微摇晃着。“听着，别尔林，一发也不许打。这样他们也会投降的，别尔林！只有我下命令才准开炮！只许听我的命令！……”

他下了这道命令后，一切都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只是脸上那透明似的苍白还没有消退。他以熟悉的动作用手摸了摸武装带，把额头上的船形帽稍稍扶正，皱了皱眉，不知为什么边走边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手帕，离开大炮径直朝林中空地前最边上的松树走去，可以看出他稍微有点瘸。在一片碧绿的草地中可以看到，他毅然把手帕举到头顶上挥动着，一字一顿地用德语喊着几句话。尼基金只勉强听懂了几个字：“别开枪”^①和“年轻人”^②。但克尼亚日科这种完全出人意料的、使人惶恐不安的行动，他不准继续同盘踞在房子里的德国人进行力量悬殊的战斗的命令，他那似乎有些正确又似乎完全正确的决定，既是一种

①② 原均为德语俄译音。

毫无意义的冒险，又是克尼亚日科好像要用自己清醒头脑的疯狂的一着来制止对方的疯狂的一条出路，因为他受不了德国人这种畜生般的嚎叫，而这嚎叫是在对准窗子打炮后引起的。

“他在干什么？他上哪儿去了？中尉，你一往一哪一儿一去？……”

别尔林的那双黑眼睛好像烧伤了尼基金，他那方方的身体在大炮侧面晃了一下，靴子喀嚓喀嚓地踩着树枝跑到柴垛跟前，抓住惊慌失措的拉甫连季耶夫的武装带，摇晃着他，冲着他的脸喊：

“快！看准目标！叫他们一发也不要打！你的魂掉啦？啊！……快长翅膀飞去！”

他因为自己的无能为力气得发狂，用信号枪枪口把军帽的硬帽檐从湿漉漉的额头上狠劲向后一推，微弯的罗圈腿跳过树根，再次奔到尼基金跟前。

“中尉，中尉！”他几乎是用信号枪敲着尼基金的胳膊肘，指着林中空地对尼基金说：“他怎么啦？他是你们的天使吗？是圣人吗？谁需要这一套？”

尼基金没有回答。他只清楚地感到一点，那就是：克尼亚日科现在做的事情，只有克尼亚日科才做得出，无论是别尔林，是他尼基金，是麦热宁，还是炮兵连长格拉纳图罗夫都无法阻止他和改变他的决定。这一点，尼基金是知道的。

听不见枪炮声了。林务所里的嚎叫声还未停息。个子不高、细腰、外表冷静的克尼亚日科本人此时也像个小孩子，一边挥动手帕，一边在草地上有节奏地迈着急健步伐，在林中空地上走着。他把一只手放在嘴边，清晰地喊着德国话，让房子里的人能更清楚地听到他的喊话。前面疯狂的嚎叫声停息了。在一片紧张的寂静中，只见楼下窗孔里露出几个影影绰绰的人头，接着

那儿响起了命令声和几个人的尖叫声。转眼间，从阁楼的窗洞里胆怯地、犹豫不决地挂下一块布条，在阳光下泛着白色。

“好了，万事大吉了！你们的天使真是好样的！”别尔林嘴巴里热烘烘的烟草味直冲尼基金的耳朵，他再次用信号枪不知轻重地敲了一下尼基金的胳膊肘。“好样儿的！……”

尼基金顾不得对别尔林这种粗鲁的高兴劲儿发火，也没听清别尔林在他耳边大声咕噜了些什么，他看到了也许克尼亚日科还没发现的情况（因为他照旧泰然自若地朝房屋走去）：阁楼上被打坏的窗口的那块白布片不见了，消失了。刹那间，探出一个戴着黑色圆便帽的人头的黑影，人头很快向旁边一闪，阁楼深处响起一阵不像人声的气喘吁吁的喊声。在这一刹那，林中空地上猝然响起了隆隆的炮声，像是房倒屋塌的声音，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在黑洞洞、空荡荡、烟雾弥漫的深渊边缘，一切都猝然停止了，好像后面什么都不存在了。

这一阵轰响，以及从戴圆形便帽的人影闪过的窗洞里发出来的机枪扫射的白光，好像打中了克尼亚日科的胸部。他退后一步，突然一个趔趄，又向前迈了一步，头一仰，便奇怪地、轻轻地跪了下去。整洁考究的军帽从头上掉下来，露出了总是梳得很整齐的浅色头发的小分头。他筋疲力尽地用手帕在脸上擦了一下，仿佛还想回头朝大炮看一眼，最后一次看到后面的什么东西，便突然耷拉下脑袋，扑倒在草地上，在阳光照耀着的林间空地的中央，依稀可以看得出他。

“这就是他们送给我们的礼物！打死人啦！我们的中尉被恶棍打死啦！”

“什么？！这是麦热宁的声音吗？他干吗离开炮位跑到我这儿来？为什么？是克尼亚日科？安德烈？难道是安德烈？当真是他？难道这是当真？这是卧倒的步兵吧？是别尔林？在这

儿？在追击自行火炮之后？在今天？此时此刻？在扯出投降的白旗之后？是从阁楼里打的枪吗？他是受伤了还是打死了？在这场跟孩子们的战斗中？什么孩子？房子里有人在喊！他为什么要去？是别尔林吗？别尔林在喊些什么？炮班怎么样了？他们在哪儿？炮弹呢？炮弹！炮弹！把这座房子给我打烂它！消灭它！烧光它！到安德烈那儿去！到安德烈那儿去！我知道，他没有被打死！不，他中弹了！打中胸部还是打中了头部？炮弹！炮弹！”

尼基金像失去理智一样，发疯似地喊着，嘶哑的喉咙里好像塞进了一个铁块，他既听不到自己和别人的声音，也看不见在大炮旁忙碌的人们苍白的脸。他失去知觉，失去了全部必需的自制力，昏昏沉沉、模模糊糊地感到大炮由于射击在震动，有一团毛茸茸、火一样通红的东西在前面爆炸，一块块圆木纷纷落在地上，被一股红色旋风映红的浓烟，从炸得不成样子的阁楼窗口涌出来，房顶上密密匝匝地炸了好多窟窿，碎瓦下面露出了光秃秃的屋架，屋脊被炸得七零八落。尼基金一直没有清醒过来，甚至在有人一把紧紧抓住他捏成拳头的手指时，他也没能马上清醒。刚才他在下命令的时候，正是用那几个手指无意识地敲打着松树，把树皮剥掉了，以致手指受伤流血。现在麦热宁站在他面前，浑身大汗，被硝烟熏得满脸乌黑，睫毛也蒙上了烟灰，只有一双发炎的眼睛是红的。他握紧着尼基金的手腕，叫他清醒清醒，一面阴郁地小声告诉他：

“炮弹用完了，中尉。一颗也没有了。我们上那儿去吧。”

“什么？用完了？”显然，声音没有透过蒙住知觉的黑色帷幕传到尼基金的耳朵里。“怎么用完了？被打死了？克尼亚日科被打死了？”

他哆嗦着，两腿发软。

“走吧，中尉。”麦热宁又说了一遍，垂下眼睛，在林间空地一片沉重阴郁的寂静中，拖着步子向什么地方走去，空地上弥漫着烈火浓烟……

“炮弹打完了？安德烈在哪边？……到安德烈那儿去！他被打死了吗？他被打死了吗？……”尼基金转着念头。

林间空地上，浓烟前面热气蒸人，一片寂静，没有一声枪声，火光冲天，林务所在燃烧，大火的前前后后响起了步兵又高兴又凶狠的声音，看来，他们都为能冲向房子而兴高采烈。士兵的喊声像子弹爆裂一样散开来，听来不像人的喊声，很像是另一个星球上的生物发出来的，它们不理解，而且永远也不会理解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在林务所前面的林间空地上，克尼亚日科已经躺了好几分钟，他被迎面直射的机枪子弹打倒在地，一个简短得无可挽回的、毫不留情的呆钝的词——“阵亡”——已经落在他身上。

“克尼亚日科被打死了？安德烈被打死了？这不可能，这是胡说！搞错了！随便打死谁也不能打死他！就是不能打死他！”

尼基金想着，一层混混沌沌的帷幕掩住他的知觉，当他像顶着逆浪摇摇晃晃地走到克尼亚日科跟前，模模糊糊地先看到他的身体还没看见他的脸时，他还没清醒过来，没有恢复常态。克尼亚日科的身子怪别扭地躺着，头弯在手臂上，手里一块鲜血淋漓的手帕还捂在胸口，仿佛要想掩住人们的视线，不让他们看到这置他于死命的一击。在那该死的林务所附近保全了自己士兵的这个步兵连长别尔林，还穿着那件破旧怪诞的“护身符”雨披，不知为什么蹲在地上，扁得难看的鼻子，因为屏住呼吸鼻孔翕动着。他轻轻地从克尼亚日科僵硬的手里取下染上了死亡颜色的手帕，小心地用结实的短手指摸着他的胸口。他在草上擦了擦手指，抬起乌黑的、像狗那样负疚的眼睛望着尼基金，又把眼睛

转向一旁。他身材矮小结实，浑身是劲，他欠起身子，打着呼哧，像在竭力压低自己因为下惯命令而变粗的嗓门，说：“两颗子弹一下子就……打在心脏附近。”尼基金望着克尼亚日科软瘫的姿态和草地上的手帕，感到自己真想揍别尔林，揍这个扁脸、塌鼻子、有一副铁嗓子的男低音、在粗野的外壳下保全了自己性命的人。于是他仇恨满腔，恶狠狠地喊道：

“您听着，上尉！把您那件避邪的雨披脱下来，滚它妈的蛋！该让他躺在雨披上……快！听见没有？！”

接着，他浑身颤抖着俯身弯向克尼亚日科的头部，两手小心翼翼地把他脸翻过来，这是一张苍白的、溅满鲜血的、平静得似乎超脱尘世的、年轻得不可置信的脸，这样的脸尼基金从来没有见过。他觉得，好像什么东西堵住了喉咙，使他窒息。这令人伤心的痛苦，眼前发生的这件不公道的东西，这种无可弥补的损失，使他眼看就会大哭一场或者竟会大笑一场。

克尼亚日科僵死的脸上的这种表情，跟他平日使人折服的清心寡欲的沉着刚毅的表情，完全不一样。眼前这种表情表明他在最后一刹那看到了以往和平的日子——那时他的义务是另一种清闲的义务，读读书，在学校附近雨后蒸发着水气的柏油马路上散散步，——看到了在战争中被他克尼亚日科和尼基金都已忘却了的可爱的童年生活，如同自己母亲的声音也被忘却了一样。但是克尼亚日科很少谈到往事。也许是那一直梳着成人的分头的浅发赋予他孩子般的表情。可现在，头发被打乱了，像一个斜角搭在苍白的鬓角上。看来，这头发是在灼热的子弹穿进胸膛的一刹那才打乱的，那时他跪了下来，不知为什么用手帕擦了……下脸。

“中尉同志……”

“什么事？谁？干吗叫我？这是谁？是麦热宁？”尼基金想。

“中尉同志……连长来了。……”

“连长？从哪儿来？哪个连长？”尼基金还是没有作声。

炮班战士们都围拢来，个个都是脸色阴沉，默默无言，在死者面前肃静无声，他们身上的军便服还没有干，脸颊上汗水一道道流下来，冲洗着污垢。矮小的瞄准手塔特金毫无必要地在肚子上揉着船形帽，乌沙季科夫伸长了脖子，眼睛一眨也不眨，因为这件他永远不能理解的事情发呆（中尉的命令声还在耳边回响，他还记得克尼亚日科挥着手帕，朝气蓬勃地健步走在林中空地上的情景）。这时，麦热宁和步兵别尔林已经摊开雨披，麦热宁心情沉重，非常仔细地把雨披在草坪上铺好、拉平，仿佛还在关心克尼亚日科，要让他躺得舒服些。他一面铺，一面说，并没有抬头看尼基金：

“连长来了，中尉同志。”

“把他放好，”尼基金轻声说，“放在雨披上。我们把他抬到大炮跟前去。”

“我可怎么对格拉纳图罗夫说呢？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都告诉他吗？把整个战斗情况重述一遍吗？真怪，格拉纳图罗夫和克尼亚日科不是朋友。”尼基金漠然地想着，好像是在想一件多余的、复杂的、眼下无需去想的事情，这件事正在使他的思想离开这不可思议而又可怕的简单情况，“是啊，是啊，格拉纳图罗夫活着，克尼亚日科却已阵亡……”

于是他朝着他并不想看的方向望去。

是的，格拉纳图罗夫上尉终于忍不住，在卫生营待不下去了，就上这儿来了，并不知道战斗已经结束，他来，就像去动物园区和昨夜到连里来那样。他那辆一星期前在柏林街上缴获来的豪华的“奥贝尔”轿车就停在离炮兵阵地五十米的林中空地的尽头，——林中的大路大概是从那儿开始的，车身浅色的油漆和玻

璃窗闪着亮光，好像玩具似的。格拉纳图罗夫下了车，他身材魁伟，绷带吊着的一条手臂，缠着厚厚的纱布，他老远就看见了林间空地上的一群人，于是就迈大步朝这边走来。后面加丽雅紧跟着连长也下了车，她同司机讲了几句话，关上车门，整了整戴在黑发上的船形帽，跟平时一样一本正经，她在后面赶上格拉纳图罗夫，也朝这边走来。

“她来干吗？他为什么不一个人来？”尼基金脑子里闪了一下，顿时有一阵深沉的、病态的悲恸压抑着他。

他们越走越近，尼基金也越来越清楚地看清了他们的脸：格拉纳图罗夫脸色黝黑，满脸乱蓬蓬的络腮胡子，他神情紧张，全神贯注地凝视着这群战士；加丽雅抬起清秀的面孔，预感到恐惧和痛苦，她脸形顿时变了样，变得陌生了。

她在这群战士中仔细地辨认着，没找到克尼亚日科的熟悉的身影，看来她以女性特有的敏感一下子就意识到这儿出事了，只见她加快脚步，好像感到窒息似地用一只手紧压着喉部。尼基金咬紧牙齿，他感到，她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她的理智还接受不了这一切，还在跟已经成为无可逆转的现实进行抗衡。

“克尼亚日科在哪儿？……克尼亚日科呢？”格拉纳图罗夫走近给他让路的战士，喊道。他那乌黑的眼睛震惊地睁得老大，显然他料想不到会看见他已面临的现实，他像狮子一样张大了嘴巴，结结巴巴地重复着：“怎么会是克尼亚日科？怎么是克尼亚日科？他是怎么死的？尼基金，你怎么不说话？这是怎么发生的？是在这儿发生的吗？是死在这儿的吗？……”

“以后再说吧，连长，看在上帝的面上……”

尼基金还能说出这几句话，可他简直听不出这像被铁箍箍住的声音是自己的声音。有一瞬间，他不知该怎么回答格拉纳图罗夫，也不知怎么回答加丽雅才好。加丽雅已经走到雨披旁，

一手按着喉咙，似乎有点支撑不住地站在克尼亚日科的头旁。尼基金这辈子没见过这样的大理石般苍白的脸色，没见过这样呆板的、冷酷无情的眼神，也没见过船形帽下面那样乌黑的头发，像翅膀似的遮住她一侧苍白的脸颊。旁边，麦热宁正不情愿地苦着脸代替尼基金向格拉纳图罗夫报告事情的经过，连长要求详细说明在阁楼窗洞里射出一梭子弹以前，克尼亚日科中尉生前最后几分钟的情况。加丽雅抿着毫无血色的嘴唇，没有提任何问题，一直麻木不仁地沉默着，她什么也没有听见，像被冻僵了似的，令人认不出来了，她望着麦热宁手里的图囊和手枪套，这是从克尼亚日科身上取下来，作为他阵亡的遗物的。过了一会，内心的痛苦使她嘴角抽搐着，她呻吟了一声便跪倒在克尼亚日科的头前，用微微颤抖的手指摸了摸他被血污的额头，（为什么他在临终前一刹那还用手帕擦擦额头？）又抚摩了一下胸前子弹打中的地方，背过脸去，伸直了腰，但没有马上站起来。她眯缝着眼，面对着使她怨愤迄今、现在终于彻底理解了的事。

“加丽雅……”尼基金想喊她，但嗓子不听使唤，他撇着嘴，只是推推麦热宁的肩膀，叫他别再讲了。

麦热宁话说了一半便停住了，他迷惘地从肩后瞟了加丽雅一眼。格拉纳图罗夫和别尔林也同时随着中士阴沉的目光把头转过去。眼前的情景、少尉军医这个一声不吭的女人的在场，把别尔林弄懵了，他不知所措，觉得不便开口，就清清嗓子，沙哑地小声问麦热宁：

“她一是谁？是他掙带来的吗？”

“别一说话！住口！”格拉纳图罗夫狂吼了一声，他那巨人般的身躯凌驾在小个子别尔林之上，他用那只没有毛病的右手在别尔林的向后躲让的扁脸旁一砍。“别说话！你的任务是俯首听命！不许作声！知道吗？”他转向还在燃烧的林务所，骂道：

“卑鄙的家伙！法西斯流氓恶棍！他为了不流血，为了拯救他们，到他们那儿去，可是这些心毒手狠的家伙，竟向他开枪！啊，就是他们，兔崽子，就是他们！我倒想看看这些亡命之徒！喂，步兵！干瞪眼做什么？下令把他们押过来！快！”

林务所的全部一楼被大火吞没了，各个建筑物里火焰熊熊，浓烟滚滚，旁边的一座附属建筑物里，大概有一头受了伤的母牛正大声喘着粗气，拖长声音使劲哞叫着。从那边走来一群人，穿着各式各样的德国服装，有制服，有军装衬衫，也有普通便服。他们是一群在步兵进攻时投降的俘虏。这一群人挤做一团，由两个身上挂满了缴获的冲锋枪的战士押送着。这两个人不时回头用询问的目光看看年轻的拉甫连季耶夫少尉，后者正喊着口令，挥着手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队伍旁边，赶着这群俘虏，嘴里喊着：“朝前走！快！”^①

“喂，上尉，叫他们上这儿来！把这些坏蛋押过来！”格拉纳图罗夫命令别尔林，他怒不可遏，还未等上尉下命令，就向步兵少尉喊起来：“喂，那边是谁？当官的！把俘虏带到这儿来！跑步！”

拉甫连季耶夫少尉向两位押送的人说了几句什么，那两人就在俘虏们周围跑起来，用冲锋枪指指右边，喊着：“快走，快走！^② 德国鬼子！”于是这群乌合之众就互相挤轧着，推推搡搡加快了步伐，拐向右边的林中空地。拉甫连季耶夫赶过俘虏，他因为投身战斗而激奋，腮上泛着红斑，支棱着一对招风耳，精神焕发。他一阵小跑第一个到达跟前，五指伸直举到鬓角上，来了个立正。当他看见别尔林身旁站着个陌生的上尉和一群帽子拿

① 此处原为德语。

②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在手里、满头大汗的炮兵时，便结巴起来：

“上尉同志……”

“你怎么？有事向他报告吗？”格拉纳图罗夫打断他的话，用头指指别尔林。他全身抽搐着，迈步向走过来的一群俘虏走去：“立定！立定！^①原来是你们这些家伙哇！打算拼死到底？在战争快结束的时候？是你们朝手无寸铁的俄国军官开的枪呀？好吧，让我来见识见识！”

俘虏们被格拉纳图罗夫的喊声和两个押送战士威慑住，更紧地挤成黑压压的一团，硝烟熏得乌黑、疲惫不堪的脸上脏兮兮的，透着油亮，几十双充满血丝的恐怖的眼睛呆板地望着耸在他们面前的、身高近两米的格拉纳图罗夫。他的嘴痉挛似地扭歪了。

“你们搞的什么鬼？该死的。^②希特勒的脓包，你们把尿壶当冲锋枪了？想开枪？”格拉纳图罗夫威胁地说，一双迷糊失神的眼睛紧盯着这些德国人的脸。

这时俘虏当中有一个男孩般的细嗓子尖叫一声，哽咽着哭了。但从密集的人堆里立即响起另一个官腔十足的、严厉的吆喝声，打断了呜咽的哭声，于是人群立即恐惧地骚动起来。这时，格拉纳图罗夫破口大骂着推开第一排俘虏，从人群中拖出一个骨骼粗大的大胡子德国兵，这人穿一件满是灰尘、拖脏了的德国军服，头戴草绿色便帽，右边的肩章已经撕掉，斜挂在肩膀上，他那被仇恨激起来的傲慢锐利的目光乱动，像个发狂的疯子，嘴唇打破了，在密密的大胡子中间看上去黑乎乎的。他在格拉纳图罗夫脚边发出蛇一样的咝咝声，缓慢地、不经心地说着：

① 此处原为德语。

②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俄国猪！全是猪！^① 伊凡……一堆臭猪屎！^②”然后像操练似地一个转身面朝那群无声无息的俘虏，又鄙夷地骂了一句，骂声被一阵愤怒的笑声打断了。

犹如一阵水花一般，这不过是在击溃后所作的一次毫无意义的、最后的无力挣扎而已。这阵笑声和狂热的怒火，仿佛是一股电流敏感地触及了每一个人。麦热宁眯缝着眼，很快朝那个德国人扫了一眼，绷紧的颧骨上鼓起的肌肉疙瘩在抽动。格拉纳图罗夫使劲抓住大胡子德国佬的肩膀，把他猛地拉到自己跟前，让他像陀螺似地拧过身来，将他的脸对着自己的脸。当那个德国佬再次沙哑地、恨得上气不接下气地骂了一句听不懂的话时，尼基金看到加丽雅那双没有眼泪的、目光呆滞的眼睛死死盯住这群俘虏。

“连这种大胡子也给俘虏来啦？真是些自由主义者！啊，你奶奶的。瞧我们是多一么善良啊！”格拉纳图罗夫像德国人刚才那样笑了一声，他那绷带缠吊着的左手臂不灵活地往上抬了抬，而右手怒不可遏地从举起的左手下面抓起有点磨破的手枪皮套，解开很难解的按扣。“把这种人也俘虏过来？还想让他们生儿育女吗？还想让他们活着吗？”他后退两步，呼吸艰难地说。“他们还指望当俘虏吗？当俘虏？不——不行！我叫你瞧瞧，大胡子恶棍，我要为克尼亚日科报仇！……来啊！”他冲向加丽雅，大声喊着，同时龇牙咧嘴，狂怒地把一支手枪塞到她的手里。“叫他见鬼去吧！见鬼去吧！我批准！叫他到阴间去！朝他开枪，开枪！我命令你，开枪！我命令你，开枪！为克尼亚日科报仇！为克尼亚日科报仇！……开枪！”

突然，像是由于憋在喉咙口的无声的恸哭，她那军装下面隆

①② 原均为德语。

起的胸脯轻轻抬动了一下，一绺黑得出奇的头发在她那大理石般的面颊上微微飘拂，前面一排德国人呆呆地看着她那擦得干干净净的长筒靴，看着她的膝部，还没弄明白这一切是怎么回事，眼睛迷迷糊糊地盯着她的手指：她手里的手枪抖动着，就像是一块死沉死沉的石头。

大概，在那一刹那，俘虏中谁也没来得及弄明白：这位长着漂亮的瘦长脸蛋和一双什么都看不见的、冷淡的眼睛的俄国小姐，会对他们施以暴力，会开枪。最右边那个瘦瘦的、长着淡黄头发的男孩，穿着肘部撕破的制服，完全像孩子似地讨好面可怜地试图看到她的目光，胆怯地朝她笑笑，他把这当作是他不久前做过的一种游戏。……尼基金也不相信，她马上就会开枪。突然，他看见，她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咬紧苍白的嘴唇来忍住没有流下来的、使她颤栗的眼泪，哆哆嗦嗦、笨手笨脚地匆忙扣了一下扳机，结果手枪砰的一响之后，就像一团活的东西从她手里滑掉下来。她丢掉手枪，捂住太阳穴，摇着头呻吟道：“天哪！这是为什么？……”

她显然没有打中。那个大胡子德国人，木然地把伤口愈合好的下巴扭过去，人朝旁边一闪，俘虏们你挤我推地急忙向后退。前排的人发出垂死的尖叫声，后排的人吓得发出濒死前失去人性的干嚎。方才朝着房子的窗口打炮时，尼基金听到的刺耳的声音，就是这样的。而最右边试图胆怯地一笑、长着淡黄头发的那个最年轻的小伙子，一边自卫着一边向前伸出抹着泥巴、弄得稀脏的褐色的巴掌，非常害怕地失声痛哭：“党卫军！党卫军！”一面用巴掌无力地打着那个跳到他这边来的大胡子德国人的背脊。

“啊，这么说，是你这个下流坯开的枪？”麦热宁一个纵身跳到大胡子德国人跟前，用冲锋枪筒直戳他的肚子。“是你这个党

卫军的死尸把克尼亚日科打死的吗？是你，是你这个恶鬼从阁楼上开的枪吗？”

麦热宁怀着一股复仇的气力用冲锋枪筒朝着大胡子德国人的心窝捅去，大胡子失去平衡，向后倒了下去，当他无力地叫喊着往后退的时候，麦热宁猛地抬起冲锋枪，眯缝着眼睛尖锐地盯住他说：

“回你一枪，混蛋！……”

枪口直对着大胡子射出的短短的一梭子弹把他抛出大约三米，黑乎乎的、伤口愈合的下巴仰面朝天，头上的便帽飞出去了。德国人发疯似的眼光死盯着天空，背朝下倒在草上，矮壮的身体变成拱形，像牛一样拖长声音哼着，咯出的血像鲜红的喷泉落在大胡子上，俘虏中响起一阵可怕的嚎叫，有人绝望地嚎啕大哭：

“不，不，不！……”^①

“啊—啊！你们也是跟他一伙的，娼妇们！”麦热宁喝醉了似地在草地上大大叉开有点发软的腿，以防跌下去，他抡起冲锋枪准备朝贪婪地大口吸气的俘虏们打去。“啊！希特勒的臭虫！把你们统统枪毙！统统枪毙！……”

这时，尼基金被手无寸铁的人群震耳的嚎叫弄得不知所措，他只有一个明确的愿望：制止这场把每个人都卷进去的突然的疯狂的流血，使它停下来。他冲向麦热宁，用拳头从后面敲了一下冲锋枪筒，夺下枪，一个劲儿重复着一句话：

“住手，住手！……我命令你，住手！……”

“你可一怜他们吗？”麦热宁哑声说，好像醉醺醺地舔着嘴角粘乎乎的唾沫。“你可怜他们吗？那克尼亚日科，你就不可怜克尼亚日科吗？你真是我们这儿的善心人啊，中尉！”

^① 此处原为德语。

“尼基金，让他替加丽雅开枪！”格拉纳图罗夫以尚未平息的仇恨口吻命令着，“送她上车！跟在她后面跑步前进！你还像耶稣基督似地看个什么呀？快跟加丽雅回去！”

尼基金明白，他既说服不了格拉纳图罗夫，也说服不了麦热宁，此刻他缺乏克尼亚日科那样有感召力的、不顾情面的意志力和不屈不挠的毅力。他无力地哆嗦着，恨自己的软弱。突然，他张着铅灰色的嘴巴说：

“连长，要是向俘虏们开枪，您将受到法庭的审判！我忘不了这一点……永远也忘不了……您最好回医院去，听见没有？”

于是，他沿林中空地走去。土地在他脚下起伏晃动着，把他从一边抛向另一边，腿像不听使唤似的，大地失去了坚硬稳固的特性。

他在火力阵地上找到了加丽雅。她一个人坐在大炮挡板下面的架子上，缩成一团，用手捂着低垂的脸，他就在旁边坐了下来。她颤抖着、呻吟着、喊叫着，在极度的悲痛中抑制不住地失声痛哭。她那捂着脸的手指上抹着克尼亚日科的血，一滴滴浅红色的眼泪从指缝中间渗出来，顺着她纤细娇嫩的手腕流到军衣袖子里。

“加丽雅……”尼基金用暗哑的嗓音轻声叫她。

她没作声。

“加丽雅，”尼基金惘然若失地又喊了一声，“我求求您……”

“我求她什么？我在说些什么？……”尼基金问自己。

她把双手从湿漉漉的脸上拿开，拧着黑眉毛，怀着极其厌恶的反感瞥了他一眼，就像是看到他脸上有一条被捻死的蛆虫一样。

“胆小鬼，”她忍住充满毒恨的哽咽，小声说，“你们都是些胆小鬼……他是最好的……是你们当中最好的！你们当中谁也没

有……只有他，他一个人牺牲了！……啊，我多么恨你们所有的人！”她用沾满鲜血的手指捂住喉咙，喘不过气来，她忍住眼泪，跳了起来，身子向前冲着走去，朝汽车奔去。而他却坐在炮架上，把胸口压在炮尾上，胸中像有一团东西冻住了、有一样坚硬麻木的东西卡住了，阻碍他呼吸。

“只有他……他一个人！……”

周围一片寂静。火药和打过的炮弹壳散发出一种又酸又苦的味道。瓦片发出噼啪的响声从燃烧的房顶上滑下来。林中空地上的林务所还在燃烧。一群人慢慢地从那儿走过，他们抬着放在雨披上的克尼亚日科的尸体，朝大炮走来。离这一群士兵远一点的地方，被押送的一群俘虏不声不响地慢慢移动着。

麦热宁和格拉纳图罗夫默默地走在后面。

第九章

尼基金想忘却一切，他喝了和大家一样多的酒。他已经分辨不出这种缴获来的不纯的烧酒味道，只是浑身越来越像火烧一样，呼吸感到困难，也越来越难以感受周围发生的一切——醉醺醺的嗓音、酒瓶和空酒杯与桌子的碰击声。客厅里点着带罩煤油灯，空气越来越热、越闷了，人们的说话声也随着变得更无克制、更响、更多了，这使他感到有点反常和难以忍受。昨夜也是在这间客厅里，还活着的克尼亚日科中尉低着梳偏分头的脑袋打过牌，审问过德国人，来回走动，一边整理武装带一边说话，下达过命令，若有所思地看着壁炉里的火焰……而现在，他们却在这间客厅里举行葬后宴悼念他。

虽然格拉纳图罗夫每斟一杯酒就站在桌旁阴郁地说：“让克尼亚日科中尉安息吧”，虽然参加的人很多、很挤，甚至由于人多，由于人们乱哄哄的、醉醺醺的互相关切而显得喧闹，但总觉得缺少一种重要的、必需的、什么也填补不了的东西。无法抑制的令人苦恼的空虚的哀感使尼基金心碎。如果他没有亲眼看见克尼亚日科怎样牺牲，怎样被从顶楼窗口射出的一梭子弹击中后跪倒在地，用手帕擦了一下前额，仿佛试图擦去额上的鲜血，他可能会轻松得多。虽然他的记忆由于喝酒变得迟钝起来，但始终不能摆脱和排遣开克尼亚日科在林务所空地上最后几秒钟的情景，不能淡忘他临死前那溅着鲜血的苍白的脸上孩子气的表情和加丽雅说的那些不可思议而又十分清楚的、被可怕的嚎啕哭声证实了的话：

“只有他，他一个人牺牲了……”

他思念着克尼亚日科，周围的人说些什么他几乎一个字也没听见。他有时想从桌子后面跳起来，离开这个醉醺醺的人声嘈杂的葬后宴，奔到卫生营医疗所，找到加丽雅，为自己，为所有的人，也为全炮连长时间地恳求她宽恕，在夹杂着甜蜜和绝望的相互了解中跪在她面前忏悔，吻她的手指，向她谈克尼亚日科，告诉她克尼亚日科比谁都勇敢，比谁都聪明，比谁都正直；没有他，炮兵连简直不可想象；没有他，难以忍受的空虚就无法填补。想到这里，好像有许多颤抖的针尖在扎他的喉咙，他把泪水一口口地往下咽，热泪使眼皮发烫，鼻梁发痒。

他咬紧牙齿，把身子歪到绿色灯罩投下的一道阴影里，悄悄地用袖子擦去眼泪，尔后猛然趴到桌前，没等格拉纳图罗夫邀请，就斟了满满一杯酒，一饮而尽，又突然站了起来，两腿发软。他心里作呕，站立不稳。他不知道他为什么站起来，为什么需要站起来。

谁都没有注意他——人们都在说话，七嘴八舌，抽着烟，用餐匙吃着从锯齿形盖子的铁罐头里掏出来的油腻的猪肉。瞄准手塔特金不知是笑还是哭（在他红胡子上闪着晶莹的水珠），抱着乌沙季科夫的双肩（乌沙季科夫正悄悄抚摩着膝盖上的猫，深表同情地喂它吃饭），用深受感动的口气说，愿上帝保佑，战争快结束吧，只要能见到自己的宝贝孩子，即使少一条腿或一只胳膊也在所不惜。旁边，透过自卷纸烟的烟雾，上年纪的四炮长兹金上士用同情、悲痛又含有责备意味的疲倦的目光瞅着尼基金。“为什么他看着我，难道我喝醉了吗？”尼基金痛苦地闪过这个念头，“不，我很清醒，只觉得苦闷得难受。我不知道我该做什么。我为什么要站起来？他们都在说些什么？那我想要做什么？我想要做什么？……”

在尼基金看来，令人不能饶恕而且可怕的是，饮酒过量使战士们思想轻松起来，完全解除了白天压在他们身上的战斗负担和不久前殡葬的痛苦，使他们忘掉了在市公墓里令人悚然的新堆土丘上空冲锋枪排射以示告别时的情景。土丘的一块木牌上写着“阵亡……”的字样，标志着克尼亚日科中尉的一生就此结束。大概谁也不再记得披在加丽雅的大理石般洁白的半边脸颊上的乌发了，那时她一直闭着眼睛木然站在尼基金身旁。现在人们都在喝这种德国烧酒，坐在桌旁大吃司务长根据格拉纳图罗夫的命令无限量供给的这些缴获的罐头。谁也不再想起那次反击自行火炮的疯狂的战斗，不再想起林务所里的战斗以及冲锋枪从顶楼窗子里射出一梭子弹的极其可怕的瞬间。大家都能幸免，唯独克尼亚日科遭到不幸，在这一点上谁都不认为自己有过错。尼基金觉得由于今天经历了遭受丧亡的战斗，现在又在这烟雾弥漫的客厅里听到内容浅薄得令人厌恶的谈话和一片无聊的喧闹声，看到一张张通红流汗的脸上那种令人不快的亢奋，

他简直痛恨他们所有的人。

“我该坐下来一声不吭。我马上就会做出一件凶狠的、使他們不愉快的事情……那怎么样呢？……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在谈什么？谈什么荒谬无聊的事？”尼基金一边想，一边用嘲笑的目光看着显然已经喝醉了的格拉纳图罗夫，看着他那只好手的粗大手指。格拉纳图罗夫正动手从克尼亚日科的战地背包里掏出一些文件，这个背包是麦热宁拿来的，葬后宴一开始就摆在连长面前的桌上。

“他想干什么？……他在那里看什么？他有什么权利翻克尼亚日科的背包？我知道，连长不喜欢克尼亚日科，克尼亚日科也不喜欢连长，但他们只是互相克制着。麦热宁为什么要给格拉纳图罗夫看一张什么字条？字条是从哪里来的？从背包里掏出来的？他们好像在谈要把克尼亚日科牺牲的消息通知家属。谁来写这封信？……格拉纳图罗夫？他亲自写？谁来写？……”

“连长……”尼基金用压得很低的暗哑的声音说。他吸足了闷热的空气，用自己都觉得讨厌的语气重复道：“格拉纳图罗夫上尉！……”

格拉纳图罗夫用充满怀疑的目光看了他一下，然后低沉地问道：

“尼基金，你想说什么？”

“请把克尼亚日科的文件……背包给我，”尼基金突然坚定地说，“我亲自……来写通知……”他微笑了一下，强作平静，但事与愿违，他感到自己的面孔呆板得令人生厌。“连长，给克尼亚日科家属的通知信，您是写不好的。您……和克尼亚日科是不同的人。”

“坐下，尼基金，”格拉纳图罗夫闷闷不乐地说。

“我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个呢？有什么用呢？”尼基金想，模模糊糊地意识到自己不对，于是用一个手指拉了拉被汗水浸潮的滑腻的军便服领子。“我要在克尼亚日科死后找他算账吗？那么是谁……是谁的过错？格拉纳图罗夫？麦热宁？乌沙季科夫？还是我？今天发生的事简直是发疯……大家都认为这是最后一次战斗吗？每个人的生命也就更宝贵了？不，我是喝多了，但是我并不怎么醉。我能思考，就说明我没有醉，格拉纳图罗夫也是这样看的……”

“坐下，尼基金，”格拉纳图罗夫双眉紧锁。他看完字条又把它放回到桌上敞开的背包里，“我知道你们是好朋友。你把背包拿去。写一个通知告诉他们，就说，你们的儿子克尼亚日科中尉在攻占柏林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格拉纳图罗夫看到有人把克尼亚日科的背包递到尼基金手里，又补充道：“写得漂亮些。就说坦克向我们进攻，一场生死搏斗开始了，克尼亚日科中尉受了伤，但他不下火线，一个人击毁了敌人坦克多辆，后来牺牲在大炮旁边。应该这么写。像英雄一样牺牲了。只能这么写。要动人一些，否则……”

“不！”尼基金像蒙受了莫大的耻辱，挥起拳头猛捶了一下桌子，震得酒瓶和酒杯摇晃起来，叮当作响。“不，连长，不能这样写！根本不能这样写！”

“为什么不能这样写？”格拉纳图罗夫警觉起来，在他那黝黑的脸上掠过一丝不满的神色。

“叫我撒谎吗？……关于克尼亚日科我不会写漂亮的谎话！我要原原本本照事情的经过写！”

“我干什么对他这样发狠？他希望写得动人一些吗？像参谋部文书们干的漂亮的蠢事？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牺牲还有动人和不动人之分吗？我跟他在说些什么啊？还当着战士们的面

呢……我为什么还用拳头捶桌子？”尼基金想了想，觉得在这里争吵不是个地方，但同时又受一种激烈的对抗情绪所支配，他放开嗓门说：

“克尼亚日科比我们所有的人都勇敢。他所以牺牲就是因为他比我们大家都好。是的，他最好。安静点，麦热宁！您有什么好笑的？”尼基金叫了一声，又用拳头捶了一下桌子。“枪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德国人，连最胆小的傻瓜都会！胆怯！这是愚蠢！这是胡闹！可耻！对着一个德国人打了一梭子弹……克尼亚日科却牺牲了……他不希望流血，他希望停止战斗！可我们呢，像胆小鬼一样，像胆小鬼一样……”

“他们都惊奇地看着我。是的，我的脸，现在我的脸是非常难看的，我觉得是扭歪的，而且发烧。”他心里想。

“中尉，喂，中尉……”

眉头紧锁的格拉纳图罗夫轻轻地推了推麦热宁。麦热宁便走到尼基金跟前，推了推他的肩膀，低声说：

“中尉，喂，中尉，我们上楼去吧，好吗？我陪你慢慢地走。今天是这样的一个日子。”

麦热宁脸上流着汗，一本正经，看上去完全是清醒的，根本不像他向那个德国人射击时的样子，这张面孔巧妙地掩盖了他要帮助尼基金的虚情假意，在尼基金看来甚至还掩盖了对他的带有醉意的讥讽和挖苦。不知为什么尼基金立刻被在灰色烟雾中安静下来的战士们的同情和怜悯的目光所吸引。但是他无法给他们解释，告诉他们，谁也找不到，而且也没有一种公道和信念来证明克尼亚日科的牺牲是正确的。他没有力量压下用这种葬后宴也无法填补的苦闷和空虚，孤独感和难以消失的、钻心的痛苦。一切都变得失去意义，毫无作用了，一切都失去了色彩和意义：我们身边已经没有而且永远不再有克尼亚日科了，再也看

不到他那整齐的梳成分头的浅色头发，经常保持清洁的衬领，穿着铬鞣革皮靴走路的轻快的步态，以及他那双蕴含某种没有向任何人公开的秘密的绿莹莹的眼睛和那严峻的、有时显得高傲的目光。

是的，生气勃勃、紧束武装带、英姿挺拔、开朗却又像谜似的难以理解的克尼亚日科如果在这个房间里，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可是克尼亚日科不在附近的任何地方，既不在隔壁的房子里，也不在他应该待的这间客厅里。一切都无可奈何地在惨淡昏暗的烟雾中溶化了，变得凄凉，凝滞了。

“中尉，喂，中尉，走，我送你去……”

“您送我到哪里去？为什么？该死的，把手放开！”尼基金推开中士放在肩上的那只沉重的手。他非常固执地看着默不作声注视着自己的战士，仿佛是在追问他们能否像在克尼亚日科牺牲前那样生活。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们大家……还会明白，我们大家都有过错……因为他牺牲了，而我们却活着……并且还以为自己的运气好。我们等着他去完成一切。就他一个人不怕死。我憎恨自己，也不能原谅你们所有的人，不能原谅我自己，不能原谅我们的胆怯……”

乌沙季科夫不再喂膝盖上的猫。他慢慢地从桌子旁探起身来，翘起下巴。塔特金没精打采，火红的小胡子在罐头上摆动着，潮润的眼睛哭泣似地朝空间看了看，叹了一口气道：

“可惜他死得太早，愿他进天堂。他严厉，但是公正。”

“猫……是他拿来的，还记得吗？他说，请喂饱它……为什么他要往该死的德国人那里走？”乌沙季科夫眨起眼来，用惊奇和表示抗议的口吻嘟嘟囔囔地说了起来，“不怜惜自己，可他们呢……咳，这些该死的家伙！”

“正是这样！可见，打枪的时候是不存在有罪没罪的！”麦热

宁下结论似地说了一句，一摇一摆地走到自己位子跟前，紧挨格拉纳图罗夫坐下，斟满一杯白酒。

“这两个人简直聪明透顶，”兹金上士说道。他闷闷不乐地沉思着，在漆布台布上搓动着一团面包。“一个在谈猫，一个说谁也没有罪过。麦热宁，我们没有中尉了——不管怎样，这完全是事实。而活着的人，他们要永远为死者负责。朝自行火炮射击的时候，我看到你首先……张皇失措。我第一次看到你这个样子。你大概想到自己在战争就要结束之前死掉，后来你打死了那个大胡子德国人。你这不是为中尉报仇，而是为自己的胆怯在出气。中士，就是这样，不管你怎么想，这是事实！……”

麦热宁颧骨上的肌肉鼓了起来，在他那长睫毛下露出铅灰色的目光。

“闭起你的嘴巴，没长翅膀的天使！”他说道，脸上渐渐露出一丝自鸣得意的笑意，他鬓角上的皮肤因而绷紧。“你瞎嚷嚷什么？别多嘴！懂吗？要不是某些慈悲心肠的人干预，我早就毙了他们所有的人，送他们到阴间去了！连长，你看他们竟这样保护德国鬼子！你说呢？”

德国人的客厅，煤油灯和桌子都在尼基金眼前的迷雾中浮动。灯光下可以模糊地看到格拉纳图罗夫，他阴郁地坐着，紧闭着大嘴，弯曲的连鬓胡子黑乎乎的。在半明半暗的灯罩阴影中，只见麦热宁的颧骨恶狠狠地绷紧着，渗出的汗水使颧骨发出暗光。在炮兵指挥员中，他早就是格拉纳图罗夫的宠儿，格拉纳图罗夫的在场，使他格外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是理所当然的。

兹金一发火，掸去了台布上的面包屑。

“照俄国的说法，如果你随便向一个手无寸铁的德国人扫射，那你就是犯了杀人罪，所以就成了类似刽子手那样的人了，”他一本正经地说，“没有别的可说，看到你我就不舒服。中士，从

那以后,我不能再尊敬你了……我是当着战士的面说的,而且还当着连长的面……”

“住一口! 兹金! 你们说的都是耶稣讲的空话! 是我下过命令:战争在进行,对德国人讲不得半点客气! 怎么啦,我们都变成羊羔了! 他们想消灭我们所有的人,一个不留! 可我们还想入非非!”格拉纳图罗夫勃然大怒,进行了干预,“尼基金,要说实话,”格拉纳图罗夫轰的一声推开椅子,站了起来,那只用绷带吊缠着的手臂猛然抬了一下,“那是克尼亚日科怜悯这些兔崽子,可他们对这种高尚行为的报答却是一梭冲锋枪子弹。不行,让这种骑士风度见上帝去吧! 伸过嘴巴去请你打我吧! 怜悯谁呢? 怜悯杀你的人? 尼基金,你是说他比大家都好吗? 好吧,就算这样! 你看看他的信,……总之,信是写给谁的并不重要,你自己会明白! 我喜欢克尼亚日科的许多优点,并不亚于你,我尊重他,但是……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呢? 他自己找死……这也是我今天才明白的!”

“连长,你撒谎! 你胡说八道! 你喜欢他吗? 你是嫉妒他,害怕他!”尼基金感到气愤和不可容忍,打断了他的话,不礼貌地改用“你”来称呼,“所以你在卫生营医疗所呆不住。你永远不会成为像克尼亚日科那样的人! 不管在哪一方面,永远不会! 至于麦热宁,连长,趁现在还不晚,你最好把他调去当你的传令副官。我已经不能容忍他在排里待着! 不能看到他待在排里了!”

“尼基金,这是什么意思? 威胁麦热宁?”

“他还威胁说要打发我去惩戒营呢,”麦热宁冷笑道,“胆敢如此,上尉同志!”

客厅一片寂静令人窒闷,使人感受到空气对身体的压力,好像横着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和高墙。尼基金原来期望把克尼亚

日科的真情实况告诉大家以后会感到轻松些,但他并没有轻松。凡是跟今天这个日子、跟麦热宁和来得不是时候的格拉纳图罗夫有关的一切,凡是跟克尼亚日科牺牲有关的一切,都结成一个难以解开的疙瘩,这是由于捉弄人的有腐蚀力的三天闲适生活造成的。这三天休整使人们转眼之间将战争抛到九霄云外,仿佛战争加足了马力,以最快的速度结束了。这是个惨痛的骗局,三天前将他们从大火熊熊的柏林的战斗中调出的时候,他们是相信这个错觉的;是的,他们受骗了,直到今天早晨——出现了疯狂的行动。尼基金觉得今天发生的一切是无可挽回的。他满怀忧伤、绝望和愤怒地说道:

“可恶,真可恶,你,连长,和你,麦热宁都很可恶!明明是狗熊,偏在俘虏面前逞英雄……可恶,真可恶!克尼亚日科倒牺牲了……不,我们大家都有过错,一个也不例外。我也有过错。我们大家都有过错。真可恶!……”

他这番恶狠狠的、在无能为力之中含有自我责备的话冲口说出之后,像一块块尖石纷纷落下,掉入万籁俱寂的深处,没有引起一点回响和耳朵里的任何微小反应。士兵们的惊奇的眼睛透过浅灰色的烟雾,屏息凝望着他,用沉默的目光紧紧地、使人窒闷地盯着他。

“你不会喝酒!”响起了格拉纳图罗夫的男低音,“说吧,说吧,不过要先去好好地睡上一觉!”

“别嚷了,连长,我根本不理你……”

“尼基金!住嘴!你太放肆了,尽管你喝醉了酒!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连长,难道你以为我怕你?往后……你现在不担任炮兵连的指挥工作了,你住在卫生营医疗所里……你滚吧!”

尼基金觉得恶心、头晕,他拿起克尼亚日科的背包,努力使

自己站稳。他转过身子,使尽全身力量保持平衡,异常平稳地迈着步子朝门外走去,在门口趑趄了一下,肩膀撞在门框上。他骂了一句,砰的一声将门带上。

加丽娜!

我从卫生营医疗所出院后,你常来炮兵连看望,这使我很不高兴。我们之间有过的那一段关系不能算作一生中才有一次的东西。在医疗所里,我对你和对所有的医生、护士一视同仁,可是那天晚上的一次谈话,你大概误解了。因此我不得不说出自己的全部想法。我没有权利爱你,你也没有爱我的权利,因为战争中既没有城堡,也没有宫殿供戴肩章的朱丽叶和罗密欧享用。请你原谅我这个不礼貌的玩笑。每当我(用军人的话来说)作出决定,我就去做也许是不愿做的事情——这一点你能理解吗?——我强迫自己违背自己的意愿。我实际上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连我自己也不清楚。我最不愿意屈从自己……(被划掉一句)。那天夜里,你说我轻视或者害怕女性,或者对待女性书生气十足。是的……以前,父亲工作室里的宁静是多么美好啊!在暴风雪袭来、院子里积满白雪的冬日,躺在舒适的旧沙发上读书或者是浏览群书又是多么美妙啊!我爱上了屠格涅夫笔下的少女。不管有多么奇怪,我竟也爱上了娜塔莎·罗斯托娃^①。你说得对:在战争中不存在与书本上相同的东西。遗憾的是,我希望或者成为一名骑士,或者成为安德烈·鲍尔康斯基^②(与我同名),尽管现在看来是可笑的,甚

① 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的女主人公。

② 《战争与和平》中的男主人公。

至是非常可笑的。我讨厌前线的形形色色的调情，讨厌在壕沟的泥土里搞可耻的恋爱以及士兵们对这些形形色色故事的议论。我对团里好色之徒的厚颜无耻的行径简直深恶痛绝。我不愿意也不可能成为像他们那样的人。早在两年前我就发过誓……（被划掉一句）。我不愿意也不能那么做。因而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任何严肃认真的关系。战争就是战争，在战争中不会有任何真正的爱情（多么奇怪而美妙的話呀！），只有虚情假意和庸俗卑鄙的行为……

请你正确地理解这一切。此外——有人等着我……（被划掉一句）。

克尼亚日科中尉

他没有点煤油灯，用手电筒照着读完了这封没有发出的信，然后关上手电筒，摸黑把信塞到克尼亚日科的背包里。他不愿意起来点灯、脱衣服。他摊开手脚，仰卧在没有铺好的床上。他恶心，胸口发痒，堵闷得难受。床令人发晕地在身子下面沉下去，滑向深渊，只觉得喉头一阵阵恶心涌动，但又吐不出来，因而他不能平静下来，不能摆脱那不习惯的、痛苦的醉酒状态。醉酒却又不能使他忘掉一切。

“看来，他并不爱她，”尼基金思索着。他的头在枕头上翻来翻去。“或许爱还是爱她的，但不愿与她有某种关系？他爱上了书本上的女性？谁是这些屠格涅夫笔下的女性呢？看来，她们是九年级的学生。可是学什么呢？……好在他没有把信交给加丽雅。我一次也没有见过他往莫斯科写信。我记得他母亲给他来过信，但很少……”

顶楼窗外是个繁星密布的夜晚。近处尚未升起的月亮把附近参天的松树和教堂后隅映得一片通红。这座德国的外省小城

市仍然如同昨天一样宁静。红光映在瓦房顶的斜面上,显出倾向街道暗影的闪亮的斑块。然而,从昨天夜晚到现在,似乎已经过去了若干年。那遥远的、久远的乃至今天的一张张人脸,青草地的模糊印象,炮轰,马达声,不连贯的句子,喊叫声和个别词句都浮现在尼基金的脑海里,像锋利的钻孔器在耳朵里转动,钻得脑袋疼痛万分。喉咙口一阵阵的恶心使他不堪忍受,他想寻求一个领会深刻的答题,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思想,一个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昨天和刚刚度过的这一天的逻辑。他撇着嘴,呻吟着,仿佛干了一件不可原谅和无法辩白的、卑鄙可耻的犯罪行为。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①,这个背熟的句子像一条延伸着的蛇老是萦绕在尼基金闭拢的眼前,那若隐若现的花体字像条黑蛇游动着,又消失在一片褐色的昏暗中,然后重新出现,散发出不知为什么竟是这种捉摸不到的、柔若无物的东西所带有的香皂味。“爱玛!”他心里突然一动,头便在枕头上翻来翻去,他想把脸藏起来,埋进又暖又软的枕头里,来摆脱那难以忍受的疚愧、悔恨和问心有愧的感觉。“我这是怎么搞的?这怎么可能?我不知道,为什么发生这件事,这不应该发生……我和德国女人在一起?可克尼亚日科却牺牲了……不,对于我来说,这是背叛行为……”

他恶心了,迅速从床上跳了起来,像站在浪头上似的,摇晃着跑到开着的窗前,把身子探到窗台外面,他感到憋气,哼哼着,满脸是泪。他一边哭,一边咒骂自己。他希望能轻松一些,希望能摆脱不幸、羞耻和背叛行为,摆脱沉重地压抑着他的苦闷。他厌恶自己的软弱,厌恶自己对这种肉体软弱的仇视,讨厌自己不

^① 此处原为德语。

会喝酒，讨厌最近几天的全部莫名其妙的、含有某种假象的紊乱。最近几天还是很有意思的一切，现在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后来他在黑暗中摸到早晨刮胡子留下的一盆水，他拿起来往头上一浇，然后脸朝下扑倒在床上。他呻吟着，嘴唇在枕头上来回蹭着。

“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①

又是这一句诗像闪现的旋转木马在褐色的空间单调地转动着，从薄雾中转出，在青草地上飘荡，向上然后向右边某处黄昏的旷野飘逸。初升的月亮照亮了屋顶，这一句诗被屋顶上淡红色发亮的斑点染红，消失在陌生的、奇形怪状的教堂的黑影后侧和远处尖屋顶的后面，尔后又从左边滑出，重复它那单调的、令人眩晕的转动，引起莫大的痛苦和无法实现的愿望：弄明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句诗，它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钉着他纠缠……

后来，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把他推倒在一个窒闷的深坑里。在又深又硬的坑底，他找不到合适的姿势，就仰面躺在土块上。一股坟墓里的潮湿气味使他喘不过气来。他胆战心寒，听到铲子嚓嚓响起来，从上面朝他抛下来的湿土开始撒在他的脸上、眼睛上，土越来越厚，严严地埋住他的胸部，使他动弹不得。

……但他知道，战斗结束后只有他一人被人们放在雨披上抬到这里，放进一个不知名的公墓中掘好的坑里，但是没有人知道他还活着和发生了无法挽救的大错：把他当作别人悄悄地埋葬了。尖铲在上面不祥地开始刨土，夜幕降临了，看不见一个人，听不到一个人的声音。他无论如何要呼喊，要提醒人们：他并没有被打死，将他活埋是压根儿弄错了。可是他被泥土紧压着，已经无法呼吸喊叫。就在这时，从上面荒凉的黑暗中垂下一

① 此处原为德语

张残酷无情的脸得意地微笑着，露出缺损的门牙，这张脸朝深坑里探了探，开始威胁地叫喊着，催促着什么人，下令快些把墓穴填上，因为墓穴里并没有人……于是他勉强地用足气力大声呻吟起来，向看不见的士兵呼救，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听见。他们开始干得更快，铲子嚓嚓作响，硬土块敲在他的前额和颈子上，潮湿的粘土味使他窒息。上面有人像女人般哽咽地痛哭起来，向他告别，同时在黑暗中有人用土块轻轻地打在他身上，悲伤地拉长声音哭诉起来：

“哎啊……啊！……”

他一面挣扎着以免被闷死，一面模模糊糊地意识到是谁造成这个错误，是谁命令士兵将他埋葬。他被大块大块的泥土牢牢压住，四周漆黑一团。他失声痛哭，觉得自己很可怜。他奄奄一息地吸了一口气并感到有人在触摸他，抚摩他的胸口，俯在他身上——一边哭泣，一边轻声叫着：

“中尉先生，中尉先生！……”^①

……于是他猛力冲向这个发自人间的絮絮的低语声。一分钟前必死无疑的砭骨的孤独感使他全身冰凉，此时当他头脑清醒过来后，便叫了起来：

“谁？”

夜深了，周围一片寂静。月亮高高挂在窗棂的上角，照亮了顶楼。不，他活着，他还在呼吸，他睁开眼睛躺在床上，只见床前的椅子上有一个黑影正俯身看着他，令人感到凉爽的手指均匀地抚摩着他那汗湿的胸部，絮声低语着，话语中时时夹着哭泣的抽噎：

“中尉先生……中尉先生……”^②

①② 原均为德语。

“难道是她？这是谁？她怎么会在这里？这是她吗？是爱玛吗？她怎么会到这里来的？是的，这是她，是她。”他想了想，痛苦地回忆起来。他还未摆脱噩梦的压抑，汗水顺着他的鬓角往下流。

他被脱掉了衣服，盖着暖和柔软的鸭绒被。看来，她见到他醉后的狼狈相后，便给他脱掉衣服，亲手剥下那件被汗水浸透了的有炸药焦味的军便服，拉下那双满是污泥的靴子，让他睡到床上，盖上鸭绒被。然而他感到羞愧得像火烧似的，对她非常反感，仿佛他已彻底被卷进了公开的背叛行径中，他粗暴地把她的手从自己胸前推开，在床上坐了起来。

“离开这里！走开！①”

“不，不！中尉先生！……”②

她缩成一团，背拱了起来，突然把头倒在他肩上。她那带有香皂味的头发披散在他的下巴上。她歇斯底里地恸哭起来，挂满泪水的嘴唇在他面颊上移动着，乞求般地吻他。他觉得她的身躯在颤抖、抽搐。他嘶哑地低声说：

“马上离开……你来干什么？从这里走开！③”

“我悲伤，我悲伤……”④

他把她推开，毫不留情地冷笑了一下。

“悲伤？⑤你悲伤吗？悲伤什么？也许你会说，你可怜一个俄罗斯军官？那你同他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关系呢？你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对你说了——走开。走开！⑥”

她从他的话音里听出严厉的语调后，不知怎么颓然丧气，呆呆不动了。当她听到她能听懂的“走开”⑦这个词时，又呜咽着

①②③④⑤⑥ 原均为德语。

⑦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叫喊着，可怜而又负疚地抱着他的脖子，乞求和解，表白自己，祈望宽恕。他的脸颊上洒满了她滚滚的热泪，起初他还试图推开她的手，挣脱她。她这样一来，他便突然闭上眼睛，咬紧牙齿，茫然不知所措了，他被这孩子受惊般的哭泣、被她那一阵热烈的同情、被她那结结巴巴的低语所打动。她在说服他，请求着什么，哀求他，并用这种哀求使他从荒谬的孤独的绝望中摆脱出来，从脑海里尚未消失的冷冰冰的恐怖不安中摆脱出来：

“我悲伤……瓦吉姆！……请原谅我……我的瓦吉姆！……”^①

“不，不，我没有出卖任何人。不，我要是出卖了什么人，我一定会死！这是怎么回事？她没有撒谎吗？她不可能这样撒谎的。”尼基金怀着令人麻木的、难以忍受的痛苦想道，他感到她的眼泪洒在自己的脸上，潮湿的鼻尖紧紧地压在自己的鬓角上。

第十章

她躺在床上，疲倦地把手放在身子两侧，将泪湿的面孔微微侧转。头发披散在枕头上，在阳光下像流水一样闪着黄铜般的柔光。她平静均匀地呼吸着，似乎已经睡着了。但他看出她并没有睡着，她正透过在朦胧中抖动的睫毛注视着在顶楼洁白的天花板和糊墙花纸上轻轻移动的闪光。尼基金想：

“难道一切又重演了吗？”

天已经亮了。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花园里的小鸟仿

^① 此处原为德语。

佛在窗前院子里扑打着翅膀。晨露渐干的苹果树送来阵阵清香。一只蝴蝶从花园里穿过敞开的窗户飞进来，在快乐明亮的顶楼里金光闪烁地飞舞着，身上的花粉星星点点地散落下来。它一会儿在天花板下飞来飞去，一会儿又停在墙上。

战争爆发以来，尼基金还是第一次见到如此动人的情景，这使他想起过去郊外的夏景：到处是一片悦目的翠绿，温暖的草地从篱笆附近微微倾向河边，草地上长满了马林浆果，中午时分，草丛中盛开着一簇簇毛茸茸的蒲公英。尼基金疲乏无力地仰面躺着，一动不动地久久注视着飞舞的蝴蝶。不知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在学校学过的一个单词，这单词爱玛能听懂，于是他轻声说：

“蝶泳。”^①

“蝶泳？”^②爱玛睁开朦胧的眼睛。一瞬间，她睡意朦胧，没有理解他的话，然后怯生生地、惊奇地把脸转过来，用手指触触他的嘴唇，再吻吻这个手指，低声说：

“蝴蝶——这是英语的说法^③……请学说德语……蝴蝶，蝴蝶，”^④她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着，又用手指碰碰他的嘴唇，胆怯地等待他讲这个单词。

“蝴蝶，蝶泳，”^⑤尼基金轻声说，“很相近嘛。蝴蝶？^⑥不，这个不像，这个词很含混。你说得对，我在学校德语学得不好，什么也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些个别的单词和句子，如：‘我上学去。’^⑦”

她只听懂了他讲的“我上学去”这句话，完全像男孩一样皱

①② 原均为英语俄译音。

③ 此处原为英语。

④⑥⑦ 原均为德语。

⑤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起了眉头,但是仍旧注视着他的嘴,仔细听他讲,小指头一直放在他的下唇上,好像凭触觉来检验外语的发音。

“你说呀,”^① 她请求道。

“好像是在七年级时,”尼基金说,全然不考虑她是否听得懂,“老师要我们背德语课本里亨利希·海涅的诗……你知道亨利希·海涅这位诗人吗?”

“亨利希?海涅?”^②她做了个抱怨的怪相表示她不了解,又快又肯定地说了句什么,可是立刻又笑着欠起身子,指指自己的耳朵,又指指舌头,像孩子一样用舌头在齿间弹弄发出“卜噜,卜噜,卜噜”的声音,并且假装反对地用手心捂住他的嘴,要他知道现在不需要用不同的语言交谈那么久。她向后倒下,眼睛闪射出蓝光,向天花板上寻视蝴蝶,一面迷信地祈祷着:“蝴蝶,蝴蝶。我的天啊,蝴蝶!”^③

她把手合成像小船似的放在下巴前面,压低嗓音,快速地喃喃默念着一些听不懂的、捉摸不定的话,好像真的在轻松地祷告、祈求、热烈地感谢什么人,也许是在感谢那只作为某种预兆从院子里偶然飞进来的蝴蝶;又好像在感谢可怕的黑夜已经过去,特别宁静、明亮、欢乐的五月之晨已经到来;也可能是在感谢以这位俄国中尉为代表的吉兆,要知道是他第一个站出来保护她的,而且昨天他没有同另一个俄国中尉一起阵亡,正是那个军官允许他们姐弟俩留在被敌军占驻的房子里。

尼基金不懂爱玛在低声说些什么,只能竭力用想象来推测,这毕竟大大刺伤了他的心,仿佛在她方才流过的泪水中,在对她的同情和她胆怯而负疚的脉脉温情中,微微透露出一种虚情假义的东西,是她有意想在这屋子里取得他的保护,因为这儿驻着

①②③ 原均为德语。

一些被昨天的战斗激怒了的士兵，而这些士兵是归他指挥的。

“蝴蝶，蝴蝶，”^①她喃喃低语，眼睛盯着在天花板下无声飞舞的蝴蝶。尼基金已经皱起眉头，诘问地瞅着对方的面孔。她脸上的表情就像在受审时那样捉摸不定：在她的目光里时而显出害怕，时而露出真诚期待的表情，然后又慢慢消失，时而又在忧愁的微笑中露出两排发亮的牙齿，含笑的双眼闪射出蓝光，迷惘地叮望着天花板某处闪烁的亮处。

“我都干了些什么呀？往后将会怎么样呢？这事又怎么收场呢？”尼基金想着，惶然失措地在寻求着答案。“我们彼此不了解，但却好像已经搞得很熟了，而且她躺在我身边并不感到害臊。‘不知是什么道理，我是这样的忧愁……’^②对，对！这是海涅的诗，我在学校还背诵过。我还没有跟她讲完，接下去怎么讲？下面是什么？‘我是这样的忧愁……’^③唉！下面一句究竟是什么呀？”

“你是……蝴蝶，”^④她突然若有所思地说道，仿佛惋惜似的，用柔软无力的嘴唇贴在他的手上感激地吻了一下，然后，朝手心里呼了口气，想了一想，又补充说。为了使他听懂，她一字一字地说：“我……也……是……蝴蝶……瓦吉姆和爱玛……你听懂我的话没有？”^⑤

“我是蝴蝶？”尼基金猜到了她的意思，笑了一下。“爱玛，你讲得太玄了，简直不可理解，怎么可以把我比作蝴蝶呢？”

“太玄？一点也不玄！”^⑥

她没松开他的手，麻利地在床上坐起来，把头发往后一甩，低下头极其认真地研究着他的手心，然后用小指甲划了两条交叉的曲线，犹犹豫豫地说：

①②③④⑤⑥ 原均为德语。

“爱玛姑娘和年轻的中尉。战争……蝴蝶和爱玛姑娘。”^①

“这也可能是对的。”尼基金又说，“只是你讲的这个……蝴蝶，^②肯定是不对的。”他惊讶地转头望着天花板，那只蝴蝶正好停在上面，像一个黄色的光点。这时他也找不到合适的德语来表达，只好缄默。

尼基金感到把自己比作蝴蝶显然是过于多愁善感，而且不严肃、太轻佻了。因为他已经得过四次战斗勋章，打了三年仗，在战争中饱经风霜，已经学会独立指挥、向手下的战士发号施令。他认为自己完全是个有主见、有经验的军官，有时自尊心很强，容易发火，能严格地适应环境，但是他绝不会向别人承认，他所习惯了的军官生活是做作的和不情愿的。他也不会向别人承认，整个那段没有结束的生活就像欢乐的阳光被留在后面的什么地方，留在世界上最好的奥尔登卡大街上长满古老菩提树的巷子里，停留在那特别幸福的、几乎是刚开始的生活阶段，这未来的生活就是被打断的美好的学生时代的继续。但他那被中断的、像夏日般明朗愉快的过去，别人不太了解，他只是偶尔对克尼亚日科一个人谈起过。然而爱玛在吻他的手时对他的怜爱，还有，“她给我脱衣服、铺床时，看到我醉成那个样子，”这种似乎是对年龄（年轻的中尉）的暗示，像是提醒他，他是非常缺乏经验，这一切都刺痛了他。

“爱玛，关于蝴蝶的说法，太荒谬了，”尼基金闷闷不乐，徒劳地寻找着德语词汇，“不是这么回事。唉！倒霉，语言不通！怎样才能跟你讲清楚呢？”

尼基金想说，不能轻浮地把他比作蝴蝶，因为他是苏联军官，他既不怕上帝也不怕鬼，不怕德国坦克，也不怕士兵们因为

^{①②} 原均为德语。

昨天发生的事而谴责他,说该他承担责任(这里面甚至含有特意表示出来的挑衅的意味)。经过一番苦苦思索,他才勉强找到几个简单的德语词:

“我二十岁。”^① (“真是愚蠢荒唐!干吗我要讲自己的年龄呢?完全不应该这么说,完全是胡说八道……”尼基金不满意自己笨拙的回答,心想着。)

“噢,二十岁!”^②爱玛高兴得眉开眼笑,为使对方信服,马上把手指撮起来放在自己胸前,以第三者的口气说到自己:“爱玛十八岁……一、二、三……这样数下去。”^③

“十七还是十八?”尼基金心里数着,德语十以上怎么讲他已经记不清了。爱玛微笑着,露出湿润莹洁的牙齿,弯身去拿尼基金放在床头旁边椅子上的手表,手指着表盘上十五分的地方,好像老师给学生上数学课一样认真地数着:“对,十五,十六,十七,十八。”^④然后把太阳穴贴在尼基金脸上,装着惊讶地笑道:“啊,我的上帝,我这么老啦!完全成了个老祖母啦!你听懂我的话没有?”^⑤

“八点差十分!”尼基金眼睛里充满了恐慌,“再过十分钟炮兵连就要起床了。难道马上就会有人来敲门?”

尼基金不动声色,倾听了一下楼下模糊的音响,赶紧戴上表,心想,该怎么跟爱玛讲呢?她不能再在这里久留,该走了,得马上离开。他匆匆地看了一下门,他的隐隐的紧张情绪立即敏感地传给了爱玛,她那生着雀斑的脸上也露出了恐惧,好像有一个意料不到的东西像阴影一样不知不觉地溜进了房间,威胁着他俩。

“出了什么事?是士兵?……什么事?”^⑥

①②③④⑤⑥ 原均为德语。

“爱玛，”尼基金困难地在脑海中搜索着德语词汇，总感到自己对不起她，心里又隐隐作痛。“爱玛……你该走了。你回去吧。^①就是说，我该……我们该起床了。炮兵连马上就要起床了。走吧，爱玛，……再见……^②我不想让别人在这里看到你。”

爱玛像被包围的小兽一样看了一下门，又望了望敞开的窗户，窗外是晴空万里的五月早晨，院子里，红瓦顶上阳光灿烂。顷刻，在静悄悄的顶楼上，透过地板听见楼下忙乱的声音，爱玛寻求保护似地把头贴在尼基金的肩上，双手抱着他的脖子，伤心地抽泣着，一字一字地低声说道：

“噢，瓦吉一姆，我亲爱的瓦吉一姆！”^③

“再见吧，爱玛，^④你该走了，天已经亮了。爱玛……”

“再见，再见，再见……”^⑤

她从床上跳起来，急急忙忙把睡衣穿在光身子上，系上腰带，低着头，像听话的小姑娘那样顺从地走了出去。尼基金仍然无力地躺着，好像轻飘飘地裹在温暖的棉花似的雾霭里，似乎耳边仍旧回荡着爱玛拖长的低语声：“再见”^⑥，还能闻到她脖子上的乳香味和黄头发上薄荷香皂的甜香味。但是这件无意中发生的偶然的、有口难辩的、他俩在健忘地脱离昨天和今天现实的情况之下犯下的错误，使潜藏在他心里的痛苦的感觉又像一只报警的小钟在他耳边震响起来，引起一种痛苦的、命运吉凶未卜之感，面临他既知道、而又不知道的危厄的感觉。

接着，楼下响起了急促的口令：“二排，起床！”顿时响起了士兵们的睡意朦胧的声音。约摸五分钟后，楼梯上响起了脚步声，而且越来越近，并听到了咳嗽的声音。脚步声在门口停住，传来乌沙季科夫的声音和胆怯的敲门声。

①②③④⑤⑥ 原均为德语。

“该起床了，中尉同志，起来吧。”

“哦，我知道了。”尼基金应道，“我已经起来了，马上就下来。”

“中尉同志，炮兵连长在等你，要你立即到他那里去。”

“格拉纳图罗夫？他在这里？”尼基金听了乌沙季科夫好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敲门声和讲话声，心想：“要我去见连长？可见他没回卫生营，昨晚是在这儿过的夜？”

第十一章

清晨，在阳光照射下，客厅显得很宽敞。窗外草地上的小草碧绿耀眼，令人心旷神怡。就像离开柏林以后一觉醒来看到的第一个意料不到的、愉快的早晨那样，同样的温暖宁静，同样的春意盎然。只有烟叶的臭味、烧酒的酸味、杯盘狼藉的桌子、桌上的空酒瓶、插着汤匙的罐头盒、地板上踩扁的烟蒂，——只有这种乱糟糟的景象和士兵军便服的汗酸味，使人想起昨天这里发生过什么事。

瞄准手塔特金的整个脸肿得眼睛只剩一条缝，脸色通红，像糖萝卜一样，两撇胡子仿佛犯了过错似地耷拉着。他在收拾桌上的餐具，两只手到处抓，把酒瓶放进一只盛东西的口袋里，又不让它们碰得叮当响；乌沙季科夫帮他撑着口袋，一双困惑不解的眼睛不时回过头来看看沙发。加丽雅坐在屋角的沙发上，两个膝头并在一起，在裙子下面圆圆地鼓起来，她仰着头，抽着烟，目光冷漠地在天花板上扫来扫去，既没有注意两个士兵，也没有注意一动不动站在她身旁的魁梧的格拉纳图罗夫上尉。

尼基金走进来，简短地说了声“我来了”，他们都不吭声。格拉纳图罗夫只是阴沉地皱皱眉头，黝黑的脸上透出一层病态的灰色，眼窝周围出现了微微肿起的黑晕，使他显得苍老。沉默了一会儿以后，格拉纳图罗夫一反常态，探究似地、怀疑地把尼基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好像尼基金是个从预备团到他连里来服役的完全陌生的新军官。

“嗯！”格拉纳图罗夫闷声闷气地说了一声，然后，朝一直围着餐桌忙碌的士兵把头一摆，“出去，一会儿再来收拾！”

“在这种情况下，该把地板擦一擦才好，上尉同志。要是按照俄国的……”塔特金一边把酒瓶塞进口袋，一边说着，然后用眼角瞟了加丽雅一眼，“也许我们的中尉，不在掩蔽部，不在战壕，而是在这座屋子里，和大伙儿在一块儿呢！唉，愿他安息……”

“在德国人的屋子里擦地板？我真不懂！”格拉纳图罗夫喊了起来。“他是像军人那样在战场上牺牲的，而不是在这座屋子里的暖和和的床上！耶稣基督，你来啦？”他对尼基金说，“坐吧，爱说实话的人。我非常需要你。加丽雅也是这样。她想见到我们俩。坐吧。我们要弄清一件必须弄清的事……”

“谢谢。我站着自在一些，”尼基金干巴巴地答了一句。对继续昨天的谈话，他没有思想准备，反感地思忖：“她是干吗来的？弄清我们的关系，要她在场干什么呢？”

“还是应该的呀，上尉同志，”塔特金仍坚持说了一声。他咳了一下，背起口袋，晃晃悠悠地向门口走去。“亲戚们和妇女们都是这样做的。要不，总有点不大好。不是住在战壕里，是住在屋子里呀。”

“走吧！”格拉纳图罗夫打断他的话，“够了！别在这儿叹苦经了！”

他亲手在两个士兵身后关上门，然后慢慢地回到餐桌旁边，

磨磨蹭蹭，久久地打量着尼基金，似笑非笑地说：

“睡得怎么样啊，中尉？你还记得你昨天说的话吧？你昨天说的是事实，是这样吧？”

“我认为是的。但现在还值得再重复一次吗？”尼基金回答。他断断续续地回忆起自己第一次喝得酩酊大醉的详情：那时，他浑身无力，内心空虚，绝望，想挑起同格拉纳图罗夫的争吵，想谴责自己，责备所有活着的人，所有在葬后宴上似乎是没有认清昨天发生事故的原委的人。

格拉纳图罗夫坐下来，一只胳膊肘靠在桌上，用那变得尖锐的、像利刃似的目光看了看加丽雅；加丽雅抬起夹着香烟的那只手，忘了抽烟，依旧是无精打采，一声不响。

“是呀，事实终究是事实，尼基金。要搞清，”格拉纳图罗夫又重复说道，“要搞清。克尼亚日科中尉的背包里有一封信……不错，是给加丽雅的信。信在哪儿？把信拿来，并且交出来。交给她，给加丽雅。”

尼基金万万没有想到，完全没有估计到，叫他来见连长的原因可能与信有关，谈话的内容将是有关克尼亚日科的信。他立刻发现，加丽雅的手微微一颤，挪动了一下，烟灰落在沙发的皮座垫上，目光冷淡的眼睛似乎这时才惊惶不安地发现了她，并且了解到他要做什么、要说明什么、要告诉她什么……“怎么回事呀，尼基金？有关信件和我的问题，您知道些什么？有必要谈吗？”可是尼基金考虑到必须马上对格拉纳图罗夫说话，他没有理她，而她终于用疲惫不堪的声音问道：

“什么信呀，中尉？”

“信？……”尼基金机械地说。他仿佛滑到了悬崖峭壁的边缘，悬崖下就是昨天一整天的经过和克尼亚日科的死。

“喂，你在想什么？”格拉纳图罗夫气呼呼地喊了起来，“真

的，你干吗像座纪念碑一样站着？把信交出来，我说的话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

“你是在装糊涂吧，尼基金？有什么不明白的？信在哪儿？”

“应该‘明白’什么？”尼基金说。他像昨天在葬后宴上一样，突然发起狠来。现在，他已十分明白，格拉纳图罗夫为什么要把信给加丽雅看。“第一，”他心中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抵制的情绪，“第一，连长，最好按规矩，说话的时候用‘您’。第二，您问的是什麼？克尼亚日科中尉的文件中什么信也没有。您像我一样，昨天喝得太多了，连长，您是做梦梦见了一封什么信。（“看来，在我来以前，他可能已经把信的事告诉加丽雅了，而我却在撒谎……”尼基金刹那间闪过了一个念头。“那末，他实际上就是要我说出全部真相，用这封信来向她证实克尼亚日科的态度。”）请原谅，加丽雅，”他转身对她温和地说。“这是误会……”

“你这个尼基金！你这是火上加油，是撒谎！信在哪儿？撕了吗？”

“连长，如果您还是称呼‘你’，并且大喊大叫，我马上离开这儿。”

格拉纳图罗夫的胳膊肘碰了一下桌子，桌上没有收掉的脏碟子叮叮当当响了起来。他站起来，脸色灰暗，显然，那只受伤的手臂在桌角上撞痛了。他把手贴在胸前，带着愤怒和强忍着疼痛的表情走近尼基金，不干净的绷带散发出一股医院里的药味，一双失神的眼睛充满了压抑不住的怒火。

“好吧，就照知识分子那样用‘您’来称呼吧。中尉，您是我当做傻瓜蛋吗？您喝得太多了！我暂时还没有丧失记忆力，我什么都记得！我也记得，中尉，您，怎样，”格拉纳图罗夫用讥刺的口吻把“您”这个字说得特别重，“从我这儿拿去了信。您知

道吗，加丽雅，”他改变了口气，使自己的声音带有阿谀奉承的、亲热的调子，“您知道信里写了些什么吗？”

“不知道。”

“您不知道信的内容吗？是啊，您当然不可能知道。”

“是的，我不知道。”她合上眼皮，把头紧紧地靠在沙发靠背上，嗓子里感到一阵痉挛，尼基金又像在林中空地上的时候那样看到她那黑得发青的头发斜披在大理石般苍白的脸上，不禁感到惊讶。“不……我不想知道，”她喃喃地说，眼皮也没睁，一道痛苦的皱纹划过雪白的额头。“不，”她又比较清晰地说了一遍，并且睁开眼睛，像死去一般平静地望着窗外——早晨的太阳正暖洋洋地照射着一棵棵青松。“连长，我不相信您……”

格拉纳图罗夫耸耸强壮有力的双肩，他的鼻孔也气得张大了。他说：

“您相信他？您相信的是他，而不是我，对吗，加丽雅？结果，看起来我倒成了个爱撒谎的人，成了个糊涂虫了？其实，我是个无辜的罪人！并不只是您一个人知道，我喜欢克尼亚日科的勇敢，喜欢他的许多品质，尽管我对他不是十分了解。我希望您能知道这一点！您需要知道真相，您还要活下去呀，加丽雅！您还……”

“别说了吧，格拉纳图罗夫。”加丽雅有气无力地请求道，额头上痛苦的皱纹显得更深了，更明显了。“这毫无意义，格拉纳图罗夫，不用您来对克尼亚日科表示敬佩爱慕。不用您……”

“毫无意义？好，就算这样吧！我一句话也不多说了！即使您想要我说，即使您请我说，我也不说了。什么信也没有过。我什么也没说过。没有给您的任何信件！尼基金中尉是对的。到此结束。完了。我不说了！”

看来，格拉纳图罗夫费了很大的劲才使从喉头迸发的一阵

阵怒火平息下去。他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鞋后跟故意弄出声响，走到屋角转身时，便加重脚步；这时，他像一个说话爱弄玄虚的人那样，怀着一股强烈的不可遏止的、要搞突然袭击的意图，不时瞅瞅尼基金。他站住了，慢慢地、字字用力地问道：

“那末，中尉，您是永远毫不客气地当面说实话的呢，还是有时候这么说？”

“为了这件事，他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的。”尼基金心里想。他顶住格拉纳图罗夫的逼视的、锐不可挡的目光。格拉纳图罗夫声色俱厉地说：

“中尉，您是想成为一只长着白绒毛的、最纯洁的白羊羔吧？真有意思！您把我当做什么人了？当做木头？您当时是怎么和德国女人搞上关系的？请问，在这种时候，您在想什么？这，我是清楚的，中尉！事实终究是事实。请您当着加丽雅的面说出来。否则就叫人弄不懂，哪些是真话，哪些是谎言了！……”

“您清楚什么？”尼基金打断了他的话。“到底是什么？”

从壁炉口里发出一股烧焦的纸味和冷炉灰的气味，使格拉纳图罗夫满嗓子里尽是烟味，刺激着他，使他感到窒闷。他的眼睛也变成紫黑色的，变成了令人窒息的烟灰的颜色。

“中尉，我清楚的是您成功地和德国女人在床上干了一仗！”格拉纳图罗夫毫不顾忌地说了下去。“此外，您在审问时，袒护了这个满脸雀斑的德国女人，您袒护了她的弟弟。而她的弟弟……他叫什么？叫库尔特吧？这个拖鼻涕的坏蛋招的是假口供：说什么森林里有几个毛孩子，有几个狗崽子，而实际上是自行火炮来进攻市镇。克尼亚日科牺牲了；那小子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这一切难道对您还不足以说明问题？到底是谁的过错？真相又何在呢？”

他没有料到格拉纳图罗夫会提出这样尖锐的、来意不善的

疑问；这对他是一种显然的、极端的不信任，是对他的直接控告。因此，在他还不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找不到无法驳斥的证据的时候，他立刻心慌意乱地想：“麦热宁，麦热宁，就是他！”他初步决定：对于格拉纳图罗夫的直截的控告仅仅付之一笑，就说：“上尉同志，您有没有考虑过您说的是什么？”而在外表上则保持镇静，似乎对于别人的并无实据的揣测之词过分认真是毫无意义的。

“是他，他！”尼基金确信不疑。他仍然一个劲儿地想着麦热宁、麦热宁的告密以及麦热宁所选择的报复时机，于是他怒不可遏地问道：

“上尉同志，您有真凭实据吗？”（“我干吗提到证据？”他想，“似乎我想摆脱困境，否认与爱玛的关系？当着加丽雅的面向格拉纳图罗夫作解释，自我辩护，蒙受耻辱吗？”）但他还是把话说完了：“您有证据证明库尔特是作密探到这儿来的，证明在他来了以后德国人就发起了进攻吗？”

“不排除这种可能！”格拉纳图罗夫低声说，“您认为能排除吗？那末，他在哪儿？躲在哪儿？他这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跑到哪儿去了？我不否认，在您和克尼亚日科允许他们留在这里时，我犯了妥协的错误，但是今天我已给自己做出一个结论：那个德国女人应该待的地方是斯灭尔施。应该由那边去对付她！”

“斯灭尔施？不能排除？……”不，尼基金没有相信过德国人。每当他遇见俘虏时——第一批是在斯大林格勒的冬季，最后一批是在柏林——他为他们的普通人的外貌、极度疲惫的目光、破烂肮脏的军装、他们阿谀奉承和千篇一律地嘟哝着“希特勒完蛋了”，而感到震惊。他曾仔细看过他们的脸和手，目的仿佛是想看到他们的血腥暴行所留下的洗不掉的痕迹（这种血腥暴行是应该作为令人切齿的法西斯的标志留在他们的皮肤上的）。但是，俘虏们在他看来都是无法区分的、一模一样的：他们

都是来自另一个黑暗的、杀人不眨眼的世界的两脚动物，为了维持生存而化为人形。不，他没有相信过德国人。就是在后来，越过德国边境的时候，以及后来，在柏林巷战的日子里，一群市民拥挤在地下室水泥拱门下，当他碰上他们投来的巴结讨好的目光时，他也没有在这短暂的交往中就相信他们为开脱自己而向疯狂的希特勒、向在战争中犯罪的狂热的党卫军发出的诅咒。他对付他们所有的人的办法是一律惩罚，对他们恨之入骨，——要知道，战争就是他们挑起的啊！——只是表面上不得不装出一副彬彬有礼的样子，因为这是战胜者在战败国的国土上应该表现出来的宽宏大量所需要的。

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认真去认识在这里、在柯尼斯多夫所发生的事件。在他的心目中，库尔特这个孩子和爱玛并不是真正的德国人；真正的德国人对俄国人露出的是一种类似阿谀奉承的微笑，暗地里却准备露出阴森森的牙齿。（还在东普鲁士的时候，他便经常发现，在战士们离开被占领的房子时，一转身这些有伸缩性的笑容就消失了。）那天夜里，也就是尼基金在顶楼上碰到麦热宁中士和德国女人在一起、德国女人痛哭流涕绝望地呼叫“不，不！”的那天夜里，以及后来，当他在审问时望着他们俩的时候，爱玛脸上惊恐的表情、撕裂到大腿部的连衣裙、她对她那茫然失措的笨拙的弟弟的保护——这一切并没有使他产生对俘虏的习惯性的、暗中的怀疑，而是引起了某种不恰当的怜悯，甚至是充满同情的惊异。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心情，大概是由于他似乎觉得，她的一双睁得大大的、蓝得出奇的眼睛（不是德国人所有的、他没有见到过的眼睛）不可能、也不会蒙骗人。在她力图解释回家原因时咬得发黑的、难看的、丰满的嘴唇使她变得像个大人，像一个被解除武装的、软弱无力的人。但是，她并不像她那哈腰驼背、孱弱无力、胸部塌陷的弟弟，他仿佛处在死

亡的恐怖之中，很听她的话。不，审问时，在他们俩的回答中，并没有尼基金在清楚的一刹那间预料会看到的那种被恐怖掩盖着的敌意的不老实的神气。然后便是那个没有战斗的早晨，在那张神话般的大床上盖着阔绰的鸭绒被醒来时的安宁，从无限美好的寂静之中传来的鸟啼声，敲门声，花园里拂来的暖风中的热气腾腾的咖啡香味，爱玛束着腰带的睡衣，她那怯生生的举止，神色畏葸的蓝眼睛：“中尉先生，早上好”^①，刚洗过的、散发着香皂味的、披在肩上的近乎是古铜色的头发；然后便是她那温柔的嘴唇，以及这全部突如其来的、令人销魂的魔力，像是羞耻的、不必要的、令人惊愕的一切——这一切都是他后来无法辩解的，虽然是偶然发生，但却不应该在他们之间，在一个俄国军官和一个德国女人之间发生的。每当他回忆这些情景时，他就鄙视自己，责备自己，仿佛是怀着一颗面临悬崖陡壁吓得麻痹的心在一片使他波动的迷雾中飘荡，沉浸在无法忍受的既幸福又辛酸的苦痛中。

经过昨天的疯狂的战斗之后，在葬礼以及举行葬后宴之后，尼基金并没有感到一丝轻松，这疯狂的一天反而变得长得难以忍受。他既不愿去想她，也不想去见她。但是，无可慰藉的孤独的痛苦；预感到自己死亡的、被爱玛在阴暗的顶楼里的哭声打断的可怕的噩梦；她那真挚的抹在他脸上的灼热的泪水；“我很忧伤，^②瓦吉一姆！”这发狂似的不自然的呼救声，——也许是这一切违反了一切意愿，又把他们投入对方的怀抱，又使他们亲昵起来。他难道会铸成如此大错，竟会不懂得她是在这种自卫的行动中，撒了谎、骗了人的吗？不可能！说她撒了骇人听闻的弥天大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不可能啊，她是了解他的，她还请他原

①②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谅过自己和库尔特,请求他不要把她和库尔特与那些会杀人、而且杀死了克尼亚日科的德国人相提并论。

“想看证据吗,中尉?你要证据吗?我认为,等斯灭尔施审讯德国女人的时候,一切证据都会有的。有很多巧合的地方,你懂吗?他们是在夜里作为主人回到家里的。也就是在这天夜里,弟弟不知去向,第二天早晨,德国人便发起了进攻。请问,相信谁呀?太感情用事了,优柔寡断,于是就相信人家了!难道不是这样吗?”

尼基金说:

“俘虏里面没有见到这个库尔特。”

“那末,有谁去查看过林务所的尸体吗?也许他就在那儿被打死了,连房子一道烧掉了呢?你太天真啦,中尉!啊,太天真了!真可笑,叫人把肚子都笑疼了。”

“不,我不相信他没去汉堡,而是逃到树林里去了,”尼基金说道,“这是不可能的。我不相信。”

格拉纳图罗夫大声地说:

“我还不相信你呐!懂吗?我不相信你,也不相信你的德国女人!我甚至不放心把连队的临时指挥权交给你!虽然你是剩下的惟一军官。现在这样吧:按男子汉方式办事。我是不会写信告发下级的。我没有这种习惯。你自己给斯灭尔施写份详细材料,要亲笔写上事情的来龙去脉,狼人跑哪儿去了,以及……以及同德国女人的关系!啊呀,请原谅,尼基金中尉,我又称呼‘你’了……”

“随您的便吧。不过,连长,这一切要由您来写。”

“什么?我写?瞧你说到哪儿去了!”

“即使……即使进惩戒营,我一个字也不会写!目前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库尔特是否回到树林里去了,林务所的俘虏是可

以证明的。请您打电话到司令部去查问一下。您见过他吗？他算是个什么样的兵？一只羽毛没长全的小鸟儿！他能干出什么事来？”

“好啊，尼基金，你真大胆！如果一切都将得到证实，——那怎么办呢？”

“俘虏们一定知道他。如果库尔特确是派来的密探，那末承担一切责任的是我，而不是您！”

“你承担什么责任？就为你和德国女人在床上干了一仗吗？就为你开始企图强奸她，后来又使她顺从你吗？”

“我……企图强奸她？这话从哪儿说起？”

“我什么都知道！中尉，我还知道，你想嫁祸于麦热宁，而他曾亲眼看见你在顶楼上的作战行动。其实你在我们这儿，不过看起来像是长着白翅膀的小天使罢了。你必须承担一切责任！要对一切负责！尼基金中尉，我当着加丽雅的面向你宣布这一点……”

仿佛是为了证实确有真凭实据一样，他那炽烈灼人、肆无忌惮的目光迅速地在加丽雅的脸上扫了一下。加丽雅一直无动于衷地闭目坐在沙发上。这个紧迫的、极具危险的现实，犹如一梭子冲锋枪子弹从尼基金的头顶低低擦过。这个将置他于死地的万分火急的危险，突然不受控制地不是将他抛到战壕的底上，而是抛到毫无遮蔽的空地上，抛到近在咫尺的、敞着的无底深渊的溜滑的边缘。深渊的一边站的不是德国人，而是端着冲锋枪的格拉纳图罗夫，他的背后有麦热宁支持他（麦热宁像个隐身人一样站在那里）。深渊的另一边是他，尼基金，叛变行为把他和德国人拴在一起。在克尼亚日科牺牲这件事中，他是直接或间接有罪的。在这种明显的直接或间接的指控中，格拉纳图罗夫并没有把话都说完，然而，就像尼基金当着加丽雅的面刚刚宣称没

有给她的任何信件时，一丝软弱无力、自尊心受到刺激的阴影传给了加丽雅一样，格拉纳图罗夫的越来越凶狠的态度，他那句“在床上干了一仗”的亵渎性的言词——这一切在尼基金心里燃起了强烈的报复的怒火，使他立即走到不顾一切后果的地步。

“听着，连长……”他说道，“我记得克尼亚日科说过：可惜的是现在不准决斗了……”

“要学克尼亚日科吗？”格拉纳图罗夫控制不住自己，转过身来对尼基金说，“要在加丽雅面前炫耀一番？办不到！克尼亚日科是一回事，你又是另一回事！阿托斯、波多斯，三剑客！你——说吧！……想决斗吗？好，请吧，请吧！走！我们去对射吧！喂？走吧！走！”

他歪着身子，用一只没受伤的手抓住胯上的手枪套，把缠着绷带的左臂笨拙地顶到下巴上，这一来，疼得他脸都变了形，齙着结实的白牙齿，牙齿上满是白沫。尼基金望着他：愤恨和软弱无力这两种表情在他脸上厮斗着。不久前，格拉纳图罗夫连长虽说是个性情粗暴、喜欢大喊大叫的人，但是跟大伙儿都合得来。现在他完全变了样儿。昨天在林务所附近那块林中空地的时候，他就失去了以前那样性情随和、那样容易息怒、那样爱流里流气地逗趣的性情，从那时起，他简直是换了一个人。因此，尼基金不知为什么会想到，在格拉纳图罗夫从某个时候就讨厌、妒忌、害怕的克尼亚日科还活着时，他过去的那一套不过是一种暂时的、保护自身的手段而已。克尼亚日科胸怀坦荡，坚定沉着，不费多大力气便能完全使连队服从指挥；在克尼亚日科身边，格拉纳图罗夫大概是尽量抑制住自己内心的自卑感。他受到别人意志的约束和束缚。这种意志要比他的高尚得多。但是，现在克尼亚日科不在了……

“太愚蠢了，连长，”尼基金说，“我倒是想学克尼亚日科的，

不过，学不像……遗憾得很，学不像。”

格拉纳图罗夫把手从枪套上缩回来，透过齜咧的牙齿深深吸了一口气，气冲冲地说：

“记住，尼基金！连里过去的一切事，到此为止！对克尼亚日科我还原谅过，对你，办不到！今天就算告一段落！我要把连里的秩序整顿一下。那些知识分子的大棒，各种乌七八糟的议论，一切臭狗屎——我连里一概不容许！”

“别说了！两人都别说了！……”

加丽雅的这种不容他们再说下去的好似恳求的声音，她的一声喊叫仿佛将尼基金和格拉纳图罗夫从中间一刀割开似的，使尼基金突然感到一阵寒颤。她那瘦脸上的一双明亮的、严厉无情的眼睛迸射出嫌恶、鄙夷的怒火，眉梢也嫌恶地弯曲了：似乎在他们之间，在这里，就在这间房间里，发生了一件被暴露的、卑鄙得反常的、令她颤抖的事情。

“是的，是的……您真可恨，格拉纳图罗夫，”她低声说道，一边用手指抚摩着喉部，帮助呼吸，“您像畜生一样发疯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了，再也不会有了！这是错误的。我们之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这是由于对他的愤恨，您懂吗……格拉纳图罗夫？您懂吗？”

她甚至把手掌竖起来敲了敲沙发的扶手，像患热病似的咬了咬透明得可怕的嘴唇。尼基金也像是被她的话所击中，被她那无情的、直言无讳的坦率所震动，他想：“这是真的吗？那末，他们之间是曾有过什么吗？那末，格拉纳图罗夫当时并不是开玩笑，只是夸大了一点，想激起克尼亚日科的醋劲？”他看了看格拉纳图罗夫。

格拉纳图罗夫先是呆若木鸡地站在壁炉旁边，然后像是准备跳跃一样，浑身都收缩起来了：圆柱一样的脖子、肩膀、一只缠

着绷带的受伤的手臂，涂着碘酒的指甲可怜地露在绷带外面——全身都收紧了，缩小了。突然，格拉纳图罗夫如同看见了一样不为哀求所动的、难以回避的祸事临头，拱起宽阔的脊背，蹒跚着走到房间的另一角了，在那儿站了一会儿，久久地看着地板，看着被践踏过的地毯；当他同样蹒跚着回到壁炉旁边，这时，歪扭了的嘴上露出死人般的、冰冷的微笑，令人看了无法忍受，好像是他憋足了劲想说话，可是，看来全部力气都用来装出一丝微笑，就像小丑戴着太紧的假面具后在嘴角上挂的微笑那样。

“原来是这样，加丽雅，您和我……”他嗓音嘶哑地说。

格拉纳图罗夫挪动两条腿，但是，并没有回到壁炉那儿去，而是转身走到桌前，在还未收掉的杯子中间乱摸了一阵，把杯子全推倒在桌布上，终于找到了一只不知是谁昨天没喝完的酒杯。他收起冷冰冰的笑容，将伏特加一饮面尽，然后坐下来，双肘支在咯咯作响的桌边上，足有一普特重的拳头抵着额头。

“我走了，连长，”尼基金说。他几乎感到轻松了，因为格拉纳图罗夫的笑容现在已被拳头挡住，看不见了，不再刺眼了。这种笑容是陌生的，是被痛苦和束手无策逼出来的。如果他朝着加丽雅大吼，砸碎酒杯，推翻椅子，这都要比那张大嘴上的小丑般的假笑显得更自然些。他这样做大概是试图为自己鼓气，回避加丽雅刚刚绝望地向他说出的无可挽救的事实。看来，格拉纳图罗夫在一心想弄清克尼亚日科和加丽雅之间关系的真相时，并没有估计到这次谈话会激怒加丽雅，使她火冒三丈。加丽雅不愿承认的这个无可辩驳的、一清二楚的事情，对她来说是一种折磨，是一种未曾实现的可能性，并且把能使现状有所改变的其他可能性都给排除了。但是，不可理解的是，在克尼亚日科和加丽雅之间有可能发生或者并未能发生的那件事以后，格拉纳图罗夫有一次竟然当着克尼亚日科的面恶毒地、饶有兴味地、轻

浮地中伤加丽雅……那天，他得意洋洋地从卫生营回来，后方的伙食把他喂得胖胖的，脸上挂着骠骑兵式的笑容。他神秘地望了望克尼亚日科，下流地讲述自己在漂亮卫生员的房间里所度过的胜利之夜的详情细节，并且像出示证据一样，将业余摄影家给加丽雅拍的一张照片放在桌上让军官们看。整个事件中包含着一个目的，一个具有破坏性的真相，像是命中要害的一击，就是在被发现的、克尼亚日科写给加丽雅的那封不知什么原因没发出的信中也包含的真相。

“尼基金，你走吧，”格拉纳图罗夫说道，同时微微动了动头，把鼻子埋在双拳里。“有关德国女人的事，写份报告给斯灭尔施……不，你也不是一个天使，尼基金，不是的……”

在格拉纳图罗夫俯伏在桌上的魁梧的身体里积郁的那可怜的压抑的痛苦，那走投无路的绝望的情绪，加丽雅的冷酷而固执的沉默，她那低垂的眼睛，和昨天在林中空地上一样毫无血色的、瘦削的脸，没有了克尼亚日科之后周围的无限的、孤独的空虚，在脑际盘旋的噩梦，爱玛温柔的嘴唇，她那萦绕耳际的絮语：“你是我的蝴蝶”^①，“为什么是蝴蝶呢？为什么？”——这一切都是一种使大家都受到感染、失去理智的行为的继续。这是由于错误地相信了战争已经到了最后阶段而造成的。他们就是在这个舒适安逸的德国柯尼斯多夫小镇上等待着它。这也许是他们相信硝烟已经永远消散了的、新的幸福生活时期到来了，于是便急急忙忙向前跑去，匆匆忙忙地超越了他们在前线非常迷信地不敢超越的命运的警戒线。

应该行动起来，作出决定，把一些问题彻底弄明白。应该从这个该死的、倒运的、迷惑人的地方冲出去。这儿的迷人的安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宁、白花盛开的宁静的花园，五月的和煦的阳光，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似乎在这里，战争对大家来说已经结束，但它狡黠地并未结束；在这里，克尼亚日科牺牲了。

“我想说一件事，连长，”尼基金闷声说道，“先让麦热宁给斯灭尔施写份报告，然后我再……”

格拉纳图罗夫哼了一声，慢慢地将额头在拳头上动了一阵，没作回答。尼基金于是便向门外走去，迫切地感到要离开这令人窒息的气氛，设法减轻心头的重压，到五月新鲜的空气中去，尽快地闻一闻青草的气味，闻一闻初放的丁香的芬芳，独自一人在花园中，在这虽然诓骗了他们、但终究是春光明媚的环境里坐一会儿。

他已经抓住门把手了，就在这时听到了身后加丽雅的变得坚定起来的深沉的声音：

“请等一等，尼基金，我想告诉您……”

他猛转过身来，马上想：“她马上要说的，就是主要的东西了……可干吗要说呢？”他遇上了她那不善于微笑的目光。

“请等一等，尼基金。”

她冷淡地绕过伏在桌上的格拉纳图罗夫，仿佛他是一样不相干的东西，脚上的靴子轧轧作响。她在桌上找到一包缴获的香烟，“咔嚓”一声掀着了打火机，点上香烟，一缕缕的烟从嘴里一口一口吐出来，她说：

“尼基金，谢谢。（“她为什么要感谢我呢？”）如果今后我不再到连里来，请不要见怪。这样做要好些。当然，大家都了解，以前我为什么常到这儿来。”

格拉纳图罗夫的额头离开了双拳，大嘴上的冰冷的、勉强的笑意消失了。眉毛痛苦而滑稽地蹙起，在鼻梁上联成一线；变得阴暗的、刺人的目光盯着加丽雅，在她脸上寻找着什么，但没有

找到。

而她呢，在鼻孔喷烟的时候，被烟呛了一下，用手按了按胸部。她穿着军装，腰间扎着皮带，使她的胸部总是显得如此饱满、突出、富有挑逗性，以致尼基金有时竟不敢去看她胸前扣得整整齐齐的金色小钮扣。加丽雅的亮得耀眼的、黑里透青的头发，她那光滑娇嫩的白皮肤，整洁的指甲，窄窄的胯股，甚至走路的样子，抽烟的姿势，以及她的不可多得的微笑，常常使尼基金产生一种无以名状的、怀有妒意的兴奋的感觉，一种模糊的、会有祸事发生的感觉。但是，她那冷若冰霜的态度不容人想到，她会按照世俗的方式去爱一个人，毫无嫌恶地让人亲吻、拥抱，允许别人抚弄自己。他无法想象她会跟男人单独在一起。

她迅速地在烟灰缸里掐灭了香烟。

“我比他大三岁，而……他是个孩子，”加丽雅用被烟呛了的嗓音说，“而且我知道……我知道，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我走了，”尼基金说。昨天，他的生活被打开了一道缺口，现在，仿佛从这深不可测的缺口中又吹来了一股荒原上的刺骨的寒气。“我走了，加丽雅。”

“您是他的朋友……所以我想让您知道。我只是爱他而已，并没有抱任何幻想，尼基金。”加丽雅胸前金色的小钮扣不知是因为反常的笑声，还是因为压抑着的哭声而抖动起来。“天——哪！在战争时期难道还能抱什么幻想吗？”

“我走了，”他第四次重复说道。为了不再听到她讲话，不再看到格拉纳图罗夫的病态的眼神（这眼神似乎还渴望着能在加丽雅的脸上捞到一点什么），他打开通向走廊的门。幽暗的走廊里今天很清静，不像平时早晨那样充满了麦粥的气味。但就在这儿，在门坎上，加丽雅像平时一样的平淡的声音又一次使他站住了。

“尼基金，我请您告诉塔特金，让他拎一桶水来。我要洗地板。我还请求您——不要任何人来帮忙。我想一个人……”

“她离开我们了，”他想，“她再也不会到连里来了，现在——不会了……”

第十二章

排里开早饭的时候，不像平时早晨那样热闹：饭堂里只听到匙子的叮当声，听不到说笑声和戏谑声。士兵们皱着眉头，低着头专心吃饭盒里的饭；麦热宁中士坐在桌子一头，好像酒后那样神情抑郁，脸色铁青，稀饭他一口也没有动，只是懒洋洋地掰着面包，填进嘴里，动着下巴，漫不经心地咀嚼着。一发觉尼基金出现在门口，麦热宁就出人意料地、似乎格外精神抖擞地对他喊了一声：“啊，中尉！……”在他那蛮横无礼的淡色眼眸里像模糊的反光似地闪过了一丝警惕的神色，但马上就换上了熟悉的、活泼的神情。而尼基金却带着疑问的神气，平静地瞧着他，问自己：

“现在我对他到底是怀着什么感情？愤恨？厌恶？”

“中尉同志，请坐。乌沙季科夫，给排长拿盒稀饭来！”麦热宁用过分严厉的口吻命令着，“快点！乌沙季科夫，你干吗老在那里逗猫，就像年轻小伙碰到女巫那样。给中尉开早饭！”

士兵们把脸转向尼基金，但谁也没有反应，谁也没有对中士的话发笑。经过昨天的葬后宴，看来，大家都已明白，连长和排长之间的不和之墙又大大增高了，并且猜到，为什么格拉纳图罗夫一早没有到医院去，以及一分钟前他们可能有过什么样的谈话。塔特金的胡子没精打采地耷拉着，红褐色的眼睛在那泡肿

的眼皮下担心地闪烁起来。乌沙季科夫偷偷地拿小块小块的肉喂着膝上的猫，手心在军便服上擦着，不知所措地欠身站了一下，又坐了下去。他还没搞明白，麦热宁要他干什么，尼基金中尉为什么站在门口，不进饭堂，便不好意思地嘟囔说：

“它饿了，真像个孤儿……”

“你真是个小娃娃，”兹金上士放下勺子，说，“你的脑袋瓜里空空洞洞，一点不动脑筋。中尉同志，请坐，稍微吃点吧。”

士兵们沉默着，斜过眼来瞧着麦热宁。他眯缝着眼，张开双唇，做出似笑非笑的样子，微露出因为抽烟熏黄的门牙。

“中尉同志，您好像决意挨饿？”

“我不想吃。”尼基金回答说。当他走近桌子时，突然感到头上似乎糊里糊涂地挨了几下，喉咙也立刻发干了，就像那时在林中空地上一样，当时他们站在大炮挡板后面，克尼亚日科在草地上向林务所走去，而由于谁也没有察觉的原因，在眼看就要发生一件意外事件的关键时刻，麦热宁没有挺过这几秒钟，提前拉响了扳机，接着炮弹就像闪电一般在那所房子楼上的窗内爆炸，就在这瞬间，从那里打出一梭自动枪子弹——克尼亚日科踉跄了一下，又走了一步，不知为什么用手帕擦着前额，便跑着跌倒了。“我可根本没有给麦热宁下令，他为什么要开炮？”头上挨的这几下使尼基金异常清楚地回想起这件事，那一刻的景象十分清晰地浮现在他的被后来发生的事件搞糊涂了的记忆里。他惊讶的是，竟没有一个人——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士兵们——注意到，没有一个人记得昨天的这件事。“没有，谁也没有责备他……要是麦热宁不开炮，那个德国人会开枪吗？……但为什么我要归罪于他呢？我对他抱着什么样的感情？憎恨？厌恶？就是说，格拉纳图罗夫完全相信他？或者想相信他？”

“谢谢，兹金，我不想吃。”尼基金冷淡地说，仍然没有坐到桌

旁去，在他听到自己嗓音的时候，血液在太阳穴里的跳动使他感到昏昏沉沉的，“我就想这样……”

“中尉同志，您和我们坐在一起吧，饥饿是无情的，哪怕喝一杯茶呢？”

“兹金，我们的排长饿一饿，这对健康也有好处。我们大家最好也都挨挨饿，要不然拼命大吃德国饭菜，把肚子吃大了，连皮带也系不上了，哈一哈！”

“麦热宁为什么要说这个？”

“麦热宁中士，既然如此，我也想说一句：您活见鬼！……”

他还不知道，如果此刻麦热宁说出他已经彻底明白、被他揭破的那件事，将它暴露到无可抵赖的程度，这时他将怎么办呢？这样一讲，势必只能有一个结果——最后的、也是令人轻松的结果——摆脱对这张漂亮的、蛮横无礼的，好像捉摸不透的脸，对他的得意微笑，对这些坏牙齿，对他那不合时宜的开炮，和林间空地上发生的流血牺牲的令人作呕和窒息的憎恨……于是尼基金突然用像金属那样铿锵作响的声音放开嗓门说：

“听着，麦热宁……如果您昨天在同自行火炮作战时牺牲的话……那就公道了。您的愚蠢的贪生怕死，就是造成克尼亚日科阵亡的原因。（“我说得多奇怪，多肯定和自信……这是怎么回事？我懂得我目前该做什么吗？多么舒畅，多么有信心——我已经好久没体验到这种心情了……”）您给我记住，现在还不嫌迟，如果我明天在我的排里还看到您这张嘴脸，我就毫不犹豫地毙了您……您这个胆小鬼，混蛋，为了过去的一切……为了日托米尔的事，为了克尼亚日科，为了您的全部谎言和丑行枪毙您！我说的话您懂吗？我说的话您听清楚了吗，麦热宁？”

如果他能义愤填膺地冲着麦热宁的脸把这番话大喊出来，他就会感到轻松和简单得多。叫嚷撕裂了他的喉咙，他讲得如

此冷酷无情，如此出乎常态、不顾一切，如此坚信于他所找到的摆脱狂热病的办法，以致在自己的声调里听出那种默默的难以忍受的决心都感到可怕，好像在全排战士面前他已用同一命运把自己和麦热宁联在一起：预先判决了麦热宁的死刑，同时也将是对自己的一种惩罚。

“您给我记住：我说话是算数的，对您我决不吝惜子弹，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最后的话！……”

尼基金看到，麦热宁脸上的酒后的浮肿变成苍灰色，看到今天早晨他那没有刮过的下巴像一只暗白的尖角那样突出来。但是中士坐在桌旁并没有起身，浓密的睫毛遮住了他那呆滞的眼光，然后，他开始机械地掰着面包，把它捏碎丢进嘴里。他沉默不语地嚼着，颧骨上的肌肉疙瘩一动一动，脸上一下子就布满了黄豆大的汗珠。

早晨很热，房间里越来越寂静，被太阳一晒，就像澡堂里那么闷热。整幢房子里都悄然无声，可以听到猫从乌沙季科夫膝上跳到地上（他已不再喂它），乌沙季科夫惊讶地拉长了脸，瞪着天真的眼睛看着尼基金，慢慢地离开椅子，一只脚碰到塔特金的膝盖，但塔特金既没有对他说什么，也没对他有任何表示，只是他的两眼死盯着麦热宁，大家也都看着麦热宁，而他仍旧不动声色地嚼着，掰着面包，用硬指甲抓着放在油布上的一块面包。寂静使尼基金耳朵里嗡嗡作响。麦热宁和士兵们的这种沉默告诉他，经过昨天的葬后宴后，谁都不愿意再发生能引起纠纷的事，谁也不希望自己同中士以及同排长的关系变得复杂，因为既然大家都经过战斗而活下来，那么对大家和个别人来说，许多事情都是可以原谅的。由于刹那间的意识到有可能和解的想法，由于那不受理智控制的决心，他突然像被一阵冰冷砭骨的穿堂风吹遍全身，心里打起了寒战：“正是现在，就是现在，现在是最后

……只要他说一个字来辩解……我和他之间就可以了结了……”他全身冷得发抖，准备应付最坏的结果，全身好像深陷在一片动荡不定的朦胧之中，那里，士兵们和麦热宁一动不动的脸全都溶化在一起。他感到周围像是荒凉的、沉默的中间地带。在不会消逝的、铅一般沉重的寂静的压力下，他朦胧地、不确切地分辨出兹金上士那审慎而凶狠的男低音，后者忧郁地望着自己的饭盒，不知为什么急于解释排里士兵们合乎理智的沉默的原因：

“中尉同志，难道值得为这种臭狗屎到惩戒营去吗？那你就太不值得啦！如果要搞清楚，他在集市上只值半个戈比……一块人肉而已！”

“不，”尼基金断断续续地、以勉强能听出的声音说，“您不全知道，兹金，不全……”

“所以我说嘛，中尉同志，身上弄了臭狗屎，好久也洗不干净。大家会用铲子把它铲掉的。”

这时麦热宁忍不住了，好像有谁从下面照着他的下巴打了一下似的，他把头猛的一抬，颧骨上的肉瘤一个个像尖石块似地跳动着，一双眯细了的眼睛里充满血丝。

“嘿，你这个乡巴佬！你想送我命？你们商量好了？而你……你它妈的莫斯科的瘪三！你想威胁我？可还不知道……不知道是谁把谁埋掉！你们这些小人，想把我搞掉！我要用牙齿啃你们！……把你们当骨头咬碎！你们要跟我干？跟我干？……”

“麦热宁！”尼基金喊了一声，按照闪电般的记忆的信号，他垂下右手，顺着身子摸到腿侧，那里危险地压着坚硬的“TT”的重量。“住嘴，麦热宁！……”

“你要开枪吗？打我？打我——吗？……”

麦热宁从桌旁跳起来，用脊背咔嚓一声把椅子推开，跳到窗口，像野兽似地露出黄牙，脸摇晃着，抽搐着。刹那间，他凶猛而灵活地弯下身子，发出低沉的嘿嘿声，蹲下去，双手抓起椅腿，胸脯发出呼呼声，把椅子举过头顶，用力向尼基金掷去。尼基金本能地急忙一跳，闪向一边，同时仍然用匆忙中发僵的手指解着手枪的皮套。

椅子扔到门框上，一块笨重的硬东西掉下来打在尼基金肩上，而他好像没来得及看见飞过来打他的木块——一张断腿的椅子落了下来，叭哒一声掉在地板上，也没来得及看清麦热宁由于仇恨而变得难看的脸，因为一切东西一下子都在一片嘈杂的人声中被遮上了一层白茫茫的尘雾，变得模模糊糊。他向这片尘雾迈了一步，被地板上一个凹凸不平的硬东西绊了一下，右手和右肩笨拙僵硬地举起手指已经感觉不到的“TT”，朝着那团模模糊糊的、不知为什么已经不像脸的样子，只是奇怪地由于无声的喊叫而像鱼一样张开嘴巴的灰白色的云雾连开了两枪，这张嘴巴一下子就消失在发苦的火药味的烟雾后面……

“中尉同志！中尉同志！……”

“完了！”尼基金阴郁地、像摆脱了一切似地、冷静地想道。他已经明白，目前他所干的那件事，就从这一分钟起将会改变他的一生。他几乎分辨不清他周围的喊叫声、慌乱的嘈杂声、桌子后边窗旁人们的走动。他模糊地看到面前乌沙季科夫、塔特金和兹金的惊愕异常的脸，看到从雾里向他走来的士兵们的熟悉而又陌生的脸。他透过他们，从他们身旁看过去，但什么也没看见，并且不知为什么拼命要把在他手里变成一块溜滑的金属的手枪往枪套里塞，好像目前这是最主要的事似的，可就是塞不进去，老是找不到皮套，只好把手枪塞在衣袋里。他下意识地，好像十分必要似地用干裂的嗓子低声说出第一句话：

“兹金……代替我留下……我自己马上去报告。”

他没有听清楚兹金的回答，后者正从远处什么地方用责备的眼光凝视着他，但他记得，谁也没有阻止他，没有拦住他，没有去缴他的枪，没有谴责他，于是，他不由自主地，不知为什么走到走廊上，在那里，他弯着身子转身走向出口，大概是要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在他背后忽高忽低地响起了许多嗓子好像堵住了的讲话声（他后面有一个人气喘吁吁地对另一人重复说着什么，莫名其妙地、慌里慌张地喊着，说什么中尉开枪打中士，把他打死了或是打伤了）。他把门打开，外面热烘烘的，空气里充满了甜丝丝的热气。绿色的草地上撒满早晨炎热的阳光。这时他身后的脚步声越来越响，传来了命令声（“在哪里？在哪里？”），走廊里又响起了咚咚的脚步声。有一个人在大声吆喝着，追上来，威胁声压倒了其它嗡嗡声；

“尼基金，站住！站住！”

尼基金迈过门槛，走到铺向草地的石板上。草地上像棋盘一样布满了阳光和松树阴影。他深深吸了一口潮润的淡淡的青草味，心脏在失控的搏动中又颠了一下，前面的草地变暗了。

“尼基金，站住！”

他没有回头看。他的耳朵里嗡嗡作响。

“尼基金，站住！我命令你！站住！……”

格拉纳图罗夫皮靴咚咚地响着，呼吸艰难地跑到他面前，铁臂似的手揪住尼基金的肩膀。他那疑惑不解的、探究的眼睛火辣辣地询问着，一会看看尼基金的眼睛，一会看看解开的手枪皮套。他气喘吁吁地喊道：

“尼基金，你干了什么事？什么事？你开枪啦？为什么开枪？你疯啦？你怎么啦？枪呢？你的枪在哪里？”

“您可以逮捕我，连长，”尼基金说，“逮捕吧，”他机械地、半

疯狂地、冷静地解开皮带扣，“好像还要解下武装带……还有肩章？好像还需要写一张逮捕证，找个押解人？”

“在哪里？……我问你枪在哪里？手枪在哪里？住嘴，白痴，疯子，倒霉的骑士！……”

格拉纳图罗夫整个巨大笨重的身体好像把尼基金同走廊里的慌乱情景、走动的人们和人声隔开了。他用臂肘推他、挤他，用膝盖把他逼向墙边，迅速地摸索着空手枪套，就在那里摸到了他的马裤右边的口袋。他用力把衬里布翻过来，拔出手枪，把它塞到自己袋里，恶狠狠地喊道：

“你到底搞了什么名堂？你为什么要打他？你做出了什么事？什么事？你落到了什么地步？什么地步？臭小子！你是怎么想的？你想步克尼亚日科的后尘？你想毁掉自己的一生？为真理而受难？臭知识分子，乳臭未干的狗崽子！”

“不，不是那么回事，连长……”

“什么‘不是那么回事’？得啦，走吧！”格拉纳图罗夫狂怒地喊道，把肩膀斜过来推着尼基金的背，“得啦！进屋去！向后转！我要逮捕你！到屋里去，尼基金中尉！解下你的武装带，肩章也摘下来！塔特金，拿着枪——到我这里来！”

接着，当尼基金穿过走廊时，这里一下子静了下来，仿佛是在傍晚，一切都变阴暗了，靠着两边墙有许多人脸，像是看不清楚的黑点。尼基金解下武装带和空手枪套，摘下肩章，默默地把这些东西递到什么人的像勺子一样伸过来的手里，心里奇怪，“怎么像勺子！”就在这里，在走廊里，从大敞着的饭堂门里，不是一下子，也不是很清晰地传来一种拖长的、哀怨的、呼唤着的呻吟声，然后传来了加丽雅发自胸臆的指令：“给他把大衣垫在头下！”于是尼基金不由自主地向那照满阳光的地方，往房间里他朝人开枪的角落瞥了一眼……在那里，加丽雅站在兹金和乌沙

季科夫中间，带着严肃关注的神色向下看着，用牙齿撕着急救包。但是，从走廊这边看不见躺在地上的麦热宁，他被桌子挡住了。他哼着。这时，有什么像是灼热的锯齿形的东西在尼基金胸口翻腾。“难道这是麦热宁？难道这是他吗？”

不，麦热宁不可能这样像人一样发出如此痛苦和绝望的呻吟，因为几分钟前他还从桌旁发狂似地跳出来，以歇斯底里的劲头企图自卫，消灭他尼基金，发泄出对尼基金、对兹金上士的憎恨。这就是他，麦热宁，一心想进行威胁，像动物发狂似地大声喊叫（“把你们当骨头咬碎！”），用力把椅子向尼基金扔过来，没有打中，便向排里堆放在地上的自动步枪冲过去。

“不，他不可能这样呻吟，这搞错了，这不是麦热宁，不是他……”

“把他送医院，快包扎，就坐我的汽车去医院！”格拉纳图罗夫在背后对着敞开的大门威严地命令着，很快地说着一些令人不快的粗话，又改变了命令：“停住！我不去不许开走！不许开走！我亲自同他一起去！把他抬到汽车那儿去，等我一会儿！喂，往前走，往前走！”他命令着，粗暴而狂怒地赶着尼基金走，严厉地、不耐烦地催着尼基金：“快些，叫你快些！”

“只不过……请您不要对我大声喊叫，连长！”尼基金非常镇静地、勉强控制住自己说，“您要我到哪里去我都去……去团部，去斯灭尔施都行，随您……”

“住一嘴！还用得着你给我出主意！”格拉纳图罗夫嚷起来，在后面紧紧地挨着他。在昏暗的走廊尽头，厨房后面，他紧紧地抓住尼基金的肩膀，把他向通往尼基金住的顶楼的楼梯猛推。“到那里去！上楼！把他关起来！塔特金！把他关起来，看住他！守在房门口——一步也不许出来，哪儿也不准去！明白吗？您得为他负责！”

“用不着这样，连长，”看到了个子矮小、愁眉苦脸的塔特金正站在楼梯旁手足失措地踌躇着，尼基金说，“我不会逃到哪儿去的。这没有意思。”

“住嘴！把他关上楼去！关起来，看住他！”

还发生了一件事——一件有损尊严的、不轻松的事，好像这是在他被捕后，在通往他房间的路上所发生的最后一件事。他在武装的塔特金的护送下上楼，抬头望了一下刺眼的阳光，望了一下白日的亮光穿过的落满尘土的小窗户。他觉得，他仿佛看到，有一样白的东西像一个轻飘飘的斜影闪了一下，惊吓地跳到微微向楼梯口打开的门缝后面，门砰然一声关上了，就在那里，钥匙在里面轻轻地响了一下。

他走进顶楼，半转过身子对着站在门口的塔特金，但是塔特金把脸转过去看着墙，不来看他，他说：“好吧，您就看着吧……”但是门刚刚关上，两腿就不听使唤，膝头发软。他一头扑到床上，把脸埋在枕头里，像热病发作似地，窒闷而绝望地喃喃自语：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

钥匙在锁眼里转动起来，响起了令人讨厌的声音。顶楼上开始安静下来，而楼下则传来嗡嗡的声音，夹杂着隐约的说话声。

第十三章

“大叔一叔！……”

左岸的机枪射出一梭子弹，在冰上激起点点火花，尼基金微低着头，用双肘抵住冰窟窿的边沿。皮带被拉紧了，像用一根粗

弦抽打不平静的水面，他感到皮带的另一端有一股非常强的弹力拉着他：濒临死亡的什托卡洛夫将他那翻着白眼、嘴巴变形的面孔伸出水面，嘟囔着什么，又消失在冰窟窿的边沿下。一股无法制止的力量把他拖到那青蓝色的冰块下面。而湿皮带变得像铁棒那么硬，这根金属杆以巨大的力量左右翻转着，激溅起波浪。皮带死死地缠在尼基金的手上，寒冷彻骨的水里有一股神秘的、可怕的、人所不知道的强力拉扯着他的手。他一面和铁棒的翻转搏斗，用尽最后的力气把沉重得无法对付的、消失到冰块下面的活人拉向自己，一面感到自己的双肘和腹部沿着冰块被拉向冰冷彻骨的、铁黑色的水里。一点儿可以支撑的东西都已经没有了，他便越来越快、越来越倾斜地滑向冰窟窿的断裂处，冰窟窿下面的冷气和溅起的水珠猛烈地冲着他的头部，但是，他及时地在右边离自己胳膊不远的地方发现了一条从冰块破口处被抛出来的有花纹的大鲈鱼，鱼鳃大张着，冻结在冰块上。这是他的臂肘惟一可以支撑的障碍物，他用肘部抵住，往前一窜，皮带的硬扣环像剃刀一样划破了手心，而什托卡洛夫一直在水中用力拖住皮带，扯啊，拉啊，把他朝自己这边猛力拉了几次，硬得像石头的鲈鱼就到了他的胸口下面，鱼鳃好像冰碴发出脆折的响声。

接着，冬天冰水的令人作呕的气味直冲到嘴里和鼻孔里，前面混浊的迷雾中有一些模糊不清的阴影时隐时现，就像是一群饿虾渴望猎取食物张开的虾钳，从四面八方他急急游来，紧紧地挤在他的身底下爬动着、互撞着，冰冷的虾壳在大衣里的光肚皮上吱吱作响，咬得人撕裂般地疼痛……

一瞬间他就这样想象着自己死亡的情景，在他几乎被涌上来的浪头呛噎、因而下意识地用最后的力量紧紧拉住皮带不放的那时候，头顶上飞过的一梭子弹使他清醒过来，子弹是从对岸

打来的，飞得很低。他躺在冰窟窿的边沿，呻吟着，吐着水，抽搐着的手冻僵了，在冰上碰得到处破裂流血，但还是抓着皮带没有松手，这根皮带现在好像松动一些了，轻得不可思议。在平静下来的冰窟窿中间，碎冰块相互摩擦，发出一阵阵玻璃般清脆的声音，两顶帽子像两只大圆碗漂浮着，一顶是他的，一顶是什托卡洛夫的。什托卡洛夫的帽子是一顶破旧的士兵的护耳棉帽，里子被汗水浸透了，像节俭的人那样，在上面别着一枚针，针上还缠着线。

什托卡洛夫……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是四二年在斯大林格勒城下的阿克萨伊河上。黄昏前，他和司令部派来通知他的一个不认识的通讯员一起到团指挥部去，这个通讯员姓什托卡洛夫，是一个爱说话的农村小伙子，走起路来蹦蹦跳跳，像只麻雀。走了半小时以后，在阿克萨伊河的河道上，突然碰上了一个德国机枪手，他们起初卧倒在冰上，爬着，然后向岸边可以隐蔽的地方奔去，什托卡洛夫就在这里掉进了可能是早晨被重型炮弹炸开的冰窟窿，冰窟窿上面已经蒙上一层没有结牢的薄冰。

“为什么我会想到什托卡洛夫？这并不是梦，我没有睡觉，虽然该睡了，但是我睡不着，而且看见了这一切，回想起来就像是昨天的事一样……那儿，在冰窟窿里，漂着两顶帽子，这就是说，我也可能在那时死去。什托卡洛夫死了，而我却活了下来……他跌进那个冰窟窿的时候，为什么他不叫‘中尉’，却不知为什么莫名其妙地照乡下人那样喊了一声‘大叔！’就像不是在打仗，不过是在冰上往邻村去似的。而我没有足够的气力把他从冰窟窿中拉出来，——为什么我不能够呢？我也没有能带着卫生指导员冲出日托米尔的包围圈，把她救出来，她叫什么名字？好像是叫热尼娅……，我还缺乏力量……昨天我还缺乏一种能制止克尼亚日科，拦阻他，防止林间空地上的事故的力量……但

是在什么时刻？怎样防止？我永远不会忘记，克尼亚日科中弹以后怎样跪下来。真奇怪，他为什么要用手抹自己的脸？那时他想的是什么呢？……”

由于晒了一天，晚上顶楼里十分闷热，尼基金躺在床上，昏昏沉沉，半睡半醒，浑身热汗，心脏激烈地、不均匀地跳动着。他听到怦怦的心跳声。回忆并没有为他辩解，没有向他提供解脱的口实。尼基金也没有寻找理由来洗刷自己的罪愆，因为令人最不能容忍的是在别人临死之际，他总没有尽最大的努力，做到超乎可能做到的事情，而且未能、也不会预防危险，有助于人……这无可辩解的无能和令人痛心的过错现在是这样难以补偿，什托卡洛夫从冰窟窿铁黑色的水中浮出的绝望的、已经死去的面容和随着波浪飘过来的“大叔”的喊叫声，是这样清楚地、活生生地再现在他的面前；热尼娅湿润的双眉是如此痛苦地紧拧在一起，他还从未见过她这样，他想象着春天的蚂蚁在她脸上爬着；克尼亚日科的一小绺浅色头发像孩子的头发那样歪贴在惨白的鬓角上；——这一切使尼基金感到钻心的痛楚，他呻吟着，牙齿咬得轧轧作响。他想从牢牢箝制住他的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挣脱出来，却马上又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淡白色的东西飘现出来，在前而像云雾似的翻滚。又有一个人脸出现了，遮住了别的人脸，这个人脸很不清楚，但却带有威胁性的敌意龇牙咧嘴，朝充满阳光的窗户那面一跳，然后在他的上面闪现出射击的红光，一声枪响，接着又是寂静，继而一个不熟悉的噪音被惊吓得上气不接下气地喊道：“中尉向麦热宁开枪了！真的打死了吗？”一片恐惧的黑浪。

他觉得自己好像睡着了，老是做着同样的梦，与此同时，似乎意识又离开了梦境，他知道，他没有睡，而是在昏昏沉沉的波涛中飘荡着，想着不能摆脱这种梦魇的痛苦，这种梦魇仅仅是用

某种东西遮住的、令人愁闷的现实。

“谁在这样可怕地叫喊？这讲的是谁？哪一个中尉？”在尼基金的脑中产生了阴郁的情绪。“不，这都不是梦，这是确实有过的事情。我好像是走进了食堂，后来我手里握着一支手枪。就是说，我向麦热宁开了枪。是我开的枪……食堂里正在吃早饭，大家都在……现在我将要为我所做的一切负责。接着而来的将是什么呢？军事法庭，降职，惩戒营，用血来赎罪？我犯了罪。因此我没有权利辩白。不，我并没有打死他……他还在呻吟。人家还给他包扎了。是的，我被扣押了，于是就躺在这儿的床上，等人家把我带走。也没有什么，我自己知道……我知道应该采取另一种做法，但是，又该怎么做呢？难道我可怜他吗？那时需要这样做吗？那现在又是为了什么呢？是我记不清楚我所做的事吗？是谁的过错？是我？还是他？我是为克尼亚日科报仇呢，还是为了保护自己？我什么也不能忘掉吗？”

在他下意识地用右手去摸枪之前，在他扣扳机、枪响、房间里窗下升起一团白雾的那一刹那之前，他没有一丝一毫的动摇和犹豫，只要是出于理智的命令，他就要用公正的判决来拯救全连和整个世界，惩罚从昨天开始成为他生活中最憎恨的那个人的怯懦和他的虚伪的叛变行为。但是，过了五分钟以后，他就作为被告被格拉纳图罗夫阻拦在草地上，被拘留了，他看到加丽雅站在原先那个充满阳光的窗户下，专注地看着下面，匆忙中撕开急救包，听到被桌子挡住的麦热宁的拖长的呻吟声，他起初不相信他所憎恨的这个人还能体验到人的痛苦，一样滚烫的东西穿过尼基金的心。不，他自己已决定进行审判，他知道，在这之后随之而来的是什（逮捕、军事法庭、惩戒营），不，他完全不是报复，而是为自己，为克尼亚日科，为全连洗刷令人厌恶的、卑鄙龌龊的污垢，但是，由于听到人的痛苦引起的呻吟声而产生的片刻

的懊悔与怜悯又使他惘然若失，他的头脑里闪过这样的问题：“是谁给我的权利？”

尼基金被扣押以后，一个人被锁在闷热的顶楼里，有哨兵站岗把守，他躺着，回想起一天天的往事，发生了什么，怎样发生的，他和麦热宁的关系是怎样紧张起来的。他竭力用一种痛苦去压制另一种痛苦，在似睡非睡的朦胧状态中想象着，克尼亚日科在那该死的草地上胸部中弹以后忍受了多么大的痛苦，克尼亚日科是否知道麦热宁杀死了他，是麦热宁毫无必要地开了炮，引起不相信我们的德国人回击。他尼基金不止一次犯有过错，在别人的死亡面前无能为力，就像四二年在阿克萨伊河上和在日本托米尔被围时一样。如果不是葬后宴、安德烈的信和格拉纳图罗夫的泄密，大概，在前线麦热宁有许多事情是会被原谅，会被以后的战斗磨掉，淡化的。

“卑鄙，无耻！不，我不应该可怜他，我没有权利可怜他，我做了我应该做的事情。我只能这样做。必然导致这样的结果。这是早就开始的……只能是这样的结果！……”尼基金的头脑中反复思考着，他非常明确地断定局面是不可挽回的，并且完全准备好经受那突然使自己命运转变为黑暗渺茫的惩罚，由于意识到所发生的事情而将受惩罚的念头使得他胸口憋闷，呼吸困难：“我做了……我自己要这样做的。就让它这样吧！……”

他疲惫不堪，浑身是汗，忽然睁开眼睛，喘了口气，就像结束了一场战斗。

房间里很暗，大地不像是在晚间，而像在黑夜里那样沉睡了，万籁俱寂，——在底楼，在顶楼门外，在黑乎乎的窗外，到处都没有一丝声响和话音。

“现在我不应当，也没有权利后悔，”尼基金又开始劝导自己。他细细谛听着，屋里一片沉寂。他把发麻的双脚放下床（靴

子没有脱掉),在房间里摸黑向门口走去,那儿的哨兵好像整天在自己的岗位上一动未动,尼基金又走回床边,再走向门口,“那么为什么?为什么这么长久呢?快点吧,只要快点就好了!……”

旧地板在脚下吱吱作响,木板的吱吱声、他的脚步声、没有束腰带的军便服的窸窣声盖过了喘气声和悸动的心跳声。他站住了,不知该做什么,怎样消磨时间让早晨快点来到,而到了早晨,他知道,一切都将清楚了,一切都将肯定地、无可改变地决定了。

“几点了?已经几点了?”他把手表凑近窗口,窗口稍微亮一些。他集中视力,仔细看了看。表面玻璃呈模糊的浅蓝色,发出反光,但指针隐约可见:已经十一点多了。“早晨之前干什么呢?我睡不着……”

顶楼的炎热和昏暗使他十分难受,没有做成的事情又折磨着他,他感到窒息。他打开一扇窗户,坐在窗台上。下面散发着潮湿、柔和的辛香味;花园篱笆外的苹果树犹如一片凝烟泛着白色;已经是夜里了,温暖而没有月光;西边,持续很久的晚霞早就消失在树林后而,天空微呈淡蓝,在黑色的天幕下还发出亮光,悬在高空的五月的繁星,像梯形,像箭矢,在天空闪耀着,放出愉快而亲切的光辉。在房子周围,在城市里屋顶拐角的阴影上面,在星光稀疏的湖上,在早晨自行火炮突然发起进攻的松树林边上空,——到处笼罩着一片可怕的沉寂;只有一个地方,在炮兵阵地与湖泊中间,一只夜鸟单调地、呀呀地啼叫,在沉睡着的德国小城城郊僻静寒冷的草地上发出的这种单调地重复着的、颇有农村风味的声响,使尼基金感到,这声音是偶然的,是在这死气沉沉的德国迷了路途的音响。

“好像是长脚秧鸡在叫,它怎么会跑到这儿来了?”

后来，他觉得烟瘾上来了，探手摸遍口袋，终于找到了一个揉皱了的烟盒，可又把它在手心里捏成一团，因为里面一支烟也没有了。白天被塔特金锁在顶楼里躺在床上时，他把最后几支烟都抽完了。

为了轻松一些，他使劲擦着额头，仿佛是用凉爽的空气洗脸，然后毫无目的地一次次将打火机打开又关上，并出声说道：“完啦！”突然他浑身一抖，因为他听到有人在喊他，声音清晰，好像就在旁边，就在背后：

“中尉同志！……”

“谁？什么？”他从窗台上跳下，又匆忙地打开打火机，借着微弱的火苗，朝门口走了几步。

那儿，在门外，有人穿着靴子在地板上来回走动，咳嗽了一声，过了半分钟，又压低嗓门叫着：

“中尉同志，您和谁在一起呀？您没有睡，好像在谈话……”

“啊，是岗哨……是的，是的，而我还以为是出现了幻觉……”

一阵胆怯的低语声从楼梯口传入房间，尼基金听出了这是谁的声音，他无意识地用打火机照着亮，向门边走去，也低低地问道：

“乌沙季科夫，是您吗？您替换了塔特金吗？”

“是我，中尉同志。”乌沙季科夫像耗子一样悄声说道，然后既不像叹息，又不像鼻子里哼哼，用几乎听不见的低语说：“是我，是瓦尼亚·乌沙季科夫，您的士兵……”

“连里怎么样啦，乌沙季科夫？为什么这样静悄悄的？”

问完这个，尼基金就不说话了，他把肩膀靠着门框，鬓角贴着散发出旧的油漆味的坚硬的木柱。他的士兵乌沙季科夫，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作为看守站在楼梯口从外面上了锁的门旁，

跟他相隔只有微不足道的几厘米,就是这几厘米成了他们之间的界限,给他们的为时很短的关系中确定了一种新的、不自然的、不可接近的关系。乌沙季科夫是排里最年轻的战士,去年冬天,在波兰领土上才来到前线。尼基金特别喜欢他,因为这个长脖子的乌沙季科夫经过最初几次战斗之后,并没有失去纯朴的好奇心;在别人看来是战争中每一个公式化的细节,都会引起他天真的喜悦和惊奇,经常使他鼓起圆溜溜的、鸽眼似的眼睛,惊叹不已,并且完全不像男子汉那样,用双手拍着大腿。他是被取笑的固定对象,但是为人不狡猾,心地善良,对自己要求严格,憨厚而轻信,——同排里那些有经验、阅历多的士兵在一起,这些出色的品质就变得可笑了。

“就是说,大家都睡了,瓦尼亚?”尼基金又一次问道,为了听到乌沙季科夫胆怯的回答、靴子的走路声和窘迫的咳嗽声,他不想使谈话中断,打算把它继续下去。“连长在哪儿?他走了吗?”

“他和医生送麦热宁到医院去了,早就走了,”乌沙季科夫小声说,这使尼基金想象到,他怎样把自己的长脖子伸向门边,说不准讲的事情。“下面好像谁也没有睡,都躺在房间里……兹金上士一直在那儿谈论您和麦热宁……”

“兹金说些什么呢?”

“他说不该那样,中尉同志……排里的人都很难过,他说您本来是一个很严肃的人。现在您可怎么办呢?会判您到惩戒营或者别的什么,会把您作为犯罪的人逮走,麦热宁毁了您的年轻的一生……真倒霉!格拉纳图罗夫临走的时候,非常严厉地亲口命令大家,有关连里发生的事件对任何人一个字都不准提。他暴怒到极点……破口大骂啦。您这是为了什么呢?”

“我做了我所做的事,”尼基金说,乌沙季科夫关于排里谈话内容的老老实实的报告及他像娘儿们那样流露出来的怜悯与同

情使尼基金讨厌，“全部事情要复杂得多。”

“怎么能这样，中尉同志，结果使您多么难堪！”乌沙季科夫在门外匆忙地低语着，在黑暗中，尼基金在想象中好像看到他眨动的双眼里显露出惊吓与诧异。“他这个人中用，凶狠而又不正常，就让他自己像蝮蛇一样爬来爬去吧，或许还不会咬死人。要知道杀死一个德国人都是可怕的，更不用说我们自己人啦。在家里，妈妈叫我杀鸡，我都是眯缝着眼睛杀的，非常害怕。中尉同志，您为什么自己愿意走上这条绝路呢？”

“不，我并没有愿意这样，”尼基金说道，他皱着眉头，无意地打开了打火机，看了看火苗。“我没有想这样，瓦尼亚，这件事说来话长，再说，又何必要解释呢？”

“好像是您自己要走上这条绝路的，中尉同志。会逮捕您的……没有了您，排里怎么办呢？大家跟您都相处惯了。克尼亚日科中尉被打死了，您又出了这种可怕的事情。我们可怎么办呢？”

“会派新排长来的，况且战争快结束了，很快，很快一切都将结束，瓦尼亚。我深信这一点。”

在门的那一面，在他们之间竖起了黑夜般不可逾越的一动不动的界墙，在咯吱咯吱响的地板上行走着的靴子没有越过这个界墙，低语声中断了，尼基金重又想象到只隔着一道门槛的、在黑暗中低垂着脑袋的乌沙季科夫，他被派来看守他这个排长，正为幼稚的困惑不解、同情和突然发生的事件而苦恼着。

“他说‘相处惯了’，”尼基金难受地想，不知为什么机械地打开打火机，然后又关上，“我自己也和他们相处惯了，习惯到难以言传的程度！”

他们俩都沉默着，突然乌沙季科夫用鼻子大声吸了口气，在楼梯口来回转动着脚步，不安的耳语声透过黑暗向房间里钻来：

“中尉同志，您那儿什么东西在咔嚓咔嚓地响？您那儿没有枪吧？”

“没有，瓦尼亚，是打火机。我非常想抽烟。烟卷没了，您那儿有什么可抽的吗？”

“哎呀，我的天哪！”乌沙季科夫哎哟一声，大概还不知所措地用巴掌拍了下大腿，“我以为，那儿咔嚓咔嚓地响，别是您在摆弄手枪呢！我起了个蠢念头：您别一时想不开，对自己开枪呢！上帝啊，我的妈呀，我这儿烟草有的是！缴获来的烟卷，有整整一包……”

“如果可以的话，请您把门打开。给我几支。”

“您怎么不早点说？我马上……如果您早点儿说，那么我……我马上用钥匙把门打开，只是要悄悄的，中尉同志，行吗？……”

“开吧。”

钥匙在锁眼里轻轻一响，转了个圈，门就打开了。小小的楼梯口上一片漆黑，热呼呼的，上面圆圆的小窗在星光照耀下微呈淡蓝，门槛外面依稀可辨的乌沙季科夫在门缝里笨拙地向前伸出自己发烫的双手，将一包烟塞到尼基金手里，不好意思地嘟囔着：

“您怎么不早说？我不会抽烟。只是做做样子。跟大伙在一起的时候喷喷烟。您把整包都拿去吧。我不需要……”

“谢谢。”

尼基金摸出一支烟，打火机发红的火苗照亮了乌沙季科夫的年轻的、惊奇的面孔，他看着微弱的火苗，双眼眨了眨，闪烁着光芒，茫然期待着什么，军便服的领子敞开着，露在领外的年轻人的脖子像根柱子，伸得笔直。底层的热气往上升，窒人的闷热聚集在这狭窄的楼梯口。

“或许，我们一起来抽烟吧，乌沙季科夫，”尼基金说。当他发现乌沙季科夫身边没有哨兵应带的武器时，他笑着问道：“喂，您的冲锋枪在哪儿呢？您怎么不带枪来看守我呀？”

他点着了烟，但没有吹灭打火机的火苗，看着乌沙季科夫的很善良的双唇，——这样，他似乎感到愉快和平静一些。

“枪在角落里……请原谅，中尉同志，”乌沙季科夫喃喃答道，十分轻悄地挪动着靴子，他垂下眼睑，然后淡淡地转换了话题：“还有这只猫，这个德国笨蛋，前几天从下面来到这里，就在小小的粗地毯上住下来了，自管睡觉，该死的，就好像俄罗斯魔鬼，真没得可说的。它老缠着我，”他看着脚下，亲切地补充说道：“您看见吗，中尉同志？只管打呼噜，这样的畜生，很灵的，就好像找到了亲人，我就这样站在它旁边，生怕靴子踩伤了它。”

但是尼基金对猫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他默默地给乌沙季科夫点上烟，关了打火机。他们俩沉默了许久。屋里一丝声响也没有，夜间，一切都沉睡了。

“哎呀，我的天，我的天！”乌沙季科夫被烟呛了，他忍住咳嗽，忧郁地低声说道，“您不怕吗？到早晨，会对您怎样呢，中尉同志？”

“在战前我曾经读到过这样的话，瓦尼亚，对一切都要负责，都要得到报应。对一切。您懂吗，瓦尼亚？我以前是不相信这个的。”

“怎么可能这样呢？”乌沙季科夫不理解，他困惑地叹息着，“如果一个人只做好事呢？那他又为什么要得到报应呢？哎呀，我的天啊，我的天啊！”

他们又沉默了，就这样在未被骚扰的静谧气氛中，一齐抽着烟，门开着，他们中间隔着一道门槛：尼基金站在房间里，肩膀靠在门框上，乌沙季科夫站在楼梯口。烟卷的火星在黑暗中时亮

时暗，意犹未尽的话，向对方无法说清楚的简单而又复杂的情况把他们联系在一起，这种状况不取决于他们俩，就好像昨天早晨许多通常认为是命中注定的事情不取决于尼基金的号令，也不取决于在穿过设有德国自行火炮的树林进行冲锋和撤退时站在炮门旁边的乌沙季科夫的神经质般的利落一样。

“中尉同志，您听见了吗？”烟头亮了一下，微弱的火光从下面映照出乌沙季科夫的脸，他的眼珠像磷光似地突然左右溜动了一下，又与暗淡下去的烟头一起消失了。“一直是这样……”他鼻子里哼哼了几声，把话说完，“从我开始站岗起，一直听见……”

“您说什么，乌沙季科夫？”尼基金漫不经心地问道。

乌沙季科夫神秘地低声诉说起来，他讲得很快，有些话都漏掉了。

“她一会儿蹑着脚向门边走来，好像是用指甲在抓，然后就走开了，要不就在自己房里轻轻地哭，不让门外听见，而我的听觉就像狗一样灵……连长命令不准她外出，她连小房间的门都不敢出，中尉同志，而她总需要什么吧。这个德国姑娘大眼睛，挺活泼，可是怕我们就像怕野兽一样……您听见吗，中尉同志，好像在抓门？”

“爱玛，爱玛！”尼基金的情绪焦灼激动起来，他朝黑暗中应该是她的房门的那边看了一下，感到脸上发烫，心脏紧揪在一起，鬓角的血管在跳动。他回想起早晨，他身上没有武装带和肩章，被格拉纳图罗夫拘捕，由塔特金押送着上楼梯到这儿来的时候，门缝里有一个白的东西一晃而过，后来，上面的门响了一下，砰的一声关上了，从里面传出惊慌的锁门声。“是的，在那个房间里……爱玛在这旁边，是她……”

在他被拘捕后待在自己的顶楼上度过的这好几个钟点里，

他几乎没有好好地、仔细地想过她，回忆过她：这一切现在看来不是主要的、微小的、偶然的事情，被他今天早晨干下的大事排除于脑后。对爱玛的思念并不持久，只是当耳朵里一再响起格拉纳图罗夫的嗓音，而他却没有表示赞同并否认了格拉纳图罗夫的怀疑的时候，他才好像感觉到她那茸毛很密的双唇淡淡的味道，看见了她在学会按音节念出俄罗斯名字“瓦吉姆”以后由于惊奇和快乐而微笑时半露的发亮的、湿润的皓齿……但是他马上在心里排除和压抑了这与她有关联的事，这像是犯罪似地触动了什么被禁止的、谁也不容许的事，逾越了制定的神圣法规一样，战争本身就不允许他逾越这些法规。

“而麦热宁前几天对兹金扯谎，中尉同志，”乌沙季科夫不好意思地说道，“说您好像在跟德国女人搞恋爱。他像个畜生，扯谎。他胡说八道，真可怕……”

“不，麦热宁没有扯谎，”尼基金突然说道，“我认识她。”

烟头红了，乌沙季科夫不知该说什么，他喘着气，吞着烟，说道：

“这怎么理解呢？中尉同志……你们爱上啦？我的天哪……是真的呢，还是怎么？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

尼基金又体验到某种新的矛盾的心情。是的，爱玛当然应该听到了枪声和下面的叫喊声，后来也能从门缝里看到他没有了武装带和肩章被人押上楼来，这样，她也可能会想，不幸的事情是由于她造成的，因而惊恐万状，把自己锁在房间里，一个人在那儿哭，不时走到门边，却又胆怯地不敢开门，不敢出去，因为楼梯口站的哨兵像是一种威胁，而谁也不愿向她解释任何事情。尼基金又羞又气，因为他强迫自己设法不去想爱玛，忘掉她，推开使他想起爱玛、想起他们之间不正当的亲密关系的一切，他使

自己相信他是用这种保护性的自我欺骗来背叛她和自己,并且懂得了(“连长吩咐不让她外出。”)使他苦恼了一整天的内在原因。

“乌沙季科夫,”尼基金忽然下了决心,因为他知道自己总归是要这样做的,“乌沙季科夫,您听我说,我对您有个要求,”他说道,“如果您同意的话……那个德国女人和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她可能以为她是这一切的祸根。我应该和她谈谈。向她解释清楚。您明白吗?我敲开她的门,同她谈谈。一切都将悄悄地进行,我们不会惊动任何人,您懂我的意思吗?”

“这怎么……中尉同志,我该怎么办呢?”乌沙季科夫迟疑着,靴子在地板上踱来踱去,“我终究是个哨兵,您自己也曾教导我要遵守规章制度,难道您……允许破坏制度吗?”

“啊,这个乌沙季科夫可真是个天真可爱的小伙子!他好像在向我道歉吧?”

“您懂吗,乌沙季科夫?我哪儿也不会逃跑的,这对您来说是主要的,我不会逃跑的,也无处可逃!”尼基金很快地说,“其它方面的事就不重要了,您相信我?还是不相信呢?”

“难道我会不相信您吗,中尉同志?”乌沙季科夫慌乱地表示同意,但是在他的嗓音中包含着迟疑和惊异。“我不知道,完全不知道,您和德国女人……”

“这很重要,乌沙季科夫,很重要,我必须跟她谈谈。现在就谈。”

他打开打火机,往楼梯口看了看,跨过门槛,走到对面关着的门前,看到淡红色的反光在门上晃动,他用手指摸了摸门,轻轻地敲了敲,低声喊道:“爱玛,到我这儿来。”^①但是,门背后无

^① 此处原为德语。

人回答，听不到沙沙声，听不到脚步声，也听不到人的呼吸声，房间里隐蕴着空荡荡的静夜，尼基金又使了点劲儿敲敲门，再次低声喊道：

“爱玛，是我……瓦吉姆，爱玛……”

忽然在下面什么地方发出隐约的声响，不知是呜咽，还是叫喊，后来，这模糊的沙沙声从地板下面怯懦地传了上来，声响很快地移到门内侧，但门锁没有马上发出响声，钥匙在转到第二圈时停顿了。打火机暗淡的火光在楼梯口温暖的过堂风中摇曳不定，微弱下去，门缝里昏暗的火光照出了爱玛惊恐的大眼睛，照出了她那蓬乱的、垂在半边面颊上的长发。她的手指按在锁骨上，好像受到走廊里冬天般寒气的侵袭。她满面泪痕，丰满的嘴唇和眉毛的颤动使整个的脸无力地扭歪了，在这瞬间尼基金觉得她的面容是病态的、绝望的、难看的。他苦于自己是半个哑巴，竭力寻找、挑选着表达自己意思的德语单词：

“爱玛，一切……一切……一切都很好。”^①

她的脸似乎无力地向后仰着，脖颈弯着，她摇着头，哭着，叫喊着，低低地说道：

“中尉先生……瓦吉姆！一切都很不好，很不好！”^②

打火机灯芯里的汽油点完了，火苗变小了，慢慢地熄灭了。尼基金慌张地猛按砂轮，冒出了几点火星，灯芯燃起几个深红色的斑点，终于喷出一点儿火苗，继而又完全熄灭了。尼基金骂了一句：

“见鬼，汽油没了！”

“中尉同志……我这儿有，”乌沙季科夫在旁边嘟哝着说，“拿去吧……”

①② 原均为德语。

他拿着打火机，用手摸着这个奥地利出产的战利品，这种战利品还在到达柏林之前就在排里出现了，——一颗微型炮弹，——而他随即使自己停下手来，没有打开打火机，像是忘记了自己已经丧失采取决定权利的处境，坚定地说出了自己想出的办法：

“最好是一——到我的房间里谈谈。这样要好一些，乌沙季科夫。如果有什事……或是格拉纳图罗夫来了，请告诉一声……大声咳嗽一下。我不想连累您，也不会连累您，您懂吗？”

乌沙季科夫在黑暗中机灵地、热情地说：

“中尉同志，我在这儿，下面有一点响动都能听到，我的听觉像狗一样灵敏。放心吧，如果有什么，给您个信号。”

“爱玛……”尼基金悄悄地喊道，他没有打开打火机（他不愿意让乌沙季科夫看见他们的脸），打开了她的房门，爱玛就默默地站在那里，他顺着暖呼呼的大腿，摸到了她那垂着的纤细的手，而她也同时伸出手来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指，尼基金小心地将她拉在自己身后：

“爱玛，到我这儿来！到我这儿来！轻轻地，爱玛！……”^①

“瓦吉一姆……”^②

第十四章

他们进去之后，乌沙季科夫关上门，刚用钥匙把门锁上，他们俩便痛苦地、迫不及待地、如饥似渴地扑到一起，以青春的狂

^{①②} 原均为德语。

热紧紧地拥抱起来，无休无止地一个劲儿地接吻。她连气都喘不上来，轻声哭着，一面接吻，一面老是低声叫唤：“瓦吉一姆，瓦吉一姆……”^①而他，一面感到爱玛面颊上的热泪和乱发的香味，一面也费力地挣脱她那寻求接吻的柔软的嘴唇，情意绵绵地说了些什么，连他自己也不完全明白。他的呼吸和她那不均匀的、勉强喘过来的热气融在一起。就像在一个远离尘世的地方，犹如点点火星，犹如头顶吹过一阵清风，脑子里浮现出一个达观的想法：无论怎么样，不管他会碰到什么事，他是无能为力的，只好任其自然。他被她的嘴唇、微弱而拖长的声音、注视着他一举一动的眼神给迷住了，征服了，好像很久以前他曾见到过她，熟悉这种感觉，同她是相识的……

“爱玛，亲爱的，”尼基金小声说，没放开她，竭力想看到她那贴着自己的脸，可是在黑暗中又看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会这样呢？你和我？我是个俄国军官，你是个德国姑娘……我没有权利呀，爱玛，亲爱的……我本来以为，一切很简单……和一般事情一样，是不是？可是事情并非如此，并非如此，爱玛……”

她擦掉他面颊上的泪水，用手抱住他的后脑。

“瓦吉姆，我要死了……我爱你。我真心爱你。唉，我们今后将会怎么样啊？”^②

他还记得“将会”和“今后”^③这两个字。他不只一次看到过在德国制造的武器上的金属商标“保佑我们”（“上帝保佑我们”^④），所以懂得她问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能晓得怎么样就好了……”尼基金忽而耳语，忽而低声说。“即使我知道他们将把我弄到哪儿去，反正也是一样，

^{①②③④} 原均为德语。

我和你能做什么呢？总而言之，有什么办法？”他有点语塞了，若有所思地讲着俄语，可立即又想起中学时熟记的海涅诗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① 她沉默不语，手仍抱着他的后脑。“你是当地人，柯尼斯多夫人，我是俄国人，莫斯科人。我们正在同你们德国人打仗。要是你生在俄国，要是我在那儿碰上你就好了。我一定会乐意遇到像你这样的人……我一定会爱上你，爱玛，爱上你，听懂我的意思吗，亲爱的爱玛？……我一定会爱上你……”

“噢，瓦吉姆，我亲爱的……为什么提到俄国？为什么？”^②

爱玛的双手哆哆嗦嗦地从他的脑后挪开。他感到手里她那整个纤细的身子向后仰去，往下滑，她坐到了地板上，用额头偎着尼基金的双腿，而尼基金羞怯地不知所措，说不出话来，忽然一下子扶起她，温情地紧抱住她，他们这样拥抱着一动也不动。

“爱玛，爱玛，”尼基金一遍又一遍地叫着，将她的头向后仰了仰，掠掉她面颊上蓬乱的头发，想看一下这张在他面前发光的而孔，“原谅我，竟会落得这样的结果。我并不知道竟会这样。你那天早晨进屋的时候，我想的完全是另一回事。当然，我有罪。我不知道，我们俩谁有罪。不，问题不在这儿，问题不在这儿……”

“瓦吉—姆，我爱你，我爱，我爱！……”^③

她把他的脖颈搂得更紧，使的劲越来越大，两膝颤动着碰到他的膝盖，接着，两腿无力地弯了下去，轻轻地叫了一声，好像一个有弹性的重物将他往下拉，好像两人一起跌在地板上：由于感激、兴奋，加上她不懂得的俄语以及他对她表现的真挚的激情使她产生的惧怕，她已经十分疲惫，她想以此来证明她对他是多么

①②③ 原均为德语。

温顺和忠忱。她用一种昏谥的低声说：

“瓦吉—姆，亲爱的……瓦吉—姆……”①

他这时脑袋里混混沌沌，为她方才的柔情的蕴藉，为她拖长的低语所降服，突然，又朦胧地想到，就在相隔几步的楼梯口，乌沙季科夫站在门旁守着他们，——不可能，也不可以忘掉这一点，接着，他好像酒后清醒过来，托着爱玛的朝后仰的背部，按着她的肩膀，用勉强可以听到那消逝在漠然的黑暗之中的声音对她说：

“爱玛，我们现在不该这样。我们现在不要这样。我们只是该谈一谈。爱玛，坐到这儿来。这儿，窗台上。这里比较舒服。请你坐下来，爱玛，请坐，爱玛……”②

他搂着她，将她带到窗前，当他要她坐到窗台上时，她大概是不明白他想干什么，就抓住他的一只手。他没有将手拿开，认为自己这样做是对的，就开始吻起她那期待着的、张开的嘴唇，在一阵突发的绝望中他眯着眼，不知道会有什么事落到他和她的头上。

“爱玛，爱玛……”

“瓦吉—姆，我爱你，我爱……”③

“爱玛，听我说，”尼基金说着，仿佛落进波涛汹涌的雾海里，“这儿发生的事，你不需要知道。你同这件事没有任何关系。你一点没有错。一点没有。也没什么好害怕的。懂吗？我要走了……也就是说，到天亮我就不在这儿了。但是事情已经如此。我很喜欢克尼亚日科中尉。鬼晓得我干了什么事！看样子，我就要看不到你了。‘我怎么会再到柯尼斯多夫来呢？不可能，我不知道会不会！在惩戒营里还要受受罪，在那里一切将重新开

①②③ 原均为德语。

始。可是随它的便……再坏也不会比在斯大林格勒，在德聂伯河或者在柏林更坏了！我知道，战争就要结束了。我再也不会到柯尼斯多夫来了！懂吗？可我……我是爱你的，爱玛。我觉得……我不知道怎么办。就这么回事，爱玛。我原先并不知道事情会这样。”

“瓦吉—姆！我一点也不懂！为什么提到斯大林格勒？提到柏林？”^①

她从窗台上弯下身子，不知为什么把鼻子贴住尼基金的鼻子，她那发出温和而又清新气息的头发触到尼基金的下颌，使他觉得发痒。她身上发散出第一天早上带来的那股略带甜味的、她一直有的香味，当时她用托盘端着一杯咖啡走进来，怯生生地看着他那疑惑不解的目光，有些做作地微笑着。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讲德语吧！我一点也不懂！”^②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③尼基金终于讲出了浮现在记忆里的学过的一句诗。“记得吗？我想起了在中学里背熟的诗。好像是在八年级。那时德语课我想得个‘优’。可你不知道这些诗。希特勒把海涅的诗烧成灰烬。我知道，强迫你们只准读希特勒的《我的奋斗》^④……”

“希特勒？”^⑤爱玛叫了起来，一头扎到他的胸前。“希特勒是个疯子！这是一场再坏不过的噩梦！希特勒开始同俄国打仗的时候，我父亲就这样说过。可是，如果不是这场可怕的战争，你也不会到柯尼斯多夫来。请原谅，也许我不该这样讲！”^⑥

“你为什么要请求原谅？”尼基金说，在她说得很匆忙的这段话里，他只听懂个别单词。“战争不是由你决定的，也不是由我决定的。爱玛，听我说……”他又把她的头向后推一点，看着那

①②③④⑤⑥ 原均为德语。

双噙满泪水的眼睛，“主要的一点我还没告诉你。我们俩……明天就再也不能见面了。我并不希望你去胡思乱想，去想已经发生的事。爱玛，我非常爱你。你和战争没有关系。不，当然是有关系，可这完全是另一回事。你听得懂我的话吗？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讲下去，看在上帝的面，讲吧！”^① 爱玛央求着，并用指尖轻轻地触了一下他的嘴唇，仿佛这样一来，单凭触觉就能领会、猜出他的意思。“瓦吉一姆，我在听。你应该学德语，我应该学俄语。”^②

“我多么希望你能懂得。等等，我讲慢些，一个字一个字地讲。我希望，我希望^③……你懂……不行，我忘了德语怎么讲的……哪怕讲一句也好：我会记得你的。德语怎么讲的？‘记得’Vergessen 是忘记。不忘记，不忘记！^④懂了吗？”

“不忘记？”^⑤她又重复问了一次，全身向他偎靠来，在黑暗中她那发亮的脸也靠了过来，用那轻盈的指尖一会儿按住他的下嘴唇，一会儿又放开。“噢，瓦吉姆！学德语，学德语。俄语，德语……为什么这样的？等一等，瓦吉姆，来，瓦吉姆！”^⑥

她按着他的肩膀，从窗台上跳下来，接着，执意拉着他的手把他拉到顶楼黑洞洞的地方——一个角落里去。在那里，他被她那警告的低低的“嘘”声阻止了，因为他不慎撞了一下，脚碰到椅子，椅子又碰响写字台的小柜。炮排驻扎进这幢房子以来，他还是第一次注意到这张写字台。上面摆着塑料做的墨水盒，一支挂满烛泪的粗蜡烛，蜡烛上有一只尖形灯罩，还有一个赛璐珞的小玻璃杯，里面插满了彩色铅笔，几本教科书照学校里的摆法叠放在一起。直到后来，他才知道，他住的这个房间是库尔特的

①②③④⑤⑥ 原均为德语。

房间。

“瓦吉姆，坐下。请念一念，我亲爱的。”^①

可是尼基金一下子还不明白，她把他拉到房间的角落里，拉到库尔特的写字台旁边来干什么。她在这儿开始找什么，不耐烦地拉出抽屉，把里面的纸弄得簌簌响，不知想干什么？接着，她划亮了火柴。那欢乐的、深红的小火苗照亮她那窝得像小船似的手和凝视着他的一双发亮的眼睛：“瓦吉姆，坐下。”^②他领会了，悄悄把椅子搬过来坐下。她用窝得像小船似的手掌遮着，把火苗移到蜡烛跟前，熔结在蜡烛中间的烛芯上的蜡融化了，火点亮了。爱玛松了一口气，坐在写字台旁老式的、有些磨损的天鹅绒安乐椅的扶手上，吹灭火柴，低着头，皱着眉头看着一张纸。

“瓦吉姆，俄语，德语。”^③她点头示意。“你看，我写上我们的名字：瓦吉—姆，爱玛……”^④

他望着爱玛低垂的脸，望着那清晰地用铅笔写成的粗大的德语字母拼写成的他的名字，看到她的眉梢、咬着的唇、稍翘的鼻子两旁的小雀斑，看到她怎样在“瓦吉姆”下面画了一颗小星，用小圆圈圈起来，旁边又写上“俄国”^⑤，然后，在纸的另一头“爱玛”^⑥下面画了一个稍小的圆圈，里面点上一个细点，圈下面写了“柯尼斯多夫”^⑦，纸上空白的地方画了一条线，把两人的名字联在一起，在线上注了三个字：“我爱你”^⑧。

“你翻译一下，”^⑨她要求说。

“‘我爱你’，”尼基金回答说。

她向他转过脸来，微笑着，蓝眼眸里放射出明亮愉快的光焰，她把铅笔递给他。

“写俄文。”^⑩

尼基金在她写的那句话旁边写上：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原均为德语。

“我爱你。”

她久久地、聚精会神地端详着这几个俄文字母,用手指甲在纸上划着,接着将德文和俄文对照着看,焦急地、小声地问他:

“Ich……俄语怎么说?”^①

“我。”尼基金回答说。

“Liebe?”

“爱。”

“Dich?”

“你。‘Ich liebe dich’,就是‘我爱你’。爱玛,跟着念。我一爱——你。”

“我爱……”她拖长着音,说得很慢,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说:“爱你。”

“对,我爱你。我爱……”

“哟,瓦吉姆,我学俄语了!”^②她甚至笑了,为自己能说出几句她没有说惯的话而感到高兴和吃惊。接着,仿佛那拂面而过的一阵晴日的和风,一瞬间便停息了。“你要到俄国去。我很忧伤。我要死掉的。死。”^③她说完这句话,用两个问号将联接他们俩名字的线划掉,画了一个带交叉的骨头的骷髅,激动地紧贴着尼基金,面颊擦着他的太阳穴。她那眨巴着的睫毛使他感到一阵阵的刺痒。

“死,”她低声说。“你走了,我要死的……死……俄语怎么说的?……”^④

“死,”尼基金回答说。在前线他常会碰到叫“骷髅”、“骷髅师”^⑤番号的德国部队,他们和炮兵连为敌。“你要知道俄语这个‘死’字干什么?”

①②③④⑤ 原均为德语。

“死？”她发出这个音，她那使对方发痒的睫毛又眨了眨，轻轻地擦了一下他的太阳穴。

“不对，这是个讨厌的字，爱玛，”尼基金说，“整个战争期间我都恨这个字。‘死’，‘死亡’，‘英勇牺牲’……我不希望你记住这类字。记别的好了，行吗？你来记，我就写。”

她一面听，一面用她那双专心捉摸着每个字母的眼睛盯着他的嘴唇，又把目光转到纸上和铅笔上，此刻，他正用铅笔以一种隐秘的迷信心理将那幅不祥的画涂掉（这是她所了解的、无法摆脱的困境的象征），在纸中间用俄文写上：“再见”——左边一短横，再写上很久前在中学学过的一句德语：“再见！”^①

“没什么死。不要死。不要忘记，不要忘记。”^②尼基金又开口说，“谁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你也不知道，一切将会是什么样。在战争中我好几次几乎死掉，但是没死。再见^③，爱玛，你懂不懂？我们将要分手——这并不等于死。战争都要结束了，我们不该谈到死。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来看你，爱玛。”

可是，尼基金未必相信他自己现在所说的话，一点把握也没有。在前线的三年中，他已学会适应情况的剧变，每个人和大伙命运中的突然转折，可是他还没有失去天真的希望。奇特的偶然，也就是说不可预知的路途还可能把他带回到柏林，这也就是说，到柯尼斯多夫逗留一两个小时、一天，——这种事情的现实性还不能说一点也没有。可是，与此同时，愈来愈加剧的痛苦使他清楚地意识到，他们从现在起再也见不到了；将他们拆开的不仅是偶然的情况，而且是某种更大的、无法克服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

“爱玛，我无论如何要想尽办法看到你，”与此同时，尼基金

①②③ 原均为德语。

想使人信服地说。“那就再见了。不管我怎么样,我都不会忘记你。我们俄国,有人出门……告别时,总是讲:再见……别忘记我!爱玛,你看,我来写……”

他写了“不要忘记我”。这时,他看到对方那双凝望着他的、饱噙泪水的眼睛里,闪烁着蜡烛的光点,知道她没听懂,便抓住她的纤瘦可怜的小手,爱怜横溢地开始吻她的顺从的手指,对她说:

“我希望你能知道。我要记着你,你也别忘记我。”

她听着,却没听他讲什么,头朝后一仰,竭力不要流泪,眼眶泪水越积越多,含在不敢眨一眨的眼睑里。这时,他异常小心地将爱玛的顺从的手掌心朝上抬起来,带着微笑看着她:

“能记在心上?”

“我爱你,”她一个音一个音地说,全身颤抖着,低下头,用那只空着的手拉开抽屉,抽出一张像手帕一样的白纸,先放到右眼前面,又放到左眼前面,把脸藏在纸里。“我们今后怎么办呢?”^①

“亲爱的,你真是个好爱玛。我从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不相信。我恨所有的德国人。你知道吗,德国女人在我看来是什么样子?要么就是肥胖凶恶的老太婆,手里拿着马鞭,要么就是些年轻的……你知道面孔像泥娃娃的残暴之徒。所以我恨。我恨所有的德国人……后来到了普鲁士……你不像他们,你完全不同,爱玛,我爱你……”

“瓦吉姆,我爱你!唉,瓦吉姆!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到俄国去?”^②

“‘варум’^③ 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不懂……”

①② 原均为德语。

③ 德语“为什么”的俄译音。

他忽然放开她的手，带着清醒过来的表情转身对着房门，谛听着。她机警地跳起来，离开安乐椅，睁得溜圆的眼睛，带着临刑前的木然恐惧望着他的脸，手掌合成小船形，放在喃喃作声的嘴唇前面，仿佛在暗自急忙祷告，恳求谁，请一位无所不知的人来主宰命运，支配战争，支配爱情，可是这对她和他已经没有多大的帮助了。

“是不是乌沙季科夫？……”尼基金用嘶哑的嗓子低声说，“什么事？”

“中尉同志……”

从楼梯口传来一声咳嗽，接着是一阵令人不安的骚乱的脚步声，大约三秒钟后，响起一阵清晰的叩门声，又有人叫着：“中尉同志！”这突如其来的声音立刻把尼基金的注意力引了过去。

“什么事？什么事，乌沙季科夫？”

“快，中尉同志！下面有响动！”乌沙季科夫嘶哑地说，并像猫一样地抓着门。“通讯兵不知为什么忙乱起来。暂时还不清楚那儿出了什么事。不是连长来了吧？”

“快，乌沙季科夫，快，”尼基金说，“开门，快。”

在楼下刚才还是沉睡的屋子里，声响愈来愈大，使人不安的人声也越来越大，皮靴咚咚作响，砰砰的关门声一个接一个，在这一片嘈杂声和乱跑的声音之中听到一个响亮的话音喊着：“兹金，听电话！上士同志，战斗警报！接电话，快！”接着，一声刺耳的、提高嗓门的警报口令清清楚楚地传到顶楼上来，那严厉的口气是熟悉的，使得尼基金不禁打了个寒战，他首先想到：“莫不是德国人又向城里进攻了？”

他跑到窗口，向通往树林的公路望去，——已近拂晓时分，周围一片浅蓝，天色开始发亮，空气凉爽，梯形的星座已落了下去，在湖面上，在黑压压的树林边缘上空闪烁着最后一片微淡的

余光，湖那边，在黑乎乎的草丛中是一条白线似的公路——黎明将至，一片沉寂。城镇上仍是一片寂静，没人走动，听不到口令，窗上没有亮光。只有楼下在叫喊，在七嘴八舌地说话，在奔跑，皮靴咚咚响，还有乌沙季科夫在门外低声地叫喊：

“中尉同志，中尉同志！”

于是尼基金低声说：

“爱玛，你该离开了……”

她领会了，叫着扑向尼基金，无望地哀求着，两膝和胸部紧偎着他，搂着他的脖子，把他的头紧贴着自己的脸，现出极其可怕的绝望的表情和恐惧，她将抖动的嘴唇撮伸到他的嘴里，他感觉得出对方颤栗的牙齿上的滑润的口水：

“瓦吉—姆，瓦吉——姆：……”

“爱玛，亲爱的……你该离开了。再见，爱玛。我希望，我多么希望……再见，^① 爱玛……再见……”

他拥抱着她，亲她那柔软的散发，搂得她那柔弱的肩骨咯咯直响，他跌跌绊绊地好不容易穿过房间将爱玛送到门口，后来就什么也记不清了：通向楼梯口的门已被乌沙季科夫打开，但没看到他本人，房门张着黑魑魑的、热乎乎的大口。她到那边去了，消逝在这吞噬了她的黑暗中，活像进入了一个见不到底的永恒的深渊。

后来，他回到房间里，不知为什么坐到桌子跟前，喘着气，呆呆地望着那张涂满了字的纸和烛光。一只黄飞蛾展翅飞来飞去，由于他的呼吸而老在一个地方扑打着。

一阵沉重的皮靴声从楼梯上传来，在楼梯口响起了命令声：“乌沙季科夫，到连队去！”房门大开，一阵穿堂风吹来，蜡烛火苗

^① 此处原为德语。

摇晃得厉害，熄掉了。格拉纳图罗夫急冲冲走进屋，胸前挂着洁白的白纱布绷带，因为没有睡醒而脸色发灰，眼窝发黑，可是他那低沉的嗓音，由于非常激动，嗡嗡直响：

“喂，尼基金！没睡觉？好啦，中尉，愿意打仗还是想关禁闭？听到了吗？还是没听到？嗯？怎么样？你在看什么？”

尼基金一声不吭，手里揉搓着香烟。

“我说，你看什么？”格拉纳图罗夫的浑厚的声音叫起来，“已经发出战斗警报！全师行动！也有我们炮兵团！要准时出发，急行军开往布拉格！我们配属给坦克集团军。我刚从司令部回来。在布拉格爆发了反抗德国人的起义！各师电台夜里都收到了求援信号。捷克人起义了，求援呢！清楚了吗，尼基金？我们要往南去！到布拉格去！到布拉格去！”

格拉纳图罗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他身躯笨重，神情激动不安，甚至似乎很愉快，新包扎的手臂在挎带里晃荡着。尼基金却一个劲地搓着那支没抽完的香烟，他没有完全弄清楚，为什么格拉纳图罗夫要对他说这个，从昨天起他似乎就永远离开了战争，离开了炮兵连，也离开了格拉纳图罗夫本人，他所等待的完全是另一种处境，等待着被命运可怕地封闭了的黑暗的囚禁生活。

“是这样吗？下一步怎么样？下一步怎么处理我？”尼基金声音嘶哑地问，坐到白天就未铺好的被褥上，“连长，我怎么办？”

格拉纳图罗夫在床边站了下来，瞪着他那眼皮发红的目光浑浊的眼睛，弯下身来。由于他那一阵大喊大嚷，尼基金的脸上觉得冷一阵热一阵。

“没事了，尼基金！向上帝祷告吧！走运啦！给你滑过去了！生来有福气！只是把一个优秀的炮长打伤了！感谢上帝，多亏没打死！就给你滑掉了！你的子弹擦到他的耳朵，伤了耳朵，明白吗？枪法不行，不如打炮行！差多了！关你十天禁闭！”

师长罚你十天！他可怜你这乳臭未干的笨小子！到布拉格以后再说，到布拉格后去关禁闭！懂啦？”

“连长，为什么可怜我？……”尼基金用干巴巴的声音问，汗湿的手指捏着香烟，热血涌头，脑袋发胀，思绪万千，急遽地变化着，如同令人目眩的旋转木马带着他转动，加速，又猛停，意外地使劲将他抛出了可怕的圆圈之外。他气喘吁吁，从胸腔里挤出一口气说：“我没有打死麦热宁？我没打中？只打伤了他？十天禁闭？师长……到布拉格后关十天禁闭……”

他不讲了，透不过气来。他望着天花板，一阵异常的、难受发痒的窒息将他的喉咙忽而堵住，忽而放松。他震惊得无法自控，他意外地感到，心头的一阵阵狂笑伴随着痛楚的眼泪，不由自主地使他颤抖起来。

“打中耳朵？只打伤了他？怎么会这样？就该打死……这个坏蛋！”

“住口，尼基金！发神经啦？站起来，站起来！”格拉纳图罗夫怒气冲冲，齧着大牙命令道，“神经出毛病啦？还是真疯了？站起来，醒醒头脑！”

可是尼基金坐在床铺上，眼泪顺着两颊流了下来。

“连长，别嚷，”他哽咽着低声说，“等等……一下子，马上就好。我打伤了他？我真的打伤了他？打伤耳朵就关十天禁闭？这真可笑。不，这不是歇斯底里。但也可能是歇斯底里。对我反正一样。我该怎么办？”

格拉纳图罗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一个急转身，斜着冲过来。

“首先，听我的，如果你还有什么想法的话！”他讲了这句话又巧妙地骂了一句，“就该把你们全都干掉！……可能，在行军途中师长会找你去。我向团长汇报了，他又向师长汇报了。我

救了你这个笨蛋，记住，我是这么说的：麦热宁中士不执行你的命令，你们就吵起来了，你一气之下就动了枪，现在后悔了。明白吗？以后你就这样对团长或师长讲。我不想为了你们这些倒霉鬼玷污了连队！顺便提一句，麦热宁也知道这说法，我告诉他了。在医院里告诉的。明白了没有，尼基金？记住啦？”

“不，连长，不明白，”尼基金说，擦着面颊上的眼泪，“要叫我出来，我就不和麦热宁合作。连长，我什么都没忘记。要是他回连里，我们当中总有一个要受审。”

“尼基金，你疯啦？你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是个疯子，神经病！……你那些原则在我炮连里顶个屁用！凭你那双戴着手套的白白的小手想去打仗！你到哪儿去找这样好的炮长去？”

“连长，我不改变自己的主张，”尼基金说，“要么就这样，要么就那样。就是前线司令官叫我去也是这样。”

“魔鬼从我颈脖上把你们俩都抓走才好呢！唉，我讨厌你的这种自命清高！”格拉纳图罗夫雷鸣般地叫了起来，一脚踢开门，洪亮有力地向下面命令道：

“乌沙季科夫！把枪、武装带、肩章给尼基金中尉拿来！快！”他回过头来看了尼基金一眼，又低声添了一句：“暂时在连里干一干，到布拉格后再说。”

楼下，士兵们仍在忙乱，门仍然砰砰作响，整个楼里就像刮起了穿堂风一样。武器铿锵，人声鼎沸；院子里和小镇的街上是一片蔚蓝明净的春天晨曦的景色；汽车马达哒哒地响起来了，窗下传来兹金上士的口令：

“挂炮！……”

“再说吧，”尼基金说，“连长，最后一个要求：我要暂离三分钟。”

“到哪儿去？”

“连长，这是我个人的事。”

第三部 怀 旧

第一章

深夜，尼基金下楼到酒吧间买纸烟。当他走出电梯，回到他住的那一层楼，到了两旁全是一式的灰色长方形房门的长廊里，他突然发觉自己忘了或者说没有记清他房间的四位数号码。他觉得，这些笼罩在走廊里昏暗光线中的每一扇门都是一模一样的。

他记得，他离开房间时，床头的小灯还开着，灯上似乎羞怯地罩着裙裾般的绿色灯罩，看上去很舒服。于是，他牢记着这个目标，抱着碰碰看的心理两次推开没有上锁的房门，希望能看见床头的灯光，但是那里没有点灯，一片令人窒息的、散发着化纤地毯气味的黑暗向他袭来，听到的是熟睡的人发出的鼾声、呻吟声和含糊的语声。他站了一会，对自己荒唐的处境感到好笑：

“妙呀，有意思极了，真可谓——在三棵树之间也迷了路……”

整个旅馆都已入睡，走廊里的壁灯发出微光。漫无尽头的长条地毯上，隐约可见一连串黑乎乎的男女皮鞋，放在那里让楼里的女侍早晨给擦干净。

“谢天谢地，我没有把皮鞋放在外面，就是说，是这里。”尼基金站在一间外面没有鞋子的房门口想，轻松地握住光滑的门把手，毫不迟疑地跨了进去。

但是他立刻就停住了——吊灯和落地灯的耀眼光线汇成一股光流投入眼帘，一阵辛香的气味扑鼻而来，一张圆茶几上摆满了酒瓶，周围烟雾腾腾。桌旁两个穿晚礼服——白衬衫上打着显眼的黑领带——的男人警惕地转过身来。一个身材高大挺直、瘦削的面颊刮得发青的人站起来，快步走到尼基金跟前打量他，眼睛里露出不认识他的神情，然后醉醺醺地、含糊不清地用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德语方言说了些什么，一边笑着，一边朝一个非常年轻、还完全是个小姑娘的女人点了下头。她头发剪得短短的，衣服脱了一半，躺在被子上面，搁在枕头上的手里拿着一支冒烟的香烟。

“请原谅，对不起！”^① 尼基金说了必要的道歉的话后就退到走廊里，仿佛是被女人的沙哑的笑声推出门外的。门砰然关上了。

整个这一层楼笼罩着一片无际的、死一般的沉寂。

在一片沉静的旅馆里他又站了几分钟。他双眉紧锁，已经又烦躁又恼怒，但不知为什么还不甘心，他认为自己的房间正是那个坐着两个陌生男人的房间。而这一切就像是发疯似的。

“多荒唐！他们不可能待在我的房间里！两个男人……还有同他们在一起的女人？不可能有这样的事！”

同时，像在梦中似的，一种不可名状的、无法摆脱的恐惧感向他袭来。

四年前的秋天，在令人不快的芝加哥，他曾体验过这种感受。晚上很晚的时候，在一次招待会后，他正在十六层楼自己那间有点昏暗的大房间的浴室里泡着。透过水声，他听到钥匙在锁眼里转动的声响、轻轻的动作和窸窣声。他浑身起了鸡皮疙

^① 此处原为德语。

瘩，打了个冷颤。他迅速抬起头，只见一个不相识的长脸男人正小心翼翼地 从浴室敞开的门外走进来。那人戴着湿透了的帽子，穿着水淋淋的雨衣擦过门框。黑色的身影停在门槛上，一只手放在口袋里。

由于尼基金发出了“您是谁？您找谁？”的可怕的叫声，那人才歪着嘴，幽灵似地后退，渐渐隐去，消失了，房间里就像从没有来过人一样。尼基金愕然地关了水龙头，身上的肥皂沫往下流着，他跑到门口，仔细地检查了门锁，摸着钥匙。门上了双锁。然后，他又不放心地查看了房间，连窗帘的皱褶、衣橱、床底下空的地方都看了。他还朝走廊里张望了一下，这是美国式的宽走廊，整个走廊里灯火通明，空空荡荡，一个人也没有。就在那一刻，他一边平息着心悸，一边使自己相信，一切都是他的幻觉。这个穿雨衣的陌生人突然悄悄地出现，只可能是错觉，是长期神经紧张的缘故，因为他明明记得，他进来之后，把门上的锁转了两下，因为他看到了大概是旅馆管理部门放在枕头上的卡片，提醒他：“睡前请别忘上锁。”然而，认为这是幻觉的念头并不能使尼基金安心。不，他是确确实实听到清晰的钥匙开锁声和雨衣的窸窣声，并且清楚地看见那个人跨过门槛要走进浴室，看见他的帽子、湿雨衣、刮过的脸的轮廓。“这是谁？来干什么？而且是在夜里十二点钟！……”

芝加哥旅馆沉浸在一片寂静凝滞的夜幕之中。尼基金精神沮丧，心头压着令人讨厌的疑团，躺在满是烟雾的、寂静的房间里无法入睡，又一次回忆起那人的脸、扣上纽扣的雨衣以及他所看到的细微末节。后来，他终于得出了清醒的结论：这个穿雨衣的人，大概是监视机关的魔爪，由于情报不确切，搞错了尼基金回旅馆的时间，这是最可能的情况。但不可能的是，他明明听到了房间里的水声，仍然如同一个活幽灵似地走进来，这样一个不

样的身影出现在浴室里，就像是一个病态的凶手，像希契科克^①电影中的狂人——尼基金用纯粹心理因素来解释类似的行为。

此后整整一个星期，一种类似牙痛的感觉持续不断地折磨着他。

现在他环顾沉睡的德国旅馆里空空荡荡的走廊，环顾摆在每扇紧闭的房门旁的一长串黑乎乎的高跟鞋和尖头皮鞋，这里好像一个没有尽头的、令人颓丧的带形墓地。突然，他感觉到同样的牙痛，他发觉，在这一片漆黑的、死气沉沉的、没有灯光的世界里，自己是被人遗忘的，好像就他独自一人，永远留在这座早已死寂的旅馆里，好像这里已经多年没有一丝人的气息，这空旷无人的走廊里的一长串没有腐烂的、缄默不语的鞋子，无非是提醒人们，这里曾经有人住过。

“很有意思！我想到哪儿去啦！是要发疯了还是怎么的？”尼基金想着，不断增添的忧愁使他的心都揪紧了。他一心只服从于一个念头：赶快，赶快找到自己的房间，赶快离开这死一般空寂的走廊。他推开右边门旁没有放鞋子的第一扇门，迎面看到的是浸没在热烘烘的、薰衣草的香味里的发暗的裸露的肉体，闻到一股潮润的床单的气味。

“不，不是这个房间！简直胡闹！”他狠狠地嘲笑自己，茫然失措，开始感到失望。于是，他又急忙坚决地伸手去开另一扇门，但是这扇门纹丝不动：里面上了锁了……

原来，再过两个门才是尼基金的房间。

他走进房间，看到熟悉的、像裙裾般的灯罩下射出的灯光，看到在昏暗中宁静地洒射在被子上的柔和的茵茵绿色，看到他离开前掀开的、套着雪白被套的暖和的鸭绒被，看到书桌上放的

^① 英国电影导演，导演有描写变态心理的影片。

自己的东西，木架上摆的自己的箱子，看到摊在枕头上的临睡前浏览的《星》杂志里面闪闪发光的彩色照片，——当尼基金看到自己的和别人的这一切东西时，他激动地擦去额上的汗水，开始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出声地责骂自己唐突愚蠢的荒谬，责骂刚才那一阵莫名的恐惧。

“恐惧？为什么在那该死的走廊里，恐惧、甚至是害怕孤独的感觉控制了我呢？”尼基金惴惴不安地想着，一边扫视着室内的家具什物——望着那个宽大的衣橱，这里面曾经挂过什么人的外衣、衬衫、领带，每过几个星期就要轮换，就像现在挂着他的衣服一样，因此还留着一股混杂的气味，他还望着那张宽阔的双人床，上面铺着洁净的、躺上去会窸窣作声的床单。在他尼基金之前，有成百上千他不认识的人，带着薰衣草味、汗臭、香粉味、白兰地味、烟味、口红味在上面躺过，睡过，打过鼾，接过吻。而这盏罩着灯罩的台灯的按钮也有许多别人的、沾着酒迹、杂志封面上的锌粉末、避孕药和钞票味儿的手指在上面撒过。这些钞票是用来付汽车费，在饭店里付晚餐费，以及付给带到房间里来作乐的女人的。

于是，尼基金开始对旅馆和房间里这种压抑人的空气感到厌恶，因为这里无形地留下了形形色色似乎来无影去无踪的人们生活过的痕迹，他们只是暂时给别人在地球上腾出一块小小的地方，留下了染有别人气味的衣橱、床和洗脸盆。

尼基金在房间里踱着，揉着胸，——失眠的痛苦使胸口犹如有一只蜘蛛伸出尖爪在丝网里颤抖着、搏动着，这在国外已经发生过不止一次……

他抽着烟，最后走到电话前，在笔记本里找到萨姆索诺夫房间的电话号码（他们的房间是相邻的，但他们还是交换了电话号

码,以防万一),拨了电话。隔了一会,才听见耳机里传来睡意懵懂和受惊的声音:“谁啊?什么?是瓦吉姆?”尼基金因为夜里打电话给他表示歉意,同时请他过来一趟,要是他方便的话。“有什么事啊?要紧吗?是什么时候了!”萨姆索诺夫边呼哧边嘟哝着说。他那睡意十足的声音,听起来几乎有一种令人坦然的亲切之感,犹如在阴沉沉、无边的夜色中闪烁着的一点火星。

“普拉托沙,恳求你来一下。”

两分钟后,萨姆索诺夫没有敲门就走进了尼基金的房间。他穿着宽大的条纹睡衣,肥大的腹部鼓囊着,赤脚穿着拖鞋,脸上没精打采,面颊上留着枕头压的红印。这一切都说明,他没有失眠之苦,在自己的房间里睡得挺香甜。现在他被叫醒了,对这来得不是时候的电话感到恼人和惊讶。

萨姆索诺夫笨重的身子倒在圈椅里。他哼了一声,眯起眨巴着的近视眼盯着尼基金。他问:

“他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吗?两点多了。失眠了吗?有苯海拉明吗?喏,试试吧。”

他从睡衣口袋里拿出一小包苯海拉明,往手上抖出一片,往杯子里倒了点矿泉水。

“吃吧。保证有效,经得起检验。”

“不,不,普拉托沙,完全不是那回事。”尼基金说。他把香烟在烟缸里弄熄,走到洗澡间拿来两只塑料杯,从书桌上拿起到达当天打开的那瓶白兰地,咕噜咕噜倒了两杯,异常高兴地提议道:“最好还是来喝点亚美尼亚酒,这大概更吸引人,也更有疗效。”

“在半夜里,这怎么理解呢?你干吗那么开心?你就为这把我叫醒的吗?这样你我在国外都要变成酒鬼了,亲爱的朋友和老师!你是不是因为令人不解的喜事而狂饮?”

“啊，祝你健康，喝吧，普拉托沙！”

尼基金喝完酒，从一包拆开的饼干里拿出几片碎块嚼起来，从房间的一角踱到另一角，后来停在窗前。他感到膝盖上热烘烘的，电暖气发出哒哒的响声。秋夜使窗户上蒙着一层潮气，稀疏的雨点敲打着，紫红色广告灯光朦胧地反射在石头马路拐角处湿漉漉的人行道上。在汉堡这座过着悄然生活的、虽大而不舒服的城市里，现在正是它多雨的十一月的夜晚的萧条时刻，就像进入了阴雨潮湿的黑暗世界。十分钟前，当尼基金在房门紧闭的阴森灰暗的长廊里徘徊时，觉得自己像是永远死寂的沙漠里的一颗孤独的沙子。还有，在跟赫伯特太太谈话之后，由于认出了她而引起的惊愕的、负疚和不满的感觉以及无法解释的羞愧感老是萦绕心头。这一切使他产生一种强烈的愿望，要摆脱、忘却、停止一切，恢复过去那种身在国外摆脱了日常职责的轻松。

但结果并非如此。咽一口热辣辣的白兰地也好，萨姆索诺夫的到来也好，——尽管他那笨拙的体态、睡眠惺忪的脸、光脚穿着拖鞋，使人依稀感到家庭生活的气氛，——一切都无济于事。

“怎么对他说我发生的事呢？”尼基金坐到萨姆索诺夫对面的椅子上，紧蹙双眉想道，“怎么对他说呢？”

“你这样失眠下去会变成酒鬼，”萨姆索诺夫埋怨道。他勉强抿了下塑料杯，润了润双唇并咳了一声：“喂，怎么啦？发什么愁呀，瓦吉姆？”他埋怨地问，拖鞋发出沙沙响声，裹在睡衣里的膝盖叉开着。“你在想些什么？动了什么念头？没出什么事吧？这位阔太太把你留下是什么原因呢？当然，如果这不是秘密的话。是亲笔题了词，还是发表了有关艺术的高论？而你也知道，她，可以说，长得还不错……”

“什么‘不错’？”尼基金一边把手指弄得作响，一边望着天花板。

“喏，体态，眼神，白发，或者说染的头发，鬼知道，现在时髦这个。总的来说，有点……还是个相当媚人的德国女人，尽管已经不年轻了。”

萨姆索诺夫又抿了一口白兰地，皱皱眉头，探身去取放在床头柜上的那包拆开的饼干，不无讽刺地说：“小心，瓦吉姆什卡；当心点，她会迷住你，把你这个俄国名人勾引上，——此外还有什么呢？祖国的文学将蒙受损失。按照西方性革命的观点她会强奸你。你不担心吗？”

尼基金沉默了一会，慢慢地揉着香烟，突然真诚而又激动地问：

“你知道，她是谁吗？”

“怎么叫她是谁？就哪方面说呢？她是个拥有私有财产的妇女，是汉堡相当富有的阔太太。看来，是个被所谓文艺界人士包围着的财主。她有民主倾向。总的说来，这就是她的全部底细。”

“现在值不值得把一切都谈出来？他可能会误解，”尼基金想，仿佛猛地使自己在障碍面前停下了，而在这障碍后面，隐藏着相隔很久的、他非常年轻时发生过的私事。这件已经模糊了的事，就好像在朦胧之中有一道暖和的阳光掠过那间遥远的、可爱的房间的糊墙纸一样。但是，这种对遥远的、青春年代所发生的、如此不现实的事情的感觉，是穿透过去生活的层层雾障才透露出来的。这个生活，不是他尼基金的，而完全是另一个人的生活。今天，这种感觉从过去一个蔚蓝晴朗的五月早晨向他逼近，使他失掉过去生活中阴影造成的沉重负担。这些阴影在战争临近尾声时差点给他——一个孩子般纯朴天真的中尉排长——的

命运涂上黑色。不，后来他就再也没有体验过年轻时代那种不顾一切、开朗纯洁，那种贸然的决心了。

“那么，你到底知不知道，赫伯特太太是什么人呢？”尼基金又问了一遍。从萨姆索诺夫的胖脸上，他看到惊讶的神情。“是啊，亲爱的普拉托沙，这种事在生活中只有一次，更确切地说，不是在生活中，而是在人类忘却的梦境里。”他又一次把手指弄响，然后，以嘲弄的神情看着深色酒液，拿起杯子，若有所思地往下说：“为青春时代的美梦干杯！我今天有点忧愁，普拉托沙，非常忧愁，甚至有点苦恼。”

“你喝得太多了。”萨姆索诺夫皱着眉，把酒杯轻轻碰了碰尼基金的杯子。“好吧，就为青春之梦……或者是人类之梦干杯吧。但是，你究竟是怎么回事，瓦吉姆？可以说，你半夜连裤子也不让人穿上就把人从床上叫起来，像参加婚宴那样灌一通白兰地，嘟嘟囔囔地说些莫名其妙的梦话，而我呢，听着就会变得聪明些吗？”

“梦话，正是梦和呓语。”尼基金贪婪地将白兰地一饮而尽，回答说，“我告诉你，普拉托沙，是怎么回事。你别觉得奇怪，因为我自己也不完全相信，尽管事实就是这样。赫伯特太太，这就是当年十八岁的、蓝眼睛的德国姑娘爱玛。在战争快结束时，我在柯尼斯多夫十分偶然地遇到她。炮连就驻扎在她家。柯尼斯多夫是个安静的郊区小镇。当时派我们那个疲惫不堪的师团从柏林到那里去休整。就在去布拉格之前。原来赫伯特太太就是这样一个人……你不感到奇怪吗，普拉托沙？”

尼基金用很有分寸的、故作镇静的口吻说出这些话，但是萨姆索诺夫额上的那对浓眉表露出不相信的样子。他把酒杯放到床头柜上，嘴和鼻子大声地呼着气，说：

“真是科幻小说，胡说八道！什么爱玛？我一点也搞不清！”

你和她有什么关系？还是有什么事？”

“大概，”尼基金说，“我那时……二十一岁左右。这是在二十六年前，一九四五年五月发生的事。”

“真的吗？好一个军人的创举！”萨姆索诺夫喊起来。他高举双手，又放到膝盖上。“你真正是在说梦话，瓦吉姆什卡，你在编造、虚构荒谬透顶的东西！怎么能记得分别二十六年之久的一个姑娘，尽管是个蓝眼睛的姑娘？你究竟搞过什么事？那时与德国人的关系十分明确，还会有什么呢？”

“有过可能发生的事，普拉托沙，”尼基金回答说，“我们在柯尼斯多夫呆了五天，是五月二日从柏林到那儿的。”

“那个姑娘就是赫伯特太太？天哪！哎，瓦吉姆什卡，瓦吉姆什卡，你现在就服苯海拉明，喝点矿泉水，被子盖暖一点，明天醒来就会有清醒的头脑准备往后的辩论。”萨姆索诺夫张大嘴巴，大声打着呵欠，“啊—哈—啊……你也不弄弄清楚，这一切是多么离奇？已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而你却还回忆起她那光洁、天真、迷人的小脸蛋……并且害了忧郁病。这是十八世纪的情节，瓦吉姆。而我不管怎样总是个现实主义者。”

萨姆索诺夫沙哑的笑声代替了呵欠，他把两手搭在腹部，两个大拇指不经心地互相推碰着。在他那没戴眼镜的粗笨的圆脸上，在那近视得眯缝起来的、由于打了个香甜的呵欠而变得湿润的眼睛里，露出了带有睡意的倨傲的神气。

“别再装糊涂了，普拉东。我谈的完全是正经事。你能不能理解我的话，还是要我住嘴？”

“我正在洗耳恭听，瓦吉姆什卡！可是你得休息一下……”

尼基金抽着烟，望着睡眼惺忪的萨姆索诺夫。萨姆索诺夫的语调随便，表示他决不相信，——别人由于失眠，半夜来电话打扰了他的清梦，和他进行一场无益的谈话，——显然，他是想

以此来表示对这场谈话的嘲讽和厌烦。他那笑声、呵欠、讥讽和无动于衷的态度，开始使尼基金感到恼怒，就像在旅馆里，对门口放着一连串黑乎乎的皮鞋的空走廊里感到的那种可笑的无能使他恼怒一样。

“不是我认出她；”尼基金并不掩饰他心里产生的不满，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是她认出我来的。大概出于偶然，当然，是出于偶然。她是看了这里翻译出版的书上的作者像认出来的。说实在的，正因为如此，她才邀请我。的确，你我二人都认识的赫伯特太太，就是柯尼斯多夫的那个爱玛。这一点我现在才确切地知道。现在，你可以装傻，可以说俏皮话来挖苦我了，普拉托沙，你尽管说吧。”

“啊哟一哟，瓦吉卡！得啦，得啦，你听我说！……”

萨姆索诺夫的脸色缓和了，露出了真正的惊讶，但马上又绷起来，睡后的虚肿消失了，那双近视眼茫然地眨了眨，显得十分鼓突，木然。

“得啦，瓦吉姆！原来如此！……”他拖长腔调重复说，深呼吸使睡衣里面的胸部鼓起。“你真把我吓呆了。等等，等等，我还有点不完全……这么说，过了二十六年她认出了你，就邀请你？还有一——怎么来着？她怎么向你解释这点的？为什么邀请你？要知道二十六年——已经统统忘掉了，留下了一片雾影。为什么她今天要把你留下？你能告诉我这一点吗？”

“问得简单点。我想，她只是出于对我好奇。”

“好奇……她好奇？仅仅是好奇吗？你相信是这样吗？那你怎么样呢，瓦吉姆？不过得坦率地说，如果可以的话……你听我说，当她要你留下的时候，我觉得似乎有点蹊跷。你说说，她对你有什么特别的表示吗？”

“我觉得没有。但是，你要知道，过去的事全想起来了，好像

回到了那里，回到了一九四五年。甚至闻到了丁香的芬芳。那时镇上正是丁香盛开，还有苹果园。不管怎么说，是美好的时候。”

“等等，等等……‘美好的时候’，这怎么说？你说，你认识她几天。你是怎么回事，是很认真的，是吗？”

“这很难说，普拉托沙。至少，战后我曾不止一次地想起她。难道你能确切地解释，这是什么时候开始和什么时候结束的吗？”

“噢，瓦吉姆！……”

“什么‘瓦吉姆’？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瓦丘什卡，别再喝白兰地。还有……等一等，我不放心国外的电话机。”

接着，萨姆索诺夫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撑住椅子扶手，从圈椅里抬起他那臃肿的身子，弄得睡衣的翻领也敞开了，露出胖鼓鼓、毛茸茸的胸口。他一本正经地从尼基金床上拖过枕头，盖住桌上的电话，警告说：

“我不怀疑所有俄国人住的房间都安装了窃听设备。我们的声音太大了……”

“我不信，”尼基金说，“不过话又说回来，可以说得轻一点。”

“现在，等一等，应该早一点想到就好了……真是‘有两个傻瓜’！你的‘板都拉’^①能用吗？你开过吗？”

萨姆索诺夫曳着拖鞋在地毯上走到房间另一角，那里的柜子上放着收音机。他乱摸着按了开关，键钮发出骨质的声音。然后收音机就发出沙沙声、干燥的放电声和惯有的声音。接着就放出了节奏感强的乐曲，轻微地混杂着从瓮声瓮气的收音机

^① 一种乌克兰弹拨乐器，这里指收音机。

里传出的女声宣叙调。在夜间室内的一片寂静中，这种声音听起来很不舒服。萨姆索诺夫找了一会以后，转动着收音机示波器上的键钮，减低了声响，满意地断定说：

“现在我们谈下去吧，没有见证人，这样比较好。”

“你什么都知道，普拉东。”尼基金苦笑了一下，“你简直是个再好不过的秘密工作者。”

“在二十世纪，这一类事就连傻瓜也知道。”萨姆索诺夫阴沉地、毫不客气地说。他趿拉着拖鞋，闪露出光裸的又白又光滑的脚后跟，开始在房间里走动起来。“我该对你说，瓦吉姆，这一切我不太理解，而且也不太喜欢。”他全神贯注地沉思着说，“这一首奇怪的抒情诗，压根儿不对头。原来她是根据照片认出了你，便邀请你来参加辩论会，这是干什么？什么原因？为什么呢？谈话，笑容可掬，彬彬有礼，悄悄地把你我分开，塞钱给我们。他们恭维你，慷慨地给你可观的稿酬，而这个新闻记者出身的窝囊废迪茨曼先生，还要晃着支票簿……这不奇怪吗，瓦吉姆？让我们弄清楚，我们是他们的什么人？你是她——赫伯特太太的什么人？天晓得，战争期间我们大家都有过闪电式的浪漫史，原谅我这个罪人吧，那又怎么样？而我甚至连她们的脸也记不得了，别说是……而她，你瞧，却一直记得你。你们在一起只有五天，而她，一个热恋中的姑娘，却一直记得自己的征服者。你不认为，这里露出马脚了吗？”

“记得或不记得，普拉托沙，这是你的个人看法，”尼基金打断他的话说，“这不是理由。你说的‘露出马脚’指的是什么？不用说，是指她要弄诡计？还是指别的？难道你当真这样想吗？”

萨姆索诺夫重重地倒在他压得陷下去的圈椅里，在软垫上坐得更舒坦些。他的眼睛因为激动而湿润了，他说：

“瓦吉姆，你还记得自己二十岁时在大炮旁是多么勇敢吗？记得前线吗？或者记得第一次出国的情景吗？不，开始使我惊讶的是，你对在你四周那一切令人可疑的忙碌抱着一种天真的信赖态度。既然你想知道我的意见，我就这么说！不，他们围着你转，并不是没有用意的。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对于我这个凡人，他们完全不放在眼里。对他们来说，我只是个‘化名’人物，而你呢，在他们眼中，可以说是个自由派人物，赫赫有名，等等，等等，——是有点儿名堂的！我看到，他们怎样抓住你的每句话，盯着你的嘴巴：看能不能捉住些什么？……你没发现吗？也许，是我错了，那么这一切又怎么解释呢？是你那位太太的情意缠绵使你神魂颠倒的缘故吗？她是为了什么理由企图将我们分开呢？我倒想知道这一点！”

他的额角变得像胡萝卜似的通红，一只膝盖开始神经质地抖动，使睡裤的一条肥大的裤腿也晃荡起来。尼基金想，萨姆索诺夫是个小心眼儿，昨天赫伯特太太大概把萨姆索诺夫当做跟他的同事是偶然碰到一块的人，没有对他表示足够的兴趣，——至少，在她将他们两人意外地分开之后，他是可能有这种感觉的，——她那种客气而又得罪人的态度，似乎特别伤害了萨姆索诺夫。但是昨天的事不会造成这种过分神经过敏的真正原因。此时在萨姆索诺夫的语气之中显露的谴责的、恶毒的挖苦，不知为什么却使尼基金激愤：他想坦率真诚地告诉萨姆索诺夫的事情，并没有像他所希望和期待的那样为对方所理解。

“你对我发起火来了，普拉东，”尼基金说，“但好像没有真正的理由，是吧？其实，我也会发火，但这毫无道理。我们两人的神经都有点……”

他用自己的酒杯悄然碰了下萨姆索诺夫忘在床头柜上的酒杯，以此亲热地表示请他喝完白兰地，说：

“普拉东，对不起，我把你叫醒了。也许是应该把这次谈话放到明天早晨吧？坦白地说，我刚才似乎有点不太……现在好像心里安定下来了。我马上就去睡觉。谢谢你……”

萨姆索诺夫的肉乎乎的双颊生气地拉长了。他低声喊着：

“听着，瓦吉姆，你把我当做什么人呀？当做避雷针？当做桑乔·潘萨？^①我就是有责任对你发火！你说，我是为了什么远道而来的？为了什么抛下工作——是因为有什么大的乐趣吗？再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荒唐的处境了！是尼基金的译员？忠实的仆从？政委？德国人一定相信是这样的！我是你的什么人？”他在圈椅里摇晃着，斜睨了一下收音机，那里正低声播送着一阵阵节奏强烈的乐曲。“你向我报告这样的新闻——你发昏啦！我十分坦率地对你说，用的是祖国的、同胞的、俄罗斯的……是的，我是用祖国的语言对你说！你听我说，一九四五年时代的德国女人啦，这个可爱的赫伯特太太啦，她的迁就逢迎啦，这个啦，那个啦，都是花花绿绿的伪装！我不相信他们的微笑，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不相信！他们似乎在拼命地笼络你，向你抛出了金钩钩！你没发觉吗？没感到吗？”

萨姆索诺夫这样说着，并习惯地将两手紧紧交叉在胸前，这时，尼基金又一次遇到他那湿润的眼睛里射出的恶意的目光——萨姆索诺夫现在仿佛无力抑制自己满腔的强烈不满。尼基金受到这种无法理解的恶意的攻击，感到有些寒心、痛苦和空虚……

几年前，有一次他们之间也发生过某种类似的情形。那是在一个夏天，他们坐在“布拉格”饭店里，热烈谈论着经历过战争的这一代作家，不管怎样，他们终于克服障碍，逐步占领了文学

^① 西班牙作家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中主人公堂吉珂德的仆人。

中的高地——从默默无闻的尉官升到了校官。萨姆索诺夫那天早上才从雅尔塔来。他在那里，像往年夏天那样，艰难而顽强地在写一个中篇，每天硬挤出半页。但他还是晒得黝黑，变得更胖了。喝了第四杯白兰地之后，他冒着汗，满脸通红，狂热地大喊着说，尼基金的头顶抵着奥林波斯山^①，向上迈步，眼看就会抓到上校官衔，而他萨姆索诺夫，目前还是个普通大尉，但是再过一年半载，所有的团长和将军们将会觉得，他们在他面前不过是小孩子……

“不，要真干，瓦吉卡，”他说，肚子抵着桌子，随着呼吸起伏着，“那就得脑子里有东西，哪怕一天写上一行，写一段，写四分之一页。不，必须造一幢坚固的房子，没有缝隙，要造得门窗不会吱嘎作响，砖缝里连针也插不进。我要说出关于战争的全部真理，关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全部真理。等我的中篇写完之后，相形之下你们这些人就要变成穿开裆裤的，穿开裆裤的孩子了！我就要可怜你们！唉，你们这些被捧上天的散文家，只能像小爬虫在人们脚下乱晃了！哎，你们都在哪儿呐？为此，我要独饮一杯，好让你记住！”接着他将酒一饮而尽，抬了抬汗湿的额头，透过眼镜瞅了尼基金一眼，把酒杯和茶盘一推，肘部支着桌边，小灌肠似的手指动弹着，像是陷入了可笑的酩酊状态。“怎么样，瓦吉姆，我们来试一试看，谁胜过谁，嗯？也许是你胜，啊？来试试！照杰克·伦敦那样干！”

“我看，从阳光明媚的雅尔塔回来后，你是发疯了，普拉托沙！”尼基金说着，扫视了一下周围的桌子，“就算你已经赢我得啦。”

“喔，瓦吉卡，要像男子汉大丈夫那样，我不求人恩赐，”萨姆

^① 古希腊神话中，奥林波斯山是群神居住之地。

索诺夫表示反对，伸过手去握住尼基金的手，强使它摆好架势，“来吧，开始啦，大作家！”

“得啦，别哇哇叫了。放好，大力士！”

尼基金毫不示弱，用足全身力气和他相持了很久，但是跟萨姆索诺夫汗涔涔的大手较量很别扭。它沉重得像转动着的绞车，把尼基金的手越来越低地压向桌面，使他感到疼痛，——最后他输了。较量时，萨姆索诺夫脸上那种酒后开玩笑的表情顿时消失了，他那几乎是充满敌意的目光，他那疯狂的寸步不让的倔劲使尼基金感到震惊。

“这样就清楚了。可以付帐了，瓦吉姆，”萨姆索诺夫喘着气说，“我来付。”

然而尼基金也掏出了皮夹，并且认为需要胡诌一通来回答他，于是说了些散文家萨姆索诺夫在摆阔，他瞒着人有百万财富之类的话。但是萨姆索诺夫生气地坚决反对，不让尼基金付帐，把钱放在桌上，还极为阔绰地加上小费（“我们的稿费不是在柴堆里找到的，瓦吉姆什卡。”）。然后，他在出租汽车站与尼基金冷淡而匆忙地分了手，留下了不愉快的尴尬的感觉。

后来他们俩没有再提过在“布拉格”饭店的这次谈话和杰克·伦敦式的较量。萨姆索诺夫给人的那种出于爱面子而挑衅的感觉也减退、磨灭和消逝了。现在，在深夜里，不是在莫斯科饭店的餐桌旁，而是在这儿，在德国旅馆里，尼基金看到萨姆索诺夫脸上绝非偶然流露出来的指责、讽刺、甚至是恶狠狠的表情，感到很不是滋味。“天哪，他这是干什么呀！他是在谴责和警告我吗？但为什么要如此激忿，好像是为了什么事要侮辱人似的呢？”

“谢谢，并请你原谅打扰了你的好梦。”尼基金说。这句抱歉的话说出口时有些勉强，不太真诚。“明天再谈，以后怎样生活。

现在大概是用白兰地服你那救命妙药的时候了，再见。^①要是明天你醒得早，就来敲门或打电话叫醒我。晚安，普拉托沙。”

“我希望，这一切你能理解吧？”萨姆索诺夫带着明显的懊恼口吻问，那双浮肿的鼓突的眼睛盯着收音机，“我说的全是正经话……”

“全都理解。每个细节都理解。我感谢你，普拉东，感谢你的明智的劝告。”

“在这种情况下，你得马上躺下，好好睡个觉。明天我们再细致讨论。我会早起来叫你的。”

“晚安，普拉东，一起喝点白兰地服药吗？”

“哎哟！别装假了，瓦吉姆！请原谅，我现在不太喜欢你这样不真诚地拼命说怪话。再会，照此地时间七点钟我来叫你！”萨姆索诺夫说的时候已经到了门口，鼻子不停地大声呼哧着，走出了房间。

门锁响了一下。只剩下尼基金一人，他关上门，坐在圈椅里，担心失眠会引起虚弱和持续的孤独感。后来，他拿起萨姆索诺夫留在床头柜上的苯海拉明，用白兰地送下去，就开始脱衣服，一边烦恼地想：

“也好，实际上没谈出个名堂来，结果我们俩都是既不满意自己也不满意对方。我希望的是另一种谈话，但是，看来他又爱我又忌妒我，而且不能超出某种界限。一切是多么愚蠢，多么不愉快！但愿能好好睡个觉，忘掉这次该死的谈话，明天起来可以头脑清醒，心情安宁。等早上看见赫伯特太太，一切就会更明朗些。她是爱玛，是爱玛吗？不，我绝对没有料到。再也没有想到！真的是人生叵测，世界过于狭小了吗？……难道赫伯特太

^① 此处原为英语俄译音。

太就是那个爱玛？我这是怎么啦？……”

他脱了衣服，抽完烟。上床前，他穿着睡衣，光着脚，在暖和的化纤地毯上走到收音机跟前——收音机在昏暗中放送着令人厌烦的音乐，——摸索着开关。就在这时，一阵急促的很响的敲门声使他转过身来，他喊着：

“是谁？是你吗，普拉东？出了什么事？”

“是我，开门！”

他有些惊奇，开了门，只见萨姆索诺夫笨拙地用肩膀抵着门框，像一个头发蓬乱的庞然大物踱了进来。他光脚穿着拖鞋，忙乱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表现出与他那臃肿的躯体不相称的灵活。看来，他是跑回来的，还在喘，说话的声音显出他在转着什么念头：

“我想起来了，瓦吉姆，是这样的：那个德国人，那个新闻记者，出版社的总编辑，他叫……迪茨曼……迪茨曼……你记得他对你提的问题，好像他在柏林遇见过你，在一九四五年……你记得这个问题吗？当时谈的是战争……你一切都记得清楚吗？”

“是的，我记得。”

“那时他还问我在什么地方打过仗。还一再说到关于你的一些莫名其妙的、怪诞的话。那次奇怪的谈话你清楚地记得吗？你记得他在谈话中都包含着暗喻，还有跟赫伯特太太交换的眼色吗？后来他离开了……这个令人可疑的专门谈论性问题的哲学家。他还在你面前晃着支票簿呢！奸笑、蠕虫般的手指、闻香烟……他的暗示是什么意思，瓦吉姆，啊？用意何在？他有什么目的？你记得，他是怎样把谈话引向你不会打死德国人这个话题的吗？这是一种谄媚的奉承话！……”

“对我说过？未必吧，我不记得。”

“怎么‘未必吧’？怎么‘我不记得’？”

尼基金坐到床上，翻了翻《星》，把它往枕头上一扔。

“问题是，普拉东，迪茨曼先生在战争期间并没有遇见过我，我不记得这一点。但一九四五年我遇到过另一个德国人，他叫库尔特，是赫伯特太太的亲兄弟。他是个被战火吓坏了的小兵，不懂事的毛孩子。这件事说来话长。当然，不排除迪茨曼从赫伯特太太那里知道点情况的可能性。这是完全可能的。一九四五年时，库尔特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我的朋友，一位中尉和我决定的。库尔特被俘已是在占领柏林之后。总的来说，普拉托沙，你是不是把这一切看得太重了？”

萨姆索诺夫在室内激动地从一头走到另一头，好像是因为没戴眼镜看不清，膝盖老碰在箱子、箱架和矮茶几上。后来他在床旁边站下。他那双湿润的、好像是充满痛苦的眼睛似乎跳进了尼基金的瞳孔。

“我见过许多天真的人，瓦吉姆，但是像你这样的人，却没有见过！你这个轻率的人最终会懂得，我们落到了真所谓是两个盲人在荨麻地里捉迷藏的境地！最终你会懂得，你不是在俄罗斯；而在这里，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就像在那个酒馆里那样。那时候，就无处申诉了！在这汉堡，甚至连领事馆也没有！我担心，当我们以亲身的经历完全弄清楚这个迪茨曼和你那可爱的赫伯特太太合伙想干什么的时候，那就晚了！……”

“你怎么啦，亲爱的普拉东？”尼基金忍不住了，“你真是鬼迷心窍啦？天哪，这一连串的惊叹号真令人讨厌！你的怀疑有什么根据？你在说些什么呀？还是忽然心血来潮？”

“为什么他的眼睛里流露出这般痛苦的神情？”尼基金沉默不语地想着，“这是古罗斯圣像上的眼睛，在为我们的共同灭亡而悲伤……现在他心里又有了某种变化。难道他确信他所说的？还是在他的话后面掩盖着另一种东西——对我的嫉妒，就

像那时在‘布拉格’饭店那样？真是人生叵测……他看人第一眼就得出结论性意见。实际上他做人比我容易，也比我困难。他困难是因为他逻辑性强，能作出无情的判断，其中也包括对我。怎么办，又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奇谈怪论吗？”

萨姆索诺夫双手擦着丰满的双颊，用充满信心的坚定口吻说：

“心血来潮？如果你把理智的结论叫做心血来潮，那也随你，瓦吉姆！而结论是明摆着的——就是尽快离开这儿。这是惟一明智的决定。尽快！如果合适的话，明天上午或下午。订票——回莫斯科！可以随便想出一种理由：你或我有心脏病，现在加剧了，不适应气候变化，诸如此类的一些说法。离开，马上离开，为时还不晚。这一点是绝对明确的。否则，就会像苍蝇掉在蜜里一样，陷于困境！”

“怎么啦，普拉东，”尼基金冷笑着说，“是你不相信我呢，还是你想比罗马教皇更圣洁？你在转什么念头？忙什么？乱什么？鬼知道！照你的体质，你应该是心平气和、舒适，喝得多，吃得更多，面带笑容，说说俏皮话，施展自己的魅力。可是你啊——却像头公牛！”

“你再听我说一次，”萨姆索诺夫把尼基金的话只当耳边风，伸开手，扳着指头，以不折不扣的执拗的语气说，“第一，我们应该立即离开这里，为此得先说明离开的原因，但这是小事情，是细节；第二，我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你；第三，你以为，你不是在汉堡，而是在卡卢加，只要给区委或民警局打个电话，一切就迎刃而解！是这样吗？还是……”

“我们马上要吵架了，普拉东！所有这些奇异的猜想都缺乏根据，无的放矢！明天我们哪儿也不去。这是没有意思的。不要过早地就惊慌失措！说实在的，你到底想到些什么？是迪茨

曼先生之流要把我缠在这儿并硬要把我留在西德吗？有什么目的？有什么意义呢？我是什么人——是掌握氢弹秘密的物理学家吗？设计局的首长吗？这里谁需要我呢？”

“那么，我就一个人走。”萨姆索诺夫喘着气说，他自尊地眯起双眼笑了一笑，“是的，一个人走，”他狠狠地重复说，“你希望这样吗？”

尼基金躺在被子上，把手枕在脑后，说：

“那你就走吧。你的确是一直在警告我。”他这样说了，由于自己不善于改变议题，把谈话转为无法闹僵的讽刺而对自己产生反感，于是又添了两句：“我们为什么要争吵呢，普拉东？犯得上为这个跑到国外来吗？”

“别说了！如果我不爱你这个可怜的唯一主义者，我就该遭到唾弃！……不，你不走，我哪儿也不去，我还没学会背叛朋友呢！还没有！”萨姆索诺夫提高嗓门喊着，“但是，请你记住，我曾经像个令人怀疑的白痴一样警告过你！而且把话统统说了出来！如果你还执迷不悟，你就会完蛋！振作起来吧，瓦吉姆，脚踏实地站起来！别再晕头转向，不然到明天就晚了，记住这点！”

“普拉东，我想睡觉。我已经服了药。”

“而我对你这个主观唯心主义者再重复一次，重复一次——别再晕头转向了，我的朋友！……”

“普拉东，我想睡觉。我已经服了苯海拉明。”

他没有看见萨姆索诺夫走出去，只听见门锁响了一下。接着，又听得旅馆走廊里的房门轻轻碰上了。深夜的走廊里阒无一人，只有壁灯发出暗淡的微光，一条笔直的、发白的长条地毯沿着灰墙一直通向昏暗的朦胧之境，还有那些好像永远与世隔绝的、放在每扇门口、一双双连成一串的死气沉沉的皮鞋。整座旅馆里没有活动，没有人声。

而在这里散发着甜丝丝的人造革气味的闷热的房间里，电暖气不时作响，雨点偶尔拍打着窗户，没有关掉的收音机里传出歌手用略带沙哑的清楚的嗓音、带着做作的激情唱的宣叙调，内容是要一个叫玛德琳的小姑娘停车，坐到他膝上，解开连衣裙的扣子——这里完全是一种别的什么人的、不习惯的、异邦的、不可知的生活。尼基金闭上眼睛想道：

“为什么一切都使我感到这么不自在？要不就起床，给爱玛打个电话，一起逛夜汉堡，跟她聊到清晨。但是聊什么呢？这能解决什么呢？要不就回国，明天就回去？萨姆索诺夫处于惶恐不安之中，他被这一切吓坏了。他知道得太多了——又不善于领会。这事会怎样了结呢？……”

第二章

“您喜欢西德吗，尼基金先生？噢，不，我不应该这样提问题。您没有对我们西德人感到失望吧？”

“您想听到直率的答复吗？如果我回答‘喜欢’，那就是欺骗自己；如果我回答‘不喜欢’，就会因为仓促而下的结论使您生气，迪茨曼先生。我毫无偏见地赞成一位聪明的德国的人话，这话大概是这样的：‘痛苦和一国对另一国的不信任，毒害着遍体鳞伤的欧洲’。说得不错，对吗？”

“是引文吗？是谁的话？托马斯·曼？雷马克？”

“斯蒂凡·茨威格，一个出色的德国作家。”

“很可惜，茨威格早就不时髦了，而且早就死了，已经很少有人记得他了。”

“那也无妨。他是在四二年死的,而四十年代是德国最近代的历史啊。”

“西德已经远离四十年代啰。我们这里有种说法:我们输了一场政治战,但赢了一场经济战。您有兴趣想了解这个似是而非的胜利是怎么赢得的吗?德国失败后盟军开始拆除德国工厂,并根据赔偿条款从工业中心运走了装备,但这都是些战前陈旧的机床,尼基金先生。东西方之间用‘铁幕’隔断时期,美国开始向被破坏的德国工业投资数以千百万美元,非常慷慨地贷款给西德人,运进现代化装备。这样,在很短期间,更新了固定资产。这是照马克思的说法,因为您是马克思主义者……于是就出现了虚假的繁荣,那就是,商品丰富、马克稳定、经济兴盛……居民早就忘了可怕的四十年代。他们按照新的准则生活。他们吃饱穿暖,早就忘了票证和代用品。您看过汉堡的商店吗?”

“是啊,根据橱窗来判断,是些很不错的商店。”

“尼基金先生,我要开诚布公,为了真理向您摊牌。战后的西德已经像猪猡一样地肥胖起来,变得脑满肠肥。居民生活在纸醉金迷的商品世界里,变为麻木不仁的消费机器。您可以给我支烟吗?我已经戒了烟,但是至今还喜欢闻烟味。”

“请吧。”

“谢谢您。我很愿意闻烟味。总之,尼基金先生,问题是,现代西德人过多地考虑新式的‘本茨’轿车、冰箱和舒适的郊外别墅。在普通的德国人身上,崇高的精神生活、精神信仰……正在消失或者已经消失了。……实用主义征服了一切。发源地和榜样就是美国。尼基金先生,我担心,过几年苏联也会肥胖起来,你们也会失去精神生活,像在西方那样,汽车、住宅、郊外别墅、冰箱也会变成你们的上帝。这样,你们就会逐渐忘掉四十年代,忘掉战争,忘掉苦痛……”

“不见得吧。尽管我知道，等待着我们的也有物质世界的考验。”

“还有信仰的考验。”

“您把什么称作信仰，迪茨曼先生？”

“你们的信仰是共产主义的乐观主义。你们是讲究实践的人，是唯物主义者，同时又是唯心主义者。尽管你们信奉的是过了时的教条，可你们还愿意谈论人，谈论某种理想和生活的意义。而在战后的西方，这种对理想的信仰没有了，大家再也不相信福音书里的善，不相信人了。德高望重的上帝已经寿终正寝，已经没有了，比如，过去对家庭、爱情和婚姻的概念，也已经没有了。照您看，现代世界是靠什么支撑的呢？”

“我想，靠的是期待和希望。”

“噢，我懂了！俄国人幻想靠两条鲸鱼^①——普遍的平等和期望着一成不变的、一律平等的福利——支撑着。与此同时，西方则继续靠三条鲸鱼——体育、性欲和电视。还有一条令人厌恶的小鲸鱼——政治。我想指出，这条小鲸鱼在东方也在游动。”

“只有两点要明确一下，迪茨曼先生。第一，如果没有这条小鲸鱼，历史上我们所知道的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存在；第二，并不是一模一样的无名小沙粒外形上的普遍一律平等。我说的是众所周知的物质福利分配方面的平等。我认为，如果说到科学和艺术，那么庸才、干才和天才之间总是会有区别的。”

“这么说，您是反对一模一样的小沙粒的啰？……但是人类的大多数就是一群无名的蚂蚁，尼基金先生。”

“依我看，迪茨曼先生，这是一个悲观的论点。我主张每个

^① 西方传说，地球是靠鲸鱼的背支撑着。

人要经过洗礼仪式之后取得自己的名字。归根到底,这个仪式可以称做自觉。”

“您是个浪漫主义者。从您写的书倒看不出这一点。大部分人不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这一点您是否同意呢?想要炸牛排?汽车?电视机?真理就在于此吗?最终目的就在于此吗?不,人们对自己是不了解的。要使他们相信自己,该怎么办呢?革命?毫无疑问,您是拥护这一马克思主义观点的……革命?阶级斗争?它最终的实质又是什么呢?目的还是让大家都有冰箱。”

“革命,这是对不道德的否定和对道德的肯定,也就是相信人,相信斗争,当然,还相信作为行动指南的良心。而您自己说,在西方没有信仰和理想。我想,信仰就是对希望和真理的热情洋溢的追求。如果没有它,我就看不到出路……”

“暂时还没有出路,尼基金先生……除非用一个权宜之计——将基督教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我不信神,也不相信赎罪的救世主。我只相信这一奇异的共生体,它是大多数无名老百姓的出路,总得让他们有个信仰吧。”

“您确信这一点吗?怎样做到这一点呢?把不能结合的东西结合起来吗?正如早就知道的那样,耶稣基督是用他所宣扬的无所作为的说教,毁灭了人的能力……”

“能力?能力?您这句话没有说完:因此把他钉到十字架上了!您是想这么说吗,尼基金先生?”

“不,我认为,把他钉到十字架上,是因为希望会出现能使每一个人都满意的第二个救世主。但这样的救世主是不存在的。”

“在你们国家里不禁止这样说吗?”

“您不是听见我说了吗?但是……请原谅,我不明白,您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怀疑。说实在的,为什么在我国就得禁止这样

说呢？”

“我感到惊奇，是因为你们有过多年的个人迷信。对耶稣基督也是个人迷信，就像对斯大林个人迷信一样。在你们那里，他也曾好像是上帝的儿子。你们曾经崇拜过他。”

“请听我说，迪茨曼先生，允许我终于要向您提出一个非常直率的、也许是不客气的问题吗？我恭听您多时了，也该允许我打断一次您的谈话吧？”

“当然可以，萨姆索诺夫先生！您确实沉默很久了。我乐意回答您提出的任何问题。”

“我不信我的问题会使您感到高兴，迪茨曼先生。那么，坦白地说，我们的个人迷信究竟跟你们有什么关系？正是跟您？还有跟西德人？”

“我不想干涉你们的事。然而您，萨姆索诺夫先生，现在是在一个西方国家里，这里充斥着肮脏龌龊和罪恶，但是在这里您可以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当然，有一定的界限。您不否认我们有相对的自由吧？我强调一下，是相对的……”

“哼！奇谈怪论！那么，为什么你们迫害共产党人和取缔共产党呢？”

“这是一种愚蠢的做法，它也使我感到愤慨。不论是共产主义，还是纳粹主义，对西德来说都形不成威胁。对德国人来说，单是共产主义——在东德——已经足够了。这是东德邻居用的名片，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喜欢。”

“它有什么地方使您不喜欢呢？是因为那里有您不喜欢的另一种制度吗？”

“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生活得比东德人好。”

“他们早晚会在一切意义上都比你们生活得好。这难道不

可能吗？在那种情况下，您会说什么呢？”

“现在人们是过一天算一天，萨姆索诺夫先生。但是我想请问尼基金先生，您也否认您现在是在一个民主国家里吗？”

“您刚才就对贵国的自由表示过怀疑。和您一起怀疑的还有我。至于说到前面的问题，那么二十多年前您所知道的慕尼黑狂人曾自称为耶稣基督第二、救世主、人类的救星，可以防御斯拉夫的传染病和共产主义。结果，欧洲和亚洲死了五千六百万人。有斯拉夫人，也有非斯拉夫人。”

“别说得这么快，尼基金先生，请原谅，您的口音妨碍我的理解。我大体能听懂，但没有抓住您话中微妙之处。您指的是纳粹主义吗？指的是德国人对人类犯下的全部罪行都要负责吗？”

“这里没有任何微妙之处，也毫无所指。我说的是，对于拯救人类的信仰和对于善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武装善来战胜恶和武装恶来战胜善。这一点早在古罗马时代就知道得很清楚了。”

“喔，是啊，是啊！善与恶之间的界限很薄弱，容易突破。从某一点来说，这是一对血管相联的暹罗双生儿，不是吗？这是现代人内心世界最有趣的一面，模糊的界限——这就是你们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他小说里最主要的东西。他在西方享有盛誉。这您是知道的吧？”

“胡说八道！”

“什么？请原谅。”

“对不起，我说的是俄语：‘丘什’……用德语委婉地表达就是‘不确切’，如果谈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

“为什么？”

“我认为，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主要的是在人心里寻找真理和在世界上、在自己内心深处寻找上帝。为了明白起见，我们将把善良和幡然醒悟当做上帝。迪茨曼先生，您没有因

为我们这种太伤脑筋的争论而感到疲倦吧？加上我的德语又说得蹩脚，看来，使您很疲倦。而我们俩人又把大家弄得疲倦了。也许，还是谈点具体的东西吧？您同意这样做吗？”

“完全不，尼基金先生……我们的谈话算不上是争论，而是当着众人的面，在东西方之间，东方作家与西方记者之间进行的一席坦率的对话。再说，就听众的注意力和安静程度来看，我看到，我与您有共同点，尽管这是令人奇怪的。我得到一种印象，您善于辩论，而且不止一次会见过西方作家。我读过一份在巴黎举行的辩论会的材料。您在那里就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有意义的艺术问题发表过演说。我没搞错吧？”

“自从西方对我的小说和我个人产生兴趣时起，我就开始被邀请参加过一些国际性辩论会。我跟所有作家一样，喜欢争论，总想要了解些什么，即使是自己论敌的立场也好。仅就真理而言，迪茨曼先生，这是非常严肃的东西。如果您头痛，您肯定不会去服治胃病的药；如果您爱上一个女人，您也不会去抱住电线杆接吻。不管您确信什么，世界上总有着客观存在的真理。”

“说得好，尼基金先生！但是，我还是不同意您的意见。现代人较之十九世纪或战前时代的人，在‘爱情’这一概念中放进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特别的含义。这里您搞错了。您指的两性结合是一种积极的开端，但是——非也！——现代人的爱情，这是两性的分离。谁也不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什么。爱情——不是两性结合就是两性分离。”

“这怎么说？粗浅地说，嗯……就拿生理因素来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道理：这是男子对女子的爱情，反之也一样。如果说的是自然的生理上的爱，那么您指的性的分离和结合又是什么呢？”

“尼基金先生，您是个严肃的人，请您不要从社会主义的观

点,而要从西方的道德观点来理解我。现代世界上的爱情失去了虚伪的成见。而虚伪的信号‘禁止’,也为自由文明所抛弃。这些看来是陈腐的禁令束缚了他和她,或者……他和他,或者她和她之间的人的感情的自由……每个人都有选择对象的自由。”

“我不大能理解。您说的是同性恋,是吗?变态的爱情吗?我可是个现实主义者,我服从真理,因此不能忍受在月亮公园笑室里的哈哈镜中被歪曲了的世界。”

“别这样,尼基金先生。谁也不知道,爱情中什么是变态,什么不是变态。每一个人都更愿意倾听自己心灵的声音。最大的变态往往是政治上的变态,这种可怕的变态扼杀着人的自由。”

“您谅必是有妻子、孩子的啰,迪茨曼先生!”

“很幸运,我没有结婚。”

“真遗憾,这样我就不能把在我头脑里打转的一个不登大雅之堂的例子举出来了。”

“尼基金先生!您一点不会使我感到惊奇,不管什么例子都行。我们生活在性爆炸的时代,人身上的一切遮羞布都被撕下了,过去受压抑的一切欲望都有着充分的选择自由。”

“是的,我有幸在世界一些城市以及你们这里的银幕和舞台上看到这种欲望的爆炸了。”

“啊,妙极了!这使您这位现实主义者感兴趣吗?”

“我认为,现实主义者不应该对存在的东西闭着眼睛。应该了解一切。何况在我们俄罗斯,谢天谢地,舞台上是不表现这种变态爱情的。”

“等一等,尼基金先生。俄国人没有被压抑的欲望和您说的变态爱情吗?您能肯定吗?您相信这一点吗?”

“不,我不肯定,这是医学上的事。但我不想说那个,迪茨曼先生。请坐在大厅里的女士们原谅我提出一个迫不得已的论据

……您设想一下，假如您有一个女儿，一个美丽的年轻人，她处在一种像宇宙那样纯洁和神秘的爱情中，会给世界上带来一个不亚于自己的美丽的孩子。然而，她愿意爱的不是一个小伙子，而是一位姑娘。您能对这种反常现象熟视无睹，平心静气地谈论自由选择吗？”

“我个人不会对她说什么。随她愿意怎么办就怎么办。不是我，而是她在选择恋爱对象。”

“这岂不是违背真理，对自然和真理的强奸吗？”

“丝毫也不。在这里面我看到的是个性‘我’的自由表现，个性的自由。”

“那我就没有别的论证了。问题解决了。”

“我打个岔，男士先生们，请主席允许我讲几句！这是应该说的！”

“看上帝的面上，蒂特尔太太，请吧，单是您的声音对大家就是一种享受！”

“我不打算唱歌……在爱情问题上一切取决于兴趣和荒唐的好感，我是这样想的。女人，毋容争辩，比较温柔，但我宁可要一个有着令人厌恶的缺点的粗男人。我读过莫泊桑的小说。他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微小的差别万岁！这就是我要对你们说的。我并不为这个法国作家感到脸红。”

“美丽尊敬的蒂特尔太太，谢谢您刚才的插话，我还要指出，正是您受到人们的崇拜，男人女人都同样爱上了您，因为天才是属于大家的！尊敬的太太们，先生们！我们应该感谢出席我们辩论会的美丽的蒂特尔太太。我理解并赞同你们的鼓掌和满意的笑声……这样，尼基金先生，您认为缺乏论证，所以问题解决了，就此结束了发言。而我感到回答中含有某种不高兴的讽刺，不是这样吗？”

“您没错。我想说的是，也许，我们过多地涉及了不必进行如此广泛讨论的隐秘领域。”

“这您就大错特错了。对这些问题在我们这里的报刊上、电视里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中还有关于取消禁止淫书、淫画的法律的讨论。不是吗，韦伯先生？请原谅，先生们，现在我是向全体在座的人说，不是吗，韦伯先生？”

“你们这些聪明的问题，使大家伤透了脑筋……知识分子到了一块儿，头脑里就开始出现一团糟。而且一切问题都扯到性上去。”

“您的玩笑博得了掌声，韦伯先生……不管如何，我要再一次反驳尼基金先生。如果我禁止实际上我没有的女儿去爱她选择的人，那么，也许她会服从我，但是过若干年后她会说：‘父亲，我是不幸的，你使我失去了爱情。’”

“这是多么奇怪的逻辑！您就赞成这样的选择自由吗？这样做的话，就该去上吊！您知道吗，到家里，找一个牢固一点的钩子，摘下皮带，——赶快，赶快从性自由的世界到美好的地狱去！这不是选择，而是摆脱侮辱人的淫秽的惟一出路！”

“您感到激愤了吗，萨姆索诺夫先生？而您是怎样想的呢，尼基金先生？您在性问题上看到淫秽了吗？”

“我想什么？当人的本性受到强制和伤害时，它就会生病和死亡，当然人也就会与它同归于尽。而这比化学废料造成的环境污染更为可怕……等一等，普拉东，过来一点……听着，得克制自己。在这次辩论中，你这种急躁的喊声不会说服人。放冷静些……”

“凭什么我该装出一副温文尔雅的样子？难道你想让我坐着充耳不闻，扮演一个同意一切谬论的可爱的俄国佬吗？说废话也要有个界限，你知道……”

“尼基金先生,您不认为人本身就是大自然的变态吗?您头脑中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怀疑吗?是谁规定什么是正常的,什么是不正常的呢?难道是上帝立下的法吗?而它就是正常的范畴吗?是人们规定的吗?但他们是不是正常的呢?正常是什么?从什么观点来看呢?如果人们把说明神圣爱情行为的词句用来当做最肮脏的骂人的话,这些人是不是变态的呢?想一想,想一想这个问题吧……您不记得那些写在公共厕所里的下流无耻的话吗?”

“我们现在的争论扯得太远了,我担心,我们不能从丧失了理智的道路上退出来。”

“哈哈,感谢您讲了这么冠冕堂皇的理由。您不想继续谈这个题目,因此我可以作出某种结论。西方人的意识——我说的是知识分子——是过分有学问了。虽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现代哲学和社会学并没有得到发展,这是因为你们在捍卫自己的信仰,这种信仰是应该靠广义的乐观主义维持的。不是这样吗?您是乐观主义者,尼基金先生,尽管您的眼神常常是忧郁的,并且写的是悲剧性的小说。但是,不管是您还是你们整个的文学,都企图保留由浪漫主义的莎士比亚和你们的托尔斯泰所创造的关于人的古老的神话。在生活和文学中被你们称为英雄的人,在西方人的意识里完全是另一种评价。在我们的概念中,你们的英雄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正注意听着,请谈下去。”

“现代西方的智者,尼基金先生,这是一种经过化学净化和裸露的人,他梦游似地移动着。独立的个人生活是不可能的。为什么?往后又怎样?这样一些问题,使人在时代面前无能为力,产生了个性分裂。西方知识分子不像你们整个的社会主义文学那样肯定现实,而是诘问现实,向它提出种种问题。这里既

没有审判者，也没有犯罪者……这并不是现代主义，完全不是，尼基金先生。现代的机械世界不需要莎士比亚，也不需要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西方小说背离了过去的现实主义，是因为它想成为切合现实的，这并非诡辩。小说就像爱克司光片，但是它不对疾病下诊断，因为医生不知道怎样彻底根治疾病，谁也不知道。现在不可能有像托尔斯泰、托马斯·曼或者左拉那样被公认的经典作家。左拉宣称他知道人的一切。您同意左拉的公式吗？”

“不，我不同意。我觉得，在法国自然主义作家们的这个声明中含有自以为是和挑战。顺便说一下，有一位和左拉同时代的俄国古典作家肯定了完全相反的理论：谁也不知道全部真理。这是比较接近真理的。”

“啊！尼基金先生！您现在的言论像个西方作家，并且肯定了我的思想！”

“说这话的不是我，而是十九世纪的一位俄国古典作家。别恭维我，我感到骄傲的是，我和伟大的俄国文学有联系。您看，您逼得我慷慨激昂地讲起来了。”

“但是，对于这位经典作家说的谁也不知道全部真理这一思想，您个人是怎样看的呢？您不同意吗？”

“不，我同意。这使您感到奇怪吗？”

“您，您同意这种思想？您可以稍微详细一点阐明一下吗？”

“既然您如此惊奇，那我就试试……我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迪茨曼先生。我们知道一系列真理，但那不过是一个主要的真理的组成部分。我们不知道全部真理。反之，如果我们知道人的一切，那么，写书、从事科学、像我与您这样进行辩论，就没有任何意义了。人就像宇宙一样，是个秘密。而这在两千年前就已经知道了。在我们之前，人们也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相

信,如果明天人们发现了世界的一切规律,当然,也包括人的精神世界的一切规律,那么历史运动也就停止了。没有什么可以认识了。一切都被发现,一切都被揭示,一切都已明白,——那么人类生活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一切信仰、一切哲学、一切艺术都会因为没有需要而一下子消亡。人类也就结束自己按规划进行的认识道路。于是,就会开始某种全新的东西,一切从零开始。这我们的生活没有丝毫关系。宇宙就将把新的数据放进地球的电子计算机里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全部真理的缘故。我的回答能使您满意吗?”

“尼基金先生,您现在说话不像作家,倒像个哲学家,这使我又惊讶又高兴。但我只想更准确地了解您的思想,人类探讨主要真理的活动是由自然界本身规划的吗?从客厅里的活跃情绪来看,我感到,您不仅使我,而且也使全体听众产生了兴趣……那么人到底是什么呢?是认识的工具吗?还是偶然的产物?是世界规律机器上的小小齿轮?”

“别惊讶和高兴,迪茨曼先生,我并不觊觎哲学家的桂冠,我可不是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无非是人过了四十之后,开始思考在三十岁时觉得像橙子那样简单的事情而已。地球上有人——这不是偶然现象。众所周知,人是能够认识自己的大自然的一分子。这是个绝妙的公式,对吗?”

“这里引的是谁的话?黑格尔的?卡尔·马克思的?”

“不,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人是能够认识整个自然界的分子,也就是说,这种认识应该在通向主要真理的道路上不断打开奥秘和规律之门。这个真理是无限的,它一步一步地打开在其长无比的走廊上一扇扇门上的锁。因此,我个人深信,发明火、蒸汽、电、原子能,这不是偶然的认识,而是根据不断认识的方式,在一定时候由大自然所启示的一种认识。这是标志着人

类走过的道路的路标。顺便说一下，这也正如我们的辩论一样，十年前我们不可能这样交谈，迪茨曼先生，这也是一个路标。”

“按照你们的理论来说，资本主义也是命中注定的一种别样的认识啰？或者，如您所说的那样，是一扇打开了一条缝的小门？”

“是的，还带有一点苦味。”

“那么社会主义呢？”

“是一种带着期待欢乐的认识，是摆脱了恐惧的自由，是对真正的自由的认识。”

“期待欢乐？就算是这样。但是，尼基金先生，在您的理论中有某种宿命论，而宿命论与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丝毫同共之处的。您是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您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难道这对您来说不是主要真理吗？”

“没有任何宿命论的东西，我再明确一下，迪茨曼先生。社会主义，这是人对最大自由的理解。”

“但一种人的自由总是受到另一种人的自由的限制。最大的自由是不可能有的。不是这样吗？”

“是这样。这是道德上的限制，这种限制产生了人对人的尊敬。”

“我很想听到您对上述关于主要真理问题的回答。这个真理在哪里？在政治之中呢，还是在政治之外？”

“尊敬的迪茨曼先生！您令人莫名其妙地老是向我的同事提着同一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和文学毫无关系。这令人产生一种印象，您不是想弄清我们争论的事情的本质，而是想抓住对方不确切的词句，所以，说句不客气的话，这一点使我困惑莫解！”

“您大错特错了，萨姆索诺夫先生。我和施普林格的报纸①

① 施普林格(1912—)，西德大报商，发行有《世界报》、《画报》。

没有关系！……先生们，感谢你们的掌声。应该认为，这些掌声很大程度上是对有点不相信我的萨姆索诺夫先生的声明而发的！”

“我认为，大家是对您的机智鼓掌，主席先生，而我不想从您手中夺取您满头大汗得来的荣誉！但我还得再说一下，我们的辩论离题了！……”

“尼基金先生，您这位严肃的同事就这样用自己的插话取消了我这个难题吗？”

“为什么呢？……您提的不是最难的问题，相反，您的问题相当简单，尽管其中带有一定的色彩，这我的同事已经指出来了。顺便说，这并不改变问题的实质。我相信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新的社会结构是人类对自己的一种认识。”

“但根据你们的理论，这还不是主要的真理吗？”

“主要真理在前面。”

“共产主义吗？”

“正是共产主义。但就是在达到这一崇高的认识形式后，通向真理的道路也并不中断。”

“这样，根据我的理解，尼基金先生，您是想说，生活的意义就在于终生探索和认识生活的意义吗？如果我的问题听起来还不是像萨姆索诺夫先生所说的那样含有挑衅意味的话，那么请您说说，您的生活，您个人生活的意义在哪里？您可是说过，谁也不知道全部真理。”

“好像西部牛仔电影中，要命中目标必须要在三秒钟内拔出柯尔特手枪发射。是您先拔出枪并向我打的，迪茨曼先生。为了回击，需要更多的时间。”

“令人费解……我又提出挑衅性的问题了吗？”

“您说什么呀！丝毫没有。只不过回答您的问题需要的时间”

间要比三秒钟多得多。为此得重述所有我写的书的内容。您看,我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此。”

“我读过您的两部长篇小说,尼基金先生,并看过您写的两部影片,它们不久前在西德上映过。影片中有不少悲哀忧伤的地方……”

“我补充一句:也有愉快的地方,如果说得确切一点。”

“然而您更像个悲观主义者,而不是乐观主义者。您的书中没有柔情。”

“说到悲观主义,您太绝对了。您说得不对,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我一向认为,打开真理的钥匙就在我书桌的抽屉里。写小说,这是一种忍耐,也是一条通向目标的痛苦道路。只有到那时一切才是充满意义的,接着再写下一本书。”

“错了,尼基金先生,错了!一方面您断言不知道全部真理,另一方面你们的文学负有教育人们、鼓舞人们的使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任务就在于此。这样,您的小说是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桎梏的突破。不是这样吗?难怪教条主义的苏联批评家要骂您!……”

“这是有的,迪茨曼先生。然而,我并不因您这种富有表达力的评论而感到受宠若惊。因为您说的是创作方法,那么我要用下面的话来回答:我惟独崇拜一个上帝——现实主义,也就是,我拥护有意义的艺术。按方法来写作是什么意思?怎样按方法来写作?难道您认为,在坐到书桌旁之前,作家会对自己说:我将用这样一种方法来写这部小说。显然,他首先会想,要说什么和怎样说。接着就是工作、工作、工作。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请解释一下,您想象中的作家的工作又是怎样的呢?是按照克里姆林宫电话的命令写作吗?还是背后站着一个阴沉的警察,读着和纠正着每一行?很想知道,您是怎样设想的?”

“我知道，你们的文学应该讴歌苏联人和苏联社会。你们经常这样说的。”

“讴歌、赞颂这些术语属于音乐艺术，这方面我完全是外行。至于说到粗浅的散文，那么它要研究和认识个别人的性格和人民总体的性格。而各种研究都是严肃的过程，它和做早操时播送的朝气蓬勃的乐曲毫无共同之处。”

“那么你们可以批评自己的政府吗？例如，批评部长那样的大官？”

“这是小品文作家的事情。”

“感谢您的回答，尼基金先生。虽然我使您困倦了，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这纯粹是个人问题。您现在对德国人是否仍旧抱有过去对曾与俄国打过仗的那种民族的仇恨？希望您在这样的問題里没有发现挑衅的意思。”

“不，没有发现。我现在对德国民族并不抱有像您所说的那种仇恨，因为各种民族主义都是无耻之辈的最后避难所。任何时候人民都是无辜的。但是，我们的相互关系不止一次地染上鲜血。我还一直记得，在最后一年的四年战争中俄国失去了两千万人，而德国失去了八百万人。这在历史上是骇人听闻的、空前的损失。”

“在六世纪，尼基金先生，由于鼠疫死了一亿人。”

“您是用这种类比来安慰人。但是，六世纪那些人并不是死于互相残杀。”

“某些西方的战争理论家，一般来说，是些聪明人。他们断言，流掉的血，这是历史的润滑剂，说这是合乎规律的，也是必然的，因为全部历史就是流血。他们认为，最后的大战给生了锈的德国机器小齿轮加了润滑剂。”

“这里您是指新复仇主义者吗？”

“不仅是他们。”

“不管怎样，您去问这些‘一般来说是些聪明人’的人吧：他们自己愿不愿意做历史的润滑剂？”

“哈哈，谢谢您！……就这样，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代表你们大家和尼基金先生握手，感谢他的真诚而又不概念化的回答。这些回答——我要满意地指出——拆除了我们两国知识分子中间敌视和疏远的栅栏。我注意到辩论的愉快气氛，并且感谢您，尼基金先生，尽管在许多地方我不同意您的观点。但是您认为你们并不知道全部真理的思想是一种很好的思想。你们不知道资本主义的全部真理，我们也不知道你们共产主义的全部真理！不是这样吗？”

“恰恰是在结论中，迪茨曼先生，您把我的思想简单化了。”

“噢，不，不，一切我都很理解，尼基金先生，连一切微妙之处也都懂了，衷心地感谢您，还有你们，先生们，感谢你们长时间而耐心地注意倾听我们的讨论！再见，先生们！……”

第三章

迪茨曼先生满面春风，身上的雨衣敞开着，脚上的尖头皮鞋闪着亮光，最后一个走下辩论俱乐部的楼梯。他很快摆脱了大门口缠住自己的人群，洋洋得意地跨着轻快的舞步向尼基金走去。尼基金在汽车旁被一群年轻人围住，看样子年轻人是热切地想得到俄国作家的题签。人们从四面八方把打印的辩论提纲塞给他，把在今天晚会上买到的他的书从人们头顶上递给他，把一张张不知干什么用的纸片塞在他手里。而他则机械地、仿佛

无意识地匆匆回答着各种问题，手里嚓嚓地划着自己的姓名，被你一言我一语弄得有点应接不暇。他心里又直想发笑，因为他看见洛塔·蒂特尔弓着透明雨衣里的细腰，照乡下人的样子用拳头顶在腰眼里，朝一名胸前挂着望远镜、茫然失措的大胡子记者大声嚷着：

“你们那个《画报》是臭狗屎！您提的那些问题也是臭狗屎！您那个施普林格是臭狗屎！您写的永远是您那笨脑瓜里忽然冒出来的东西！您的报纸还说我一丝不挂睡在一群猫中间！您怎么想得出来的？我向来讨厌猫！您听了尼基金先生的答复，可得听到什么写什么！但愿这儿在场的先生们都知道你们的报纸甚至不配擦屁股！这就是我要对您说的！”

“可爱的洛塔·蒂特尔太太在大出记者的洋相。”迪茨曼赞叹道，“明天报纸上又会有一条绝妙的标题了！”

一些围在自己汽车旁的上了年纪的德国人以怀有敬意的严肃的表情好奇地转向赫赫有名的洛塔·蒂特尔。在照相机镁光灯的闪光下，洛塔·蒂特尔雄赳赳地两手叉腰，粗卤地呵斥着一个沉默不语的记者。人群中，韦伯先生温和地搔着秃顶，不时嘿嘿地发出几声笑声，用满含深情的小眼睛望望妻子。赫伯特太太已经用钥匙匆匆打开了“本茨”汽车的车门，近乎柔情地对尼基金笑了笑，说：“先生们，你们该让俄国作家开路了。”她亲热地引着他，把他拉到车子跟前，说：

“乘洛塔跟市侩气的报界干架的时候，我们赶快坐好。您的朋友在哪儿？萨姆索诺夫先生！”她喊了一声，脸上依然带着微笑，“您坐我的车子还是坐韦伯先生的车？”

“请原谅，”韦伯先生应声道。他低下光秃的头顶吻了一下赫伯特太太的手，又紧紧握了握尼基金的手，说：“听了您的宏论，我需要冷静地思考思考。您倾盆大雨似地向我倾注了一大

套高见,我得消化一下,不吃晚饭,否则会得消化不良症。至于洛塔嘛,我相信,她一定会跟你们去的,她天生不是那种很快会安静下来的人,不,不! 萨姆索诺夫先生,迪茨曼先生,我也向你们告辞了……”

在一阵谦让之后,大家终于都上了车。洛塔·蒂特尔在人行道上被照相机的镁光灯的闪光照亮着,胜利结束了看来不是第一次与新闻界人士的交锋,然后把雨衣弄得窸窣作响,满身香味扑鼻,游蛇似地挤在后座上胖子萨姆索诺夫和尼基金中间。迪茨曼先生等她上车以后把车门关上,用不无做作的亲切态度对记者们招招手,灵活地在前座赫伯特太太身旁坐下,轻松地笑了起来:

“先生们,多亏我们可爱的洛塔的舍己精神,我们从施普林格的手中挣脱出来了。现在我们可以充分享受这争取来的自由了! 我认为,我们有必要从天上降临尘世,从物质的角度来看看真理。我们应该弥补一下脑力的消耗。首先,诸位想上哪家饭馆?”

“迪茨曼先生对汉堡所有饭馆都了如指掌。”赫伯特太太一面戴手套,一面快活地回答说,“我们的客人不可能知道饭馆的内情,只有您最清楚。请您下命令吧,我来开车,你们不反对吗?”

“在富有家庭风味的资产阶级清静的饭馆里,端详那些睡意朦胧、心满意足的面孔,呸! 这多没劲儿! 我喜欢上热闹的地方去,可以看到点新鲜玩意儿。”洛塔·蒂特尔任性地插进来说,“要不然,辩论会后我们的脑袋瓜要像炸弹一样炸开了! 走吧,先生们! 我想喝酒,而且要喝个痛快,这就是我要说的话。”

赫伯特太太开始小心地把车子开出停车场,向幽暗的公园后隅灯火通明的中心大街驶去。

“脱衣舞厅？”迪茨曼略带询问的神情转过身子，迷醉的细眼睛闪闪发亮，“但是那儿没有什么可吃的，葡萄酒、桔子水、可口可乐、矿泉水，还有不可胜数的女性的姿态。这些东西可填不饱肚子。”

“圣保罗区有个‘瓦连西亚’饭馆，是个很好玩的地方，饭菜也可口，”洛塔·蒂特尔提议说，“在半地下室……”

“不男不女的人？嗨，这倒还有点意思。”迪茨曼看了看表，“他们已经开始了，可是……”

“不，不，这太那个了……”赫伯特太太反对说，“可别上那儿去，想个别的地方吧。尼基金先生和萨姆索诺夫先生，你们有什么意见？”

“不管怎样，他们应该光顾一下汉堡别有风味的地区。这些地方，他们在像修道院一样简朴的俄国是永远也看不到的！”洛塔·蒂特尔的声音像大提琴，身上的雨衣窸窣作响。她笑着，缩做一团，很大方地用手挽着尼基金和萨姆索诺夫的胳膊，紧靠着他们。“你们不反对吧，俄国作家先生们？据我所知，你们那儿既没有脱衣舞厅，又没有这些不男不女的人聚会的酒馆，也没有色情电影，果真是这样吗？”

“您说得对，蒂特尔太太。没有这，没有那，也没有别的。”尼基金玩笑似地回答说，“在这方面我们赶不上你们。去哪家饭馆，随你们选择，我都无所谓。你怎么样，普拉东？”

萨姆索诺夫态度冷淡，透过玻璃望着夜市橱窗的灯火，从辩论会结束到现在他还没开过口。这时，他哼了一声，用不高兴的口吻有礼貌地说：

“你们可有简便些的、比较正派的饭店吗？譬如说，普通德国人……一般的德国人吃饭的饭店？脑力劳动者先生们，我想看看他们，也许这样能充分地了解真理。假如要征求我的意见，

我赞成去这样的饭店。”

“啊！啊！啊！”迪茨曼连叫三声，顿时活跃起来，并举起双手。“我投降！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开场了吧？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我来回答您这个沉闷的政治问题，也可以说是挑衅性的问题，萨姆索诺夫先生！西德的劳动力不足，这儿没有失业，因此没有乞丐在垃圾箱里翻寻食物的现象。你们那儿所谈论和描述的那种对比，您是看不到的。而您对这些却很感兴趣，是吗？它能使您得到灵感吗？”

萨姆索诺夫噗哧一笑：

“这么说来，你们这儿是人间天堂啰？”

“德国——既是小小的地狱，又是小小的天堂。您说的那些可爱的普通德国人，工资很可观，萨姆索诺夫先生，每天晚上，他们无所事事，只有大吃大喝或者看看电视！”洛塔·蒂特尔断然地加入谈话，“一个个坐在电视机旁，两只眼睛贪婪地看着我那位胖子请他们看的市侩气十足的节目！他捞钱的本领真不亚于任何美国佬！”

她那富有弹性的身躯在尼基金和萨姆索诺夫之间转动起来。她俯下身子，一只拳头支着下颌，霎时间拉长涂满脂粉的脸，扮出一副像公牛那样大嚼的人的昏昏欲睡的、迟钝的表情，睡意朦胧地说：

“怪不得现在给德国人看的电视这么不像样子。嘴里忙着嚼，眼里忙着看，就不可能思考了。好看吗，尼基金先生？”

“装得像极了！”尼基金回答说，“话也说得很好。这么说来，橡皮糖是为给眼睛看的吗？是该这么理解吗？”

“没什么好的。”萨姆索诺夫口气坚决地用俄语说，好像在顺便回答尼基金的话似的，然后勉强挤出一丝微笑问洛塔·蒂特尔：

“您既能看出用电视愚弄人民的全部危害性,但又不想劝自己丈夫改变节目,使它变得有意义些,是吗?”

“我不希望我的丈夫破产。”洛塔·蒂特尔带笑说,“不管您喜欢不喜欢,反正在我们社会里是金钱指挥一切。”

“那么请您原谅,蒂特尔太太,你们的尊敬的西方知识界被妥协主义腐蚀坏了。空谈,全是空谈,仅仅是空谈,用空话掩盖起来的妥协主义却能震动大气!”

“普拉东,亲爱的,别忘了你是客人,不要骂起东道主来啊!”尼基金也好像顺便地用俄语说了一句。他对萨姆索诺夫一味冷嘲热讽的口吻感到讨厌。在辩论会上这种态度不时干扰他,令他生气,就跟现在关于妥协主义的这种武断的结论一样,好像他萨姆索诺夫掌握了妥协主义的永恒的真谛。但他竭力要消除、抑制对萨姆索诺夫无法平息的恼怒,他想:“昨天谈话后,我们还记着互相说的挖苦话,显然,两人都不对。”

“您——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当然也是十分幸福的人,萨姆索诺夫先生,”迪茨曼富有表情地说,但是他那讥讽的腔调刺痛了尼基金:看来,机灵的迪茨曼对俄语的理解很透彻,并且在附和他。

“有时候,”尼基金便说,“我们把自信和直率划等号,这往往有利于自信的人,这也说明了那种老是把是非颠倒的人的弱点。”

“先生们,让我们停止争论吧!就算是我们找到了真理,又把它丢掉了,后来又重新找回来了!”迪茨曼和解地扬声说,“而我们的真理就是: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我同意尼基金先生的看法,西方知识分子缺乏坚定的理念。”赫伯特太太温和地说着,用戴着手套的手轻轻把前窗旁映着路旁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广告的反光镜调整了一下。

“是啊，她就坐在这里。我们同车去饭店，——这就是爱玛，是她……赫伯特太太。很久前是有个柯尼斯多夫镇，是在五月间，春光明媚，那时我们都年轻，什么东西，甚至战争都没能制止我们。在那年轻时代难道能想到我们将来会在汉堡再见，而且已是历尽沧桑的人，和以前根本不同了……这一切真是不可思议啊，然而这就是如此……”

他常常发现，她不时用眼梢朝反光镜里瞄一下，但是反光镜常常被后面的车灯照得突然发亮，这种白光使尼基金不能看到她的目光，他只看见路灯的灯光从她的脸颊上、头发上和突然向上一抬的眼梢上掠过，看见方向盘上她那双戴着黑皮手套的手，——于是灵魂深处就有一个念头在折磨他。他似乎想起了很久以前，在遥远的地方，青年时代已被淡忘的战时的梦中见到的一件事。这件事情刚被理解就已中断，令人忐忑而且没有了结。这时尼基金下意识地猜想，她一定是一刻也没有忘记第一天晚上的那次谈话，就像他没有忘记一样。他想起了她那带有歉意的拘谨和那含笑直视着他眼睛的温柔亲切的目光。这时，他产生了一种被强烈地激发出的、令人烦恼和痛苦的好奇：那天谈话时，他缺乏足够的勇气来问她：她结婚没有？生活幸福吗？有孩子吗？

“这真是不可思议。”尼基金想，“她坐在这儿，在汽车里，我就在她身旁，而以往的一切却只成了回忆。”

“先生们，如果今天由我当你们的向导，那今天我们的计划是这样……”前座响起了迪茨曼兴致勃勃的声音，“我这主意是在行进途中拿定的，我们到‘快活的猫头鹰’夜间音乐酒馆去。不过车子开不到那儿，得把车子停在车场，步行走过去。我要顺路带男士们到一个有名的巷子去一下，那儿有很多逗趣好玩的东西，这是汉堡所特有的。很遗憾，体面的太太们是进不去的。

先生们，给你们看一个限制自由的例子。十分钟后，在‘快活的猫头鹰’再见。就这样了！迷人的太太们，你们没意见吧？”

“多么不平等啊！”洛塔·蒂特尔扮了一个调皮的鬼脸，在座位上朝后一仰，“街上的外国水兵们不会把我们抢到酒馆去吗？走过这条街，十分钟后我们能再见面吗？这地方男子汉们去了可危险哪。”

“我们等你们。”赫伯特太太说着把车子拐了弯，避开迎面疯狂射来的令人眼花缭乱的灯光，开进停车场，又匆匆看了一下反光镜。这时，尼基金不知为什么仿佛感到，时间的距离缩短了，又被无垠的空间隔开了，把（他和她的）美好的青春黄金时代隔开了整整一世。

“在攻克柏林后那令人难以置信的日子里，我，一个天真果敢的青年人，怎么能想到很多年后，经过漫长的二三十年的岁月，她，那个手捧托盘胆怯地走进阁楼来的可爱的爱玛，会坐在方向盘后开汽车，会说出这些话，会在反光镜里寻找我的视线，而我也在自己心里寻找那被无情的光阴磨灭的东西呢？”

后面是圣保罗区的主要大街。酒吧间、夜总会以及影剧院巨大的广告牌灯火辉煌。房顶上方，无星的夜空里，万家灯火像火龙带一样到处狂飞乱舞。车辆堵塞，汽车上面一片炽热的浓雾翻滚着。灯光广告的虚线跳动着，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光直射到麇集着黑压压人群的人行道上。迪茨曼把他们从停车场带到要去的那条主要大街的拐角处。那儿相当偏僻、昏暗，行人履声橐橐，稀落的路灯发出幽微的光。接着，大铁门旁一盏非常明亮的电灯直射眼帘，一群男人从黑暗中出来，走进那个门洞。迪茨曼在大门旁神秘而调皮地嗅了嗅没有点着的香烟，压低声音说：

“大门后面就是女人街和她们的住处。这个地方有一个特

点：她们跟一般的妓女不一样，她们无权主动请您进去，选择的权利属于嫖客。你们将看到，她们像被陈列在橱窗里那样坐在那里。手续是：如果您看中了哪个姑娘，您必须敲敲窗子，同她讲妥价钱和其他的一切……”

“大概您以为，迪茨曼先生……”萨姆索诺夫说，他掏出手帕，像吹喇叭似地擤了鼻涕，连眼镜都跳了起来，额头涨得通红。“大概，您以为，我们对汉堡的妓女特别感兴趣吗？”他气愤地擦了擦自己的大鼻子，接着说：“这有什么目的呢？”

“什么？我感到十分惊讶！您又没在梵蒂冈受过教育！”迪茨曼喊道，接着又笑着说：“您是个男人！又是个现实主义者。您不想就近了解一下资本主义世界吗？”

“‘妇女和不满十八岁的青年禁止入内。’”尼基金念着上面灯光映照的牌子，又说：“您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迪茨曼先生。这很有意思。我并不反对，恰恰相反，我很想亲眼看着资本主义世界。”

他几乎是轻率地对迪茨曼说了这句话，并朝萨姆索诺夫使了个眼色。可是，萨姆索诺夫痛苦地看了他一眼（就像昨夜在旅馆里一样），默默地反抄着双手，肚子在宽敞的雨衣底下挺着，厌恶地鼓着双颊，这使他的样子显得怪诞可笑。这时，迪茨曼耸耸肩膀，一口好看的牙齿闪亮着。

“您像是被什么东西吓懵了，萨姆索诺夫先生？是您的道德观念使您感到痛苦吗？”

“应该告诉您，我并不感到怎么高兴，迪茨曼先生！”

“普拉托沙，别这样，”尼基金用俄语说，“我求求你，别生气。你到底想证明什么呢？”

“这我到旅馆再告诉你，如果你还能够理解的话，如果你还能……”

“能呀，能呀……走吧。”

这扇旁边有一个不显眼的进口的大铁门，挡住了小街的去路。小街上路灯微弱，相当幽暗，但出乎意料，那儿人却很多，挤满了男人。他们小声说笑，脚步声沙沙作响。他们或是成群、或是单个沿人行道两侧不急不忙地走着，汇成两股相反的人流。他们不时停下来，就像停在商店橱窗前，朝那昏暗的窗子里张望。在一层楼上，到处的窗帘都拉开了，摆设着廉价家具的小房间里的一切可以一览无遗：五斗橱上点着蜡烛，橱上带花边的小台布洁白整齐；沙发上长圆扶手下面整整齐齐地放着绣花靠垫；光秃秃的墙上挂着廉价的复制画和令人悲伤的木十字架，一眼望去，就看到窗内摆出各种姿态的女模特儿。她们面无表情地看着大街上川流不息的男人；有的像修女般温文，纹丝不动地坐在那儿，谦恭地把两手放在超短裙下面裸露着的、紧裹着肉色袜子的膝盖中间。有的半躺在沙发椅里，旁若无人地跷着大腿，轻轻摇晃着发亮的皮靴。这些模特儿活动起来了，涂着浓眼圈的眼睛顾盼着，她们点着烟，漫不经心地懒洋洋地把香烟送到发黑的嘴边，撮起嘴唇向玻璃上喷吐烟雾；有的对着小镜子若有所思地整理耳垂上廉价的耳环，用光亮的小指甲抹着细眉。其中有一个特别引人注目，这是一个淡黄头发、面色苍白清瘦的小姑娘：她对着窗口正襟危坐在沙发椅里，啃着苹果，像小学生一样垂下睫毛，拘谨地嚼着，她那芭蕾舞女演员般柔软灵活的颈项完美无瑕，焕发着青春的气息，没有发育完全的小小的乳峰在白色尼龙短上衣里微微鼓起。当一个高大肥胖、头发花白、穿灰格子大衣的男子走到近前，用指头敲窗的时候，她突然呆住不动了，苹果也不啃了，像是猛然被惊呆了似的。妓女用孩童般的小手打开半扇窗子，那男子便一本正经地跟她攀谈起来。听不到她回答的声音，只见她明显地盯着他那满是皱纹的黄脸，像知识分

子家庭出身的小姑娘一样羞涩地笑着。然而，那男子不赞同地摇了摇头，大声说了声“不！”^① 流露出对答复不满的样子，向别的窗口走去。看来，他是想挑选适合于自己的身价和口味的求欢对象，他要她答应什么。尼基金根据不同意的、短短的“不！”^②，知道她没向他让步，而他也没向她让步。

“这个精打细算的德国人是什么人？”尼基金莫名其妙地想着，“他要她干什么？他结过婚吗？是个光棍？他经常到这儿来吗？”

这个头发花白的德国人在人群中消失了，男人们仍旧不断地从窗口走过。他们彼此看不见对方，也不注意对方，好像是一群闷声不响、自顾自的发情的公畜，各自寻找着自己可以接近的母畜。他们装出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扫视着玻璃窗后面女人的姿影。尼基金像第一天去雷佩尔班大街那样，看着橱窗里这些女人既相似又不相似的脸，她们的模特儿姿态，她们的抹得发黑的嘴唇，那夹着烟卷的修过的粉红色指甲，那异常扁平或丰满的胯股，齐小腿肚紧裹着时髦的长筒靴，向人行道上一群群男人展览的健美的腿，他不知怎么感到不舒服，看不下去。然而，在这些女人的姿态中，似乎可以感到那种习以为常的逢场作戏的味道，以及要遮掩这种不文明的公开卖淫的企图。不，她们没有自荐，没有死皮赖脸地强邀人们登堂入室。表面上她们对过路的男人们探究的目光报以无情的冷漠，表现出拒人千里的、平静的冷淡，丝毫没有暗示可以在这里买到无耻的经验，挑逗起情欲的声音，训练有素的、随时准备着的、并且善于迎合前后买主不同的嗜好、习惯和愿望而随机应变的肉体……

“尼基金先生，请到这儿来，请看……”

①② 原均为德语。

尼基金清楚地听到旁边急剧敲玻璃窗的声音，在前面离他两步的地方看到了迪茨曼。迪茨曼站在窗前，贪婪地嗅着没点火的香烟，在看着一位非常显眼地把小脑袋上的黑发梳得溜光的、皮肤黑黑的妓女。那妓女很像是西班牙少女，独自规规矩矩地坐在十字架下淡紫色落地灯旁的沙发椅里。她那精心修饰的瓜子脸上两道弯弯的黑眉毛，长得不自然的睫毛在脸颊上投下蓝色的阴影，两个手指祈祷似地凝放在胸前金色小十字架旁。迪茨曼的指甲敲得更响了，那位西班牙少女这才慢慢地如梦初醒，抬起眼睛，眼里狂热地射出修女般的、高不可攀的宗教狂热。他匆匆地抬眼打量着她，向她打着手势，让她侧过脸去。她顺从地照办了，微微伸直脖子，笑咪咪地张开鲜红的嘴巴，用她那南方人的灼人目光看了他一眼。迪茨曼想了想，装出失望的样子摇摇头。妓女坚决地把嘴一抿，慢慢地合上了粘在眼睛上的睫毛。

“多么迷人的小姑娘，”迪茨曼轻轻地说，“她装出那副贞洁的模样真是无懈可击，简直是拉斐尔笔下的圣母！您以前见过这么漂亮的天主教徒吗？”

“说真的，迪茨曼先生，在这个‘妇女拍卖行’里，我不知怎么有点不大舒服。”尼基金说，“一切都很清楚。也许不值得在这儿久留。该走了，何况还有人等着我们哩。”

“当然，当然。咱们马上到下一个门里去……可是，我们的严肃的萨姆索诺夫先生在哪里？汉堡的高等艺妓还没有把他迷住吗？啊，他在那儿，我看见了！是什么使他感到兴趣啦？他们好像都成了难分难舍的好朋友啦？噢，这有什么好看的！”

萨姆索诺夫把无檐帽盖到额头，正呆板地反抄双手站在街那边一群年轻人后面。那些年轻人不修边幅，留着像基督一样的长发，其中有三个人穿着长到脚踝的毛茸茸的皮大衣，他们都

兴奋地挤在人行道上，醉醺醺地哈哈笑着，用英语对窗内的两个妓女商谈着什么，一面催促着。皮肤白皙的那一个长着小玩偶般的小脸；黑头发的那个，体格像斗士般健壮。她们坐在那儿，脸碰脸地拥抱着，泰然自若，态度冷淡，眼睛越过这群年轻人头上望着前面某个地方。这些年轻人兴奋异常地冲她们喊着：

“列斯博斯太太，^① 好极啦，列斯博斯！……”

“普拉东！”尼基金看见萨姆索诺夫的脸涨得通红，就喊了一声：“我们走吧，走。”

“我应该对您说，”萨姆索诺夫挺着他那笨重的像压路机的鼓鼓的大肚子，穿过窗前川流不息的一群男人，走到迪茨曼跟前恶狠狠地说：“你们的性革命进行得的确很成功，但是还缺少一个性的反革命。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和您就生活的意义、进步、人的个性进行了辩论，可是同这个所谓革命的变革比较起来，那不过是瞎扯淡！”

迪茨曼点点头，含蓄地笑了笑。

“我应该告诉您，萨姆索诺夫先生，有些德国人，纳粹主义的崇拜者们声称：要是希特勒在世的话，他会把一切留长发者的发绺剪掉，禁止读卡夫卡的书，扼杀性革命，消灭这些性中心，在对他俯首听命的国家里建立起规规矩矩的道德观。这样一来，您愿意同复仇主义者联合起来吗？在性的激情中，暂时谁也不知道全部真理。暂时——不知道。”

“请您不要把我同复仇主义者扯到一起！”萨姆索诺夫说，眼镜片后面的双眸瞪得老大。“至于谈到尼基金先生所说的‘全部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列斯博斯是希腊的岛名，在爱琴海，是女诗人萨福的出生地。“列斯博斯太太”有“搞同性爱的太太”之意。

真理’，那我不知道我的同事有何感受。但是，再过一分钟，这个醒醒的淫欲市场就要使我作呕了。”

“我很羡慕您的值得赞美的纯洁，萨姆索诺夫先生！”迪茨曼笑了起来。“您要么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要么是个圣人，然而是个凶狠的圣人！”

“他干吗老是摆出一副凶相？”尼基金皱着眉头想，“他好像不是想同迪茨曼，而是想跟我争吵似的，他像是要向我证实，他在某个问题上是正确的。愚蠢，太愚蠢了，而且完全不合时宜！”

第四章

在这家十分拥挤、喧闹、烟雾腾腾的小酒馆里，看来人们对迪茨曼很熟悉。一个讨人喜欢、外表恭顺的小堂倌把他们领到角落里预订的桌前，桌上已经殷勤地铺上非常干净的桌布，摆好餐巾。他摆上大小酒杯，拿了订菜单，绕过拥挤地跳舞的年轻人，高高兴兴地溜进粉红色的层层烟雾。周围的小桌上点着蜡烛，由于小舞厅中央疯狂旋转的舞伴的杂乱的顿踏，爵士音乐震耳的节奏以及人们的笑语，烛光摇曳，屋里显得十分闷热。由于人们的呼吸，由于满头大汗的人体和长头发的晃动、手的挥摆、鼓掌、屁股的扭动和飞旋的短裙下大腿的舞动，地下室的空气变得窒闷而燥热。

“看来，我们在这家‘快活的猫头鹰’里不会得到很好的休息。”尼基金想。他一直好奇地环视着酒馆的砖墙。墙上满是粉笔画和题词，挂满了各式各样没有刻度盘和指针的老式时钟，古

色古香的小女伞、男帽和车轮的钢条戳出的自行车坏钢架，还有坏得不像样的小汽车的方向盘，方向盘四周的橡皮圈已经磨损得很厉害。接着，又看见桌子附近的壁龛里有一架积满灰尘的残缺不全的打字机，打字机旁边摆满了空酒瓶。右边是一张褪了色的、布满蛛网的贝多芬画像，像下面是一架不像样的、琴键翻转的钢琴。面对这些搜集来的废物，他不无惊奇地问迪茨曼：

“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别具一格呢，还是有什么古怪的念头？我只能揣测，不过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只有店主人自己才能回答。”迪茨曼兴致勃勃地说着，并斜过眼来看了一下萨姆索诺夫，问：“到过您非常不喜欢的那条小街之后，您觉得这地方怎么样？”

“难道还不喜欢？汉堡迷人的美女还不能勾引住萨姆索诺夫先生吗？”洛塔·蒂特尔感叹地说。她的眉毛装出责备和诧异的神气扬了起来。“美女们怎么也不能使他动心吗？那么，大概该让胸脯高耸、目光能令人化为灰烬的蛇一样的女妖精来追捕您——啾——啾——啾！看我！……”

于是她好像对他施展魔法似的，眼珠呆定，带着夸大的激情，张开利爪，摆出一副蛰伏不动、要突然扑上前去的母猫的架势。但萨姆索诺夫却不理她这一套，身子牢牢地顶住桌子，嘲笑似地不动声色，眼镜环视了一下越来越多的跳舞的人群，回答说：

“白费劲。我这辈子从来没买过女人的爱情。可千万别让我体验这类下贱的事。”

洛塔·蒂特尔又开纤指支着下颏，半真半假地小声说：

“我的上帝，您真是童贞的化身，萨姆索诺夫先生。您能活两辈子。您会长出白天鹅般的翅膀飞升上天。当着您的面我真想祷告：上帝啊，拯救我罪恶的灵魂，饶恕我所有的罪孽，所有的

恶习，所有的男人，所有的烟酒。这就是您对我产生的东方俄国的影响。我将不再唱歌，我要戒掉烟酒，到你们俄国去，到西伯利亚的一个修道院去！”

“谢谢您，”萨姆索诺夫温和地说，“他们会要您吗？为了一张免罪符，您付的代价岂不太高了吗？”

一直保持沉默的赫伯特太太凑着蜡烛点了支烟，目光炯炯地凝视着尼基金，——这时他也把烟凑到火上，她立即羞赧而愉快地朝他笑笑。瞬息间，他感到了这探询的目光，不由得也对她笑了笑。她的眼睛里清晰地反照出烛光，不知为什么它们看上去不像是蓝色，而是透明的黑色，闪耀着惊慌而温存的湿润的光芒。顿时，尼基金心里突然一震，感到喘不过气来，心想，这一刹那她想的一定是他也应该记得的事。什么辩论会，没完没了的谈话，以及坐在汽车里她在反光镜里寻找他的脸，总之，今天整个晚上对她来讲也许是毫无意义的，都是在半睡半醒的朦胧状态中，在期待着什么之中度过的，也许就是在期待她自己以及他的微笑。她似乎在等待着那最后一秒钟，就像当初深夜在顶楼上，桌上点着蜡烛，窗外五月的夜空发出微光，她绝望地眨着眼睛，忍着眼泪，在一张纸上描着俄语字母，知道这是最后的……

“奇怪，”尼基金头脑里模模糊糊地想，“她现在这样看着我，似乎从远处用这一瞥提醒我。当时我们分别了，对什么都不抱指望，可是终于发生了这种无法解释、不可思议的事情……不，看来，我什么也没有忘记。或是我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忘记。我自信我还记得那天夜里她的脸、她的眉毛和嘴唇……不，我还记得她的嘴唇在颤抖，那嘴唇是柔软的，被泪水弄湿了，有点儿咸……记得她不想离去……打算和我一起倒在地板上……她的头发散发出一股甜丝丝的香皂味儿……这是怎么回事？爱玛，

就是赫伯特太太？赫伯特太太，就是爱玛？她身上还留着一点过去的痕迹吗？而我依然是以前那个并非没有过失的、大胆的尼基金中尉吗？真是不可思议，一切都不可思议！……”

“爱玛……莫非您还记得？”尼基金想小声说，但是，他的喉咙发堵，像被带刺的钳子紧夹着，于是，他笑着干咳了几声，用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的腔调说：

“赫伯特太太^①，请原谅，我的喉咙有点哑了，都怪那辩论会，所以我该沉默一下……请原谅……”他字斟句酌地挑选着在目前情况下听起来应该非常合情合理，十分自然的话：“您对辩论会感到满意吗？”

“非常满意。”她回答说，目光更凝聚，更明亮，闪烁着忠诚而安详的、年轻人的柔和的光芒。于是他又想，她在期待着另一个问题，经过方才他俩像一刹那摆脱了什么并被什么联系起来，同时凑着烛火点烟，相视而笑之后，她已经明白了他那短暂的停顿的原因。

“您大概想同我谈谈。”她的眼睛在说，“可是，干吗又有什么使您憋住不讲了呢？难道使您憋住不讲的东西是那么重要吗？您应该相信我，我不会对您弄虚作假，我不会骗您。我记得过去的一切，我并没有为过去发生的事感到懊悔。您理解我吗？”

“是啊，我是想谈谈。”他的眼睛小心翼翼地扫视了一下她那温柔而发光的眸子，像是在说：“我又何尝不记得，尽管这是多么不可思议，而且，这一切似乎都恍如隔世。我可爱的战士乌沙季科夫站在门外，咱俩最后一次在烛光下，在纸上写着俄文和德文，里面有绝望，有恐惧，也有只在那时才会产生的突如其来的青年人的钟情。那时我俩之间发生了什么事？那春光明媚的早

^① 此处原为德语。

晨,苹果花的芬芳,敲门声,小托盘上放着一小杯咖啡,睡眼惺忪的脸上带着歉意的微笑,睡衣,咬肿的嘴唇,潮湿的头发……你还记得,那第一天早上你是怎么到我的顶楼上来的吗?……”

“是的,我记得,记得。”她的眼睛似乎表示同意地说,“看着您和蜡烛,回忆着您也能回忆起的往事,我是多么快活啊……”

“尼基金先生,请您尝尝,这是绝妙的巴敦酒!它有点像俄国香槟酒。为一您的一健康!……”

“谢谢,迪茨曼先生。标准俄语是这么说的:祝您健康!”

他尽力强使自己恢复常态,像掀掉幕布一样,摆脱这忧郁而又甜蜜的昏睡状态,摆脱引起他胡思乱想的魔力,其实在赫伯特太太的凝视的蓝眼睛的神情中,也许并无此意。他朝四周看了一下,爵士乐疯狂的节拍仍旧不停地敲打着,桌上蜡烛炽热的光轮摇曳不定,一对对舞伴的身影在一片浅粉红色的烟雾中混杂地跳动着。彬彬有礼的、讨人喜欢的小堂倌在朦胧中弯着腰悄悄地走出来。他用浆过的餐巾包着酒瓶,熟练地把浓稠的红酒斟进酒杯里。萨姆索诺夫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过分严肃地朝邻桌那边看着,一个穿短上衣、留大胡子的小伙子(脖子里围一条彩色围巾,长头发拖到肩上)正在放肆地吻着一个纤瘦的、浑身慵懒的、似乎困倦欲睡的少女的嘴角。她坐在一个穿着肮脏的灰色绒线衫的年轻黑人旁边,那黑人不管他们,只管吃着油腻的通心粉,灵活地使着叉子,每喝几口啤酒就用叉子随着爵士音乐在桌边敲着切分音作伴奏。洛塔·蒂特尔不时若有所思地用珍珠般的牙齿咬着长长的琥珀烟嘴,柔韧的手指抚摩着玻璃酒杯,似乎想把酒温热。她那浓黑的扇形的睫毛从容地扇动着,一会儿看看迪茨曼,一会儿看看萨姆索诺夫(她这副漂亮的脸,由于比较生硬的面部表情和浓装艳抹显得有点可怕,似乎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感到羞怯)。迪茨曼高举酒杯,快活地说:

“在‘快活的猫头鹰’酒家，人们不发表政治性的祝酒词，它超越时间之外，在这儿，只应该吃喝玩乐、跳舞，不去想正经事。让我们干杯，祝您——健康！”

“我给您说句无关政治的话。”洛塔·蒂特尔插进来说，“全世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舍此没有其它出路，这是千真万确的！”

“知识分子不是一个阶级，蒂特尔太太。”萨姆索诺夫以讥笑的口吻说，“在什么立场上联合起来？在修正主义的基础上？在妥协主义的基础上？在什么基础上呢？”

她反驳说：

“得啦！我赞成唯智论者乃至疯子，他们能出主意，就这么回事。耶稣基督就是个唯智论者，这就是我要跟您说的！”

“祝您健康，赫伯特太太。”尼基金说，突然情不自禁地继续着刚刚开始的同她心照不宣的对话，他不用言语，仅用含笑的眼波补充说：“现在让我们为了我们的重逢干杯吧——尽管它不知为什么有点令人感伤，管它呢，就为它干杯吧。”

“祝您健康，尼基金先生。”她轻声说，在双眸深处久久报以脉脉含情、他完全能心领神会的微笑。她也无言地接着说：“让我们为咱们都还记得的青年时代干杯。我不想放弃发生过的一切。”

“我父亲来了，迪茨曼先生，您找过他。”小堂倌说着把酒瓶放到桌上，他那张讨人喜欢的脸像受什么所打扰，变得比较严峻和苍白了。“我父亲马上就到您这儿来……”

“噢，店主人——快乐的阿列克斯，”迪茨曼对尼基金说，“阿列克斯是个活宝，您马上就能看到他！”

这时，一个圆滚滚的矮胖子，手端托盘从大厅红橙橙的昏暗之中，从跳舞的人群后面快步走出来，托盘一直举到光秃的头顶上，灵活的小眼睛里像闪电似的放射出幸福、善良、生气勃勃的

光芒，他左顾右盼地使眼色，打招呼，那活泼的眼神在大厅里熠熠生光，使人精神振奋。他身穿一套漂亮的黑衣服，打着黑蝴蝶领结，里面是雪白的尼龙衬衫。他随着爵士音乐用沙哑的嗓子尖喊着，看样子是在跟舞台上的乐队插科打诨，桌子周围的人都醉醺醺地大笑起来。他一个箭步又轻快地跳上椅子，把摆满酒瓶和酒杯的托盘举到头顶上巧妙地转动着，学着歌手的腔调扯起嗓子唱了起来，发疯似地扭着屁股，模仿扭摆舞的样子把身子滑稽地摇晃几下。餐厅里顿时一阵哄堂大笑。接着，他又用拳头猛捶自己的胸脯，像嗓子被卡住似地大声咳嗽起来，然后又跳下椅子，以去追赶已经开动了的火车似的那股劲头跑到迪茨曼桌前，仿佛深受感动地、幸福地喊道：

“迪茨曼先生！蒂特尔太太！我在自己舒适、热闹而又令人讨厌的洞穴里衷心地欢迎你们！晚上好，先生们，晚上好！你们到了我这酒馆都会高呼：‘快活的猫头鹰’万岁！蒂特尔太太，我们美丽的蒂特尔，让我像往常一样来好好地亲亲您……”

“亲吧，阿列克斯……”

她把嘴唇送过去，阿列克斯先生像小丑一样吧的一声、津津有味地吻了她，惊喜地瞪大眼睛，笑呵呵地向她眨巴了几下，点点头。然后他跑开去，在桌旁张罗起来，巧妙熟练地把新拿来的酒杯擦干净摆好，嘴里不停地谈论着天气，谈洛塔·蒂特尔最新的唱片，谈她那无与伦比的天才，谈他特地为尊敬的俄国客人从冰箱里拿出来的绝无仅有的地道的俄国伏特加。后来，他甚至宣布说，战后他也学会了几句俄语，兴奋得通红的脸上装出一副吓人的怪相，迫不及待地、丑态百出地用走了腔的几句话来证实这点：“来吧，来吧……近况怎么样？糟透了。”“别垂涎别人的财产。”但是他只要一住嘴，他的本来面目就露了出来，完全是一个不知忧愁的忠厚的汉子。他那副样子像是一个可笑而疲倦的男

孩，被这种喧闹、音乐、跳舞、说笑以及他必须时刻给加油的酒馆的不自然的欢乐气氛弄得很兴奋。当他一本正经地从冰冷的酒瓶里把酒倒在女士们小得可怜的酒杯里，一边说话，一边做出种种惊奇、害怕、高兴的手势时，尼基金兴致勃勃地看着他，心想：“他每天晚上都这么精神饱满吗？他哪来的这股充沛的精力？这手势、微笑、鬼脸……他多大年纪了？近五十了吧？”

“俄国作家先生，从您的眼睛里我看得出，您想问我什么问题，是吗？对不起，作为酒馆主人，我先来向您提一个问题。在汉堡，您常到人们用双手毁掉文明的这种店铺来吗？”

阿列克斯先生脸上泛起令人高兴的感动的神情，熟练地把尼基金的酒杯斟满。这时，这位活跃的矮胖子的一双鼓励人交际和开玩笑的小眼睛善意地看了一眼尼基金的脸，就像几秒钟前看着迪茨曼和蒂特尔太太的脸一样。

尼基金只是报以微笑。

“不，您没到过这样的酒馆。”阿列克斯接着说，他已跑到萨姆索诺夫背后给他斟酒了，“在这儿没有时间的观念，在这儿没有东西应该使您想起在上面存在着可怕的现实。”他用手指指上面，“这儿是与疯狂世界隔绝的孤岛，没有发臭的政治、肮脏的妒忌、丑恶的民族主义！这儿没有人会把耶稣钉十字架，因为我只能提供音乐、笑声和美酒来代替那些生锈的钉子！我是以微笑代替仇恨。当人们总是笑呵呵的时候，他们就变得善良了。假如人们只是因为笑哈哈和笑眯眯而渐渐变老的话，那便是大伙儿的幸福！是吗？猫头鹰——这是明哲的意思。快活的猫头鹰——那便是快活的明哲！因此，艺术界人士也常到我这儿来！然而，俄国人到我这儿来，却还是头一次，所以我为能让他们享用我这个小酒馆由衷地感到高兴！你们在我这儿痛痛快快地玩吧！高兴吧，笑吧！……”

“也许我讲得不对，您……要不是当过记者，就是当过演员，阿列克斯先生。”尼基金说，“我猜得八九不离十吧？”

阿列克斯先生翻了一下白眼，做出惊怔的样子，像是被突如其来的莫名其妙的事情震惊了似的：

“不，不，不！我只不过是我这小酒馆里的小丑而已。我当了一辈子的小丑。记者不爱人们而且撒谎。对不起，迪茨曼先生，我是指那些阴险地耍笔杆子的强盗。而我只不过是个小丑……对，去爱人们吧，爱所有的人，幸福的和不幸的人，甚至爱敌人。爱所有的人吧。现在不是战争时期……”

“这是《马太福音》。”尼基金说。

“我没有念过福音书，上帝饶恕我吧，作家先生！”

“连敌人也爱？”萨姆索诺夫问，他鼻子里呼噜一声，不安地动了动眼镜。

“所有的人！否则人们就会变成互相吞噬的机器。那还有谁会生孩子？谁再去传宗接代？”

“嗯，很有意思。”萨姆索诺夫说。

“我是小丑，对。”阿列克斯先生嘶哑地咯咯笑着，跺了跺他那双短脚，双手叉在腰间，笨拙地摆了个滑稽可笑的舞步，引起邻桌一阵哄笑。“您看见了吗？我想使人们心情愉快。我不想抢劫、说谎。现在没有纳粹主义，也没有战争了。每天晚上我都在这儿当小丑，每晚如此。大家哈哈笑，我当一个心地纯洁的小丑，也落个痛快，我在笑声中洗刷自己的良心，我不需要时兴的‘奥莫’洗衣粉。俄国先生已经认识我的好儿子了吗？”

这时，那个沉默寡言、殷勤的小堂倌轻手轻脚地在桌上摆好冷盘，抬起他那精心梳过的头，尼基金趁着烛光看到，小玻璃珠似的汗珠蒙住了他那平滑白皙的额头。他用压低了的、含着敬意和痛苦的声调说：

“不，爸爸，你不是小丑……”

阿列克斯先生把小手一举一拍。

“你们听见了吗，我心爱的独子说些什么来着？他不愿意我当小丑，可我每天晚上都在当小丑。我儿子是大学生，未来的律师，是个好儿子。他不让我当小丑。我儿子第一次到酒馆来帮我忙的时候，他感到震惊，差点儿哭了。我的心也碎了。他把我从酒吧间拉走，抚摩着我的脸说：‘我不愿意你当小丑，爸爸。你根本不是小丑。’我心疼他，也差点儿哭了。我说：‘所有到我这个小酒馆里来的人，都是小丑，都是好人，而生活本身就是丑角的舞台。可我在这儿挺痛快……我是小丑，跟大伙儿一样！’”

“爸爸，我求求你……”阿列克斯先生的儿子低声打断了他的话，并立刻一边走一边把空杯子收进托盘，走到旁边的桌前，那个年轻漂亮的黑人在那对亲吻的人儿旁边已经吃完通心粉，一边嚼着，一边用叉子敲打着切分音，做个手势叫他过去。

“他是个好儿子，我就这么一个儿子！”阿列克斯先生喊着，小孩般饱满的脸庞容光焕发，“可他才二十岁，不像我那样知道毛特豪森、布痕瓦尔德和奥斯威辛^①。我干吗要说这些个？我有个朋友住在美国，是个有钱人，是流行艺术的头领。去年我到他那儿去了一趟，他请我去作客。他住在纽约，房子宽敞豪华，然而四面的窗户都做得像集中营的栅栏，他穿着长条花纹的衣服，不睡床垫而睡铺板。他不能忘记。他同我一起待过集中营。我们什么都忘不了。可是大家全忘了，全忘光了！所以，最好还是当个小丑。我们是不同的小丑，但都是小丑。我不承认，不，不承认什么民族差别，没有德国人和犹太人之分，也没有俄国人和美国人之分——大伙儿都是兄弟！人人平等，我爱所有的人！”

^① 这三处都是希特勒法西斯曾设集中营的地方。

我可怜这可怕世界上所有的人，在这个世界上，政治迫使人们自相残杀！俄国先生，您很熟悉这种味道，尝尝吧。您一定会再到我这小酒馆来喝地道的伏特加的！我不骗人。”

阿列克斯先生迈碎步围着桌子跑着，把斟满伏特加的酒杯一直送到尼基金嘴边。尼基金不由得伸手从对方有劲的手里接过杯，品了品。他因为备受关注而感到窘迫和尴尬，他说：

“是您这儿时兴品酒呢，还是在‘快活的猫头鹰’里特别重视俄国伏特加？”

“这是货真价实的俄国伏特加！”阿列克斯先生尖叫着，做出幸福而害怕的样子抬眼看着天花板，“里面没有掺水！是‘首都’牌的！您想起了俄国，是吗？我知道，在集中营里，俄国人是多么怀念祖国！我很高兴，您在我这小酒馆里想起了祖国！您还会想起这首好听的俄罗斯民歌……《卡秋一秋莎》。这是歌唱卡秋莎的，这个好姑娘喜欢苹果和梨子。先生们，祝你们好胃口，我吻你们大家，我爱你们大家！你们是我的好客人，而我是你们的小丑！我爱你们！……”

阿列克斯先生吻了吻自己的指尖，在空中抖了抖，像是把这吻和爱撒给所有的人。他随着爵士乐的节奏扭动着肥臀，在桌后众人的笑声和喝采声中向餐厅深处奔去。

“很有意思。”尼基金说。

“战后，”迪茨曼一边说，一边张大鼻孔嗅着香烟，“他出了集中营，还是胆战心惊，就去做了鼻子整形手术。你们看见他那地道的亚利安人的鼻子了吗？做了手术，买了一家酒馆，当上了小丑。他想让大家都喜欢他！真有意思，是吗？……美丽的洛塔，我们干吗白坐在这儿，我邀请您跳舞。”

“我们也去跳舞吧，好吗？”赫伯特太太面带笑容说。“对我

们这样年纪的人来说，这不过分吧？他们正在演奏一支缓步舞曲，可我不知道……”

“啊，无所谓！主要是决定跳就行。”尼基金回答，仿佛有一阵热烈的轻率的淘气心情，一阵由自己引起的莫名其妙的可笑的孩子气支持着他。“说真的，赫伯特太太，我不知有多少年没跳这玩艺儿了，我这显然是在冒险，冒丢脸的危险。但是又为什么不跳呢？普拉东，让你一个人在这儿寂寞几分钟，不反对吗？”

萨姆索诺夫从酒杯里呷了一口酒，耍无赖似地、闷闷不乐地急忙嘟哝说：

“我希望看看摇摆舞、扭摆舞和肚皮舞，一次看完。你们痛快地跳吧，先生们，玩吧，我来欣赏欣赏。”

切分音一阵爆炸式的轰鸣过后，顿时一切都变为平静的、老式的，在摇曳的烛光下，甚至显得昏昏沉沉的。在淡红色的昏暗中，一对对舞伴疲倦地挪动着，在缓慢的乐声中旋转着；有些人拥抱着在昏昏然地转圈子；另一些人疲惫不堪地几乎在原地打转；满头大汗、披头散发的年轻人，大敞着带“拉链”的破旧的短上衣，在自己桌旁转动着，不时从桌上抓起褐色的可口可乐瓶，大口大口地喝着，抹抹嘴，互相传递着瓶子，但继续踏着步子，疲倦地抖着身躯，似乎无法使单调地抖动着的腿停下来似的。

尼基金投进懒洋洋地打转的人流，对自己轻率的胆大妄为暗自吃惊：在汉堡某个不可想象的夜酒店里同赫伯特太太跳舞！——他向她承认了这种举动是幼稚而狂妄的：

“就是打死我，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舞。可是，您要是想摆脱窘境，就听我的吧。我要尽力回忆这在好多年前前是怎么跳的。”

她轻轻抚摩一下他的肩膀，赞同地微笑着表示回答。他感到了她那小心翼翼的触摸，在被容许的搂抱中，他感到了她的背

部，嗅到了她身上略带甜味和苦味的香水味，又一次清楚地想起了那个早晨和她那用香皂洗过的凉爽湿润的头发。那时她第一次顺从而绝望地抱着他说：“啊，中尉先生！……”^①

“赫伯特太太，我发现您在默想着什么……”尼基金努力不去看她头上那一绺干净的白发，力求把当初在他们年轻时代一个美好的早晨偶然发生的事情，和现在凝视着他眼睛的那蔚蓝清澈的目光相比较、相对比。他想在这目光中看到在另一种梦幻般的生活中的她和自己，在那种生活中，有的是没有战争的天堂般的宁静，温暖的草地，春日晴朗的空气带来的幸福。“赫伯特太太，”尼基金悄声重复着说，一边注视着她那水汪汪的发亮的眼睛，“我记得，……许多事情我都记得，赫伯特太太……”他停了一下，喘了口气，“……甚至还记得您教我德语说蝴蝶^②时的情景。那是个大清早，太阳出来了，一只蝴蝶从窗口飞进来。记得吗？接着就是这句‘学德语，学德语……’^③”

“学德语……”^④赫伯特太太轻声说，“您还记得？啊，天哪！……”

她的手指在他的手指里变得湿润了，她那无力的膝盖碰到了他的膝盖。这种莫名的恐惧和不加掩饰的喜悦的流露像一阵缓缓的冷风透过尼基金全身：她当真没有忘记，至今还记得当初他们互相倾诉的那些话吗？他急忙说：

“您还记得，我怎么教您几句俄语的吗？”

她笑了，有准备似地撮起嘴唇，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用俄语说：

“再一见……不一要一忘一了一我……”她停了一下，用湿

① 此处原为德语。

②③④ 原均为德语俄译音。

润的手指握了握他的手，又添上一句：“我一爱一你……对吗？对吗？”

尼基金没想到她还记得二十六年教给她的这些话。那是在沉睡的小城，五月的夜晚，天上有几颗稀疏的亮星，蜡烛的火苗在他们的呼吸下晃动，他们轮流在一张纸上写着德语和俄语，不管信还是不信，他们就要久别了。不，他曾知道，并且感到，明天他生活中有许多事情将要发生无可挽回的变化，他们再也不会相见了，而她对不可能的事情还抱着一线希望，居然会记住他说的几句俄语？然而，不知为什么，他目前还是竭力要避开这严肃的话题，开玩笑地说：

“我在大学读德语时，当然，曾不止一次地落在后边，那时我就想起您说的：‘学德语，学德语。’^① 您瞧，您是怎样地影响了我，这……”

“您德语说得很好。”她说，接着，显然很踌躇，没有把握地问：“您妻子……是做什么工作的？”

“她是医生。嗯……您丈夫呢？”

“他在五四年去世了，我们一起生活了四年。”

“您有孩子吗？”

“有一个女儿，但她不住在汉堡。她结了婚，同丈夫一起到加拿大去了。”

“那么您的弟弟呢？我还模模糊糊记得您的弟弟。他好像是叫库尔特吧？他在哪儿？”

“在杜塞尔多夫市。他是有名的律师，有自己的事务所。他事情很多，工作很忙。您来之前我给他打过电话，他很想到汉堡来，可是来不了。”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我昨天想详细问您，请您说说，您到底是怎么邀请我来参加辩论会的？您是怎么认出来的？难道是从照片上认出来的吗？”

“在西方出版的书里，我看到您的照片。您的小说是在我的几个书店销售的。只是在这以后，我才读了这些书。”

“从照片就能认出我来吗？”

“对，我认出来了。”

“您的记性比我好。战后，我脑子里记的事情太多。真是一言难尽。总之——大半辈子过去了，可是没有功夫去细想它，真遗憾。”

“我变得很厉害吧，尼基金先生？您认不出我来了……我完全变了吧？不是那个爱玛了，是吗？”

“我也不是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中尉了。”

“不，对女人来说，二十六年就是整整一生。这就是您曾经说过的真理。”

“我也感到岁月的流逝。我早上刮脸时照镜子，有时就会产生一种天真的、自我解嘲的想法：两鬓斑白了，虽然还差一点不到五十岁。其实，主要的岁月是在那镜子后面……这是相当平凡的真理，尽管一些人活到六十岁往往还不服老。不过，应当活到六十岁……”

“您说的是‘主要岁月’？而我想，我相信……您应该是个幸福的人，您有……家庭、工作，您很有名望……难道您不是一切如意吗？”

“没有比我更顺心如意的人了。”

“您是开玩笑还是说正经的？”

“我是想问您……您说说看，当时在您家里的俄国人中间发生的一切，您都明白吗？”

“我为库尔特和自己担心。我知道,是您救了我。”

“如果说到过去,救您的不是我,而是克尼亚日科中尉。您还记得那个德语说得很好的中尉吗?”

“我只知道是您救了我。那个中尉很凶,非常严肃,说真的,我怕他,而您……”

“像克尼亚日科中尉那样的人,我这辈子再也没有遇到过。至今我还需要他。然而这样的人往往都牺牲了。这似乎是某种可怕的规律。”

“可是您,上帝保佑,却活了下来。”

“我真走运……失去了克尼亚日科这种人,就失去了真正的朋友,世界上许多东西也就黯然失色了。我至今都忘不了他,做梦也梦见他。到了早上,我就难受得坐立不安,就像我儿子死后那样。请原谅,我们谈的是克尼亚日科,可我似乎……”

“您……儿子死了?什么时候?”

“四年前。那时,我的妻子,我惟一的亲人,也差点儿死去:她得了精神病。慢着,我们谈的是克尼亚日科,那个中尉,我的战友。当然,您还记得他……”

“噢,我不会问您什么。我理解,您妻子……还有您……我理解,为什么您的眼睛经常流露出忧郁的神情。是的,我看得出来,请您原谅。我不假思索就说您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请原谅我。也许我们该坐下喝点酒了?我们跳了很久了。我想喝点酒,而且很想抽支烟。对,对,这儿太闷了……不过,我似乎有点冷……”

“赫伯特太太,您不舒服了吧?您的手真是冰冷的。大概,您不太舒服吧?”

“不,不,这也是神经质的。女人一般都会有这种神经质的感觉。正像您所说的,我不过是想起了自己最美好的岁月。但

那还称不上是岁月，那只是几天……就像是儿时的一种幻觉，像是一场梦呵……尼基金先生，您在听音乐吗？我想，现在人们正在跳扭摆舞或是摇摆舞。我们妨碍年轻人……最好让我们坐下来，喝点酒，抽抽烟。”

“您的手还没有热哩，冰冷的……”

“喝了酒，一切就会好的。我有点累了。”

“那我们就坐坐吧。”

“对不起，尼基金先生，您的同事萨姆索诺夫先生肯定是个刚毅的人，他知道我们以前认识吗？”

“这没有什么意义。怎么？”

“您也不想让他详细地知道吗？”

“这我还没来得及考虑。”

“谢谢您。让我们坐到桌旁去吧。”

第五章

他们走出快速旋转的跳舞的圈子，回到自己的桌旁。迪茨曼和洛塔·蒂特尔还在跳舞。萨姆索诺夫两手交叉放在胸前，独自坐在那儿。

“你们没有表演什么扭摆舞，也没有跳什么摇摆舞……这些舞按现代的叫法不知叫什么名堂。”他说，“你们太规矩了，这种规矩是不合时宜的……”

“尼基金先生，请替我斟杯酒。”赫伯特太太请求着，一边匆忙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等尼基金给她倒满一杯酒，她好像解渴似地咕嘟咕嘟喝了好几口。他清楚地听到她的牙齿和玻璃

杯的叩击声。因此尼基金又一次问她：

“赫伯特太太，您不舒服吗？”

“在这儿地下室好像又闷又潮。”她抽着烟，从蜡烛黄色光轮的上方歉疚地看了看他，随便地说，“请原谅，尼基金先生，我经常这样……我有点累了。这些爵士音乐，这般嘈杂和拥挤……阿列克斯先生说的对，小丑的表演，一点不假。”

“真可使人变傻，”萨姆索诺夫承认说，“令人发疯……这二十世纪的狂欢滥饮！要寻这种快活，得有坚强的神经，还得吃燕麦粥。”

她无声地几口把酒喝完，尼基金重新给她斟满。这时，他发现她的牙齿打着哆嗦，同时还看见她那怯生生的请他原谅的目光。然而，在她那异样的盯着他的脸的目光中，却流露出想要微笑和欲言又止的神情，大概是由于萨姆索诺夫在场而不便启齿。

“尼基金先生，我本想……”

“爱玛，从前的爱玛，她那双眼睛依然像过去那样，她的眼睛表达了一切，”尼基金想，在她那蓝莹莹的目光中，特别在她的声音里流露出的一种温顺、无助、已经十分软弱的女性的东西，突然引起他对这位不年轻的爱玛模糊的温情。从前，很久以前那被他认识了的东西，不知为什么在她身上仍然保存着，没有欺骗他。他立刻想到，类似的东西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这一切——不论是她面部那轻信而软弱无助的表情，还是她那怯懦的负疚的神态，——只是被战时自己年轻时代的回忆激起的想象的结果而已：因为她的外表变得如此厉害，以致他都认不出她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已经做好精神准备了吗？我没有力量摆脱对往事的迷恋吗？”

“我本想……请萨姆索诺夫先生原谅。”赫伯特太太用带着

歉意的声音继续说，“半小时后我一定得到家……如果您累了，我可以把你们二位用汽车送回旅馆。我想，迪茨曼先生和蒂特尔太太要在这里玩很久。他们很喜欢阿列克斯的这个酒馆……我们可以照英国方式离去，”她补充说，“不辞而别，这在我们这儿已经很流行了。”

“赫伯特太太，我是您的支持者！”萨姆索诺夫过分热情地支持她说，“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回到旅馆，登上电梯，打开房间，钻到被窝里去……”

“当然，当然。”尼基金若有所思地说，他差不多猜到了她为什么着急起来，便看了一下跳舞的人群。“但不管怎样，总该告辞一下。”

不肯停息的音乐节拍再次加快，舞蹈旋律也再次发疯似地快起来，——烛光下一对一对的舞伴忽儿接近，忽儿离开，忽儿散去，忽儿靠近，像是用腿脚的弯曲和身体的摆动在谈话。年轻人流汗的脸，甩动的头发，弯曲的脖子，晃动的胳膊时隐时现，牛仔褲紧裹着的大腿摇摆着、晃荡着，短裙拍打着膝盖。尼基金终于在乱哄哄的人堆中看见了洛塔·蒂特尔那蛇一般柔韧的、苗条的身躯，她那清秀的面孔和火红的头发显得很突出，她频频轻盈迅速地低下头挑逗着迪茨曼，她笑着，不时指着自己的胸、肩膀。而他则带着孤僻的、沉思的表情把发亮的尖头皮鞋的后跟相互敲击，并用手掌机械地做着下砍的手势，像在原地跑步一样。又矮又胖、脸色红润的酒店主人阿列克斯先生，又悲又喜地瞪大眼睛，飞快地在小客厅里跑动着，在震耳欲聋的音乐声中，向跳舞的人、向乐队以及向烟雾腾腾的餐桌旁影影绰绰露着白圆脸的人们滑稽地大声说着俏皮话。他每到一处，每次大声向大伙说一番俏皮话，那儿的人们就对他报以哈哈大笑。显然，这儿的晚会达到了高潮。

尼基金等到迪茨曼原地跑步似地跳到最靠边的桌前时，用手指在空中向他做了一个跨步动作。迪茨曼用眉毛做出惊奇的表情表示回答，然后，停止跳舞，对摆动着瘦肩膀的洛塔·蒂特尔说了句什么，就挽起她的手，急忙走过来。洛塔·蒂特尔胸脯起伏，喘息着，疲惫不堪地倒在椅子上，高呼：“这真是绝妙的体操！”说着，从手提包里拿出小镜子，用手帕角在眼睛下面擦了擦，兴奋地说：

“尼基金先生，现在人们都说扭摆舞和摇摆舞能预防癌症。但是，要是我得了这种可怕的疾病，那我一定要回自己的波兰人那儿去死！”

“那可真不得了啊。万一发生这种情况，也可以去俄国：你知道，我们那儿有高明的医生。”萨姆索诺夫以半真半假的口气说着，立即怀疑地盯着上气不接下气的迪茨曼，“大概，扭摆舞还会产生关于人生意义的卓越思想吧？你们唯智论者是经常用两条腿来进行思考的吧？有效吗？”

“您想对我进行某种指责吗？为什么呢？我道德堕落了吗？我打死无辜的婴儿了吗？萨姆索诺夫先生，您对我是不是过分吹毛求疵了吧？我非常不希望您对我抱有成见。”

“该死，这个自我标榜的圣徒。”尼基金内心突然激怒起来，甚至恨得咬牙切齿，“是什么东西刺得他恶狠狠地啥事都管？”尼基金赶在他们眼看就要不合时宜地开始争执之前说道：“非常遗憾，我们该回旅馆了。我同意您的看法，迪茨曼先生，这个小酒馆颇有意思。谢谢您的好客。”

“小丑的表演，尼基金先生，小丑的表演，”萨姆索诺夫挖苦地对他施加压力，用俄语插嘴说，“你说，你说呀……啊，笃信宗教的神父……”

“迪茨曼先生，还有您，蒂特尔太太，请你们别客气，也不必

送我们。你们这样已经太客气了。”尼基金不理睬萨姆索诺夫的插话，愉快地接着说，“赫伯特太太已经盛情地答应送我们回去。所以你们不必中断自己的晚会……我只是请求你们，先生们！不必过分拘礼。好吗？”

他站起身来。

“当然，我们还要再玩一会儿。”洛塔·蒂特尔像扇子般忽闪着毛茸茸的睫毛说，“但我要告诉您，尼基金先生，让您知道有关辩论会的情况，——您在某些问题上揪迪茨曼先生的辫子揪得他够呛，他向我承认了这一点。在某些问题上。再见吧，请吻我的手。在波兰，亲吻女人的手。据说，在你们俄国也是如此。在吃得太饱的德国倒不经常这样。我后天将去科隆，但动身之前我想同您再会一面。”

“谢谢您，蒂特尔太太。同你们在一起，我感到很愉快。”

尼基金吻了吻她那纤细的、尖尖的指甲呈珠母色的手（她热情地咬紧嘴唇，用指甲刺了一下他的手心），又同很快地肃然起立的迪茨曼握了握手。迪茨曼跳舞跳得通红的脸上露出活泼的笑容，表现出友好的态度，这时他把鞋后跟碰响，认为需要像老朋友一样开开玩笑：

“其实，尼基金先生，我认为，在阿列克斯先生的这个小酒馆里，您没有决心把真相彻底搞清楚，就像在那条街上跟女孩子们……”

“这我再考虑考虑，”尼基金也开玩笑地说，“一直考虑到早晨。我有的是时间。”

萨姆索诺夫跟赫伯特太太从桌旁站起来，摆出一副凛然的态度，客气而冷淡地点头告辞，又故意表现出有分寸的礼貌，默默地把挂在椅背上的风衣递给她。他们离开不停地轰响着爵士音乐，充满嘈杂声、叫声、笑声和像教堂里一样闪烁着烛光的潮

湿的小地下室，来到昏暗的街上。秋天的空气湿闷异常，在暗淡的路灯下，风儿吹着人行道上被踩碎的树叶和脚穿黑色长袜、乳峰高耸诱人的裸体女郎的彩色照片——被圣保罗区夜晚的过堂风吹到这里的广告画的碎片。

“说真的，阿列克斯先生那里的喧闹和音乐使我感到累了。”赫伯特太太对尼基金说。他坐在右边，侧身对着她和在后座的黑暗中呼哧呼哧喘气的萨姆索诺夫。她接着说：“我是头一次到那里，因为我喜欢安静的饭馆，可以避开这种普遍的疯狂现象，休息休息。”

• 午夜十二点多钟，灯光通明、不眠的雷佩尔班大街上已经冷落；夜酒店的霓虹灯下和酒吧间前密集的人群渐渐稀少；鸡尾酒早已在泛泡；脱衣舞厅里，台上的舞女脱着衣服，摆出种种求爱的姿态，向烟雾弥漫、透露出一张张面孔的昏暗的大厅机械地微笑着；电影院里放映着五马克一张票的内容千篇一律的瑞典影片，但门口的人群也渐渐稀少了。午夜时分的雷佩尔班大街是灯火辉煌而又冷落的、人欲横流的场所，这儿有在门前哑声叫喊着拉客的鸨儿，也有在角落里广告亭旁的单身妓女。途经深夜狂欢的雷佩尔班大街之后，那些直到清晨人行道两旁都被车辆堵塞着的汉堡中心街道，相形之下就显得冷冷清清，毫无生气，沉浸在黑暗之中了。尽管关了门的商店橱窗的白光照射到人行道上，还有迟归的情侣拥抱着从商店前经过。

“我有点被震得头昏脑胀。”赫伯特太太带着温柔而又不失分寸的歉意接着说，“我希望我们能到清静一点的地方坐坐，即使彼此只能听到对方的声音……如果你们不反对的话，先生们，我领你们到一家非常清静的家庭风味餐馆去喝一小杯咖啡。你们将会从嘈杂声中清醒过来。先生们，你们不反对吗？”

“真奇怪。”尼基金想，“她似乎在耍花招，找到了离开阿列克斯先生过分嘈杂的酒馆的借口。她并不想回家，就像我不想回旅馆一样。这真是奇怪的感觉，好像有什么吸引着我，促使我去揣摩她的心思……”

“不管怎么样，我大概还能再喝一杯咖啡，了解一下资本主义汉堡的夜生活。”尼基金说着，朝萨姆索诺夫看了一眼，后者用摘下来的圆形软帽遮着嘴巴，正在神经质地大打呵欠。“你怎么样，普拉东，同意吗？”

“算一啦。”萨姆索诺夫呵欠打了一半，呼了一口气说，“什么餐馆我都不想去，只想睡觉。夜生活过够了。到旅馆去，到旅馆去，今天我们玩够了，谢谢您。”

最后这一句——“今天我们玩够了，谢谢您”——带有代替两个人的回答，还有一种心安理得和好奇心得到满足的意思。她没有冒昧地坚持己见，只是用戴着手套的手掌擦了擦蒙上水气的玻璃。街上一片寂静，夜晚的灯光像毛茸茸的圆圈在玻璃上模糊地滑下来，像光亮的蜘蛛网在她脸上一闪而过。尼基金说：

“我们这么着，根据所罗门^① 决定的而不是萨姆索诺夫决定的原则，我们把玩腻了的俄国作家送回旅馆，再到清静的小馆子去喝咖啡。我同意您的建议，赫伯特太太。”

“真是孩子气！”萨姆索诺夫不满地用俄语说，“实在荒唐。我真不理解你这酗饮的作风。何苦呢？要适可而止。”他又改用德语说，“赫伯特太太，我像请求一个女人那样，请求您取消自己盛情的提议。不然的话，明天尼基金先生就会心脏病发作而爬不起来了……他的体质我是了解的。他该睡觉了，该服戊酸薄

① 所罗门，纪元前以色列国王，聪明而又多才多艺。

荷脂和安眠药了，不能再到酒馆去乱窜了。”

她把小镜子移了一下，以便能在镜子里看到萨姆索诺夫，仍旧不反驳他，只是胆怯地对尼基金说：

“这用不了我们一个小时。但是，要是您不能去，要是萨姆索诺夫先生……”

“萨姆索诺夫是个有钢铁意志、循规蹈矩的禁欲主义者，遵守严格生活制度的先知。此外，他从小就不爱喝咖啡。”尼基金说，“所以，尽管这在道义上说不过去，我们也得在旅馆门前和他分手。”

萨姆索诺夫立即用俄语瓮声瓮气地嚷着：

“我对你的俏皮话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才如梦初醒，才理解我的处境……”他又用德语补充说，“我的任务是提醒他，赫伯特太太，结论由他自己去做，以他固有的轻率的性格去做。”

“已经做了。我已经泪流满面了，别再使我嚎啕大哭得喘不过气来吧。我们快到旅馆了，你不会因为吃不到咖啡而遗憾得睡不着觉吗？”

“有一个结论，我今天已经听到了。”萨姆索诺夫后脑勺在座位的靠背上晃来晃去，故意打了个呵欠说，“是怎么说来着？人类……哎呀，对啦，对啦，不知道全部真理。赫伯特太太，我同事的这项声明含义无比深刻，使我大为震惊，使我胜读十年书。这个哲学公式使我大吃一惊，目瞪口呆，无法镇静下来。您怎么样？您同意他的说法吗？”

她轻声回答说：

“尼基金先生说得对。谁都不知道……”

“什么，谁都不知道？那么，不容置辩的真理又在哪里呢？这就是说，整个人类迄今为止都是徘徊在迷雾之中喽？都是些瞎子喽？始终只是在探求而什么也没有找到吗？像狗崽子一

样，用鼻子到处瞎撞吗？”

“只有一个人除外，普拉托沙。”尼基金半开玩笑地说，“不过，辩论会已经结束了……我们也快到了，亲爱的论敌。旅馆关门了，看门人也睡了。你去按一下铃，给他一个马克，谢谢他，他就会给你开门，甚至还会让你坐电梯。要回到舒服的房间，眼下这真理已经够用了。”

他们从中心街道拐了弯，来到旅馆。旅馆已经关门沉睡了。每层楼的窗户都熄了灯。前厅里玻璃墙后面的曲管灯入夜后也暗淡了。带有放钥匙的小抽屉的柜台上方，半圆形的毛玻璃灯罩发出微光。这没有门岗的前厅，特别是没有行人的人行道及停在大门前的黑魑魑的汽车，使尼基金想到时间已晚，他感到疲倦，想到他一生中又过去了一个短促而漫长的昼夜。但他并不想睡，此刻要是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睡在鸭绒被窝里，照常神志清醒，他也不会睡得着。昨晚他已尝到这个滋味。在没住惯的房间里，寂静和预料中的失眠会使他因为盘据脑际的不安的孤独感到害怕。

“我只有一点请求：回来后打个电话给我。”萨姆索诺夫阴沉地嘟哝着，“好吧，当心点吧，哲学家，当心点啊！等一切完事，就该酒后头疼了。再见吧，先生，女士！……”

他拼命呼哧着把无檐帽往蓬松的头发上一拉，拖着沉重的身子跨出汽车，大摇大摆地走近大门已经关上的旅馆门前，在那儿略站片刻，摸到了电铃的按钮。于是，玻璃门后很快出现了被叫醒的看门人的身影。尼基金说：

“一切就绪，可以开车了。”

“天哪！”赫伯特太太说着，脱下手套，在小手提包里摸索着，“您来到汉堡，这该多好啊！……您来这儿汉堡，我是多么高兴啊。我不知道您是否高兴，可我很高兴，……让我们就这样坐上

两分钟,抽抽烟,好吗?”

她掏出香烟,他擦着了火柴。她一边抽烟,一边感激地用夏天湖水般碧蓝的眼睛柔情地侧视着。于是,他又清楚地看见了爱玛以前那双令人可以看到深处的眼睛,这双眼睛仿佛仍然保持着青春的光辉和那天早晨瞬息的喜悦。留在他的记忆中的是:那个早晨坐落在松树林中的房屋,屋前那片翠绿的草地,五月间柯尼斯多夫镇花园里盛开的苹果树的带着露水的芳香,教堂周围洒满朝曦的古老的长方石板铺的广场,坐在凉爽的石板上舒舒服服抽烟的那些士兵……奇怪,当她不时超出他们目前处境所允许的程度长久地盯住他看的时候,她的眼睛,甚至她的眉毛的动作,令人想起了一切,也表达了一切。然而,更为奇怪的是,他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制止他,但又不可遏止地促使他去猜测她面部的变化和说那些可有可无的话时嘴唇的颤动,好像他是透过明亮的缝隙偷偷地向后看,望着茫茫空间和望进自己的内心,由于惆怅地回到生活中值得纪念的幸福时刻,想起他和克尼亚日科在丁香树下沿着人行道走过铁丝网的情景,他感到又是心酸,又是高兴。

“您到过罗马吗?尼基金先生?”

“到过。”

“那不用说,您喜欢在纳沃纳广场上散步喽?”

“是啊,那可是个好地方。”

她把没抽完的香烟塞进烟灰缸,也不看他,神秘地笑着。

“我现在的心情就像在那美好的广场上一样,晴天那儿总是很安静的。有点儿忧郁、快活,也有点惊慌不安。因为自己并不住在那里。而……您呢?”她转向他,“而您……您觉得怎么样?请原谅,我已经冒昧地向您问起也许是不该问的事情来了。”

“您问吧……我现在不知怎的也有点忧郁,”尼基金回答道,

“您尽管问吧。”

她沉默片刻，抚摩着手指上的皮手套。

“您忧郁？在这儿？在汉堡？是因为想起了罗马，还是想起了莫斯科？”

“不，有点忧郁……是因为……”尼基金试图故意找一个不表达他的感觉的词儿，可是这感觉像是一种威胁，在他心里若隐若现，他担心她可能会感到他的回答过于坦率，过于老实，于是他慢条斯理地接着说：“因为有点忧郁。”他笑了起来，“在异国的深夜里我往往会感到忧郁。人们都熟睡了，城市也似乎变得空旷了，死一般的寂静，好像是最后一批被遗弃在另一个星球上的居民。就为这……”

“天哪！他们怎么会都熟睡了！这些德国人多么可怜，多么省吃俭用啊！他们在梦中也节省马克！”她也笑起来，看着大街上那阴森森的、陷坑似的漆黑的窗子，“这样浪费时间哪行？我们到罗马去吧，我们有的是钱。我们有小汽车，我们可以通宵任意纵饮作乐。到了早上，我们就从罗马回到汉堡，那时汉堡已经醒来，也就不会那么忧郁了。”

他不明白地问：

“去罗马？怎么去法？”

“喔，这个小餐馆叫‘纳沃纳’，是汉堡的罗马。还是您想去圣保罗区？到夜总会去？看看年轻漂亮的女人？”

“不，我们就到罗马去吧。”

“我通宵当您的司机并能快速开到目的地……以美国西部惊险影片中闪电般的速度。您喜欢美国西部的惊险影片吗？”

“不太喜欢。”

“这也没什么。”

她弯下身，两脚轻轻地一用劲，这时他听到，一只脱下来的

鞋子清晰地掉到踏板上，接着又是一只。她用脚很快地把鞋踢到座垫底下去。他惊奇地问：

“您光穿袜子不冷吗？”

“这样能更好地掌握速度。我夜间开车有时就是这样。”

他们来到“纳沃纳”小餐馆。这儿确实是一家家庭风味的酒家，清静，空闲，餐桌之间有木板隔开，在餐桌上铺着洁白凉爽的浆过的台布，台灯在天蓝色的灯罩下发出幽暗的亮光。蒙着花布的墙壁的背光处挂着罗马风光的水彩画和照片，大厅神秘的深处，优雅而令人快慰的音乐如潺潺流水，隐约可闻，音乐似有若无，好像是从另一个美好的古老世界小心翼翼地截来的。这儿一切都干净、整齐而舒适，这儿的人们都不大声说话。小餐馆整个舒适的气氛，遮得严严的窗户，以及只有那昏昏欲睡的、小溪潺流似的音乐才能打破的暖洋洋的宁静，使尼基金觉得仿佛是在一个令人欣慰、使人神往的可爱的往昔的孤岛上。那往昔的岁月在这现代的夜汉堡，在雷佩尔班大街的狂乱之中，显得平静、美好和正派，而此时的雷佩尔班大街一刻也没有入睡，在离此地两条街的地方病态地、疯狂地寻欢作乐。

“尼基金先生，我们要点白兰地和咖啡，您不反对吧？我总觉得有点发冷，”当他们坐到桌旁，一位围着洁白围裙的年轻姑娘迈着女侍的腼腆的步子走近他们，用欢迎、善意的目光打量他们两人时，赫伯特太太说，“也许，我们今天还能再喝一点？”

他回答着，暗自发觉她身上表露出一一种大胆的新东西。

“那待会儿您怎么开车呢？能摸到方向盘吗？”

“喔，这不成问题！”她笑了。后来，等端来白兰地和用瓷杯盛着的又浓又烫的咖啡时，她一边若有所思地解开一包窸窣作声的方糖，一边说：“为了使世界上没有邪恶，尼基金先生，上帝

也需要您到汉堡来。在我想象中,您是另外一个人……对,成了另外一个人,我担心您会装作什么都不记得。只是那时我们都还年轻……对,那时正是最美好的岁月,正像您所说的,那岁月已经在镜子后面消逝……我已经不是那个十八岁的爱玛了,我是‘赫伯特太太’了,我老了二十六岁。现在我开始考虑这个问题,我越来越多地考虑一点:在我一生中,究竟什么是主要的?”

“让我们为最美好的岁月干杯,”尼基金说。忽然,他半忧半喜地坦率地说:“从某个时期起,我也越来越经常考虑这件事。已经常要回头看看,可是后面又有什么呢?是像战后复员时所设想、所希望的那样生活吗?许多事看来并非如此。我犯了相当多的错误,也做了不少蠢事,想起来都感到羞愧。然而说也奇怪,坏事已经被忘记或者渐渐淡忘,留下的是大学时代,结婚,生儿子,第一次成功,五八年第一次出国。一切都是第一次……因此,以往的生活显得特别短暂又特别漫长。因为有的年月都是恍恍惚惚的,像在迷雾中一样。”

“那么战争年代呢?”她小声提醒他并歉意地请求道:“只是别谈政治……如果您方便的话……如果这样能够说清楚的话……”

“没有政治的战争?”尼基金重复了一句,“这不可能。我知道您想问些什么。我憎恶战争,但有时我也会感到苦恼,因为我失去了在战争中遇到的人,所有的人,不管是坏人好人,所有我认识的人。为什么这样,回答起来也并不十分简单。也许是因为我们,不管是坏人还是好人,当时彼此都很需要。我们就像是一家之中的各不相像的弟兄,大致如此。阿列克斯先生今天就说:‘爱朋友和敌人吧。’”尼基金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儿,“我可没有《圣经》里所说的耶稣基督的感情,但战争结束后,又过了许多年,我才感到,后来我再也没有遇到过比那些人更好的人。

这是一代人的怀旧病。懂吗？像克尼亚日科中尉这样的朋友，我一直需要，至今还需要。而像克尼亚日科这样的人却没有了。我们这一代人全都被毁掉了，几乎全部。也许特别因为这，我才爱他们，忘不了他们。甚至连那个麦热宁中士……您应该记得他……就是当初那个在顶楼上强迫您……”

她扬起眉毛，凝神地听着。

“您爱他们？甚至爱那个中士？我记得，您开枪打他，于是您就被抓起来了……就是在那一天被抓起来的吗？”

“他是真的吃我的醋。”尼基金回答，“您知道他的命运吗？可惜战后他牺牲了。五月十一日，在奥地利，有人在林中朝汽车开枪。车里坐了四个人，就死了他一个。早在柯尼斯多夫最后一次战斗时就可以预料到这一点了……他当时就已是注定遭劫了。听起来固然可怕，但却是事实。战争快结束时，他非常想活下去。当他牺牲的消息传来时，好长一个时期我都感到不是滋味。他的死似乎是命中注定的，就像战争中常有的那样。”

“我想再喝一点。我今天全然没有醉意。”她说着，做个手势叫那个穿围裙的姑娘过来。那女侍的顺从的脸上仍然带着先前的亲切的表情。“小姐^①，请来两杯白兰地。”

“是，赫伯特太太，就来。”

小餐馆渐渐挤满夜间的顾客，桌旁出现了一些上了年纪的单身妇女，一对对体面的情人，到这儿来喝杯咖啡，吃顿晚餐。看来，是看完电影或从夜总会来的。小灯罩在烟雾中泛着淡黄色的光，菜单沙沙作响，摆好的餐具发出轻轻的响声，音乐像从远方传来似的，低低地回荡着，一切都是那么有条不紊，整齐，舒服，似乎拉上的窗帘，遮着花布并挂着阳光灿然的罗马水彩画和

^① 此处原为德语俄译音。

彩色照片的墙壁，把这个超越时间、坚不可摧的带有家庭风味的房间，这个幽静的、令人精神安宁的避难所牢牢地保护起来。这时，尼基金想到，赫伯特太太选中并爱上这儿照片上所拍的“纳沃纳”（罗马最安静的广场）可以休憩的一角，但是，她大概也知道，她是用自己的选择来欺骗自己，并且希望受骗。他觉得，目前她这种急忙往何处去、无忧无虑、兴高采烈的样子，这开车的速度（脱掉鞋子，毫不刹车，驱车在沉睡的汉堡疾驶），以及像童话里那样期待出现一种臆想出来的、永远消逝了的、一切都牢牢蕴藏在其中的往昔的宁静环境——凡此种种，和她的整个生活是不相称的。“我已经可以想象出她的生活，”他想着，一面怀着疑团在解一个神秘的小疙瘩，由于对她没有说出的话所怀的好奇心，这个疙瘩一直折磨着他，“现在成了赫伯特太太的爱玛的生活。不，我也可能猜错，瞎编出一些莫须有的事来。”

“我想……”他开口说，等穿围裙的姑娘细心地把装满白兰地的酒杯在他们面前摆好走开之后，接着说道：“我想请允许我向您提几个问题……作为您向我提出的任何问题的交换。”

“同意交换。只要我办得到……”

他问：

“战后您生活得怎么样？我清楚地记得，您弟弟和您曾想到汉堡去。他一个人走了，而您却留了下来……后来呢？找到您弟弟了吗？”

她长久地端详着他，又把目光移开。等她再看他的时候，脸上流露出一种犹豫和激动不安的表情。

“是的，我到了汉堡，美国人已经在那儿了。我找到了弟弟，在舅舅家碰到他。库尔特垂头丧气，惊恐不安，一直躺在沙发上，像病人似地看着天花板，也不出门。有一次，他在舅舅办公室的柜子里找到一件军服，就丢到壁炉里烧了。他在家里乱跑，

哭着，锁上房门喊着，说俄国人要来了，要向他开枪。这是一种可怕的歇斯底里。过了一个月他才好。”

“您弟弟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多病的神经质的小伙子。”尼基金说，模模糊糊地已经记不清他的脸，只是想起一个拱肩驼背、高个子、穿一件不合身的肥大军服的人，那军服极不像样地搭在笔直的肩膀上。“别去管他啦，别去管您的弟弟了，我不大记得他了。那么，您后来的情况怎么样？读大学了吗？”

“库尔特比我小两岁。”她接着说，不自然地急忙为尼基金所记得的她弟弟未成年时的缺陷进行辩解。“不，我没上完大学，得挣钱。开始我在一家小商行做秘书，后来在图书馆，再后来到了书店。我就在那时结了婚，只不过……”她苦闷地翘起嘴角，“这些年头对我来讲，并不是美好的岁月。我丈夫比我大十岁，是一个聪明善良的人。我知道，已经不能再一个人……该安排生活了。三个大书店，一套宽敞的住房，两辆汽车，我成了一个有钱的女人。幸亏生了个女儿，这是我战后最好的岁月。最美好的……后来我和丈夫一起挣钱，经常到国外去。但是好景不长，丈夫死了，女儿嫁给一个法国人到加拿大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和我的钱、书店以及汽车。就这样度过了一生，完全是不知不觉地……我现在想起来了，在您最近写的一部小说里，主人公在考虑，他过的一生是幸福呢，还是不幸，他寻找答案，但是找不到。您是这样写的吗？”

她透过台灯的阴影询问似地看着他，而他从她那故作平静的声调中并没有得到满足，他怀着一种说不出的迫切心情要知道她的遥远而陌生的生活中主要的东西——她的生活曾经和他的生活有过密切而痛苦的关系——他克制着对自己的不满，终于轻易地逾越了可以允许的界线，坦率地问：

“不管怎么说，您总有过幸福吧？当然，我理解，当一个人考

虑他是否幸福时，他马上就会成为不幸的人……”他突然因为自己不礼貌的好奇而生气，补充说：“请原谅，我本不想提出这个不客气的复杂问题！……对不起，我这真是胡扯！”他用手指在空中划了一个叉，“请用红铅笔把我的问题勾掉吧！”

她垂下眼帘说：

“为什么？问题很简单，答案却很复杂。我记得，您曾经要我开诚布公。现在咱们就该这样，因为我们不是在谈政治。啊，我是多么憎恶政治，它多么令人讨厌，太妨碍人了，妨碍了几千年！”她摸了摸白兰地酒杯，慢慢地将酒杯底在台布上移了一下。顿时，她毅然拿定主意，用一种挑衅的语气强颜欢笑地说：“一切早就过去啦。以前在柏林附近的一个小疗养城里，住着一个叫爱玛的女孩子，她是一个天真的德国‘灰姑娘’，一个满脸雀斑的丑姑娘。那时，战争进展得相当快，在那儿只有几天就过去了。既危险又害怕，因为小姑娘在等待着野蛮人的入侵。起初她确实感到恐惧，在那个……顶楼上。后来，一只蝴蝶飞进她的房间，化成一个俄国中尉，就像她小时候人们给她读过的优美的德国童话里的少年骑士。这个女孩子一辈子都记得那个短小奇妙的童话，也许可说是一场梦。在她嫁了人，生了女儿，甚至和丈夫一起到自己心爱的罗马去时，她始终记着它。她在那儿不知为什么幻想会突然遇见自己的骑士，他会像小时候的那个蝴蝶一样飞进来。可是……让我们设想，现在我们就是在罗马！我们无忧无虑，没有任何问题……好吗？”

她笑了，天真地、无所顾虑地从举起的酒杯上方直盯着他的眼睛，他看到：她的喉头在抽搐，像是紧张的痉挛。突然，像他们在阿列克斯先生的小酒馆里跳舞时那样，他感到的已不是令人忧伤的纷至沓来的愉快的回忆，而是对那近在眼前的往事，对他们之间发生过的事，对爱玛念念不忘的、不可理解地留在心头的

情谊，怀着一种疼得钻心的柔情。然而，他并没有料到，她会如此坦率地谈到他们的过去，因此他对她那意想不到的诚挚、她那自持的微笑，以及她喉头的抽搐，感到十分惊愕。

在相隔久远的岁月里，曾经发生过野蛮的战争现实，有过困惑不解，有过恐惧，还有那迅速飞逝、占据了他们整个心灵的富有魔力的几天。难道这一去不复返的、相隔多年的、只有青春时期才会发生的事，至今还像一阵失去的欢乐的微风吹拂着她的心田，而且比战后岁月的经历更为牢固、更不平常、更为幸福吗？他简直不敢相信：难道在这位四十四岁的、女儿也已出嫁的赫伯特太太身上，在某些方面还活生生地保存着以前那个十八岁的爱玛的心？而那个俄国中尉，“少年骑士”，“俄国飞来的蝴蝶”，就是他——这个热爱自己的妻子、由于上千条不同的理由而不那么经常回忆起战争结束前使他惘然若失的那短短几天的“前线”初恋、如今已经四十七岁的见多识广的人。

“赫伯特太太！”他说，“赫伯特太太！”

他说不下去了。

在这刹那间，他在反躬自问自己犯下过错的原因。这个过错由于痛苦的惊愕、窘迫和怜惜而增大了，变得严重了。而她却摇晃着酒杯里的白兰地，老是看着他，并装出一副调皮的、无所顾忌的、忘形的态度等待着，好像顺便提起，不一定是向他提醒过去那普通的、昙花一现的、无需他们中间任何一方感到紧张的事。但是只有眼睛经受不住这场虚假的游戏，笑意消失了，她尽量使他们俩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紧张，尽力使他们的谈话变得轻松，不致惹起任何麻烦，她很快地说：

“尼基金先生，我们回忆起青年时代，许多事情是那么幼稚，那么……有点带有幻想，可笑，是吗？”

他说：

“可笑？不。没什么可笑的，恰恰相反。”

她保持着轻松的口气改正说：

“现在看来是可笑。我们曾期望别人不会来妨碍我们，期望很快相见。我们简直忘记了战争。我曾相信……只有年轻时候才会这样地相信。”

“您说得对，只有在年轻时候。”他说，“您说得对。”

她惘然地用手掌摸了摸鬓角。

“那么您……您，尼基金先生，请原谅，当初要是可能的话，您会到柯尼斯多夫来吗？”

目前他对先前的那个爱玛和先前的那个尼基金中尉所怀有的全部感情，是他战时生活的一部分，然而这段生活已成过去，那年轻人的热烈的、轻率的果断精神已经一去不返。后来这种轻率的果断有时影响和妨碍他控制过去那个尼基金中尉的举动。他过于自信，以为在战争中命运多变的每一分钟应该做那些主要的事或大体上主要的事，他知道，似乎命运全取决于他。只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才明白：他渐渐丢掉了那些年月中构成他本质的东西，而获得了另外一种使他和尼基金中尉疏远的特性。

“那时——是啊，”他最后带着一种痛苦不安的心情，无可奈何地回答说，“我曾有一半相信，战争能通过奇怪的途径使我回到柯尼斯多夫。我既相信又不相信我们还会见面。后来，我们到了捷克斯洛伐克，战争结束了，复员了。‘后来’发生过许多事情。”

“您常想起我吗？”

“是的。尽管支配我的是另一种生活。”

“天哪！”她说，刹那间，她脸上失去了那淘气的开玩笑的表情，变得阴沉、苍白、瘦削了，像刚才在阿列克斯先生的饭馆里那

样,肩膀冷得缩了起来,因而,在她整个姿态中,在垂下去的额头上,在紧闭着的嘴唇上露出一副沮丧的可怜相。“天哪!……”她又说了一句,把放在膝盖上的手指紧夹着。“我等待着……我想您一定会来的。您知道,我祷告什么来着?一想到战后我都想了些什么,我就感到可怕。我祷告说,天啊,让战争再爆发吧,再开枪开炮吧,再把我强奸吧,只要俄国中尉回来……只要他能开着自己的大炮到柯尼斯多夫来,到汉堡来,对我说一声:‘爱玛,我爱你。’我将回答说:‘没有你我会死去……’我想象着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那时,我是一个多么疯狂愚蠢、多愁善感的小姑娘啊!可不是吗?……现在说起这些来都感到可笑。现在我们该喝白兰地,回忆一些愉快的事。我们应该心情愉快,对吗,尼基金先生?”

她竭力使自己脸上露出轻松愉快的表情,竭力使眼睛透过淡蓝色的灯罩照旧放射出亮光,然而这个尝试并不坚决,只是故作活泼地把酒杯端到微笑着的唇边,小声说下去:

“您一点儿也没有喝,尼基金先生。请原谅,我有点醉了,说得太多了。我忘情了,请原谅……”

看到她无力而又脆弱的辩解,看到她不善于掩饰和摆脱自己在回忆记忆犹新的往事时刻的感情冲动,尼基金觉得胸口靠心脏的地方好像有一根多刺的钢丝弹簧蹦开了,如同尖刀一样绞得他疼痛难忍,妨碍他作出回答。他没有料到他们的谈话会达到这个限度,他想,他不能像她解释自己的生活那样把自己战后大半辈子的生活向她解释。他头脑里闪过一个想法,他们俩好像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在两个星球充满敌意相撞的时刻,他们偶然相遇了千分之一秒的时间,也许,就像年轻时候看见对方在近旁时那样,感到很幸福。可是,随着星球可怕的毁灭,他们重又疏远了,分开了,两个星球在已确立了的世界中按着银河系

截然相反的方向运行。然后，在每一个星球上形成了不相一致的时间，不同的计算年份的方法，互不相干的白天和黑夜，以及不同的痛苦、灾难、爱情和各自使人服从的规律性。而他尼基金就是按照他这个星球的规律性来生活，碰到许多新鲜事，为别的感情所影响，忘却了他和她之间相连接的闪电似的火光。“我的过错是由于我还是个毛头小伙子，不顾死活，容易陷入迷恋吗？是的，我和她发生过初欢的迷惘。可是，当初她就深信自己的命运是不可更变的，她怎么还能始终不渝地盼望，等待呢？四五年时，我常常想起她，可是到了四六年，我就又像几百个别的中尉一样，完全听命于来临的和平时期了。啊，它是多么威严地主宰着我啊！我是生活在另一种尺度里，一切都在另一种尺度里。复员，回到莫斯科，对生活的乐趣和渴求，穿军大衣的年轻小伙子的晚会，新朋友，大学，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大学生宿舍……而她的一切都是另样的吧？是时间刹车了吗？”

“赫伯特太太，”尼基金说，喘了口气来克制刺入他胸中的小弹簧的阵痛，“在四五年时我相信，战后一切都要改变，整个世界、整个生活都将像过节一样。到了四六年和四九年，我已经不想这些了。接着，就开始‘冷战’，一切都被彻底打破了……”

“我谈的根本就不是那些，不是那些，我不能对她撒谎，”他想，“这些她都知道，她等待我说的是另一种解释。我究竟能对她说些什么呢？对她说，那二十六年把青春时期的那几天都吞没了、溶解掉了吗？对她说，不可能的事情是不能变成现实的吗？”

他小声说：

“当初尼基金中尉什么都很清楚。我记得，他几乎不会说谎，他感到，一切取决于他的勇敢和诚实。但他毕竟是个孩子，不懂得生活，而生活要比他强悍得多。”

她像是待在冷风中，瑟缩地收拢肩膀，然后，歪过头去，强颜欢笑，这时她那保护得很好的牙齿像小镜子似的闪亮了一下。

“我喝醉了，尼基金先生，头发晕，所以对您说了许多蠢话。我们没有到什么罗马。我使您厌倦，请原谅我！我们现在从罗马再回到汉堡来吧，这儿正派的德国人早就在鸭绒被窝里入睡了。您设想一下，他们枕着鸭绒枕头如此安稳地打着鼾，似乎天堂降到了人间——呼噜——呼噜！成百万的德国人在打鼾！是吗？真可笑！”

她又装出活泼的样子用手托腮，表示正派的德国人好梦方浓。但他明白，她这是竭力掩饰她在他面前流露出来的坦率，纯粹是按女人的方式设法用这种半真半假的笑脸来中断他们俩都很费力的谈话。明白了她的用意后，尽管他思想上还没有转过弯来，但他还是并不轻松地参加了她作为不得已的解围办法而建议的游戏。他抢先一步开玩笑地问：

“您把车从罗马开到汉堡不嫌麻烦吗？你们的海关人员不严格吗？”

“噢，不！”她继续做着游戏，扬声说，“我只要坐在方向盘前，脱掉鞋，……我们就能飞快地通过海关检查，快得让警察害怕！我是什么都不怕的。”

“您真是个勇敢的女性……”

她一时不知如何应答，眉毛痛苦而惊奇地弯了起来。

“我？勇敢？您大错特错了……我是个单身女人，尼基金先生。除了房子、‘本茨’小轿车和三个书店，我没什么可丧失的。可是……”她装出一副恐惧的面孔，“可是我不要任何革命，我不愿失去书店，也不愿失去‘本茨’小轿车。这可是怯弱而不是勇敢，是吗？”

“也许是，”他说。

她急忙说：

“最后一杯，尼基金先生。我想为您和您的妻子干杯。我知道您爱她。您一次没有提起她，这就说明您爱她。”

“为您干杯，赫伯特太太，”他说着，立即因这句无意的双关语^①而不自然地停顿了一下，皱着眉，改口说：“我为您干杯，赫伯特太太。”

可是，她敏锐地抓住了这句双关语，笑着对他说：

“啊，遗憾，我不是您的妻子。让我们为您所热爱的您的正式妻子干杯。她也爱着您。让我们像在你们俄国那样碰杯。我在什么地方读到过，尼基金先生，古代人们碰杯是为了让酒从一个酒杯溅到另一个酒杯里。为什么呢？为了证实里面没有毒药。我的杯子里没有毒药，尼基金先生。我们不必忧伤，是吗？”

“祝您健康，赫伯特太太。”

“谢谢您。我争取活得很长，既能去罗马，又能喝白兰地，既能看一些好书，又能在镜子里愉快地照照自己脸上的皱纹。”

然而，上了汽车，看来赫伯特太太已经受不住费劲的游戏引起的长时间的精神紧张。她在方向盘前坐下，开动马达，慢吞吞地脱掉鞋子，刚要戴上手套，又猛地扯下来，好像要在夹紧的膝盖里暖暖手。她俯身向前，呆呆地看着漆黑的大街，湿闷的秋风从街这头吹到那一头，一个行人也没有，在蓝莹莹的路灯下，空荡荡的柏油马路映照出暗淡的亮光。她轻声说：

“天哪，真冷……”

“您干吗脱掉鞋子？”他责备地说，“穿上吧。用中速行驶也行啊！”

^① 俄语口语中“为您干杯”在此处可能误解成“为了您的缘故”。

“我不知为什么常觉得发冷，尼基金先生，”她全身发抖，眼睛因为哀求和恐惧显得大大的，在苍白的脸上泛出不自然的光芒，“连白兰地都不能使我暖和些，”她顿了一下，又像自言自语地小声说道，“天哪，有时我觉得多么冷啊！……”

“赫伯特太太……爱玛。”他十分爱怜地说，又不知该怎么回答她才好，只觉得铁刺般刺入胸口的那根小弹簧伸直了，切断和抑制了呼吸。突然，他双手捧起她的手，爱玛的那双冰冷纤细的、像孩子般轻得出奇的、顺从地递给他手的手。他朝她手上呵着热气，把它们放在自己的手心里，小心而温柔地搓揉着，茫然不知所措地急忙用一句听来很不自然的高兴而果断的话安慰她：“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您也能像真正的男子汉那样把住方向盘。就像美国西部影片里的英雄一样。一切都会非常好。现在咱们要从罗马回来，可是您还会再回到罗马去的。”

他不好意思地、完全是毫无意义地安慰着她。他意识到，这是毫无意义的，却是他惟一能做到的事。而她转过头来，胆怯地靠着他，咬着嘴唇，望着街上的灯火。一道亮光，像是路灯的反光，在她脸上掠过。

“请原谅我……”

她呜咽了，他突然听到了她十分微弱的压制着的低语声，就像在那个满天星斗的五月之夜，她到顶楼上来看他（那时他被格拉纳图罗夫拘留）时那样。

“瓦吉——姆，”她伸出发抖着的纤细的手指，低下头，很快戴上手套，接着用手套抹了一下脸说：“我没有哭，没哭。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还哭，这有多不好看，多么可笑。我们马上去吧……我要像美国西部影片里的英雄那样开车。我是个勇敢的女人，是吗？要知道，我是个德国女人，是那些半商半贼的航海者的后裔！天哪……”

她透过泪水模糊的眼睛，望了他一眼。

“天哪，我没有力气了。”她又一次绝望地低语道，“让不幸，让灾难再来吧，也让那件事再现吧，让那件事再重演吧……这真是发疯，发疯！可是我却无能为力，请原谅我！……”

她被她的话惊呆了，说不出话来。她也沉默不语，闭上眼睛，后脑勺仰在坐位的靠背上。

第六章

喷气式推进器发出紧张单调的吼声，金属机身在九千公尺寒冷的高空中已经飞行了三刻钟，把像被点点炭火照明的汉堡机场远远留在后面。飞机起飞不久，殷勤可爱的空中小姐端着托盘分送了晚餐。晚饭完毕，分发了格子毛毯。翻阅报纸杂志的沙沙声静下来之后，软椅靠背后仰了，舷窗上打褶的窗帘拉上了，舱顶上珍珠般的半圆形灯罩发着微光。乘客们喝过红葡萄酒和矿泉水，盖上格子毛毯，在现代化推进器强大功率的震动下，在预示大家飞行顺利、安全着陆的正常喧声下，安然打着瞌睡。暖和的机舱里沉静下来了，显得空空荡荡，进入了梦境。

尼基金感到心口剧烈地灼痛，使他紧张得不能入睡。戊酸薄荷脂药片也无济于事，止不了痛。他知道，这是由于四天来紧张的生活，喝了过量的白兰地和浓咖啡，睡眠不足，过分疲劳，以及昨夜与萨姆索诺夫那场差点闹翻的不愉快的、尖锐激烈的谈话的缘故。这场谈话之所以不愉快，还由于萨姆索诺夫摆出一副训入的架势，盛气凌人，想大吵一场，把他们的关系摊开，并用一些缠绕不清的训诫的话语恶毒地刺激他，侮辱他，打击他。萨

姆索诺夫那在房间里扫射的凶狠的目光，那像从罐头里发出来的声音：“你和迪茨曼先生之间有什么共同之处，你讲吧！”这一切都留在他的头脑中。

在机场上他们两人匆匆交谈了几句，没有和解。上飞机后，又发生了一场口角。后来，晚饭时两人都不吭声。饭后，萨姆索诺夫气呼呼地翻阅着画报，翻得光洁的纸页簌簌直响，然后他又把画报插在椅背袋里，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头朝后仰着，生气地皱着眉头，好像睡着了。

舷窗外，一轮火红的巨大的秋月像只火球，静止不动地悬挂在黑暗广漠的寒空中，轮廓分明的明暗面清晰可见。月亮离得很近，发出迷人的光辉，它吸引了尼基金，使他目不转睛。在它的寒光中，在这因为靠近而显得硕大、可望而不可及的星体中，尼基金仿佛觉得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能医治和镇定那使他不忍妄动的心痛。

金属机翼平稳地悬在高空深处，下面，一片银蓝色的云海遮盖着夜茫茫的大地。宁静皎洁的月光，泻进舷窗厚厚的双层玻璃，它的晦暗的光点照射在高空飞行的机身上。尼基金有时觉得这月光好像是透过深紫色的水渗出来的，他仿佛不是飞行在几千公尺的高空，而是在潜水艇里，在大洋深处潜行，被海水紧压得喘不过气来。

他拧开头顶上的通风器，一股凉风吹了进来。

现在，这一切早已留在身后的地面上，被十一月的死沉沉的月光照射下的云块所遮覆。在底下那遥远的地方，举行了告别午宴，和在去机场前一个半小时前来旅馆的韦伯先生、迪茨曼先生互相敬酒致谢，在装满皮箱的轿车旁脱帽、微笑、握手。后来，在机场餐厅，他们带着几分焦急的心情等待班机。机场餐厅宽敞、嘈杂，充满香水和人造革的气味。在那里，他们又喝了洛塔·

蒂特尔要的咖啡和白兰地。赫伯特太太沉默不语，眼圈下显现出疲倦的蓝色阴影，一支接一支地紧张地抽着烟。班机因天气不好推迟十五分钟才能到达。这一意外消息使她苍白的脸上忽然现出又惊又喜的神情。尼基金讲了几句逗趣的话，大意是说在这儿，在这舒适的机场餐厅里，在这些箱子上睡一觉，倒是挺不错的。后来，听到宣布班机到达的广播，坐在桌旁、软椅上、沙发上的旅客骚动起来。大家如释重负，因为一切终于有了头绪，宣布可以上飞机了。现在，他回想起登上飞机的那几秒钟，心情特别难受。

他们喝完咖啡，朝出口处走去，大家都没有流露出分手时的激动心情。在出口处的玻璃门前，那些外表庄重、为事业奔忙的人们，拎着皮包，排成队，准备接受检票。在这儿，人们开始告别。尼基金像原先那样对洛塔·蒂特尔讲了几句友好的风趣话，他把手第一个伸向她。可是她笑着，不同意地说：“不行，不行！尽管我是演员，可我是个妇女！要是我将来去莫斯科，您根据我引起的轰动就能打听出是我来了。”说着，她拥抱了他，紧紧地、出声地吻了他的嘴唇，又吻了萨姆索诺夫。尼基金克制着窘态，转向赫伯特太太，只见她那睁大的蓝眼睛里露出惊恐的神色。她喑哑地喊叫一声，向他扑去，把头埋在他的胸前，她的心像被火灼烧似的非常可怕而又绝望地低声呼唤着：“瓦吉姆！瓦吉一吉一姆！”听到她的低唤声，他简直喘不过气来了。

尼基金出乎意料，惘然不知所措，只是笨拙地吻了吻她的鬓角，克制不住自己刹那间的慌张，从检票员身旁走过去后，又羞愧地回头看了一眼。她身材苗条、挺拔，穿着短风衣，风帽显眼地半搭在后面。这是开始变老的但依然是从前的爱玛。这时，还看见她和使劲挥着手套的洛塔·蒂特尔站在玻璃墙后，在匀净的霓虹灯光下，她那白净的脸上流露出绝望、孤苦无告的痛苦神

态，如同多年前他们离别的那个夜晚一样。

他从远处最后一次向她们两人招手致意，做出不必要的快乐笑容，耳边回响着她那令人心乱的低唤声：“瓦吉姆！瓦吉姆！”然后随同那群匆匆忙忙的旅客一起沿水泥路向飞机走去。机场上的风很大，掀动着人们手里的皮包，卷起人们头上的帽檐。

后来，上了飞机，萨姆索诺夫乱哄哄地忙了一通，然后在软椅上安顿下来，把安全带拉到膝上，带着怀疑的神情打量了尼基金一眼，嘴唇异样地发出噗哧一响，说：

“这次告别真是不错，真是惊人啊！你跟赫伯特太太告别，就像跟妻子或情妇告别一样！她怎么啦？你又怎么啦？当着可敬的人们面前又是拥抱，又是喊叫，又是接吻！这么说来，昨天你是在她那儿过夜啦？”

“你没完没了地尽提些愚蠢透顶的问题，真见你的鬼！”尼基金有点生硬地答着，身子转向舷窗，“亲爱的普拉托沙，你在德国失去了理智。这一点，我必须十分坦率地告诉你！”

“究竟是谁失去了理智，还是个大问号呢！”萨姆索诺夫冒火了，“也许，正好相反吧？完全相反！看来，不是我，倒是我的一个熟人向一帮德国人莫名其妙地胡扯了一通，弄得欣喜若狂，情投意合！不正是我那位大名鼎鼎的同事，跟一位什么赫伯特太太，姑且这么说吧，混得最后失去了理智？到底是谁失去了理智？”

“我顺便说一句，”尼基金冷笑说，“看来，这次我们一起到德国跑了一趟，彻底搞清楚我们的关系，这是值得的。也许，这种关系本来就是一场没有暴露的悲剧。我并不惋惜，这样更干脆，更清楚。”

“总的来说，是这样！”萨姆索诺夫用圣像上蒙难者的目光扫

视了机舱，双手交叉放在腹部，用教训的口吻说：“过些时候，你回想这一切时，会因为我把你从污泥浊水中拉出来而感激我的。我亲爱的，在那里，人们给你大笔的稿费，形形色色的迪茨曼先生围着你转，阿谀奉承你。还有这么一位身份不明的，说得轻一点吧，一位拥有‘本茨’轿车的太太，深夜开车带你逛低级酒馆。你有没有想想，这一切的背后隐藏着什么？”

“我总算到过一些西方国家，我亲爱的，”尼基金突出“我亲爱的”这个嘲弄而傲慢的字眼，加以回敬说，“见过各种不同的世面，普拉托沙。而你活像只骄傲的火鸡，似乎你对整个世界，对各种人物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简直像茶里加辣椒一样，愚蠢可笑！你像拿破仑那样不可一世，自以为是，似乎你周围全是一群蠢货！”

“我亲爱的，我有我的立场。你得知道，我是问心无愧的，绝对地问心无愧！”

“那好，现在我请你在对我的态度上保持坚定的立场：到达莫斯科前你别说话。我们未必能相互谅解。”

萨姆索诺夫搭在肚子上的肥厚的手指叉紧了，接着，两个拇指，一个绕着另一个旋转了几下。他极为愤懑地说：

“可见，你把我看成地道的蠢货！感谢你！告诉你，是我把你从陷得很深的泥坑中，从卑鄙险恶的阴谋勾当中挽救了出来。可你连自己脚下是块什么土地都嗅不出来了！……”

“你挽救了我？从谁那儿？”

“从迪茨曼一伙人那儿！从那个德国女人那儿！难道你真以为，她邀请你参加辩论会，是为了谈情说爱，只是为了多情地看看你，动人地感伤一番？对你媚笑？陪你喝白兰地？这里没有别的用意吗？迪茨曼这个可疑分子不是别有用心地对你那位俊俏的赫伯特太太，对不起，在施加压力吗？他是什么人，你了

解吗？……”

“请你接受我的建议，”尼基金不等听完就冷冷地打断了他的话，“到莫斯科前，我们别再讲话。我累了，很累。即使你是福尔摩斯，梅格莱，普鲁宁少校，代表了他们所有的人，我也没有兴趣加入你的推理。”

“好极了，我们别再讲话。再一次感谢你，因为你说明了我们真诚关系的真相，揭穿了我们的悲剧。你对我的真诚，使我感激涕零。”

“鳄鱼的眼泪。早就该这样收场了，普拉东。”

“哼，瓦吉姆，哼！我没有认清楚你，没有认清楚。”

“真诚的关系？”尼基金思忖着。难堪的沉默像冰块上发黑的裂缝，冒出寒气，使他摆脱了萨姆索诺夫，“这种真诚毁了一切。他想在真诚的掩盖下，贬低我，奚落我，甚至给我加上什么罪名。是什么使我们疏远了呢？干吗我要对他发狠？难道在这儿，在国外，他又克制不住像那次在‘布拉格’饭店所流露出来的令人厌恶的东西了？他嫉妒什么？人家关心我，使他恼火了？他嫉妒赫伯特太太和我的来往？究竟为了什么？为了什么呢？他的真诚实质上倒像对我的仇恨。奇怪，我从来没有做过对他不利的事。那究竟为什么我会这样难受？是因为没完没了的抽烟、喝酒、彻夜不眠……”

在一片月色的夜空中，穿过通风器吹来一丝凉风，使尼基金的头脑清醒了，但心口的疼痛没有平息，隐隐的紧压的痛苦，近似发病时的烦躁，攥紧了他的胸口。烦恼、疲倦、昨夜的失眠，对自己的不满情绪，对萨姆索诺夫的敌意，还有赫伯特太太那心烦意乱、苍白可怜的面容，在最后一刻突然的叫喊：“瓦吉姆，瓦吉姆！”这是当年的爱玛的呼唤声，还有自己那急急忙忙的笨拙的吻别，——这一切引起了病态的心律不齐。为了忘却和排除

使他不安的心痛，他迫使自己去想那令人欣慰的时刻：飞机降落了，轮子轻轻碰着谢连密契耶夫机场的混凝土路，空转着，发动机发出强烈的隆隆声，飞机在地面跑道的信号灯旁滑过。然后，机场上吹拂着故乡温馨的微风，无可比拟的静穆，祖国的语言，检查护照，等取行李，把东西装上一辆咣当作响的旧出租汽车。看到了莫斯科街道上暗淡的灯光，不很耀眼的玻璃橱窗，一张张行人的面孔，电车站上候车的行列，街心广场上交警的身影。在请司机抽了一支外国香烟后和司机交谈，后者好奇地询问外国人的生活状况。最后，和以往一样，还是在那个地方看到一幢坚固的、熟悉的老式住房和破旧的电梯，闻到大门口的气味。在九层楼的房门上习惯地摁两下电铃。前厅的灯亮了，妻子喜气洋洋喊着：“瓦吉姆，你终于回来啦！”她那亲人的嘴唇紧贴在他的似乎还有夹心糖甜味的嘴唇上。她一向不上机场迎送他。从他第一次外出时，他俩就是这样，因此，他的归来，总是使她喜出望外。

“就是不能心急，”尼基金想。有几秒钟工夫他清楚地体验着回家的幸福，耳边仿佛听见妻子的声音，看见她和自己站在整洁的工作室里，屋里已经添了一些新东西（他不在家时买的一只台灯和一个小塑像）。放杂志的茶几上放着一叠报纸、一堆印刷品、一叠信件，全都给他放得整整齐齐。信上有张便笺，上面写着一些人名，谁找过他，谁来过电话，谁问起过他、等过他。“不，我不该想家。不然时间会长得无法忍受。我太想念妻子、想念写字桌啦。因此，我不该想这些。等我坐上出租汽车，从机场来到公路上，到那时候再……只有几天工夫。我提前回来了……可是为什么我觉得离家很久很久了呢？为什么我现在有这个感觉呢？好像离别家园，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度过了一生似的。当我们飞往德国时，我脑子里萦绕着一句话。一句什么话？他，我

作品中的主人公，梦到童年时代。他浑身虚弱无力，或是受了伤，躺在后院的砖瓦堆上。她向他俯下身去，把他的头搁在自己的膝盖上。他爱上了那个少女，他们住在一个院子里。

“可是那句话，那句话……是句什么话呢？我忘了。别去想它，别去伤脑筋了。那句话会自然而然想起来的。等到想起来……其实也许不需要了。此刻，什么话我都不需要。那些话把我弄得太疲劳了。多么可怜、多么可怕的呼唤：‘瓦吉姆，瓦吉姆！……’她是怎样把头埋在我的胸口啊！我无言相对。我只是莫名其妙地嘟哝着，莫名其妙地吻了吻她……在餐厅时，她控制着自己。可后来这叫唤声，这绝望的呼声。她好像有什么事恳求我。罗马，罗马……为什么她这么喜欢罗马？纳沃纳广场……我是什么时候到罗马去的？是前年了。也是参加一次讨论会。讨论什么？我在那儿待了大约一星期吧。为什么她这样喜欢罗马？”在飞机的单调的机械喧声中，他陷入沉思，望着皓月，望着在浩瀚沉寂的夜空顺着机翼飞驰的茫茫月色。这一切在他心中唤起一种没有了却的、若有所失的怅惘之感，这使他痛苦，也使他感到不解，“为什么她喜欢的是罗马，而不是巴黎呢？”

他竭力回忆罗马的情景。本来似乎已被他遗忘了的罗马，此刻忽然仿佛就在眼前，一切细节都那么逼真。他对自己能这么清楚地记得这个城市感到十分惊讶。那是四月，太阳很热，到处是古老的意大利松和椰子林，一派南方疗养地的风光。街头的玻璃窗上阳光耀眼，一幢幢白房子，阳台上的帆布篷，窗上打褶的窗帘。半坍塌的巨石砌成的古罗马大圆形竞技场，永恒宏伟的圣彼得大教堂，神秘的梵蒂冈的界墙，以及宽阔的广场。广场上停满了闪闪发亮的——本身似乎就是文明标志的——各国旅游者的轿车、客车以及仿佛回到好几个世纪前的双轮马车。

广场上飘散着刺鼻的汽油味,混杂着在此地还算好闻的马汗和马粪气味。一些快活的、脸膛晒得黝黑的马车夫招揽着旅游者,大大咧咧地用小铲子打扫着广场。身穿黑色、白色长袍的修女,面孔瘦削苍白,坐在由熟练的司机恭恭敬敬、稳稳当当地驾驶的摩托车上。男女莫辨的嬉皮士,披着垂到肩胛的长发,脖颈污黑,在阳光灿烂的西班牙广场的台阶上,有的拙劣地弹着吉他,有的一对对坐在宽护墙上接吻。三五成群的旅游者站在总是很凉爽的特列维喷水池旁休憩。碧绿清澈的池水中,投掷在水底的银光闪闪的硬币清晰可见。这是静穆宜人的纳沃纳广场。这是罗马的蒙马特区^①,出售图画和画稿的画家的画架上栖息着鸽子。周围一群孩童沿着石板路追逐一只画着棋盘形图案的足球。小贩在叫卖彩色气球。不知谁放的一只蓝气球孤零零地飘向布满金色彩霞的广场上空。这儿呈现出一派昔日宁静和幸福的气氛。戈尔塞商业大街上车水马龙,百货公司和奢华的小型商店的橱窗耀眼发亮,人行道上行人熙熙攘攘,有戴大框墨镜的,有穿短裤的,从女人敞开的轻便大衣里露出紧裹大腿的肉色连袜裤。条纹的帆布篷下放着咖啡馆的小餐桌。每天上午店主人站在小梯上擦洗餐馆的玻璃。就在这个罗马城,有条亚庇乌斯大道^②,一半是石子路面,一半是柏油路面。在这条大道上,曾经响起过西庇阿^③的大军的木底鞋的步伐声。沿路有被毁的建筑物,石围墙的断垣,城门的残迹,耸立在古罗马气势雄伟的古老土地上嶙峋的巨石。大道旁的绿草上,意大利松树荫下,

① 蒙马特是巴黎的一个区,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十八日巴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军队进行决战的地方。结果劳动人民取得了胜利,并随即宣布成立巴黎公社。

② 亚庇乌斯大道,从罗马向南长达三五〇英里的大路,筑于古罗马时期。

③ 西庇阿,古罗马统帅。

停着“菲亚特”轿车和白色的儿童车。一些漂亮的青年男女，身穿游泳衣，坐在折叠式的小椅子上，摆出一副假日休息的姿态。在喧嚣不息的市中心，电车的轰响声，摩托车发出的连珠炮似的哒哒声，连在巴黎都见不到的、几乎无人指挥的无秩序的狂乱的交通，空气中烟雾般的废气，停在人行道两旁的汽车长龙，而在这条狭窄的长廊中间，则有一条切不断的汽车洪流，一会儿刹住，一会儿又突然急速向前开动，不耐烦地呼呼直响。汽车里陌生的年轻人，上年纪的人，有的急于到哪里去，有的在交谈，有的在说笑，有的默不作声，停车时有的在接吻。好像是被惊动的蚁冢里的蚂蚁，顺着自己的蚂蚁的交通动脉想出调动的方法，好像按照指定的、不可思议的计划，绕着一个封闭的圈子，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地奔跑。在那年的春天里，这座不可思议的都市，到处令人眼花缭乱，目迷五色，轰鸣嘈杂，震耳欲聋。只是偶尔在身旁出现古迹时，才像瞬息间吹来一阵凉风，令人略感安宁。

“为什么她喜欢罗马？她不是说过，她在罗马心情总是很舒畅吗？是不是纳沃纳广场在这人间地狱中保存着一个僻静的孤岛？”

尼基金对这座过度喧闹、充斥着旅游者的都市很不适应。他，一个俄国人，只身寄寓在西班牙广场附近的一所旅馆里。那里面有一架小小的家用电梯，每上下一次，得花三个里拉。卧室朝南的一面，惹人注目地摆着几张古色古香的天鹅绒安乐椅。窗外是个宽敞的可晒日光浴的阳台，上面有遮阳的蔓藤和一顶大伞。每天清晨，他总是被摩托车剧烈的哒哒声吵醒，就坐在这把伞下吃早饭。早餐有冰黄油、松脆的小白面包、果酱，还有金属咖啡壶里保温的咖啡在清晨的空气中散发着香味。他一面进早餐，一面喂鸽子，望望对面某机关的窗口——那儿有的人坐在桌旁打字，有的人在干着什么事，再眺望远处大教堂的圆顶和罗

马全景的轮廓,这一切在已经炎热的蓝空中微微颤动。下面
是被阳台挡住视线的、还很凉爽的窄长的马路,但成群的汽车早已
闹哄哄的。还没下楼,就仿佛感到人群的拥挤,闻到汽车在窄街
上接连不断地排出的废气的臭味,汽车窗玻璃上耀眼的反光,广
场在旋转,汽车、行人都在乱转。在那条烈日曝晒下的石子马路
上没法抽烟,汽油味堵住了喉咙,令人呼吸不畅,刚穿上的衬衫
不消半小时领子就给汗水湿透,粘在脖子上(到傍晚,领子已经
完全发黑,只得另换衬衫),领带勒得使人难受;头脑发胀,好像
《启示录》^① 中的炎热、喧嚣的车声、熙熙攘攘的人群、夺目的光
芒,很快就使人感觉迟钝,随之而来的是疲劳,对这座永恒之城的
绮丽风光失去兴趣,想坐在浓荫下喝点冰啤酒,一种淡漠而疏
懒的倦意潜人脑际。“何苦呢?这个五光十色的、疯狂的蚂蚁窝
有什么意思?它有没有个限度?哪儿是它的尽头?再往后会变
成什么样子呢?”

虽说纽约人口稠密(三年前的冬天,他到过那儿),它那足以
向人炫耀的豪华的摩天大楼“中心区”以及交易所的大理石和青
铜饰物,它那湮没在霓虹灯广告中的发疯似的纸醉金迷的百老
汇,令人吃惊;或者说巴黎,这座充斥着乱哄哄的旅游者和密密
麻麻的汽车的都市,就连这两座城市也都不像这座受阳光熔炼
的永恒之城的混乱情景那样,使他感到压抑。

“她为什么喜欢罗马?她说过,在那儿她身心愉快、轻
松……”

在罗马的那些日子里,尼基金没有怀念莫斯科,没有怀念它
那华灯初上的温和的夏天傍晚(他很喜欢这个情景),灯光沿着
街道两旁一直伸展到晚霞映红的天边;也没有怀念莫斯科冬天

^① 《圣经·新约》中的最末一部

的清晨和那刚被暴风雪吹积成的一个个圆锥形雪堆的晶莹的雪景。他怀念的完全是另一件事，——几年前他突然起了思乡之念，转乘了几次飞机，经过比去美国还远的路程，回到他出生和在五岁以前居住过的那些地方，在这次旅行之后，这件事就开始使他苦恼。

在罗马的小旅馆里，早上，当他对着大镜子刮脸，镜子里映照出白色的开关、消过毒的白瓷盥洗盆和锃亮的镀铬龙头；还有，当他躺在浴缸里，微风从打开的窗口吹进来，他凝视着洁白的瓷砖墙上摇曳不定的斑斑光点，这时，他便激动地回忆起西伯利亚的九月阳光和煦的一日……

他那时垂首俯瞰，宽阔的通古斯卡河水光潋潋，蜿蜒地穿过一望无际的棕褐色的原始森林。太阳经过湖泊上空，照得湖泊和河湾一片通红，像几面反光镜向上喷射出万道金光，好像从地面上把五彩缤纷的光点投射在这架仅有十二个座位的、像汽炉一样吱嘎作响的客机的舷窗上。飞机不时急转弯，侧飞，使乘客时时发愣。他们如临深渊，一会儿悬在通古斯卡河明镜般的河湾上，一会儿悬在原始森林中一块块像玻璃草地似的湖面上。后来，为了抽支烟（照飞行员的说法）终于降落十分钟的时候，他为那难以言状的寂静所震惊。田野上醉人的微风轻轻拂过，送来阵阵干草的芬芳——杂草丛生的机场尽头堆着干草垛。近处的河流泛着亮光，水上有几座幽静的小房，这完全是一派被遗忘的、宁静的田园风光，使他回想起童年，回想起那很久以前泡影似的梦境的世界。

这空气充足的原始的寂静使他惊讶，使他茫然。童年时代村镇给他的最初印象打动他的心灵。他仿佛不止一次闻到盛夏季节从小径飘来的热烘烘的草香，看到严寒的清晨堆到窗口的白糖似的积雪。以前，他把自己出生的小镇几乎看成是通古斯

卡河旁的一座小城市,如今真正呈现在眼前的却是被原始森林挤到河边尽头、房子旁边铺着木板路面的小小的、令人惬意的、不知为什么带点伤感情调的农村。但是,尼基金记忆犹新的是(不仅在罗马时)一个夜晚。他结识了一个从伊尔库茨克来这儿探亲的青年大学生。他们在一位七十高龄的老人马特维·鲁基契的陪同下,步行了十来公里,到原始森林去捕猎大雷鸟(老人和曾在这儿当过教师的尼基金的父亲相识)。他们跋涉在荒凉的沼泽地和土墩间,累得筋疲力尽。黄昏时分,他们露宿在通古斯卡河的支流乌木特卡河畔。那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狭窄的小河,流经冷杉林附近一片茂密的金黄色草地。深秋,异常沉寂的原始森林中偶尔只有几只山雀的啁啾声划破大自然的宁静。

他深夜醒来,浑身打着寒颤。他躺在堆在树根旁的松枝上,透过冷杉的桎杈,倏然看见头顶上一片黑茫茫辽阔的星空。秋末冬初的星座,闪着晶莹如冰霜的光芒,高悬空中,宏大,明亮。在这原始森林上空,星星闪烁着的光芒强烈刺眼,转瞬间他更觉凉意透骨。身旁的篝火噼啪作响,渐渐熄灭,他闻到一股寒冷的泥土味和暖烘烘、刺鼻的烟火味。他一动不动地躺着,望着令人发冷的直刺眼帘的晶亮的群星,望着九月广袤的星空,从那儿正传出无穷的声息。他仰卧着,目不转睛地仰望着群星,仿佛自己在静穆的宇宙中缓缓地飘浮着,仿佛被永恒的幸福,被神秘的、捉弄人的宇宙迷住了。它向他隐秘地打开那不可企及的永恒的大门。后来从天上传来另外一种依稀可辨的声音,那是人世间的奇异的声音,尘世苦难的声音,这苦难同永恒的不能消灭的、宁静的美迥然不同。

在被寒风扫清了的高空,雁群啼叫着向南飞去。它们被雅库特地区湖面上强劲的寒潮和风雪驱往南方。尼基金突然感到苍穹下北极地带的可怕的酷寒,感到在群星照耀的茫茫黑夜中,

从地面上看不到的疲倦的雁群在尽最后的力气飞行。在它们下面，一堆孤零零的篝火，就像几颗极其微弱的火星闪烁了几下，便消失在黑沉沉的夜幕中。他羡慕雁群的不畏黑暗和不怕路途遥远的百折不挠的天性。

接着，他想象，在离这堆篝火的余烬，离这无垠的黑茫茫的空间中的星星之火数千公里以外非常遥远的地方，就是那个文明世界。那儿有天堂般灯火辉煌的马路，有暖气设备的舒适的住宅，有洁净舒服的床铺，有瓷砖浴缸、香皂、刮脸用具，有快速电梯，有台灯和心爱的书籍。他一想到自己很快就要回到那儿去，就在夜色朦胧的寒冷中颤抖着，一面瑟缩着一面在微笑，他觉得自己是个无拘无束的快活的自由人，因为自己有权回到那儿去。现在，他躺在星光下孤独的乌木特卡河畔的篝火旁，怀着对自己出生地的兴趣来到这个天涯海角。这是怎么一回事？是一种难以言传的乐趣？因为他享受到现实把他和神秘美好而又充满苦难的永恒世界联结起来的瞬息欢乐？由于他有可能回到那成为生活必需的、干净、井井有条、舒适的城市里去？

……马特维·鲁基契站起来，在篝火旁忙碌着，把木头放到火里。篝火冒出一股难闻的烟火味，哗哗剥剥地烧得更旺，火星四溅，像一片淡红的灰尘掠过黑魆魆的松树梢，飞向被火光映得一片通红的黑暗的天空。尼基金听见大学生在树枝上翻身，深深吸了一口气，在嘟嘟哝哝地自言自语：

“多好啊，上帝，多好啊！……”他坐起来，怀着青年人的激动问道：“您真的常常一个人去阿米岗爷爷岭打猎吗？怎么样啊？有收获吗？”

“逮熊吗？”马特维·鲁基契被烟呛得直咳嗽，吐了几口唾沫回答说，一面又拨弄着篝火里的木头，“我常去打猎。只要带两条衬裤和一只放衣服的篮子就可去猎熊了。”

尼基金躺着听他们两人聊天。

“您是开玩笑吧？这不很危险吗？”大学生说。

“逮熊可不简单呐。要是一枪打不中，或者只是打伤了它，那它可要收拾你了。就是子弹打穿了它，内脏烧伤了，它还能活。要是打它的头，子弹就像打在铁板上一样，会弹回来或是滑掉。它那脑袋就像混凝土。受了伤的熊发起狂来，一下就能追上你，快得像特别快车。得往它的左肩胛骨下打，还得带几条猎狗。没有猎狗，不能逮熊。两个朋友顶不上一条狗。这当口儿一条狗比两个朋友还可靠呢。”

“要是熊……人不好躲到树后面吗？”

“可以是，但没有用。”马特维·鲁基契笑起来了，仍然拨弄着烧旺的篝火，“不管你像虾一样蜷缩到树后面，还是撒腿就跑，它用一只爪子伸到树后面一抓，就会把你的头皮都剥下来。要是你开了第一枪而没有撂到阿米岗熊，那就挺住，别后退，尽管你两腿发抖，尽管你吓得屁滚尿流，只要你有一点儿害怕，它马上就看得出来，就会疯狂地向你扑来。它报复起来非同一般的野兽。”

“那么狗呢？马特维·鲁基契，您不是说过狗能找到熊窝吗？”

“狗在刚下过雪的雪地上能找到熊窝。刚下过雪，熊窝上会冒水气，看得清清楚楚。九月是熊长膘的时候，这时它吃果子和核桃，开始筑窝，为了过冬它要把屁股塞起来。它先喝水，啃泥巴，来清洗肠胃。后来，一面长膘，一面用泥巴在肚子里做个塞子。这样，熊冬眠时随便什么小虫子、小蚂蚁都爬不进肚里去。”

“这有多新鲜哪！”

“狗呐，一找到熊窝就叫起来。只要狗一叫，就得把钩叉和铁条准备好。”

“干吗？什么钩叉？”

“钩叉，我告诉你，瞧，你看见篝火里的树干吗？有这么粗……那铁条有杯口这么粗。钩叉准备好了，捅进熊窝的洞口，熊马上就出现了。钩叉要捅得准，要不，熊就会把钩叉搭走。”

“什么‘搭走’？”

“它会把钩叉拉过去。”

“那后来怎么办？”

“熊就吼起来啦。紧接着钩叉，你就把铁条捅进去，把洞口捣烂。熊就爬到堵住洞口的石子土堆上。当它的左肩胛刚朝你一露，你就马上开枪，端枪就放。如果你只是把它打伤，这下你的末日来临了。这时，狗就派用处了。熊一出洞，狗就咬住它腿上的毛，也就是扯它的腿。不用两个朋友，只要一条狗。没有狗，没法猎熊。”

大学生沉默了片刻，思考着什么。接着，仍旧带着青年人天真激动的神情问道：

“天黑时您说过，您看到这里熊和驼鹿的足迹，是吗？”

“对。看到过。”马特维·鲁基契庄重地说，“熊跟在鹿后面，守候着，想咬死它。熊爱吃鹿，一只鹿够它吃三个星期。它先吃一点，把剩下的埋在土里，让肉变质，有点发臭，它吃起来更有味。熊离开了这儿，它的足迹却留下来了。这儿有鹿，到处有它们睡过的痕迹，草也给压平了，鹿常在河边咬杞柳的枝梢。眼下鹿到处奔跑，正是它的发情季节。”

“什么叫发情？”大学生好奇地问。

“找雌的。就是找女的……喂，小伙子，我们喝点茶吧？冻坏了吧？”马特维·鲁基契说着，摸摸搁在火上的茶壶，“深夜一杯茶，胜似好朋友。”

树下的篝火添了柴，烧得很旺，烧着的树干不断发出噼噼啪

啪的爆裂声，烧得周围热烘烘的。尼基金没有加入谈话，暗自怀着欣赏的心情聆听着。他们坐在篝火旁，一本正经喝着杯里的热茶。橙红色的火星飞旋上升，又洒落下来，消失在黑暗里。黑沉沉的夜幕外，陡岸下面，就是那条静静流动的清澈的乌木特卡河（白昼，可以看见在碧清的水底摇曳漂浮的水草）。对岸远处，是一片原始森林、密林里的沼地、蔓草丛生的湖泊、还有狗熊和鹿。河这边近处，一片通红的火光在闪耀，在飞舞。在寒气袭人的夜幕前，两只莱卡狗躺在地上，那机灵、平静的黄眼睛注视着火堆，头搁在伸出的爪子上，好像躺在广漠的黑暗和篝火的交界处，在守卫着星空和原始森林之间的这堆火光。

这深沉的夜、这飞向星空的烈焰中的星火，这长空中雁群的啼声，这眼睛直视前方的机灵的猎狗，这篝火旁大学生的嘟哝声：“多好啊，上帝，多好啊……”这一切，在这一瞬间是多么美好，多么永恒，多么真实，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与它比拟。

尼基金第二次醒来，天气更冷。篝火冒着烟，不时发出微弱的爆裂声。马特维·鲁基契和大学生已经睡着了。星座低低地垂挂着，它那渐渐暗淡下去的队形移动了一下，消失在灰空中现在依稀可辨的下垂的松树顶梢背后。只有几颗大星在天幕上依然灿然发光，像拂晓前的一道白光在树枝间穿过。篝火四周，湿草上浓重的水雾冉冉上升。

突然，两只莱卡狗一跃而起，像石头似的凝然不动，两眼直视灌木丛。马特维·鲁基契刹那间也像得了什么信号似地一跃而起，敞着棉袄，抓起靠在冷杉树干上的卡宾枪，抬起头，顺着岸边的土墩走了十来步。尼基金也盯着，一下还没有看清。在半截被晨雾笼罩的松树枝头上，一只浅褐色的松鼠快活地在奔跑，接着，它那金黄色的尾巴在树梢头一闪，抖了一下，不见了。马特维·鲁基契不慌不忙端起卡宾枪，很快瞄准好，一枪打了出去。

尼基金的耳边嗡嗡作响,心想:“没有打中。”忽然一个黑糊糊的小东西从上面滑了下来,晃动了树枝,掉落在灌木丛的树根上。不一会儿,马特维·鲁基契回到篝火旁,手里提着死松鼠的后腿,让一条狗嗅了嗅,舔舔血。另一条狗,看样子比较幼小。主人没有把猎获物给它。它便伸出尖长的嘴脸,总算从老狗嘴上舔了点血。两条狗安静下来,重又躺下。马特维·鲁基契坐在一棵放倒的白桦树干上,拉出折叠式小刀(昨天他用来切面包的),把死松鼠放在膝头上(鲜血从松鼠的头部滴在地上),从爪子底部切开一个口子,很容易地、像脱袜子似地把皮剥了下来,挂到白桦树上,蓬松的尾巴朝下。他膝上放着剥了皮的粉红色的松鼠,就像被屠杀的婴儿的尸体,双膝蜷缩,小脑袋鲜血淋漓。这一切好像一场骇人的屠杀,尼基金甚至全身筋肉都收紧了。

“打死了? 雌的还是雄的?”被枪声惊醒的大学生懵懵懂懂地猜想刚才发生的事情。

“男的。”

马特维·鲁基契走近两条狗,把不久前还是非常漂亮的、刚被杀死的小生命的可怜的粉红色的身体放在跃起的老狗面前。莱卡狗嗅了嗅,把血淋淋的头咬到嘴里,吱咯吱咯地咀嚼着。它毫不在乎地吃着,显得懒洋洋的,有点厌烦。小狗听到均匀的咀嚼声,斜过眼来看了一眼,但立即不感兴趣似地扭过头去。看来,它明白猎获物没有它的份。不多久,咀嚼声停了,老狗咂咂嘴,悠闲地瞅瞅马特维·鲁基契,摇摇尾巴,蜷缩在篝火旁边。就在这一瞬间,小狗跳起来,转脸对着薄雾笼罩下发白的密林,挺直身子,竖起了耳朵。老狗半睁着机灵的黄眼,依然蜷缩着。马特维·鲁基契又拿起卡宾枪,低声说:

“还有一只在跑呢。它在等太阳出来呢。松鼠喜欢在日出前嬉戏。”

他朝密林走去，毫无声息地绕过枯黄的松针落叶。

过了一会儿，听到一声枪响。他又拎着一只烟灰色死松鼠的后腿，回到篝火旁，它的沾满露水的蓬松的尾巴在草上拖着。这一回，他把死松鼠给小狗嗅嗅。老狗不乐意地抬抬身子，打了个呵欠，满不在乎地走开了。

马特维·鲁基契坐在倒下的白桦树上，久久地像等待着什么，用那粗糙的手掌摸了摸打死的小动物的脊背。

“还在抽动呢，还活着呢，”他似乎有点内疚地说。过了一会儿他才把它剥皮开膛，把皮挂在第一只的旁边。

“也是男的？”受惊的大学生不由地学着马特维·鲁基契的土话问。“您的枪法真棒！”

“不是男的，是女的。还是一对儿呢，丈夫和老婆。”

马特维·鲁基契站起来，打了一个唿哨，把松鼠扔给小狗。小狗伸出尖鼻子，仔细嗅嗅松鼠那样子难看的、红红的身子，就是不吃。马特维·鲁基契说：

“这条狗还小。来林子前一天没有喂过东西，它还是不吃。”

于是，他把松鼠放在老狗面前。老狗慢慢吞吞地牵动着下颚，依然小心地发出那样厌恶的咀嚼声，终于啃完了。

四周是深秋湿润的晨曦，晓雾从灌木丛伸展到乌木特卡河畔，弥漫在渐渐明亮的凛冽的水面上，宛如一缕缕白色纤维在潮润的密林中冒着水气，摇曳着。密林中冷杉树顶和倒卧的白桦树干上笼罩着静静的、朦胧的血红色的金光。两张翻转的小松鼠皮就挂在白桦树上。这两只被害的小动物，原是两个多么快乐、正嬉戏着等待日出的可爱的小生命啊！

“为什么这些情景我还记得如此清楚？为什么在罗马时我会想起原始森林的夜晚，而在原始森林中又想起莫斯科呢？我想找到真理，但为什么只有一瞬间体验到了真理？那一刻，我体

验到了星空下迷人的夜晚、篝火、寒冷、人们简朴的生活。但是，总还有什么不能使我满足。是不是我想在自己和那位大学生的兴奋中，在飞越长空的雁啼声中，在马特维·鲁基契打死的两只美丽的松鼠（一对夫妻）身上，去探求现实生活的全部意义？马特维·鲁基契扼杀、破坏了美好世界的平衡，就像是他扼杀了那个夜晚，扑灭水上的寒气和篝火，熄灭了星星，烧掉了原始森林一样，因为他扼杀了大地伟大而又脆弱的和谐统一。在战争年代我会这样思考问题吗？

“是的，在他朝松鼠开枪的这一瞬间包含了生活的某种意义。但这只是一瞬间的，而不是生活的全部意义。生活的全部意义在哪里呢？就在群星闪烁的夜空下的原始森林里吗？那为什么我又怀念莫斯科，怀念它那舒适的生活、辉煌的灯火、洁净的被褥和热水浴呢？要知道那个夜晚才是真正的享受。我只享受了一瞬间？只有几小时吗？

“怎么办，哪儿也找不到完整的答案。对人人都是完全可靠、无所不包的真理是不存在的。她喜欢罗马，而罗马却使我感到压抑和厌倦。和爱玛的相逢究竟有什么意义呢？对她、对我来说都很痛苦的谈话，又有什么意义呢？啊，我这是在想些什么？我们飞了多久了？心口怎么这样痛？戊酸薄荷脂……要服第二片戊酸薄荷脂。我撑不住了，等飞到家，我的病也就发作了，要躺倒啦……”

尼基金用嘴急促地呼了口气，紧锁双眉，用手按摩心的四周。心律不齐的心脏加快了跳动。

发动机发出均匀的轰鸣声。在推进器的声响和机舱顶朦胧的浅蓝灯光的催眠下，整个座舱沉睡了。左边的萨姆索诺夫双手交叉在胸前，头后仰着，打着瞌睡。肉乎乎的脸紧绷着，满脸痛苦愠怒的样子。尼基金取出一片戊酸薄荷脂，第一次想，从萨

姆索诺夫瞌睡的脸上,大概可以揣摩出萨姆索诺夫童年的模样:一个胖乎乎、矮敦敦的男孩,因为受了同班同学的欺侮而怒容满面……

“我们之间发生的这一切毫无意义。”尼基金脑际冒出这个想法。“毫无意义,尽管我们未必能保持从前的关系。难道我就不能克制自己,不能谅解别人?奇怪,我们相识这么多年了……要是能明确知道,我们的生活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就好了!是罗马重要?是原始森林里的那个夜晚和清晨重要?还是汉堡重要?和爱玛的相逢重要不重要呢?和萨姆索诺夫的那场争吵呢?战后二十一年中的一切都是重要的,同时又都是不重要的。因为人的一生都是寄希望于未来。生活的实质就在生活本身之中,它毫不迟疑,毫不停顿,以闪电般的速度奔向不可知的、幸福的‘后来’。岁月流逝,日月如梭,毋需去思考在流逝的岁月中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后来’终于到来了:大学毕业、结婚、功成、名就。为什么近五年来我考虑起这些问题来了?我开始问自己,我是否幸福。我在自己的所作所为中,在别人的谈话中,在飞雪中,在潺潺的流水中,在原始森林里那忽然向我打开了永恒世界大门的星空下,探索着生活的意义……发生了什么事?是意识到‘后来’已经来临?明白自己的年龄不小了?

“她为什么问我幸福不幸福?还有她那最后的呼喊声:‘瓦吉姆!瓦吉姆!……’看来,二十六年来她一直爱着我——她生活的意义就在于期待,就在不切实际的希望之中吗?我不断地探索生活的实质,面总是不能满足。我向自己提出关于真理的两重性问题(从前,这些真理的标志是多么简单明确!……),关于生活本身不能成为尽善尽美的矛盾性问题。有时,我只要看到恶意的目光、凶狠的面孔,看到人和人之间相互贬低、冷酷无

情,我对那些丧失了善良、仁爱的人便会产生一种憎恶感。但是,当时只要偶然遇到同情的目光,听到悦耳的话语和亲切的语调,我的憎恶感便会立即消失,立即会对所有的人产生怜悯心。例如,对人家的啼哭着的婴孩啦,对街上年轻而难看的陌生女人啦,对每一个过路人,特别是对我的妻子,只要一想起儿子死后她和我的悲痛便会怜悯她。不,这不只是对妻子的爱情,这是比爱情更深得多的相依为命的感情,是心心相印,再没有比这更高尚的感情了。什么时候我产生了这种想法?什么时候对真理产生了动摇?是儿子死后吗?”

这是在埋葬了儿子两个月以后的事。他们离家来到别墅,免得在家看到能引起对伊戈尔的思念的一切,想起他那快乐的尖叫声、他那结实的小脚在地毯上走动的脚步声、他那叽叽喳喳的孩子的笑语声,仿佛他还活在这冷冷清清的房间里——在轻轻拂动的窗帘里,在他的小桌上的糊墙纸里,在照射着已经不需要的、收集起来的玩具的阳光里。他在别墅里总是工作到极度疲乏,头晕作呕。夜晚,他经常在郊外田野的小路上久久地徘徊,用长时间的散步来驱散自己老一套的思索。

有一次,他走得精疲力尽,直到夜里十一点多才回去。他从低洼地向上走到空旷的路上,朝前方闪烁的灯光走去。他感到气急,只得放慢脚步,好像有什么东西妨碍着他,拖住他……他战栗了一下,突然几乎是身体上感受到有人的凝视的目光死盯着他的背部。他屏住呼吸,迅速回头一看。后面是一片深沉的茫茫黑夜,看不见一点星火,听不到一点声响,没有一丝动静,也没有一个人影。

他说服自己,这不可能是真实的,这只是由于工作时间过长、用脑过度所致。他好像看到救星似的,艰难地从低洼地向灯

光走去。同时，仿佛又有一股莫名其妙的力量把他往后推去，抓住他的肩膀，拦住他。一股致命的寒气穿进他的后脑勺，引起无限的凄凉和孤独，像要撕裂他的心脏似的。

他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许，有什么东西在向他作某种预示？或是因为他竟然从黑暗中挣脱出来，向前方别墅黯淡的灯光走去，这使厄运本身感到遗憾？还是可能有个看不见的人在召唤他？

他总算走到了别墅。他生怕木板楼梯的吱嘎声会吵醒妻子，他上了楼，走进自己的工作室，开了电灯，仍然惊魂未定。他抽着烟，从房间的一头走到另一头，感到凝滞的漆黑中一直有一道活生生的、注视的目光，像人的视线一样，牢牢地盯着他的后背。

他通宵无法入睡，开着灯，在沙发上翻来覆去。他几次起来又来回踱着，走到朝着漆黑的花园微开的窗口，在凉快的地方透透气，服一点缬草酊滴剂，重又躺下。他想起一个认识的老画家在他丧子后对他说的话，感到喉头有团东西塞住了。那画家说：“我们死后，我们会面对面地走来走去，从活人旁边走过，只是永远不会和他们相遇，认不出他们，也看不见他们。因为我们走在另一条时间的正弦曲线上。”

他想起老画家的这些话，眯起眼睛，还感觉到刚才从低洼地向上走时，那背后捕捉不到的目光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威胁。他想到自己和妻子依然健康地活在人间，但是失去儿子已经两个月了。儿子在那一边，穿着白袜子，叽叽喳喳地叫着，柔软的亚麻色头发有股好闻的味道，一个人孤零零地走进阴冷黑暗的永恒世界，走到另一条时间的正弦曲线上，老是从父母身旁走过，但永远不会和他们相遇。那天夜里，他哭了。他忘不了二月严寒的一天，他的嘴唇吻着儿子冰凉的三角形的小嘴；忘不了那没

有合上的睫毛透出的浅蓝色眼睛的光泽，不久前那双眼睛还是那么明亮、快活，充满了童稚的喜悦……

“那时，我失去了一半生命。是不是就在那时，真理的可靠性丧失了？”

第二天，他因为失眠极度疲倦，头疼心痛。他下楼来到空气清新、阳光和煦、半边背阴的凉台上。妻子睡眠惺忪，头发系在背后，默默地在准备早餐（这件不幸的事发生之后，她变得沉默寡言了）。他像平时一样在她的唇边吻了一下，说了声：“早安……”比平时更长久地把手放在她的肩上，忽然看见妻子抬起的脸上，一闪而过的惊恐，好像在问：“你没有睡好？又失眠了？你怎么啦，怎么啦？”她问他：

“你身体怎么样？”

“一切都正常。”他按平时习惯的说法，抢先回答说，但显然很不自然。为了不再撒谎，回避那些使人激动的问题，避开妻子专注探询的目光，他走下台阶，来到花园。这时正是四月，和煦的阳光透过稀疏娇嫩的绿荫，照得花园暖洋洋的。他信步在草上，在沾满晨露的苹果树下走去，在树叶嫩绿的白桦树旁小立。几只椋鸟在清晨明净的天空中送来几声甜蜜的婉啼——“啾一啾一啾”，宛如在清澈的水面掠过的涟漪。连在春天早晨这样宁静的喜悦也没有能慰藉他，散步未能驱散他的哀思。后来，早饭时，妻子的沉默不安使他难受，他便又出乎自己意外地哄骗她说，为了保持当时的情绪，他工作了一个通宵。说后他又觉得后悔。

她猜到了，说：

“瓦吉姆，你在骗我吧？我去过工作室。你一行也没有写。我知道你想什么了。”

“是啊，”他脸色阴沉地说，“我再也不能……要不，我们最好到哪儿待上三个月？把一切丢在脑后，一走了之……”

她替他倒咖啡，没有倒完，不知怎么无力地把咖啡壶掉在托盘上。她颓然倒在藤椅里，转过脸去，哭了。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没有了他，一切都完了。”

“丽达！”他说，“我们要经受得住……我们俩。”

“是的，是的，我们要经受住。”她说，用餐巾掩住鼻子。“可是，怎么经受住，怎么经受住呢？我现在什么都怕。自从他死了以后，我变得害怕一切。我怕孤独，一种前途茫茫的感觉使我感到恐惧。你不在家时，深夜里的电话铃声都使我害怕。我总是提心吊胆。原谅我，我不知道我会成什么样，但现在我为你担心。你废寝忘食地工作。我求你，别抽烟了。要不，就少抽点……你的头发开始花白了，两鬓几乎全白了。”

“我的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他重复说，“像我这个年龄，很多人头发都白了。”

她用餐巾擦了擦鼻子，替他倒满了咖啡，轻轻地把泪湿的脸颊偎着他的鬓发，轻轻地说：

“我怀伊戈尔的时候，总是爱看漂亮的妇女。我希望他长得漂亮，有一双和你一模一样的眼睛。他的眼睛果然是和你的一模一样。瓦吉姆，为什么我们受到这样的惩罚？我们难道对谁做过坏事？为什么命运偏偏选中了我们？”

“丽达，”他说，“我们越讲这些，就越难受。”

她同意地点点头。

“是啊。我要你现在别再工作，躺一会，看看报纸。你的脸色很疲倦，瓦吉姆。今天我来开车。”

他觉得自己不舒服，就同意了，中午，她亲自把车从汽车房开出来，坐在方向盘前，后来，他们刚开出郊外小村，来到沙沙作

响的、发热的公路上，眼前就展现出一片春光明媚的远景。一路上他们不再想起早上的谈话，也不再提一个字。这种有意识的沉默使他们心心相连，偶尔询问似地互相看一眼。开到离莫斯科只有五公里的最后一个村子里，紧接着从菩提树公园后面，隐隐现出新开辟的郊区的发白的方形塔式建筑群。她不知为什么在一个铁栅栏旁停了车。穿过栅栏可以看见这里的一座大门敞开的小教堂，里面正在做礼拜。在昏暗的教堂深处，烛光若隐若现。教堂前的台阶上有一些包着头巾、鬓发斑白的小老太婆。丽达用负疚而又坚决的声调说：

“瓦吉姆，原谅我，我去一下。我早就想到这里来一趟。”

“干什么？”他问。一想到她和他自己是不是变得神经失常，他不禁打了个寒颤，随即低沉地说：“好吧，我等一等。好，你去吧。”

“我不信上帝，瓦吉姆，我只是想去一下，请原谅我。”她说着，从座垫上拿起手提包，“我要给我们的孩子……点支蜡烛，需要这样。”

他耐心地坐在被阳光晒热的轿车里，等了她半个多小时，一边聆听着牧师在教堂神秘的拱顶下发出像是远处的隆隆声，又像是发自地下的宣叙调。教堂里点着各种颜色的蜡烛，显得很温暖，那里也有为伊戈尔点的蜡烛。阳光晒得汽车外壳发烫，闷热得很。这股热气中传来的阵阵洪亮的、非尘世的声音，压迫他的心脏，使它受到滞阻，几乎停止跳动。空气不足，没法呼吸了。他取了一片戊酸薄荷脂，正吮吸着药片的薄荷的清凉味，看见她出来了，苍白的脸低垂着。她一边走，一面打开手提包，急忙施舍着硬币，有点不好意思地把钱塞到老人恭恭敬敬伸出来的手掌里。接着，她坐到了方向盘前，哭肿了的眼睛瞥了他一下，她说：

“原谅我，亲爱的，让你等我。我不能很快……”她说着，陷入悲哀的沉思中。“这是多么崇高的声音：‘教堂属基督，教堂归基督，教堂为基督。’还有：‘罪孽深重的大地’‘彼得仙逝’。唉，可惜我没有学过教会斯拉夫语。多么崇高、多么悲壮的古代语言！”

看来，她讲的不完全是她在教堂里想的。他知道，她并不信教，但是她被命运残酷无情地带给他们的意外打击所压抑，他完全能猜到她想在教堂里体验到的是什麼。他沉默不语。她微低着头，不停地弄着膝盖上的手提包，反复地打开又扣上，似乎她的思想不能集中，弄不明白他们坐在轿车里要到哪儿去，去干什么。最后，她终于放下手提包，但没有发动马达。她用像从虚无的境界返回来的、失神的眼神重又看了看他，只见她的双眸闪动了一下，突然睁大了，渗进了一阵恐惧。

“瓦吉姆，你心痛吗？还在痛？”她急忙从衣袖里抽出一块手帕，替他擦去鬓角上的虚汗，自己很痛苦地低语道：“看你，干吗要瞒着我？痉挛了？把你的痛苦给我吧，我的亲人，要是可以的话，就给我吧……还是让我承担的好，让我承担的好！……”

“丽达，我只是夜里没有睡好。”他说，从心底发出的柔情和一阵突发的亲人间的同情，使他激动得声音嘶哑。他那样感激地、狂热而又爱抚地吻了吻她的还握着手帕的手。在他们相识的最初几年中他都没有这样做过。

“丽达——她想承担我的痛苦。而我……却想承担另一个人的痛苦——爱玛的痛苦。我也是在汽车里吻了她的手。承担别人的痛苦，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是疯狂，这是理智所难以理解的。但也许正是在这里面含有我们心里所有的最富有人性的、最主要的东西？在别人的痛苦面前感到负疚？我第一次有这种

感受,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是在一个春天,在德国的一个城郊的小镇上。那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战争已经完全结束,那时克尼亚日科已经牺牲了。

“是谁说过,一个人只有当他成为永生不灭的时候,才是真正幸福的呢?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去认识生与死的伟大奥秘,——又怎样去认识呢?这就意味着要找到不可能存在的、极端的東西……尝尽一切苦难、疑虑、探求、斗争。使人们失去生活本身的意义,也就意味着失去克服了一切困难之后的暂时的欢乐。是的,是的,不容争辩的实质就在其中。取消了这个动力,人们就会变成一堆蚂蚁,就会诅咒自己的苟活。这么看来,也许死——就是对最终真理的最高认识吧?这是多么熟悉的思想……谁的思想?不管是谁的反正都是一样……不,一个人,只有当他掌握了不可思议的奥秘,——不再害怕死,这时他才是真正幸福的。那时,也不会去想他经历的生活,不去考虑什么是幸福了。可是,往后呢?往后是什么呢?一个人只要一开始想到自己是个幸福的人,他马上会产生害怕失去幸福的想法,这时他已经是不幸的了。为什么我要去想这些问题呢?我曾经是个幸福的人吗?在什么时候呢?我能记起我生活中最美好的时刻吗?是哪几秒钟?哪几分钟?哪几小时?是童年时代?青年时代?但是战争,战争……莫非那些永远失去了的东西,就是真正的东西?奇怪的是,一个人总是当他失去了过去时,才会感到往事是不可再得的。而把失去的东西和现在的东西联系起来,则会产生一种特别的欢乐。也许,企图使往事复返,这是一种保护性的反应?难道往事,就是对不能再现、不可复返的东西的怀念:就像对初恋,对美好的童年生活中一个不寻常的片段——在晌午时分天堂般暖洋洋的河面上有一只浴满阳光的渡船,船上散发着焦油味、马匹的气味和大车上晒得热烘烘的干草香味——以及对那个绿色的、天国般的、蜂蜜一

般的夏日幸福的彼岸的怀念吗？是啊，有过这样一个彼岸……我曾不止一次梦见过它，它也只是在梦中一再出现，使人产生一种虚幻而幸福的忧伤，使我早晨醒来，觉得喉头哽咽，希望把我亲身感受过的、但不知在哪儿失去了的童年生活的这个美好的片段留在记忆中。我回想这些梦境的时候，希望从中感受并抓住一点：那就是在这里有一条人类生活中伟大、神圣、宝贵的规律，这是希望的规律，相信没有任何东西会不留痕迹地消逝。这是背叛人们肉体死亡的规律，希望一切事物都是永恒的……一个人年过四十，去思考和理解他开始感受的许多事，这是何等的快乐……乐趣就在这思考之中……或许，这个思想是来自美好的梦境？可是心口为什么这样疼痛？我们是在哪里？在飞机上吗？戊酸薄荷脂也不管用了。我没有估计到，应该带上硝酸甘油。……这思考本身是多么大的乐趣。那‘瓦吉姆，瓦吉姆！’的呼唤又是多么美好的呼声！也许这是我和丽达坐在轿车里……开车离开那个公园，离开那个教堂的栅栏。她用手帕擦着我的额头，说：‘把你的痛苦给我吧……’她的手上和手帕上发出一股温柔亲切的气息……就像夏天早晨的干草的味道……我是在哪里？我是在哪里？……”

他好不容易醒来，听出马达单调和降低的轰鸣声，看见微弱的光亮中的机舱里前面那后仰的椅背，还有左边熟睡了、双手交叉在肚子上的萨姆索诺夫。他按摩了一下心口，俯向舷窗。高空中一轮明月放着光辉，往后移去。在笼罩着看不见的地面上空的蓝紫色的云尘中，庞大的、似乎弯曲的机翼像猛禽似地飞驰着，这是现代翼指龙的翅膀，幻想中的蝙蝠的翅膀。飞机打着信号，粉红色的反光在机翼面上一亮一灭，舷窗玻璃上一条条线条，像示波器荧光屏上的脉冲，急速地滑过，留下细细的横道。

也许,这是因为寒冷而凝聚的极其细微的水气。

“您可知道,人类生存的意义是什么?人类的未来是什么吗?”尼基金不知为什么想起了一年前和他认识的一位年轻物理学家的争论。“这个意义就是加速运动,就是征服整个世界,然后征服整个宇宙。但是在相对论中有一个谜:如果速度超过光速,那么无限的加速运动会把我们带到哪儿呢——带到未来还是带回到过去?你可以设想,它没有把我们带到火星上去,只会使我们返回到基辅罗斯时代。

“人为什么要征服宇宙,又为什么要回到基辅罗斯去呢?为了什么呢?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岸,有幸福的岸,有被分隔开的、不幸的岸……”

于是他闭上眼睛设想,此刻,在远离地面的险恶的、层层叠叠黑暗的高空,在那茫茫的空间,在这架孤单的飞机的金属机身外面,该是多么寒冷。他想象下面的仿佛被人们遗弃和凌辱的星球像是一粒永远被遗失的尘屑。他还觉得,他不愿意和过去、和地球上的一切永别。以往的那一切比现在的更加有力、更加实在、更加牢固地活在他的心中。令人欢乐的缕缕忆念,像梦境一样,带着像疼痛那样刺心而明晰的真实感在他面前一幕幕地掠过。

起初他看见的是夜、深灰色的田野、干草棚敞开的门口吹来一阵清新的寒气。那儿已经稍稍泛蓝,空气变得更寒冷了。森林上空低垂的星座,闪着最后的光芒。黎明前草儿变冷了。接着,好像在童年时候,出现了一片透进阳光的快乐的小树林,微风拂过,白杨树顶发出簌簌的声音,树叶嬉戏着,闪着光亮。在这夏日的田野和小树林后面的遥远的地方(他想起那无限遥远的地方,心里特别难受)偶尔传来隆隆的声响。那儿有一座城市,湮没在暴风雪的暮色中。飞扬的雪雾裹住了电车和胡同深

处的路灯。而在某一个地方，在春天的太阳底下，大炮在潮湿的田野上前进。眼睛碧绿、举止敏捷、身材像柳树般挺拔的克尼亚日科中尉和尼基金踏着沾满泥巴的窄窄的皮靴在大炮旁走着。无限美好的夕阳映照在一幢爬满常春藤的屋墙上。三月的金色阳光闪烁着，映照在德国田园式的瓦屋顶。宁静的晚霞在特列帕托夫公园的林荫道上升起。一只蝴蝶在充满晨光和花园里飘来的凉意的房间里飞舞。爱玛嘴唇冰凉，她那欢乐的、晶莹蔚蓝的双眸凝视着白色的天花板。接着，又是晌午暖洋洋的河水，好闻的马匹的气味，焦油味和大车上香甜的干草味，又是那绿色的、神秘的、美好的、使他一生充满了希望的彼岸……

心口疼痛得如同刀绞一样，无法忍受，周身感到针刺般的寒颤。他呻吟起来，用手一推，抓住了软椅的扶手，他睁开眼睛，看见上面是黑夜的星空，下面也是黑夜的星空。机翼上突出的起落架的支腿伸向下方，飞机依旧向低空用红光发着信号。他还来得及想：

“难道就在这儿吗？是吗？”

这时，他模糊地听得，萨姆索诺夫由于马达声减弱，被他的呻吟声惊醒，在软椅里坐起，还没有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惊恐地唠叨起来，突然一把紧紧抓住他的肩膀，用刚刚睡醒的嘶哑的声音喊起来：

“瓦吉姆，瓦吉姆！你——怎么啦？……”

“是谁不久前这样叫过我？”尼基金的头脑里一闪而过，“是妻子？是爱玛？在哪儿？什么时候？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吗？为什么它还留在我的心中？我一直在回到那儿去吗？丽达怎么办呢？她又怎么办呢？……”

他已经不再疼痛，他要和自己永别了，他在充满干草味的渡船上，在晌午暖洋洋的水面上徐徐飘浮，飘浮，快要靠岸，却怎么

也靠不到那绿色的、天国般的、阳光灿烂的、使他终生充满了希望的彼岸。

1970—1974 年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口
口口
口口